

# 地缘看世界

大航海时代（上）



温骏轩 / 著

# 地 缘 看 世 界

大航海时代（上）

非洲 / 南亚 / 东南亚

仅供学习  
禁止商用

## 目 录

第一章 西班牙光复运动中的地缘政治整合 .....	1
第一节 阿斯图里亚王国的兴起和扩张 .....	1
第二节 巴斯克人建立纳瓦拉王国 .....	3
第三节 伊比利亚基督教势力的第一次整合潮 .....	5
第四节 基督教国家蚕食泰法诸国 .....	8
第五节 基督教势力完成收复失地前后的整合潮 .....	10
第二章 跨撒哈拉贸易商道开通的背景 .....	13
第一节 葡萄牙攻占北非地区的休达港 .....	13
第二节 柏柏尔人开通前往黑非洲的金盐之路 .....	15
第三节 西非地区的地理结构 .....	17
第三章 西非地区三大黄金帝国的盛衰 .....	19
第一节 古加纳王国核心区的位置 .....	19
第二节 柏柏人南下建立古加纳政权 .....	22
第三节 穆拉比特王朝对加纳帝国衰落的影响 .....	23
第四节 马里向内尼日尔河三角洲扩张 .....	25
第五节 图阿雷格人南下对西非的影响 .....	27
第六节 马里帝国的衰弱与桑海帝国的崛起 .....	31
第七节 桑海帝国控制撒哈拉沙漠中的盐矿 .....	33
第四章 乍得盆地和乔斯高原的地缘格局 .....	37
第一节 乍得湖的特点及其区位优势 .....	37
第二节 乍得湖区和乔斯高原兴起的政权 .....	38
第五章 葡萄牙在西非以西海岸的探索 .....	41
第一节 葡萄牙发现并开发马德拉群岛 .....	41
第二节 葡萄牙在加那利群岛建立据点 .....	44
第三节 葡萄牙海上探险资金的主要来源 .....	47
第四节 葡萄牙船队发现亚速尔群岛 .....	49
第六章 葡萄牙在几内亚湾海岸的探索 .....	51

第一节 葡萄牙在西非猎取黑奴 .....	51
第二节 葡萄牙进入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 .....	53
第三节 葡萄牙人到达胡椒海岸 .....	55
第四节 葡萄牙人到达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 .....	58
第五节 德国在奴隶海岸的殖民地 .....	60
<b>第七章 葡萄牙人在中非地区海岸的探索 .....</b>	<b>64</b>
第一节 马格里布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 .....	64
第二节 葡萄牙人在邦尼湾的探索和收获 .....	65
第三节 欧洲国家在喀麦隆地区的殖民 .....	68
第四节 非洲热带雨林中俾格米人的特征 .....	70
第五节 葡萄牙人沿海岸南下至刚果河口 .....	72
第六节 比利时殖民刚果盆地的背景 .....	75
第七节 葡萄牙在安哥拉建立殖民据点 .....	77
第八节 法国在刚果盆地获取的殖民地 .....	79
第九节 法国在非洲大陆获得的殖民地 .....	81
<b>第八章 葡葡人在南部非洲西海岸的探索 .....</b>	<b>85</b>
第一节 葡萄牙人南下航行至纳米布沙漠 .....	85
第二节 迪亚士冲破骷髅海岸探索至好望角 .....	87
第三节 科伊桑人的生存环境和族群特征 .....	89
第四节 班图人南下压缩科伊桑人的空间 .....	91
第五节 葡萄牙人航行非洲南端的开普半岛 .....	93
<b>第九章 哥伦布向大西洋以西探索发现美洲 .....</b>	<b>95</b>
第一节 哥伦布在西班牙资助下向西探索 .....	95
第二节 哥伦布在美洲发现的陆地 .....	97
第三节 哥伦布结束在美洲探索返航 .....	102
第四节 西班牙和葡萄牙以教皇子午线分割世界 .....	106
<b>第十章 达·伽马在南部非洲东海岸的探索 .....</b>	<b>109</b>
第一节 南非班图斯坦制度形成的背景 .....	109
第二节 南部非洲在地缘上的覆盖范围 .....	110
第三节 南非高原的地理结构 .....	113
第四节 大津巴布韦文化因黄金贸易而兴盛 .....	116

第五节 葡萄牙与莫诺莫塔帕王国建立贸易联系 .....	119
第六节 达·伽马北上遇到逆洋流和僧祇城邦 .....	122
<b>第十一章 达·伽马船队在东非海岸线的探索 .....</b>	<b>125</b>
第一节 穆斯林在东非形成斯瓦希里城邦 .....	125
第二节 东非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	127
第三节 卢旺达和布隆迪种族屠杀产生的背景 .....	129
第四节 达·伽马在东非补给后跨过印度洋 .....	131
<b>第十二章 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建立国家与文明 .....</b>	<b>135</b>
第一节 印度河文明的初始位置和特点 .....	135
第二节 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创立宗教体系 .....	137
第三节 中国春秋战国与印度列国时代的异同 .....	140
第四节 波斯拜火教无法同化印度雅利安人 .....	143
第五节 孔雀王朝收复印度河平原和统一印度 .....	145
第六节 婆罗门教升级为印度教的技术调整 .....	148
第七节 笈多王朝在孔雀王朝分裂后重新统一印度 .....	150
<b>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势力入主印度对其的影响 .....</b>	<b>152</b>
第一节 阿拉伯帝国和伽色尼王朝入侵印度 .....	152
第二节 古尔王朝击败拉杰普特联盟后入主印度 .....	154
第三节 蒙古入侵印度的德里苏丹国 .....	157
第四节 拉杰普特人在穆斯林政权压力下的选择 .....	158
第五节 帖木尔与巴布尔先后入侵印度 .....	160
<b>第十四章 南印度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b>	<b>162</b>
第一节 锡兰岛的族群和宗教结构 .....	162
第二节 印度南北差异在语言结构上的体现 .....	165
第三节 雅利安人渗透德干半岛的路线 .....	167
第四节 拉杰普特人建立遮娄其王朝 .....	171
第五节 东遮娄其王朝与南印度诸国的博弈 .....	172
<b>第十五章 马来群岛地区文明与国家的产生 .....</b>	<b>175</b>
第一节 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	175
第二节 马来半岛成为马来板块的文明起点 .....	176

第三节 爪哇国和三佛齐在南洋的崛起 .....	177
第四节 三佛齐征服爪哇国并与朱罗对决 .....	179
<b>第十六章 孟加拉与印度东北部的地缘特点 .....</b>	<b>183</b>
第一节 孟加拉形成独立板块的原因 .....	183
第二节 阿萨姆国统治印度东北部地区 .....	184
第三节 孟加拉在宗教信仰选择上的变迁 .....	186
第四节 曼尼普尔人经营英帕尔盆地区 .....	187
<b>第十七章 德里苏丹国衰亡后的印度地缘格局 .....</b>	<b>191</b>
第一节 德里苏丹国没能完成整合南印度 .....	191
第二节 印度在后德里苏丹国时代陷入分裂 .....	193
第三节 巴布尔入主印度建立莫卧尔王朝 .....	195
<b>第十八章 达·伽马航行至印度时面临的形势 .....</b>	<b>197</b>
第一节 达·伽马船队抵达印度马拉巴海岸 .....	197
第二节 达·伽马船队逆风返航时使用的风帆 .....	199
第三节 达·伽马船队因坏血病而减员 .....	202
<b>第十九章 葡萄牙因贸易权与卡利卡特开战 .....</b>	<b>203</b>
第一节 葡萄牙再次组织船队前往印度 .....	203
第二节 葡萄牙第三次至印度时与古利卡特交战 .....	204
第三节 葡萄牙在柯钦构筑城堡抵御卡利卡特 .....	205
<b>第二十章 葡萄牙夺取印度洋贸易主导权 .....</b>	<b>209</b>
第一节 葡萄牙控制东非海岸和中东航线 .....	209
第二节 威尼斯与穆斯林国家结成反葡联盟 .....	211
第三节 葡萄牙在第乌海战击败穆斯林舰队 .....	213
第四节 葡萄牙在印度建立殖民据点 .....	216
第五节 香料的主要种类和分布区域 .....	218
<b>第二十一章 元朝海军跨海远征占城和爪哇 .....</b>	<b>220</b>
第一节 爪哇岛崛起新政权挑战三佛齐 .....	220
第二节 元朝进攻安南和占城中的失败 .....	222
第三节 元朝海军远征爪哇以失败告终 .....	224
第四节 征爪哇之役产生的后续影响 .....	227



<b>第二十二章 满者伯夷崛起后征服马来世界</b>	229
第一节 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政治格局	229
第二节 马来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格局	231
第三节 满者伯夷征服马来世界建立帝国	233
第四节 巴塞苏丹国伊斯兰化对马来世界的影响	235
<b>第二十三章 中南半岛各民族进入文明时期</b>	238
第一节 中南半岛湄公河流域的地缘结构	238
第二节 孟人和高棉人的崛起与相争	241
第三节 泰人南下湄南河平原建立王朝	243
第四节 缅人和泰人在马来半岛的分割线	246
第五节 泰人在马来半岛南部控制的区域	248
<b>第二十四章 三佛齐的灭亡对南洋格局的影响</b>	252
第一节 满者伯夷攻灭意图再坐大的三佛齐	252
第二节 梁道明与陈祖义控制三佛齐故地	254
第三节 阿拉伯人在南洋传播伊斯兰教的方式	255
第四节 马来西亚的族群和地理结构	257
第五节 马六甲王国的建立及其伊斯兰化	260
第六节 马六甲海峡北岸的地理结构	261
<b>第二十五章 郑和下西洋对南洋地缘格局的影响</b>	265
第一节 明朝时中国对东洋和西洋的划分法	265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行为本质	266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时召回移民并剿灭陈祖义	268
第四节 色目人在元朝和明朝时的社会地位	271
第五节 明朝解决主体民族与穆斯林结构性矛盾的方法	274
第六节 郑和下西洋时对马六甲王国的扶植	277
<b>第二十六章 荷兰引入华人开发南洋地区</b>	281
第一节 中国人口剧增使下南洋成为现实	281
第二节 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在南洋扩张	282
第三节 荷兰争夺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	284
第四节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开发南洋引入华人	285
第五节 荷兰在香料贸易衰落后引入甘蔗种植	288

第六节 蔗糖贸易衰落引发荷兰人屠杀华人 .....	290
<b>第二十七章 婆罗洲的族群结构和政治格局 .....</b>	<b>294</b>
第一节 婆罗洲的土著民族及文明发展水平 .....	294
第二节 婆罗洲沿岸港口形成的苏丹国 .....	297
第三节 达雅人依赖原始森林维持自身特性 .....	298
<b>第二十八章 西加里曼丹华人社团的政治演化 .....</b>	<b>301</b>
第一节 华人前往加里曼丹淘金并结成社团 .....	301
第二节 洪门 / 天地会所选择的凝聚点和理念 .....	303
第三节 青帮的起源及其组织架构 .....	306
第四节 加里曼丹华人以洪门组织方式聚结 .....	308
第五节 兰芳公司与和顺总公司的建立 .....	310
第六节 英国和荷兰划分在南洋的势力范围 .....	313
第七节 荷兰征服西加里曼丹诸华人社团 .....	315
<b>第二十九章 北婆罗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b>	<b>317</b>
第一节 华人与英国人渗透入婆罗洲北部 .....	317
第二节 苏禄王国控制婆罗洲沙巴地区 .....	319
第三节 英国夺取苏禄王国的沙巴地区 .....	321
第四节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的分离主义 .....	322
第五节 华人在婆罗洲的人口比例的变迁 .....	323
<b>第三十章 葡萄牙攻取马六甲产生的影响 .....</b>	<b>325</b>
第一节 葡萄牙征服南洋马六甲苏丹国 .....	325
第二节 亚齐苏丹国崛起并与葡萄牙对抗 .....	326
第三节 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城 .....	329
第四节 荷兰雇佣布吉人与马来亚锡矿的开发 .....	330
第五节 米南加保人在马来亚建立森美兰国 .....	333
<b>第三十一章 英国殖民马来亚对其地缘结构的影响 .....</b>	<b>335</b>
第一节 英国建立海峡殖民地与南洋华人的分化 .....	335
第二节 君主立宪制及其他政治权力分配模式的利弊 .....	337
第三节 英国建立马来联邦并与泰国分割马来半岛 .....	340
第四节 英国治下南洋各板块组建马来西亚 .....	341



# 第一章 西班牙光复运动中的地缘政治整合

## 第一节 阿斯图里亚王国的兴起和扩张

一提到“大航海时代”，大家首先想到的国家肯定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两颗“牙”：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前在交待过阿拉伯帝国对西哥特王国的征服后，整个中世纪中后期，伊比利亚几乎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不过现在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是时候回过头来看看这几百年，伊比利亚半岛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了。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伊比利亚这些年来所发生的故事的话，那就是“收复失地运动”（又称“西班牙光复运动”）。从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时算起，至15世纪末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据点被拔除为止，这场发生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圣战”，前后延续了将近700年。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部伊比利亚内部的地缘政治整合史。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伊比利亚的政治结构上时，会发现有两个奇特的现象：一是葡萄牙的存在。在西班牙几乎以伊比利亚地理边界立国的情况下，葡萄牙看起来很突兀的在半岛西海岸割去了一块矩形之地立国；二是西班牙内部的政治结构。议会君主制的政治框架，使之看起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然而从行政角度来看，全国被划分为十七个自治区（另加两个自治飞地）的西班牙，又似乎更像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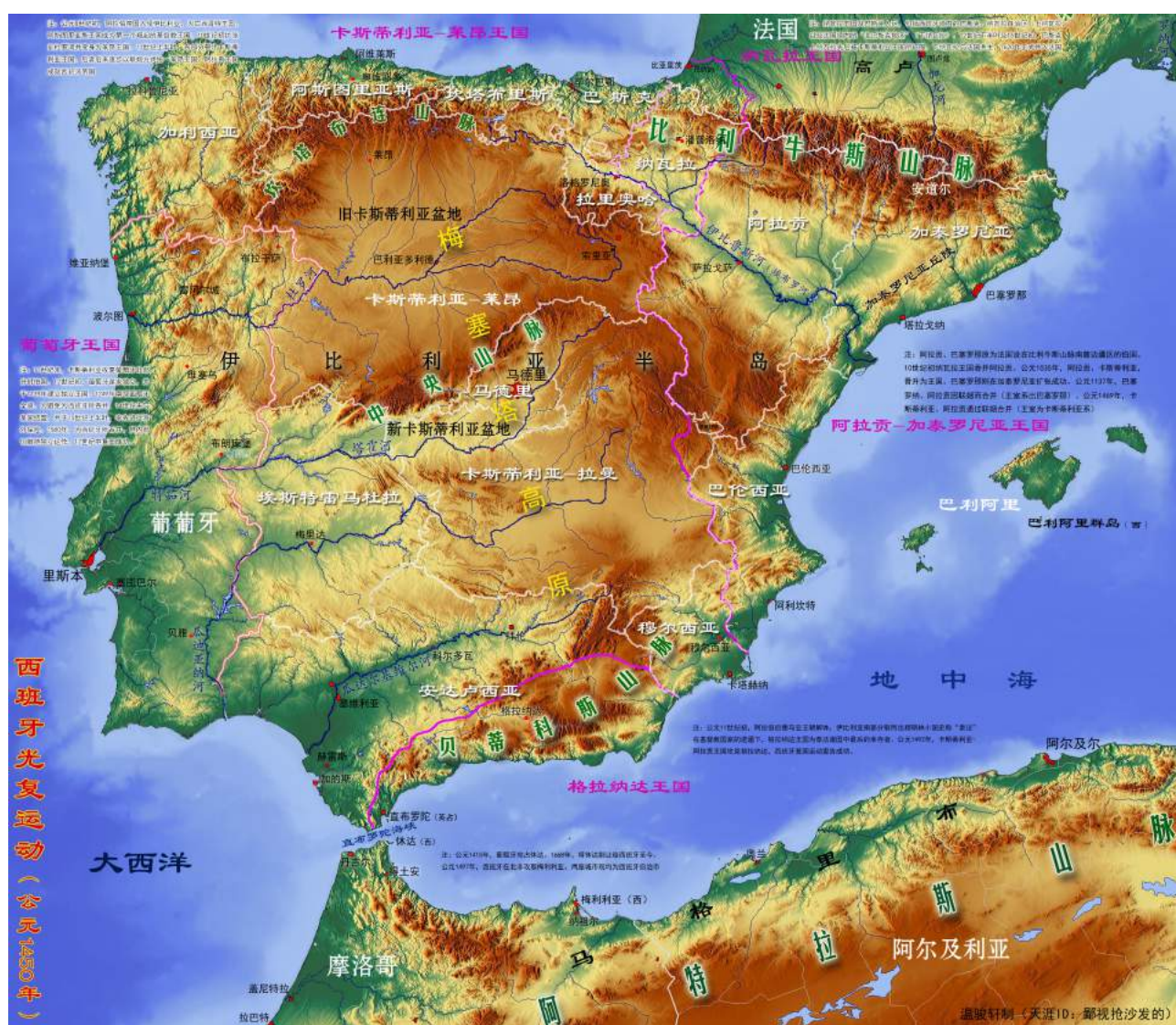
了解这一切的缘由有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那就是国旗。与欧洲许多国家所使用的那种能够引发“脸盲症”的三色旗不同，西班牙略显复杂的国旗就是一部浓缩的地缘史拼图。事实上，后面葡萄牙出场时，我们同样能够在它的国旗中找到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它的前世今生。鉴于很多人有可能是球迷，下述内容对你在球迷圈里升级应该也会有所帮助。

西班牙国旗整体设计上，并没有脱离欧洲主流的条状色块拼接模式。国旗的上下为两条红色窄边，中间则填充黄色。比较特别之处，是它中间放置了西班牙国徽。而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也正是在这个国徽之中。在欧洲中世纪，盾徽是一个家族或者政治体的标志，就“盾”这一形制来说，也可看出它的军事采邑制背景。西班牙的国徽核心也是一面盾，不过这面盾徽本身又是由四面分别代表着四个中世纪古王国的盾徽所组成的。这四个古王国分别是：左上角的“卡斯蒂利亚王国”（红底金城堡）；右上角的“莱昂王国”（白底紫狮子）；右下角的“阿拉贡王国”（黄红竖条纹）；右下角的“纳瓦拉王国”（金色链网纵横相交的十字）。

需要说明的是，也许是因为国旗的设计太过复杂，西班牙民间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国旗时，也经常使用去除国徽的版本。不过很显然，只观察这样的国旗对我们来

说就没什么意义了。

如果再加上没有被并入西班牙的葡萄牙，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一千年来的地缘政治史，就是这五个王国的博弈史。不过这五大王国并非是一时间出现的，“收复失地运动”中也并非只出现过这五个王国。在西哥特王国崩盘之后，伊比利亚半岛最先兴起的基督教王国，是没有出现在上述榜单中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在公元8世纪初的阿拉伯征服中，后来被称为“摩尔人”的穆斯林并没有能够征服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半岛西北边缘的坎塔布连山脉，成为了西哥特人最后的保护者。依托这条山脉，西哥特人抵御住了摩尔人的进攻，并重新建立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受这段光荣历史的影响，坎塔布连山脉之北至海岸线的这条狭长地带，也有机会以“阿斯图里亚自治区”之名，跻身于西班牙十七个自治区之列。



西班牙光复运动（公元1450年）

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西哥特人，并不认为这是他们事业的终点。在随后的



数百年间，他们和半岛北部随后兴起的其它基督教国家一起，开始了漫长的收复失地运动。基于位置的关系，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南下之路并不平坦。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是一个以山地、高原为主，四周环绕沿海低地的地区，整个中心高地被称之为“梅塞塔高原”。在阿斯图里亚地区之南，就是高原上最大的一个地理单元——旧卡斯蒂利亚盆地。北部的坎塔布连山脉以及半岛中部的“中央山脉”，是这个形状近乎完美的锅状盆地的南北边界。横穿整个盆地，西向从葡萄牙北部城市波尔图入海的“杜罗河”则是盆地的中轴线。

在随后的岁月里，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一直试图越过坎塔布连山脉，向伊比利亚半岛腹地渗透。公元10世纪初，差不多花了两百年时间，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收复失地运动”取得了重大突破，将基督教的控制线进逼到了杜罗河一线，并一度控制了整个“旧卡斯蒂利亚盆地”。领土大幅扩张之后，阿斯图里亚斯的位置就显得过于边缘了。为此，王国的都城开始从坎塔布连山脉北部的奥维耶多，迁往山脉南部的“莱昂”。王国也因此改名为“莱昂王国”，并在今天西班牙的国徽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变身为“莱昂王国”，并非只是名字变更和领土扩张那么简单。促成这一转化的君主（阿方索三世），认为自己已经在反击异教徒入侵的事业中占得先机，并有能力成为所有伊比利亚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不过这个梦想最终却并没有实现，因为在王国突破中央山脉之际，西班牙国徽上的另一面盾牌——纳瓦拉王国的崛起，对旧卡斯蒂利亚盆地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

## 第二节 巴斯克人建立纳瓦拉王国

建立纳瓦拉王国的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欧洲民族：巴斯克人。王国正式立国的时间是在公元9世纪初，比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晚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然而巴斯克人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抵御摩尔人入侵的历史，却并不比西哥特人晚多少。事实上，阿斯图里亚斯王国能够在最后时刻抵御住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正是因为得到了巴斯克人的支援。共同的信仰，使得双方站在了同一阵线。不过，如果莱昂王国——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是基于历史原因（直接传承自西哥特王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认定成为伊比利亚主人的话，那么纳瓦拉王国肯定会表示不屑。要知道巴斯克人进入伊比利亚的时间，可是比西哥特人要早得多。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巴斯克人是古伊比利亚人后裔，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继承者。关于古伊比利亚人是什么时候抵达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让人疑惑的是，欧洲东部那些非印欧语民族，如隶属乌拉尔语系的芬人、马扎尔人，都能够明确发现他们的迁移路线，并且在欧洲以外找到亲缘民族，但巴斯

克人和他们继承自古伊利里亚人的巴斯克语，却是孤独的存在于伊比利亚半岛一角。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他们抵达欧洲的时间比之印欧语系的凯尔特、日耳曼等族要早得多。另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古伊比利亚人并非和欧洲其它民族那样源自欧亚相接之处，而是从地中海南部的北非迁徙而来。也就是说，巴斯克人祖先的迁徙路线和迦太基人、阿拉伯人类似。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最早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印欧人“凯尔特人”与古伊比利亚人之间的碰撞，才是伊比利亚半岛南北地缘博弈的开端。实际上，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史中，消失的民族、种族应当是数不胜数的。幸运的是，古伊比利亚人还有巴斯克人这个后代能够帮助今天的我们记起这个古老的民族。考虑到伊比利亚半岛在已知的历史中，曾经遭遇过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的入侵，能够做到这点实属不易。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巴斯克人顽强生存至今，他们在西班牙的光复运动中又发挥了怎么样的特殊作用？

对于身处大陆的弱小民族来说，山地总是他们最好的保护。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的情况都是如此，巴斯克人也不例外。坎塔布连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的相接之处，南抵埃布罗河上游，北至海岸线以及西、法边界处的这片山地，是今天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所在位置（首府为维多利亚）。世人听闻这片巴斯克人之地，多是通过以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以及只招收巴斯克人却从未降过级的西甲俱乐部“毕尔巴鄂竞技队”而了解的。

然而事实上，我们认知中的“巴斯克”却并非唯一的巴斯克人行政区，在它的东部还有一个面积更大点，覆盖一段埃布罗河谷的“纳瓦拉自治区”（首府为潘普洛纳），实际也是巴斯克人的领地。只不过相比前者，纳瓦拉人似乎更认同他们在西班牙国旗中的地位，以至于 30 多年前（1979 年），巴斯克人邀请他们共同组建巴斯克自治区的时候，纳瓦拉人并没有同意。

山地民族属性，以及长久以来危机四伏的地缘政治环境，造就了巴斯克人强悍的战斗力。不过从一个边缘民族跻身核心政治圈，还是需要机遇的。如果说阿尔巴尼亚人能够抵御住斯拉夫人的压力维持民族独立，很大程度是受益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扩张的话，那么巴斯克人能够和纳瓦拉王国联系起来，并出现在西班牙政治核心圈，也要感谢一下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与阿尔巴尼亚人转变信仰，倒向穆斯林一方不同的是，巴斯克人选择了和其它日耳曼系基督教国家一起，推进“收复失地运动”。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拥有海岸线的“巴斯克”比之“纳瓦拉”要更有发展空间。这一点，从人口数据上也可以看出。前者的面积只有后者的 70%，但人口却是后者的 4 倍。其中巴斯克人口不少于 210 万，仅身处沿海的毕尔巴鄂的人口就多达百万，然而在中世纪及以前情况却并非如此。面向大西洋的出海口，价值并不如埃布罗河这样的大河河谷潜力更大。这点从 9 世纪——12 世纪，这个巴斯克人开创王

国被称之为“潘普洛纳王国”（之后更名为“纳瓦拉王国”）也可以看出。如果说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扩张空间在旧卡斯蒂利亚盆地的话，那么巴斯克人的方向就是埃布罗河河谷了。

事实上，巴斯克人应该比同时期的其它民族更有资格得到埃布罗河河谷。古希腊人是伊比利亚人最早的“发现者”。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人的名称，则源自于埃布罗河的古名——“伊比鲁斯河”。换言之，以巴斯克人后来的位置来说，他们的祖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最初被古希腊人“发现”的伊比利亚部落，随后被不断入侵的外来民族压缩至伊比鲁斯河上游地区。当然，这一历史对于身处乱世的巴斯克人来说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它现在有没有实力压倒竞争对手。

### 第三节 伊比利亚基督教势力的第一次整合潮

纳瓦拉王国在伊比鲁斯河谷的竞争对手，并不仅仅是北上的穆斯林，还有南下的法兰克人。公元8世纪中（矮子丕平建立“加洛林王朝”），趋于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开始对外强力扩张，并用了半个世纪时间建立了“查理曼帝国”。在这个过程中，近在咫尺的伊比利亚半岛也成为了法兰克扩张的方向（一如当年与迦太基相争的罗马一样）。高举着圣战旗帜，很多法兰克贵族希望能够在比利牛斯山脉之南有所建树。这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两个边疆区（伯国）：一个是比利牛斯山脉西南麓的“阿拉贡”；一个是山脉东南麓的“巴塞罗纳”。

阿拉贡的名字，得自于伊比鲁斯河中游左岸河流“阿拉贡河”。巴塞罗纳的直接扩张方向，则主体是比利牛斯山脉向伊比鲁斯河下游延伸出一片丘陵：加泰罗尼亚丘陵。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的巴塞罗那，是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地缘中心。可以说，西班牙的纳瓦拉自治区、阿拉贡自治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今天在伊比鲁斯河谷的排列组合，在1200年前就已经成型了。由于比利牛斯山脉的分隔，法兰克人在阿拉贡地区实际统治并不稳定。公元10世纪初，纳瓦拉王国取得了阿拉贡地区的控制权。

相比阿拉贡地区，法兰克人在比利牛斯山脉东南端的渗透要有力得多。一方面，比利牛斯山脉与海洋之间天然形成有沿海通道；另一方面法兰克人还可以通过海路施加影响力。不过对于法国人来说，地理上的自然分割依然是一个大问题，在加泰罗尼亚扩张的巴塞罗那，最终还是在11世纪初脱离了当时的西法兰克王国控制，以独立政治体的姿态参与到伊比利亚的权力之争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兰西对加泰罗尼亚的地缘影响力就此消退。今天加泰罗尼亚地区之所以主张独立，地缘政治上希望能够依靠法国是重要的原因。

只是现在的话，在整个欧洲都在走向政治统一的大背景下，寄希望于法国人去开罪西班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现实的。当然，如果有一天因政治原因（不一



定是独立后），逼着巴塞罗那俱乐部脱离西甲的话，那么最有可能成为这个欧洲豪门下一站的，必将是法甲。

需要说明的是，欧洲诸国之间的这种合并，技术上多是因联姻而形成的“共主联邦”模式，很少会改变当地原本的地缘政治结构。也就是说，诸地缘政治板块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进行政治融合，内部还是会保持原有的独立结构。今天西班牙内部自治区拼图的模式，就是这一地缘特点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结束之后，被放逐的西班牙王室又被请回来作为国家元首。也能够明白，在西班牙国徽的古王国之盾上，那顶王冠的重要性了。

在合并阿拉贡之后，强大的纳瓦拉王国又迫使莱昂王国与之进入了“共主”模式（公元 1029 年），第一次统一了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基督教地区。完成这一历史性突破的纳瓦拉君主，也成为了西班牙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大帝”（桑乔大帝）。

不过在欧洲，这种所谓的“帝国”，往往会因为继承一世而终。因为大帝们在死后，总是会遵循传统把国土公平的分给几个儿子。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短暂的统一之后，还远未完成收复失地运动的西班牙，再次陷入了分裂（公元 1035 年）。在桑乔大帝死后，除了原有的纳瓦拉王国以外，得到阿拉贡地区的继承人将之升级为了“阿拉贡王国”，体量过大的莱昂王国则被分为了二块，东部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国”（公元 1035 年）。今天旧卡斯蒂利亚盆地，行政上被称之为“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正是源自于这一背景。（注解：当时卡斯蒂利亚王国从莱昂王国东部分离出来，后又与莱昂王国合并。）

厘清西班牙光复运动中的那些政治标签，以及所对应的地缘板块，有助于帮助大家在阅读相关资料时对号入座。在莱昂、卡斯蒂利亚、纳瓦拉、阿拉贡、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这五个地缘政治板块先后脱颖而出后，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整个伊比利亚基督教世界的整合工作，也开始分化为两条主线。

分水岭原则又一次在地缘政治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比利亚半岛的南北分水线并非处于半岛的中线，而是半岛西北边缘的坎塔布连山脉东，向南延伸至东南边缘的贝蒂科斯山脉东。也就是说，整个梅塞塔高原上的河流，最终都西流入了大西洋方向。这条分水线的存在，使得由北向南推进“收复失地运动”的西班牙北部基督教国家，被自然分割为了两个方向。梅塞塔高原及其以西的伊比利亚大部，为一个整体；南北分水岭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则是以伊比鲁斯河谷及东部沿海低地为核心的三角地带。其中后者是阿拉贡和巴塞罗那的扩张方向。体现在今天西班牙的行政规划上，主要包括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

上述地缘背景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阿拉贡与巴塞罗那的合并（公元 1137 年），基于加泰罗尼亚在经济上的沿海优势，这个联合政治体的控制权落在了巴塞罗那手中（史称“巴塞罗那王朝”时期）。不过由于阿拉贡在政治上拥有“王国”的身份，“阿拉贡王国”遂成为了这个联合政治体的政治标签。就像在“海峡帝国”时期，



获得英格兰王位的“法国人”更愿意突出自己这层身份，而不是那些置于法兰西王权之下的法国爵位一样。

比起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的整合，原本同根生的卡斯蒂利亚——莱昂王国之间的整合要更早。自卡斯蒂利亚崛起之后，这个新生王国就掌控了二者整合的主导权。11 世纪末，卡斯蒂利亚王国越过中央山脉，向梅塞塔高原南部扩张，并最终在 13 世纪控制了包括特茹河、瓜迪亚纳河上游在内的高地区。这一被称之为“新卡斯蒂利亚”的区域，行政上包括现在的马德里、卡斯蒂利亚——拉曼两个自治区。从领土面积上来看，卡斯蒂利亚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高地国家要想成为伊比利亚的主宰者，还需要收获一块农业、商业潜力巨大的沿海低地。



伊比利亚半岛地缘结构图（至公元前 218 年）

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整合东部边缘，穆斯林还控制有半岛南部边缘低地时，西部的大西洋海岸线应该是卡斯蒂利亚的自然辐射区。从新、旧卡斯蒂利亚西流而

出的三条大河：杜罗河、特茹河（塔霍河）、瓜迪亚纳河，将帮助卡斯蒂利亚王国完成这一整合工作。11 世纪末，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开始越过中央山脉，开拓“新卡斯蒂利亚”时，它们在杜罗河下游也就是葡萄牙北部的扩张也获得了成功。依照封建传统，当时的卡斯蒂利亚君主在这个方向分封了一个伯国，并希望这个新生的“葡萄牙伯国”能够沿海岸线而下，帮助王国进一步向南压缩摩尔人的生存空间。

然而让卡斯蒂利亚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新生的政权却很快决定摆脱卡斯蒂利亚，将自己升级为独立的“葡萄牙王国”。从地理结构上来说，既然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能够自成一体，那么在大西洋海岸线上拥有想象空间的葡萄牙，试图摆来自中央高地的控制，也并非不可理解。只不过，后来发展成为“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

最终在 12 世纪中，经由教庭调解，葡萄牙还是如愿的与“西班牙”签订条约，获得了独立王国地位。在整个伊比利亚收复失地运动还未完成的背景下，西班牙的这种妥协并非没有道理。让葡萄牙人自己有动力南下独立推进收复失地运动，可以帮助自己分担西侧的压力。以位置来看，面朝大西洋的葡萄牙毕竟想象空间有限，基于这一背景，卡斯蒂利亚会更为在意在地中海拥有扩张空间的阿拉贡——加泰罗尼亚。

然而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卡斯蒂利亚要想整合阿拉贡（而不是被对方整合），仅仅凭借在梅塞塔高原的扩张是不够的。得到一块能够拥有地中海气候以及海岸线的沿海低地，才是其崛起的关键。幸运的是，卡斯蒂利亚天然扩张方向的区域不仅符合这两个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伊比利亚半岛最为富庶的区域。这个板块就是位于伊比利亚南部的“安达卢西亚”。

#### 第四节 基督教国家蚕食泰法诸国

从地理位置上看，安达卢西亚可以被概括为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基于这个位置，安达卢西亚一直也是西北非政治势力（比如迦太基）向欧洲扩张的桥头堡。公元 8 世纪中，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在中东击败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后，倭马亚王朝（又译伍麦叶王朝）并未从地缘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是退入伊比利亚，以安达卢西亚为中心，建立了后倭马亚王朝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都城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中游的“科尔多瓦”）。

公元 11 世纪前期，在北部基督教诸政权因纳瓦拉王国的崛起而开启整合进程时，半岛南部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却开始分裂。导致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东地中海的阿拉伯人与西北非土著的柏柏尔人之间的矛盾。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进入伊比利亚的所谓穆斯林“摩尔人”，大部分都是归依了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掌控政教大权的阿拉伯人则为少数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构性矛盾必将会引发政



权的分裂乃至颠覆。只不过在宗教识别高于一切的中世纪，民族或者部族矛盾往往是以教派矛盾体现出来的（事实上，现在依然有这种情况）。比如激进派柏柏尔人认为，“哈里发”一职并不能被固定在哈希姆家族或者阿拉伯人之中，任何穆斯林都有机会成为政教领袖。需要注意的是，阵营并非是以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为标准划分的。每一个政治体，代表的只是自己部族的利益。

由于对教义的解读不同成为了识别敌我的主要标准，从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分裂而出的阿拉伯人或者柏柏尔人统治的穆斯林小国，被统称之为“泰法”诸国（泰法为“教派”的意思）。进入“泰法”时代对于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来说并非好事，为了自身的利益，民族、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泰法诸国，与北方基督教国家结盟攻伐敌对的邻居成为了常态。相比之下，有教廷居中调解的北部天主教国家，这种情况出现就较少了（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的和解就是典型案例），彼此之间地缘政治关系更多由政治联姻而推进。

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政权也并非没有再度重新整合在一起，只是统一的力量并非来自内部，而是对岸的非洲。11 世纪末及 12 世纪中，与伊比利亚半岛隔直布罗陀海峡相望的摩洛哥地区，相继出现了两个强大的柏柏尔人王朝：阿尔穆拉比特王朝（阿尔摩拉维德）以及阿尔摩哈德王朝（穆瓦希德），它们都先后向伊比利亚进行过渗透。更为成功的后者不仅吞并了整个西班牙的泰法地区，还在非洲统一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这个空前绝后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后倭马亚王朝。为了更好的利用“圣战”牌来领导西地中海的穆斯林，穆瓦希德王朝将统治中心移往安达卢西亚（以塞维利亚为都）。

然而问题在于，统治一个横跨海峡的帝国是非常困难的。从技术角度看，这需要强大海军的支援；另一个问题在于伊比利亚穆斯林的想法，如果来自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是去帮泰法诸国进行圣战，那么他们将会很受这些国家欢迎（包括认其为宗主）。而一旦开始试图以集权之力对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进行整合时，那些伊比利亚穆斯林国家就更愿意和帮助他们维持独立的势力（哪怕是基督教国家）站在一起了。

13 世纪初，卡斯蒂利亚联合其它基督教王国，在安达卢西亚击败了穆瓦希德王朝。后者在败退回非洲后不久，便被其它穆斯林王朝所颠覆。尽管有部分泰法小国乘乱立国，但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注定没有办法阻止基督教徒们的南下。在这个世纪中，葡萄牙、卡斯蒂利亚、阿拉贡三个前线王国，都获得了与其原生位置相对应的进展。葡萄牙得以向南扩张到瓜迪亚纳河下游，并奠定了今天葡萄牙的版图；巴塞罗那领导的阿拉贡王国，在东线获取了巴伦西亚；位于其中的卡斯蒂利亚，则是这场圣战中收获最大的。特茹河、瓜迪亚纳河中游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安达卢西亚的瓜达尔基维河河谷，都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的领地。

贝蒂科山脉成为了伊比利亚穆斯林最后的保护者。凭借这条山脉的庇护，借助

穆瓦希德王朝崩溃而复国的最后一个泰法国家：格拉纳达王国（首府格拉纳达）又支撑了两个半世纪。今天我们在西班牙国徽那四面盾牌之下，能够看到一丛石榴图案，其所代表的就是又被称为石榴城的“格拉纳达”。今天格拉纳达人应该很自豪，自己有机会在西班牙的标志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这种设计所蕴藏的地缘含义，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出来。

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不同的是，在整个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文明程度包括对“异教”的宽容度比之欧洲要高。异端裁判这类极端举动，是天主教的特色。就地中海文明圈的情况来说，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度，往往与经济的繁荣程度成正比。作为联接两大世界的纽带，安达卢西亚在摩尔人统治时期，也因此成为了西地中海的经济中心。这一点也很好理解，毕竟在结构复杂的地中海地区，贸易是融通整个区域的主线。对宗教、民族更加包容者，在经济上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一定要把自己定位为多种族文化包容者的原因所在。

## 第五节 基督教势力完成收复失地前后的整合潮

15 世纪下半叶，随着收复失地运动即将完成的愿景，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世界又一次掀起了整合潮。公元 1469 年，随着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之间的联姻，现代意义上的西班牙正式出现。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历史上这种将两个或以上的王冠（爵位）集于一身（或者两位共主）的整合，并不一定代表就此能够建立统一国家。地方事务的主导权，还是在于代表地方利益的贵族议会手中。从这点来看，倒是那些直接从异教徒手中收复的失地，其意义更为重大，最起码收复者直接可以将之消化为自己的核心区。很显然，得到安达卢西亚的卡斯蒂利亚，成为经济及地缘政治上的最大受益者，并使之在与阿拉贡王国的整合中拥有比较优势。

在一个联盟性质的政治体中，一方拥有相对优势并非坏事，否则我们看到的就将是无休止的争斗。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卡斯蒂利亚人的坐大，才使得西班牙的王权有机会真正统一起来。今天卡斯蒂利亚语在西班牙的使用人数超过 7 成（官方语言即卡斯蒂利亚语），便是这种地缘政治后果的体现。当然，对于认为自己在西班牙统一进程中，曾经与卡斯蒂利亚人拥有同等机会的加泰罗尼亚人来说，接受这一现状多少会有些不服，尤其现在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在西班牙诸板块中还有一定优势时。

公元 1492 年是一个值得西班牙人和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整合在一起的西班牙拿下了格拉纳达，彻底将穆斯林的势力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然而问题在于伊斯兰政权在伊比利亚的存在长达 700 多年，想要彻底消除其烙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最为现实的，就是如何处理那些“异教徒”的问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是阻力最小的选择，在蒙古人、土耳其人的迅速扩张中，也都曾经成功

运用过。而在说服格拉纳达投降之时，西班牙曾经做出过这方面的承诺。然而对于长期处在圣战前线的西班牙来说，显然并不希望为自己留下隐患。定居于半岛的摩尔人（包括犹太人）最终被要求在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离开西班牙之间做出选择。

客观评价的话，西班牙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坚持，对于西班牙的统一（不光是政治上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使得在近现代史上，伊比利亚半岛上虽然也有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独立这样的诉求，却没有出现类似巴尔干那样的复杂局面。同时，基于对内统一和对外扩张的需要，伊比利亚半岛并没有在 16 世纪兴起的宗教改革中受到冲击，意识形态层面更为保守、更有利于集权的“天主教”，成为了西班牙乃至葡萄牙的选择。

除了收复格拉纳达外，公元 1492 年在世界史上还有一层更大的意义，那就是在这一年，代表西班牙出海的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对于整个旧大陆来说，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地理大发现”。我们接下来的解读焦点，也应该就此转向更为广阔的海洋了。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收复失地运动前期一度掌握了主动权的纳瓦拉王国，后来的走向如何。

以纳瓦拉王国居中的位置来说，如果实力足够强大的话，理论上可以同时向两边发力完成西班牙的统一。最初这个以巴斯克人为主体的王国，凭借自己的军事素质也的确做到了，然而孤立民族的短板毕竟是现实存在的。当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自成体系，一个在高原、一个在沿海向南扩张时，纳瓦拉王国的上升空间就被封死了。12 世纪初，南扩无力的纳瓦拉人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跟法国走到一起。其后一直至 17 世纪初，纳瓦拉都是以法国属地的形式横亘在比利牛斯山两侧。期间甚至有一大半的时间，法兰西国王同时也是纳瓦拉国王。

对于法国来说，纳瓦拉的归附有助于其介入伊比利亚事物，尤其在失去对巴塞罗那和阿拉贡的控制力之后。至于巴格克人，促使他们做出这一选择的直接原因，则是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压力。12 世纪后期，日趋强大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从纳瓦拉手中夺取了现在的巴斯克地区。为了避免周边两大政治集团蚕食，巴斯克人方决定从法国寻求帮助，并最终导致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地区被分割形成了巴斯克与纳瓦拉两个行政区。

不过纳瓦拉王国曾经的属地，或者说地缘层面的巴斯克地区，并不仅仅在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纳瓦拉地区。今天在比利牛斯山脉分水岭的北边，依然还有一块与现在西属纳瓦拉地区，镜像对应的法属纳瓦拉地区（面积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北巴斯克地区”或者“下纳瓦拉”（西属纳瓦拉为“上纳瓦拉”）。在比利牛斯山北的大西洋沿海方向，我们会看到一条叫做阿杜尔河的河流，所谓“下纳瓦拉”的范围，大体就是比利牛斯山脉分水线向北，至阿杜尔河下游北岸的区域。河口的法国度假圣地“比亚里茨”，应该是这一地区最为知名的地标了。

巴斯克的这种情况，与内、外高加索的情况类似。上述一切的产生，当然要归

功于巴斯克这个倔强民族数千年以来在这片山地的坚持了。只是西班牙人可以不在乎巴斯克人的国家归属感在哪，但肯定是无法容忍自己强大的邻居，在如此敏感之地插入这样一个突出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分水岭，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天然平衡线。当然，要是这样划分的话，巴斯克人势必就会被分隔在两个国家了。只是在大国相争的地缘政治舞台上，谁又会真正在乎一个弱小民族是怎么想的呢？

公元 17 世纪初，法国、西班牙两国终于就纳瓦拉的问题达成了和解。西班牙如愿得到了“上纳瓦拉”地区，法国人则直接吃掉了“下纳瓦拉”地区（纳瓦拉再无理论上的王国属性了）。如果说巴斯克地区的最终归属给人一种地缘政治平衡感的话，那么葡萄牙的存在多少还是会让人有点违和感了。至于是什么支撑着葡萄牙的独立，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二章 跨撒哈拉贸易商道开通的背景

### 第一节 葡萄牙攻占北非地区的休达港

虽然没有与地中海相接,但大部分葡萄牙领土在气候上还是归类于地中海气候。问题在于,这虽然可以让葡萄牙也出产诸如橄榄油这样的地中海特色农产品,却无法为之在地中海的贸易中分一杯羹。加上陆地只有西班牙一个邻国的现实,使得葡萄牙不管是出于寻找外援还是主动扩张的目的,都必须把目光投向真正的海洋。

14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选择了与英国结盟。彼时的英国,正处在力保其法国领土的“英法百年战争”时期。鉴于当时法兰西的海岸线基本都属于英格兰国王的属地,试图从海路寻求战略帮助的葡萄牙,看起来也不会有更合理的选择。在英国被迫退出法国之后,双方的这一战略同盟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对于随后在欧洲推行外交均势政策的英国来说,葡萄牙是他们牵制西班牙的重要同盟,尤其后来英、西还在海外有着直接竞争关系。基于几个世纪以来,两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并没有变化,直至今日,英、葡之间仍然维持着特殊的同盟关系。

寻找一个战略盟友对一个国家的生存有没有帮助呢?答案是有,但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永远不能把自身的安危系于所谓盟友身上。葡萄牙要想摆脱西班牙的压力,还需要在海外找到自己的扩张方向。就葡萄牙的地缘位置来说,西北非那片受阿特拉斯山脉庇护的“马格里布”地区,看起来是其唯一的扩张方向。当然,这一区域同样也是西班牙的天然扩张方向。对葡萄牙人来说,最大的利好在于他们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使命在 13 世纪末就已完成(完成了现有的版图),而西班牙的注意力还在解决安达卢西亚和格拉纳达王国身上。在自知没有可能和西班牙争夺安达卢西亚的情况下,葡萄牙更早的将目光投向了海洋。

15 世纪初,葡萄牙在政治上明确了海外扩张的国策,并将第一次海外行动指向了非洲的“休达”。我们知道,连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是“直布罗陀海峡”,在海峡内侧两端有两个海岬:北边隶属安达卢西亚的“直布罗陀”,以及南边归于摩洛哥的“休达”,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约 12 海里。在腓基尼人开拓西地中海贸易时期,这两地就已开始建港,并成为直布罗陀海峡的门户了。传说中代表世界尽头的两座山峰:海格力斯之柱,便身处于这两个海岬。当然,很快整个欧洲都会发现,直布罗陀海峡只能算是“旧世界”的尽头,一如海南岛的“天涯海角”一样。

葡萄牙将休达作为第一目标的直接原因,是西班牙人已经从格拉纳达王国手中夺取了直布罗陀(公元 1410 年)。可以想见的是,这个直接对手将变得更为强大,并代表基督教世界向西北非地区渗透。为此,葡萄牙人必须抢在西班牙之前动手,以使自己有机会在马格里布地区布局。对葡萄牙人比较有利的一点是,马格里布地

区当时并无强大的穆斯林政权存在。作为一座贸易城市，休达港实际是由海盗（商）所控制。

公元 1415 年，经过长达 5 年的准备，由两百艘战舰和 2 万余人组成的葡萄牙远征军，发动了休达战役，并一举拿下了这座西北非最为繁华的港口城市。随后数年间，为了夺回这个地缘枢纽，马格里布地区的摩尔人发动了多次围攻战。凭借海上支援，葡萄牙人还是力保住了这个西北非的支点。就战略层面来说，休达本来并不是这次远征的终点。无论葡萄牙还是教廷，都曾经希望能够以休达为起点，一路向东、向南征服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内的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然而以葡萄牙当时的实力来说，能做到这点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当时人口仅有 150 万的葡萄牙来说，远征休达之举已达到其国力的极限。事实上，为了这次海外行动，葡萄牙人前后共损失了上万人。为了保证远征的成功，葡萄牙不得不通过征调罪犯（可获教皇赦免）、从意大利甚至摩尔人中招募雇佣兵等措施，来补充在战争中的损失。在无力进一步扩张的情况下，一鼓作气拿下直布罗陀，然后通过控制地中海与大西洋的门户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应该算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了。事实上，葡萄牙在稳定休达局面后也的确动过这样的念头，只不过考虑到在西班牙已经抢先拿下了直布罗陀的情况下，这样做的政治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在随后的岁月里，除了继续保有休达以外，葡萄牙并没有在地中海有更大的作为。后来在奥斯曼帝国拿下埃及，并试图向西北非扩张时，地理位置和实力上都占据优势的西班牙，成为了阻止土耳其人西扩的主力。休达这个点，也在 2 个半世纪之后（公元 1668 年）也被迫割让给了西班牙（同时西班牙承认葡萄牙的独立）。不过远征休达这件事，对于葡萄牙甚至世界历史的影响却仍然是极其深远的。葡萄牙人发现，上帝虽然把他们向大陆扩张的门关上了，却为之打开了一扇海上扩张的窗。从这一时刻开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以海外扩张为主线的帝国：葡萄牙帝国，就此进入人们的视线。

既然是扩张，那必然就需要有一个方向了。很多资料认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是因为欧洲人希望绕过奥斯曼帝国的封锁，打通与东方（特别是印度）的贸易通道。这样理解也不能说错，不过如果我们把大航海时代的序曲上推到葡萄牙拿下休达的 1415 年，并由此探究葡萄牙人最初的探索目标的话，会发现海洋探索的先行者暂时并没有想那么远。比之遥远的印度，葡萄牙人有一个更现实的目标，那就是被撒哈拉沙漠所阻隔的黑非洲。

我们知道，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整个欧洲在获取东方奢侈品这件事情上，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反过来，欧洲却没有什麼产品是奥斯曼帝国所必需的。这种贸易逆差，使得欧洲那些充当货币的贵金属越来越多的流向奥斯曼。由此也推高了金银的价值，并让欧洲人愈发迷信它们的力量。不幸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金、银

矿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境内，葡萄牙很难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这些硬通货。

葡萄牙乃至西欧所需要的黄金，有相当部分是通过与摩尔人的贸易获得的。与控制诸多富庶之地的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西北非地区，对欧洲粮食的需求量较大。这使得西、葡两国有机会在这个方向上，得到自己需要的黄金。然而一直以来，欧洲人并不清楚那些黄金的产地在哪。作为马格里布地区与伊比利亚进行贸易的重要一环，聚集于休达城内的穆斯林商人则清楚这一点。在葡萄牙征服之后，这个秘密也随即被葡萄牙人所获知了。

在摩尔人看来，葡萄牙人即使知道了黄金的产地，也没有可能自己去进行贸易，因为这些黄金产自于黑非洲。要想到达这些黄金的产地，必须穿越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基于这片死亡之海的存在，强大的罗马虽然曾经统治整个地中海南岸，但欧洲人对黑非洲却几乎还是一无所知。当然，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最起码透过尼罗河，埃及人很早就和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延续着贸易联系，甚至曾试图尝试过向南扩张。然而在尼罗河以外，撒哈拉沙漠中再无这样的天然绿色通道，来帮助北非的统治者来了解这一切。因此可以说，在欧洲人的视角里，黑非洲算得上是一片孤立于旧大陆文明之外的“新大陆”。

## 第二节 柏柏尔人开通前往黑非洲的金盐之路

在阿拉伯帝国扩张之前，原住于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并没有开拓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通道。没有这样做大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柏柏尔人可以依托相对条件较好的阿特拉斯山脉发展自己。比如当年曾经在“布匿战争”中为汉尼拔提供轻骑兵的努米底亚，就是柏柏尔先民建立的国家；二是没有合适的工具。在工业文明造就“机器”时代之前，阿拉伯人所驯化出来的单峰驼，是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唯一工具。一切的改变，源自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公元7世纪初，骑着骆驼、手持古兰经和武器的阿拉伯人，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基于伊斯兰教之于这片土地的地缘优势，已经在启动基督教进程的柏柏尔人，很快也接受了这个更适应沙漠生活的宗教。

虽然柏柏尔人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和统治，但却并不代表两族就此合体。为了统治这片土地，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迁居来了大量部落。这种做法，势必挤压了柏柏尔人原有的生存空间。事实上，这并不是柏柏尔人第一次面临外来的压力。只是与当年那些仅对沿海地区感兴趣的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不同的是，与之地缘属性类似的阿拉伯人，理论上可以完全覆盖柏柏尔人的生存空间（并融合掉对方）。这也意味着，部分不愿意接受阿拉伯人统治的部落，必须更向更边缘、更荒凉的区域迁移。

阿拉伯人带来的骆驼，让柏柏尔人有了向撒哈拉沙漠腹地游牧的可能性。随着



这种渗透的逐渐深入，一条连通马格里布与黑非洲的贸易通道，也就此被打通了。至于在沙漠的另一头，柏柏尔人看到了什么，又为后来的葡萄牙帝国描绘出了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在后面会解读。

与欧洲整体趋向于一个平原的地势有所不同的是，整个非洲更像是一个高原大陆。不过提到高原，大家也不必联想到青藏高原那种“世界屋脊”般的海拔。事实上，非洲的地势整体还是比较平坦的，大部分的土地处在海拔 500——1000 米的区间。与欧洲的情况类似的是，非洲的高大山脉所占比例也很小，并同样分布于大陆的边缘。从地缘角度来说，整个非洲可以简单的纵向划分为阿拉伯非洲和黑非洲。其中干旱的撒哈拉沙漠，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带，撒哈拉沙漠几乎覆盖了北非全境，面积超过 900 万平方公里。一山一水，即：西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马格里布）与东北部的尼罗河下游（埃及），是撒哈拉北部的两片绿色之地。这一地理背景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成为了打通跨撒哈拉贸易通道的两大起点。这其中，由于尼罗河所具有的天然绿色通道功能，以及红海航道沿途补给的便利，使得古埃及的历史很早就通过水路与东部黑非洲联系在一起了。今天我们在确认古埃及人种的时候，会有诸多困惑之处（比如壁画上的人物会有多种肤色），也正是来源于这种早期的地缘交流。

相比之下，从马格里布地区向南开拓贸易通道的时间，就要晚得多了。需要说明的是，在以方位划分非洲时，一如“东非”这个概念不包括阿拉伯化的埃及、北苏丹一样；“西非”这个地缘标签也不包括同样属性的马格里布地区。这两个阿拉伯属性明显的区域，与利比亚一起被统称为“北非”。再细分的话，马格里布地区也可被单独被称之为“西北非”。以现在的地缘政治结构来看，主要就是摩纳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至于“西非”的位置也很好确认，上宽下窄的非洲大陆，西向突出了一片上起阿特拉斯山脉、下至海岸线（几内亚湾）的土地。除了马格里布国家以外，直至几内亚湾的国家，都可以被纳入西非的范畴。这其中包含有：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等 16 个大陆国家（地区），以及群岛属性的“佛得角”。

前面我们也说了，在葡萄牙人沿海岸线南下之前，摩尔人已经先期开拓了跨撒哈拉贸易通道。现在的问题在于，虽然理论上任何物品都有可能成为贸易对象，但距离越长、路程越艰险，对利润的要求也就越高。在伊比利亚，基督教国家可以向邻近的摩尔人国家出口粮食，不过将这些大宗商品用骆驼运送到撒哈拉以南，显然是不会有太高利润的；反之，类似中国的丝织品、香料，南亚的香料、宝石，这些体积较小，却又价值颇高的商品，就很能刺激贸易者的冒险神经了。

很显然，马格里布地区跨撒哈拉贸易的前景，取决于西非地区有没有类似的产品。

那么摩尔人开拓西线跨撒哈拉贸易通道的动力是什么呢？之前的内容其实已经给出过答案，那就是“黄金”。同样的，输往西非的商品中，也需要有一个具备类似属性的产品充当核心。这个商品我们也很熟悉，那就是盐。由于长期未能掌握制盐技术，非洲尤其是西非所需的食盐，需要从文明发达的地中海地区进口。对于马格里布的摩尔人来说，跨撒哈拉贸易通道是一条“黄金之路”；而对于土著黑人来说，则是一条“食盐之路”。结合双方的核心需求，我们也可将连通非洲南北两大世界的贸易通道，称之为“金盐之路”。

对于地中海的情况，我们已经有很深的了解了，探究摩尔人出口西非的盐到底是自产还是转口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垄断这些用量很小的生活必需品，足以产生高额的利益。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黑非洲，倒是很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来探究一下它的地缘结构。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是谁把这些黄金开采出来的。又或者说，摩尔人和葡萄牙人的贸易对象是谁。

### 第三节 西非地区的地理结构

“水是生命之源”，先来看看是哪些山、水哺育了西非大陆。整个西非地区并没有特别高大的山脉，其中比较明显的突出部有两个区域：一是靠近西海岸，位于今天“几内亚共和国”境内的富塔贾隆高原、几内亚高原；二是与几内亚湾东部拐点相接的乔斯高原（尼日利亚境内）、阿达马瓦高原（喀麦隆、尼日利亚边境）。总的来说，这几处山地体量都不大，相比之下阿达马瓦高原的体量和海拔更占优势。不过就西非板块来说，最有资格成为西非核心山地的，却是最西端沿海的富塔贾隆高原。

富塔贾隆高原位于几内亚的西端，海拔并不高（仅 900 多米），体量也不算很大。如果放在西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或者东非的埃塞俄比亚高原旁边，至多只能算是延伸出来的一小片丘陵地带了。然而这一小片“丘陵”，却有着“西非水塔”之称。充沛的降水，是富塔贾隆高原成为传奇的基础。横贯西非的“尼日尔河”水系便是发源于富塔贾隆高原，然后一路向东，最终受到阿达马瓦高原的阻拦，南下注入几内亚湾东部的。

这条流域面积达 150 万平方公里的西非第一大河，年径流量在整个非洲的水量也能够排在第三，仅次于东非的尼罗河与中非的刚果河。富塔贾隆高原与阿达马瓦高原都为它的流量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在大西洋水汽的作用下，富塔贾隆高原与同样临海的阿达马瓦山的迎风面，也是整个非洲大陆降雨量最多的区域，年降水量能够达到 3000 毫米。即使是在背风面，其降水量也在 2000——3000 毫米之间。从降雨量来看，上述两处山体都应该有机会竞争“西非水塔”的美誉。不过阿达马瓦山之水仅仅是汇入了尼日尔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带，过短的流程使之无法为更多的

西非人民服务。相比之下，为尼日尔河源头处供水的富塔贾隆山脉，竞争起这个位置来就要有底气得多了。

为富塔贾隆高原的“西非水塔”之称加分的，并不仅仅只有尼日尔河，还有从山脉西北坡注入大西洋的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两条河流。基于富塔贾隆高原靠近海岸线的位置，两条河流流程都不算太长，但受益于高原迎风面的充沛水量，它们的流量在西非诸河中也都能挤进前四。至于两条河流的具体位置，相信大家看河流的名称就能联想到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了。这其中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应该就是那个曾经在两岸关系中发表奇葩言论，最近又墙头草般与大陆建交的“冈比亚伊斯兰共和国”了。

观察地图，大家会发现冈比亚的独立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完全被塞内加尔包围的国中之国，整个国家的版图，就只是沿冈比亚中下游而下，直至出海口的一片狭长沿河平原。如果你手边没有地图，可以脑补一段蚯蚓的形象，大致就是这个非洲最小的国家（面积仅有1万平方公里）轮廓的真实写照了。依据经验来看，这种格局很有可能如东蒂汶突兀的从印尼独立出来的情况一样（前者为葡萄牙殖民地，后者为荷兰殖民地），源自于欧洲殖民者的利益划分。

情况也的确如此，冈比亚与塞内加尔的政治分离，源自于英法之争。就整个西部非洲（包括马格里布和西非）的情况来说，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先发优势消退之后，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拥有双重地缘优势的法国，逐渐成为了本地区起主导作用的主导者。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在西部甚至中部非洲看到连成一片的法语国家。然而作为法国永恒的对手，英国人也并非在此一无所获，这其中冈比亚河中下游就是英国从法国口中夺食的成果之一。让英国人为这片弹丸之地倾注心力的，是冈比亚河优良的通航通行条件。由于河宽水深，冈比亚河被认为是西非唯一可以通行海船的河流。对于渡海而来，试图深入大陆腹地掠夺资源的欧洲殖民者来说，这一优势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英法对西非的争夺，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今天我们更关心的是冈比亚河、塞内加尔河，以及尼日尔河这些西非主要河流，在中世纪及之后的大航海时代发挥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具体到今天的问题上，就是要在了解上述地理结构的基础上，描画出西非中世纪的地缘政治进程，以为即将到来的摩尔人和葡萄牙人“指明”方向。至于到底是哪个西非土著政权成为了“金盐之路”的南部终端，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三章 西非地区三大黄金帝国的盛衰

### 第一节 古加纳王国核心区的位置

基于撒哈拉沙漠的阻隔，黑非洲曾经长期被隔离在旧大陆文明圈之外。缺乏交流的后果，就是黑非洲进入“文明”状态的时间较晚。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文明”并没有特别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是基础的硬件标准；而软件方面的要求，则是需要建立一套国家统治制度。简单点说，你最起码得有个能让一部分人脱离第一产业，开始制定各种规则的“城”（不一定要有城墙），才算是有资格进入以“国家”为标志的文明状态。至于是否使用了文字、金属工具，倒并不是最重要的。

黑非洲到底有没有独立发展出来的“原生文明”，一直以来是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中世纪先后出现在西非的加纳、马里、桑海三个古国，经常会被用来充当黑非洲文明的门面。很多资料中，甚至会将这三个国家冠以“帝国”之称，以区别于周边那些部落式（或体量较小）的西非土著政权。先且不论这三个古国的文明因子到底是原生还是受其它文明影响而次生的，也不管到底够不够得上“帝国”的标准，仅就三者在西非文明的地位，以及彼此间的地缘关系来说，倒是可以和同样为“中华文明”奠基的上古三代：夏、商、周做一个类比，以帮助我们熟悉这个陌生的版块。

世界上大多数农耕文明都与一条或数条大型河流密不可分，由此也有了“大河文明”的说法。如果说华夏文明的源头是黄河的话，那么西非文明的大河自然就是“尼日尔河”了。这其中，最早依托尼日尔河流域建立强大政权的，就是古加纳王国了。提到“加纳”，大家很自然的会联想到现在叫“加纳”的西非国家。不过时过境迁，类似这种地缘遗产，向来容易被当成一笔宝贵财富为后世所争夺。今天叫某个历史地名的地方，未必就是它的原生地。加纳也是这种情况，现在位于西非南部与几内亚湾相接的“加纳共和国”，并非古加纳王国的所在，也不属于尼日尔河流域。15世纪末，当葡萄牙人到来之后，他们为这片土地取的名字为“黄金海岸”。以类似方式命名的，还有加纳的西邻“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黄金海岸”、“象牙海岸”之称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因此上世纪两国在获得独立之后，都在尝试摆脱这段屈辱的历史。其中“黄金海岸”率先抢到了“加纳”这笔丰厚的地缘政治遗产（1957年独立并更名）。至于“象牙海岸”，其实还是叫这个名字。所谓“科特迪瓦”就是“象牙海岸”的法语发音。也正因为如此，在海外华语地区，科特迪瓦很多时候还是会直译为“象牙海岸”的。不过科特迪瓦人显然对此也不满意，以至于在1985年做出决定，要求其它国家只用“科特迪瓦”的音译，而非意译“象牙海岸”来称呼他们的国家。类似的做法并非孤立，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例，应该是2005年韩国要求中国将其首都的汉译名，从“汉城”改称为音译的“首

尔”的做法一样。

尽管加纳共和国抢注了西非历史最悠久的“加纳”标签，但以其地理位置来说，却并不属于古加纳王国的范畴。除了尼日尔河这条核心河流之外，西非弧状的海岸线还均匀分布着许多独流入海的河流，并成为今天西非众多沿海国家立国的地理基础。其中加纳的核心河流叫做“沃尔特河”（河流上游为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则有三条体量相当的河流并列，分别是：萨桑德拉河、邦达马河、科莫埃河。虽然在日后欧洲殖民者从海路深入西非的过程中，这些河流都像冈比亚河、塞内加尔河那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西非文明初始的中世纪来说，却并没有太大用处。有机会与外部交流，并借此建立强大政权的，还是能够与撒哈拉商道直接对接的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等北部河流地区。



跨撒哈拉贸易（金盐之路）及西非古国示意图

向南迁移到了现在的加纳。至于这到底是不是历史事实，倒是不重要。所谓文化继承的重点并不在于二者的联系是否紧密，而在于后者愿不愿意继承。

既然现在的加纳不是“古加纳”，那么古加纳到底在哪呢？基于文明初始时那么松散的政治结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古加纳王国的核心区到底在哪里。

其实今天的加纳与古代加纳之间也不能说一点关联都没有，古加纳之所以能够在众多西非土著部族政权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最先接通了跨地区的黄金贸易。而“黄金海岸”的知名度，也同样源自于黄金贸易。当然，西非产金的地方并不止于“黄金海岸”一处，仅凭这一共同点就想继承1000多年前“黄金之国”的政治遗产，还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加纳人相信，自己的祖先便是古加纳王国建立者。也就是说，古加纳人在灭国之后，



概括的说，古加纳王国的位置是在富塔贾隆高原以北，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上游河谷平原包夹的这个“V”型地带，即从马里境内的热带草原区向北延伸至毛里塔里亚南部的萨赫勒地带。

这里需要着重解读一下的是“萨赫勒地带”。所谓“萨赫勒”的原意是“边缘”，这个边缘客观上有两重含义：一是沙漠的边缘（南缘），二是草原的边缘。简单点说，萨赫勒地带是撒哈拉沙漠与非洲南部热带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地貌上则可以将之归类于“荒漠草原”。应该说，在两个地貌区之间存在一条缓冲地带，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就像典型干草原地区与森林地带之间，会有森林草原地带一样。萨赫勒地带的平均南北纵深，约在 600 公里左右。如果想追求更为精确的范围，可以尝试在非洲地图上划出 200 毫米～ 700 毫米两条等量雨线，二者之间的区域就是“萨赫勒地带”了。

顺便说下，其实撒哈拉地区并不一直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幅黄沙漫漫的景象的。在地质时期，北非的气候曾经经过数次巨大变迁。公元前 7000 年——公元前 3900 年间，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绿色之地（其后由于气候变迁，撒哈拉地区逐渐沙漠化）。最起码到古埃及王朝初始时（公元前 3200 年），撒哈拉地区的气候已经与今天的情况差不多了。有一种说法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可能是始于绿色撒哈拉时期，然后在沙漠化之后向尼罗河流域汇集，并成就了最终的古埃及文明。

虽然撒哈拉地区在史前文明的过去能够引发大家的好奇心，但终究已经与后来的文明进程没什么关联了。因此我们只需默认撒哈拉在人类文明出现时，已是一片大沙漠就可以了。至于这片沙漠是否能够有一天重新变成绿色之地，也肯定不是现在的人类可以左右的（所以也不用开脑洞）。引出这一段气候变迁的意义在于清楚一点，即今天我们在非洲看到的大环境，与正在解读的时代并没有质的区别。基于撒哈拉沙漠覆盖了整个北非大陆，萨赫勒地带也贯穿了从大西洋到红海的非洲大地。以今天的行政分割来看，由西向东大体包括塞内加尔北部、毛里塔尼亚南部，以及马里、尼日尔、乍得、苏丹四国中部，直至红海之滨的厄立特里亚西端。

古加纳王国的统治区，也向北包括萨赫勒地带。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政治中心，古加纳王国也不例外。它的首都位于毛里塔尼亚与马里西部国境线之北，是由两个叫做：昆比和萨利赫的相邻城镇结合而成（统称昆比－萨利赫 Koumbi Saleh）。就这个处在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流域最边缘的位置来说，可以说是萨赫勒地带与西非热带草原地带的分割点。如果不考虑与北部干旱地区的地缘关系，古加纳人其实可以选择把政治中心放在南部气候更加湿润的区域。然而作为西非第一个“帝国”，古加纳人在做类似选择时，就不能只考虑“黑非洲”内部的地缘关系了。那么这一切又与跨撒哈拉贸易有什么关联呢？

## 第二节 柏柏人南下建立古加纳政权

古加纳王国最初的发祥之地要更靠近富塔贾隆高原，以及塞内加尔河上游。根据流传下来的说法，古加纳王国在进入阿拉伯人视线之前就已经建国数百年了（能追溯到公元 300 年前后）。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并不能证明西非文明的原生性，因为根据这一口口相传的说法，古加纳政权的初创者是来自于北方的柏柏尔人。其趋于强大，并为北非穆斯林政权所熟知，则是在公元 9 世纪。显而易见的是，阿拉伯入侵马格里布并开拓跨撒哈拉商道，是古加纳王国崛起的直接原因。

原住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曾经率先穿越撒哈拉沙漠草创古加纳政权，与阿拉伯文明激活跨撒哈拉贸易，并带动古加纳崛起并不矛盾。这就好比所谓“丝绸之路”的源头会追溯到张骞出使西域。但在汉帝国通过对匈奴的军事活动控制河西走廊及南疆之前，并不代表天山南北就不存在贸易往来了。只是在没有强大终端提供的安全保护，以及规模化之前，这些贸易行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不足以对地缘政治生态造成影响。

有两个因素推进了柏柏尔人的南下探索之旅：一是早在公元初，随着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阿拉比亚（阿拉伯）的扩张，使得骆驼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传入了北非。尽管这一时期，在罗马治下的柏柏尔人还是以农耕为主，但如果少量柏柏尔人基于某种原因尝试向南迁徙，最起码在技术上已经具备条件了；二是进入公元 3 世纪后，罗马帝国的内部矛盾开始积累到了爆发的阶段。原有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农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并直接影响到了贸易的活力。这使得公元 3 世纪的罗马，大部分时间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史称“三世纪危机”。对于历史上饱受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很清楚这种混乱会对人口结构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有部分处于边缘状态的柏柏尔人，放弃原有的生存状态，被迫向更恶劣的区域迁徙（逃离），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以地理位置来说，马格里布绿洲带的最南端应该是阿特拉斯山脉的西南角，也就是今天摩洛哥与西撒哈拉交界之处；与之南北相对的塞内加尔河下游，则是西非诸河中位置最北的。今天的塞内加尔河下游地处萨赫勒地带的最西端，同时还承担着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河两国分界线的任务。也就是说，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两国边境线出发，南行至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两国边境的线路，技术上算是最短的穿越撒哈拉之路。不过即便如此，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也达到了 500 公里，没有上述因素的推动，柏柏尔人也是很难去尝试穿越这样一片干旱之地的。

尽管柏柏尔人在地中海文明圈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技术水平显然已经远超封闭的西非土著了。一部分带着先进技术的柏柏尔人（包括军事技术）抵达萨赫勒地带后，与一支土著部落融合（并居于统治地位），建立最初的古加纳政权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人类穿越撒哈拉的历史很有可能还要更为久远。问

题在于，只有那些最终能够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的交流才具备真正的影响力。这就好像无论有多少证据证明哥伦布并非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都无损于那次远航的意义一样。

在阿拉伯帝国西扩，并开始大规模拓展跨撒哈拉贸易之后，古加纳政权原有的柏柏尔基因有助于其从众多黑人土著部落政权中脱颖而出（这一阶段加纳的统治阶层已经土著化了），并率先与那些异族人进行贸易。产自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的“班布克”（塞内加尔河与塞内加尔——几内亚国境线之间的区域）的黄金，则是古加纳王国崛起的关键资源。需要说明的是，古加纳人并不一定是这些黄金的直接开采者。黑非洲的封闭性使得很多土著部落不愿意与外来者直接贸易，而更愿意让与自己文化相近的部落来充当中间商。

对于古加纳人来说，用政治手段还是商品来控制黄金产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让前来交易的穆斯林商人深入西非腹地，找到直接贸易甚至掠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政治中心）北移至西非草原与萨赫勒地带边缘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微妙的心理，也体现在古加纳王国首都“昆比-萨利赫”的城市结构上。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这座都城是由两座相邻的城镇（或者说居住区）所组成。造成这种结构的原因是古加纳王国的统治者在自己的王城之外，单独为前来交易的穆斯林商人划定一片居住区。

### 第三节 穆拉比特王朝对加纳帝国衰落的影响

跨撒哈拉贸易的展开，不仅对西非地缘政治结构影响巨大，反过来也对马格里布以及地中海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影响。在解读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时，我们曾经提到，后倭马亚王朝崩溃后，伊比利亚分裂出来的泰法诸国并非没有重新统一在一起的机会，11世纪末至12世纪中，来自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政权“阿尔穆拉比特王朝”（也译穆拉比特王朝），曾经一度建立了横跨直布罗陀海峡的穆斯林政权，与卡斯蒂利亚王国领衔的基督教王国形成对峙的局面（后为阿尔穆瓦希德王朝所取代）。这个穆拉比特王朝的根基之地，就在西非的塞内加尔河下游。

就伊斯兰教的传播来说，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政治扩张；二是商贸渗透。前者往往是通过军事征服，然后以强制或者税收杠杆的形式（异教徒收更高的税）扩充穆斯林人口。后者则更多是通过贸易往来，让一部分土著中间商或者部族统治者（二者往往是统一的）先行接受，然后再逐步铺开。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更关注前面一种刚性扩张的结果，但却对后面这种柔性渗透过程缺乏了解。事实上，今天很多接受伊斯兰教的热带区域，如东南亚、西非，都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接受伊斯兰教的。因此穆斯林商人在最初的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受贸易影响而主动接受伊斯兰教的政权来说，伊斯兰教的诱惑力在于能够



提供一整套的“教法”。不仅能够在意识形态层面让接受者找到方向，更能在生产、生活，乃至政权的建立上提供一整套方案；对于最先接触到穆斯林群体的土著中间商来说，接受古兰经约束，则意味着融入了一套成熟的商业体系，并由此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根据阿拉伯民族的特点，借鉴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而创立的。就阿拉伯人的地缘属性来说，“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里说的“游”字并不能狭义的理解为“游牧”，还拓展至因游牧生活而升级的更高级的经济生活方式——“游商”。我们会看到，阿拉伯半岛的重要城市（如麦加），以及控制这些城市在的统治阶层，其统治力是源自于其所掌控的贸易商队。

基于上述地缘属性，十二岁就随叔父外出经商的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融入了一整套的贸易规则。接受这套规则，或者在穆斯林内部进行交易，意味着贸易伙伴间的信任成本将大大降低。当然，依靠武力的刚性传播与润物细无声式的商业渗透，永远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承的。天主教世界能够诞出带有狂热宗教信仰的“十字军”，伊斯兰教同样也不缺乏狂热传教的宗教团体。在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通过跨撒哈拉贸易通道大量进入萨赫勒地带之后，塞内加尔河下游（时称“台克鲁尔”地区）就成为了伊斯兰教团“穆拉比特”主动传教的核心地区。

所谓“穆拉比特”直译的话就是“武装僧侣”，性质与十字军中的那些骑士团类似。由于塞内加尔河上游才是产金区（班布克地区），古加纳王国并没有力图将塞内加尔河下游纳入控制范围，这也为以柏柏尔人属性的“穆拉比特”教团，在塞内加尔河下游建立根据地，并向土著黑人强力传播伊斯兰教提供了空间。在西非边缘做大的“穆拉比特”，一开始并没有向东去挑战古加纳王国，而是向北透过毛里塔里亚——西撒哈拉商道，回到了阿拉比特山脉西端的摩纳哥，与阿拉伯人争夺统治权。这一事件回过头来也可以为数百年前柏柏尔人沿同样路线，向塞内加尔河渗透，并催生古加纳政权的可能性提供佐证。

基于“穆拉比特王朝”狂热的宗教属性，以及它崛起于西非的地缘背景，在马格里布地区站稳脚跟后，很自然的会希望能够向古加纳王国方向扩张（更别说黄金的诱惑了）。公元1076年，穆拉比特王朝攻陷昆比—萨利赫，也就此造成了古加纳王国的衰弱。穆拉比特王朝对古加纳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很快他们的重心就转移到伊比利亚，去和基督教世界展开圣战去了。毕竟单纯从地缘位置来看，维持一个跨直布罗陀的帝国，比之将统治力延伸到黑非洲要更现实一些。针对古加纳的征服，客观上更像是一场单纯的掠夺。显而易见的是，从古加纳掠夺而来的黄金，对穆拉比特王朝后来在西地中海的扩张，起到了很大帮助。

尽管穆拉比特王朝在加纳的直接统治仅仅维持了差不多10年时间，但对西非的地缘结构还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古加纳帝国在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建立的统治秩序被彻底打破了。如果说相对那些酋长国性质的土著“王国”来说，以前的古加纳算得上是西非第一个“帝国”的话，那么柏柏尔穆斯林的这次入侵，则相当于



结束了加纳的帝国时代，使得那些原本臣服于加纳政权的部族重新获得了独立。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古加纳王国就此消失，只是领地收缩、统治力没办法外延罢了。

另一个重要影响体现在了宗教层面。一直以来，古加纳王国对于伊斯兰教的态度都有些矛盾。一方面，王国需要穆斯林带来的商业机会，以及包括管理手段在内的文明因子（加纳宫廷里会起用很多穆斯林官员）；另一方面，古加纳人还没有做好完全引入伊斯兰教的心理准备。从技术上看，“加纳帝国”相对集权的统治，有利于阻止本地区的伊斯兰化。不过在整個地区重回混乱之后，伊斯兰教在西非的扩张就在所难免了。

#### 第四节 马里向内尼日尔河三角洲扩张

按照我们之前的比照设定，所谓“加纳帝国”在西非文明的地缘政治地位，相当于华夏文明中的“夏”，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应该就是相当于“商”代的“马里帝国”了。不过马里并不是“加纳帝国”衰弱的始作俑者，在穆拉比特人的控制力消退之后，马里人并没有能马上让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地区的土著部族重新统一起来。部族相争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直到13世纪上半叶，马里人才通过一场场战争，击败了诸多竞争者，成就了继加纳之后的第二个西非“黄金帝国”。

西非文明的觉醒史，本质上也是一场黄金贸易史，由此将加纳、马里、桑海三个勉强够得上“帝国”标准的西非土著政权，统称为“黄金帝国”倒是很贴切。如果说古加纳王国能够最先脱颖而出，是因为控制了塞内加尔河上游（班布克地区）的黄金的话，那么马里帝国能够在一片混乱中出头，路径其实也是一样的。简单点说，就是马里人在自己的领地上，找到了另一个比班布克储量更为巨大的矿脉。

我们先来看看最初的“马里”是在哪个位置。与“加纳”这个标签，从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上游，位移到几内亚湾的情况不同的是（以至于行文时需要用“古加纳”这个标签，以避免引发认知上的混乱），今天的“马里共和国”，与当年的马里帝国的范围有着很高的重合度。如果去除掉境内萨赫勒地带以北的沙漠部分，再加上今天塞内加尔、冈比亚两国，以及毛里塔利亚境内的萨赫勒部分的话，几乎就是马里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了。更重要的是，现在的马里控制了古马里帝国的核心区，因此他们在继承这个古老标签时，会更加的理直气壮。

与古加纳人相比，马里人原始领地要更加向南一些，靠近富塔贾隆高原东麓，大体在今天马里－几内亚两国交界的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其所发现的新金矿，位于今马里－几内亚边境线以西的几内亚境内，当时被称之为“布雷”地区，统治中心“尼亚尼”则位于以东的马里境内（尼日尔河与支流桑卡拉尼河交汇处）。据称布雷金

矿当时的产量，能够超出班布克金矿的8-10倍。当然，这一比较结果，很大程度是因为班布克金矿持续开采了数百年，已经接近枯竭。不过当时的古加纳人更愿意相信，是自己得罪了神明，以至于矿脉转移到了马里人的领地上。

不管认知正确与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马里人由此有了竞逐地区霸主的资本。基于自己手上所掌握的筹码，马里人能够从穆斯林商人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及技术支持。在这个过程中，马里的统治者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并开始依照伊斯兰教教法来建立国家秩序。虽然在今时今日的环境下，试图恢复教法时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被视为时代的退步，但在当时这一选择却还是有其先进性的。诚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古兰经不仅能够让你融入一条成熟的商业链，更能够从生活到政治提供一整套的规则。至于其在军事扩张方面的效应，当年阿拉伯人已经证明过了。

控制产金地可以让你富足，但想要成为一个帝国，扩张将是必由之路。向北部扩张，收服塞内加尔河流域与尼日尔河上游之间的加纳故地，只是马里帝国的一个选项。对于马里来说，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向，那就是“内尼日尔河三角洲”。一条奔流入海的河流，在河口处有一个三角洲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随着开发的深入，肥沃的河口三角洲地区往往也会成为整个流域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不过依照惯例，这样的三角洲应该就是命名为“尼日尔河三角洲”，为什么刚才给出的标签前面会有个“内”呢？难道尼日尔河有内、外两个三角洲？没错，情况的确如此。除了下游入海口处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外三角洲）以外，尼日尔河中游还有一片富庶肥沃的内三角洲。

尼日尔河的整体走势颇有点像黄河，只是这个尼日尔“几”字的笔势看起来不那么标准罢了。我们知道，黄河中游的“几”字形弯处由于流速变缓，泥沙冲积而成了包括西套、后套、前套三部分的河套平原。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便是形容河套之水草丰美的。尼日尔河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数百年前的地质时期，从富塔贾隆高原及几内亚高原汇集而下的河水，本来是接入塞内加尔河，从萨赫勒地带的西端入海的。不过由于地质变化的原因，这段河水后来改道向东，在一片洼地中大面积蓄积，导致沼泽属性的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形成。

一个典型“几”字形的结构，会有四个较为明显的转折处。尼日尔河的走势之所以被形容为变形的“几”字形，是因为它西部反“Z”字形的两个转折距离较近，东部则只有一个转折。“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具体的位置，指向的就是西部这个反“Z”部位。要是将今天马里共和国的轮廓看成一只展翅蝴蝶的话，内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位置，就是两翅结合的身体部位了。如果还要和黄河做地理位置上的类比的话，则相当于西套（宁夏）与后套（内蒙巴彦淖尔－包头）的结合。随着三角洲蓄水极限的突破，继续东流的河水，与三角洲东部一条南流入几内亚湾的河流合流，形成了现在的尼日尔河下游，并最终打通了横贯西非的尼日尔河水系。

沧海桑田，随着自然的变迁以及人类的开发，内尼日尔河三角洲逐渐陆地化，今天我们在这片洼地的最低点还能找到一个叫作“法吉宾湖”的湖泊，以帮助我们定位这片冲积平原的中心位置。不过肥沃的土地并不足以让内尼日尔河三角洲，获得比下游尼日尔河三角洲更有先发优势，更为靠近撒哈拉商道的地缘位置才是其先发的首要原因。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最先“发现”西非的是跨海而来的欧洲人，而不是穿越撒哈拉而来的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的话，那么因贸易先强大起来的，可能就是尼日尔河三角洲了。在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案例。长江中游的楚国，因与中原、黄河文明更加接近的原因，决定了它能够比下游的吴国在文明和政治层面上更为先发（在这样的类比条件下，马里帝国控制下的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就相当于是楚国的云梦泽了）。

马里人并不是加纳帝国崩溃后的唯一受益者（在此之前马里人臣属于加纳），同时也不是渗透内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唯一势力，除却那些土著酋长国以外，对马里帝国的扩张构成威胁最大的，是入驻萨赫勒地带定居的柏柏尔人。为了区别柏柏尔人这个更大的族群概念，这部分柏柏尔人一般被称之为“图阿雷格人”。

## 第五节 图阿雷格人南下对西非的影响

萨赫勒地带的图阿雷格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这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奇特的穿着风格。与北方那些已经趋向阿拉伯化的远亲不同的是，图阿雷格人的衣着要鲜艳得多。蓝色的长袍和面纱，是他们特立独行的标志。然而更加奇特的是，图阿雷格人中的妇女地位非常高，且并不一定要带面纱，而成年男性则必须带面纱。这一女权色彩浓厚的风俗，源自于一个古老传说。图阿雷格人认为，是一个叫作“卡希娜”的女王，在7世纪末率领他们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并在失败后穿越撒哈拉，来到了这片沙漠之南的土地。

当然，从更深层次解读的话，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源自母系社会结构的遗风。毕竟在外族入侵之前，马格里布柏柏尔人内部也同样会出现分化。相比那些融入文明且在沿海定居的柏柏尔人，原本被挤压到山区的游牧者的社会结构会更为“原生态”，对试图改变其习俗、生存方式的入侵者，也更不容易妥协。不过具体情况是否如此已经不重要了。马里帝国崛起之时，在萨赫勒地区已经定居了几百年的图阿雷格人，已经成为沙漠以南一支不可忽视的“土著”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图阿雷格人的南下，对打通跨撒哈拉贸易通道肯定有所帮助，但从政治和组织角度来看，这一功劳还是要算到阿拉伯人头上。基于撒哈拉沙漠的覆盖范围较广，小规模穿越行为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你很有可能在到达下一个绿洲补给点之前就断水。在这种情况下，商队就需要派出机动力强的成员，前往补给点为大部队带回补给。为了应对恶劣的环境，一支商队规模通常会达到上千，甚



至上万峰骆驼。凡此种种，没有经验和良好的组织力是做不到的。原本在阿拉伯半岛就拥有足够的沙漠贸易经验，并用教法武装起来的阿拉伯人做起来要有优势得多。当然，既然萨赫勒地带是连通西非产金地与马格里布地区的必经之地，已经属地化的图阿雷格人也不可能不尝试在跨撒哈拉贸易中分一杯羹的，那么图阿雷格人的存在对跨撒哈拉贸易及西非地缘格局有什么影响呢？

与那些谋求贸易利益的商人群体不同，作为一个外来族群，包括图阿雷格人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渗透，本质是一种移民或者说殖民行为，其对于一个地区的地缘结构改变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比如曾经强大无比的大英帝国在崩溃之后，真正能够与之结成紧密同盟关系的，正是当年殖民成功的那些“新大陆”国家（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将“殖民”这个概念回归到本质的种族扩张层面，再做进一步分析又可以发现，能够让英国人殖民成功的“新大陆”，都是土著民族人口很少、文明层级较低，且处于温带的区域（在印度就没有“殖民”成功）。为此，我们需要看看，外来入侵者在黑非洲的土地上遇到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族群和环境。

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皮肤种族来说，简单的用一个“黑人”或者更学术一点“尼格罗人种”的概念来涵盖，是有失偏颇的。总的来说，非洲属于典型“尼格罗人种”的有两个族系：苏丹尼格罗人与班图尼格罗人。大体来说，我们在尼日尔河－乍得湖一线的中、西非地区看到的“黑人”，属于苏丹系；而赤道两侧及其以南的南部非洲地区，则大部属于班图系。前者的皮肤更为黝黑，后者则相对较浅一些。

需要注意的是，尼罗河上游——印度洋一线，以埃塞俄比亚高原为核心的“非洲之角”（东非地区），在人种上属于高加索人种与尼格罗人种的混血类型，族系上被单独称之为“库希特人”。由于这一混血特性，有的研究者甚至会将其剥离出“黑人”的范畴，归类入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的闪含民族。当然，更多的时候，在种族特征上更趋向于尼格罗人种的库希特人，是被标注为“库希特尼格罗人”的。除了上述两种典型黑人和一种非典型黑人以外，非洲还存在一些其它的族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分布于非洲西南角的“桑人”（科伊桑人）。随着非洲殖民历史的推进，这些族系的前世今生，也会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阶段引出非洲种族划分的一些概念来，是因为大家在阅读西非与外来文明接触的相关资料时，会看到这片土地上的土著经常被称之为“苏丹人”，并还能看到“东苏丹”、“中苏丹”、“西苏丹”的称谓。“苏丹”一词源自于阿拉伯语，意为“黑人的土地”，基于地理位置关系，直接与撒哈拉沙漠对接的黑非洲地区，也因此被泛称为“苏丹”。所谓“苏丹尼格罗人”的分布、迁徙区域，也正是指向于此。只是由于现在“苏丹”一词，已经为尼罗河中上游的两个国家所垄断（北苏丹、南苏丹），这些标签的存在无疑会造成认知上的困惑。

今天抢夺到“苏丹”这个标签的区域，就是广义苏丹中的“东苏丹”；我们正



在解读的西非地区是“西苏丹”；至于中苏丹，则是东、西苏丹之间，以乍得湖为中心的中非地区了（它的地理地缘结构，我们后面会有所解读）。在历史上，现在的“马里共和国”也曾经被称之为“法属苏丹”。当然，刚才已经说了，东苏丹在政治上已经注册了这个标签。不过“法属苏丹”选择了更有地缘政治价值的“马里”，而不是带有地域色彩的“苏丹”倒是更有意义，毕竟前者本身带有一段辉煌的历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习惯热带沙漠气候的闪含人不同的是，苏丹尼格罗人的原生区域属于“热带草原气候区”。相信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通过《动物世界》，对非洲热带草原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在印象中，那是一片一望无际，间杂着稀疏乔木与灌木的绿色之地（热带草原为“稀树草原”属性）。数以十万计的角马、斑马等食草动物，在草原上随季迁移，而身处食物链顶端的狮子、猎豹等食肉动物，则在它们身边徘徊、潜伏。当这一幅幅画面从我们脑海中滑过时，一个熟悉的话外音响起：雨季过后，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现在，请大家把思绪从动物交配的画面，拉回到地缘的基础——环境上来。是的，与温带四季分明的气候不同，热带草原气候分为两季：雨季和旱季。这片土地并不缺水，但降水时间极其失衡。一年 700 ~ 1000 毫米的降水集中在雨季，另外将近半年时则是几乎没有任何降水的旱季。刚才那些生机盎然的画片只是出现在降水充足的月份，等到旱季降临，这片土地所呈现的就是一片绝望的景象了。

温带典型草原地带（干草原）的年降水量，通常只有 250-400 毫米之间，年平均降水量超过 650 毫米，就可以滋养出成片的森林了。纯粹从这个数据比较，非洲热带地区的降水应该更有利于树木生长的。不过考虑到一年当中有近半的时间没有补水，森林被耐旱的草本植物所淘汰，也就很好理解了。当然，雨季充沛的降水，以及更高的温度，使得热带草原的质量要远好于干草原，以至于不仅能让捕食者们躲在草丛中，更能孕育出种类丰富且种群数量庞大的植食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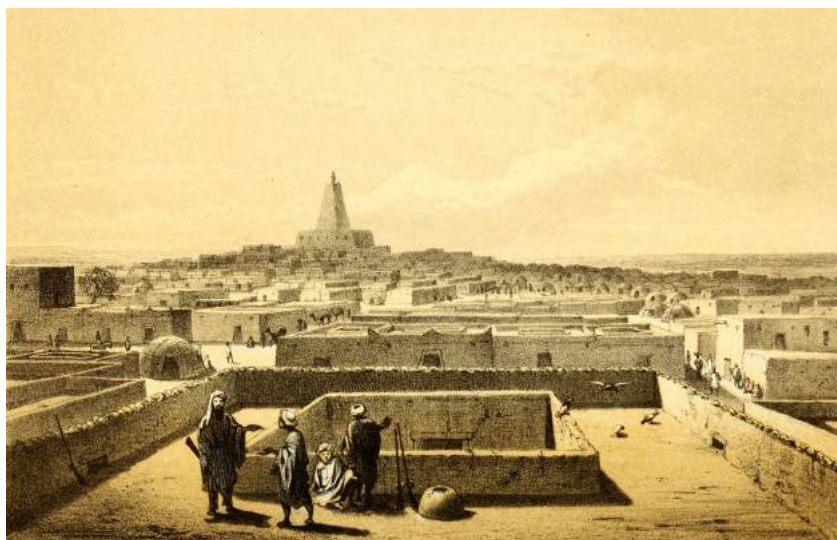
一如欧亚干草原、荒漠草原地带滋养出了以羊、骆驼为代表的游牧经济一样，非洲的热带草原地带也同样让一些土著部族，从原始的渔猎经济转向了游牧经济。对水资源要求更高的“牛”（具体为“长角水牛”），是非洲热带草原牧业的主要品种。基于这一特点，这些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眼中的“苏丹人”，对半干旱的萨赫勒地带的渗透力并不强，尤其是在降水更为稀少的萨赫勒北部。

图阿雷格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萨赫勒地带的人口结构。这些北方人带来的骆驼、绵羊和山羊，要更为适应萨赫勒地带的气候。由此也带来了两个直接影响：一是萨赫勒地带的原生平衡被大量引入的外来物种所打破，出现了草场退化等现象；二是定居化的图阿雷格人，不可避免的与热带草原地带的“苏丹尼格罗人”发生了地缘联系。至于二者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相信在二千多年来，看惯了无数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恩怨史的中国人，应该会很能理解这一点的。顺便说一下，纯粹从种族的角度来看，在萨赫勒地带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图阿雷格人，事实上已经变成了

一个类似东非“库希特尼人”那样的混血民族了。不过与混合时间更长，多被归类于尼格罗人种的后者不同的是，图阿雷格人地缘属性，还是能够支撑他们与北非的亲戚们划为一类的。

加入跨撒哈拉贸易，或者直接以劫掠的方式从中分一杯羹，是图阿雷格人在游牧经济以外的常见补充方式。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世人眼中，图阿雷格人的强盗标签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不过不要以为，图阿雷格人就没有“生态”观念了。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会竭泽而渔，而是会给被劫者留下足够利润（或者直接按比例收保护费）。也就是说，图阿雷格人的存在并不会像奥斯曼帝国那样，严重影响贸易通道的通畅。

虽然游牧让人自由，“山贼”这份职业看起来也很有前途，但却不代表图阿雷格人就没有更高追求了。以中原王朝博弈北方游牧势力的经验来看，一方的混乱往往是另一方的机会所在。图阿雷格人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西非第一个强大政权“加纳帝国”崩溃之后，图阿雷格人也燃起了渗透尼日尔河流域，并控制贸易通道的想法。他们在萨赫勒南部边缘所兴建的最重要据点，就是西非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城市——廷巴克图（现名“通布图”）。



廷巴克图

作为日后西非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廷巴克图是如此的出名，以至于14世纪的欧洲人就已经透过摩尔人之口，知道有这么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城市了。从地缘条件来说，廷巴克图的选址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位置正处在内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东端，尼日尔河“几”字形湾的中点，同时也是萨赫勒地带与热带草原位置最靠北部的

分割点。换句话说，廷巴克图无论是从沟通尼日尔河上下游的角度，还是打通南北贸易通道的角度看，都是一个中心点。这种十字交叉的枢纽位置，也使之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

尽管图阿雷格人是廷巴克图的初建者，并希望以此增加自己在跨撒哈拉贸易中的发言权，但图阿雷格人的问题在于整条贸易线中最为重要的资源——黄金，并没有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而廷巴克图尽管优势明显，却也不是金盐之路唯一的选择。在马里帝国崛起之后，马里人从图阿雷格人手中夺取了这座城市，并依托自己手上

的资源将之打造成为自己的贸易中心。

廷巴克图并非内尼日尔三角洲唯一知名的贸易城市，在三角洲的西南端，还有一座与之相距 500 公里的城市“杰内”，与之一起为尼日尔河的贸易繁荣做出贡献。从建城的历史来说，杰内城其实要比廷巴克图还要早上 3 个世纪（公元 800 年前后）。不过与廷巴图克一开始就定位贸易有所不同的是，杰内城最初的兴建更多是源自于土著农业文明，由内尼日尔河上游向中游地区扩张的自然作用。

## 第六节 马里帝国的衰弱与桑海帝国的崛起

拥有更多黄金，并将统治力延伸到内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马里帝国”，取得了比加纳帝国更高的成就。皈依伊斯兰教，并积极与伊斯兰世界融合，也是马里帝国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公元 1324-1325 年，马里帝国统治者做出一件让整个伊斯兰世界震惊的事件，那就是前往麦加朝圣。就朝圣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可以说每一个虔诚穆斯林的愿望，都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前往麦加朝圣。问题在于，马里帝国统治者的这次朝圣，本身带有强烈的炫富色彩。据说由马里国王——“曼萨·穆萨”发起的这次朝圣，除了跟随有近万人的随行队伍外，还随身携带了 100 峰骆驼（每头骆驼携带 300 磅黄金，折合现在的市价 3500 万人民币），以供其在朝圣的路上消费和施舍。

无比强大的消费力，使得作为此次朝圣之旅重要消费地的开罗，金价由此下跌了十几年。“黄金帝国”之名，甚至让西欧人为之侧目并记住了马里。然而这次惊人的朝圣之旅，却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炫富，这些黄金更多是用于购买商品，包括在开罗和麦加购置地产，以为马里朝圣者和商人提供驻地的形式，加强西非与中东的联系。换句话说，这次朝圣之举为西非在传统的马格里布商路之外，加强了与以埃及为首的中东地区的贸易联系（此后大量埃及商人开始进入西非）。

除了扩展贸易市场以外，马里的炫富之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崛起的西非引进人才。要知道，虽然从加纳帝国崛起算起，西非进入文明期的时间也已经算有几百年了，但总的来说，对这片土地感兴趣的，还是穿行于撒哈拉沙漠的穆斯林商人。至于那些对发展文化、优化内部结构能起到更大作用的学者、技术人才来说，西非却还是一片印象模糊的偏远之地。

马里在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开罗以及宗教中心麦加的展示秀，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此后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学者、能工巧匠开始涌入这片遍地黄金的土地。大量伊斯兰式建筑，如清真寺、大学、图书馆被建立起来，西非的文明层级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也使得 14 世纪中叶的马里帝国，声势达到了顶峰。不过从规律的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高潮过后的马里，也许很快就要遇到危机了。

通过加纳、马里的崛起顺序我们会发现，整个西非文明的推进路径，是沿着尼



尼日尔河自西向东的顺序。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认为西非文明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受外来文明刺激而产生的“次生文明”。基于文明的标准不同，以及“政治正确性”，黑非洲没有原生文明的说法，应该一直会遭受质疑的。如果换一种说法，可能会更容易取得共识，那就是西非贸易重心有一个自西向东渐移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了西非地缘政治中心的东移。

尽管西非的黄金时代还没有结束，但具体到微观层面，马里却和加纳一样，未必能永远居于统治地位。所谓花无百日红，一个王朝运行时间久了，内部难免会出现阶级固化、土地集中、中央政权丧失管控力等弊端。经过 14 世纪的高潮之后，进入 15 世纪的马里也没有逃出这个规律。与古加纳一样，马里的危机也体现在“内忧外患”两方面，一是西非内部土著政权的竞争；二是北方政权的压力。这其中，已经成为萨赫勒之王的图阿雷格人，以及马里东部的“桑海人”，成为了马里帝国的最后终结者。

尼日尔河河曲地带以东开始南流的下游北部河段，处在一个补水的空白区间。一方面，从西端富塔贾隆－几内亚高原等高地东流而下的雨水，最远只能延伸到中游的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其中杰内城所依托的巴尼河，算是中游地区最大的河流了。至于下游河段，则有相当一部分位于降水不那么丰沛的萨赫勒地带（补给河流基本为季节性河流），一直到尼日尔－贝宁－尼日利亚相接处一带，才开始进入降水充足的热带草原气候区。这片热带草原气候区的边缘，也是桑海人最初的生存之地。

正常情况下，桑海人应该沿着尼日尔河向南扩张，迁徙到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才是。然而跨撒哈拉贸易所带来的红利，却驱使着桑海人沿河北上，以从跨撒哈拉贸易中分一杯羹。11 世纪时，桑海王国的政治中心被确定在了廷巴克图东部约 400 公里处的“加奥”。这座今属马里共和国的城市，曾因为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遇袭案，而频繁见诸于新闻。一个简单的定位方法，是在地图上找出 0 度经线，这条穿越英国格木威治天文台的“本初子午线”，向南延伸到尼日尔河并与之交叉的点，就是加奥的位置所在了。

加奥的位置，对于控制尼日尔河下游的贸易非常有利，这也使得它后来与廷巴克图、杰内两城，共同组成了尼日尔湾的贸易三角中心地带。桑海人的贸易红利，很大程度与本土中间集团的形成、壮大有关。与那些从沙漠北方而来的阿拉伯、柏柏尔商人相比，出身土著黑人部落的商人，能够将贸易线拓展到离沙漠更远的地方，并且更容易发现新的客户和可供交易的资源。同时，这些土著商人也是最先接受伊斯兰教的西非人，使之在与北方贸易商进行交易时，可以毫无困难。

由于马里帝国的强大，加奥的桑海王国最初也算是马里的属国。失去廷巴克图，是马里帝国衰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打破了马里－桑海之间的平衡关系。不过最先夺取这座贸易、文化中心的并不是桑海人，而是它的初建者图阿雷格人（公元 1433 年）。然而图阿雷格人并没有像中国历史上部分成功者一样，入主中原建立强大政



权。借势崛起的，是以加奥为立足点的桑海人。通过夺取包括廷巴克图、杰内在内的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公元 1469 年），桑海王国正式晋级为“桑海帝国”（马里像原来的加纳那样，反过来成为后来者属国）。那些原本臣服于马里人的西部部族，也很快成为了桑海帝国的一部分。

桑海帝国的崛起，很大程度源于相对恶劣的环境由此引发的尚武精神。在军事层面，除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外，甚至还建立了水军，以使之在尼日尔河流域拥有更强的机动能力。强大的武力使得桑海帝国一如周王朝一样，在领土方面的成就超出了两个前辈。这其中，除了桑海人自己带入的尼日尔河湾东部领土以外，桑海帝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向撒哈拉沙漠扩张成功。今天在非洲的板块划分中，我们会看到，马里共和国是西非诸国中，领土向北延伸最多的国家。这片撒哈拉之地，就是桑海帝国的地缘政治遗产。也可以说，马里共和国与其说是继承了当年马里帝国的遗产，倒不如说是桑海帝国的翻版更为准确。

今天的马里，选择了“马里”而不是更为强大的“桑海”作为继承对象，与其独立之后与塞内加尔的一段蜜月期有关。在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原为法国控制下的“法属苏丹”（今天的马里），与塞内加尔共同组建了联邦性质的“马里联邦”（1959 年）。基于马里帝国的统治中心更靠近两个联邦主体的中心位置，选择“马里”这个标签，会比桑海更有利于形成共同的国家、民族意识。不过这个脆弱的联邦仅仅运行了一年多时间就宣告解体了。

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人在后殖民时代和英国一样，建立了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政治体——法兰西共同体，以延续自己在殖民时代的影响力。基于这种不影响独立地位的政经联盟对原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也有益处，大多数原殖民地国家都选择了加入。就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的情况来说，拥有海岸线的塞内加尔，认为自己更有机会从“法兰西共同体”中获益；身处内陆的“法属苏丹”则由于担心会因此削弱自己在联邦中的地位，而持反对意见。在塞内加尔退出联邦，独立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后，原来的法属苏丹部分就变成了现在的“马里共和国”（马里后来又选择了加入法兰西共同体）。顺便说下，今天的“法兰西共同体”虽然表面还存在，但却在影响力上远不如“英联邦”。追根溯源的话，与英国人更为浓厚的重商主义思维，以及有个能够充当黏合剂的“王室”不无关联。现在距离英、法在海外竞争的时代还有 200 多年时间，我们还是把视线拉回到桑海帝国崛起的时段来。

## 第七节 桑海帝国控制撒哈拉沙漠中的盐矿

从地缘属性上来说，西非土著政权从热带草原地带，将控制力延伸到萨赫勒地带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萨赫勒地带的南部可以种植耐旱的作物（高粱），并由此而建立定居点；另一方面，这条中间地带不仅是贸易中转区，生存其间的游牧民

族还会给尼日尔河的“黄金帝国”带来压力。要知道，西非三大帝国崛起的一个很重要标志，就是能够压制住北方游牧的图阿雷格人。然而将控制区延伸到撒哈拉沙漠腹地，就不是很好理解了。即使是出于控制商道的目的，在沙漠中心多得那么一两个有水井的补给点，看起来意义也实在不大。除非这片沙漠中有桑海帝国所垂涎的资源。

答案的确如此，能够让桑海人冒险将控制力伸入沙漠腹地的，是堪比黄金的另一项资源——盐。虽说制盐业的产生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毕竟人类可以像动物一样，通过食物（特别是肉类），及舔食含盐土壤、岩石等来获取身体所需的盐分，但当人类通过农作等方式扩大自己的食谱后，身体对于盐分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大了。同时，盐还可以帮助人类将食物储存起来，以减少季节周期对种群人口的致命影响。对于受温度、湿度影响，食物更容易变质的西非来说，盐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撒哈拉沙漠中的盐矿

在跨撒哈拉贸易的高峰期（三大帝国时期），输入西非的食盐并非来自于地中海沿岸。因为被阿拉伯人挤压入沙漠的柏柏尔人，不久便发现了撒哈拉沙漠中的矿盐。从技术上看，在沙漠地带发现天然矿盐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种情况是，这一区域地质时期原本是海洋，在地质、气候变迁后，原本的海洋变成陆地，海水

中的盐份就此留在了地面（如柴达木盆地的盐，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河流内流，没有办法将融解于水中的矿物质输出，最终在河流终端蓄积后蒸发成了咸水湖，直至天然析出盐层。相对而言，前一种情况的盐产量更高、覆盖面也更广（柴达木盆地的矿盐含量占全国一半）。撒哈拉地区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种，那些在前湿润期还能够外流入海的河流，在沙漠化后渐渐干涸，并将盐份蓄积到了沙漠中的一个一个终端干湖中。

在马格里布与西非之间的撒哈拉沙漠中，散布的盐场同时也充当着贸易中转站的职能。有了如此昂贵的资源，你不用担心控制者会缺少补给。基于地缘属性，控制上述沙漠盐场的，是那些能够适应沙漠生活的柏柏尔人部落（如图阿雷格人）。在价格最高的时期，穿行沙漠的柏柏尔人甚至能在廷巴克图，用盐换到同等重要的

黄金。一直到今天，贩卖撒哈拉矿盐，依然是图阿雷格人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这片土地无法滋养更多人口，是它最大的短板（今天图阿雷格人的总人口也不过百万）。盐更多是提升了柏柏尔人在沙漠中的生存能力，却无法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有更大作为。

需要说明的是，塞内加尔的沿海地区也有海盐出产，不过它的产量只是用来供应塞内加尔河下游河谷地区。塞内加尔河上游及整个尼日尔河流域所需的食盐，还是需要依靠撒哈拉的盐矿。这事实上也造成了塞内加尔河下游在地缘政治上一定的独立性（没有成为三大黄金帝国的核心区）。现在产盐的撒哈拉沙漠与产金的西非地区之间，看起来可以形成一个贸易闭环了，然而这并不代表马格里布地区就此为这张贸易网所抛弃。恰恰相反的是，基于身处文明程度更高的地中海文明圈，马格里布能够向南输出的各种工具、铜、奢侈品，甚至充当货币的贝壳，以让西非融入更加广阔的贸易网。那些从西非流出的黄金，也正是因此进入了地中海市场。

在毛里塔尼亚西部，靠近西撒哈拉东南的“伊吉勒”；以及马里西北角的“塔阿扎”，是撒哈拉矿盐的主产区。基于盐矿在跨撒哈拉贸易中的重要性，马格里布的阿拉伯、柏柏尔政权，以及西非三大帝国，都曾尝试控制这些产盐地，以及能够开采与输出这些重要资源的柏柏尔人部落。对于后者来说，做到这点相对要困难一点。不过通过军事和贸易手段，将统治力延伸入自己不善长的环境，并非无法做到。在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也曾经让漠北的游牧部落表示过臣服。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自身要足够强大。

事实上，在北方的阿拉伯帝国陷入崩溃之后，崛起的西非黄金帝国，很大程度上就充当维护了整个贸易网安全的角色。就控制盐矿这件事来说，走得最远的是桑海帝国。今天的马里共和国，在撒哈拉沙漠中伸入那只长“角”，其地缘政治层面的源头，就是当年被桑海帝国纳入版图的塔阿扎。从地理位置上看，塔阿扎正好位于阿特拉斯山脉与尼日尔河中游之间的中点。能做到这点，足以证明桑海帝国的强大。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加纳－马里－桑海三个所谓的西非“帝国”历史，并不需要割裂来看，而是可以统称为西非的“黄金帝国”时期。这就好像我们经常会把夏、商、周，统称为“上古三代”一样。除了向撒哈拉产盐区渗透以外，更多的西非产金区也在黄金帝国时期得到开发，其中最著名的产金地有两处：洛比、阿散蒂。后者的具体位置在今天的加纳西南，前者则位于加纳与“布基纳法索”相接地带。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加纳、布基纳法索，看到两个叫作洛比、阿散蒂的民族。不过这些产金区并不由三大黄金帝国直接控制，而是受当地的部族政权（酋长国）管辖。

对于一个以贸易立国的政权来说，并不一定要直接控制资源产地，重要的是你有机会垄断贸易线。就跨撒哈拉贸易的特点来说，控制撒哈拉地带与萨赫勒地带的交接处至关重要。然而随着贸易线的不断深入，即使是势力范围最广的桑海帝国，



也很难做到对贸易线的垄断了。毕竟萨赫勒地带横贯整个北部非洲，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并非是通往黑非洲甚至西非唯一选择。市场需要竞争，随着三大帝国的垄断力增加，更靠近黑非洲中部的贸易线也逐渐被打通。能够对接萨赫勒地带的大河流域，是成为贸易中心乃至建立强大政权的最佳地点，内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开发就是成功的案例。那么以尼日尔河以东还有哪条重要河流，可以支撑贸易线的东移呢？

答案并不是一条河流，而是一个湖泊——乍得湖（“乍得”本意为“水”）。从地理结构来看，乍得湖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缘分割点。所谓的西非地区，东部一般是以乍得湖为界，向东则被划入中非范畴。今天的乍得湖也是尼日尔、尼日利亚，以及乍得、喀麦隆四国交界点。前两个国家属于西非板块，后两个国家则归类于中非。需要注意的是，今天“中非”这个标签，已经被前身为“法属乌班吉夏利”的“中非共和国”所注册，因此在后面的行文中，会用“中部非洲”这个概念与之区别开来。



## 第四章 乍得盆地和乔斯高原的地缘格局

### 第一节 乍得湖的特点及其区位优势

先来了解一下乍得湖的位置和结构。前面曾经说过，与欧洲地势截然相反的是，非洲是一个以高原地形为主的大陆。不过高原只是一个初步印象，这片高原大陆内部也是高低错落。乍得湖及其周边低地区，就是一片被高地包围的地质凹陷区。这些高地计有：北部位于撒哈拉腹地，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尔－乍得四国相接地带的阿杰尔高原、阿哈加尔高原、提贝斯提高原；东、西部则为同处萨赫勒地带的阿伊尔高原（尼日尔中部）、萨赫勒地带的“达尔富尔高原”（苏丹西南），以及南部热带草原地带的乔斯高原、阿达马瓦高原（尼日利亚境内）。这个包含乍得湖在内的凹陷区，被称之为“乍得盆地”。

今天的乍得湖位于萨赫勒地带，湖区年降水量只有 200-500 毫米。很显然，它需要从整个盆地区及四周高地来补水。然而，以乍得湖横跨三个气候区的整体结构来看，你很难指望北部的撒哈拉沙漠，以及半干旱的萨赫勒地带，能够为乍得湖提供多少水源。真正能够依靠的，只能是来自南部热带草原区的河流。这其中发源于中非境内，透过乍得西南部，并最终在尼日利亚－喀麦隆交界处合流注入乍得湖南部的沙里、洛贡两河（合称沙里－洛贡河），就占了乍得湖水源的三分之二。

由于热带草原气候区雨、旱两季降水差异巨大，乍得湖的水域面积变化也很大。上世纪末，乍得湖雨季时的面积就有 2.2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五个青海湖（中国最大湖泊）的面积，至于旱季时水域面积则缩小一半。不过在撒哈拉还是湿润的森林地带时，能够四面补水的乍得湖，湖域面积肯定要宽阔得多。高峰期能够达到将近 40 万平方公里的湖面（相当于湖南、湖北两省面积之和），不仅能够填满整个乍得盆地，还能够溢出并通过上游河道与西面的尼日尔河、东面的尼罗河流域连通。这一时期的乍得湖也因此被称之为“乍得海”。

即使在撒哈拉气候进入干旱期后很长一段时间，乍得湖在丰水期依然能够与东、西两条大河相通。这使得源于中西非地区的黑皮肤“苏丹尼格罗人”，有机会沿水岸迁徙至尼罗河中游的东苏丹地区，与在下游建立古埃及文明，并与沿尼罗河南下的闪含民族发生碰撞，开启东非的种族混合史。在撒哈拉地区沙漠化后，湖面大幅缩小的乍得湖也不再具有自然连通两端的作用。不过即使如此，淡水湖属性的乍得湖仍不失为一片水草丰美之地。

作为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湖，乍得湖的淡水属性并不常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奇迹。从技术上看，如果乍得湖是一个终端湖的话，那么它的盐度上升几乎就是一个必然。除非它并不是一个终端湖，而是一个中继湖。在中亚的巴尔喀什湖，

我们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弧性湖泊的西半部就是一个淡水湖，通过狭窄水道相连的东半部则是一个咸水湖。为巴尔喀什湖提供主要补水的伊犁河，是从西端注入湖泊的，东半部湖盆的地势较之西半部又更低，使得淡水属性的西巴尔喀什湖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中继湖，并得以将河水带来的矿物盐倾泄到终端湖属性的东巴尔喀什湖。

那么乍得湖是不是也是如此呢？答案其实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从表面看，即使远离沙里－洛贡河河口的北部湖区，含盐量也很低（当然比河口略高）。也就是说，乍得湖本身并没有像巴尔喀什湖那样自然分区。真相是表面上看，乍得湖并非乍得盆地的最低点，在它东北部约 400 公里，靠近乍得、尼日尔边境处（乍得境内）有一片海拔更低的“博德莱洼地”（法语 Bodélé Depression），前者海拔低点约在 270 米，后者则仅有 155 米。通过地下岩缝，乍得湖水最终得以渗透至博德莱洼地，并使之实质成为一个中继湖。只不过，由于博德莱洼地的位置已经进入了撒哈拉沙漠，高蒸发量使得我们无法在此看到宽广的水域。

乍得湖的淡水属性，使之具备了聚落人类的功能。然而真正使得生活在乍得湖区的土著部落，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展现风采的，还是它地处萨赫勒地带南部的地缘位置。当西非黄金帝国之名逐渐为北部伊斯兰世界所知时，那些从埃及、利比亚方向而来的沙漠商人，可以选择先进入乍得湖区，然后再西入尼日尔河流域，或者“黄金海岸”。同时，在贸易线向中部非洲纵深渗透之后，即使是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商人，也可以选择绕过黄金帝国的控制区，直接以乍得湖区为中继点，向南开拓市场。

另一条凸显乍得湖地缘地位的贸易线，是经由西非通过东非的贸易路线。尽管乍得湖不再直接连通尼日尔河、尼罗河了，但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萨赫勒地带之后，萨赫勒地带的横向常态交通就已不是问题了。分隔尼罗河水系与乍得湖水系的分水岭，是一个曾经频繁见诸新闻端的地名——达尔富尔（高原）。这片位于原“苏丹共和国”西南边缘的高地，今天也是南、北苏丹相争的焦点地区。对于来往乍得湖与尼罗河中游的商人来说，达尔富尔高原就是他们的中继点；而放在东、西非贸易的层面来看，充当地缘枢纽的就是乍得湖了。那么乍得湖地区有没有诞出能够与西非黄金帝国相抗衡的土著文明呢？以及除乍得湖地区以外，西非是否还有值得一书的中世纪政权？

## 第二节 乍得湖区和乔斯高原兴起的政权

沿乍得湖兴起的土著政权叫作“卡涅姆－博尔努王国”。9 世纪的阿拉伯人得知这个国家的信息时，它是以“卡涅姆”（Kanem，又译卡内姆或加涅姆）之名兴起于乍得湖东北部，14 世纪末迁居至位置更为安全的乍得湖西岸后（首都库卡瓦），

更名为“博尔努王国”。与西非其它土著政权的兴起如出一辙的是，跨撒哈拉贸易的展开以及北非穆斯林商人、牧民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阿拉伯的记录者甚至认为这些外来势力中的佼佼者，曾经取得过卡涅姆王国控制权（而后被当地部族融合）。当然，在地缘框架中这些其实并不重要，就像俄国皇室中有再多的日耳曼血统，以及列宁是否有蒙古人血统，都不会影响它的地缘属性一样。

既能沟通南、北商路，又能打通东、西非贸易线的乍得湖势力，在博尔努王国时期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以至于能够与同时期控制内尼日尔三角洲，并向东扩张势力范围的桑海帝国展开竞争。好在双方都有自己的核心领地以及贸易空间，这种竞争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不过介于二者之间的区域，就难免深受其害了。

乍得湖与尼日尔河间的直线距离超过 1000 公里，二者之间的分水岭是西非另一个明显的凸起的，位于尼日利亚中部的“乔斯高原”。身处热带草原气候区的乔斯高原，平均海拔约在 1200-1400 米。对于依靠农业技术发展来催生文明的人类来说，这样的自然条件，既可以帮助当地居民在雨季躲避过量的雨水，又不至于在旱季无水可用（山地可形成地形雨）。今天在黑非洲发现的最古老的土著文化——诺克文化，便是处于乔斯高原地区。这个兴起于公元前 10 世纪的土著文化，除有成熟的农业技术、制陶技术等文明基本要素以外，还有发展了成熟的冶铁技术。

冶铁技术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诺克文化乃至中西非土著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没有经历成熟的青铜时代（并非没有掌握技术），而更像是直接从石器时代跨越进铁器时代。鉴于铁制工具比铜制工具的优越性，以及黑非洲文明的后发性，如果这两项技术是早期从外部传入黑非洲的（最有可能是沿尼罗河进入的），作为后发者选择更为先进的技术发展，也属正常之举了。当然，这并不代表铜在黑非洲就不重要了。事实上，在中西非贸易中，从北方输入的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商品。只不过铜的定位更多是用来制造工艺品、奢侈品，乃至充当货币罢了。联想一下中国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后，铜及其制品的定位就能够理解这一点了。

黑非洲土著文明中，原生性和次生性的比例到底有多少，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无论是尼日尔河、乍得湖，还是乔斯高原，真正让他们有机会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聚光灯下的，是它们与跨撒哈拉贸易的对接度。从位置上来看，乔斯高原的北部会比其它方位，更有机会填补尼日尔河与乍得湖贸易中心之间的空白。公元 11-12 世纪，这一地区诞出了一个以“豪萨”为标签的政治体。

不过豪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而是一批兴起于乔斯高原北部，尼日尔河-乍得河流域相接处的城邦统称，由于主要城邦有七个，所以也被称之为“豪萨七邦”，其中最为核心的城邦叫作“卡诺”。参照旧大陆的经验，豪萨人的城邦体更类似于古希腊式城邦的存在（卡诺相当于雅典），在有强大外敌入侵时，他们会趋向于结成同盟共同应对；而为了争夺利益，彼此之间也会征战不休。



处在桑海帝国与博尔努王国之间的豪萨之地，不可避免的成为后两者争夺势力范围的焦点之地。豪萨松散的政治组织形式，使之战略上一直处于防御地位。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就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来说，以“帝国”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并非是唯一的道路。区别于那些帝国体制的国家，此类政治样本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更为浓厚的商业属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上的开放性。这一点，从如今豪萨语西非“非官方通用语”的地位也可以看出。

今天使用豪萨语的人口超过 5000 万。然而豪萨语却并不属于黑非洲原有的“尼罗－撒哈拉语系”或者“尼日尔－刚果语系”，而是被归类为包含阿拉伯语、柏柏尔语的“闪含语系”中。简单点说，豪萨人不仅像其他跨撒哈拉贸易的受益者一样接受了伊斯兰教，还在语言上更为彻底的拉近了与贸易对象的距离。甚至在进入城邦时代后，豪萨商人就很快选择借助阿拉伯字母，创立了自己的文字。

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以桑海帝国为代表的西非三大黄金帝国，无疑算得上是成功者，但从更为基础的地缘角度来看，“豪萨”的后续影响力却要大得多。要知道，今天被认定为“桑海人”的族群，数量仅仅只有 200——300 万（桑海语属于“尼罗－撒哈拉语系”）。当然，每个民族集团或者政治体都有他的生存之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桑海人依靠军事而取得的政治上的成功，与豪萨人变通灵活的生存之道，并无所谓优劣。

现在，我们已经对从大西洋到乍得湖，沿萨赫勒南沿一线的地缘政治结构有所了解。基于跨撒哈拉贸易对西非文明、地缘政治进程的影响，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伊斯兰政权，将不可避免的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就此再推进几百年，我们今天看到的黑非洲也许就全是一片“绿色”之地了。不过，这个世界总是不缺乏竞争的，从海上而来的葡萄牙人，很快将会把地中海的圣战之火引向这片土地了。

## 第五章 葡萄牙在西非以西海岸的探索

### 第一节 葡萄牙发现并开发马德拉群岛

提到大航海时代，大家脑海中最先浮现出来的，估计是“发现”美洲的哥伦布、绕过好望角的达·伽玛，以及率先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虽然他本人身死菲律宾）等耳熟能详的航海家。的确，这些在合适的时候做了合适事情的航海家，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层面都对人类更深的了解这个星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如果从“人”的角度去探寻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者的话，这一荣誉却要更应归属于一位葡萄牙贵族——恩里克王子（又称“亨利王子”）身上。

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之路，始于之前我们分析过的“休达战役”（1415年）。攻占这个重要的北非据点，不仅让葡萄牙有机会在直布罗陀海峡布局成功，更为葡萄牙寻找到了摆脱西班牙压力的战略突破口。这场战役统帅，就是当时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恩里克王子。当然，如果仅仅是指挥了一场重要战役的话，这位葡萄牙亲王并没有机会出现在这个缺少帝王将相视角的帖子里，重要的是他之后的选择。

攻陷休达，引发了葡萄牙和恩里克王子向“西苏丹”进发，寻找黄金帝国的热情。尽管在此之前，欧洲人已经通过间接途径听闻了很多关于那片黄金之地的传说，但只有在真正踏足非洲之后，这些传说才会变成真正的情报。至于恩里克王子的贡献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端坐在宫廷中的指挥者，而是一个类似张骞的实践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做过太远海上航行）。可以说，他为葡萄牙乃至欧洲的海上殖民之旅，率先设计了一套有商业操作性的方案。与西班牙国旗浓厚的内部整合特征不同的是，今天葡萄牙国旗中央的葡萄牙盾徽背后印有一个浑天仪的图案，正是为了纪念恩里克王子和那个时代。

关于恩里克王子的生平，大家可以自行了解。在纪念完这位伟大人物之后，我们的视角要重回以国家、族群为基本单位的大历史视角来了。顺便说下，基于时刻要遭到来自西班牙的压力，葡萄牙的国运甚至比英国人更为依赖那片海洋（英国有天然防御优势）。这一理念甚至导致葡萄牙成为最后一个放弃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在1999年12月20日结束殖民统治的澳门，成为了葡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终止符（澳门也因此成为世界史上西方殖民时间最长的地区）。而在澳门回归中国之前，另一个为世人所熟知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则是一度引发战争的东帝汶了。

所谓师出有名，葡萄牙人要想进行海外扩张，也要有一个类似十字军收复圣地的理由，以得到罗马教廷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基于地中海两大宗教对立的局面，葡萄牙在北非的扩张倒是很容易让教廷和普通民众理解。然而本土并无地中

海出海口的葡萄牙，参与地中海的竞争始终是有点力不从心。在葡萄牙决定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沿非洲海岸线向南扩张时，葡萄牙还需要一个能引发教廷和信徒热情的理由。

寻找传说中被称之为“普莱斯特·约翰王国”的非洲基督教国家，成为了葡萄牙非洲探险之旅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关于这个国家最早的信息，是公元1170年，拜占庭帝国收到的一封署名为“普莱斯特·约翰国王”的信件。在传闻中，这个国王在伊斯兰世界背后统治着一个地域广大而又富庶的基督教国家，并表示希望与欧洲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一起应对伊斯兰世界的压力。此后数百年间，关于这个国家在哪里，一直是猜测不断。从战略角度考虑，欧洲人寻找这个潜在基督教盟友的想法，与当年汉武帝希望通过联合大月氏国，以断匈奴右臂的想法如出一辙。

依据传说中的信息，今天我们可以判定，所谓的“普莱斯特·约翰国王”的国家，应该位于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建立基督教政权（阿克苏姆王国）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与欧洲基督教世界遭受伊斯兰扩张压力相似的是，依靠红海贸易强大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也在阿拉伯帝国崛起并入侵东非之后，走上了衰退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海上贸易所获取的信息，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尝试向欧洲基督教世界寻求帮助，也就不足为怪了。只不过，基于伊斯兰世界的强大，这种联系当时并没有被建立起来，欧洲人也不再收到关于这个传说中国度的消息。

传说中强大富庶的基督教王国到底在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传说能够为探险者们提供一个目标，就像耶路撒冷曾经为十字军指引方向一样。有位外星人长相的“哲人”曾经说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如果你不去采取行动，不给自己梦想一个实践的机会，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回归到现实层面，虽然宗教热情能够激发一部分人的热情，但所有的行动都必须有物质作为基础。好在葡萄牙接下来的探险之旅，不仅有“圣战”层面的动力，还有几乎能够诱惑所有人的“黄金”。

葡萄牙在大西洋之旅所占据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是距离摩洛哥西南海岸线约700公里的马德拉群岛（公元1418年）。这一发现其实是一个意外，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远离海岸线航行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执行远航任务的葡萄牙船队，实际上是被风暴吹向了这个无人群岛。事实上，葡萄牙人并不是这个群岛的第一发现者，有确切证据表明，14世纪上半叶，热那亚商人也曾经到达于此。不确切的信息是，腓尼基人或者罗马人在公元前有无可能抵达于此。问题在于，一项发现如果没有带来足够的商业利润（包括利润不足以与风险和成本相当）的话，这项发现本身就很可能被湮没。就像很多人会坚信，亚洲人或者维京人早就“发现”美洲了，但这种没能够将新旧大陆连接起来的发现，即使是事实也没有价值。

葡萄牙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马德拉群岛的命运。对于在地中海有大量市场可供争夺的腓尼基、热那亚商人，或者在地中海沿线拥有强大空间的罗马帝国来说，这片远离大陆的无人岛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对于急于进行海外扩张的葡萄牙人来



说，意义却大为不同。首先，葡萄牙人的海外扩张需要中继点。尽管远离非洲海岸线，看起来为接下来的南下探险之旅直接帮助不大，但当你探索一片未知世界时，谁又能确切知道哪一步是最有价值的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马德拉群岛迅速成为了横跨大西洋航线的首要补给站。这一点在航行时间较长的风帆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经营一片殖民地，最重要的就是这片土地有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在商贸价值体现之前，这是一片气候宜人、植被茂密的无人岛。比起在北非的荒漠地带，在马德拉群岛上进行殖民活动要容易得多。葡萄牙人所采取的开发方式也颇为原始，那就是放火烧荒。这件事情放在今天是一定会被痛批的，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以当时农业开发的角度来看，在这种原始地带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需要重点提到的是，葡萄牙人为马德拉群岛引入的经济作物为甘蔗。基于海上运输的高风险性，日后在殖民贸易中种植的农产品，基本都是诸如甘蔗、咖啡、烟草这样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甘蔗和马德拉群岛，便是这一切的起始点。

葡萄牙乃至欧洲并非甘蔗的原产地。这一能提炼蔗糖的重要经济作物原产于印度，后经由阿拉伯帝国传播至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中国引入甘蔗种植的时间要更早些，一种说法是西汉开拓丝绸之路时经由中亚传入；另一种说法，则是在周代时已经由中南半岛传入中国南方。需要注意的是，引种甘蔗成功与掌握蔗糖提炼技术是两个概念，就像人类很早就发现海水是咸的，但学会将盐提炼出来却要晚得多一样。

最初的制糖术得到的只是颜色浅褐的粗糖（也就是俗称的红糖），只有用亚硫酸、石灰等进一步澄清脱色后，才会进一步精练为白糖。中国最初的白糖提炼技术也是从印度输入。一个存疑的引入者，是近年来在网络上热炒的民族英雄——王玄策。一如推定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人能够从中国战俘中获得造纸术一样。王玄策在印度所取得的军事胜利，有可能让其获得掌握蔗糖熬制技术的工匠。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后来在蔗糖精练技术上发展得更有优势，又将更好的白糖提纯技术反输回了印度，以至于今天在印地语中“白糖”一词（cīnī）的意思便是“中国的”。

甘蔗种植传入伊比利亚半岛之后，欧洲人也同时获得了制糖技术。在日后的蔗糖贸易中，欧洲人一般会将产自殖民地的原料先提炼为粗糖，然后再运到欧洲进一步提纯为白糖进行销售。从地缘角度看，甘蔗种植与蔗糖生产工艺的普及，并不仅仅在于方便人类品尝到五味中最能让人产生愉悦感的“甜味”（在此之前，产量偏低的蜂蜜是甜味的主要供应者）。要知道人类活动所消耗的能量，有70%是靠糖类氧化所产生的热量来维持的。在食谱中直接加入代表高热量的“白糖”，以及掌握大量“糖”资源，其在战略层面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对马德拉群岛的农业开发，让葡萄牙人真正获得了第一片“海外”（如果休达不算“海外”的话）殖民地，并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然而就寻找“黄金帝国”或

者更崇高的“普莱斯特·约翰王国”目标来说，马德拉群岛所能发挥的价值却是有限，葡萄牙接下来还需在其他的方向展开探索。

## 第二节 葡萄牙在加那利群岛建立据点

葡萄牙探险家接下来的探索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以马德拉群岛为基地，向西做新的探索；二是继续沿着北非海岸线继续南下，去完成原定目标。已经决定走海外扩张之路的葡萄牙，并没有放弃任何一种选择，而是同时向两个方向派遣了探险船队。一定要比较的话，沿非洲海岸线南下之路，优先级将会更高。在这个方向，葡萄牙人的第一步就有非常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加那利群岛。

之所以目标会如此明确，是因为这个群岛不需要葡萄牙人去发现，甚至可以说需要葡萄牙人代表欧洲人去征服。在葡萄牙人决定启程之前，柏柏尔人和代表西班牙的殖民者已经登上了这片土地。地理位置决定了，加那利群岛很早就被影响力触及西北非的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所发现。有一种说法是，加那利之名原意为“有狗的岛屿”，得名则是因为那些早期发现者发现岛上出产一种巨大的狗。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今天被命名为“加那利犬”的西班牙猛犬，只是借用了这个传说罢了。

与远离大陆 700 公里的马德拉群岛不同的是，加那利群岛与大陆的距离仅仅为 100 公里。即使在风帆时代，跨越这样的距离发现一片新大陆，也是大概率事件。同时，这样的距离也足以保证群岛与大陆的交通成为常态，并使得移民成为可能性。当然，上述概率和可能性还取决于大陆的人口状态。就加那利群岛的位置来看，它恰好面对的是今天摩洛哥与西撒哈拉的未定国境线，而这条有争议的国境线同时也是一条地缘分割线。从阿特拉斯山脉向西南延伸的影响力，大体便延伸至此。从气候角度来看，算是从地中海气候向热带沙漠气候过度。也就是说，从摩洛哥向南进入西撒哈拉境内，便是正式进入撒哈拉沙漠地带了。

上述地缘特点，从西撒哈拉的人口数量也能看出。整个西撒哈拉境内，仅有北部靠近海岸线和摩洛哥边境的“阿尤恩”勉强算得上是一座城市（人口 13 万），而国土面积比两个福建省还略大（26.6 万平方公里）的西撒哈拉，总人口也不过 40 余万。对比受阿特拉斯山脉庇护而人口总数达到 3300 多万的摩洛哥（面积 46.6 万平方公里），西撒哈拉的荒芜感受更显直观。

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的纯荒漠国家，西撒哈拉地区缺少抵御外部入侵的能力，以至于西班牙宣布放弃在西撒哈拉的统治之后（1975 年），法属殖民地出身的摩洛哥很快便取得了西撒哈拉大部领土（包括全部海岸线）的控制权。由于西撒哈拉地区东南方向的另一个前法国殖民地——“毛里塔尼亚”，在西撒哈拉东部与自己相邻的区域扶植了争取西撒哈拉独立的“西撒哈拉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了约 1/4 的领土），

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看到一个能代表西撒哈拉发声的政府（目前获得 40 余个国家承认）。只是基于先天不足的客观条件，摩洛哥吞并大部西撒哈拉领土的事实，相信已经很难更改了。

世居于阿特拉斯山脉之侧的柏柏尔人，在欧洲人“发现”加那利群岛之前就已在岛上移民成功。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加那利群岛上已经繁衍有数万被称之为“关契斯人”的柏柏尔原住民。就自然条件而言，这个由 7 个岛屿所组成的群岛可谓得天独厚，不仅四季如春，更有肥沃的火山灰为农业发展提供助力。如果说海峡对面是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的场面，那么加那群岛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片世外桃源了。这个世外桃源出现在普通中国人的视线里，最早应该是源自台湾作家“三毛”的书（以《撒哈拉的故事》为代表）。在她那些散文体的自传中，这个自幼喜爱“三毛”（因此而以此为笔名）的女子，在阿尤恩与西班牙人荷恩结婚，并一起在西撒哈拉的沙漠里，以及天堂般的加那利群岛书写了一段被很多“文艺青年”所憧憬的爱情故事。

作家三毛的经历让“文艺青年”向往，很大程度是因为故事发生在那种天堂与地狱一线之隔，有着奇特景象的地方。而“文艺青年”很可能没注意到的，则是这个故事背后的地缘政治背景。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西撒哈拉的得名并不是源自于它的方向，而是因为它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西属撒哈拉）。伊比利亚海外扩张的黄金时代结束后，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拥有双重地缘优势的法国，逐渐取得了西北非 - 西非的主导权。西属撒哈拉是西班牙在这片大陆上所保留的为数不多的殖民地之一（也是唯一连片的殖民地）。

法国人愿意在自己的殖民地中包围之中给西班牙人留出一片保留地，根源上当然还是因为这片沙漠之地实在没什么资源。至于西班牙人在远离本土 1000 公里的土地上，执着的保留一块拥有海岸线的沙漠之地，盖因为这片沙漠对面的加那利群岛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也就是说，尽管西撒哈拉本身没有太大潜力，但却可以充当加那利群岛在非洲大陆的支点。反过来，即使西撒哈拉被周边法属殖民地所孤立，也可以与加那利群岛形成一个自循环体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也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法国和西班牙都已不再可能像之前那样经营自己的殖民地了。1975 年，西班牙被迫放弃在西撒哈拉的统治。次年，都认为自己更有理由得到西撒哈拉的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在西撒哈拉展开对峙。也正是在这一年，三毛、荷西与很多西班牙移民一样，移居仍属西班牙领地的加那利群岛。1979 年，自知实力比不上摩洛哥的毛里塔尼亚宣布放弃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退而求其次的支持谋求独立的西撒哈拉民族解放阵线。

也就是说，西属撒哈拉的存在，源于西班牙得到了加那利群岛，或者说西班牙在法理上是加那利群岛的最先“发现者”。当然，最先也好、发现也罢，说法都完



全是从欧洲殖民规则的角度来说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个天堂般的群岛早已生活有柏柏尔居民了。事实上，今天生活在加那利群岛上的 220 多万岛民，绝大多数都是西班牙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需要说明的是，西班牙“发现”加那利群岛之说，是从国家层面来判定的，具体操作的则是一个来自法国的诺曼贵族——让·德贝当古。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源自北欧海盗的诺曼人，以及在地中海编织商业版图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都曾经是欧洲海洋文化的代表。与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的意大利商人不同的是，诺曼人注重的是带征服性质的殖民扩张。他们不仅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打下了一片江山，更远赴地中海建立过西西里王国。如果以探险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诺曼人算是真正的探险家了。让·德贝当古知道这个群岛的信息，则是从两名被贩卖至欧洲的加那利原住民那里获得的。他发现并登陆加那利群岛的时间，是在 1402 年，随后又花了二年时间征服了七个岛屿中的一半（包括：兰萨罗特岛、富埃特文岛、耶罗岛，以及未完全征服的戈梅拉岛），并建立殖民统治。

严格来说，诺曼探险家的这次海外征服，并不能算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而更多是一次个人的冒险之举（资金也来自自己变卖资产所筹措）。只不过，如果没有国家为之背书，包括提供后续援助的话，探险成果的保留是有很大大风险的。在远征之前，诺曼人曾经四处寻找支持，回报则是将殖民地的宗主权交付于提供支持的王室。正纠缠于英法百年战争的法国，并没有对这次看似没可能成功的冒险之举抱以热情。最终愿意为之背书的，是正在力求把摩尔人最终赶出伊比利亚，并且已经把视线投向马格里布的西班牙王室（卡斯蒂利亚王国）。从西班牙的角度来看，如果诺曼人成功了，理论上就将在马格里布的侧后方打入一颗钉子；如果没有成功，这次自筹经费的冒险之举于西班牙也没有损失。

让·德贝当古的这次征服，过程并不太血腥，更多是通过两个带路党，让土著居民相信他们的到来，能够为之带来更多的商贸利益。与土著部族首领联姻，并且传播天主教，则是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欧洲人后来的海外殖民之旅中，这实际上也是通行的做法。当然，一旦欧洲人自觉占据了绝对优势时，再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时，就会倾向于用强硬手段了。

让·德贝当古的这次征服震动了整个欧洲，也让加那利群岛成为了欧洲诸国的觊觎对象。西班牙的先发优势，使之后来在加那利群岛归属问题的争夺上，能够在法理层面占优（判定者为教廷）。然而法理只是一方面了，加那利群岛能不能归属西班牙，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消化。对于当时还没有完成“西班牙光复运动”，并且有机会在西地中海发挥主导作用的西班牙来说，海外扩张并不在优先考虑的范畴。而已经明确自己海上之路的葡萄者，则在其中看到了机会。

可以说，葡萄牙第一阶段的海上扩张之路，目标就是加那利群岛。在被风暴吹偏至马德拉群岛之后不久，恩里克王子再次派出的舰队终于抵达加利利群岛（1420

年），并在让·德贝当古未能完全占领的戈梅拉岛上建立据点。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先到的诺曼人，还是后来的葡萄牙人，都还远不能说真正完成对群岛的征服。15 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又花了将近 20 年时间（至 1496 年），付出惨痛代价后才算真正征服全部岛屿。对于葡萄牙来说，他们暂时对于与西班牙或者土著人争夺群岛的宗主权还没有兴趣，这次远航的目的在于为下一步的探险建立支点。这个任务完成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 第三节 葡萄牙海上探险资金的主要来源

相比葡萄牙人接下来要遇到的挑战，前往加那利的航程已是非常轻松的了。一方面，探险者有加那利土著为之确定明确的目标，以及提供岛上的情报；另一方面，整条航线都是在阿特拉斯山脉西北麓沿海地带的庇护之下。即使不考虑沿途补给的便利性，能远望绿色的诺曼人和葡萄牙人，最起码也不会有置身于绝境的感觉。

对于新的航程，更大的困难在于船员对不可知世界的恐惧。在之前诺曼贵族征服加那利群岛的探险中，恐惧心理就曾经使让·德贝当古雇佣的船员大量逃亡（只剩数十人随之登陆）。如果说这还只是“恐惧感”的话，那么沿西撒哈拉南下的航线，给予探险者的感觉就是“绝望感”了。因为从加那利群岛再往南的航程，船员遥望大陆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沿途补给几乎没有可能。

在葡萄牙人之前并非没有打通西北非 - 西非海上航线的先行者，之前那些将贸易线在直布罗陀以西拓展的海上强者（比如阿拉伯人）都曾经沿西非海岸线南下做过努力。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 14 世纪也有商人在与摩洛哥沿海地区进行海上贸易时，也有过类似尝试。这些航海先行者所认定的航海线终点，是今天西撒哈拉西北沿海与加那利群岛隔海峡相对的“博哈多尔角”。受欲望驱使沿海岸线航行至此的航海者们，在绕过岬角之后看到的还是一片荒凉之地时，心理便出现了崩溃。于是乎，在航海者的传说中，博哈多尔角以南海域被描述为一片魔鬼之地，任何驶入这片禁地之人都将万劫不复。

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以加那利群岛（具体是戈梅拉岛）为起点的葡萄牙探险家，注定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博哈多尔角以南的航线。为了寻找到黄金帝国，葡萄牙人需要一点点的延伸自己的每一次航程，并考察沿岸是否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最初的突破是在公元 1434 年，恩里克派出的探险家第一次绕过博哈多尔角，向南航行了 100 海里。好消息是，这片魔鬼海域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可怕；坏消息则是，此次航行所面对的仍然是荒芜的沙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抛开经济基础谈论理想和政治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实的问题在于，航海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即使恩里克王子的身份能够帮助他在葡萄牙国内击败一些反对意见，但如果不为这项不可知的探索活动找到直接的经济支撑

和收益的话，事情将变得难以为继。先期发现的马德拉群岛，开始为进一步的探险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德拉群岛财政收入的20%，被用来做进一步探险的专项海上基金。在这个群岛上的殖民和农业开发的成功，为葡萄牙财政带来了额外收入。从技术上来说，将部分收入用来支持下一步探索的滚动发展模式，与企业将每年赢利中的固定比例用作技术开发一样，都是良性循环的表现。

葡萄牙和恩里克王子航海探险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来自于罗马教廷。对于教廷来说，任何一次针对异教徒的征服，都是值得期待的。教廷有权利要求每一个教徒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当然其实是奉献给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了），这就是所谓“什一税”。只要你向教廷承诺，将传播天主教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教廷当然是很乐得在政治上表示支持的。对于付出十分之一收入的天主教国家来说，这样做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

获得教廷支持，相当于为接下来的航行发现进行了注册（以避免其它国家的恶性争夺），而宗教传播对于殖民地的开发与稳定也的确会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教廷也给予了葡萄牙接下来的海上探险以实质性的支持。我们知道，十字军时代是教廷影响力最盛的时期。那些受狂热宗教思想驱动，并在东征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骑士团，在结构上是超出各国政治统治者，直接听命于教廷的重要力量。除了最著名的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之外，各国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骑士团组织存在。

14世纪初，伴随着十字军事业的衰弱，骑士团在东地中海的事业也走向了没落。他们对各国王权集中度的破坏，以及所积累的财富都使之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这其中，在波罗的海继续延续征服事业的条顿骑士团，以及以塞浦路斯 - 罗得岛 - 马耳他岛等东地中海岛屿为基地，逐级为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林压力的医院骑士团，都因其还有地缘政治价值而延续了下来。以法国为基地，影响力最大、财产也最多的圣殿骑士团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法国国王不仅以异端为名解散了圣殿骑士团，还处死了大量骑士团的高级领导者。至于法国境内的骑士团财产，自然也成了王室所有。

在法国之外，圣殿骑士团的财产则在教廷的授意下，自然依属地原则流入了其它骑士团。这其中，获益最多的是依然在地中海发挥影响力的医院骑士团，而在葡萄牙的财产，则归入了葡萄牙本土的阿维斯骑士团。基于圣战属性的“收复失地运动”中，伊比利亚诸国需要获得教廷的支持比其它国家更甚。同时军事修道会的存在，也的确能够在针对摩尔人的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骑士团这类军事修道组织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处境，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危险。然而随着伊比利亚圣战的结束，情况同样变得有些微妙了。这些受教廷指导的骑士团需要找到新的方向，才能继续让王权觉得有存在的价值。

最终的结果是双赢的，在葡萄牙拥有大量地产的阿维斯骑士团，成为了支持葡



萄牙海外探险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事实上，伟大的恩里克王子本人，正是这个骑士团的团长。教权与王权在海外扩张的协调之处，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不过这位航海先行者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恰好”拥有了双重身份。身体力行的推进航海事业，才是他值得世人铭记的地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航海本身是一件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生活环境亦十分恶劣）。除了少数出身不那么正的贵族（比如诺曼人）外，绝大多数贵族是不屑于亲自做这件事的。毫无疑问，恩里克王子的修道者身份，是他能做到这点的直接原因（其本人甚至终身未婚）。

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宗教仍然是影响这一进程的重要地缘因素之一。地缘跟地理之间的差异，只在于一个“人”。意识形态和信仰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在微观历史层面并不容忽视。只是我们的重心会更多放在这一因素产生的地缘背景，以及宏观关系上罢了。具体到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来说，那就是有具体的行动力其实远比拥有宏观思维更为重要（不至于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 第四节 葡萄牙船队发现亚述尔群岛

回到葡萄牙海外扩张的路线问题上来。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的西非海岸线，长度超过 650 海里（约 1200 公里），并且中途再无群岛为之延续航程。也就是说，葡萄牙人要向南探索到处在萨赫勒地带的塞内加尔河口，才有机会真正触及心目中的黄金帝国。从绕过博哈多尔角算起，葡萄牙人又花了 11 年时间才完成这个“发现”，并在稍早些时候看到了黑人的踪迹。而在此之前，支撑葡萄牙人信心的，几乎只有在沙漠海岸发现的柏柏尔驼队留下的足迹（证明南下的方向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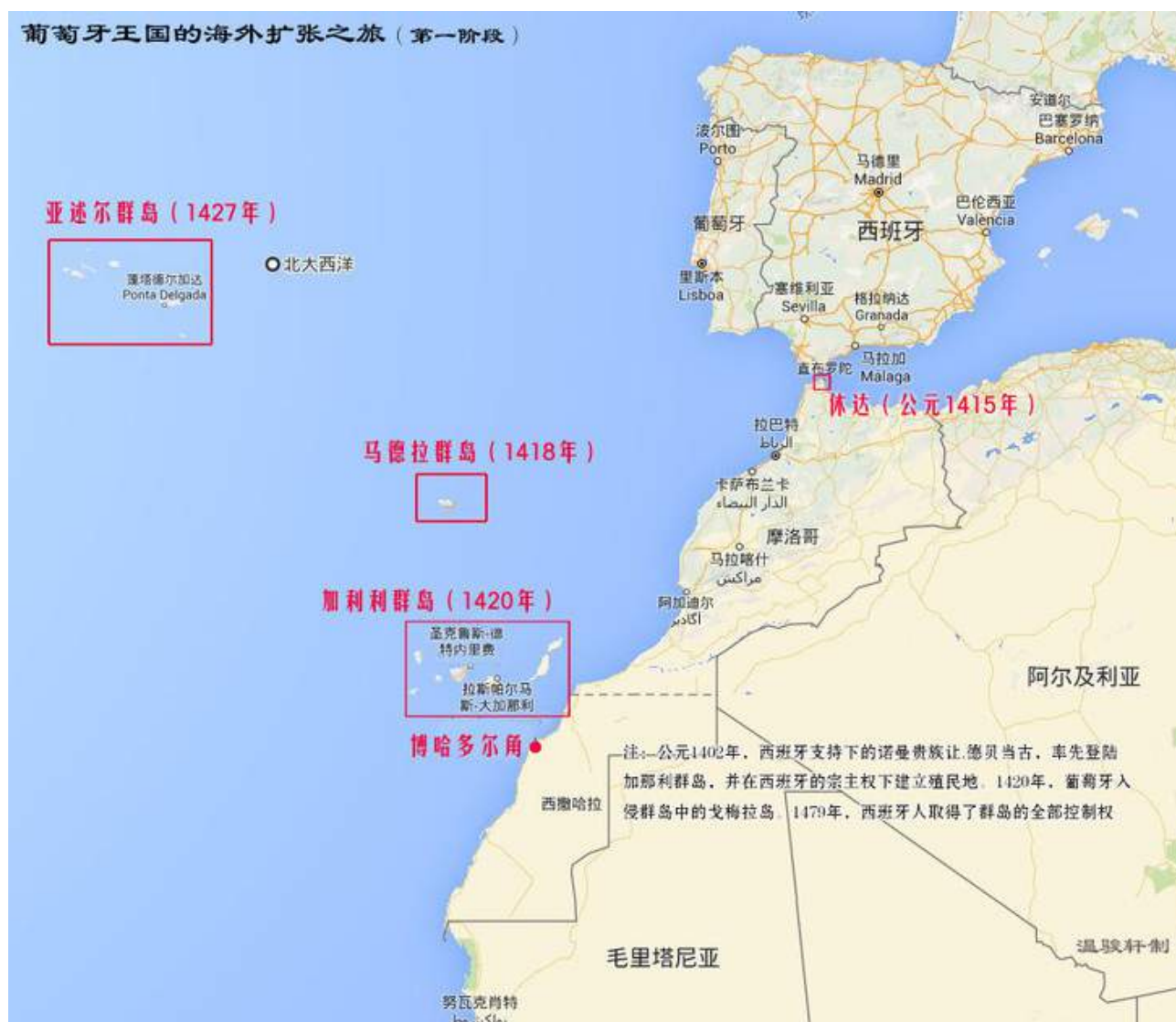
相比艰难的南下探索之旅，以马德里群岛为基地向西的探险之旅，出结果的时间要更早一些。1427 年，葡萄牙船队在距离马德拉群岛西北约 450 海里处，发现了又一个体量更大群岛——亚述尔群岛，并于 5 年之后正式在此建立殖民地。与马德拉群岛一样，亚述尔群岛也属于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火山岛，温润的气候以及肥沃的火山土，使得群岛之上植被茂密，并且尤为适于农业开发。以至于有人认为，古希腊传说中失落的大陆——亚特兰蒂斯，有可能指向的就是亚述尔群岛。

不过葡萄牙人在登陆之后，并没有在诸岛上发现人类曾经活动过的痕迹。基于它的位置离大陆实在有些遥远，即使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也几乎没有可能是亚述尔群岛。尽管亚述尔群岛距离欧洲大陆的距离过于遥远，除了通过农业开发（包括开采自然资源）向葡萄牙财政做贡献以外，似乎没有打通贸易路线层面的利好，但这一定位是建立在美洲没有被发现的前提之下。一旦“新大陆”被标在海图上，你就会发现这片海外净土对于打通大西洋航线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葡萄牙人却没有继续向西的探索，即使后来理论上已经证实了环球航行到

达东方的可能性，又即使哥伦布最先寻求的是葡萄牙人支持（而非西班牙），葡萄牙的关注点也没有再次转向西方。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机会成本”的计算，沿非洲海岸线的航行已经为之描绘出了一幅巨大的贸易前景。葡萄牙人认为自己几乎没有理由，再为一次完全未知（并且理论航程不会短于印度洋航线）的航行去投入资金。

如果说登陆加那利群岛是葡萄牙海外扩张之旅的第一步的话，那么穿越西非沙漠海岸抵达塞内加尔河，就是其海外之旅第二阶段的起点了。作为对之前探索的回报，葡萄牙将会在西非大陆收获到什么呢？



葡萄牙王国的海外扩张之旅（第一阶段）

## 第六章 葡萄牙在几内亚湾海岸的探索

### 第一节 葡萄牙在西非猎取黑奴

尽管葡萄牙人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西非的黄金，但作为一项从开采到贸易都已拥有一套相当成熟产业链的资源，在塞内加尔河触及到西非的葡萄牙人，其实很难就此打破穆斯林商人的垄断。尤其从海路接近西非的葡萄牙人，很难像骑骆驼、马匹的穆斯林商人那样，深入已经伊斯兰化的西非腹地。虽然如此，葡萄牙人还是有机会通过海上贸易获得一定数量黄金，并且从其它贸易发现中获利。

以象牙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可以为葡萄牙人的货仓做出一定贡献。不过葡萄牙人其实更青睐一项回报率更高的货物——黑人。事实上，欧洲人对黑人本身并不陌生。基于撒哈拉贸易线的开通，在西北非的摩尔人当中，其实已经杂有不少来自西非的“苏丹人”了。这其中，有整部落归信伊斯兰教的黑人部落（比如通过军事上的雇佣），亦有更多是基于奴隶贸易被贩卖至马格里布乃至伊比利亚的黑人奴隶。这些后来在语言、文化上已经伊斯兰化、阿拉伯化，却在种族上呈现苏丹尼格罗人种特征的摩尔人，被统称为“黑摩尔人”。至于有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特征的摩尔人，自然就被归类为“白摩尔人”了。

今天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是了解白摩尔人 - 黑摩尔人 - 黑人地缘关系的典型地区。这个北接阿尔及利亚，西临西撒哈拉，南抵塞内加尔、马里，东线与马里相交，并且在西撒哈拉与塞内加尔之间拥有一段长约 600 公里海岸线的国家，地缘位置正处在马格里布地区与西非草原之间，也是非洲西部跨撒哈拉贸易的发源之地。曾经在塞内加尔河下游积蓄力量，并且反攻至摩洛哥建立政权的“阿尔穆拉比特王朝”，其所依靠的部族力量就是游牧于毛里塔尼亚地区的柏柏尔人。

前面我们也解读过，崛起后的阿尔穆拉比特王朝曾经向南击溃加纳帝国。虽然不久之后，便因为统治的困难而放弃，但这次征服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为阿尔穆拉比特王朝获得大量黄金外，从西非获得的人口也是另一项重要收获。对于人口稀少的毛里塔尼亚柏柏尔人来说，他们需要在不影响自身种族纯洁性的前提下，补足人力的不足，而黑人奴隶的使用则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一问题。当年斯巴达人在强化自身统治阶层属性的同时，将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作为农奴阶层（史称“希洛人”），本质也是这种情况。

对加纳帝国的征服，让那些服务于阿尔穆拉比特王朝的柏柏尔人部落，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黑人奴隶。12 世纪中，建立阿尔穆拉比特王朝的毛里塔尼亚柏柏尔人，被崛起于阿特拉斯山脉的“穆瓦希德王朝”所取代，被迫退回了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毛里塔尼亚境内。基于自己的地缘位置，以及奴役黑人的传统，数百年来毛里塔



尼亚白摩尔人，一直在不断从南部的西非地区获取人力，这也使得现在的毛里塔尼亚境内形成了人口众多的“黑摩尔人”群体。在毛里塔尼亚 400 万人口中，黑摩尔人的比例达到 40%，白摩尔人、黑人则各占 30%。

白摩尔人 - 黑摩尔人在毛里塔尼亚这种维持数百年的共生关系，使得“黑摩尔人”在身份认同上强烈倾向于“摩尔人”，而耻于和与之同样肤色的“黑人”为伍。与此同时，长时间的奴化经历，又使得黑摩尔人作为一个带有农奴性质阶层，在意识里接受与白摩尔人的主从关系，并且帮助后者压制南部黑人势力可能的反抗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毛里塔尼亚是一个“摩尔人”占 70%，而非“黑人”占 70% 的国家。

毛里塔尼亚黑摩尔人的这种族群归属现象，看起来虽然有些奇怪，但深究起来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族群为了融入自视更高级的族群里，往往会尽力表现出对原有身份更多的恶意，以洗刷身上的这种原罪。比如在日本极右翼势力中，最卖力表现的其实是一些日籍韩裔。包括海外一些所谓拥有华人血统的政治家，往往并不如很多人想象那样，天然会做更有利于中国的事（甚至会更反华）也是如此。

希望用意识形态上的高调表现来补足血统不足的情况，也表现在毛里塔尼亚的国家属性认定上。毛里塔尼亚是世界上仅有的 5 个以“伊斯兰共和国”为名的国家。其它 4 个分别是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以及经常“跳梁”的冈比亚。观察上述几个国家的属性，就会发现它们在种族归属上，都不属于最能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概念中，并且都面临很现实的地缘政治压力。将认同传统政教合一形式的“伊斯兰”放在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之前，是上述国家试图彰显自己存在，寻求在伊斯兰世界获取支持的重要手段。

当然，也不是说用了“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旗号，就一定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践行伊斯兰教法，这更多是在表明一种态度了。比如最早用这个标签的巴基斯坦，实际上就没有形成政教合一，或者说神权置于政权之上的统治结构。不过与阿拉伯 - 逊尼派势力正面对抗的伊朗（波斯 - 什叶派属性的），目前却的确是在这样践行的。

“毛里塔尼亚”希望尽力切割与西非的地缘关系，而尽力将自己的属性与北非拉近的心理，还体现在它的国名选择上。与加纳、马里这些古为今用的非洲国名一样，毛里塔尼亚一名也相当有历史，甚至要更久远得多。在罗马与迦太基相争时期，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阿特拉斯山脉沿海地区，就被称之为“毛里塔尼亚”。腓尼基人的殖民中心“迦太基”，狭义指向的则是突尼斯地区。后来在罗马帝国的行省划分中，马格里布毛里塔尼亚地区被划为“毛里塔尼亚行省”；而摩洛哥（迦太基）和利比亚西部沿海（的黎波里斯地区）则被归为“阿非利加行省”。

从位置上看，马格里布毛里塔尼亚地区应该也是后来入侵伊比利亚的“摩尔人”的根基之地，那么毛里塔尼亚与摩尔人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所谓“尼亚”与其它类似的“里亚”、“西亚”、“尼亚亚”……后缀一样，都是“之地”或者“之国”的意思；少有人知的是，“毛里”与“摩尔”其实只是不同的译法。

也就是说“毛里塔尼亚”的本意，就是“摩尔人之地”。了解了这层关系，相信大家会对现在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为什么要把一个原本位于阿特拉斯山脉之北的地缘概念，南移到荒漠覆盖的区域，并且处处彰显自己“摩尔人”身份的用意有所领会了吧。

虽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毛里塔尼亚没有可能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张到马格里布地区，更别说摩尔人曾经入主的伊比利亚了，但将一段辉煌经历通过垄断标签的形式对接入自己的历史，对形成独立的国族认同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毛里塔尼亚不是第一个这样做，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一个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案例，就是尽力将自己包装成高句丽、渤海国继承者的两个国家了。在接近塞内加尔河的毛里塔尼亚沿海后，葡萄牙人捕获到了第一批（10 人）黑人奴隶。这些黑人很有可能本身就是柏柏尔人的奴隶，不过想要有更多的收获，葡萄牙必须真正进入黑人聚落的区域。

## 第二节 葡萄牙进入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

进入西非沿海，并不代表葡萄牙接下来即将与西非土著，乃至“黄金帝国”爆发战争。恰恰相反，恩里克王子为葡萄牙制定的海外扩张之旅原则十分明确，那就是尽量与当地土著和平相处，以期获得贸易利益。问题在于，海上贸易之路的稳定延伸，有赖于沿线布设的贸易据点。由于塞内加尔河下游（包括冈比亚河流域）属于马里 - 桑海帝国的领地，并且沿贸易线而下的毛里塔尼亚柏柏尔人，肯定也不愿意看到葡萄牙人来抢生意，所以葡萄牙人希望能够在两大势力之外先找到一块能够快速立足的土地。

公元 1446 年，葡萄牙人经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口继续向下，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登陆的地点。这就是今天位于塞内加尔河与几内亚之间的沿海小国——几内亚比绍（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与“几内亚共和国”相比，这个面积要小得多的“几内亚”，仅仅是在国名后面加注了一个首都名（首都“比绍”）。类似情况在非洲并不少见，比如后面我们会看到的两个刚果之争。说到底，还是彼此都不愿意放弃“几内亚”之名所带来的地缘遗产。

关于“几内亚”的名字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某位登陆西非的航海家（据说是法国人），遇到当地土著妇女问这是什么地方，对方答曰自己是“几内亚”（妇女），于是便误以为“几内亚”这片土地之名。是不是觉得很眼熟？类似的误会在大航海时代的传说中看起来很常见。不过法国人登陆西非比之葡萄牙人要晚得多，在此之前穆斯林商人也早就对这片土地进行了商业开发。换句话说，就这样一块不是“新大陆”的大陆来说，后来者基本都会遵从先行者的命名习惯，因误会而命名的机率是非常小的。比如将西非称之为“西苏丹”，便是从阿拉伯人将撒哈拉以南地区称

之为“苏丹”（黑人之地）的传统。相比之下，另一种说法看起来更符合地缘规律，那就是“几内亚”的原意，即为柏柏尔语中的“黑人之地”。也就是说，几内亚与苏丹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不管“几内亚”之名的来源如何，它的确已然成为了西非最重要的地缘遗产之一了。只是由于后来葡萄牙在西非的势衰，面积更大的法属几内亚，也就是现在的“几内亚共和国”成功的抢注了这个标签。而葡属几内亚，则不得不在后面加注一下首都名，以示区别。顺便说下，19世纪的西班牙也在几内亚湾东部，抢得了一块比几内亚比绍还要小的殖民地（2.8万平方公里），上世纪独立之后，这块西属几内亚便成了今天的“赤道几内亚”。

尽管葡萄牙人认为自己的到来是为了促进彼此的贸易，但并非所有原住民都能够从贸易中直接获益，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种改变。无论是在戈梅拉岛（加那利群岛）还是几内亚比绍，葡萄牙人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长期以来都仅仅是沿海的几个贸易据点罢了。在这种压力下，类似马德拉群岛、亚述尔群岛这样的无人居住岛屿，才是进行殖民并成为稳定贸易基地的最合适选择。

那么在西非沿海地带有没有这样的无人群岛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塞内加尔河正西方向约570公里处，有一个由15个火山岛所组成的群岛——佛得角群岛。这一距离比之马德拉群岛与大陆的距离略近，较加那利群岛则要远得多。公元1456年，葡萄牙人抵达于此，一如他们看到的马德拉群岛一样，并没有发现有人定居的痕迹。不过佛得角群岛的气候条件并不算湿润，整体属于降雨稀少的热带沙漠性气候。可供种植开发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有高地补水的河谷地带（高地则为高山草场）。

虽然从农业开发的角度看，佛得角并不如马德拉、加那利两个群岛，但佛得角群岛的区位价值却是独一无二的。葡萄牙人在西非的收获可以在这个群岛汇集，然后向北穿越西非沙漠海岸，再经由加那利、马德拉中继，运往葡萄牙本土。这样的话，即使葡萄牙在这段航线上没有一个大陆据点，也能够将贸易线稳定的延伸至几内亚湾了。不过尽管如此，几内亚比绍在大陆的作用对葡萄牙依然十分重要，葡萄牙在西非“收集”到的商品（比如黑奴），需要几内亚比绍为之提供出海港口。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一如西班牙统治下的加那利群岛 - 西撒哈拉。

基于佛得角在葡萄牙西非贸易中的枢纽地位，一直到19世纪末，葡属几内亚在行政上都属于佛得角管辖。这也使得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非独立浪潮中，来自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政治力量，曾经设想在摆脱葡萄牙统治后建立统一国家。不过海峡所造成的地理分割毕竟是现实存在的，包括原宗主国在内的外部势力也不希望二者统一的情况出现。“佛得角共和国”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还是先后成为了独立国家。相比之下，同时期面临同样烦恼的西班牙人看起来要幸运得多，最起码他们在失去西撒哈拉之后，还能够保有加那利群岛。

在几内亚比绍 - 佛得角建立贸易据点后，葡萄牙人三十余年来的投资终于开始



获得了回报。即使葡萄牙与西非的贸易额，一时还无法与穆斯林商人所掌控的跨撒哈拉贸易相比；但对于葡萄牙来说，这已经足以让自己的实力有了质的提升。然而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葡萄牙人暂时并没有设想过在西非进行政治扩张，而是将海外贸易获取的收益用来支持在摩洛哥沿海地区的扩张。15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先后从摩尔人手中夺取了休达以西的丹吉尔、艾西拉、卡萨布兰卡等大西洋港口城镇（均可在谷歌地图定位）。

当然，在地缘政治层面，葡萄牙的做法并不算错误。一则以葡萄牙大西洋国家的定位，在马格里布大西洋海岸线的扩张既与自己的地理位置相符，又避免了与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利益摩擦的风险；二则有了这些地处北非的大西洋港口，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的贸易链将更为完整。这一地缘政治倾向所带来的另一后果就是，葡萄牙在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真正建立殖民统治（行政意义上的）的时间，被推迟到了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葡萄牙在西非及至非洲的探索就此陷入了迟滞状态呢？答案当然不是。

### 第三节 葡萄牙人到达胡椒海岸

在葡萄牙王国希望在马格里布有所建树之时，在西非海岸的探索、贸易工作也并没有停滞，而是被交给了承包商。从王室取得授权的商人，需按一定比例上缴贸易利润。当然，说到底这毕竟还是一项有国家背书的事业，因此葡萄牙对贸易线延伸的进度也是有要求的。以几内亚湾的情况而言，当时的承包者被要求每年开拓不少于 100 海里的海岸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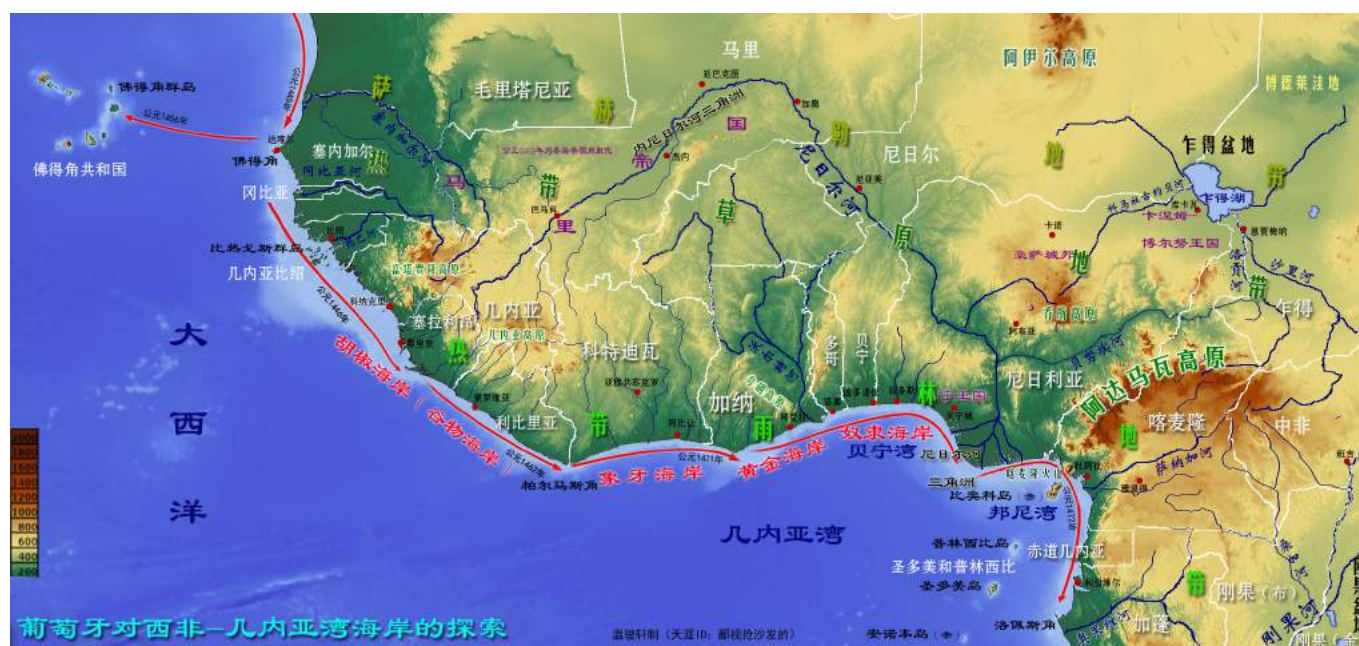
与之前的政府投资、主导的探险事业相较而言，这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种商业合作模式了。然而将政府职能剥离出来，并不意味着效率的下降。相反，足够自由和规范的商业模式，反而极大的刺激了参与者的热情。在利润的驱动下，处在各分级代理层的商人们开始涌向了这片未知的世界。事实上，在后来欧洲各国的海外扩张中，这种模式非常普遍，各种从王室取得特许授权，主导殖民开发的商业集团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为大英帝国开拓南亚的“东印度公司”了。

对于从几内亚比绍出发，接下来沿非洲海岸线探索的葡萄牙商人来说，这片资源丰富的土地固然存在着诸多贸易机会，但也存在着开发上的难度。我们知道，就西非的情况而言，人口最密集、最有潜力的区域，是以尼日尔河为核心的热带草原气候区。而位于萨赫勒地带之南的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正是西非热带草原的西端。从技术上来说，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的贸易据点，能够相对容易的向东与黄金帝国发生贸易关系。而继续向南探索的话，葡萄牙人会发现，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岸线，将会被一条连续的热带雨林带所覆盖。

这条从几内亚境内富塔贾隆高原西麓而起的沿海热带雨林带，向东经现在的塞

拉利昂、利比里亚，以及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的南部地区，一路延伸至几内亚湾东端，并向非洲中部扩张至喀麦隆、赤道几内亚，以及加蓬和两个刚果北部。其中，在更容易受西风影响的东端，热带雨林要更为深入内地，而几内亚湾北部沿线雨林带则相对较“薄”。

内部结构复杂的热带雨林地区，一直被视为最具有挑战性的探险区域。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不与现代人类交往的“原始部落”，都集中于非洲、美洲以及南洋群岛的热带雨林地区。以热带雨林为背景的探险题材，也一直在文学、电影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类地区开拓，河流几乎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径。南美热带雨林的为人类所知晓，便是得益于世界第一大河的亚马逊河水系的覆盖。



### 葡萄牙对西非 - 几内亚湾海岸的探索

降水充沛的非洲热带雨林地区并不缺少河流，问题在于这些河流能不能帮助外来者穿越雨林，进入人口相对密集的热带草原地带。最起码在葡萄牙人最先探索到的富塔贾隆-几内亚高原西南麓，这一愿望很难实现。由于高原的阻隔，几内亚西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境内的河流虽然非常密集，但却向内陆渗透有限（最多航行 30 多公里）。葡萄牙人即使能够沿河上溯到顶点，也无法走出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地带。事实上，即使对于非洲土著来说，热带雨林也属于边缘地区。欧洲人在这一地区见到的黑人部落，大都是 12 世纪后受三大黄金帝国崛起影响，而被迫南迁至雨林地带（政治扩张总是会引发人口迁徙的连锁反应）。

对于试图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的欧洲商人来说，上述地区最初的人口状况无疑是令人沮丧的。然而物种丰富却是热带雨林地区的一大特点，欧洲人最终还是在此发现了一种能够让他们获取巨大利润的商品——几内亚胡椒。香料在西方贸易中硬通

货般的地位，我们已经用过很多文字来描述了。很多人的疑虑在于，这些原产于热带地区，能够强烈刺激感官的植物，就真是那么必不可少吗？其实如果一定要从我们的生活（尤其是食谱）中移除掉香料，当然也不是不能活的。只是当你的感官尤其是味蕾已经习惯了各种香料所带来的刺激之后，它们在你预算中也就必然拥有自己的位置了。

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对许多喜欢食辣的人来说，食谱中失去辣椒将是一件多么灰暗的事情。当然，也许你会说我不喜欢吃辣。那么姜呢？蒜呢？葱呢？没错，所有这些能够引起强烈感官刺激的植物性调料，都是我们所述及的“香料”范畴。在佛教原始的教义中，这种刺激所带来的兴奋感其实也是一种罪恶，所以才会有禁食“五辛”的戒律。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有一天你的食品调味料中只剩下盐了，那么任何一种能够刺激你味蕾的香料，都有可能成为商人获取暴利的源泉。

对于从罗马时代就已习惯用香料改良食谱的欧洲人来说，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成功是一个重大打击。悲剧的是，气候寒冷的欧洲并不适合生产“香料”，甚至连生姜这种中国人最常见的“香料”，都长期依赖进口（由印度制成干姜粉出口至欧洲）。在这种情况下，在“几内亚”海岸的发现，能够带来多大商机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葡萄牙人在这段西临大西洋的雨林带（几内亚——利比里亚）中所发现的“几内亚胡椒”，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胡椒（胡椒科），而是属于姜科的“非洲豆蔻”。用一个大众熟悉的物种之名（加上一个前缀），为一个外观或味道相似外来物种命名，也是一种有利于打开市场的商业惯例。比如中国人熟悉的“西红柿”、“胡萝卜”，以及刚刚被本土“杏仁”协会通过法律途径，剥夺“美国大杏仁”之名的扁桃仁（或标注为洋味十足的“巴坦木”），都是这种情况。

然而在当时，除了植物学家以外，估计没有谁会关心长相类似胡椒，又有香辛味的“几内亚胡椒”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胡椒。事实上，这一误会应该也不是源于葡萄牙人，因为在葡萄牙人发现之前，摩尔人已经透过跨撒哈拉贸易将这一产品输往欧洲，并作为胡椒的替代品了。只不过，它最初是被称之为“非洲胡椒”罢了。这一误区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映射就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的这段“胡椒”主产区，被命名为“胡椒海岸”。同时，由于所有迷人气味的“非洲豆蔻”外观有些像谷物，它也被欧洲人称之为“来自天堂的谷物”（天堂谷），所以“胡椒海岸”又有“谷物海岸”之称。

今天继承“谷物海岸”/“胡椒海岸”这笔地缘遗产的国家是利比里亚。至于海岸线略短的塞拉利昂之所以没有和利比里亚合成一个国家，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那就是殖民分割。简单点说，塞拉利昂后来成为了英国殖民地，而利比里亚则成为了美国殖民地（几内亚则为法国殖民地）。当法国人凭借地缘位置优势，成为西北非/西非/中非殖民势力主导者之后，在非洲西海岸谋得一两个据点，是类似英/美这样的海洋国家，打通航线、维护海洋利益所必须追求的。



除了相似的环境，以及地缘政治源头以外，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曾经成为英、法废奴主义者的试验地。基于位置的原因，西非一直是美洲黑奴的主要输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各种方式在北美获得自由的黑人数量也越来越多。关注这些自由黑人命运的，并不仅仅是只有认定奴隶制已经过时的政治势力。自由黑人的大量存在，不仅会对仍身为奴隶身份的黑人造成心理影响，亦会抢夺白人的工作机会及政治权利，因此即使是支持奴隶制的势力，也不反对找块土地把这些自由黑人送出去。

18 世纪末，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在今天的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昂”建立移民区，并开始陆续迁入自由黑人（弗里昂的意思即为“自由城”）；19 世纪初，独立后的美国也开始在利比里亚执行类似的计划（利比里亚的意思即为“自由之国”）。这一试验甚至直接导致了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这两个国家的诞生。比如所谓的“利比里亚”，就是美国通过向当地土著购买土地，建立“自由黑人”居住地而最终扩张形成的。抛开这件事的价值观光环，纯粹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审视这一做法，你也可以认为美国这样做，客观上是为了让自己在欧洲势力的包围中，在大西洋对岸赚得一个桥头堡。

尽管拥有“前殖民地”身份，并且通过国内战争确定自己“自由”主义身份定位的美国，在这件输出新价值观的事业上，比英国人要更有热情，但总得来说，英美两国的这项人口、价值观输出计划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输出人口的不足，是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热带雨林开发的深入，在英美两国决定对西非地缘结构进行改造时，曾经的“谷物海岸”已经由北方渗入了数量众多的西非土著部落，且大都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比之跨海而来的自由黑人，这些土著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问题在于，那些已经归信基督教、说着流利英语的自由黑人，很显然在政治上更有优势，或者说更为原宗主国所倚重。即使那些沐浴过“自由”之光的美洲黑人，真的能够拷贝不走样的在西非传播“自由民主”精神，这一结构性问题也很难让他们获得成功（更何况拷贝走了样）。有鉴于此，今天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制度上都完全复制美国的利比里亚，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塞拉利昂也是）。

#### 第四节 葡萄牙人到达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

胡椒海岸（谷物海岸）并不是西非唯一以“土产”命名的海岸线，接下来在几内亚湾沿线，还将看到象牙、黄金和奴隶三大海岸。这些带有鲜明殖民贸易特征的标签，今天皆已不再使用，不过却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非洲的“资源”。离开胡椒海岸的葡萄牙人将转而向东正式对几内亚湾进行探索。接下来这段海岸，依然是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地带，葡萄牙人发现的下一个贸易机会就是象牙。

一般认为，大象有两个亚种：非洲象和亚洲象。不过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非洲象其实也分为两种：一为我们印象中，漫步于非洲大草原之上的“非洲草原象”；二为体型较小，生活在非洲热带雨林中的“非洲森林象”。在布匿战争中，迦太基所使用的战象应该就是性格相对温顺的“非洲森林象”（草原象无法驯服）。不过这些战象并非产自西非，而有可能产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由靠近红海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输入北非。一直到 19 世纪末，这一地区依然能找到大象的踪迹。

显而易见的是，驯服大象要比驯养其它动物更为困难。印度是这一技术的源头，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源自印度的“象奴”（驯象者）被托勒密王朝带入了埃及。至于处在文明初始阶段的西非，则没有能够让非洲森林象在工作场合（包括战场）发挥作用。缺乏生存条件（太冷）的欧洲，更是没有让大象驰骋的空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欧洲人已经可以轻易从非洲获得这一资源。然而作为一种天然奢侈品，象牙雕刻早在欧洲中世纪，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就已十分流行了。葡萄牙人对西非的“发现”，第一次给了欧洲人直接进口这一贵重原材料的机会。

从科特迪瓦沿海出口的象牙，大部分并不是非洲森林象，比之受富塔贾隆—几内亚高原阻隔的“胡椒海岸”，科特迪瓦南部的雨林地带，已经不那么“厚”了，境内的几条河流（萨桑德拉河、邦达马河、科莫埃河）已经能够向北延伸至草原腹地，并与尼日尔河的黄金帝国发生贸易关系了。也就是说，从塞内加尔河上游——内尼日尔河三角洲，这一非洲黄金帝国核心区所出产的象牙，都可以从科特迪瓦出海。当然，几内亚湾海岸线的其它港口，同样也可以出口象牙，它们没有被命名为“象牙海岸”，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商品可供出口。

比之奢侈品定位的象牙，葡萄牙人更为渴求的是几乎可以买到一切的“黄金”。甚至可以说，黄金才是葡萄牙人费尽心力向南探险的源动力。在掠过“象牙海岸”之后，葡萄牙人的这一目标很快将会实现。“黄金海岸”——加纳即将展现在葡萄牙人面前。当然，经过之前的解读，大家已经清楚了，现在我们所说的“加纳”并非 12 世纪开创黄金帝国时代的“古加纳”。然而要说“黄金海岸”徒有虚名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它的确已经成为了西非最重要的黄金出产地以及集散地。

从地理范围上看，加纳主要分为两块，其中覆盖东、北部的是沃尔特河中下游流域，西南部则是一些独流入海的小河流，二者之间的分水岭是一条叫作“夸胡高原”的丘陵带。西非最大的黄金出产地便是在这一带，被称之为“阿散蒂”（既是地区名，也是部族名）。另外，沃尔特河上游，今加纳—布基纳法索相接一带的“洛比”地区，也是重要的黄金出产地。在穆斯林商人垄断黄金贸易时期，阿散蒂和洛比的黄金，或向北经内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延巴克图、杰内等城，输向西北非的马格里布；或向东经乍得湖流域，运往非洲东部。

葡萄牙及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也使得位置原本最边缘的产金区“阿散蒂”，变成了西非最重要的黄金集散地。这些源源不断从海路输出的黄金，最终成

就了著名的“黄金海岸”。至于阿散蒂和加纳的黄金储量到底有多丰富呢？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10年前，广西上林人开始进入加纳，并迅速凭借自身先进（较当地人）的淘金技术，成为了加纳黄金的重要开采者。一夜暴富的神话，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外交事件，一度让“上林帮”之名频频在国内各大媒体曝光。当然，加纳金矿资源真正的垄断者还是那些白人控制的大公司，上林帮更多是在做拾遗补缺的工作。

坐拥最重要的资源，黄金海岸也成为了最吸睛的西非版块。在葡萄牙人之后，法国、德人、英国人，甚至北欧的丹麦、瑞典等国，都纷纷在此建立据点，试图从利润巨大的黄金贸易中分一杯羹。需要说明的是，在中文的政治语境中，所谓“殖民”的范围实在是太过宽泛，欧洲人最初在非洲布局的目的，其实只在于贸易。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殖民”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黄金海岸争夺中胜出的，是欧洲殖民帝国中的最强者——英国。19世纪末，英国人夺取了其它国家在黄金海岸建立的据点，成功的将之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不过英国人并没有控制整个沃尔特河流域，沃尔特河上游地区，也就是“上沃尔特”地区，在19世纪末与“象牙海岸”一起，成为了法国殖民地。

## 第五节 德国在奴隶海岸的殖民地

在19世纪末开启的非洲政治殖民潮中，英、法两个殖民强国并非是唯一有所收获的欧洲国家。虽然最先开启大航海时代的伊比利亚“两颗牙”已经势弱，但一个在19世纪下半叶才算完成统一的中欧国家，却不甘示弱的加入了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此后的70余年间，这个国家也成为了英法最大的敌人。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德国”，准确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

1871年，通过“普法战争”的胜利完成德意志统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这个后来伴随一战失败而解体的帝国，就是“第二帝国”了。所谓的“第一帝国”，所指向的是那个1000年前始建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这种历史关系，终归是后人来定义的。德意志三大帝国的承接定位，始于纳粹德国时代。希特勒所组建的“纳粹德国”，被其定位为“第三帝国”。

由于神圣罗马时代德意志地区的混乱局面，数百年来德国人在欧洲海外扩张的浪潮中少有收获。考虑到连荷兰这种法、德间的缓冲小国都曾经在海洋上风光一时，并非内陆国定位的德意志，对于这种表现实在是难以让自己满意。事实上，德意志的地缘属性中并非没有海洋基因，曾经纵横波罗的海，将海上贸易版图延伸至北海沿岸的“汉萨同盟”，就是德意志海洋属性的具体体现。19世纪末，德意志终于建立起了一支足以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公海舰队”；政治层面，则是开始强势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被老牌海外殖民帝国更多是当成资源供给地的南部非洲进行卡位。



甚至可以说，欧洲殖民帝国在非洲的这拨政治瓜分浪潮，很大程度是因为受到德国崛起的刺激。

同样沿非洲西海岸而下的德国人，在非洲的第一个收获是在黄金海岸之东的“奴隶海岸”。所谓“奴隶海岸”，指的是今加纳以东，一直到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湾”地区。由于尼日尔河泥沙在河口地区的淤积，尼日尔河三角洲向南凸向几内亚湾，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岬角。岬角以西至黄金海岸部分，也可以说是沃尔特河口－尼日尔河口之间的区域，就是“贝宁湾”或者说“奴隶海岸”的概念了。政治上包括多哥、贝宁，以及尼日利亚的西部沿海地区。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整个贝宁湾地区在西非的地缘政治地位，实际上是十分边缘的。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只有身处萨赫勒－非洲热带草原相接地带的区域和部族，才是跨撒哈拉贸易中的最大受益者。塞尔加尔－尼日尔河中上游的古加纳／马里／桑海帝国，以及乍得湖畔的卡涅姆－博尔努王国、两大流域相接处的豪萨城邦都属于这种情况。

奴隶海岸最重要的资源当然是“奴隶”了。沃尔特河、尼日尔河，以及二者之间延伸入热带草原地带的诸多河流，为黑奴输往贝宁湾提供了便利。然而由欧洲人自己动手捕捉的黑奴却是少数。事实上，葡萄牙人和后来者很快就发现，这种既做“生产者”，又做“贸易者”的做法，并不是最划算的办法。与当地土著部族合作，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收购黑奴要简单得多。至于哪些商品能够激发土著黑人的交换欲望，则是一个完全不用担心的问题。基于黑非洲地区在文明上的弱势地位，欧洲人带来的几乎任何商品，如：金属制品、布匹、武器，甚至不值钱的玻璃珠子，都足以让土著首领为之侧目。

土著部族用来换取欧洲商品的“黑奴”，绝大多数并非本部落成员，而是在冲突和战争中俘获的其它部族成员。客观上即使没有欧洲人介入，非洲大地也像地球上其它地区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大小冲突。还没有进入所谓“奴隶社会”阶段的部族，通常会杀死被俘者（一般用于祭祀）。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收购黑奴的行为，看起来似乎并不会对当地的生态造成改变。然而必须注意的有两点：首先西非此时也已开始进入了所谓奴隶社会阶段，大部分被俘人口并不会被简单“浪费”掉。如果欧洲人不把这些人口输出的话，那么无论以什么形式（包括奴隶）使用，这些人口所产生的生产力都是服务于西非本地的；其次当“人口”成为一项高利润的生意时（对于土著部落来说也是），冲突和战争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换句话说，“人口”上的收获已经不再只是战争的副产品，而直接成为了战争的起因。这种性质的改变，势必会加速西非的人口损失。

当然，黑奴贸易并非起源于欧洲殖民者。前面我们也说过了，欧洲人对这些黑皮肤的奴隶并不陌生，在跨撒哈拉贸易中，黑奴也早已进入穆斯林商人的商品目录。然而跨撒哈拉贸易中的奴隶交易，只是当时贸易的常态，并非只针对黑人，也没有对

西非人口资源造成结构性破坏。欧洲人的黑奴贸易则不然，后面我们会看到，新大陆的发现让欧洲人急需大量劳动力去填充那片潜力无限的土地，来自西非的奴隶则战略性的成为了人口输出地。与此同时，跨大西洋航线中的运输风险以及恶劣的劳动环境，又使得黑奴的浪费量极大。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殖民者对西非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人在奴隶海岸的收获就是多哥 + 贝宁，当时的地缘标签为“多哥兰”和“达荷美”。其中“多哥兰”的范围，准确的说还包括西边到沃尔特河的部分土地（不包括沿海地带）。不过相比早在 16 世纪中叶就开始在几内亚湾渗透的英国人，德国人的这一收获还是少了点。奴隶海岸东端的古贝宁王国，以及包括尼日尔河下游在内的“尼日利亚”都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在这一块的殖民范围来说，更有历史感的贝宁或者豪萨，都不足以覆盖。凸显“尼日尔河”标签的“尼日利亚”，才是拥有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

不过今天的多哥和贝宁并不是从德国人手中获得独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战场失利的德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这一事件在中国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在分配战争胜利果实的“巴黎和会”上，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没有被“还”给战胜国身份的中国，而是整体移交给了日本。由此而导致的五四运动，也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起点。

作为殖民帝国的后起之秀，日本的地缘政治优势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而德国在海外失去的利益，主要还是由英、法两个传统欧洲强国所获。为了完整的控制沃尔特河中下游地区，英国人割取了沃尔特河至今天多哥共和国西境部分德国殖民地（时称“英属多哥兰”），后来与英属黄金海岸一起，变身成为现在的“加纳共和国”。东部的多哥兰（法属多哥兰），及达荷美地区则成为了法国殖民地。

今天“多哥共和国”的名字，直接来源于之前的“多哥兰”。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 60 年代，法属多哥兰独立为“多哥共和国”时，其实是非常想跟西边的“英属多哥兰”重新合为一体的。只是单从地理结构来看，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英国人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最终通过“公投”，英属多哥兰还是加入了今天的加纳。至于东面的“达荷美”，则不太喜欢这个旧名，而是选择了被尼日利亚舍弃的“贝宁”作为国名。

作为奴隶海岸中最早建立的土著政权，古贝宁王国这笔地缘政治遗产被浪费也的确可惜，更何况整个“奴隶海岸”还被称之为“贝宁湾”。另一个促使“达荷美”放弃旧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名称的原意实在是有些不堪。这个 17 世纪建立的土著王国，全名为“达恩·荷美·胡埃贝格”，意思是“建在达恩肚子上的国家”。这是一个一看就感觉有故事的名字。简单点说，就是两个在此相争的土著酋长国，一方的国王对后起之秀说，你扩张的太过份了，我要再容忍下去，你就要在我肚皮上盖房子了。然后对方就真的这样做了（在攻杀、埋葬对方国王的地点盖房），并且

自豪的取了一个这样怪异的名字。这其中的细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

虽然从阶级史观来看，我们应该着重描绘一下非洲这些土著政权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很不幸的是，他们当中真正成为主角，甚至掌握自己命运的毕竟是少数。以欧洲殖民者的扩张路径作为主线会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非洲国家在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定位。实际上，欧洲人对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并不只出现在后来的殖民地瓜分，以及由此造就的现代国家格局。回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会发现，就这些土著政权的崛起来说，其实也跟外来者的影响密不可分。比如以三大黄金帝国为代表的西非北部政权，正是由于能够在跨撒哈拉贸易中获益，才能够在西非诸土著政权中率先完成进阶。

贝宁、达荷美、奥约等奴隶海岸沿线土著政权的崛起，也同样受益于欧洲贸易者的到来。从整个西非的角度来看，奴隶贸易无疑对西非原有的地缘结构造成了重大伤害。只是凡事都有两面性，研究上述土著政权的崛起，我们会悲哀的发现，在地缘政治层面，这些王国都是奴隶贸易的受益者。简单点说，奴隶贸易成为了奴隶海岸沿线最大的经济增长点，谁能够最大程度从中受益，谁就有了兼并其它部族的实力。

然而任何贸易都不可能永远兴盛。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机器和化石能源的应用及工业革命开启，奴隶贸易及使用也开始走向了没落。纯粹从技术角度分析的话，由此而引发的所谓“废奴运动”，与其说是西方文明良知的发现，不如说是人类找到了效率更高的“化石资源”作为人力的替代。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上述土著王国先后丧失独立地位，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直接吞并，或成为保护国），与奴隶贸易的衰弱不无关联。一方面奴隶贸易的衰弱，直接削弱了奴隶海岸沿线土著政权的经济实力，以及与西方殖民者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当欧洲人不再需要这些土著政权帮他们在非洲充当奴隶资源供给者时，它们存在的价值就被大大削弱了。



## 第七章 葡萄牙人在中非地区海岸的探索

### 第一节 马格里布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

在一个系统中，一个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对整个系统造成连锁反应，这种混沌现象就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蝴蝶效应”。按照刚才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认为，一个叫瓦特的英国人，最终会影响到某个非洲土著王国的命运。然而这种简单的线性推理其实并不可靠，蝴蝶效应的运用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事务的进程并非受单一因素影响，每一个因素也并非无可替代（就像瓦特不发明蒸气机，别人也会在同时期发明一样）。你不知道某个初始点在后面的一系列变化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又或是否可以被替代）。纠结于此，往往会让分析者过于扩大一些细节变化在战略层面的决定性作用，以至于认定这个世界是由一系列阴谋创造的（阴谋论者的问题所在）。相比之下，从大历史范畴里观察地缘政治领域的连锁反应，会更具科学性。

在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线而下，为今日西非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埋下伏笔时，西部非洲跨撒哈贸易线两端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原本就马格里布的情况而言，新千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柏柏尔人摆脱了阿拉伯人的控制，先后在摩洛哥地区建立了穆拉比特、穆瓦希德王朝。后者覆灭之后，取而代之的“马林王朝”（1213～1554），也属于柏柏尔政权。不过在此之后，已经在马格里布定居数百年的阿拉伯势力重新崛起，先后建立萨阿德王朝（1553～1666）以及阿拉维王朝（后者的统治则一直延续到现在）。

阿拉伯势力在摩纳哥的复辟，与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向北非（尤其是直布罗陀对面的摩洛哥）的强势扩张有直接关系。前面我们曾经解读到，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的西非事业取得突破后，开始向摩洛哥沿海地区攻取据点。伴随着葡萄牙人的扩张，柏柏尔政权所担负的历史责任也越来越大。相比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当中的领导者有机会自称“圣裔”（萨阿德、阿拉维王室都自称“谢里夫”也就是圣裔）。在欧洲基督徒日益强势的大航海时代，还有什么比这个政教合一的身份更能凝聚穆斯林力量，并领导一场穆斯林的“收复失地运动”呢？

因遭受伊比利亚压力而改变地缘政治属性的，还有马格里布的另外两个地区。15世纪末，西班牙攻克格拉纳达，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并在美洲获得突破后，也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沿海地区强势扩张。16世纪，为了避免被西班牙征服，控制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及摩洛哥的穆斯林，先后主动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内部保持独立运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伊斯兰世界在实力和技术上已经与西方完全不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西方政治殖民浪潮中，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先后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解读这一渐行渐远的过程，在后面的内容中慢慢展开。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在伊比利亚势力强势扩张的 16 世纪，是什么力量帮助摩洛哥保持了独立状态（以至于不需要向奥斯曼求援）。从技术上来看，来自西非的黄金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摩洛哥地区一直是马格里布——西非一线，跨撒哈拉贸易的主力参与者，并且由此而引发政治上的扩张。当初的穆拉比特王朝的崛起，就借助了来自古加纳的资源。

如果说柏柏尔人的“穆拉比特王朝”是加纳帝国的掘墓人的话，那么阿拉伯人的“萨阿德王朝”，就是“桑海帝国”的毁灭者了。公元 1591 年，来自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穿越撒哈拉沙漠，再次代表北方势力入侵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并摧毁了这个最后的黄金帝国。基于撒哈拉沙漠的阻隔，不管是远征行动本身，还是后来维持在西非的统治，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前后有数万来自摩洛哥的阿拉伯 / 柏柏尔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回报也是十分丰富的，来自今天马里地区的黄金为萨阿德王朝的财政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西非对摩洛哥的另一个地缘支撑来自于“人力资源”。除了劳动力（以奴隶的形式）以外，还包括军事层面的支撑。最典型的事例，来自于 17 世纪下半叶取代萨阿德王朝统治摩洛哥的“阿拉维王朝”。这个延续至今的阿拉伯人王朝，在战略层面有意识的组建了忠于王室的黑人军队。除了在境内赎买的黑人奴隶以外，从内尼日尔河三角洲招募或捕获而来的黑人，也是阿拉维王朝黑人穆斯林部队的重要来源。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与古拉姆、马穆鲁克军人（奴隶军人）性质类似的军队，会更具忠诚度。

事实上，即使在当代北非，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类似的做法。在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实际上几乎没有国家军队。相比利比亚境内的阿拉伯 / 柏柏尔人，卡扎菲更愿意从西非雇佣黑人来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最起码他们不会受到部族势力的影响。这一战略性政策的实行，也使得卡扎菲在利比亚维持了 40 年的统治。不过当利比亚的敌人是整个西方时，无论什么样的策略都变得无济于事了（当年沦为法国殖民地的马格里布地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 第二节 葡萄牙人在邦尼湾的探索和收获

16 世纪末，摩洛哥阿拉伯王朝对桑海帝国的征服，使得整个西非又重回到了部族林立的时代。缺少强有力政治势力维持秩序的后果，就是由马格里布到内尼日尔河三角洲一线的贸易受到了破坏，廷巴克图等曾经兴旺无比的贸易城市开始走向衰弱。受此影响，跨撒哈拉贸易线在西部的主轴，开始东移至豪萨、乍得湖等马格里布政治力量难以触及的区域。不过对于这一切，欧洲人其实知之甚少，一直到 19 世纪，

欧洲探险家都很难深入西非内陆。通过在沿海地带寻找土著贸易代理人，是欧洲殖民者获取非洲资源的主要方式。

在西非海岸线探索工作开始之后，葡萄牙人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整条西非海岸线缺少类似“佛得角群岛”这样的大基地。几内亚比绍核心河流——“热巴河”河口处的“比热戈斯群岛”，算是葡萄牙人一个勉强合格的基地。不过这个紧贴海岸的群岛并非无人岛屿，事实上所谓“比热戈斯”就是当时葡萄牙人在此登陆后，遇到的土著部族首领之名。

葡萄牙人在这个群岛上的征服工作，一如他们在几内亚比绍内陆地区一样缓慢。从比热戈斯群岛向南，一直到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这段以胡椒、象牙、黄金、奴隶命名的海岸线上，葡萄牙人都再也没有探索到离岸基地的踪迹。我们知道，很多近海岛屿其实是山脉向大陆架延伸的产物，几内亚湾相对平缓的地形，是造成整个海湾缺少岛屿的重要原因。不过当葡萄牙人绕过尼日尔河三角洲，进入几内亚湾东端后，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地貌终于开始发生了变化了。

尼日尔河口以东至加蓬境内的“洛佩斯角”，包括尼日利亚东部、喀麦隆、赤道几内亚，以及加蓬北部近海的几内亚湾海区，又被单独称之为“邦尼湾”。目光投向大陆的葡萄牙人，会在海湾的西北角发现一条斜插入内陆，延伸上千公里的弧形山脉——阿达马瓦山脉（高原）。东南－西北走向的阿达马瓦山脉也是中－西非的地理分割线，其西麓的降水流向尼日尔河下游，从尼日利亚境内入海；东麓的降水则汇集成一条叫作“萨纳加河”的河流，从喀麦隆境内注入邦尼湾。以地理角度来看，整个喀麦隆地区的主体部分，大体也就是指向萨纳加河流域。平均海拔千米的阿达马瓦山脉，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在靠近海岸线处延伸出了一个海拔达到 4070 米的活火山——喀麦隆火山。

这座经常喷发的活火山为附近的土地带来了肥沃的火山灰，加上充沛的降水，你可以想象这一地区的农业潜力是很不错的。不过在葡萄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热带雨林才是这一地区的主角。后期与几内亚湾其它沿海雨林地带一样，为了满足欧洲消费者的需求，可可、油棕、橡胶等经济作物成为了这一土地上的主角。

事实上，今天非洲的粮食自给率普遍较低，与这些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种植不无关系。独立后的非洲诸国虽然也普遍注意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但受限于水资源、政治等因素，非洲粮食的缺口并没有得到战略性补强。当然，这其中也有做得不错的，比如土地、气候条件较好、政局较稳定的喀麦隆就解决得比较好。在航海者眼中，这座近海火山是他们结束东向航行的地标。如果要继续沿岸探索的话，接下来的航向将转而向南。

不过在继续向南探索的同时，葡萄牙人还会有一个重要发现，那就是阿达马瓦山脉并不仅仅是在沿海提供了一座活火山，而是向整个海湾腹地延伸了一条长约 700 公里的火山岛链。岛链主要包含四个主岛，由近及远分别为：比奥科岛、普林



西比岛、圣多美岛，以及安诺本岛。这其中最大的岛屿是距离海岸线仅 30 多公里，与喀麦隆火山遥相响应的“比奥科岛”。与喀麦隆火山区一样，这些火山岛也是为风光秀丽的热带雨林所覆盖。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位置上看，比奥科岛都是非常适合作为殖民地的。

15 世纪 70 年代登陆于此的葡萄牙航海者，甚至兴奋的为之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福摩萨（又译“福尔摩沙”，葡萄牙语意为“美丽”）。是不是觉得这个名称非常的眼熟？这个名字也是台湾岛的曾用名，目前国际上也多有使用此名指向台湾岛的，尤其对于那些希望割裂台湾与大陆历史、政治联系的人来说。其实在葡萄牙人和其它欧洲殖民者的海外探索中，福摩萨这一拉丁语称谓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除了南极洲以外，各大洲都有以“福摩萨”命名的地区。

然而发现比奥科岛“美丽”之处的，不只有葡萄牙人。比奥科岛离海岸线的距离，并不足以阻止原住民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的成功登陆。这些从喀麦隆渡海入住比奥科岛的土著，被称之为“布比人”。从地缘角度来看，布比人并不属于我们在西非见到的“苏丹尼格罗人”，而是属于黑非洲另一大黑人族群——班图尼格罗人。后面我们会分析到，班图尼格罗人与苏丹尼格罗人的分布特点。

从比奥科岛启航的葡萄牙人，再往西南顺着比奥科岛-喀麦隆火山连线的延伸，航行 200 公里就会看到岛链上的另一座岛屿：面积为 142 平方公里普林西比岛。再沿着这条延伸线，葡萄牙人接下来还发现了面积为 836 平方公里的“圣多美岛”，以及面积仅为 17 平方公里的安诺本岛。与面积超过 2000 平方公里的比奥科岛相比，安诺本岛并不占优势。好在这个距离，已经足以阻止班图人的抢先登陆。葡萄牙人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这几个无人区。

其实类似这样的群岛，并不一定要逐一列举、细细解读的。就像之前诸多群岛，我们基本也只是搞清群岛整体的地缘结构就行了。之所以在这里多费些笔墨，是因为这四个岛特殊的地缘政治归属。简单点说，现在两个一大一小的比奥科岛、安诺本岛，属于邦尼湾沿海小国“赤道几内亚”，而中间的圣多美、普林西比两岛，则单独组建了独立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很显然，这么奇特的政治归属，一定又是殖民分割的结果。葡萄牙人从 15 世纪下半叶发现上述岛屿并开始殖民，一直到 18 世纪下半叶的 300 年间，上述火山岛都是葡萄牙的领地。

当然，这只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了，最起码比奥科岛上的布比人就一直没有完全屈服。相比之下，对圣多美、普林西比这几个无人岛的殖民就容易得多了。葡萄牙人后来不仅为两岛引入经济作物，还引进了数以万计的班图裔黑奴。这些黑奴的后代目前也已成为了岛上的主要居民。在 20 世纪 70 年代风起云涌的非洲独立浪潮中，种族结构决定了这两个岛没能留在葡萄牙接受一个海外省的定位，而是成为了独立国家。

顺便说一下，这个总人口不到 20 万的袖珍岛国在独立之后，先是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交，后在台湾的金元攻势之下，于1997年转投“中华民国”至今。至于今后会不会再转向，其实也是无所谓的事了。比奥科岛和安诺本岛之所以没有和上述两岛打包，是因为葡萄牙在1778年与西班牙签订条约，将之转让给了西班牙。与之一同被转让的，还有葡萄牙在邦尼湾沿岸，包括部分今尼日利亚、喀麦隆，以及加蓬、赤道几内亚在内的，总计约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殖民权。当然，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西班牙人也要付出相应的对价。他们所付出的，是放弃部分在南美的殖民地，以使葡萄牙统治下的巴西在地理层面上更加的完整。

西、葡两国在殖民地划分上的诸多恩怨，要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后才能一一展开。到那时，两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次交换，就能解释得更清楚了。不过单就这笔交易来说，西班牙人应该算是吃了大亏的。因为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从葡萄牙人手中拿到的80万殖民地，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最终拿到手的，仅有不到3万平方公里。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欧洲国家在喀麦隆地区的殖民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西、葡两国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教廷主持下瓜分世界。就邦尼湾的情况而言，如果西班牙人殖民成功的话，地缘政治上将会出现一个“西属中非”的概念。问题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终究不是由着伊比利亚人来切割的。在19世纪后期的政治瓜分浪潮中，阿达马瓦高原以西的尼日尔河下游地区，是英国人渗透的方向；以南隶属中非的区域，则是法国人的扩张方向。同时后发的德国人也在虎视眈眈，19世纪中叶，来自德国的商人就已经开始在几内亚湾寻找立足点。借助“普法战争”获胜的红利，德国在贝宁湾得到了“多哥兰”，而在邦尼湾扩张的结果则是“喀麦隆”。

作为黑非洲海岸线探索的先行者，葡萄牙人登陆喀麦隆海岸的时间大约在1472年。喀麦隆这个名字，也是葡萄牙人取的。根据第一印象为一个区域命名，也算是一个惯例了。这次在靠近喀麦隆火山之后，最让葡萄牙人印象深刻的是河流中游动着数量众多的虾，遂将之命名为“虾河”。这些让葡萄牙人印象深刻的虾，（“喀麦隆”Camarão 葡萄牙语“虾”的意思）后来也成为了整个版块的名字。可惜的是，“虾”并不适合作为商品运往欧洲或美洲，否则也许喀麦隆就会有“大虾海岸”的历史名称了。

德国在喀麦隆地区的扩张在1910年达到了顶峰。当时的喀麦隆地区还包括北部与之相邻的一部分尼日利亚领土，以及南部从法国殖民地割取的一部分加蓬、刚果（布）的土地。其总面积差不多有80万平方公里，几乎与当年葡萄牙人许诺给西班牙人的面积相当。当然，在经历一场失败战争之后（一战），这些都不重要了。除了少部分（约9万平方公里）靠近尼日利亚的殖民地被英国获得以外，大部分的喀

麦隆变成为了“法属喀麦隆”，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原属刚果、加蓬部分重新剥离）。英属部分则分为了两块，南部沿海地区经公投并入喀麦隆，北部地区则公投入了尼日利亚。

今天我们在地形图上会发现，喀麦隆与尼日利亚南部的地缘分割线，并没有严格按照阿达马瓦山脉分水岭来划分（对于强迫症者来说，可能会有些难受）。这其实就是英属喀麦隆那次公投结果所造成的后果。简单点说，分水岭以西这部分突出部（包括火山地区），就是一战后英国得到的“英属喀麦隆”南部地区（今喀麦隆西北省和西南省）。很显然，一如英国人把沃尔特河东岸的“英属多哥兰”并入加纳一样，英国人也是希望让自己治下的“尼日利亚”，地理边界更加的完整。

然而问题在于，尼日利亚的范围太广了。从跨撒哈拉贸易中受益的豪萨、博尔努等地的商人，早以让伊斯兰教渗透了尼日利亚北部区域，而几内亚湾沿线受西方殖民者影响的区域，则普遍归信了基督教，前者在人口上更占优势（伊斯兰教为 50%，基督教为 40%）。相比之下，与跨撒哈拉贸易线距离更远的喀麦隆地区，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就较小了。除了西北部处在阿达马瓦高原以北的区域属于穆斯林聚居区以外（约占总人口 20%），其余大部为基督教及原始宗教（40%）覆盖区（身处内陆的后者，政治、经济影响力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原英属喀麦隆南部基督教区，很自然的更愿意和他们的教友在一个国家。反之，北部干旱地带的穆斯林，则倾向于成为尼日利亚人。

喀麦隆的例子告诉我们，“地缘”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地理固然是最基础的要素，但基于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人类认知（比如宗教、民族），经过时间沉淀后也属于重要的地缘因素。完全从地理结构上来规划地缘政治格局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会总是很难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个国家内部，都或多或少的会存在一些难以化解的地缘矛盾。了解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有助于找到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又或知道哪些是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比如以尼日利亚这种南、北宗教分割明显，人口数量又大体相当的区域，出现“博科圣地”这样的极端宗教武装组织，几乎是一种必然。

回到西班牙在中非扩张的问题上来。在从葡萄牙人手上得到比奥科岛、安诺本岛，及邦尼湾沿岸地区的殖民权后，西班牙人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在 19 世纪中才算正式登陆（他们在其它地区还有很多事头疼）。在欧洲三强的夹击之下，西班牙人只是在今赤道几内亚南部的“木尼河”畔建立据点成功，并且无力扩张。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这块轮廓横平竖直，面积仅 28000 平方公里的“赤道几内亚”，也就是西班牙在非洲西海岸仅有的两块殖民地之一。

顺便说下，赤道其实并没有穿越“赤道几内亚”，想去非洲西海岸感受下横跨南、北两半球的感觉，还得再往南进入加蓬境内。赤道几内亚的原名是“西属几内亚”。很显然，“西几内亚”这种明显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并不受前殖民地的人民欢迎，



至今没有真正完成独立的“西撒哈拉”算是一个例外。如果有一天这个地区政治地位正常了，改个更能彰显民族自豪感的名称也是分分钟的事。至于在几内亚之前冠以“赤道”之名，更多是受法国人的影响。在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人曾经把自己控制下的中非地区（包括现在的加蓬、刚果（布）、中非、乍得）称之为“赤道非洲”。

现在我们知道了，老大帝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后来在西非－几内亚湾地区能够保留的政治成果实在有限。一片群岛＋一小块陆地的模式看起来很常见。加纳利群岛——西撒哈拉；佛得角群岛——几内亚比绍，都是曾经分析过的案例。不过参考这两个案例我们会发现，比奥科岛、安诺本岛（尤其是前者）与赤道几内亚本土的政治婚姻并不稳定，两岛与大陆的直线距离，甚至比赤道几内亚的东西纵横还要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天听到新闻里说这个弹丸之地还要闹分裂，大家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 第四节 非洲热带雨林中俾格米人的特征

前面我们说过，葡萄牙人在阿达马瓦山脉以南看到的黑人类型，应该是与西非“苏丹尼格罗人”有所不同的“班图尼格罗人”。总的来说，上述两种黑人就是人们认识中的典型黑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地域分布存在差异，这两种“黑人”在体质、肤色上可能会有些许差异，但这一分类更多还是语言方面的划分。这就好像我们所说的“突厥人”，其实也是一个语族概念。不过语言是族群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因此即使不能说同一语族就必定在政治或民族上统一，但最起码算是具备了基础。

阿达马瓦高原南北（东尼日利亚－西喀麦隆）的热带草原地带，一般被认为是班图尼格罗人的起源地。进入公元时代后，由于受到苏丹尼格罗人的压力，这些操班图语的尼格罗人开始往南部雨林地带迁徙，并向整个赤道及其以南的非洲地区扩散。然而在此之前，这些雨林地带并非无主之地。如果罗马在布匿战争胜利后，不满足于对北非岸线控制，而率先开始向南探险的话，那么抵达喀麦隆地区的罗马航海家看到的“黑人”，很可能就是另一种与典型黑人迥异的类型——俾格米人。

即使没有任何种族分辨经验的人，应该也能一眼识别出俾格米人来。事实上所谓“俾格米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种族名称，而是古希腊语中“侏儒”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身材矮小的个体或者族群，都可能被欧洲人称之为俾格米人。今天在非洲及亚洲都有被称之为俾格米人的族群存在，这些俾格米人的共同特点是身材矮小（普遍身高在 1 米 3-1 米 5 之间，亚洲类型略高），皮肤较黑、毛发卷曲，并且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带。为了有所区别，其中非洲类型可以被细分为“尼格利罗人”；亚洲类型又被称之为“尼格利陀人”。

即使“俾格米人”一词现时已经窄化为特定族群的标签，分布在非洲和亚洲的所谓“侏儒民族”，在基因上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二者更多的是为了适应相似的环境。

境（雨林），在繁衍生息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热带雨林充沛的食物来源（不需要储备过多脂肪），以及高、密分布的树林，使得更为灵敏的身材相较高大身材更容易适应。这一客观影响，我们在其它热带雨林动物身上也可以看到。比如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带的非洲森林象，体型就要比同纬度的非洲草原象更小；而生活在印尼热带雨林的苏门答腊虎，也是所有老虎亚种中体型最小的。

尽管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俾格米人在体质和生活习惯上已经非常适应非洲热带雨林地带了。但原始的渔猎生活方式，却极大限制了其族群数量的扩大。尤其热带雨林的封闭性，还阻碍了其从外部获取更为先进的技术。当外来民族因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入侵雨林时（比如武器），俾格米人积年养成的那些雨林生存技巧，并不足以帮助他们成为胜者。比如掌握农耕技术的外来民族，并不一定需要与雨林部落发生正面冲突。烧荒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是将森林变为耕地的通用方式。虽然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获取耕地，但却在客观上压缩了雨林部落的生存空间。

由于生存环境的封闭性，雨林部落通常对外来者是非常敏感的。当感觉到自身安全有可能受到影响时，他们会选择迁往森林深处，以避开外来影响。尤其俾格米人身材、族群数量上的不足，使之很难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中，与争夺生存空间者获得平等交流的权利。这使得他们即使有机会先于班图人、苏丹人接触到欧洲人，也很难从欧洲人那里获得反转命运的技术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俾格米人成为边缘民族几乎是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看，俾格米人的势衰并不能算在欧洲殖民者身上，而是非洲内部族群竞争的结果。在今天黑非洲超过 10 亿的人口中，俾格米人所占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不足百万），且散布于雨林深处，几乎完全丧失了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发声的机会。

葡萄牙人和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并不会去特别关注俾格米人的存在。从奴隶贸易的角度来看，那些身材高大、强壮的班图人，才会更吸引奴隶贩子的目光。不过正如之前所分析的那样，长期以来欧洲贸易者一般不会冒险深入内陆地区，而是通过与沿岸部落进行交易，向内陆延伸贸易线。就邦尼湾沿岸地区的情况而言，奴隶贸易的量并不会太大。这主要是因为从尼日利亚三角洲——洛佩斯角一带（加蓬北部）一带，当时都是纵深很大的热带雨林地区。由邦尼湾沿岸向东延伸的热带雨林带，甚至一直扩张到非洲东部的尼罗河上游。虽然原始的刀耕火种能够对热带雨林进行开发，但过量的降水冲刷，却使得土壤很难保持肥力。也就是说，在葡萄牙人抵达邦尼湾之时，沿岸流域的人口密度远不如贝宁湾沿岸流域大。

虽然以当时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来看，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不过商人们容易从人口交易的规模，判断出喀麦隆一带并不是第二个“奴隶湾”。若是还想寻找到下一个贩奴基地的话，葡萄牙人需要继续向南，以尽快走出这片雨林覆盖的海岸。从技术上看，如果接下来的海岸有类似尼日尔河这样的大河连通非洲腹地的话，葡萄牙以及后来的欧洲贸易者将有机会通过土著中间商，将贸易版图扩张得更

大。那么，究竟还有没有符合上述要求的区域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刚果盆地”。

## 第五节 葡萄牙人沿海岸南下至刚果河口

整体为高原地形的非洲大地，错落分布着许多条状的高原，这些高原之间又包夹出了不少盆地。地理上的中非概念，实际就是由“乍得盆地”及其南部的“刚果盆地”组成的。前者的西部因为政治分割的关系，在地缘政治层面被归入了西非板块（尼日尔东南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理、地缘层面都归入“中非”概念的后者，则不仅是非洲也是世界最大的盆地。阿达马瓦山脉是刚果盆地拼图的第一块，

除此之外，围就刚果盆地的高地还包括有：北部的阿赞德高原、东部的米通巴山脉，南部的加丹高原－比耶高原，以及西部沿海的“下几内亚高原”。上述高原所围就的土地，总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公里，甚至比印度的领土还要略大。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盆地大部为刚果河流域所覆盖。可以想见的是，刚果河和刚果盆地能够为欧洲殖民者提供多大的想象空间。

在几内亚湾的东南岸线上，我们可以在海岸线上看到一个明显突起的岬角，这就是之前提到的洛佩斯角。作为几内亚湾的东南起止点，这个岬角以南的沿海区域曾经被称之为“下几内亚”（几内亚湾地区为“上几内亚”）。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在几内亚的标签用的地方实在有点多，所以上、下几内亚的概念也被用到了许多别的地方。

对于从海上而来的贸易者来说，能够避风建港的峡湾，比能够帮助其深入内陆的河流同样重要。因此我们会发现，很多国家的起点都缘自于这两类地理特征。今天的喀麦隆首都，港口城市杜阿拉所面对的峡湾——“喀麦隆湾”，就是当年葡萄牙人看见成群虾，并为之命名的地方。不过非洲的海岸线过于平直，适合建港的峡湾数量并不是太多。在离开喀麦隆湾之后，葡萄牙人还能见到一些小型独流入海的河流，比如贯穿赤道几内亚的“姆比尼河”，但他们更希望找到一个能帮助船只躲避风雨的峡湾。

在掠过今赤道几内亚的海岸线后，葡萄牙人的愿望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将要到达的是一个深入陆地 70 公里的三角形峡湾，轮廓看起来很像是根象牙，不过葡萄牙人倒是觉得更像他们在家乡所使用的一种叫作“Gabon”的斗篷。同时葡萄牙人认为，这个峡湾应该是一个河口，顶端所连接的河流能够帮助其更加深入内陆，于是便形象的将之命名为“加蓬河口”（英文名 Gabon Estuary）。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建于“加蓬河口”之侧的港口城市“利伯维尔”，不仅成为了加蓬地区的贸易中心，更成为了今天加蓬的首都。

然而所谓的“加蓬河口”并没有连接一条深入加蓬地区的大河，洛佩斯角南侧入海的“奥果韦河”，才是整个地区的核心河流。在雨季，这条几乎全境处于加蓬



中部非洲地缘结构图 (20世纪初)





境内的河流，可以帮助探险者向内陆航行 250 公里。不过整个加蓬地区大部还是处在热带雨林气候区（尤其是内陆地区），今天这个面积相当于江西、浙江两省之和的国家，人口仅为 170 万，可以想见当年的奴隶贸易并不会太兴旺。

真正让葡萄牙人眼前一亮的发现，是在离开洛佩斯角和奥果韦河口之后。从河口向南差不多 1000 公里的沿海地区，就是所谓“下几内亚”的概念。作为刚果盆地的西边缘，下几内亚地区海岸线依附一条南北向，被称之为“下几内亚高原”的高地。沿下几内亚分布的主要河口有：从北端入海的“奥果维河”、南端入海的“宽扎河”，以及从高原中部突围的“刚果河”。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下几内亚高原的诱惑之处在于，这条海岸线终于不再呈现为连片的热带雨林带。

刚果河流域的面积非常之广大，但总体来说人口密度却不算太大。即使包含中非共和国、乍得、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刚果、扎伊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8 个国家在内，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公里的中部非洲，总人口也不过 1.5 亿（其中刚果金占一半强）。要知道面积不到百万的尼日利亚，人口就已经将近 1.8 亿了。影响中非人口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中部为非洲最大的热带雨林带。这条雨林带的北线，从喀麦隆中部一路向西，大体沿今刚果（金）的北部边境线，一路延伸向东境。南线则自加蓬－刚果（布）相接处的巴泰凯高原，一路向东延伸到刚果（金）东境。

今为刚果（布）、刚果（金）、安哥拉三国所共有的刚果河下游地区，以及下游处于同一纬度的刚果河中上游地区（开赛河、宽果河等支流流域）则属于人口密度大得多的热带草原气候区。最初抵达刚果河口的葡萄牙人，并不知道他们发现的河流是整个非洲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从刚果河下游一直到宽果河流域，黑人的数量明显的增多。葡萄牙人甚至在第一次探索至此时（公元 1475 年），就捕获到了第一批黑奴。而此时控制刚果河下游，势力范围扩张至宽扎河口的土著政权，是班图人属性的“刚果王国”。

所谓刚果河之名，最初只是刚果王国对下游河段的称呼。后来探明的中上游诸支流，也各有各的名称。事实上，不管是“刚果人”还是欧洲人，都不清楚这条大河究竟通往哪里。在葡萄牙人发现刚果河后的 400 年间，欧洲人甚至认为刚果河（包括尼日尔河），应该是和尼罗河相通的。

一如葡萄牙人在非洲惯常所采取的和平贸易方式一样，刚果王国也成为了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的贸易中间商。通过刚果王国输出的大量班图裔黑奴，使得刚果河下游成为了非洲西海岸又一个重要的奴隶贸易起点。同时，刚果王国也因此获得压倒内陆其他土著部落的技术优势。对于还肩负传教重任的葡萄牙人来说，刚果河流域和刚果王国的发现，还让他们对教廷的支持有所交待。

要知道，葡萄牙人在上几内亚地区的传教工作，难免会与透过跨撒哈拉贸易渗透而来的“伊斯兰教”势力发生碰撞。而在远离穆斯林商人影响力的刚果河流域，

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在与刚果王国的和平交往中当中，葡萄牙人成功的让这个黑人王国接受了天主教。今天在整个中非地区，除了阿达马瓦高原北部的乍得、喀麦隆北部地区是穆斯林占主之外，其余皆为基督教势力（另有部分原始宗教）所覆盖，便是受此地缘位置的影响。

然而刚果盆地基督教的传播也并不全是葡萄牙人的功劳，最起码今天在这一地区占比颇高的新教徒，就不会是葡萄牙人发展出来的。葡萄牙人所熟悉的刚果王国，其势力范围也只是向东扩张至刚果河中游左岸支流“宽果河”。这条南北向河流的中段，今天还承担着刚果（金）-安哥拉边界的任务。欧洲人真正对刚果盆地腹地的探索是在 19 世纪。公元 1874 年，一位英国探险家成功的溯河而上，大致搞清了刚果河流域的情况（之前有多批失败者）。

然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最终的政治受益者却并非英国。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今天覆盖大部刚果河流域的“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刚果金），在殖民时代的标签为“比属刚果”。

## 第六节 比利时殖民刚果盆地的背景

比利时本身狭小的国土面积，并不是让人疑惑它获得如此广阔非洲殖民地（234.5 万平方公里）的原因，本土面积与之相仿的荷兰，在海外殖民时代也曾经成为过霸主。问题在于比利时实际上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才算独立，而且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欧洲强势崛起。比利时独立之后突然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大块的殖民地，难免会让人好奇。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刚果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面也说过，西方政治瓜分非洲的导火索是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崛起。作为大航海时代最先被“发现”的一块大陆，非洲被政治瓜分的时间似乎有点晚。这主要是因为这片大陆整体实在太不适合欧洲人移民了。无论是北非酷热的热带沙漠气候，还是黑非洲雨、旱两季泾渭分明的热带草原 / 雨林气候，对高纬度地区的欧洲人来说，适应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土著居民已经遍布整个大陆，也对大规模移民行动造成了很大障碍。以至于敢于进入非洲腹地探险的欧洲人，大都不是死于热带气候所引发的疾病，就是被土著部落所消灭。

鉴于上述困难，一直到 19 世纪中期，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白人数量也不过十万，其中还有差不多半数是定居在南非南部的亚热带（地中海气候类型）地区。另一个影响移民热情的情况是北美大陆的开发，对于欧洲移民者来说，纬度适宜且土著居民数量稀少的北美大陆，吸引力要大得多（16 世纪初，北美印第安人口约为 150 万人）。以至于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开启之前，美国人口就已经超过 3000 万了，去除掉主要为黑人的有色人种数量，白人移民的数量也超过 2500 万。



当“德意志第二帝国”挟战胜法国余威，开始强势在海外扩张时，之前未被充分政治开拓的黑非洲，成为了德国争夺世界话语权的重要战场。由此，也引发了英、法等传统殖民强国的警觉，并在整个非常掀起了一场政治瓜分浪潮。欧洲以外的殖民纷争，更多只是欧洲内战的外围映射。这一点，也可以从比利时奇迹般的入主刚果盆地可以看出。

事实上，比利时的独立以及后来的殖民行为，也是大国博弈的产物。作为西欧与中欧之间的缓冲之地，莱茵河下游的比-荷低地，一直是两大板块之间的缓冲之地。在高卢进入罗马时代之前，这一地缘矛盾主要体现在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则是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之间的问题。当日耳曼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在西欧平原融合成拉丁化的日耳曼板块——法兰西，原来的日耳曼变身为“德意志”之后，比-荷低地进而又成为了法兰西与德意志的博弈焦点。今天比利时的1100万人口中，讲德国/荷兰语（荷兰语其实算是低地德语）的人口占比6成，而操法语者则有4成，便是受这一地缘位置影响形成的。

比利时是在1831年正式获得独立的。在此之前，它曾经为西班牙、奥地利等地区统治的王朝所领有。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曾经成功吞并比利时，不过随着滑铁卢战役的失败，低潮期的法国又失去了比利时。最初比利时本来是被欧洲列强划分给荷兰的（1815年），不过比利时大部分属于天主教徒，而荷兰则是新教徒，并最终导致了比利时从荷兰分离出来，并建立独立王国。很显然这种宗教分割，也是两大版块地缘博弈的一部分（德国南部主要以新教为主）。

总的来说，比利时之所以能获得独立地位，取决于它特殊的地缘位置。尽管法兰西和德意志都曾经在强盛期试图直接统治比利时，但只要法、德在欧洲的大平衡没有被打破，能够大幅缩短两国边境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等小国，在地缘政治上就有存在的空间。为此，比利时当时独立后，甚至同时被诸强授予“永久中立国”地位。当然，平衡从来都是用来打破的。这一中立国地位，并没有阻止二战时德国对比利时的占领。同样的地缘政治妥协，也出现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两个亦敌亦友的大国之间。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外蒙古，以及被俄国人吐出来的中亚，成为了今天中、俄两国达成地缘政治互信的有力保证。至于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变化，实在不是现阶段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虽然同为大国缓冲，但相比地处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外蒙古、中亚，拥有海岸线的比利时，在地缘政治上拥有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一方面，与英吉利海峡相接的地理位置，使得比利时可以在英、法、德三大欧洲强国之间维持平衡。也可以说，上述三国将同时为比利时的独立背书；另一方面，在世界整体为欧洲所瓜分的大背景下，比利时的海岸线也让它有了海外扩张的可能性。最起码与它地位相似，但机遇更好的荷兰，早就这样做了。

最初探索刚果盆地腹地成功的英国探险家（1874年）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资

助。此时英国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刚刚被打破地缘政治平衡的欧洲大陆上（德国统一，法国落败），对遥远非洲腹地的一次探险工作，暂时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顾及。而这一机会，被也希望在海外有所作为的比利时看到了。比利时王室很快资助了英国探险家接下来的探险行为，并开始在刚果盆地腹地布设商站。当然，这个机会仅仅是给了比利时一个法理上的想象空间，如果大国们希望得到刚果的话，他们有一千个理由把比利时排除在外（或者留一小块给比利时）。就像葡萄牙人后来认为按照“谁发现，谁占有”的原则，自己才应该是刚果河流域的主人，最后却只是在刚果河下游得以保有一小块自留地一样。

比利时人的机会在于，德国人把海外争夺的主战场放到了黑非洲。参看所附的《中部非洲地缘结构图（20 世纪初）》就会发现，比属刚果周围英、法、德三国呈三足鼎立之势，谁得了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谁就可以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边成一片，并分割两个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在欧洲就处在三大势力包夹之中的比利时，又一次的在非洲充当了缓冲之地，神奇般的获得了将近 80 倍于本土面积的“比属刚果”。

需要说明的是，比利时在刚果殖民时，全球范围的奴隶贸易已然结束。有鉴于此，比利时人在刚果获取的更多是诸如橡胶、象牙、棕榈油等自然资源。然而这并不代表土著黑人的苦难就此成为过去。对于那些被统治的刚果黑人来说，与前斯历史中那些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相比，唯一的区别也只在于不用离家做奴隶罢了。在竭泽而渔的政策之下，在由比利时王室直接统治“刚果”的最初 30 年间（至 1908 年），比属刚果损失了 1500 万人口。由此也可以看出，比利时人对非洲造成的破坏完全不比那些殖民前辈要小，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 第七节 葡萄牙在安哥拉建立殖民据点

基于刚果盆地位置的重要性，当时的欧洲需要一个平台来协商解决它的归属问题。由于德国是这轮海外殖民争端战略推动者，也是最希望借此来划定自己利益区的国家，所以 1884 年在著名的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持下，欧洲诸国加上美国，在柏林以解决刚果河流域归属问题为名，召开了著名的“柏林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欧美各国在非洲的利益区被正式的划定边界，并最终成为了今天非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基础。

在国际政治中，争端并不是全部由军事手段来解决的。既然各方决定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那么包括“谁发现，谁占有”的法律原则，也就必须得到尊重了。这其中，最早代表欧洲“开发”刚果河流域的葡萄牙，到底卡位如何是我们最先需要了解的。

在 17 世纪中叶以前，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的贸易，主要都是通过刚果河下游的

“刚果王国”来代理的。当然，从贸易的角度来说，葡萄牙人也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永久殖民点。参照在西非的经验，初始永久殖民点的选址，要么是远离海岸线的海岛，要么是强大土著政权的势力范围边缘。前一种做法的代表是佛得角群岛，几内亚比绍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由于下几内亚地区沿海并没有合适的群岛提供支撑，葡萄牙人最终在宽扎河口之北的海岬之上，建立了他们在这地区的第一个殖民点——罗安达。随后以此为基点，向宽扎河以南海岸线扩张。由此而形成的殖民地，历史上被称之为“葡属西非”（虽然我们现在把它划入中非板块），也就是今天的安哥拉。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比较有利的一点是，尽管刚果王国的势力范围曾经抵达宽扎河下游，但总的来说，刚果人的重心还是在刚果河下游地区，并没有着力向南部沿海地区扩张。这也为葡萄牙在宽扎河下游扎根提供了机会。影响刚果人沿海岸线南下意愿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气候。因为离开刚果河河口继续向南，探索今天的安哥拉海岸线的话，无论是刚果人还是葡萄牙人都能感觉到，沿海平原的气候开始变得不那么温润。

刚果河口以南的沿海平原气候变干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这一地区的降水量开始变小，年均降水量大约在 400-700 毫米之间。看到这个区间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之前在解读跨撒哈拉贸易时，热带沙漠气候区与热带草原气候区之间的萨赫勒地带，年降水量就是处在这个区间的。换句话说，虽然现在一提到萨赫勒地带，所指的就是黑白非洲之间的那条半干旱地带，但如果宽扎河南北的沿海地区也是处在这两大气候区之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将之定义为萨赫勒气候区。就像从气候角度看，地中海气候类型并不只存在于地中海周边一样。

安哥拉沿海地带大部到底能不能定性为萨赫勒地带，取决于它的南边是否真的存在一片沙漠。那么事实果然如此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非洲西南边缘，也就是今天纳米比亚的沿海地带，的确存在一条南北长约 1900 公里的狭长沙漠带——纳米布沙漠。很显然纳米比亚这个国家的名称，也是来源于这条沙漠带。事实上，纳米布沙漠也几乎成为了葡萄牙人向南扩张的自然终点，并奠定了今天安哥拉与纳米比亚的边境基础。只是基于缓冲的原因，葡萄牙人最终在与德国人划定边境时（纳米比亚原为德国殖民地），得到了沙漠北部约 150 公里的海岸线。

对于更习惯温润热带草原气候的土著族群来说，萨赫勒地带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成为地缘政治的重心。比如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的西非黄金帝国，取得的政治成果就直接来源于对萨赫勒地带的控制力。然而西非萨赫勒地带之所以成为关键先生，是因为它在跨撒哈拉贸易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只不过，这样做的前提，必须是现在的南非地区拥有发达的经济。换句话说，如果刚果河下游和南非有巨大的贸易量的话，整个王国的重心就有可能是气候更加干燥的安哥拉地区了。现实情况是，远离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南非地区，并没有北非



地区那么多的贸易机会。由此安哥拉地区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也就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廷巴克图”了。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之所以在非洲看到如此之多横平竖直的边境线，是因为欧洲殖民者真正能够控制的很多时候只是沿海地带。当沿海地区的利益边界划分清楚之后，用直线向内陆延伸相应的腹地，看起来会十分的“科学”和公平（尤其是人烟稀少地区）。不过在葡萄牙人着力开发下几内亚海岸线的16、17世纪，倒还没有想到将来的竞争会如此激烈，他们所面临的直接对手仍然是曾经与之有过密切合作的刚果王国。

刚果王国在这一地区的做大，与葡萄牙人的到来有直接关系。那些在战争中收获的黑人奴隶，不仅为刚果贵族获得了巨大财富，也为他们换来了技术优势。然而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刚果王国的做大，只是贸易所带来的客观结果，并不是葡萄牙人刻意追求的。无论对于政治扩张者还是贸易者来说，一片分裂的土地，才能带来更多的机会。

像世界上大部分貌似统一政治体一样，刚果王国并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它核心地区位于刚果河下游北岸，而刚果河以南至宽扎河的土地，实际上是由一个叫“恩东戈”的附属酋长国控制。15世纪末探索至此的葡萄牙人，见到的第一位恩东戈国王叫做恩哥拉·基伦热(ngola a kiluane)，因此这位国王名字的一部分（加上一点转译的错误），便成为了今天安哥拉国名的由来。鉴于沿海地区的干燥气候，恩东戈王国的经营重心，是在宽扎河中上游至宽果河一带的高地上。这也为葡萄牙人在罗安达的落地，以及随后沿海岸线的扩张提供了空间。

对付一个模块式的政治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激化它的内部矛盾，然后各个击破。在罗安达站稳脚跟的葡萄牙人，最终也是这样做的。公元1665年，葡萄牙人终于通过战争迫使曾经强大的刚果王国分裂，并将自己的控制线延伸到了刚果河下游。土著人的“恩东戈”就此变成了葡萄牙人的“安哥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刚果王国这个政治体就此消亡了。退回刚果河北岸的刚果王国，实际上直到柏林会议之后，才消失于地缘政治舞台的。

## 第八节 法国在刚果盆地获取的殖民地

尽管在葡萄牙人之后，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相继尝试过对中非海岸线进行贸易，但在地缘政治层面都没有造成过重大影响。19世纪中叶，法国人在加蓬湾的登陆才是造成本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直接原因。登陆加蓬湾的法国人，在加蓬湾建立了一座安置被解放黑奴的“自由城”，也就是今天的加蓬首都利伯维尔。

从技术上看，这一时期已是奴隶贸易的尾声了，以解放黑奴为名，政治介入非洲未开发（瓜分）地区，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与英、美两国在“胡椒海岸”建

立“自由城”弗里敦（塞拉利昂首都）、利比里亚（自由之国），并取得相应利益一样，法国也人凭借“自由”之名，成功的在西非沿海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大部分为热带雨林所覆盖的加蓬地区，基本还是处在部落时代（与胡椒海岸的情况类似）。洛佩斯角以南地区，名义上属于刚果政权的势力范围。然而一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刚果人的真正统治区是在刚果河流域下游（北岸）。德意志第二帝国将黑非洲作为海外扩张重心的决策，以及比利时在刚果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探索，对法国造成了强烈的刺激。

为了避免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刚果流域为他人所取，法国人开始由加蓬地区向刚果河流域强势渗透，以图在刚果盆地争夺中占得先机。与此同时，德国人也从喀麦隆东南，透过刚果河上游的桑加河，向刚果盆地渗透。1880年德国人完成了对“法属刚果”的占领。德国人控制下的喀麦隆，也成功的在刚果盆地插入了一只脚。其中法属刚果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造就了位处刚果河中游－乌班吉河下游（刚果河上游河流）以北的刚果（布）。

之所以会有个如此纠结的名称，是因为“刚果”二字所蕴含的巨大地缘政治价值，让独立后的“法属刚果”与“比属刚果”都不愿意放弃这个标签，而是分别为自己取了个“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名字。其中“比属刚果”曾经在1971年更名为“扎伊尔”（刚果河又称“扎伊尔河”，意为“大河”），但在1997年又改回曾经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单纯从在刚果河流域的占比来看，面积7倍于法属刚果的比属刚果，执念于“刚果”这个标签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却给其他吃瓜群众出了一个难题，以至于必须把二者的首都简称标注在国名后面，才能够在字面上区别出二者来。

刚果（金）和刚果（布）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纠葛，并非仅仅体现在字面上。观察地图的话，大家会发现，两国用来区分彼此的首都，位置都正处在刚果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割点上。也就是说，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与刚果（布）的首都布拉扎维之间，仅仅隔了一条刚果河。基于两座城市在本国的政治中心地位，飞往刚果地区的航班在其中一个机场起降后，通常还得飞过“宽阔”的刚果河，到另一个首都上下乘客。更由于两国国名太过雷同，以至于一些初次到此的国际乘客，会搞错目的地提前下飞机。鉴于两个城市分属两个国家，邻居关系很多时候还不怎么好，下错飞机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

按照法国人的想法，是非常希望能够控制整个刚果河北岸地区的。然而在葡属西非（安哥拉）已经控制了刚果河口南岸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所谓的“比属刚果”就没有出海口了。虽然比利时的实力无法阻止法国人这样做，但德、英等暂时没有办法直接染指刚果盆地的欧洲大国，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1884末年开启的“柏林会议”，核心议题其实也就是为了解决刚果河下游的归属问题。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被孤立的法国人，并没有能够染指刚果河的出海口，所谓的比属

刚果在刚果河口之北拿到了一段南北宽仅 40 公里的海岸线，以及向内地延伸约 290 公里的一条刚果河北岸邻土。

阻止法国人染指刚果河口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葡萄牙人的介入。当法国人开始从加蓬地区向刚果河扩张时，已经在刚果河口之南经营了两百多年的葡萄牙人，自然也坐不住了。基于葡萄牙人的实力，像法国人那样的大举扩张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过在争夺刚果河口的问题上，葡萄牙人却还是有地缘优势的。几乎与法国控制“法属刚果”同时，葡萄牙人也在刚果河口之北，也通过与土著居民达成保护协议，占得了一块殖民地。

很显然，葡萄牙人的做法阻断了法国南下刚果河口的进程。只是任何一个国家独占刚果河口，都不符合其它国家的利益。在一片维护比属刚果出海权的声音中，葡萄牙人并没有能够在柏林会议上，把刚果河口之北的这一小块土地与自己的“葡属西非”相连。比属刚果在得到出海口的同时，也在刚果河之北、两个刚果之间割裂出来一块面积仅 7200 多平方公里的“葡属刚果”——卡宾达。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卡宾达”一词倒也不能说完全陌生。一种原产自卡宾达的天然药材——卡宾达树皮，当下正在坊间流传有神奇功效。

卡宾达树皮是否真有药用效果，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基于飞地性质的卡宾达与安哥拉本土并不相连（且有海岸线），它在葡萄牙帝国体系内的地位一直不太确定（是否应归属于葡属西非管辖）。这块飞地所天然具有的分裂倾向，亦使卡宾达在 1975 年宣布独立为“卡宾达共和国”。尽管安哥拉政府很快控制了卡宾达，但直到今天卡宾达人依然在用各种方式尝试独立。

事实上，如果卡宾达人在柏林会议前，有机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法、葡、比之外的欧美国家，他们今天肯定就已经获得独立地位了。就像原来“西属几内亚”的赤道几内亚一样。当然，从非洲政治格局来看，目前以开发自然资源（森林、矿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卡宾达是否独立，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欧洲殖民者基于自身利益博弈，对非洲地缘政治格局所造成的混乱，才是这部分内容解读的重点。

## 第九节 法国在非洲大陆获得的殖民地

作为欧洲内部地缘政治博弈的外延，理解非洲当下的地缘政治格局，需要从更高的视角来审视那段被殖民史。就我们当下在非洲西海岸所触及的版块来说，法国的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得益于法国在地缘位置上优势，同时拥有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线的地理特点，使得法国人在整个非洲西半部的布局，比之另两个竞争对手更有优势。20 世纪初，法国在非洲获得的政治成果被整合为了三大板块，即：法属北非、法属西非，以及中部非洲的“法属赤道非洲”。

这三大板块中，与法国隔地中海相望的马格里布地区（也就是法属北非），应



该是法国最重要的海外领地。从划分地缘利益区的角度来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个位于西地中海的马格里布国家，属于西欧的地缘利益区。

当然，这种划分是建立在欧洲本位的基础上，或者说欧洲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历史上很多时期，比如迦太基、阿拉伯时期，马格里布与西欧算是对等的竞争关系。不过必须承认的是，由于人口潜力差异巨大及工业时代的来临，马格里布以及整个北非（包括阿拉伯半岛），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再有机会与欧洲进行对称竞争了。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这片无论在气候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与欧洲截然相左的土地，还将会更倾向于使用一些“不对称作战”（比如自杀性袭击）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不甘。

从地理位置上看，代表欧洲经营马格里布地区的，可以是西班牙也可以是法国。不过在19世纪末，西班牙作为大航海时代先行者的先发优势已经消耗殆尽，兼具大陆、海洋优势的法国，成为了欧洲渗透并控制马格里布地区的代表。问题在于“渗透”并不总是单方面的。就像历史上很多外来民族曾经在政治上入主中原，反过来却又在文化和民族上融入中国一样。今天法国变成西欧穆斯林比例最多的国家（10%），其中大部又是来自马格里布国家，又何尝不是缘起于这段成功的殖民史呢？

法国在殖民非洲问题上的地缘优势，也体现在了对中、西部非洲板块的争夺上。借助传统的跨撒哈拉商路，以及葡萄牙人开拓的海上航线，法国人成为了西非的最大赢家。统治之下的“法属西非”，包括有现在的：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尼日尔、马里、几内亚、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贝宁，以及尼日尔。可以说，除了西撒哈沙（西属）、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葡属）、塞拉利昂、贝宁、尼日利亚（英属）、多哥（德属），这几个沿海地区以外，整个利比亚－乍得湖以西的非洲西部地区，几乎都成为了“新法兰西”。

法国人在非洲西部统治秩序的建立，也为他们在乍得湖－阿达马瓦山脉以东的非洲中部地区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一方面，法国人可以在内陆，从西北方向渗透至今天为尼日尔、乍得两国所有的“乍得盆地”，进而南下刚果河流域；另一方面，还可以像英、德等国一样，遵循传统的海洋扩张路径，从加蓬登陆向刚果渗透。正是基于这双重优势，法国成为了欧洲三强中，唯一能够把自己在非洲（大陆部分）殖民地连成一片的国家。

与刚果盆地同属地理中非范畴的“乍得盆地”，也同样是各方争夺的焦点。今天乍得湖周围呈现出的四国分列的格局，就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其中乍得湖西南的尼日利亚属于英国殖民地；南部的喀麦隆属于德国殖民地；西北的尼日尔、东北的乍得，则为法国人所有。不仅如此，乍得湖也是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两大殖民板块的分割线。湖以西的尼日尔被划入“法属西非”，以东的乍得则属于“法属赤道非洲”的范畴。

事实上，纯粹从原始的地缘关系来看，横跨撒哈拉沙漠－萨赫勒地带、热带草

原气候区的乍得，也属于跨撒哈拉贸易涵盖板块。跟西非、北非板块之间的接触，远比跟刚果盆地紧密得多。在法国人渗透乍得地区的 19 世纪后期，从东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而来的穆斯林，刚刚在乍得湖盆地成功的建立了统一王朝。

两大地缘势力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博弈的结果，也在如今乍得宗教结构上也有所体现。今天的乍得共和国，穆斯林的比例约为 44%，基督徒的比例则约为 33%（剩余为原始宗教信仰者）。很显然，前者主要分布于中北部的干旱地区，后者及遵循原始信仰者，则生活在南部湿润的热带草原地带。基于双线出击的地缘优势，在争夺乍得盆地的博弈中，法国人最终取得了胜利。由此，英国人无法把自己控制下的尼日利亚，与东、北非的英属埃及、苏丹等地连成一片。而法国人，则可以将自己的控制线从地中海向南一直延伸到赤道地区。

由于在柏林会议上未能取得刚果盆地的控制权，法国在中部非洲所拥有的“法属刚果”有些形单影孤，并且随时有被德属喀麦隆割裂其与北部殖民地联系的可能。为此，法国人决定将乍得与南部的法属刚果板块整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法属赤道非洲”（1910 年）。所谓的“法属赤道非洲”在地理上涵盖两大地理单元：乍得盆地和刚果盆地。

为了连接这两大板块，法国人在乍得湖流域与刚果河流域相接地区，划分出了一个叫作“乌班吉沙里”的政治单元。其中的“乌班吉”指的是刚果河上源的“乌班吉河”；“沙里”则指的是乍得湖的主源“沙里河”。两条河流都有很长一段为这个政治体充当其与乍得、刚果（金）两国的边境线。这个标注显著地理特征的地缘政治标签，也为我们了解这片土地的地缘归属提供了方便。不过现在大家在全球国家序列中是看不到“乌班吉沙里”这个国名了，因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找到了一个更为高大上的政治标签——中非。

法属赤道非洲地区摆脱法国直接统治，获得独立的时间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年。与其它殖民地区一样，法国人本希望法属赤道非洲四大政治单元（加蓬、刚果布、中非、乍得）之间，能够继续以联邦的形式，留在其为延续海外影响力而成立的邦联组织——“法兰西共同体”中。不过很显然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为此在 1958-1960 年之间，一个叫作“中非共和国联盟”的政治体，承担了帮助法属赤道非洲四个国家向独立过渡的任务。

在四国分获独立，而其它三个国家又都有彰显自己地缘属性国名的情况下，对自己名称不太满意的乌班吉沙里，顺势接过了“中非”这笔地缘政治遗产。以自身的潜力来说，人口不到 500 万的“中非共和国”，着实有点受不起“中非”这顶大帽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统治者曾经因此而怀有一个帝国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一下“中非帝国”这个标签，看看这个曾经短暂存于 1976-1979 年所谓“帝国”，以及他的嗜血皇帝博卡萨，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做过的荒唐梦。

法国人在中部非洲的成功扩张，并非没有受到过挑战。在喀麦隆站稳脚跟的德

国人就曾经用围魏救赵之法，扩张了自己在喀麦隆的殖民地，并成功的将法属赤道非洲一分为二。我们知道，就海外殖民这件事来说，德国属于后起之秀。如果说 16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主力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话，那么 19 世纪的世界，则主要是英、法两国博弈战场了。

基于法国在地中海的优势，以及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海洋优势，二者在 20 世纪初达成了共识，即英国承认法国在非洲西海岸的优势；而法国则认可英国在非洲东海岸的主导地位。体现在北非，则是法国得到马格里布，英国得到埃及（中间的利比亚则由意大利缓冲）。英、法两国的这种做法，很明显会影响到德国的利益。尤其此时的德国已经将非洲作为了海外扩张重心。一如葡萄牙、法国等国一样，在德国的非洲扩张之路上，与大西洋相接的摩洛哥是重要的前进基地。为此，在英国承认法国在马格里布的政治权力之后，德国人以维护摩纳哥独立、利益均沾为名，先后在 1905 年、1911 年在摩洛哥挑起外交、军事冲突，史称两次“摩纳哥危机”。

最终法国以割让部分法属刚果的土地为代价，换取了德国对其控制摩纳哥的承认（1912 年）。德属喀麦隆的领土也向东北方向扩张到桑加河及乌班吉河口，与比属刚果相接（法属四个政治单元的乍得、中非因此与刚果布、加蓬割裂）。当然，没有谁会真正满意这个结果。一战结束后，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英、法两国瓜分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而二战时期，“德意志第三帝国”又把他最优秀的统帅之一送到了北非战场。

想要全面了解非洲的前世今生，还需要把视线渐次扩张到整个大陆。基于葡萄牙人先行者的地位，我们还是回到这条主线上来，看看已经航行到安哥拉的葡萄牙航海家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从位置上看，他们离发现好望角及印度洋已经为时不远了。不过就像西游取经到了最后，还要遭受一次磨难一样。葡萄牙人之后的航海之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至于会遇到什么，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八章 葡萄牙人在南部非洲西海岸的探索

### 第一节 葡萄牙人南下航行至纳米布沙漠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大多数探险者来说，沙漠都算得上是极危之地。即使开拓的是一条海上航行之路，沿海沙漠带的存在也会对人类的探索决心造成致命影响。一直以来，西撒哈拉地区绵延上千公里的沙漠海岸，都让从海路探索黑非洲的航海者感到绝望。在迦太基 / 罗马时代，来自旧大陆海洋贸易者就曾经沿摩洛哥海岸线向南进行过尝试。一直到两千年后的 15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才算替整个旧大陆文明跨越这条沙漠海岸“发现”西非。这其中最致命的因素是没有人告诉你，这片沙漠的尽头在哪里。

在摆脱撒哈拉沙漠的影响之后，葡萄牙人接下来的探索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尽管葡萄牙王国在政治上对黑非洲并没有企图，甚至将接下来的探索、开发工作承包给了商人，但利益才是最好的驱动力。仅仅用了不到 30 多年时间，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葡萄牙人，就完成了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之间长达 6000 多公里海岸线的探索工作。在王室与承包商的合同当中，除按比例上缴贸易收入外，承包者还必须每年为王室承担探索 100 海里海岸线的任务。简单计算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份合同算是被精确执行了（1 海里约等于 1.852 公里）。

任何方法都有其两面性，虽然商业探索在效率上有其可取之处，但计算商业风险也是商人本性。最简单的案例就是，如果突破西撒哈拉沙漠海岸的工作，没有得到恩里克王子所代表的国家机器支持的话，葡萄牙人将很有可能失去大航海时代启动者的荣誉。现在，在黑非洲西海岸的商业探索持续了 30 多年后，同样的问题又摆在了葡萄牙人面前。因为他们在同样的纬度又碰到了一条沙漠海岸。这条沙漠海岸就是之前提到的，覆盖纳米比亚海岸线的“纳米布沙漠”。后来喜欢用土特产来标注岸线、水域的葡萄牙水手，也为这条海岸取了一个特别的名称——骷髅海岸。

骷髅当然不是受葡萄牙人青睐的商品了。这个名称所透露出的是葡萄牙人对这条海岸线的恐惧感。不过在北半球面对环境相仿的西撒哈拉沙漠海岸，葡萄牙人也没有如此暴露出心中的恐惧感。由此看来，这段航线应该还有其它令航海者感到恐惧的因素存在。事实上，沿途缺少天然补给地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探索时期。在探知沙漠海岸的长度之后，随船带足补给品便可有效的规避风险。对于后来的航海者来说，纳米比亚海岸线最大的风险在于变幻莫测的风向和风力，以及缓急不定的洋流和暗礁。试想一下，一旦船只在海风和洋流的作用下不幸触礁，侥幸逃生的水手好不容易游到岸边，却发现面对的是一片极度干旱的沙漠（还有不少船只残骸和人类遗骨），会是什么样的绝望心情。因此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条海岸会有“骷

髅海岸”之称了。

仔细观察纳米布沙漠在地球上的纬度，会发现它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位置其实是相对应的，主体都存在于北 / 南纬  $20^{\circ}$  ——  $30^{\circ}$  的区间内。再进一步扩展视角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包含南 / 北回归线 ( $23^{\circ} 26'$ ) 在内的区间内，并不仅仅存在这两片沙漠。包括在纳米布沙漠东部，现在主要分布于博茨瓦纳境内的卡拉哈里沙漠、阿拉伯半岛的内夫德 / 鲁卜哈利沙漠、南亚次大陆的塔尔沙漠（印度大沙漠）、北美墨西哥的奇瓦瓦沙漠、南美智利沿海的阿塔卡马沙漠在内的世界主要沙漠，都在这个区间。这条横跨回归线的沙漠地带，也由此被称之为“回归沙漠带”。然而就中国人自身的感受来说，这一区间内的气候应该属于温润多雨的亚热带气候，北回归线南北更是植被茂盛之地。为什么那么多著名的热带沙漠气候区却又都同时存在于这个区间内呢？如此“巧合”用元芳的话说就是：此事必有蹊跷。

一片土地属于什么样的气候类型，本质是一个温度和降水的问题。就这些身处热带地区的沙漠而言，降水稀少无疑是它们成为干旱之地的共同原因，而这一切又是由一种常见于气象预报中的气候现象——副热带高压（又称“亚热带高压”）所决定的。解读这一专业气象名词的来龙去脉，相对有些复杂。简单点说，就是这条脊线主要在南 / 北纬  $20^{\circ}$  ——  $30^{\circ}$  之间摆的高压带，在冬季会使得气流下沉，并向纬度低、气温高的赤道地地区输送，水汽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凝结成雨；夏季的风虽然是由低纬度向高纬度输送，却又是从内陆往海洋方向刮（信风），没有办法为陆地带来水汽。因此造成覆盖之处成为干旱之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影响气流的话，在副热带高压的作用下，处在这个区间的中国南方以及印度中北部，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本来也很有可能成为“回归沙漠带”成员的。

最终让东亚、南亚这两个人口、文明昌盛之地免于成为不毛之地的原因，在于与将这两大板块连接起来，并为二者提供依靠的那片“极地”——青藏高原。水汽多处距离地面 3000 米以内的空间内，而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很显然，如此海拔和体量的一片高原，将对地球的大气环流造成重大影响。体现在气候上，就是造就了东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这两个“例外”。其影响就是给这两个地区带来了两股方向不同的季风及充沛的降水。其中为东亚输送水汽的是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为南亚服务的则是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

顺便说一下，由于印度河流域“恰好”被西南季风所错过，所以循常例成为了热带沙漠气候区。不过青藏高原（包括向西延伸的帕米尔高原）虽然没有为这一地区带来充沛的降水，却还是慷慨的用高原之水滋润了这片土地（通过印度河）。人类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始于种植业的大规模开发。通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包括利用自然力），不缺少热能及高山流水的干旱低地，最有利于扩张种植规模。两河、尼罗河、印度河文明的先发，便是缘自于此。相比之下，在同时需要考虑旱涝两种情况的季风地带，水利设施的设计就要更复杂一些。恒河流域产生文明的时间晚于印

度河流域，黄河、长江文明兴盛的时间，要晚于那些热带沙漠气候区，都与此有很大关系。同时，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分裂为两个文化迥异国家，也与二地气候环境的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就地缘研究这个视角而言，地理、气候等客观物理环境，毫无疑问是最基础的要素。不过基于为现实人类服务的原因，通常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人力可能改变的点上（比如运河），因此除非对气候学特别感兴趣，我们并不需要费力去了解每一地气候形成的细节。只需知道它现在的气候类型，以及由此对人类生存、交流产生的影响就行了。就好像探讨在台湾海峡如何挖条隧道，会比思考如何让撒哈拉沙漠重回绿色之地更为现实。

## 第二节 迪亚士冲破骷髅海岸探索至好望角

回到葡萄牙人探索非洲这条主线上来。对于商人来说，探索骷髅海岸本身缺乏足够的利益驱动。然而欧洲人早已知道，控制北非－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可以从这片大陆的东部出发航行到富庶的印度。这也意味着如果葡萄牙人继续沿海岸线向南探索，寻找到这片大陆的尽头的话，那么就可以绕到非洲的东海岸，进而进入印度所属的海域（也就是印度洋），打通一条不被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海上贸易线。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乃至宗教价值，无论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在这一巨大前景驱动下，葡萄牙王室很快又接过了继续向南探索的主导权。受命于王室的探索船队，开始尝试冲破骷髅海岸的阻隔，向着非洲大陆的尽头出发。

公元 1487 年 7 月，贵族及航海世家出身的葡萄牙人“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在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充分准备后，从葡萄牙本土出发，开始了他的印度洋发现之旅。在此之前，那些尝试冲破骷髅海岸的探索者，仅仅向南探索至南纬 22 度附近便停止了探索工作。现在我们知道，由这个位置前往这次航海所发现的“好望角”，还有差不多 1500 公里海岸线属于未知范围。当然，迪亚士和他的船队并不知晓眼前有多长的障碍。他们能做的就是准备尽量多的补给品，以冲破这片危险的海域。为此，船队除了用两艘来执行探索任务的武装帆船之外，还专门配备了一艘补给货船。

在未知海岸线的探索中，迪亚士和他的船队首先发现的是位于纳米比亚中部的海湾——“鲸湾”，这个海湾今天也是纳米比亚唯一的深水港“鲸湾港”所在地。不过迪亚士和后来的葡萄牙人，都对鲸湾和纳米比亚的开发缺乏兴趣。毕竟有富庶的印度在前，谁又会对这片干旱之地感兴趣呢？最终开发鲸湾和整个纳米比亚的，是 19 世纪末开始在非洲拾遗补缺的德国人。为此，今天这个人口仅 100 万的西南非洲国家，也烙下了浓厚的德意志印记。

整个纳米布沙漠南北长约 2000 公里，从安哥拉南部开始，沿整个纳米比亚西缘



延伸入南非西北部。并非每一处沙漠都与海洋无缝对接，这条沙漠海岸中的最凶险之处，正处于鲸湾以南至今天纳米比亚西南“吕德里茨湾”（今海湾城市“吕德里茨”所在地）的区域内。在这一危险区域的南北方向最窄处只有 10 公里，黄沙在此完全漫入海洋，甚至让你在视线之内无法分辨出哪里是沙漠，哪里是海水。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在风的作用下形成的。变幻莫测的强风，同时也常常对后来航行者造成威胁，狭义概念中的“骷髅海岸”也正是指向于此。

不过迪亚士和他的船队却没有在骷髅海岸遭遇强风。除了运气以外，很大程度有赖于他做的一个正确决定。为了快速通过这段让人没有探索欲望的海岸，在把剩余补给品搬至另两艘快船上后，航速较慢的补给船受命离开船队返航。这使得迪亚士船队接下来的航速得以增快了许多，无形中减小了在骷髅海岸遭遇不测的概率。然而在未知海域航行，不可预知的风险总是会出现，骷髅海岸也并非唯一产生风暴之处。在南纬 34 度附近，迪亚士的船队还是遭遇了强大的风暴，并因此而偏离了航向。

如果迪亚士的船队在这次风暴中没能幸存，或者就此返航的话，那么他估计很难会被历史所记录下来了。因为这个让他遭遇风暴之苦的地点，正是好望角的所在地。事实上，由于从南极和印度洋方向而来的一冷一热两股洋流，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相遇，航海者在此遭遇狂风巨浪其实也是大概率事件。基于这段经历，迪亚士最初将这个岬角命名为“风暴角”。只不过当时的葡萄牙国王认为，如此重大价值的发现应该有个更吉利的名字，遂正式将之命名为了“好望角”。



好望角

被风暴驱使绕过好望角的迪亚士，很快就发现接下来的海岸线开始出现在视线的北方。对于出海半年一直在寻找非洲最南点的探险家来说，这一发现无疑是个好兆头。为了验证结果，迪亚士的船队又向东航行了 400 多公里，抵达南非南部的莫塞尔湾（海湾城市为“莫塞尔贝”），在补给接近耗尽时才不得不返航。严格来说好望角并不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它东南方向的厄加勒斯角才是地理上的最南点。另外从技术上说，最终没有完成下一个转折（由东向北航行）的迪亚士，其实也不能完全证明自己找到了非洲大陆的终点。就好像 40 年前从几内亚比绍开始向东南方向航行的葡萄牙人，花了 20 多年探索至喀麦隆火山后才明白，接下来还有漫长的南行之旅在等待着他们。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迪亚士当时的判断虽然在逻辑上不够完美，但结果的确是赌对了。只是“发现”印度洋和印度的历史使命，将要由另一位葡萄牙贵族来完成了。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土地上又是什么样的地缘结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科伊桑人的生存环境和族群特征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他们在黑非洲发现的无疑是一片“新大陆”。但作为人类发源之地，这片大陆绝非无人居住之地。随着南部非洲开发的深入，葡萄牙人和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发现，这些人口稀少的原住民（较之班图人），与他们在西、中非所贩卖的那些黑奴外表有着明显的差异。很久之后人类学家们才搞清，这些被称之为“科伊桑人”的南部非洲原住民，无论从种族还是语言上看，的确应该独立分类。

科伊桑人内部可分为两大民族集团：科伊科伊人和桑人。科伊桑人这个标签，便是这两个族名的合称。另外前者还曾经被命名为“霍屯督人”，后者过去则被叫做“布须曼人”。前后两组名称的差异在于，后一组名称是欧洲殖民者所取，带有歧视性。其中霍屯督人的是根据他们的发音特点来命名的，意指其说话含混不清；布须曼人则是“丛林人”的意思（前一组则是自称）。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更关心的是科伊桑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首先来看下科伊桑人的生存环境。通常情况下，一个边缘民族的生存环境都不会太好，科伊桑人也是如此。纳米布沙漠周边的半干旱地区（萨赫勒），以及与之相接的较为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是他们目前的生存之地。不过如果把科伊桑人的分布区域标注在地图上，又很容易造成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好像覆盖了南部非洲的半壁江山（西半部），看起来在本地区应该很有发言权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了，要知道包含安哥拉、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等10国的“南部非洲”大陆，总人口达到1.3亿，而能够被归类为科伊桑人的总数不过20余万。

纳米布沙漠并非这一地区唯一的沙漠。这条狭长沿海沙漠带的东部是一条南北向的山地带，包括北部的卡奥科兰山脉，以及南部的阿瓦斯山脉。其中阿瓦斯山脉东部是一个面积达到60余万平方公里的高原盆地——“卡拉哈迪盆地”。假如卡拉哈迪盆地处在刚果盆地的位置，那么这一地区肯定也是降水丰沛的雨林区。不幸的是，它的位置正处在副热带高压带。因此整个盆地同样呈现为干旱、半干旱地貌。其中盆地的西半部为沙漠所覆盖，被称之为“卡拉哈迪沙漠”。倘若不是阿瓦斯山脉分割的话，纳米布、卡拉哈迪两大沙漠势必会连成一片。不过即使如此，这条干旱地带也对刚果—安哥拉方向的班图人南下造成了战略上的障碍。同时也让边缘化的科伊桑人，有了一片看起来相当大的天然保护区。

虽说政治、经济影响力并不一定与人口比例成正比（比如犹太人），但科伊桑人很显然没有可能获取超出其人口比例的存在感。因为这个由于背靠“沙漠”才得以幸存的古老族群，整体一直还处在非常原始的游猎和游牧阶段。其中桑人（布须曼人）的生产方式，以在草原（灌木草原）上狩猎、采集为主；而分化时间稍晚的科伊科伊人，除了狩猎以外，经济上已经开始进入游牧阶段了（长角牛）。放在中央之国所面临的环境里，就是满洲渔猎和蒙古游牧两大体系之分。

划分族群所需参考的因素有很多，种族、语言、生产生活方式等等，都是常见的标准。对于大多数非洲以外的人来说，很大程度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没有大块整合），又被外来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的黑非洲，内部民族的细分实在是一件头疼，甚至没有意义的事。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科伊桑人的存在也还是值得特别关注一下。因为这一族群与大家脑海中的“典型黑人”形象的确有非常显性的差异。如果说俾格米人的“矮”，是这个族群与典型黑人的标志性区别的话，那么科伊桑人的重要识别特征就是“白”了。当然，这个白只是相对于典型黑人的黑了。更严谨的说法是，科伊桑人的肤色与黄种人相近。

科伊桑人与黄种人的相近之处，并不仅仅在肤色。黄种人（蒙古人种），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有一个多发性的外部特征，那就是内眼角经常会出现上眼睑下拉，遮盖住下眼皮及泪腺的情况，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内眦赘皮”或者“蒙古褶”。上述地区的亚洲人的眼睛看起来不如高加索人种大，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有二点：一是在黄种人当中，蒙古褶的出现机率呈现北高南低的走势。如果没有蒙古褶也不代表自己不属于这个种族；二是蒙古褶和单眼皮是两个概念，由不同的基因决定的。如果同时拥有比较明显的蒙古褶和双眼皮，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通常所说的“内双”了。

顺便说一下，经常看到有争论中国古代是否以单眼皮为美，毕竟流传下来的仕女图大都看起来都像是单眼皮形象。实际上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观本质并不在于眼皮单双，而在于蒙古褶所造成的内眼角下压，同时外眼角又明显高于内眼角上挑，加上较长眼裂（两眼角之间的距离）的所呈现出来效果。用一个词概括，就是俗称的“丹凤眼”。受此影响，今天西方人所认可的中国美女形象也大都偏向于此。只不过相比西方人喜欢的那种单眼皮式丹凤眼，现在中国人会更接受“内双”式的丹凤眼罢了。

在科伊桑人当中，“内眦赘皮”的现象也属多发。典型的科伊桑人除了上述两大特征以外，还具有面部皮肤较为松弛、颧骨较高，以及头发卷曲的特征。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南非著名政治家曼德拉，血统中就含有一半科伊桑人的成分（另一半为班图黑人）。这也是为什么曼德拉的某些照片，看起来甚至比黑白混血的奥巴马还要“白”的原因。前几日在里约奥运会上，破了400米纪录的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从肤色、颧骨上看，似乎也有明显的科伊桑人血统。事实上，科伊桑人出现的时间



比典型黑人要更早。只是由于科伊桑人的数量过于稀少，加之现与班图黑人的混合度较高，这个族群很多时候被简单归类为尼格罗人的一个特殊分支了。

#### 第四节 班图人南下压缩科伊桑人的空间

影响科伊桑人地缘地位的原因，主要在于班图人向非洲中、南部的扩张。从体质特征上来看，所谓班图尼格罗人和苏丹尼格罗人之间，原本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典型黑人”的主要原因。二者都源自于西非（西苏丹）。在公元前的漫长历史中，这些原始部落状态的典型黑人，主要的迁移方向是东部与之气候相近的中、东“苏丹”地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在尼罗河上游的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地区，与从北非、阿拉伯半岛南下的闪含语族的高加索人种发生了混合和碰撞。原来也北进到尼罗河上游的科伊桑人，很快便被两个强势族群所融合掉。

由于东进的过程非常漫长，并且在南下闪含民族的强势影响下，最终在西起塞内加尔河口、东至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土地上，苏丹尼格罗人在语言上呈现出了多样性。今天能够被归类于“苏丹尼格罗人”的种族集团，内部各民族在语言上却可能被归类入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或者闪－含语系。同时，一如撒哈拉沙漠影响了地中海的高加索人种南下一样，中非热带雨林带也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从几内亚湾一直到刚果盆地东部的这条热带雨林带，东西长约2400公里，南北平均纵深也有约1000公里。当然，这片雨林带也并非完全没办法绕过去。就地理位置来说，刚果盆地东部的非洲大陆是被两片高原所覆盖，其中东部与之相接的为东非高原，东北部与之相接的则是名气更大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了。

东非高原最大的特色，就是以维多利亚湖为代表的一系列高原湖泊。通常也被称之为“大湖地区”。与此同时，高原北部还和埃塞俄比亚高原西部一同为尼罗河供水（源自东非高原的上游为“白尼罗河”，源自埃塞俄比亚高原为“青尼罗河”）。连接这两大高原的是一条举世文明的地球伤痕：东非大裂谷。东非高原上一系列呈弧状排列的湖泊，以及红海、西亚裂谷带，都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东非大裂谷及其周边地区整体来说属于热带草原气候，但受跨度和高（深）度的影响，内部呈现复杂多样的气候环境。这不仅使之成为了动植物的基因库，更成为了人类的摇篮。不过也正因为它纵穿非洲大陆东部，全长将近6000公里的特点，使得地理上的“东非”很难整合成地缘政治上的东非板块。

通常情况下，会把红海南部至非洲东南海岸“赞比西河”下游，东非裂谷带所涉及的的国家归入东非概念（大陆地区）。就国家来说，从北向南包括有：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南苏丹、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这10个国家归入东非概念。北部领土位于裂谷带的莫桑比克则一般被划入南部非洲的范畴。基于东非板块南北跨度过大，一般围绕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埃塞俄

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四国，在地缘政治上自成体系为“东北非”（又称“非洲之角”）。在这样分类的前提下，“东非”的概念很多时候又专指东非高原及其相关部分了。

东非并不是当下解读的重心。提前把东非及东非裂谷带的概念拿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在刚果热带雨林带的东面，有一条纵贯非洲东部、适宜自然迁徙的路线。科伊桑人无疑曾经利用过这条路线，并向北触及尼罗河上游。不过在进入公元纪年之后，操班图语的“典型黑人”开始强势向南扩张，并极大压缩了科伊桑人在东、南非洲的空间。这些“典型黑人”的南扩成功，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体质方面。尽管科伊桑人要比热带雨林中的俾格米人更高大些，但男性平均身高也只有不到1.6米。而苏丹地区的典型黑人，成年男子则平均达到1.8米。在一片双方都能适应的热带草原上，后者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则是文明的成熟度。尽管撒哈拉沙漠的阻隔使得沙漠南部的“苏丹”地区的文明进程缓慢，但终归还是比东非高原和南部非洲地区，要更有机会接受北方文明的信息的。比如黑非洲普遍畜牧的长角牛，就是沿尼罗河从地中海周边地区传入的。地缘位置优势也使得苏丹、班图尼格罗人，有机会比之更加封闭的科伊科伊人更早进入农业阶段（并由此带来人口数量上的优势）。

由于班图尼格罗人的原始位置较苏丹尼格罗人更偏南，后者的压力使之不得向赤道区迁徙。基于刚果热带雨林带的存在，从阿达马瓦山脉一带起程的“班图尼格罗人”，大体上沿着两条迁移路线扩张到了整个赤道及其以南地区：一条是沿雨林带的北沿向东渗透至东非高原，然后一路向南（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则为苏丹尼格罗人所据）；另一条则从喀麦隆出发，南向进入刚果河下游，并进而扩张至整个刚果盆地。班图人在这个方向所遇到的土著，是适应热带雨林气候的俾格米人。当然，这里说的两条路线都是主线。在族群迁徙过程中，往往是每个方向都会尝试的。比如说进入刚果盆地的班图人，也可能有部分是从东、北方向。

班图人的两个迁徙方向，也造成了其内部种族特征上的分化。分化出来的两种类型被称之为：刚果型和大湖－开普型（开普意指南非地区）。从这两个标签也可判断出二者所分布的区域。由于刚果盆地的俾格米人并没有对北方来者的种族特征造成太大影响，刚果型班图人在外观上与西非的苏丹尼格罗人差异不大；而从东非高原南下的班图尼格罗人，则在融合原居于此的科伊桑人过程中，种族特征出现了一定变化，其中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的肤色变浅。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可以适应很多恶劣环境，但趋利避害又是生物本能。从这个角度看，体质、技术和人口上更占优势的班图人南下，才是科伊桑人被迫选择在纳米布－卡拉哈迪沙漠周边地区生存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条副热带沙漠带整体位于非洲大陆的西南部，也造成了班图人和科伊桑人在南部非洲形成东西分立的局面。当然，这种分立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说科伊桑人和他们所生存的土地有能够

和东部对抗的资本。就像新疆、青藏、内蒙这几个生存环境相对恶劣地区，面积虽然占了中国领土的一半，但人口占比却不到 4% 一样。

## 第五节 葡萄牙人航行非洲南端的开普半岛

今天的纳米布沙漠以及卡拉哈迪沙漠西部归属于纳米比亚。这片干旱之地也是 19 世纪末，德意志第二帝国在非洲所开拓的殖民地之一，被称之为“德属西南非洲”。对于后发的德国人来说，他们能够在非洲西南完成这一布局，多少和科伊桑人的境遇类似（不重要的边缘之地）。当然，沙漠本身是没有什么殖民和贸易价值的，就像科伊桑人也不是靠真正生活在沙漠里一样。有鉴于此，德国人必须将控制范围向内陆延伸至卡拉哈迪盆地边缘的萨赫勒—热带草原地带，才能够体现“德属西南非洲”的价值。

19 世纪末，与德国人在卡拉哈迪盆地展开竞争的，还有在南非建立统治的英国人。由南向北渗透的英国人，在卡拉哈迪盆地扩张的殖民地，就是现在的博茨瓦纳。今天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人口都只有 200 多万。地广人稀的一个后果就是，各殖民国在此划分国界相当的随意。纳米比亚与安哥拉、博茨瓦纳之间的国境线，几乎完全就是沿经纬度进行切割，而这一现象在撒哈拉地区也是相当的普遍。

从真正殖民的角度（而不是贸易）来看，非洲的整体环境是让人沮丧的。通过考察全球人口分布与气候类型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四季分明、温度适中的温带气候区，如东亚；有季风润泽的热带气候区，如印度、中南半岛，都是农业发达和人口密集之地。不幸的是，非洲整体都不属于这两种类型。一提到非洲，大家的第一感觉应该就是“热”了。的确，这片大陆无论什么时候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都是一片骄阳似火的画面。横贯大陆中部的赤道地区（南北回归线之间），及其两侧的副热带高压带，是造成非洲整体呈现热带气候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陆南北两端沿海地区，才有机会呈现出四季分明类型的“亚热带”气候。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归属于亚热带气候，与我们在东亚感觉到的会有所差异。其中显著的区别就是“夏季干热少雨，冬季温暖多雨”。水和阳光是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两大要素，这种雨热不同期的现象显然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当然，通过选择适应这一气候条件的作物（比如地中海的油橄榄），这种影响并非没有办法克服。就像热带沙漠地区只要能够解决水源问题，充足的光照便很容易滋生出优质的绿洲来一样。

对于有相当领土处在地中海气候区的葡萄牙人来说，最让他们有舒适感的肯定不是热带气候区，而是地中海气候区了。在沿非洲西海岸航行 10000 公里后，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在大陆的最南端，横亘有一条东西长约 800 米、海拔 600—100 米的近海山脉：开普山脉，山脉南麓的沿海地区便属于地中海气候。南非首都开普



敦所处的“开普半岛”，以及半岛南端的好望角都位于此（行政上大体对应南非“西开普省”中南部），并且属于地中海气候区。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总面积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中海地带，也成为欧洲殖民者争夺的重心。19世纪初，大英帝国开始在此布局，并与先期殖民于此的荷兰人（布尔人）展开了长期博弈。尽管英国人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但从殖民角度来说，布尔人显然更为成功（成为了南非白人的多数）。

在荷兰人登上全球地缘政治舞台后，上述这段历史有更为详细的解读。就15世纪末的情况来说，发现印度洋为葡萄牙人所带来的兴奋感，要远远大于找到了一小块适于移民的土地。当然，前面也从技术上分析过了，迪亚士本人其实并不能准确证明自己发现了印度洋。为此，葡萄牙人需要一场准备更为充分的远洋行动，来迎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一使命最终落到了另一位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身上。公元1497年7月，也就是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后第十个年头，达·伽马所率领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并沿东非海岸北上最终抵达印度。

达·伽马的印度洋之旅，肯定将是后面的解读重点。然而在迪亚士和达·伽马两位葡萄牙裔航海家之间，这个世界却还有另一项更为惊人的地理大发现吸引我们将目光暂时从非洲和印度洋航线上移开。顺便说下，鉴于非洲的地理气候与中国人身处的环境实在差异太大，因此通过一些影视剧、纪录片来了解它的地缘特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最近上线的《泰山归来：险战丛林》（虽然评分不高），背景就是比属刚果的热带雨林。借助这段时间的解读，电影中雨林、草原、班图人等属地元素的设定，以及比利时（王室）野蛮殖民刚果的那段历史，都会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 第九章 哥伦布向大西洋以西探索发现美洲

### 第一节 哥伦布在西班牙资助下向西探索

从葡萄牙人抵达塞内加尔河口（公元 1445 年），到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公元 1488 年），葡萄牙人对黑非洲西海岸的探索已经过去了 40 多年。从地缘政治层面来看，作为伊比利亚半岛的大哥“西班牙”，很难做到不眼红葡萄牙人的成就并开始跟进。之所以一直没有大动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葡萄牙人在探索西非后不久（1455 年），就从教廷那里获得了博多哈尔角以南的整个非洲乃至东方的“主权”认定（特权令原文：“凡属业已征服或将被征服的地方，均应让与并归属国王阿丰索、王储及其继承者，自博哈多尔角至几内亚全部海岸以及整个东方，今后将永归国王阿丰索及其继承者享有主权。”）。

另一方面，我们概念中的西班牙此时实际还未形成。在西班牙统一进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卡斯蒂利亚，直到 1479 年才通过联姻的方式，与阿拉贡王国正式合并为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在此之前，能够对葡萄牙构成威胁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并没有余力去考虑遏止葡萄牙的问题。顺便说一下，卡斯蒂利亚王国通过联姻与阿拉贡王国合为一体时，葡萄牙王国本来也是预选对象的。抛开这个微观政治博弈不谈，从战略层面上看，如果葡萄牙不是及时抢在西班牙统一之前，开启大航海进程并取得了成功的话，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将几乎无可避免的被统一到西班牙的王旗之下。

西班牙的统一，不仅意味着摩尔人在伊比利亚最后的政治印记即将成为过去（公元 1492 年，格拉纳达陷落，西班牙光复运动结束），也意味着西班牙开始将重心放在海外领地的争夺上了。除了欧洲强国必争的地中海地区以外，西班牙也要寻找机会在大西洋上与先发的葡萄牙人展开竞争。然而对于急于清除异教遗产（不仅包括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的西班牙来说，此时非常需要来自罗马教廷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中央集权之路。因此，在教廷已经给葡萄牙所授予的特权令的背景下，西班牙不可能冒着与教廷决裂的风险与葡萄牙在黑非洲展开竞争，想要有所突破就必须另辟蹊径。

与葡萄牙人由恩里克王子组织，自上而下推进航海事业有所不同的是，为西班牙撬开海洋大门的是一个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哥伦布加入大航海事业并非一个意外。因为奥斯曼帝国对东地中海的控制，最大的受害者并不是那些热衷于权力斗争的欧洲王国，而是以贸易立国的威尼斯、热那亚两个海洋共和国，以及意大利半岛那些长期从贸易中获利的商业集团。数百年的地中海贸易史，使得意大利积累了大量航海技术和人才，在地中海贸易版图萎缩的背

景下，这些携带地中海航海基因的人才，需要寻找到另一个平台施展自己的才能，哥伦布就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

哥伦布能够发现美洲大陆的另一个背景，在于地圆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而哥伦布对此又深信不疑。基于这个认知，理论上只要一路向西，便可绕过奥斯曼帝国封锁，开拓前往东方的贸易线。当然，有没有人愿意前往一片未知的海洋探索，以及有没有人愿意冒险资助这场冒险之举，才是问题的重点。事实上，基于葡萄牙在非洲的成功开拓，哥伦布最开始寻求的赞助者并非西班牙而是葡萄牙。然而凡事都是利弊共存，经验和积累有时候并不一定成为继续开拓的动力，反而会成为创新的阻力。

以葡萄牙人在海洋上的积累来说，如果希望开拓向西的航线，其实也用不着让一个热那亚人来抢头功。尤其葡萄牙人早在1427年就发现了亚述尔群岛，由此向大西洋腹地推进了1400公里。只不过在非洲的巨大成功，使得葡萄牙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一片未知海域冒险。尤其是哥伦布劝说葡萄牙王室资助他的探险行动之后不久，迪亚士就为葡萄牙发现了好望角，富庶的东方以及新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算得上是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哥伦布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其它国家身上。

英、法等国也曾经成为哥伦布的游说方向。但随着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束，整个15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的重心都在内部的重新整合上。比如英国的两个皇族之间为了争夺王位，进行了一场著名的“玫瑰战争”（1455年至1485年）；法兰西则大体完成了法兰西王国的统一工作，重新控制了那些因英国影响而脱离王室控制的诸侯国。

最终成为哥伦布金主的是西班牙王室，尽管西班牙这一时期也在进行关键的内部整合工作，但葡萄牙近在咫尺的示范效应，显然对西班牙的心理影响要大得多。更何况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如果没有从海外获得的巨大利益，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几乎是一种必然。在不能向黑非洲扩张的背景下（除非跟教廷翻脸），哥伦布所提出的那条希望渺茫的新线路，在战略上就成为了西班牙可以为之一赌的救命稻草了。当然，与葡萄牙沿海岸线南行的探索相比，横穿茫茫大海去寻找一片欧洲人完全不熟悉的大陆要冒险得多。即使是在当时的西班牙国内，对是否要这样冒险也存在巨大的反对声。以至于一直有传闻说，资助哥伦布航行的资金，来自于当时西班牙女王的私房钱。

不管怎么说，哥伦布终于找到了资金和政治后盾，而西班牙也获得了一个开启大航海事业的契机，接下来要做的应该就是“一路向西”了。公元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满载货物和补给的船只，离开西班牙开始了他自己规划的东方之旅。不过船队最初的航向却并非向西而是向南。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会记得在15世纪初，诺曼人曾经为西班牙在摩洛哥西南方向获得了一个支撑点——加那利群岛。如果不是葡萄牙人先声夺人的垄断了黑非洲的探索权，加那利群岛本该成为西班牙南



向扩张的跳板。

虽然加那利群岛没有为西班牙的非洲事业做出大贡献，但在西班牙决心向西探索新航路之时，却仍然有机会充当前进基地。这是因为加那利群岛比之西班牙的经度位置，要更加深入大西洋（大约偏西 300 公里）。当你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海洋时，任何能让你缩短在未知海域探索时间的机会，都是不容放过的。另一个让加那利群岛成为航行真正起点的原因（经度还不行），在于哥伦布经过计算认为，只要沿着同纬度直线西行（也是最短的路径），他的船队可以抵达亚洲最东部的日本。据说哥伦布的计算依据，来自于马可·波罗的记录。当然现在我们会知道，与加利利群岛同纬度的，其实是当时琉球王国北部的奄美群岛。

错估日本位置本身并没有对哥伦布的航行造成影响。因为要是没有美洲大陆的存在，哥伦布此次航行将注定会失败。要知道，加那利群岛与琉球的直线距离将近 16000 海里。以哥伦布的准备工作的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横穿两大洋航行那么远的。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横亘着美洲，可以让哥伦布在未知海域的航程缩短到 3100 海里。实际上，即使这样也超出了哥伦布的预估。以至于在航行过程中，哥伦布不得不掩盖了许多事实（也就是撒谎了），以让水手们还有信心跟他一起去冒险。

经过 37 天的航行，哥伦布和他的船队终于发现了陆地的迹象。即使时间算不上很长，但在此之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已经让船队差点爆发一场叛乱了。假如哥伦布严格按照既定的“纬度航行法”，那么他最终所抵达的陆地，应该是今天美国东南角的“佛罗里达半岛”的中部。作为北美大陆在大西洋方向的一个明显突出部，佛罗里达半岛也是墨西哥湾水域与大西洋的地理分割线。问题是在海上航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最终让哥伦布率先看到的陆地，其实是佛罗里达半岛东南方向，加勒比海外围的巴哈马群岛。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巴哈马群岛和加勒比海对于大航海时代又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我们接下来再接着解读。

## 第二节 哥伦布在美洲发现的陆地

哥伦布的航海基因并非全部源自于意大利，毕竟在外洋探险与在地中海航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过在非洲大获成功的葡萄牙拥有非常丰富的航海文化，里斯本也成为了欧洲的航海中心。在开启东方探险之旅之前，哥伦布曾移居里斯本十几年，并通过参与葡萄牙的航海行动，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值（并一直试图说服葡萄牙支持他的计划）。由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葡萄牙错过新大陆的发现的确不是失误，而是一个战略选择问题。

从大历史的层面观察从古希腊人到哥伦布的航海之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从内海（地中海、黑海）到外洋沿岸航行（西非），再到横穿大洋的循序渐进过程。在

这个学习过程中，欧洲人积累了相当的航海经验。比如通过观察海上飘浮的植物、海鸟的飞行方向，哥伦布认定他所期盼的陆地实际并未位于既定路线之方向，并随之调整了航向。公元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终于踏上了美洲的土地，由此也牵扯出了一个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地缘标签：拿骚、加勒比、古巴、牙买加、海地……，说熟悉，是因为应该很少有人没有听闻过“加勒比海盗”的名字，尤其是在强尼·德普成功演绎过几部以此为名的系列电影之后。说到陌生，是因为除了那些在海盗题材作品中出现过的地缘标签之外，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熟悉它们的位置，以及在历史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不要紧，随着哥伦布的探险之旅，接下来将有足够的时间和历史事件帮助大家补一补这一区域的地缘知识。



哥伦布航海路线暨加勒比地区地缘结构图

先来看看，即将等待哥伦布发现的是一片什么样的陆地和海洋。大家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在北美大陆与南美大陆之间，因为半岛和群岛分割形成了两片半封闭



的陆间海：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对比大家熟悉的东亚的情况，这两片海区的地理位置、结构，与渤海－黄海有些类似。只不过由于地理、历史原因，墨西哥湾 / 加勒比海的地缘政治关系，要远比渤海 / 黄海复杂得多。

总的来说包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陆地分为三组，可将之归纳为：三片大陆、两个半岛，以及一个群岛。三片大陆指的是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在地理范畴里，一般会以巴拿马运河为界，将美洲划分为南、北两块。虽然单纯从地理角度来看，这个切割堪称完美，不过南、北美连接处的狭长地理形态，及其与加勒比地区的相邻关系，使之具备了成为一个单独地理单元的基础。结合彼此地缘特点，将墨西哥及其以北的美国、加拿大归入“北美”概念；南美大陆最北部国家哥伦比亚，及其以南地区归入“南美”概念；墨西哥与哥伦比亚之间的连接区，单独划分为“中美”板块，是最合理的地缘切割法了。目前在地缘政治、经济乃至体育领域，这也是个最普遍采用的归类法。比如在六个洲一级的足球协会中，“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就被打包入一个协会。

两个半岛指的是佛罗里达半岛和尤卡坦半岛，前者位于美国的东南角，后者则是墨西哥的最东端。二者与墨西哥湾的位置关系，相当于辽宁、山东两个半岛与渤海的关系。区别在于，中国因为同时拥有山东、辽宁两个半岛而将渤海实际变成了内海，而墨西哥湾则出现了美国、墨西哥南北对峙的情况。一个群岛则指的是位于墨西哥湾东南部，与尤卡坦半岛、中美洲、南美洲共同围就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这条从墨西哥湾口向东延绵至南美洲北部的岛链，内部又可以划分为三个次一级的岛链状群岛，包括哥伦布最先登陆的“巴哈马群岛”；西印度群岛的核心陆地区“大安的列斯群岛”；以及最东端蜿蜒至南美大陆北端，与整个委内瑞拉海岸线对应的“小安的列斯群岛”。

需要说明的是，通常人们认为哥伦布此行的目标是“印度”。这一认知的形成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即哥伦布错误的认为他登陆的地方是印度，甚至将包括巴哈马群岛在内的加勒比岛屿统称为“印度群岛”（后改称为“西印度群岛”，以与正确方向的印度群岛区别）。然而仔细研究哥伦布探索历程会发现，这一命名并不代表哥伦布此行的目标是印度。他在寻找的实际上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被蒙古人统治的中国。为此，西班牙王室甚至让哥伦布带上了写给蒙古大汗的国书，以期说服蒙古人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一起，夹击处在二者之间的穆斯林国家。

当然，哥伦布和西班牙人并不知道，蒙古人在东方已经失败了 100 多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朝统治之下。有此误解除了奥斯曼帝国阻断丝路，影响了信息交流以外，还因为此时的南俄草原还处在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基于寻找中国的目的，才使得中国的外围岛屿——日本，为了哥伦布计划中的第一站。只是在实际航行过程中，哥伦布的航线开始向南偏移，没有严格执行计划中的同纬度航行路线，导致其认为与日本及中国失之交臂。



尽管基于当时的认知条件，哥伦布学习到的一些地理知识有很多错误，包括关于日本的位置，欧洲与亚洲的距离等。但通过马可·罗等中世纪旅行者的记录，日本在中国的东部、印度在中国的南部这一位置关系还是很明确的。因此，当航线南移并发现一片岛屿时，哥伦布有理由相信，上帝将前往中国大门关上的同时，为他打开了通往印度的窗。

事实上对于哥伦布或者西班牙王室来说，找到的是中国还是印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为这次远航加上一层联络蒙古人夹击穆斯林的政治外衣，也只是为了让整个行动变得更加“正义”，以得到教廷和民意的支持罢了。就像葡萄牙人向世人宣布，他们的黑非洲探险之旅，主要是为了寻找“普莱斯特·约翰”国王的基督教国家（然后与之联合夹击穆斯林国家）一样。至于将中国而不是印度作为这次航行的目标，无非是因为中国位于印度的东方，从向西做环球航行的角度看，应该是先“发现”中国（包括日本）罢了。

从经济层面上，印度与中国这两个文明、富庶之地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印度出产的各种商品，如香料在欧洲拥有广泛的市场和高昂的价格。同时基于地缘位置的原因，印度对于夹击“穆斯林”国家这个伟大目标来说，也会更有价值。然而西班牙也许还需要考虑一下，如何为它与“印度”的交往也披上一层政治、宗教外衣。但作为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哥伦布来说，倒是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冒险动力就是为了寻找财富。在自认为发现印度之后，回到西班牙的哥伦布一方面敦促西班牙履行之前的约定（哥伦布享有其所发现每片陆地的总督权，并可世袭）；另一方面哥伦布战略性的调整了自己接下来的航行方向。在后来三次远航中，他放弃了向北继续寻找中国的初始目标，而是围绕着加勒比海进行对“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实际是中南美洲）的探索工作。

现在我们知道了，哥伦布的“发现”实际上是由一系列错误所导致的。不过哥伦布本人没有意识到这片陆地的属性，并不妨碍他成为新大陆的“发现者”；即使之前可能有维京人或者亚洲人曾经先一步抵达美洲土地。毕竟只有哥伦布的“发现”，才导致了一系列地缘政治层面的重大变化。有可能让人产生遐想的一点，倒是哥伦布如果严格按照既定线路和目标方向航行，他应该会在北美的佛罗里达半岛登陆，并将这个半岛认定为日本或者中国的一部分。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哥伦布接下来很可能在北美大陆进行探索，他所碰到的土著人也不会被叫作“印第安人”（印度人），而会被贴上“中国人”的标签。这一先入为主的认知，甚至可能导致哥伦布再发现加勒比海及所属群岛时，将之认定为“南中国海”及其所属岛屿（而不是印度群岛）。

说起来，从所谓“印第安人”的人种归属来看，哥伦布当年要是将之称为“中国人”，倒还更靠谱一些。不过欧洲人正确认识到印第安人的黄种人属性，实际要到20世纪了。在此之前喜欢用各种颜料涂抹身体的美洲土著，因其比亚洲黄种人感观上更深一些的外表，而长时间被列为单独的“红种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让哥伦布更加坚信他在加勒比地区看到的是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当然，哥伦布的错误认知，本身并没有对历史进程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错误很快被纠正了）。即使当初为印第安人和西印度群岛打上个“中国”标签，也无非是为今天中国键盘侠们再提供一点“政治”想象空间罢了。在欧洲视角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被发现对象无论是打上中国、印度，还是新大陆的标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先发现这片土地。

回到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问题上来。一般认为，哥伦布最先发现的陆地，是位于巴哈马群岛中部的“圣萨尔瓦多岛”，也有学者认为他最先登陆的是另一个岛屿。不管怎么说，哥伦布最先发现的美洲土地是巴哈马群岛是确认无疑的。于大历史和地缘层面来说，在这个拥有 3000 多个岛礁（包括 700 多岛屿，其中 30 多有人居住）的群岛中，考据哥伦布发现最先发现的是具体哪个点也没有特别的意义。巴哈马群岛整体的地理位置和结构，才是它进入地缘政治舞台的关键。

与巴哈马群岛及其首都“拿骚”（这真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译名）紧密关联的名词，是很多冒险故事的主角——海盗。历史上所谓的“加勒比海盗”正是以巴哈马群岛为活动基地，劫掠往来于此的商船（包括袭击殖民点）。然而在总面积 24 万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岛中，面积达到 21 万平方公里的大安德列斯群岛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地理概念中的加勒比海，也是由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与美洲大陆围就的。身处大安的列斯北部外围的巴哈马群岛，实际并不处在加勒比海的地理范围内。

无论是美洲的西印度群岛，还是亚洲的东印度群岛，岛屿的数量都是数以万计。尽管这当中能够提供人类生存基础的岛屿也数以百计，但有条件成为地区人口中心和地缘政治主角的，总归还是那些大岛。整个西印度群岛中最重要的陆地，是隶属大安的列斯群岛的四个岛屿，按面积大小排列依次是：位置最西端，与佛罗里达半岛、尤卡坦半岛呈三足鼎立之态的“古巴岛”（今属古巴）；位于古巴岛东侧，今由海地、多米尼加两国分治西东的“海地岛”；古巴东岛南侧的牙买加岛（今属牙买加）；以及群岛东端，海地岛之侧的波多黎各岛（今属美国）。

很显然，西班牙人在入主加勒比海地区后，上述四个大岛势必将成为其经营重心。也可以说，西印度群岛的主导权问题，取决于谁控制了大安的列斯群岛。在这几个主岛当中，面积最大，今天人口占西印度群岛 1/3（1100 余万）的古巴岛，地缘政治意义又尤其重大。我们甚至会发现，一定要为整个美洲找一个地理中心的话，身担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大西洋三大海区分割线的古巴岛，将是最合适的人选。有鉴于此，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为什么面积仅相当于中国江苏省的古巴，在冷战时期曾经搅动整个世界的神经了。

相比古巴岛和大安的列斯群岛，巴哈马群岛的体量就有些微不足道了。在有更多可供开拓土地的情况下，西班牙及后来在美洲竞争的欧洲国家，都没有把巴哈马

群岛做为殖民重心。然而对于海盗来说，巴哈马群岛的存在却又恰到好处。这西北－东南方向延绵 950 公里的岛链，不仅将大安的列斯群岛的海岸线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下，更是完美的封堵了进出墨西哥湾的海峡：佛罗里达海峡（佛罗里达半岛与古巴岛之间）。也就是说，以巴哈马群岛为基地的加勒比海盗们，不仅能够对加勒比海地区殖民点构成威胁，同时也能够从北美和墨西哥湾地区的对外贸易中获利。鉴于加勒比海盗的故事是如此的吸引眼球，接下来我们也将对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地缘结构和历史，做进一步解读。

### 第三节 哥伦布结束在美洲探索返航

在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中，他的船队从巴哈马群岛中部穿越，然后探索了古巴岛和海地岛的北部，并接触到了居住于岛上的土著印第安人。对于这些外来者，大多数土著人抱以了友好的态度。就像很多不常有外来访客的偏远农村，会把每一次访客的到来当成一次节日一样。当然，这期间也有不信任这些外来者，并与之进行武力冲突的部落。不过潘多拉的魔盒既已打开，在文明层级上与西班牙人差着几级的印第安人到底是什么态度，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班牙人准备怎么处理这些“无主”之地。

在接近海地岛时，哥伦布的一艘船因操作失误搁浅。公元 1493 年初，哥伦布决定结束这次探索，回到西班牙复命（同时也是急于索取他应得的报酬）。顺便说下，由于剩下的船只不足以载回所有的船员，部分船员（39 人）自愿留在了海地并建起了一座临时据点。在岛上寻找梦想中的黄金，是这些船员选择留下的直接原因。悲剧的是，几个月后哥伦布率队再次回到这里时，这些船员已经被土著居民所消灭。不过比起西班牙人后来将要对印第安人所做的一切，这种阻止外来者入侵的做法，其实算不上过分。

在回程的过程中，哥伦布还是希望采取同纬度航行法，即先向北航行到北纬 28 度线附近，然后再向东航行至加那利群岛。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通过测量固定时间点的太阳与海平面之间的夹角，欧洲航海者已经能够准确判断出地球的纬度了（经度还不行）。航海者们也为此发展出了各种测量工具，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六分仪（哥伦布时代还没有）。顺便说下，由于要具体测量时，需要单眼对着强烈的阳光，势必对视力造成一定影响。由此也产生了一种说法，即海盗传说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眼龙”形象，便是因此而产生的。不过独眼海盗的形象如此普遍，其实并不大可能是被太阳晒瞎的，更有可能是因海盗的职业属性所造成的。

对于求财的海盗来说，即使火力足够强大，也不会谋求将对手击沉，而是会寻机跳帮解决对手。在对手殊死抵抗的情况下，战斗往往会从甲板延伸到底舱。由于甲板上下光照条件差距巨大（战斗基本都是在白天进行），海盗贸然闯入的话，



眼睛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黑暗，势必会给潜伏的对手以可乘之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有些海盗在跳帮接战之时，会先遮盖住一只眼睛，在进入底舱战斗时，再使用这只提前适应黑暗的眼睛。由此也造成了海盗中多独眼龙的印象。

在哥伦布时代，暂时还不用考虑海盗的问题，他最需要防范的其实是葡萄牙人。我们知道，葡萄牙人早在1455年就从教皇那里取得了博哈多尔角以南地区的探索权。对于这一点，西班牙的前身“卡斯蒂利亚王国”自然是相当的不满意，尤其是它早在公元1420年，就在诺曼人的帮助下取得南下航线最重要的跳板——加那利群岛主权的情况下。为了在黑非洲分一杯羹，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甚至海上军事冲突。事情的转机出现了公元1479年，为了顺利与阿拉贡王国合并（葡萄牙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西班牙同意加那利群岛以南各项权利归属葡萄牙。同时葡萄牙也退出之前在戈梅拉岛（隶属加那利群岛）建立的据点，承认西班牙对加那利群岛的主权。

在教廷的主持下，西、葡两国就上述内容（以及我们不关心的王位归属问题）签订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这份划定西葡两国海上势力范围的文件，不仅是航海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第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甚至也可以被认定为国际法的开端。由于加那利群岛的南线大体在北纬28度左右，根据这份条约的规定，在这条线以南所发现的土地，理论上都应该归属于葡萄牙。当然，从条约签订的初衷来说，并没有考虑到新大陆的发现问题。葡萄牙人通过条约所谋求的，实际是黑非洲及由此延伸的印度的探索权（其实印度北方也在这条线北边）。而西班牙和哥伦布之所以把最初的探索目标设定为中国，也有考虑到中国会在北纬28度线北边的因素。

很显然，单纯的以一条纬度线切割未知世界，会带来诸多的后遗症。最起码哥伦布现在阴差阳错的发现了“印度”，一定会让葡萄牙人有所异议。这一点，哥伦布本人也很清楚。不过这并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要做的是尽快在不让葡萄牙人发现的情况下，将消息报告给西班牙王室，然后让西班牙去和教廷、葡萄牙交涉。在回到西班牙后，哥伦布又分别在公元1493年9月——1496年3月；1498年5月底——1500年底；1502年5月——1504年11月，先后3次（总计4次）从西班牙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前往加勒比地区探索，并都安全回到西班牙。

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普遍认知来说，横穿大洋之举可以说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哥伦布西行前5年（公元1487年），葡萄牙曾经派出过两名航海家从亚速尔群岛出发西行。这次探险倒不是为了寻找亚洲或者说新大陆，而是葡萄牙人相信在亚速尔群岛西面应该还有一组群岛（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并将之称为“安提利亚”。鉴于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述尔群岛渐次向大西洋腹地延伸现象，葡萄牙人相信在亚述尔群岛西面还可能存在一组群岛也属正常。如果有哥伦布的运气的话，葡萄牙人按照这个航向应该是很有机会发现北美大陆的。然后残酷的现实却是，派出去远航的船队却再也没有回来。探索臆想中的“安提利亚岛”之举唯一

的贡献，应该是在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后，给西班牙人为之命名时提供了灵感。西印度群岛中的大安的列斯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统称安的列斯群岛）的名字，便是来源于“安提利亚”。

对比葡萄牙人探索的失败，哥伦布能够一次成功，并且接下来成功数次验证航线的可行性，应该说是相当的成功了。这一切难道都只是因为上帝更加眷顾西班牙人吗？西班牙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但我们肯定是要找出背后原因的。参照所附的《哥伦布美洲之旅示意图》会发现，哥伦布的每一次航行，在大方向上都是遵循着从加那利群岛先东南向驶往加勒比海，在考察完毕后再西北向直接返航西班牙本土，整个航线呈顺时针状。造成这一航线特点的，就是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气候现象——信风。



哥伦布航海路线暨加勒比地区地缘结构图

信风指的是在低空从副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地区的风。在之前的解读中，信风也是造成包括撒哈拉沙漠在内的副热带沙漠带的重要原因。南北纬  $5^{\circ}$ — $25^{\circ}$  一带，是信风活动的范围。信风带在这个低纬度范围内，周期性南北移动位置。不变的，是信风吹动的方向。在地球偏向力的影响下，北半球的盛行的是从东北方向刮向西南的“东北信风”。正是这一风向，将北非大陆的水汽带离了大陆。当然，有人失意就有人得意，信风也同时为大西洋西侧的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东侧输送了大西洋水气，使之成为了降水丰沛之地。

固定时节的固定风向，也为试图横穿大洋的航海者提供了便利。包括哥伦布、麦哲伦，以及诸多海洋贸易者，都很好的让自己成为了信风的受益者。为此，信风

也被形象的称之为“贸易风”。与后来那些掌握规律，主动利用信风航行的航海者不同的是，哥伦布的信风之旅实际上是误打误撞。从北纬 28 度的加那利群岛出发的哥伦布，在行程近半时再循着风向南调整航向，恰好使自己的船队置于东北信风带中。意识到这点的哥伦布，在后来的 3 次航行中，都会主动先从加那利群岛向南进入信风带，让“天”帮助自己到达“印度”。

如果哥伦布所遇到的只有东北信风的话，那么他回程时将遇到很大的障碍。不过球状的地球并不只有一个风带，大体上南北半球各存在三个相对应的风带。以北半球的情况来看，除了低纬度区的东北信风带以外，还有中纬度的西风带（核心区在 35 度—60 度之间）、高纬度的极地东风带，再加上一个南北纬 5 度之间的“赤道无风带”。整个西欧大陆都处在西风带的润泽之下，这也是为什么同纬度的情况下，欧洲的气候要比亚洲东部更为温润的根本原因（以纬度计，伦敦的位置相当于黑龙江北部了）。

由于发现的“印度”位于加那利群岛之南，哥伦布在回程过程中，决定先向北航行至 28 度线附近，然后再寻找合适的风向向东航行。这一歪打正着的决定，让好运再次降临到哥伦布身上。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从西印度群岛启程向北航行的哥伦布，正在向着顺风的西风带前行。事实上，哥伦布的运气实在更好些，在北纬 30 度的时候，他的船只就遇到了西风，遂调整航向向东航行。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从亚速尔群岛（北纬  $36^{\circ} 55'$  —— $39^{\circ} 43'$  之间）出发西行的葡萄牙人，想要发现北美大陆的可能性有多低了。如果在与西风抗争的过程中再遇到风暴，那么等待他们的结果将更加悲惨。

顺便说下，哥伦布的船队是在波多黎各岛东北方向开始转而向北航行的。如果接下来一直严格向正北方向航行的话（而不是向东北方向偏移），那么哥伦布很可能在遇到西风时看见一片西太平洋腹地唯一的陆地——百慕大群岛（北纬 32 度 14 分至 32 度 25 分，西经 64 度 38 分至 64 度 53 分）。十年之后，西班牙人还是发现了百慕大（现为英国属地）。吸引我们目光的倒不是这个群岛本身，而是传说中的“百慕大三角洲”。所谓“百慕大三角洲”又叫“魔鬼三角洲”，一般指的是百慕大群岛——佛罗里达半岛——波多黎各岛之间的海域。关于这个区域的传说，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至于到底有几分真实性，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诸多船只、飞机在此失事，并不会在这里通通解读。只能说如果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哥伦布将所想象中的“印度”，而不是“中国”调整为探索方向，倒是恰巧避开了这个危险之地。

西风固然为哥伦布的回程提供了极大便利，日后哥伦布和其他航海家也可以利用这点穿越大西洋和其它大洋，但风力却不是航海者们所能掌控的。在回程过程中，哥伦布就因为风暴的原因，有两次不得不在葡萄牙的领地避险（亚速尔和里斯本）。只不过，哥伦布既然有手段用隐瞒航程、航向的方式，稳定住失去耐心（甚至差点暴动）的船员，自然也有办法让葡萄牙人以为他的航行失败了。虽然这点小插曲没



有影响到哥伦布的计划，但很显然，在西班牙公布哥伦布的发现后，葡萄牙一定会有所动作。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四节 西班牙和葡萄牙以教皇子午线分割世界

一切都如西班牙人所担心的那样，哥伦布的发现结果一经公布，葡萄牙方面极为不满。葡萄牙人认为根据《阿尔卡索瓦斯条约》的约定，加那利群岛同纬度以南已探索或未探索的土地，都应该归属于葡萄牙。问题在于这个条约的签订，实际只是在帮助葡萄牙垄断黑非洲的探索权。如果将权利向西无限延伸的话，对西班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所谓“国际法”更多是政治博弈的妥协。法律层面能做的，本质只是让结果变得有章可循罢了。在大环境未变的情况下，这些条约一般能得到有效执行。一旦条约所适应的基础环境出现大变化，就势必会再陷入一场新的博弈，以磨合出新的规则来调整彼此的关系，现在西班牙的发现就是如此。基于前往印度和东方的航线所蕴含的无限经济空间，西班牙绝对愿意以一场全面战争为代价，与葡萄牙人争个长短。

战争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最起码葡萄牙肯定也没有把握战胜西班牙。尤其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未知的土地等待西、葡两国去开发，还没有到需要争得你死我活的地步。两国需要的是一个有资格充当调解人的第三方。很显然，罗马教廷将是最佳人选。对于罗马教廷来说，利益是它希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的最大驱动力。从公元6世纪起就开始推广征收的“什一税”，让教会能够从天主教徒的所有收益中获利10%。这意味着，只要葡萄牙和西班牙坚定承认自己天主教国家的身份，无论他们谁在未知世界的扩张，对教廷都是有利的（注：什一税的依据是《圣经·旧约部分》中写到的，利未记27:30-34：“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杖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假如教廷一定要偏向于葡萄牙的话，那么它很可能看到的情况就是西班牙脱离天主教体系。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无论哪个宗教都存在有否定权威、试图另立教派的情况，天主教也不例外。至于说那些一开始被定为异端的教派能不能成事，就要看它在政治上是否有利用价值了。在15世纪末，摆脱罗马教廷控制以自成体系（尤其教会还掌握了大量地方财富），已成为很多地区的政治需求，并在16世纪酿成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伊比利亚双雄在海外扩张道路上的先发优势，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个动力。一些后发国家希望借力宗教改革，绕过海外扩张道路上的法律障碍。在后面的章节中，结合荷、英等国的崛起之路，这部分内容也将展现。

就西班牙的情况而言，天主教的存在对于它洗牌这片刚刚统一、地缘结构复杂

的土地有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在很多地区希望摆脱天主教意识形态强力干政的情况下，西班牙人却可以利用天主教会的高度组织性，来“洗白”这片被异教徒控制了好几百年的土地。维持教会权威和缴纳利益分成的前提在于，教廷也需要积极维护西班牙的利益（而不是偏袒葡萄牙）。简单点说，只有西班牙觉得自己“接受”教廷庇护所获取的收益大于付出时，这种合作关系才能持续。在这种权衡下，西班牙的发现几乎马上被教廷所承认，并在葡萄牙提出异议之后，教廷亦迅速开始了调解工作。

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后的第二年（1494 年），在教廷的主持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历史上第一份瓜分世界的条约——托德西拉斯条约（之前的《阿尔卡索瓦斯条约》主要是为葡萄牙划势力范围）。条约的核心内容，是以一条南北向的“子午线”（经度线）来纵向切割世界。子午线以西的殖民权、传教权归属西班牙，以东则归属于葡萄牙。具体位置则被认定在佛得角群岛以西 100 里格（合 300 海里，约 555.6 公里）处。由于是在教皇主持下划定的，所以也被称之为“教皇子午线”。

在茫茫大洋中选定这样一条分割线的依据在于，它可以把葡萄牙最西方的领地“亚速尔群岛”划定在归属葡萄牙的东部。当然，这是一条划定未知土地探索权的分割线，像西班牙已经占据的加那利群岛，权利并不会因此而移交给葡萄牙。就当时已知的世界来说，这样一条分割线完美的解决了双方的矛盾。葡萄牙能够安心开拓他们沿非洲海岸线南下，通过印度洋的航线。在已经发现好望角的情况下，这几乎是唾手可得的成果；西班牙也可以在不受竞争的情况下，搞清自己的发现是不是印度。

然而对于地圆说的支持者来说，应该很难认为这样一条画在平面上的线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从技术上看，东、西两个探索方向，终有一天会在地球的另一面发生冲突。后来在麦哲伦的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后，这一矛盾便凸显了出来，以至于伊比利亚双雄不得不坐下来再次为地球“画线”。只不过当时的问题在于，教廷与“科学”几乎是对立的存在，你很难让教廷从地圆说的角度去认知世界。所以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说，先让教廷在大西洋划条中分线才是当务之急。

不管怎么说，西、葡两国都有了自己的海外扩张方向，并且看起来暂时没有发生冲突的风险。葡萄牙的下一步任务是绕过好望角，开启通过东方之路。这项历史使命，被交给了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航海家——达·伽马；西班牙人则希望哥伦布能够进一步的搞清他的发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哥伦布又花了 11 年时间（公元 1493 年—1504 年）围绕着加勒比海与西印度群岛进行了三次探索工作。这期间，除了对加勒比海上的三组群岛进行了考察（并设立殖民点）以外，哥伦布还在第三、第四次远洋中，登陆了南美洲北部今委内瑞拉海岸，并沿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岸进行了航行。

这些围绕加勒比海的探索行动，不仅让西班牙人真正登陆了美洲大陆，也让欧

洲人第一次知道（通过中美洲土著）狭长的中美洲地峡之西还存在另一片海洋。然而就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印度”这一点来说，这些工作可以说是毫无益处。尽管哥伦布坚持他的发现是“印度”，但大多数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毕竟自亚历山大时代起，欧洲人对于印度的文明和富庶就已有所了解。如果说“印度群岛”上那些尚处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还能用他们处在印度大陆（文明）之外来解释的话，那么随着无法绕过的中、南美洲大陆的发现，这片未知大陆属于“印度”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毕竟哥伦布从陆地上带回欧洲的印第安人，还是那么的“原始”。

事实上，哥伦布自己可能也已经对此有所怀疑，不过让西班牙王室相信他所发现的是印度，比之告诉金主自己只发现了一片原始之地，在经济、政治、宗教上的意义要大得多。不幸的是，在哥伦布进行第三次探索之时，葡萄牙方向传来了一个巨大的打击——真正的印度被“发现”了。



## 第十章 达·伽马在南部非洲东海岸的探索

### 第一节 南非班图斯坦制度形成的背景

由于西班牙的参与打破了葡萄牙一家独大的局面，15 世纪末、16 世纪初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黄金时代。基于“谁发现，谁占有”的原则，这些发现不仅对西、葡两国瓜分世界具有重大意义，亦对后世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按照时间线来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理解中间的因果关系。

哥伦布的发现，让初登大航海舞台的西班牙迅速抢得了足以与葡萄牙相媲美的成果。由于哥伦布宣称他发现的是印度（尽管很多人怀疑），无疑给一直在寻找印度的葡萄牙以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葡萄牙开始着手准备在印度洋的探索之旅。不过最终被选中执行这次任务的，并不是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而是另一名出身航海世家的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基于发现印度的意义是那么的重大，达·伽马的知名度要比迪亚士更大。不过迪亚士也并未就此从大航海舞台上消失，这个发现好望角的葡萄牙航海家，很快又亲身参与了另一项重大地理发现（后面会有所解读）。

公元 1497 年 7 月初，达·伽马率领由 4 艘船组成的船队，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踏上了寻找印度之旅。得益于迪亚士和之前数十年诸多葡萄牙航海家对非洲西海岸的探索，达伽马用了 5 个多月的时间就抵达了好望角，并于当年的圣诞节抵达今天南非东北角的“夸祖鲁－纳塔尔省”。这个南非省份在 1994 年之前的名字还是“纳塔尔省”，而纳塔尔之名正是由达·伽马所取，意思就是“圣诞节”。欧洲航海家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为他们“发现”的陆地命名实属常态。这片土地能够引发我们兴趣的，是它名字变化背后的地缘政治变迁。

通常情况下，一个组合式的地名意味着这片土地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行政主体拼合而成的。如果说纳塔尔这个名称属于白人的话，那么“夸祖鲁”则指向的是南非最知名的黑人民族——祖鲁族了。英国征服南非的过程中，曾经的“祖鲁王国”是土著酋长国中抵抗最为激烈的一个（详见“祖鲁战争”）。在现在的“夸祖鲁－纳塔尔省”中，祖鲁族的人口占比达到 7 成。更为重要的是，祖鲁族只是南非班图黑人中的一员。在南非的土地上，班图裔黑人的占比要更高，达到了将近 8 成。

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曾经解读过，从赤道地区向南迁徙的班图人，主要是从刚果盆地以东的“东非高原”南下，向南迁徙至南非地区的。受此影响，原先分布于东非高原的科伊桑人则被迫向西部干旱地区迁徙，依靠纳米布、卡拉哈迪沙漠的庇护得以幸存。班图人能够压倒科伊桑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及体质上的优势。尽管后来欧洲殖民者（主要为荷兰人、英国人）能够在南非最南端，受开普山脉保护

的沿海地区殖民成功，但在北部的热带草原地带却始终还是那些非洲原住民更占优势。

很显然，这样的人口结构会让南非白人产生很大的不安全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南非的白人统治阶层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在境内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并在独立（1948 年）后以法律的形式将之制度化，这一制度的核心就是所谓的“班图斯坦制”。祖鲁族等班图语黑人民族，各项权益被限定在 10 个原住民自治区中（显然都是一些贫瘠的土地），这些自治区被称之为“班图斯坦自治区”。即使这些黑人实际并未生活在自治区，而是在白人区工作、生活，也不享有南非公民权。“夸祖鲁”就是其中一个班图斯坦自治区，也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所谓“夸祖鲁-纳塔尔省”，实际上便是将之前的“夸祖鲁自治区”与白人治下的“纳塔尔省”合并而成的。

班图斯坦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将黑人彻底从南非分离出去，以建立一个纯粹由白人所有的“南非”。基于这个目的，南非白人甚至愿意在国土上分割出一个个飞地般性质的黑人独立国家。在极为重视土地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以土地换控制权”的做法似乎很不好理解。然而考虑到无论是技术上（黑人人口太多），还是国际环境，20 世纪中后期的南非白人，都没可能用种族清洗的文式来“净化”南非。同时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南非，又必须推进以普选权为核心“普世民主”制度的大背景，南非白人这种做法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同为前英殖民地的印度，愿意看到穆斯林占主的巴基斯坦、孟加拉独立出去；马来西亚逼迫华人占主的新加坡独立，其实都是源自这种思路。只不过，南非白人在南非的占比实在太小（不到 10%），所图谋的土地又太大（占南非总面积的 87.3%），使得国际舆论很难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很多人在看南非地图时，会奇怪为什么南非的国土内会存在一个飞地性质的“莱索托”，以及一个 3 个半方向（仅西北与莫桑比克接壤）被南非包围的“斯威士兰”。通过上述解读，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明白，让斯威士兰人、巴苏陀人（莱索托原名“巴苏陀兰”）这两支班图黑人土著建立自己的国家，其实才更符合南非白人的利益。只不过，最终南非白人再想复制 10 个类似黑人独立国家的战略构思，最终并没有实现。经过南非黑人的不断抗争，1994 年成为一个特别的年份。在这一年，南非结束了实行将近半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同年，曼德拉成为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至于这个变化是好是坏，不同的人、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解读。

## 第二节 南部非洲在地缘上的覆盖范围

对于葡萄牙来说，南非以及它所处的地缘板块，都只是前往印度时所必须“绕过”的一片陆地。南非的殖民历史，更多的是由后来崛起的荷兰、英国来创造的。所以等这两个国家登上大航海舞台后，通过他们之间的博弈（包括与班图黑人部落间的战争）来解读南非内部地缘结构是最为合适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跟随着达

伽马的航线，从更高层面来审视一下南非及其所属板块的地缘政治空间。以南非本身的基本面来说并不算突出，122 万平方公里土地，5200 万的人口，即使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在全球范围内也不过是个 G20 里的二线国家水平。然而实力这个东西，除了考虑绝对值还要考虑相对值。放在非洲这个整体实力偏弱的环境里，南非的综合国力就能够排第一了。以至于它能够代表非洲，加入已经明显带有地缘政治俱乐部性质的“金砖国家”。

随着葡萄牙人的探索脚步，西北非（马格里布）、西非、中非三个地缘板块，已经相继被解读过了。尽管以国境线为标准的地缘政治划分法，与严格按照地理标准划定板块的方法之间，总是不可能完全吻合（就好像东亚的中国实际拥有部分中亚土地一样）。但通过之前的解读，最起码大家已经清楚了在这些板块里，哪些是核心国家，哪些国家在地缘位置上实际具有双重属性（并因此成为缓冲之地）。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说，“南非共和国”无疑是所在板块的核心国家，这使得它在为自己贴上“南非”标签时，比用同样思路取名的“中非”要有底气得多，也由此成为了我们在非洲南部关注的重心。

只是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困扰，那就是把地理、地缘上的南非，与政治上的“南非共和国”概念想混淆。为此，接下来地理、地缘上范畴内的“南非”，会用“南部非洲”这个概念以示区别。当然，“南部非洲”的概念有时也会用来泛指撒哈拉以南的整个黑非洲地区。如果南非有能力在整个黑非洲鹤立鸡群的话，以撒哈拉为界将非洲切割为南、北两部分会更有现实意义。现实的问题在于，南非虽然已经成功通过加入金砖国家俱乐部，勉强跻身于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中心，但以其过于偏南的位置和硬条件来说，不仅没有可能将影响力延伸至各方面属性完全不同的北非，甚至也没有可能成为黑非洲的唯一代表。为此，需要从地理、种族、文化等基本面研究“南部非洲”的地缘影响力可能延伸至哪里，或者说“南非”可能向外圈定的地缘利益边缘到底在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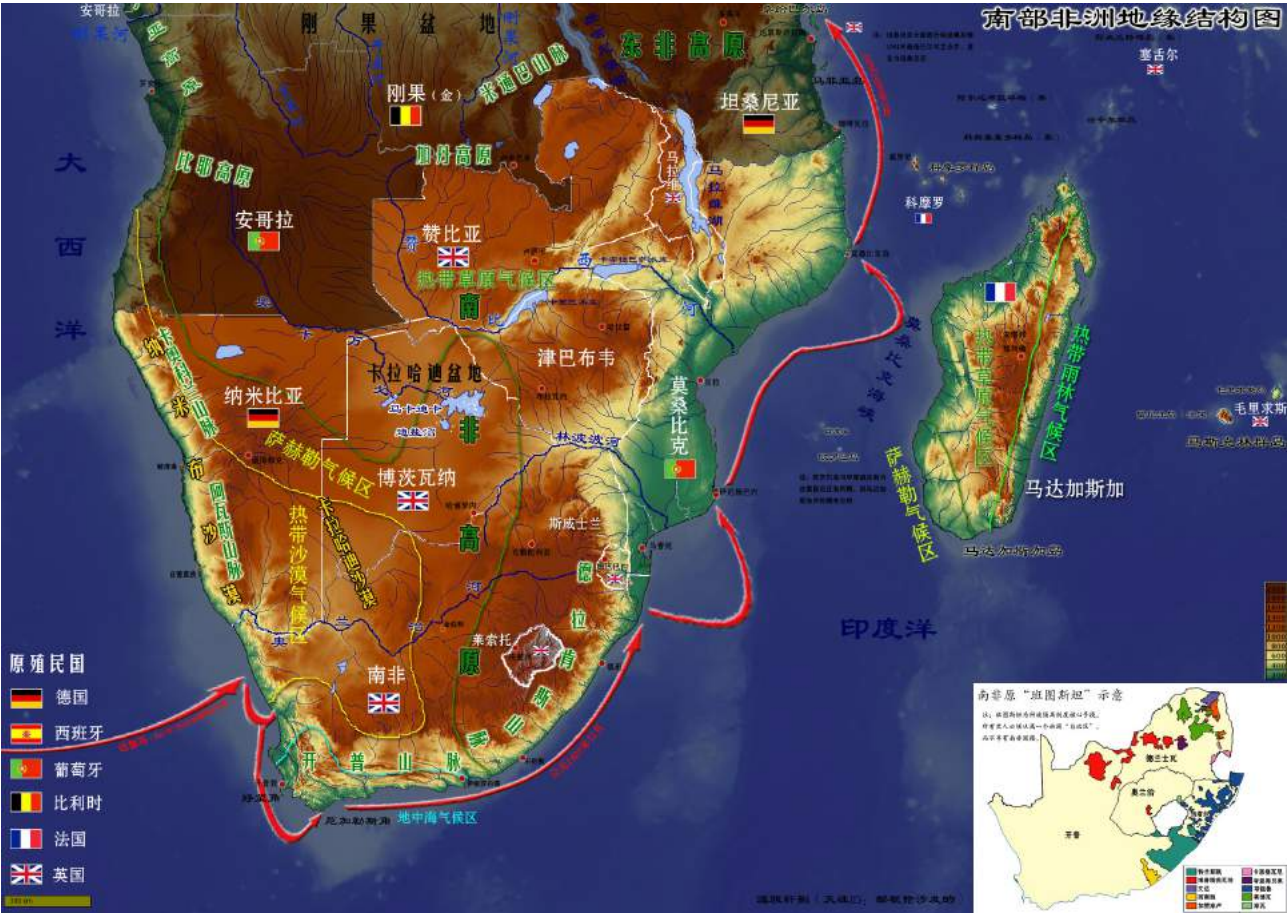
每一片大陆都有它的基本地理特点，如果说欧洲是一片“平原大陆”的话，那么非洲就是一片“高原大陆”。至于亚洲，由于青藏高原“世界屋脊”般的存在，使得整个大陆的结构，大体上有如美洲玛雅文明的“阶梯金字塔”般的存在，将之称之为“阶梯大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归纳方法，每片大陆内部依然会有高低差。就好像欧洲大陆总体算是“平原大陆”，却也有如阿尔卑斯山系这样的屋脊存在一样。非洲这片“高原大陆”也是如此，在其内部，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走势。其中分布于东、南方向，从红海向南一直延伸至厄加勒斯角（非洲最南点）北部的这条高原带，又可从北向南划分为三大块：埃塞俄比亚高原、东非高原，以及南非高原。当下所解读的“南部非洲”板块，对应的正是最南端的“南非高原”。

南非高原位于刚果盆地－东非高原之南，所涉及到的非洲国家（大陆部分）包



括有：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莱索托、斯威士兰等 11 个国家。这其中需要参考的另一个地理参数是水流的方向。由于高原的北麓是在为刚果盆地供水，北部边缘隶于刚果河流域的高地，地缘上会更容易与刚果盆地融合，并因此被归于“中部非洲”。依照水系原则来解构中、南非地理分割线的话，可以得出一个标准：河流流向偏北（包括西北、东北）的区域属于地理中非；河流流向偏南（包括西南、东南）的区域属于地理南非。

分水岭原则可以说是行政区域划分中最重要的原则。这一点也很好理解，生活在同一水系的族群总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并因此而产生共同点。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标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会有些横跨两大流域的行政板块存在，以为缓冲。在中部非洲，曾经叫“法属乌班吉夏利”的“中非共和国”就是典型案例。其北部属于乍得盆地水系；南部则归属于刚果盆地水系。在中、南部非洲之间，也有类似的跨界国家存在，它就是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



南部非洲地缘结构图

安哥拉的北部为刚果河流域所有或从属（在盆地边缘独流入海）；至于南部河流则汇入从非洲东南入海的赞比西河（南部非洲最大河流），以及南非高原中部的卡拉哈迪盆地（最终内流为马卡迪卡迪盐泽）。北部算是中部非洲的一部分，南部

则是南部非洲的地理边缘。单纯从流域面积比来看，安哥拉的南北方算是基本平分秋色，然而在地缘政治划分上，人口分布才是最值得参照的数据。中国被划为东亚国家，是因为它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东亚板块，即使整个中亚都归属于中国，也不会改变原本的地缘政治属性。安哥拉的情况也是如此，整个国家 2500 万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北部省份中。南部那些归属于“南非高原”水系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口不足 200 万。

很明显，即使不考虑安哥拉北部与南非（共和国）之间所间隔的是类似大片撒哈拉沙漠这样的荒漠化土地，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也会使得安哥拉人更多把自己的命运与刚果地区国家捆绑在一起。有鉴于此，曾经被称为“德属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才是南部非洲板块最西北部的国家。同时又因为南部非洲西半部的气候以热带沙漠气候区为核心，南非的地缘政治空间，实际上在于达·伽马即将探索的非洲东南部。我们接下来的任务，也就是补足“南部非洲”板块中这缺失的东南拼图。

事实上，即使没有可能考虑上述地缘政治因素，达·伽马本人也会对非洲东南海岸抱有更大的热情。这不仅仅是因为绕过好望角之后就意味着打开了通往印度的大门，还因为对于航海者来说，西南非洲的海岸线实在是一条恐怖的“骷髅海岸”，以至于达·伽马这次南行时，并没有像迪亚士上次那样沿海岸线南下，而是在大西洋腹地绕了一个大圈子。至于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样做的技术背景又是什么，后面在解读巴西的发现过程时，会揭晓答案。现在的话，我们还是跟随着达·伽马的航线，先去探索一下之前内容没有触及到的“东南非洲”。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人烟稀少、资源缺乏的西南非洲海岸线，固然让人非常失望。但机遇永远与风险并存，富庶的非洲东海岸并不只有令人垂涎的资源。在达·伽马怀着激动心情在南非东北部的纳塔尔试过圣诞节后，接下来他和他的船队将遇到此行中最大的挑战。

### 第三节 南非高原的地理结构

最近一直都有朋友在推荐《釜山行》，虽然我个人是不喜欢看丧尸片的，不过“存在即是合理”。一部电影成为现象级事件，必然不会只是懂得“吓人”那么简单的。于是借中秋假期，选了个阳气最盛的午间和家人一起看过。这部片子所揭示的道理并不复杂，相信看过的人都能体会到，那就是最可怕的不是“丧尸”而是人。地缘研究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是以地理、环境为重，但这些都只是基础。重要的还是在于“人”怎么去适应、利用这些条件，以在竞争占得优势。同样基于这个道理，葡萄牙人在航行中可能遇到的最大挑战也并不是环境，而是有可能阻止他们前行的“人”。那么继续北行的葡萄牙人，将可能接触到什么人呢？

水是生命之源，以水系、降水量分布来切入，能够更宏观的揭示人类在某一片



土地的分布特点。就南非高原的情况而言，降水量由东向西呈递减状态，直至出现纳米布沙漠那样的极端气候区。而以水系来说，南非高原主要有四大水系，由北至南分别是：发源于安哥拉、赞比亚境内，沿安哥拉 / 赞比亚 / 博茨瓦纳 / 津巴四国边境东行，最终从莫桑比克中部流入印度洋的赞比西河；发源于安哥拉南部，穿越纳米比亚东北角，注入卡拉哈迪盆地腹地的奥卡万戈河。与绝大部分内流河一样，作为南非高原腹地的低点，卡拉哈迪盆地中央也汇集、蒸发而成了一个咸水湖——马卡迪卡迪盐沼（博茨瓦纳境内）；第三条河流是发源于博茨瓦纳、南非相接处，沿博茨瓦纳 / 津巴布韦与南非边境线东行，从莫桑比克南部注入印度洋的林波波河。最南端的一条，则是横贯南非高原中北部，由南非、纳米比亚相接处西行入大西洋的奥兰治河。也就是说南非高原中北部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南部地势则为东高西低。

很显然，位于中部的奥卡万戈河 - 马卡迪卡迪盐沼，在人口上不会有什么潜力。今天这一流域的人口数量（安哥拉南部，博茨瓦纳北部）不过百万。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南非最大的河流——奥兰治河流域。在温带地区，一条河流的下游往往意味着更大面积的冲积平原、更好的农业条件，以及滋养更多的人口。然而奥兰治河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副热带高压以及信风（南半球为“东南信风”）的影响，南非西北部的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200 毫米，气候上与纳米比亚沿海一样，属于高蒸发量的“热带沙漠气候”（但没有那么极端）。这使得奥兰治河中下游（南非 / 纳米比来边境段）支流稀少，并导致冬季经常断流。反应在人口上，就是南非在此建制的“北开普省”，人口甚至不足百万（占全国人口 2%）；而这个省份的面积，却占到了南非国土的 30%。

如果奥兰治河最终没能夺路而出，注入大西洋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成为像奥卡万戈河那样的内流河。不过奥兰治河能够出海，根本原因其实倒不在于地势（地势的话，奥卡万戈河东部更容易突破），而是在于东南方向的高地区降水充足，能够使它的下游河道经受住热带沙漠气候的考验。就好像借助埃塞俄比亚高原、东非高原这两大水塔的助力，尼罗河能够冲破撒哈拉沙漠的阻隔注入地中海，甚至滋养出灿烂的古埃及文明一样。

尽管南非的东南高地有机会滋养更多的人口，但葡萄牙人要是想在这一地区开展奴隶贸易，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地理障碍。位于南非东南边缘的“德拉肯斯山脉”，是奥兰治河的发源地，也是整个南非高原的东南边缘。高原南部东高西低的地势，使得整个德拉肯斯山脉东南麓既没有通往南非腹地的河流，也没有连片的冲积平原。也就是说，葡萄牙人既没有可能在此捕获大量黑人土著，也很难打通连通南非腹地的贸易线。抱着寻找大片沿海冲积平原和大河的目的航行的话，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位于南非东北部的“莫桑比克”。

南非高原北部的两大河流：赞比西河、林波波河，都是由莫桑比克境内注入印度洋的，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赞比西河。从长度和流域面积来看，赞比西河在



整个非洲排名第四位，仅次于尼罗河、刚果河以及尼日尔河。不过考虑到河流流量的话，能够超过赞比西河的就只有刚果河了。在热带草原气候的作用下，两大河流（及其它一些小型河流）补水充足，并最终在莫桑比克境内形成了面积达 30 余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平原带（可将之称为“莫桑比克平原”）。

然而将冲积平原的面积作为衡量人口、国力标准的东亚经验，在热带气候的非洲古代并不完全适用。莫桑比克全境属于热带草原气候区，一年分为雨旱两季是这一气候区的主要特点。水是生命之源，但过大或过小的降水量，对于低地农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当然，你可以用水利建设来均衡水土关系，就像中国人一直在做的那样。不过在文明初始时期，能够在雨季来临之际帮忙人类躲避水患，旱季又有相对低地天然蓄水的高地区，会更受人类的青睐。有鉴于此，在欧洲人探索至南部非洲东部时，这一地区的人口中心其实并不在莫桑比克的沿海平原，而是在它西部的高地区。



莫桑比克沿海地区

莫桑比克平原西部的高地，属于南非高原的一部分。这片位于赞比西河、林波波河、卡拉哈迪盆地以及莫桑比克平原之间的高地，绝大部分为今天的津巴布韦所有，因此可以将之称为“津巴布韦高原”。今天生活在津巴布韦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土著，都是从北方迁徙而来的班图人。由于津巴布韦高原的西南方向，是相对干旱的卡拉哈迪盆地；东部则是更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莫桑比克平原，因此沿东非高原南下的“班图人”，无论是继续沿东非大裂谷向南，还是向西南方向先进入赞比亚境内的赞比西河上游地区，最终都会更多汇入津巴布韦高原。并继续将原居于此的科伊桑人，进一步向西南方向挤压。

需要说明的是，班图人与科伊桑人的博弈，并不是通过一两场战争体现出来的。

绝大多数时候，身处其中的人类族群并没有我们这样的“上帝视角”，而是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经过漫长的岁月作用而自然出现的结果。班图人的迁徙也是这样，在公元一世纪就开始向南迁徙的班图人，直到公元10世纪才大规模越过赞比西河，进入津巴布韦高原（南非地区就更晚了）。相比处在原始渔猎、游牧状态科伊桑人，已经掌握原始农业技术，并会使用铁器的班图人，要更有优势得多。

不过班图人的技术优势只是相对的，肯定没有办法跟同时期的欧洲人相比了。虽然进入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地区的班图人，还有数百年时间提升自己的生产力，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葡萄牙人。但远离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现状，使得迁徙至此的班图人似乎很难有外力能够刺激他们，将自己的经济、技术实力提升一个层级。那么，后来远航至此的欧洲人，真的不会有意外发现吗？

#### 第四节 津巴布韦文化因黄金贸易而兴盛

虽然黑非洲整体文明层级偏低的事实摆在那里，但并不代表着这片土地上没有一点让人感到意外的情况发生。除去加纳、马里、桑海三个一脉相承的西非“黄金帝国”以外，黑非洲还有一个孤立于南部的文化代表——津巴布韦。津巴布韦这个标签，其实指的并不是一个古代国家的名字，而是一种石头建筑。在当地土著语中，津巴布韦的原意就是“石头城”。高大的围墙以及墙内的圆形高塔式建筑，是“津巴布韦”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津巴布韦的很多地方，包括周边与津巴布韦相邻的国家（靠近津巴布韦的地区），有数百处这样的遗址被发现。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津巴布韦共和国的东南部，被称之为“大津巴布韦”。此类建筑所代表的文化也因此被称之为“大津巴布韦文化”。至于它能不能算是一个文明体，那就要看它具不具备其它条件了。

一般情况下，认定一个地区或者族群是否进入文明阶段，会有几个标志：一是城市的建立；其次是文字的产生。文字对于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及文明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是金属工具的使用以及灌溉技术的运用。当然，认定的标志还可以再丰富一点，不过归根到底的一个词就是“经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让一部分人（或者说阶层）脱产，才可能意味着以“阶级”分层为特点的统治秩序的建立，并因此而产生城市、文字等进一步促进文明发展的因子。

今天居住在津巴布韦的主要是属于班图族系的“绍纳人”。然而除了雄伟的津巴布韦遗址突兀的矗立在这片土地上以外，在这些土著的居民身上几乎完全看不到古老文明传承的痕迹。以至于最初考察这些建筑的欧洲人，完全不相信是这些土著人的创作。然而大津巴布韦的建筑年代是在公元11世纪，在16世纪被废弃。这个时间段也是大津巴布韦文化的兴盛期。从这点来说，此时已经大规模进入津巴布韦高原的班图人，无疑是这个建筑奇迹最有可能的创造者。



以原生文明的标准来说，农业产量的提升是刺激文明产生的直接经济因素。一方面，农业产量的提升能够让人类有更多的时间发展那些“奢侈”的文明事业；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农业产出规模以及维护自己族群的安全，建造大型水利工程、战争等行为，客观上又能促进政治、社会体系的成熟。2000 多年前从亚洲热带地区（印度、东南亚）传入的香蕉和薯类植物，是包括苏丹、班图两大族系在内的“典型黑人”，得以在这片大陆竞争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两种能够提供高热量的农作物，本身并不需要特别的种植技术。上天赐予热带草原地区的阳光、雨水，便可以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良好。也就是说，这些农作物的引种只是让典型黑人在与俾格米人、科伊桑人的竞争中占得优势，却无力为他们进入文明阶段提供助力。



津巴布韦建筑

现在的问题在于，不管“津巴布韦”建筑本身是否有足够力度代表着一个原生文明的产生，它的存在显然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这片土地曾经有过足以摆脱原始部落文化的经济。虽然从人类整体来看，农业技术发展是催生文明的前提，但具体就某一个点来说，却未必要依赖农业来完成文明进化。商业是促进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源，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地球上的文明源头分为“农本”与“商本”两种类型。对于古津巴布韦的建设者来说，如果要“因商而兴”的话，他们需要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连接一张连通其它高等级文明地区的贸易网；二是必须拥有贸易对象所需要的高价值的商品。

在大津巴布韦文化兴盛的年代，西非的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中上游）流域，已经遵循上述路径进入了文明行列。黄金和跨撒哈拉贸易是西非三大黄金帝国的立国之本，那么津巴布韦有没有可能复制这一路径呢？最起码从黄金的角度来说，津巴布韦是很有机会的。今天非洲及世界最主要的产金地是在津巴布韦之南的“南非”，南非的主要产金地则在奥兰治河上游（北部），也就是今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一带。其黄金产量甚至一度占全球产量的 2/3（储量约一



半)。不过南非黄金的大规模开采起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几乎与工业时代的到来同步。南非黄金如此巨大的产量，也主要是因为工业技术能使之开采出地下富含黄金的矿石来。

在工业技术出现之前，人类采金的主要手段是从河流湖泊中打捞泥沙，然后用冲洗的方法将沙石“淘”出（黄金密度高，会在这个过程中沉淀）。今天在非洲“淘金”的原籍中国广西上林县的“上林帮”，便是淘金技术的集大成者。只不过他们能利用挖掘机、水泵等机械在河道中采金，极大的提升效率罢了。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对当地的水土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于前两年在非洲第二大产金国——加纳，差点酿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除掉南非、加纳以外，津巴布韦是非洲第三大产金国。当地居民至今甚至还会在闲暇时候，用最原始的“淘金”法从泥沙中赚点外快。在中世纪后期，正是这些易于开采的黄金使得进入津巴布韦高原的班图人获得巨额财富，并建造了“大津巴布韦”这样的宏伟建筑。问题在于，如果津巴布韦所在的区域整体经济不发达（没有多余物资出售），那么这些黄金除了作为酋长的装饰品或者献祭给神明外，对经济并不会会有促进作用。正如刚才所分析的那样，除了黄金以外，津巴布韦必须还加入一个商业网络，能够帮助他们用这些黄金换取先进的技术和商品。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津巴布韦班图人不可能依赖跨撒哈拉贸易线。即使穆斯林商人能够顺着尼罗河一路南下到尽头，能够从中获得最大贸易利益的，也会是生活在东非高原上的部族。好在陆地并非是唯一的贸易平台，海洋所能够提供的贸易空间要宽广的多。

相比于陆地，海洋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帮助交易对象绕过阻隔在中间的“人”，让双方进行直接交易，前提是双方都拥有海岸线。早在中世纪以前，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就已经打通了，从红海 / 阿拉伯半岛前往印度的航线。鉴于通往印度的航线利益是如此的巨大，商人和航海者们因此缺少向非洲东海岸拓展的动力。阿拉伯人也曾从这条航线中获利，将从印度而来的香料通过沙漠驼队输往埃及。然而在罗马帝国控制西亚裂谷带南段，建立巴勒斯坦、阿拉比亚行省后，阿拉伯人的获利空间被大大压缩。及至其东部的萨珊波斯崛起后，沙漠商人们的商业版图又被进一步压缩。

为了重获发展机遇，阿拉伯人开始渡过红海，向对面的非洲之角移民，并且逐步沿海岸线向南扩张贸易线。由于非洲之角的沿海地区也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移居于此的阿拉伯人，显然比以前偶尔航行至此的航海者们要有优势得多。当阿拉伯人依靠伊斯兰教建立帝国之后，他们的海上扩张之路也变得更加顺畅。最晚至公元 9 世纪，穆斯林商人（这一阶段不仅包括阿拉伯人了）的贸易线就已经延伸到莫桑比克北部海岸，并建立了永久性的贸易据点。

从时间线上看，阿拉伯人从非洲之角向南扩张的进程，与班图人的南下大致吻合。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确应该有很大的关联性。如后来的欧洲贸易者一样，大多数从

海路而来穆斯林商人并不需要自己深入内地寻找“货源”，而是会与贸易据点所在地部落合作，由后者充当中间人。无论是班图人先一步向南迁徙，还是阿拉伯人更早延伸贸易线，都使得津巴布韦高原－莫桑比克平原有机会在葡萄牙人航行在此之前，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不是孤立于旧大陆之外）。

与阿拉伯人的黄金贸易，极大的促进了津巴布韦经济的发展，津巴布韦高原上以“大津巴布韦”为代表的数百座石头城堡遗址，就是每一个地区的贸易中心。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这些建筑在技术、形制上直接受到过穆斯林商人的指导，但以其孤立于南部非洲大陆的存在，以及印度洋贸易线在稍早时候拓展至此的客观事实来看，贸易所带来的技术交流，对津巴布韦文化的形成显然有直接助力作用。

经济的提升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催熟了津巴布韦高原的政治。那些城堡式的津巴布韦建筑，很多也同时承担着政治中心的作用。最终在津巴布韦高原称霸，并将势力范围向莫桑比克平原延伸的政治体，就是被葡萄牙人称之为“莫诺莫塔帕”的王国（也译：“穆胡姆塔巴”帝国），这个名称实际上是臣民对其国王的称呼。王国及其所属的族群（今占津巴布韦人口多数的“绍纳人”），也被认为是津巴布韦建筑的营造者。在达·伽马登陆莫桑比克海岸后，葡萄牙人就从当地土著及穆斯林商人口中知晓内陆存在这么一个“黄金帝国”。在达·伽马的第二次（公元1502年）及后继者的印度洋之旅中，与核心区位于高地的“黄金帝国”建立贸易联系，成为了葡萄牙探险家的重要目标之一。

## 第五节 葡萄牙与莫诺莫塔帕王国建立贸易联系

溯赞比西河等河流而上的葡萄牙探险家，很快就搞清了津巴布韦“黄金帝国”的位置，并见到了那些让人惊讶的石头建筑。然而以葡萄牙人对黑非洲的了解来说，很难相信在位置如此偏僻之地，土著黑人能够独立创作出这样文明符号来。同时基于根深蒂固的地缘矛盾，基督信徒们也同样不愿意去考虑真主信徒们的贡献。客观层面来说，基于这一地区本身已是穆斯林商人向南延伸贸易线的极限，伊斯兰世界一时无力对其发挥政治、军事影响（如马格里布对西非一样），因此整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地区在欧洲人到来之时，并没有伊斯兰化。这无疑也使得欧洲人更有理由相信，穆斯林并不是津巴布韦文化的缔造者。

就像一些中国人愿意相信最早登陆黑非洲或者美洲的是中国人一样，欧洲人也希望从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津巴布韦文化的源头。最终为津巴布韦起源提供理论支撑的，是《圣经·旧约》中的一段记载：公元前10世纪，犹太人“所罗门王”与来自南方的“示巴女王”之间发生了一段恋情。这位女王和她的国家极其富有，而她送给所罗门王的黄金财宝则来自南方一个叫作“俄斐”的地方。根据传说，示巴女王离开所罗门王之后，也有可能带着她的财富去了“俄斐”。为此，“俄斐”在基

督教世界成为了“黄金之地”的代名词。在津巴布韦的黄金以及那些巨大石头建筑被发现之后，欧洲人相信这里应该就是“俄斐”。

虽然将津巴布韦跟所罗门王或者示巴女王牵扯在一起的想法并没有依据，但就此认为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除了穆斯林商人外就没有其它地区的探索者抵达，也是不严谨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说法是 15 世纪初，代表中国（明朝）皇帝出使“西洋”的郑和，曾经探索过非洲东海岸，并最远航行至莫桑比克海岸。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出土的一些中国商品（比如瓷器），似乎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从技术上来说，通过穆斯林商人的间接贸易，上述地区同样有机会获取来自中国的奢侈品（更何况很多出土文物晚于郑和年代）。这就好像在中国的先秦墓葬中偶有发现的来自中亚及地中海文明圈的物品，但也不能证明先秦时中国就与这些地区发生直接接触一样。



马达加斯加人

另一个将南部非洲与郑和及古代中国扯上关系的“证据”，来自与莫桑比克平原隔海峡（莫桑比克海峡）相望的“马达加斯加岛”。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世界第四）在中国的知名度，很大程度应该是靠那部以动物为主角的系列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打开的。人类学家很早就发现，这座岛屿上的居民在外貌特征上与大陆地区的班图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更为偏向黄种人。不过通过对人种和语言的深入研究，马达加斯加人的亚洲血统主要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南岛民族，马达加斯加语亦属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

事实上，尽管马达加斯加岛距离非洲大陆的距离要更近，但班图人迁入马达加斯加岛的时间却是在十世纪前后。一方面，是班图人是在这个时段大规模南下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地区；另一方面也与黑非洲海岸线平滑缺乏天然港口有关（因此海洋文化不发达）。而精于海上航行的南岛民族，则最晚在公元 6 世纪就踏上这片土地了。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天马达加斯加人，无论在人种还是语言上都更像是一个东南亚人。

与津巴布韦黄金帝国的崛起一样，班图人最终能够跨越平均宽度达到 450 千米的莫桑比克海峡，与阿拉伯人的助力有着直接的关系。穆斯林商人成为了马达加斯加岛与外部沟通的最初桥梁。这些中世纪进入的外来文化、民族，与后来殖民于此



的欧洲人一起，使得马达加斯加岛一如非洲大陆一样，成为了一个种族、文化多样性的地区。基督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在此都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那些来自南洋群岛的先民是如何横穿印度洋抵达马达加斯加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后面达·伽马做同样的事情时将会有所解释。

黄金几乎是每一个欧洲航海者最梦寐以求的收获。在南部非洲意外发现一个新的“黄金帝国”，自然是一件值得葡萄牙人欣喜的事情。通过赠送礼物等和平手段，葡萄牙人后来也的确与“莫诺莫塔帕王国”建立了贸易联系，并将这种关系维持至16世纪中叶。不过这种关系本身并不稳定，一则土著王国知道自己国力基础是那些金矿，与西非黄金帝国一样，并不愿意这些外来贸易者知晓金矿的产地，甚至影响干涉自己的政治。而有技术优势和政治背景的贸易者，又希望透过政治干预得到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他们在沿海地区建立稳固的据点之后；二则葡萄牙人并不是黄金贸易的唯一受益者，阿拉伯人才是这一地区黄金贸易的拓荒者。基于二者的竞争关系，每当葡萄牙人试图通过武力或政治干预控制莫诺莫塔帕王国时，阿拉伯人总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最终在18世纪，通过战争和各种政治操弄，葡萄牙人还是在将莫桑比克从“莫诺莫塔帕王国”中分离出来，置于了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一政治成果也在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中得到了确认。不过土著王国的主体——津巴布韦高原，则成为了英国殖民地。19世纪30、40年代，由于受到英国人的挤压，原先殖民于南开普地区的“布尔人”（荷兰人后裔），被迫向南非高原东部，即班图人居住的草原地区迁徙。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之下，以祖鲁人为代表的南非班图黑人部落，则跨越林波波河向津巴布韦高原迁徙，并征服绍纳人成为津巴布韦高原的统治者。

当英国人通过布尔战争、祖鲁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击溃在南非的竞争对手和土著势力，成为南非的主人后，很自然的也开始顺势向津巴布韦和整个南非高原北部渗透。柏林会议之后，英国人在南非高原的扩张得到了政治确认。代表大英帝国在津巴布韦及其北部赞比亚高原扩张的，是一个叫做“赛西尔·罗兹”的英国人。之所以提到这个殖民者，是因为在英国殖民时期，津巴布韦－赞比亚地区的名称“罗得西亚”，就是来源于他的名字。以赞比西河为界，今天的津巴布韦被称之为“南罗得西亚”；赞比亚被称之为“北罗得西亚”。只不过上世纪60年代，津巴布韦在独立之后，曾经一度使用“罗得西亚”作为国名，所以很多时候“罗得西亚”一名也单纯指向津巴布韦。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极度渴望独立自主的非洲人民来说，类似“罗得西亚”这样带有殖民记忆的名称并不合适。因此在1980年，地缘政治、文明遗产丰厚的“津巴布韦”，成为了旧“南罗得西亚”地区的新国名。相比之下，同时期独立的“北罗得西亚”就没那么折腾了。源自“赞比西河”（原意“大河”）的“赞比亚”，在独立之始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新名称。尽可能多继承或争取更多的地缘资本，是

各国在取国名时的共同心理。

通常情况下，包含更多政治、人文信息的历史标签，会更有价值。如尼罗河畔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顺便吐槽一下弃徽州而取黄山的决策者）。退而求其次的话，类似尼日尔河、刚果河、赞比西河这样的著名地标，也是拓展地缘政治空间好标签。参考两个刚果之争，如果不是南罗得西亚有“津巴布韦”这个更高级的名称，说不定赞比西河南岸也会出现两个“赞比亚”之争。

## 第六节 达·伽马北上遇到逆洋流和僧祇城邦

回到达·伽马的航程上来。葡萄牙人在沿非洲东南海岸线继续北上的航行中，在上岸考察之前，还必须先克服复杂海洋环境所带来的困扰。在风帆时代，风是航海时所必须考虑的第一要素。除此之外，海流（又称“洋流”）也是影响航速、航向的重要因素。西风、季风、信风等在固定区域、固定时段盛行的强风（统称“盛行风”），是促成海流的主要原因。这使得大多数情况下，海流与盛行风的方向趋于一致。在风力作用下形成的海流被称之为“风海流”（又称“漂流”）。

然而风并不是产生海水流动的唯一原因，海流也不一定总和风向相符。比如在河口或者两个相邻海盆之间，由于海水的温度、盐底不同，造成相邻或上下层海水密度差异，从而引发海水流动。这种被称之为“密度流”的海流就不一定会和风向相符。最大最著名的密度流当属发源于加勒比海，经尤卡坦海峡和墨西哥湾，东北方向从佛罗里达海峡穿出进入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流”（简称“湾流”）；又比如因天体引力而引发的海洋“潮汐”也会引发海水水平流动，这种就被称之为“潮流”。

达·伽马在非洲东南海岸遇到的海流属于另一种类型：补偿流。我们知道北纬5-25度的区间属于西北信风带。这条从西北方向刮向东南方向的风带，之前刚刚帮助哥伦布歪打正着的发现了美洲。而在南半球，信风的风向则正好相反。莫桑比克—坦桑尼亚海岸所在的南纬5-25度的区间，所盛行的则是东南信风。这股终年盛行的强风加上充足的日照，在赤道之南形成了一股由东向西的风向流——南赤道暖流。如果纯粹以风向来看，这股暖流应该只是西北向流动，遇到大陆阻挡后，再由赤道无风带折返向东（赤道逆流）至南洋群岛西侧，再向南对接南赤道暖流，形成一个闭合的环流带。

问题是南赤道暖流并没有完全这样做，而是有部分海流在靠近非洲之时，从马达加斯加岛两侧分流而过，其中位于莫桑比克海峡的被叫做“莫桑比克暖流”，马达加斯加岛东侧的则叫做“马达加斯加海流”。两股海流在马达加斯加岛之南再次会合（改称为“厄加勒斯暖流”），并沿南非海岸线抵达大陆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之所以会有部分南赤道海流沿非洲海岸线南流，是因为非洲大陆之南已经不是东南信风，而是西风带的控制区（南纬40-60度区间）。

在北半球，受西风带所带来的湿润水汽影响，纬度偏高的西欧大陆变成了这个星球上最适宜人类发展的区域之一；而在南半球的西风带，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这个区间，整个西风盛行的区域基本为海洋所覆盖。受强大的西风影响，非洲－澳大利亚－南美大陆，与南极大陆之间的海水，形成了一个自西向东的环流——西风漂流。非洲东南部的海水被西风漂流带走之后，为了填补这一区域的海水，部分南赤道暖流开始顺势南流，进入马达加斯加岛两侧，并最终抵达非洲之南。

南下的赤道暖流以及东南信风对陆地气候的影响巨大。暖流所带来的湿润水汽，被东南信风带入了非洲东南部，使得东南非洲大陆及马达加斯加岛没有成为“副热带沙漠带”的成员，而是呈现为热带草原气候（马达加斯加岛东侧甚至为热带雨林气候）。然而对于在海上航行的达·伽马来说，情况就多少有些复杂了。在绕过好望角进入非洲东南海岸之后，船队的行进方向正好与厄加勒斯－莫桑比克暖流相冲；而东南信风则又推动着船队继续北行。在这两股相生相克的自然力作用下，达伽马的船队不得不在莫桑比克海岸线曲折航行。好在强大的信风最终还是帮助葡萄牙人继续向北，并开始了莫桑比克海峡的探索工作。不过对于达·伽马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相比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力，“人”的问题要更复杂得多。在莫桑比克及整个西印度洋遇到的最大对手，并不是土著黑人而是穆斯林商人。公元10世纪中后期，由波斯人／阿拉伯人所组成的商业集团，在北至索马里南部、南至莫桑比克中部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据点（最开始波斯人主导，后为阿拉伯人所取代），这些贸易城市被统称为“僧祇城邦”。“僧祇”在波斯语中是黑人的意思，阿拉伯语中的“苏丹”、柏柏尔语中的“几内亚”，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12世纪中叶，原本各自为政的僧祇城邦经过内部博弈，诞生出了一个更高一级的政治体——基尔瓦王朝（统治中心为坦桑尼亚南部的基尔瓦城）。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古希腊、罗马那些点状分布于海外的贸易城邦一样，在这种政治归属之下，各城邦仍事实保持着自治状态（这也是目前很多香港人所希望的）。

莫桑比克平原是“僧祇城邦”贸易线的最南端板块。穆斯林商人沿海岸线布设的贸易据点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莫桑比克南部的“伊尼扬巴内”城；中部索法拉河口处的“索法拉”城（今天索法拉省首府“贝拉”城南约30公里处）；北部的“莫桑比克岛”。与掌握黄金、象牙等资源的黑人土著，特别是“莫诺莫塔帕王国”进行贸易，是这几个穆斯据点生存的基础。基于双方的意识形态冲突，葡萄牙人的到来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宗教战争的风险。然而对于逐利的商人来说，宗教和意识形态并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比如在十字军时代，热那亚、威尼斯等海上共和国，就从和穆斯林的贸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同样的，除非政治上有特别要求，大多数时候穆斯林商人也不会拒绝与异教徒交易。

尽管的确肩负着传播天主教的任务，但意识形态的传播说到底还是在为经济利



益服务。如果传教本身有利于获取经济利益，那么自然是会尽力去做；反之，则没有必要突出了。葡萄牙人在恩里克王子时代，就竖立了以贸易为主线的务实海外扩张政策。基于这个原则，达·伽马并没有尝试和穆斯林对抗，而是希望以友好访问的姿态完成这次旅行。对于这些基督徒的到来，诸僧祇城邦的意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认为葡萄牙人的到来，不过是为自己在非洲收获的资源，增加了一个出口方向；另一种则认为，葡萄牙人最终一定会直接和土著黑人交易，从而影响自己的贸易垄断权。伊尼扬巴内和莫桑比克岛的统治者属于相对乐观一派，达·伽马的船队也在这两个港口得到了补给。

达·伽马一行在莫桑比克海岸航行的另一个收获是“莫桑比克”这个名字。莫桑比克岛是一个面积不大，但却被天然海湾两面庇护的岛屿。在因海岸线平滑而缺乏天然港口的非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贸易据点。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莫桑比克”只是岛上统治者的尊称（意为“伟大的受贡者”）。不过葡萄牙人把它拿来作为岛屿（包括上面的城）、海峡，乃至这一带沿海地区的标签罢了。当然名字只是一个标签，叫什么都无所谓。对于葡萄牙人来说，继续向北寻找通往印度之路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 第十一章 达·伽马船队在东非海岸线的探索

### 第一节 穆斯林在东非形成斯瓦希里城邦

葡萄牙是欧洲印度洋航海事业的开创者，却不代表是印度洋开拓的先行者。在达·伽马进入印度洋之前，整个印度洋贸易已经开拓得非洲成熟了。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公元7世纪起创立伊斯兰教，并建立强大帝国的阿拉伯人，已经成为了整个印度洋贸易的主导者。事实上，15世纪初代表中央之国开启南海－印度洋之旅的郑和船队，客观上也是得益于阿拉伯人在海上的开拓，以及元朝将这些异族商业、航海基因／人才的引入。只不过古典时期的中央之国终究是一个农本国家，昙花一现的海上辉煌之后，一切又回归到了原状。

顺便说一下，担忧今天的中国会重回这种封闭状态是没有必要的。全球化以及工业时代的到来，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外部的地缘大环境（之前最大的问题，是外部没有先进文明给予改变的压力）。在这种类似大“地中海”的环境下，中国的地缘定位已经从一个大陆国家，开始向陆、海兼备的“边缘国家”转变。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正有幸经历这一转变过程。

由于阿拉伯半岛整体处于海洋包围的环境中，既可向西对接地中海文明圈的海洋文明，又可向东吸收印度洋的航海文化，因此以沙漠游牧起家的阿拉伯人最起码在公元8世纪起，就已经成为了全球航海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印度洋是阿拉伯人海上活动的最重要舞台，通过几个世纪的商业航行，阿拉伯人甚至抢在欧洲人参与竞争之前，成功的将他们的宗教通过海路传播到南亚次大陆东端（孟加拉）、南洋群岛（东印度群岛）。今天即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相信也大都知道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伊斯兰属性。让大多数人比较陌生的，是伊斯兰文明对东非海岸的影响。而承载这一任务的地缘政治集团，就是之前解读过的“僧祇城邦”。

相比“僧祇”这个陌生的词汇，还有一个至今仍广为使用的地缘标签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一进程，那就是“斯瓦希里”。作为一种语言标签，斯瓦希里语最近出现在中国媒体上，是因为一部在坦桑尼亚热播的中国家庭戏《媳妇的美好时代》。作为中国软实力提升、文化扩张战略的一部分，将优秀的中国电视剧翻译成非洲语言进行推广是一种尝试。用斯瓦希里语译制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一片，就是成功的一例。这也使得很多中国人，第一次听闻这个小语种之名（尽管在黑非洲也算大语种了）。

在部落林立、语言繁杂的黑非洲（语言总数超过800种），出现一种能够让各部族有兴趣学习的“通用语”非常的重要。在欧洲殖民者将英语、法语等语言输入黑非洲之前，通过北非／阿拉伯半岛穆斯林商人的商业活动，渗透融合而成的豪萨

语、斯瓦希里语，是黑非洲最主要的通用语，二者今天的使用人口都超过 5000 万。其中源起于尼日利亚豪萨城邦的“豪萨语”，是伊斯兰文化在西非渗透的结果；斯瓦希里语则是穆斯林商人们在东非数百年影响的见证。

“斯瓦希里”一词的原意是阿拉伯语中的“海岸”，其本意显然带有明显的海洋属性。实际上，“斯瓦希里”一词的地缘内涵，与“僧祇”并无二致。只不过一个是源自阿拉伯语，突出了地理属性；一个源自波斯语，突出了人文属性罢了。基于阿拉伯人在东非贸易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斯瓦希里一词今天的地缘地位，用“斯瓦希里城邦（文化）”取代带有波斯印记的“僧祇城邦（文化）”，来代指东非海岸这条伊斯兰文明延伸带，会更容易让人理解。

从地缘渗透力角度来看，伊斯兰文明在西非商业、文化扩张要更为全面。即使在欧洲人已经控制了所有海岸线的情况下，阿拉伯 / 柏柏尔人依然能够全方位的跨越撒哈拉沙漠，与中、西非地区进行贸易。相比之下，在东非沿岸布点的斯瓦希里商人，扩张路径就要线性得多了。这一点在豪萨语与斯瓦希里语的属性上也可以看出。同为基于商业活动而形成的通用语，豪萨语被归类于与阿拉伯语、柏柏尔语同系的“闪 - 含语系”，而斯瓦希里语本质上则属于黑非洲原生的“班图语系”。后者与阿拉伯语的关系，更多是通过其吸收的大量阿拉伯语借词，并在 19 世纪以前采用阿拉伯字母进行拼写。这一点就像韩语中有许多汉语词，并曾经长期使用汉字一样。

斯瓦希里语及文化在东非的形成，与阿拉伯人在印度洋所进行的是一场商业扩张，而非政治扩张有关。阿拉伯人能够做到的是，以共同意识形态（宗教）为纽带建立起贸易网，但却无法如罗马那样，建立一个环印度洋帝国的想法。即使某一地缘联系更紧密的板块，如东非海岸的斯瓦希里城邦，也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紧密的政治体。这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阿拉伯人没有足够的人口向海外输出。

对于人口总数居世界首位的中国来说，民间政论时往往不会考虑人口问题，或者说向来不认为在各种臆想的海外扩张之旅中，会没有足够的人口去填充吃进来的土地（同时本着要地不要人的原则，也不会考虑如何处置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然而在地广人稀的古代，人口才是最重要的地缘资本。为此我们会看到俄国人费尽心机的想把那些本属异族的游牧部落留在境内；也会看到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将魏国百姓整县迁入蜀境。

在斯瓦希里城邦发展成熟的 15 世纪，斯瓦希里城邦总数达到了三十余个（有记载的）。城邦带的核心区位于在今天的坦桑尼亚、肯尼亚海岸（包括很多沿岸小岛），今天斯瓦希里语也是这两个国家的官方用语之一。随着贸易线的扩张，索马里南部、莫桑比克沿海，以及莫桑比克海峡北部的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岛北部，也都有斯瓦希里城邦分布。莫桑比克中北部的索法拉、莫桑比克岛，坦桑尼亚沿海的基尔瓦、桑给巴尔岛，肯尼亚境内的蒙巴萨、马林迪，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都是这一系



列贸易城邦中比较知名的。

然而这些由贸易据点发展而来的城邦人口数量都不多，即使如基尔瓦这样的大城邦，常住人口也不过万人（并且并非全部是阿拉伯人）。这使得阿拉伯人更多需要依靠与当地土著的合作，来完成与内陆地区的贸易。这使得成为东非通用语的斯瓦希里语，并没有成为阿拉伯语的变种，而仅仅属于通过使用阿拉伯字母变成书面语（包括借用大量阿拉伯语词汇）的班图语。当然，后面我们会解读到，葡萄牙人的到来，也对斯瓦希里语的扩散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拉伯人的贸易线究竟向内陆地区延伸了多远，可以通过今天斯瓦希里语传播区的范围看出。东非高原及其沿海平原区是斯瓦希里语的核心区。这片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非两大高原中间的高原，还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标签：大湖地区。

## 第二节 东非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由于东非高原正处在“东非大裂谷”的核心区，断裂的高原、充沛的降水在高原西部以及腹地，造就了包括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等大型湖泊在内的一系列湖泊。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五国，便是存在于这片高原和湖泊之间。上述国家再加上依附于埃塞俄比亚高原而存在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四国，便是地理概念中的“东部非洲”板块。

由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与东非高原属于完全独立的两个地理单元，因此“东部非洲”内部实际也依此划分为两个地缘政治板块。依附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四国，通常会被单独划分为“东北非洲”或者称之为“非洲之角”。东非高原地区的几个国家，则通常会使用“大湖地区”的标签来拉进彼此的地缘关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高原边缘的坦噶尼喀湖等湖也是刚果（金）与上述国家现在的边界湖泊，所以大湖地区的概念通常也会加入刚果（金）。

另外原“苏丹共和国”南部由黑人覆盖的热带草原地带，在2011年已经正式分裂为了“南苏丹共和国”。这个明显希望与北非阿拉伯国家划清界线的黑人国家，目前也被归入了东非板块。至于这个新生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到底是跟非洲之角还是大湖地区走得更近，从位置上看是可以选择的。不过考虑到非洲之角当下的乱局，以及南苏丹与肯尼亚之间没有山地阻隔的地理特点（正处于两大高原之间），最起码希望为南苏丹的石油寻找新出口通道的政治家们（包括在南苏丹有重大得益的中国），会更愿意帮助南苏丹和肯尼亚之间建设一条新的石油管道。

基于前三十年在第三世界国家打下的政治基础，今天的黑非洲也成为中国扩张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战场。不过作为后来者，中国在非洲的一举一动，不得不考虑到各国原宗主国的影响力。在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之后，东非高原地区被划给了德国和英国。其中英国得到了北部的乌干达和肯尼亚，德国则拿到了南

部的卢旺达、布隆迪、坦噶尼喀，后者被合称为“德属东非”。而在一战之后，英国人则顺势把面积最大的坦噶尼喀拿走，归入了“英属东非”。为了不让英国人独美，卢旺达、布隆迪这两个高原小国，则交给了控制刚果盆地大部的比利时人代管。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坦噶尼喀”，所谓坦噶尼喀地区所指向的就是今天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坦噶尼喀之名在班图语中的原意是“汇聚”之意）。之所以会演变为坦桑尼亚，是因为英国人最初在认可德国对坦噶尼喀殖民权的同时，争取到了领有沿海两个岛屿的“桑给巴尔苏丹国”的保护权。在葡萄牙人的势力衰弱之后，来自阿拉伯半岛阿曼地区的阿拉伯人，曾经在17世纪南下东非海岸重夺控制权，并恢复、新建了一系列贸易城邦，桑给巴尔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由于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这段曾经分属德、英的历史（一战后都归属英国），上世纪60年代二者先是分别独立，然后很快再合并为一个国家。尽管失去了独立地位，但面积、实力完全无法与坦噶尼喀抗衡的桑给巴尔，也由此把自己的标签加入了新的国名之中。

南苏丹并非是唯一一个在地缘政治归属上有多重选择的国家。位于坦噶尼喀湖与赞比西河之间的“赞比亚”，也同样具备这样的特点。以班图人覆盖的赤道及其以南的“班图地区”来说，赞比亚算得上是地理中心。由于并不是处在班图人南下的主路线上，班图尼格罗人大量进入这片高原的时间，其实并不比葡萄牙人“发现”黑非洲的时间要早（也是在16世纪前后）。铜矿是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主要矿石资源，不过比起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金矿来说，赞比亚的资源吸引力就要小得多了。这使得赞比亚无论在阿拉伯还是欧洲贸易时代，都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记。

中国人对赞比亚却很熟悉，甚至有很大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来源于一条帮助赞比亚打通出海口的“坦赞铁路”（最主要是运输铜矿）。这条铁路的意义是如此的重大，以至于今天中国用更先进技术、更合理运作方式，在东北非修建类似意义的“亚吉铁路”时（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还会被媒体冠以“新时期的坦赞铁路”之名。不过悲剧的是，曾经被视为参与各方认为是重大外交成果的坦赞铁路，今天已经逐渐没落了。

坦赞铁路的没落，从根本上说也是受其位置和大地缘政治环境变迁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赞比亚的位置可以选择跟东非、南非，及至中非（刚果）进行地缘合作。上世纪6、70年代，赞比亚之所以选择从坦桑尼亚打通出海口，是因为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是黑非洲较早迎来独立的国家，同时期周边的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包括南非等国都还处在白人政权的掌控之下。基于这种结构性矛盾，赞比亚在地缘政治上并无法按照其地理属性，发展与南部非洲国家的关系（甚至因支持南部非洲国家的黑人运动而关系紧张），而只能向东与坦桑尼亚结盟打通出海口。这一基于非洲内部地缘政治关系而做出的选择，又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寻求盟友的需要，以及意识形态相吻合。

今天随着南部非洲国家白人统治时代的结束，赞比亚与南部非洲国家（尤其是南非）的合作也逐渐恢复正常。向西通过纳米比亚出海的公路运输线，对技术得不到升级（且维护不力）的坦赞铁路造成了直接影响。至于说下一步中国会不会重新通过亚吉模式重新激活坦赞铁路，应该说也是个可供选择的方向。毕竟东北部与坦噶尼喀湖相接的赞比亚，也可以算是“大湖地区”成员，这个地缘政治选项永远存在着可能性。只是今时不同往日，经济上先做到有利可图，才是一切项目推进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第三节 卢旺达和布隆迪种族屠杀产生的背景

相比在意识形态为先时期，跟中国曾经发生过一段政治友谊的坦桑尼亚、赞比亚两个东非大国，最近这些年更为各国民众所关注的，反倒是东非高原西部位于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之间的两个高原小国：卢旺达、布隆迪。只是这个出镜率却是用鲜血换来的。1994年，卢旺达与布隆迪两国总统一同乘坐飞机，在卢旺达首都机场上空被击落（双双遇难），由此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短短3个月时间中，人口仅700多万的卢旺达，有将近百万人口被屠杀，400万人成为难民。事实上，在这场种族大屠杀之前，卢旺达、布隆迪两国内部就多次爆发带种族仇杀性质的武装冲突，死亡者数以十万计。

卢旺达与布隆迪两个国家人口结构相似，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约85%）的都是胡图族，种族屠杀的主要对象则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不让英国独得“德属东非”的遗产，卢旺达、布隆迪（当时称“乌隆地”）被分配给了比利时。基于阶级史观，一般我们看到的公开报道会认定，种族屠杀的根源在于殖民时代，欧洲殖民者扶植少数派图西族统治胡图族的做法。欧洲殖民者扶植图西族的理由也非常的“肤浅”，仅仅是因为图西族肤色似乎较浅一些，五官更接近欧洲人。然而实际情况是，两族之间的这种统治关系并不是在柏林会议之后才形成的，而是延续了长达数百年。

从种族角度来看，今天的胡图、图西二族的属性都为班图尼格罗人，且语言非常的相近。其中胡图族最早在公元2世纪可能就已经迁入大湖地区，图西族则是在公元16世纪前后迁入。在水草丰美的大湖地区放牧长角牛，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只不过后来者的图西族掌握牲畜的所有权，胡图族则通过租赁牛群来维持生活。这使得两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又可以被理解为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富裕的图西族很自然的会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至于在成为欧洲殖民地之后，欧洲人可以通过财富多少来简单归类图西、胡图两族。

在16世纪时，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差异是否比今天要大得多，人数较少的图西族又是如何成为统治阶层的，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考虑到在文明层级要高得多



的中央之国，类似北方民族入侵并取得长期统治权情况也很多，这点应该不难理解。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现在所谓的图西族一定吸收了部分原来胡图族的成分（就像所谓旗人中有很多汉人一样）；不太确定的一点是，长角牛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很有可能是由图西族带入的，更早进入大湖地区的胡图族，当时则有可能还处在原始的渔猎 / 农业阶段。至于后来欧洲人更加倚重图西族来维持当地统治，更多是一种顺势而为罢了。毕竟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殖民者并没有必要打破原有的统治秩序。比如今天民族结构相似且相邻的卢旺达、布隆迪地区之所以被分为两个国家，是因为在德国、比利时建立统治之时，这片山湖交错之地已经自然形成了两个由图西族统治的王国。

### 东部非洲地缘结构图

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风刮遍全球之际，处于阶级底层的多数民族推翻少数派的统治民族，几乎是一种必然。既有南非那样和平完成政治转换，并成就黑白两个“诺贝尔和平奖”总统（白人前总统德克勒克，黑人总统曼德拉）的样板；也有卢旺达大屠杀这样的血腥案例。是不是多数派掌权之后就会拥有更光明的前景，就只能由历史来证明了。

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人口始终是最重要的“地缘”要素之一，选票和战争都是显现这一要素影响力的方式之一。很多统治者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消化一片土地的话，那么不管你的强势地位能够保持多久，最终都还是会失败。作为大航海事业的先行者，葡萄牙人被后来者超越，甚至没有像西班牙那样阶段性的成为全球性霸主的原因有很多，人口不足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以今天的人口为例，葡萄牙的人口不过千万，而曾经建立过“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口数量为 6500 万。如果加上在殖民扩张时期被英国统治的爱尔兰，人口数量则达到 7000 万（葡萄牙的面积接近英国 4 成）。当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葡萄牙并非英国的直接对手。基于对抗西班牙的需要，二者甚至长期保持着战略合作的态势。只不过，拿两国的人口数量出来对比，能够让大家看出葡萄牙的短板在哪里罢了。

人口不足，使得葡萄牙人在大航海事业开启之时，就制定了与土著居民进行贸易的扩张主线。问题在于，在印度洋执行同样策略的阿拉伯人，显然也不愿意看到有模仿者出现。不过最起码在达·伽马的航行中，这种担忧还没有得到验证。因为此时达·伽马和他的舰队并不会显露出挑战阿拉伯人贸易权的想法，他们不仅希望在阿拉伯人的城邦中得到补给，还希望阿拉伯人能够帮助他们寻找通往印度的捷径。至于这一愿望是否实现，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四节 达·伽马在东非补给后跨过印度洋

达·伽马并没有逐个造访东非岸线上的每一个斯瓦希里城邦，毕竟他此行的终极目标是印度。肯尼亚南部沿海城市蒙巴萨、马林迪，是达·伽马明确到访过的两个城邦。这两座城市也是当年郑和船队明确到访过的最西点（蒙巴萨时译“慢八撒”，马林迪时译“麻林”）。今天的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扩张的主轴，是合称为“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的历史源头是张骞和汉武帝，后者最重要的开拓者就是郑和了。

作为大湖地区仅有的两个印度洋国家（另一个是坦桑尼亚），肯尼亚本身很有机会充当大湖国家对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点。与之相邻的内陆国家，包括南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等国，都有可能通过肯尼亚打通它们与印度洋乃至中国的贸易线。基于内部合作的需要，上述国家在 2001 年协调建立了区域性合作组织“东非共同体”（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三国为创始国）来进行彼



此的协调。其地缘政治上的预期，是建立一个以斯瓦希里语为国语的“东非联邦”。

在各地都意识到抱团取暖重要性的今天，类似欧盟式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虽然定立一个政治统一的终极目标更多是一个挂在天际的理想，但并不妨碍各方以务实的心态去推进经济方面的合作。毕竟不管是从改变上层建筑，还是提振眼下经济的角度来说，打破地区经济壁垒都是必须的。纯粹从种族、语言、地理结构等基本地缘要素来看，东非国家的这一预期倒也算得上是有基础的。不过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的连通，都必须先做到交通的连通，而路网建设却又是最难最费时日的。东非共同体正式成立之前，成员国就试图从英国、比利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寻求经济上的帮助来完善各国的基础建设。只是从最终的情况来看，正在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且一直秉持着“要想富，先修路”战略的中国，应该是最有可能帮助东非诸国实现梦想的国家。

东非共同体互联互通的基础，是由蒙巴萨港起向东非腹地延伸，经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连接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南苏丹，甚至刚果（金）东部的“东非铁路网”计划（整个计划预计2030年建成）。2015年，整个计划的第一段“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已经由中国企业承建开工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计划如能成功实施，将极大提升肯尼亚在东非国家，乃至整个非洲的话语权。因此尽管在建设中不出意料的又遇到了人权、环保方向的阻力，但还是很有希望能够复制“亚吉铁路”成功的。

事实上最早提出“东非联邦”设想的，是该地区的前宗主国英国。上世纪50年代，在非洲独立浪潮已不可逆转之时，英国曾经希望将治下的“英属东非”，包括：桑给巴尔、乌干达、肯尼亚，以及从德国人那里接收来的坦噶尼喀组合成“东非联邦”。无奈当时急于独立的原住民们并不支持这个宏大的计划，而是各自谋求独立了。至于最早进入斯瓦希里地区葡萄牙人，却从来没有关心过东非的政治形态。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块通过印度的跳板罢了。

虽然同属斯瓦希里城邦体系，但蒙巴萨和马林迪两城对于葡萄牙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前者因认定这个后来者一定会对自己的贸易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对葡萄牙人的到来非常的冷淡；后者则相信葡萄牙人可以帮助自己在与蒙巴萨等城邦的竞争中，获得额外的优势。在任何一个不管紧密还是松散的集团中，这两种态度的存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一些看似整体实力有限的族群/政治体之所以能够做到“蛇吞象”，正是看到并利用了对手内部的缝隙。而所谓政治家、外交家的生存空间，也正在于此。

葡萄牙人在马林迪不仅得到补给，还得到了接下去航行的方向。一位叫作伊本·马吉德的阿拉伯航海家，成为了葡萄牙舰队的领航员。按照传统的沿海岸航行法，达·伽马需要继续沿非洲海岸线北上，经索马里进入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沿海，然后再由沿伊朗高原边缘进入印度河下游地区。奥斯曼帝国倒并不会成为达·伽马前行道路



上的障碍，因为这个突厥帝国此时的直接统治区，还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及巴尔干半岛。埃及、叙利亚，以及汉志地区则处在马穆鲁克王朝的控制之下。不过在葡萄牙人开拓印度洋航路后不久，奥斯曼帝国便完成了对上述地区的征服。将控制线延伸至波斯湾北部及亚丁湾，奥斯曼随即开始直接染指印度洋贸易。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是在 1517 年吞并的马穆鲁克王朝，因此将伊比利亚双雄开辟新航路的直接原因，仅仅“归功”于土耳其人似乎有失公允。事实上，奥斯曼帝国阻断商路一说，更多体现在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土耳其人开始占据了东地中海的海上优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再也无法获得来自东方的商品，但海洋控制力的削弱，无疑极大影响了威尼斯等海上共和国议价能力，并拉高了这些商品在欧洲的物价。以最负盛名的胡椒为例，15 世纪末，欧洲人从威尼斯人手中购买 100 磅的话，需要花费 80 个金币。而在印度，达·伽马仅仅花费 3 个金币就可以买到。这其中能够为葡萄牙人带来的利润有多么的丰厚，就可想而知了。



### 达·伽马船队

客观的说，奥斯曼帝国的敌对态度，固然是威尼斯商人走向末落的重要原因，但真正将他们挤出地缘政治舞台的，还是新航路的开通。这就好像出租车再贵，只要能够通过限制牌照而获得垄断地位的话，都会有消费者不得不为之买单。只有在政府允许网约车野蛮成长的时候，出租车行业才会真正感觉有穷途末路之感。悲剧的是，现在政府人为拉高网约车的定位，终于让出租车这个僵尸行业又看到了一丝曙光。让葡萄牙人值得庆幸的是，唯一有可能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管制”的罗马教廷，并不会为了保护威尼斯这类地中海掮客的得益，而对他们的扩张行为进行限制。

离开了马林迪的达·伽马船队并没有继续沿海岸线北上，而是在阿拉伯领航员和风的帮助下，开始了横穿印度洋直奔印度（南部）的旅程。几年前哥伦布的跨大西洋之旅，也是在风的帮助下做到的。比起无知无畏的哥伦布，有阿拉伯人帮助的达·伽马，所冒的风险倒是要小得多了。与在大西洋上帮助哥伦布的西风、信风不一样的是，北印度洋地区盛行的是“季风”。所谓季风，顾名思义就是在固定季节吹来

的风。帮助达·伽马驶往印度的季风，是每年5-6月开始盛行于北印度洋（赤道以北）的“西南季风”。

所谓“西南季风”的来源，其实也是“信风”。每年北半球夏季之时，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北移，在越过赤道后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向东北方向发生偏移，并在北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形成“西南季风”（由于海域狭窄，本该盛行于北印度洋地区的“东北信风”并不风行）。印度、东南亚，甚至中国西南地区，每年5-10月份都会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海洋吹向陆地的西南季风，为上述地区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尽管这些降水经常会造成洪涝灾难，但在掌握自然规律之后，这些地区的还是依靠西南季风的润泽，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农业地区以及人口密集区。

达·伽马是在1498年4月抵达肯尼亚，并于当月24日从马林迪启航。马林迪的位置距离赤道仅有约250海里的距离，这意味着幸运的葡萄牙人恰好能够赶上北印度洋即将刮起的西南季风，抵达他们梦寐以求的印度。

## 第十二章 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建立国家与文明

### 第一节 印度河文明的初始位置和特点

随着达·伽马一步步的迫近印度，令葡萄牙及整个欧洲为之沸腾的“发现”，终于要在15——16世纪相交之际到来了。无论对于贸易者还是掠夺者来说，一处文明之地远比一片荒蛮之地（哪怕资源丰富）要更有吸引力。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更加密集、文化/技术更发达，政治体系更成熟的话，那么它所积累的财富也必将是惊人的。

在欧洲人的思维里，印度早已被描述为一片黄金遍地的土地，不过很显然他们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来了解这片土地。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问题。虽然佛教、种姓、雅利安、宝莱坞……等种种源自印度的标签，已经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中。之前随着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征服者的征程，我们也多次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从西北方向触及过这片大陆，但这些碎片式的信息还不足以帮助形成一个关于印度的大历史架构。更何况这次达·伽马登陆的地点，是之前内容并没有触及过的“南印度”。

从技术上看，大英帝国的登场，将是一个解读印度地缘结构的最好契机。毕竟现代印度—南亚次大陆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也与这个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史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作为大航海时代开启的直接动因（寻找印度），借助葡萄牙人的登陆，来梳理一下印度中世纪及之前的历史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印度比之黑非洲那些尚处在文明前（或初级）阶段的地缘板块，看起来要强大太多。随着欧洲列强在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的扩张，最起码很多人会感兴趣印度本土文明有没有机会遏制这一势头（又或为什么没有做到这点）。基于中、印两国都是屹立于亚洲的两大文明古国，从大历史的角度将两大文明的变迁史及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做一个对比，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古老国家的前世今生。尤其二者似乎在各方面，都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

首先就“印度”这个标签的初始含义来说，并非指向的是现在的印度，而是今天大部为巴基斯坦所有的印度河平原。最初在“印度”这片土地上创造文明的，也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雅利安人”，而是今天生活在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这些黑皮肤土著所创造的文明被称之为“印度河文明”。在中央之国—西域部分时，曾经对整个印度河平原的地缘结构有所解读。西南季风所带来的水汽从印度河流域东侧滑过，滋润了今天属于印度的恒河流域、德干高原等地区，却没有给印度河平原带来多少降雨（同时被错过的还有阿拉伯半岛）。整体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的印度河平原，纯粹从气候角度来说本该是一片沙漠的。不过幸运的是，印度河平原的西、



北部是由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所组成的高地集水区，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天然水塔”。上述高地汇流下来的河水，在印度河平原的北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积扇。因其主要有五条大河，所以被称之为“五河之地”。20 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家就是在五河中“拉维河”流域的哈拉帕城，第一次发现印度河文明的遗迹，印度河文明也由此又被称之为“哈拉帕文明”。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划分中，五河之地的“上印度河平原”通常被称之为“旁遮普”地区（旁遮普就是“五河之地”的意思）；五河合流之后向西南方向冲破沙漠的阻隔注入印度洋，这段下游河道所冲积出来的绿洲则是“下印度河平原”，也被叫做“信德”地区（巴基斯坦信德省）。需要说明的是，旁遮普地区今天大部分属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但也有小部分属于印度（旁遮普邦）。之所以会这样，无他，实在是因为这片土地太过富庶，且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当年印巴分治时，印度不愿意将之全数让给巴基斯坦，就像印度同样不能放手克什米尔一样。相比之下，信德地区的情况就简单多了。与诸多大河滋养的沙漠绿洲带一样，印度河下游地区少有补水，导致绿洲平原的体量较五河地区要小。这使得“下印度河平原”的东面还存在大片的沙漠地带。这片被称之为“大印度沙漠”或“塔尔沙漠”的干旱地带，成为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天然分割线，并使得巴基斯坦能够独占信德地区。

有更多阳光和热量，同时又有高山补水的地区，总是更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机会。灌溉农业技术所带来的农业产量剧增，又是大多数文明产生的基础，印度河流域也不例外。哈拉帕文明所留存的遗址，在上、下印度河平原都有所发现，文明存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 2500 年－前 1700 年。就这个时段并结合它的位置来说，很显然是受到了公元前 3000-4000 年，就凭借灌溉农业而兴盛的两河文明影响。另一个可以提供参考的证据，是这两个地区都属于有高地补水的热带沙漠气候区，共同的地理背景使得印度河流域更容易消化来自波斯湾的技术。基于两大文明的位置，两河文明很有可能是通过海路向印度河平原输入文明因子，考古方面的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将哈拉帕文明所处的时段对应中国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所兴盛的年代，大体与华夏文明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相对应（公元前 21- 前 16 世纪）。两大文明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处在青铜时代初期，除了部分使用青铜器以外，还有大量石器时代的工具遗存；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并使用了技术上最有利于承载历史的汉字。这使得后来的中国人即使再难看到夏王朝的遗迹，也有理由相信它的存在；印度河文明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案例，如果不是上世纪初的考古发现，今天的人们依然会相信，雅利安人才是这片土地的文明初创者。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有遗址支撑的印度河文明相比夏王朝，能够显露出更多的信息。如城市、灌溉农业遗址，甚至印章文字。不过如果有一天夏王朝考古获得重大突破，那么能够和历史记录相互印证的夏王朝的话，将比印度河文明更有生命力

（如殷墟之于商那般）。印度河文明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其实并不是孤例而是常例，如华夏文明这样数千年一脉相承下来才是特例。这与两大板块所处的地缘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印度河流域所处的位置，固然使之更有机会与周边文明地区交流并受益，但也让它处在一个更危险的境地。那些从西、北方向，或陆或海而来的外来因子，并不总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进入。相比之下，华夏文明就要“安全”得多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这一地缘上的封闭性，也曾经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间里，让中央之国没能踏上工业化时代的第一班车。

一般认为，印度河文明的终结者是从西北方向而来的雅利安人。然而就考古方面的证据来说，印度河文明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就已经呈现出衰弱的迹象。造成这一情况有直接原因，有可能是冰川融化所带来的过量洪水；也有可能是其它外来民族的入侵，毕竟印度河流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地缘板块。如果有人抢在雅利安人之前，给过这个文明以致命的破坏也属正常。不过从雅利安人的记载来说，他们的确是那些黑皮肤土著的征服者，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塑了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地缘结构。

事实上，几乎与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同时期，东亚的夏王朝也同样遭遇了来自北方“商人”的致命一击（约公元前1600）。与终结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人类似的是，取代夏人建立“商王朝”的商人，也是一支游牧属性的民族。做中印文明比较的话，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正是这之后的历史。东亚与南亚地缘文化的不同走向，也正是由此开始。

## 第二节 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创立宗教体系

葡萄牙人并不是最早到达印度的“白种人”，雅利安人入侵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件。“印度人”也因此种族属性上，经常被归入与欧洲人同类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然而问题在于，现实生活或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印度人（尤其是南印度），很多会与大家印象中的“白种人”有很大差别，尤其在感官上要“黑”得多，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热带气候影响所能解释的。为此，我们接下来要看看，这些从欧洲方向而来的“白人”在印度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一般认为，雅利安人最初游牧于里海-乌拉尔山脉一带的草原地带。这条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黑海之滨的草原地带，在地理上统称为“西干草原”。蒙古高原所属的草原地带则属于“东干草原”，两条草原地带又合称为“欧亚草原”。这条横亘于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地带，既是世界上最宽广的草原带，也一直是全球游牧中心。游牧者所争夺的不仅仅是草场的控制权，还会不失时机的向草原外围的各个农业中心渗透。这种渗透本身并没有特定方向而是全方位的。可以说，中国、欧洲、印度、西亚两河流域等大陆边缘地带的农业中心区，数千年来都在遭受着来自欧亚

草原的入侵压力。每一代游牧者在进入边缘农业区后，草原上又必定会有新生游牧势力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并且对那些已经适应定居生活的先辈们构成新的压力。如此周而复始的一幕幕直到工业时代，边缘定居者对游牧者拥有绝对优势后，方被完全终结。

公元前 2000 前后，雅利安人开启了他们的大迁徙之路。需要注意的是，操“原始印欧语”的雅利安人并非“高加索人种”的全部。在他们之前和之后都有与之种族属性相同的其他族群向外扩散，比如比雅利安人更早迁入西欧的“伊比利亚人”。在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中，这些伊比利亚人还在在西班牙保有一定的地缘政治空间。不过现在，就只有身处西班牙、法国相接地带的“巴斯克人”，可以通过语言学将自己的历史与伊比利亚人相连了。因此所谓“雅利安人”后裔，其实更应该是一个“印欧语系”语言集团的统称。至于当年第三帝国的统治者希望沿着这条语言线上溯，将之变成一个种族概念（并为帝国的扩张找到地缘基础），只能说是政治需要了。有鉴于这段经历曾经将“雅利安人”的概念污名化，这一语言集团的源头也可被称之为“古印欧人”（或原始印欧人）。

一个民族 / 语言集团的迁徙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多批次延绵不绝的。这一点可以从与我们时代更近的，源自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的扩散得到验证。正是由于这些古印欧人在迁徙时间、方向上不同，才在最终定居地造就了种族属性相近，语言上却有所差异的不同族群。比如向西迁往欧洲方向的雅利安人后裔，就分别形成了凯尔特人、拉丁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波罗的人等族群。上述几个族群标签之所以能够并立，是因为它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之下的“语族”级别。在现实政治中，这些语族下面又会因各种地缘环境差异分化出许多民族来。

关于诸印欧语系民族在欧洲的前世今生，在之前解读欧洲的过程中已经详尽理出过脉络来。现在随着葡萄牙人即将登陆印度，我们的关注点是那些南迁的雅利安人。伊朗高原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必经之路，由此也造就了雅利安人南支的两大语言集团：伊朗语族和印度语族。后者就是通常所说的“印度雅利安人”，也正是这支雅利安人所创造的宗教，成为了今天印度文化的基础。

从人类认知的角度解读宗教的发展过程的话，无论东、西方大体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信仰、一神信仰。基于理解自然的能力有限，最初的人类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魂（也包括自己的祖先），并试图用祭拜的方式使自己免受其害（或者庇护自己）。这种自然崇拜的做法在今天依然十分普遍。比如说在中国许多地区，一棵树龄明显比周边树木高出一个量级的古树，往往会被当地民众认为是有“灵”性之物加以祭拜，就是万物有灵观念的遗存。

祖先崇拜是宗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以及知识 / 经验的积累，原始氏族阶段的人类，开始寄希望于祖先的灵魂能够给自己以最大的保护（包括对抗其他氏族的攻击）。这一阶段并不是和万物有灵阶段割裂开，而只是



说在万物有灵的“泛灵论”观点中，寻找一个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主灵。以刚才中国民间崇拜神树的案例来说，这种行为并不会影响中国宗教思维中祖先崇拜的中心地位。

在转换的最初阶段，人类并不十分确定自己的祖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帮助自己对抗自然力，图腾崇拜文化便因此而诞生。图腾崇拜的表现一般为将某种特定的动物（有时也可以是植物），视为自己氏族血统的一部分加以崇拜，因此也可以被归为祖先崇拜的一种类型。比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就是图腾文化的反映。技术上有可能是各氏族图腾之集大成者的“龙”，以及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其实都是图腾－祖先崇拜文化的产物。在原始氏族阶段，为自己的族群标明一个图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自己的氏族与其它氏族区别开来。毕竟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终将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自然力，而是与自己相同属性的“人”。

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这些宗教类型，往往会被归类为“原始宗教”，甚至不被认定为具有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一神教的西方人往往会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而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却总感觉各种宗教性质的活动却比比皆是的原因。即使在无神论占主体思想的当代中国，这些行为也常常被鄙称为“封建迷信”。至于那些貌似层级更高，有体系教义的多神、一神信仰，则被认定为有合法地位“宗教”而加以保护（虽然之前也有被当成“迷信”的阶段）。

纯粹从宗教体系、传播力来说，“原始”宗教一说倒也并无不妥。这一阶段的崇拜对象与其说是“神”，倒不如说是“灵”。印度河文明以及中国同阶段的华夏文明，无疑都属于这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由原始氏族阶段向国家阶段过渡，“原始宗教”在技术上的缺陷开始显现。如何建立一套更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以维系不同属性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摆在东亚、南亚两大板块面前重要课题。中、印两大文明，也由此开始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公元前 16 世纪前后，雅利安人和殷人分别在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取得优势。马车及青铜兵器的运用，是这两个民族得以地缘扩张成功的技术原因。由此甚至出现了将建立商朝的殷人认定为“雅利安人”的说法。不过从地理距离以及商朝的遗存来看，这种说法显然是很难成立的。虽然这并不能排除殷人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有可能受益于由西而来的游牧者，抑或其本身含有游牧基因。不过这一切的真相如何，实际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在周王朝建立之后，认定自己属于华夏后裔的周人，已经很好的将商人和商文化融入了华夏体系，并且将华夏文明一脉相传的延续至今。换句话说，即使殷人的确有着迥然不同的出身，他们最初的这些不同也正如哈拉帕文明的缔造者一样，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雅利安人与殷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融入了本已存在的“华夏文明”体系，这一点在周王朝建立之后亦得到了正式的确认；雅利安人则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文明体系。鉴于雅利安人所创造的以种姓、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

为特点的文明体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会继续根植于这片土地，将“印度文明”的起始点上溯到公元前16世纪前后，而不是已经湮灭的哈拉帕时代会更为合适。

导致雅利安人没有与创建印度河文明的达罗毗荼人相融的最大原因，在于二者之间巨大的种族差异。达罗毗荼人在种族上属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人。在武力和体质上都占尽优势的雅利安人，自视为“高贵之人”（雅利安的原意），并不愿意自己的种族特征受到“污染”。由此而产生了种族隔离制度，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种姓”制度（所谓“种姓”二字的原始含义即为肤色）。

文化是人类摆脱原始宗教阶段的重要武器。正是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整理，让仅仅依靠祭师口口相传的原始宗教仪式，开始体系化并最终进化为有典籍传承的多神/一神教。记录和神话雅利安人早期历史、文化的古老文献，是四部被称之为“吠陀”的经典（合称“四吠陀”）。吠陀经也是当代印度教与早期婆罗门教最根本的经典，编订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这一印度文化形成的历史阶段，也被称之为“吠陀时代”。如果对照中国历史，大体就是商朝至东周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东亚的华夏文明同样确立了以“周礼”为表现形式的系统化行为规范。也可以说，两大文明的社会典章制度，基础都是在这一阶段打下来的。

接下的历史，两大文明的走向依然惊人的相似。中国开始由春秋时代转入战国时代，印度则同样进入了“列国时代”。当然，两个时代的相似点决不仅仅在于出现群雄并立的局面。至于说还有哪些异同，接下来的印度又将走向何方，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中国春秋战国与印度列国时代的异同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相信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了。首先这是一个国家形态重塑的过渡阶段，随着战国阶段的结束，之前由周王朝强化过的“封建”模式开始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帝国形态，开始登上东亚地缘政治舞台，并由此在这片土地上运行了2000年；其次这又是一个各种学说竞相登场的时代，儒、道、法、墨、纵横……构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地缘政治上异彩纷呈的局面，是这些学说涌现的基础。基于竞争的需要，各国统治者都希望借创新思维之机，取得比较优势。

值得注意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并立局面，是经过长时间磨合自然博弈形成的。看似纷杂的局面，内核却存在很大稳定性。以至于秦国凭借军事优势完成一统之后，很快就又在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遗民反攻下土崩瓦解。而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基于时间沉淀而形成的稳定性，一方面使得统治者意识到，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点，而是需要触及根本的全方位一揽子解

决方案。所谓“变法图强”中的“法”并不是专指律法，法字从水，其本意为公平、平衡，一个兼顾各方平衡的，能够建立新秩序的“法”才是真正的大法。

另一方面，诸国在战略层面谋求突破的需求，促使参与争鸣的各家学说，都趋向于从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至后人在评说那个时代时，都会认可诸学派的佼佼者堪称思想家、哲学家。比如墨家虽然军事防御战术上的贡献很大，但这样做的本质是为了说服统治者接受其兼爱、非攻的哲学思想（虽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墨子的想法显然又过于超前了）；又比如身为“兵家”的孙武，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也绝不仅仅是一本事关军事战术的书。

写到这里，顺便谈一下关于分裂和统一的话题。《三国演义》开篇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历史上那些分裂、战乱的年代给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难回忆，使得大一统思维成为维系华夏文明命脉的核心线。不过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技术角度解读分裂时期是否也能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些别样的环境。

人才和创新思维在大分裂时代能够拥有更多展现机会，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乱世出英雄”之说便说的是这种情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民国、三国时代这样的短期分裂局面，本身并不足以促进思维方式的质变。毕竟地缘影响力需要一个较长时代的累计，才能显现出来。一个王朝最危险的时期往往是在前三代，需要所谓“英主”稳定局面（秦、隋就是这方面的反例）。一旦治下的每一个国民都出生在这个朝代，即使出现一些“庸主”，趋于稳定的统治秩序 / 官僚体系，以及民众意识中的天然认同感，也能够推动王朝继续运行相当长的时段。有鉴于此，此种分裂局面所展现的更多是一些谋略方面的技巧（比如三国），而非文化上的创新。

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是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方面的大家，以至于有人会很怀念那个时代。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思想活跃度，主因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19 世纪下半叶，中央之国封闭的地缘结构被迫渐开，在外来思想、先进技术的冲击下，华夏文明不得不被动处在一个战略转型阶段。当束缚思想的大清帝国成为历史之后，自清末洋务运动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维量变，得以在民国这个纷杂的地缘舞台上释放。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处在统一阶段的中国，是否又会因为稳定而丧失了思想创新的活力。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倒也不必十分过虑。毕竟“固步自封”的前提在于封闭。今天身处这个世界中的中国，早已不可能回到关起门来一家独大的状态。即使华夏文明的内核是稳定、和谐，外部剧烈的竞争环境也会推动其适应新变化的。

再来看看印度的情况，公元前 10 世纪中叶，雅利安人从印度河平原开始向东部的恒河平原扩张。达罗毗荼人的空间则进一步的被压缩入了以高原地形为主的南印度。在这个扩张进程中，原本还处在部落阶段的雅利安人开始完成国家化进程，并完善了以《吠陀经》为理论基础的婆罗门教 - 种姓社会架构。为了区别于达罗毗荼



人所创造的“印度河文明”，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印度－雅利安文明”。这些早期印度－雅利安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完成了进一步整合，使得北印度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几乎同期之时，也进入了一个乱而有序的新时代——列国时代。

中国的战国时代有“战国七雄”之说。印度的列国时代之始，在包括印度河、恒河流域在内的北印度，则存有十六个较大国家。这两个时代过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统一的帝国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统治秩序的进化中处于同一阶段。中国战国时代与印度列国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在三代（夏商周）时就已经完成过政治上的整合。在大历史层面，战国时代更应该被看作原本由周王朝强化的“列土封疆”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印度的列国时代，虽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向“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但后来统一印度的几个“帝国”，统治结构却并非是“中央集权式”的。

从统治方式来看，印度列国时代则是印度雅利安文明，从原始部落共和阶段向君主制国家过渡的阶段。换句话说，印度所将要完成的这一进程，其实中国在三代之时已经完成了。客观的说，历史上大多数所谓“帝国”都达不到中央集权的标准，或者说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央集权”模式。以至于用“封建”这一西方概念来概括自秦开始延续2000年的中央之国政治体系，变得十分的可笑。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在于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地区地缘结构开放且复杂，很难像地处东亚的华夏文明那样，完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全方面同化工作。比如奥斯曼帝国如果一定要求治下之地全部都融入突厥－伊斯兰体系的话，那么他们在巴尔干的统治将几乎没有可能稳定。

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雅利安人主观上，竭力避免与土著的达罗毗荼人融合。由此而诞生的“种姓”制度，又反过来进一步固化了自己内部，以血缘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细分统治秩序。并最终使得印度历史上那些表面基本完成政治统一的诸“帝国”（包括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内部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成百上千拥有自己统治体系的邦国。

不可否认的是，纯粹从统治技术上来说，中央集权体系要更为先进，能更好的调动内部资源（降低消耗）。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集权体系就一定比各地区保有高度自治权的分封体系（等同于现在的联邦制）更好，只能说是适应不同地区地缘环境的产物。这就好像并不能认为“一神教”就比“多神教”或者“祖先崇拜”等被归入原始宗教体系的信仰更好一样，但从宗教发展及扩张的技术角度看，一神教体系的确算是宗教发展的终极阶段了。

抛开因地缘环境不同而造成的统治架构方面的差异，再来看中印两国在文明进程方面的变迁会发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相交之时而开启的印度“列国”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碰撞的大时代。如果说中国这一阶段思想碰撞的具体体现，是“诸子百家”这类直接服务于建立统治秩序的入世哲学，那么印度列国时代则一如这片

大陆所呈现给世人的印象一样，进入的是一个宗教百花齐放的时代。佛教、耆那教等成为古印度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都是在列国时代初期而兴起的。

印度列国时代成为各种宗教思想繁盛期的背景，与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是相一致的。各个基于长期地缘磨合而形成的政治体，都希望借助更先进的学说帮助自己脱颖而出。事实上，同时期的欧洲文明中心——希腊也进入了一个“城邦时代”（公元前8～前4世纪）。在这个古希腊文明昌盛的时代，政治上形成了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专制制”，及以雅典为代表的“贵族民主制”的两大体系。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大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二者碰撞的政治体现。

总的来说，在公元6世纪前后，欧亚大陆的几个文明中心都进入了一个文明完善升级、政治转型的阶段。结束中国战国时代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标准）的帝国：秦帝国；结束希腊“城邦时代”的，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同时也是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有趣的是，不管是秦国还是亚历山大出身的“马其顿”，其本身之于华夏、希腊文明来说，出身都不能算是很正。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边缘地位，能够为原有的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包括更没有包袱），才使之在诸侯/城邦相争的纷杂时代中脱颖而出。

当然，秦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短命。作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先行者，这看起来更像是他们的宿命。真正让两大板块稳定进入帝国时代的，是后来从前者汲取教训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至于印度，又会是谁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那些列国时代诞生的宗教思想又有没有对印度雅利安文明的基础：婆罗门/种姓文化造成过重大影响？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四节 波斯拜火教无法同化印度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并非唯一进入南亚次大陆的“白种人”（可能也不是第一支），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帝国在大流士的统领下，向印度河流域扩张。从种族角度看，这可以被视作“高地雅利安人”（伊朗）与“低地雅利安人”之间的战争。当然，两支雅利安人后裔分化已久，早已变成了文化皆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在波斯这片高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叫作“琐罗亚斯德教”，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祆教”，俗称“拜火教”。

拜火教很多时候被归类于比较特别的“二元神教”，既认定世界是由善神所创造（善神的化身是“火”），而恶神则在尽一切力量破坏这个世界。这一源自波斯的古老宗教，很多教义后来被同样兴起于波斯的另一个二元神教“摩尼教”所吸收。后者因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之故在中国知名度甚高（书中称“明教”）。由于二元神教认定善神终将战胜恶神，所以也有人认为二元神教也算是一种“一神教”。然而我们所称“一神教”中的一神是一个绝对概念，不能存在任何其它人格化的神。

拜火教显然并不符合这个要求，更何况它的宗教体系里还有其它神祇的存在。因此，拜火教本身仍属多神教的一种类型。其看起来有些偏向一神教体系的教义，后来反而成为其抵御伊斯兰教入侵的弱点。毕竟作为 3.0 版本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在强调“神”的唯一性、主导性方面要更为强大。

今天在伊朗地区，几乎看不到拜火教徒的存在了。而在与之相邻的印度西海岸，却还有一支人数仅数万，却对印度经济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拜火教后裔——帕西人存在。所谓“帕西”的原意，其实就是波斯。在印度，帕西人的存在一如犹太人在美国的存在，印度最大的企业“塔塔集团”就是帕西人的产业。另一个让“帕西人”声名鹊起的事件，是一个叫做“费罗兹·甘地”的帕西青年成为了尼赫鲁的女婿，并由此诞生了印度政坛最为显赫的“尼赫鲁·甘地家族”。

由于这个帕西青年的姓氏与圣雄甘地太过相似，以至于很多人愿意相信，当初甘地为了成全这段姻缘，曾经将自己的姓氏送给那位帕西甘地。不过圣雄甘地本人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政治遗产，留给“尼赫鲁-甘地家族”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毕竟这种说法能让那些后来姓甘地的印度总理，在政治渊源上将更为印度民众所接受。相比之下，帕西人在印度定居的古吉拉特邦，在地缘上有何特别之处会更值得关注。要知道，古吉拉特邦也是今天印度总理莫迪的“龙兴之地”。正是在因为在古吉拉特邦的施政成功（尤其是经济上的），莫迪才会成为印度总理，并成为印度成就大国梦的希望。

上述问题的答案，将在后面的内容中逐步揭晓。现在还是回到拜火教的鼎盛时期，去看看它有没有机会引领“伊朗雅利安人”去同化印度雅利安人。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上曾经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不仅它没有做到，包括后来主导南亚次大陆政治将近千年的穆斯林，以及携技术优势而控制整个印度的大英帝国，也没能在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信仰压倒印度教。这并不是说，印度教的教义本身比之其它宗教更为强悍，而是在于印度教与“种姓制度”完全融为一体，成为了印度社会结构、文化的基础。比如在印度神话中，上古之神“普鲁沙”的身体各部分，化身成为了世间万物的基础及诸神。其中他的口变为婆罗门，双臂变为刹帝利，双腿变为吠舍，两脚则变为首陀罗。类似的设定，让彻底改造印度变得极为的困难。

如何统治人口远多于自己的印度，是任何一个入侵印度的外族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接受印度原有的种姓制度，是控制这片土地的最有效方法。二者间达成妥协的通行办法是，入侵者不破坏印度原有的宗教、社会结构。同时身为祭司阶层的“婆罗门”，给予征服民族“刹帝利”的阶层的地位，并帮助其统治印度。类似的情况在中央之国也同样存在。华夏文明本身在技术上虽然没有一神教那么容易“普世”，却深深的与这片土地结合在了一起。汉字、姓氏、节气……等等文明因子，无不成为华夏文明内在基因的一部分。想要将之推倒重来，再造一个文明体系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汉化”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一旦他们愿意这么做（比如重开科举），那些承担华夏文明传承的士大夫 / 知识分子阶层，便会接受这个带有异族血统政权的存在。

在列国时代初期侵入印度河平原的波斯帝国，算是雅利安人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尽管印度雅利安人还能保有旁遮普地区的东部，但印度雅利安文明的地缘中心则不可避免的向恒河平原转移了。这种情况与西周末年因关中平原遭遇戎狄入侵，而被迫将统治中心迁往洛阳变成为“东周”颇有些相似。300年后，波斯帝国进入了衰弱期。不过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则站在波斯的肩膀上，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帝国，并继承了波斯帝国在印度河平原的遗产。

对于一个内部呈分裂状态的地缘板块来说，强大异族入侵有时会是一件好事。面对危机，民众心理会希望看到各方结束内部纷争以共同对外。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开启侵华战争之后，便曾经在中国出现。包括东北易帜、国共合作等一系列促成“统一”的政治妥协，可以说都是在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旗帜下达成的。2300年前，亚历山大的强势入侵，便为印度结束已经运行了3个多世纪的列国时代提供了契机。

## 第五节 孔雀王朝收复印度河平原和统一印度

亚历山大能够合希腊之力东征，是因为他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对希腊的成功征服。这次征服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几乎与此同时，印度的列国时代也开启了统一进程。完成这一进程的是北印度雅利安十六国中，兴起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一带）。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个北印度国家内部完成了一次王朝更迭，新上位的王朝被称之为“难陀王朝”。随后难陀王朝统治下的摩揭陀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并逐步吞并其它恒河平原的印度雅利安国家。当亚历山大的大军进入印度河平原，准备继承波斯帝国遗产之时，难陀王朝也完成了北印度的统一，并试图向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及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扩张。

在亚历山大开始东征之时，波斯帝国仍然在印度河流域保有一定统治力。大流士三世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大军中，就有来自印度的军队。当然，这种统治更多是采用一种不触及当地原有社会结构的羁縻方式，以帝国派驻的总督作为统治纽带。应该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东征，难陀王朝将很有希望帮助印度雅利安人，拿回被波斯羁縻统治的旁遮普地区的。毕竟此时的波斯帝国已经开始没落，数百年来所累积的矛盾，将使之无暇顾及帝国边缘的印度河流域。换句话说，一个处在“分久必合”阶段的北印度，相对“合久必分”的波斯时将会更占据优势。事态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相对）的大帝国，将会被称之为“难陀帝国”。然而虽然完成了这一开创性事业的政治势力，的确来源于摩揭陀国，但王朝的名称

却变成了“孔雀王朝”。在印度历史上取得堪与亚历山大帝国、秦帝国比肩成就的开创性帝国，也被烙上了“孔雀”的标签。

孔雀帝国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原为摩揭陀国贵族，他在印度河流域击败亚历山大留在印度的军队后，携收复“失地”之功，回军僭越上位成功（其实难陀王朝当初也是如此）。这个故事与宋太祖通过“陈桥兵变”代周建宋的典故颇有些类似。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北上抗击契丹入侵的赵匡胤并没有真的抵达前线（只是借抗敌之由拿到领兵权），便能够黄袍加身；旃陀罗笈多则是自己看到了机会，在旁遮普的“反马其顿战争”中壮大了自身，再回到母国夺取政权的。类似故事，在东西方历史中比比皆是，我们更关注的此类故事背后的地缘轨迹。尽管“旃陀罗笈多”的起点不如赵匡胤高（后者本身为领兵将领，前者则是被放逐的贵族），但他所面临的机遇却要好得多。亚历山大在征服干燥的印度河流域之后，恒河流域湿热的气候环境，严重影响了马其顿军团的横扫全印度的决心；另一个影响士气的因素，是马其顿军团出征十年以来，所扩张的领土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军团成员，都希望能够享受一下胜利果实了。

从地缘角度看，将南亚扩张线暂时止步于印度河流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之前的波斯帝国，以及之后的很多入侵者都曾经这样做过。雅利安人本身也是在印度河流域盘桓了几个世纪，才继续向恒河平原扩张的。不出意外的话，代表印度-雅利安文明整合了恒河平原的“摩揭陀国”，将与亚历山大帝国在旁遮普地区展开长期的对抗。然而意外总是无处不在，离开印度的亚历山大很快便因病去世，这使得他所开创的帝国事业没有能度过最初的危险期，便进入了权力斗争的高峰期。亚历山大留驻于印度河平原的帝国总督将领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站队，而不是如何管理这片土地。这种纷乱的局面，也为印度雅利安人重新拿回印度河流域的主控权提供了契机。

正是借助亚历山大离世所造成的混乱，被放逐的摩揭陀贵族迅速抓住机会，在印度河平原的“反马”战争中做大自己，取代难陀王朝建立“孔雀王朝”。当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领通过“继业者战争”（公元前322-前301年），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政治遗产大致按亚、非、欧的地缘属性瓜分为三块之时，孔雀王朝也已完成了对北印度的政治重塑，并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前来印度河平原接收亚历山大遗产的希腊人。

公元前305年，孔雀王朝与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亚洲部分的“塞琉古王朝”的战争开启。不过这场战争并没有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而是很快以双方缔结和平条约（并联姻），塞琉古王朝退出印度河平原的结果收场。这也是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印度本土政权成功抵御外部入侵的案例。造成这一结果的，除了北印度正处在统一之后的高峰期以外，这很大程度还因为对于塞琉古王朝来说，印度并非势在必得的核心区。基于在“希腊化”世界中争霸的需要，塞琉古王朝的关注点一直在东地中

海地区，王朝的首都也因此设在地中海东北角的安条克。如果此时的印度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的话，那么接收曾经被波斯长期经营，并见识过马其顿军团威力的印度河平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就现在情况来看，塞琉古王朝如果一定要“拿回”并固守印度河平原的话，显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退出印度河平原的塞琉古王朝也并非一无所获。印度拥有的丰富的物产，使之在进入文明期后，一直是东西方贸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双方决定不再以战争形式解决矛盾时，随之而来的必将是贸易的繁荣。对于骨子里浸透商业基因的希腊人来说，对土地的直接占有从来不是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这其中所带来的好处，甚至直接反映在了军事层面。从印度引入的战象（最初 500 头是在缔结条约时由孔雀王朝赠送的），在接下来塞琉古王朝的西方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苦于得不到印度战象的情况下，不得不谋求训练非洲森林象来抵消塞琉古王朝的这一技术优势（结果并不理想）。

如果说塞琉古王朝的野心是在东地中海的话，那么孔雀王朝想做的无疑是统一整个南亚次大陆了。这一愿望在孔雀王朝更迭到第三位君主时得以实现，堪称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阿育王（公元前 273—前 232 年在位），向南征服了德干高原腹地、向西扩张至兴都库什山脉，基本完成了南亚次大陆的统一工作（除了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一带以外）。然而表面的政治统一，并不能掩盖孔雀帝国所面临的内部矛盾问题。要知道政治统一的基础是民族与文化的认同，而对于地缘结构复杂的南亚次大陆来说，这却又是最大的问题。

整合印度所遇到的障碍，具体来说就是婆罗门阶层对信仰的垄断权；以及种姓制度在吸收外来民族时，所遇到的结构性障碍。首先来谈谈婆罗门阶层和信仰问题。大多数资料介绍印度教时，往往只是简单用印度教源自古代的“婆罗门教”一笔带过，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二者之间是否有区别，又是否只是一个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叫法。事实上，二者之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简单点说，印度教是婆罗门教的升级版。也正是在升级之后，印度教才不仅限于印度雅利安人，而是成为了通行南亚不同民族集团的宗教。

从技术上看，婆罗门教与印度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进入了偶像化、人格化时代，而婆罗门教时代则有更多原始宗教的成分。在婆罗门教时代，掌握祭祀权的婆罗门阶层是人与神明沟通的唯一途径。信仰的基础就是由婆罗门设定的各种复杂宗教仪式，以及身为祭司的婆罗门阶层（想象一下原始宗教里的“巫师”）。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婆罗门阶层更倾向于用宗教之力彻底固化社会阶层。参考西欧中世纪时期，罗马天主教廷与诸天主教政治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身为世俗统治者的刹帝利阶层，显然不会都对婆罗门阶层的这种权力垄断感到满意。

15 世纪末，西欧社会及世俗统治者与罗马教庭之间的矛盾，触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此后，以基督新教或“新教”为名的教派，成为了与天主教、



东正教并立的广义基督教（因为在中国，新教很多时候以“基督教”为名）三大教派。新教与天主教的本质区别，在于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理解的圣经之意，直接与上帝对话。由此将原天主教罗马教廷所主导的祭司阶层，置于了可有可无的境地。对于无法从罗马教廷那里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新教思想的产生也有助于自己摆脱罗马教廷的掣肘，建立有利于世俗统治者的秩序。至于印度教之于婆罗门教又做了哪些改变，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六节 婆罗门教升级为印度教的技术调整

婆罗门教进化的第一步，是将“神”赋予了人的性格、情感特征（人格化），以及形象（偶像化）。今天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分别为：梵天、湿婆、毗湿奴。其中梵天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湿婆是破坏之神、生殖之神；毗湿奴则是保护之神。事实上在印度教体系中神是非常多的，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上述三“神”成为了后来印度教的三大主神，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地缘背景。

首先作为世间万物的创造者，“梵天”在偶像化印度教时代占有一席之地是很自然的现象。在婆罗门教 / 印度教信仰中，世间万物都是“梵”的化身。未被人格化 / 偶像化的“梵天”神之前的“梵”，也是婆罗门祭祀沟通的对象。类似的演化进程在世界各地都曾经出现过，中国也不例外。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帝王会自称“天子”，并通过“祭天”仪式等行为，宣告自己天命所归的超然地位。这里说的“天”，本意与印度教中的“梵”是一致的，其人格化的形象“天帝”在华夏神话体系中被称“昊天上帝”。大家对这个天帝之名是不是很陌生？没关系，他在道教体系中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玉皇大帝”。

尽管在华夏神话以及道教体系中，天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并不代表他在民间信仰中就一定最受尊崇。在偶像时代，很多更接地气的“神”，往往成为了某一群体祭拜的主神。比如在做生意的人（也包括某些社团）看来，“关公”的信义会更符合行业价值观；而对于东南沿海的渔民来说，海神属性的“妈祖”，会比虚幻的“天帝”更能安抚他们对海洋的恐惧感。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祭天或者说与“天”沟通的权利，理论上是被“天子”所垄断的。即使天被人格化为“玉皇大帝”，这个高高在上的主神也不可能兼顾到底层民众的利益。更何况中央之国是个信仰繁杂的国度，并没有一种宗教信仰能够一统天下。

在印度教的演化过程中，抽象的“梵”变成人格化 / 偶像化的“梵天”之后，也同样如华夏文明中的“天帝”一样，在信仰体系中被架空。无论是原属雅利安人中的其他阶层，还是那些被吸收入印度教的其它民族，特别是生存空间被挤压至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都不愿意继续看到雅利安婆罗门阶层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在印度教内部，很少能看到“梵天”崇拜的痕迹（虽然梵天的

地位还很高)，另两大主神：湿婆、毗湿奴则拥有大批的信众。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会是这两个神，尤其这两个神被赋予的属性看起来是那么的相克，犹如二元神教中的善恶两神一般。

深入分析湿婆、毗湿奴信仰产生的原始地缘基础，我们会发现形象“完美”，常化身为各种形象拯救世界的毗湿奴源自于雅利安神话；湿婆崇拜则源自于达罗毗荼（印度河文明）神话，随后融入印度教体系中。当由婆罗门阶层所把持的“婆罗门教”成为阻碍印度社会融合的障碍时，印度社会的两大种族集团，在选择具体的主神时出现了分歧。优势地位的印度雅利安人倾向于选择形象完美的“毗湿奴”作为自己的信仰主体（这也是正常的选择）；达罗毗荼人则将代表再生能力的“生殖力”，及反抗精神的“破坏力”，融入“湿婆”信仰中。

今天在印度，湿婆信仰在南部及低种姓印度教徒中分布较广，具有“毁灭”与“再生”双重属性的湿婆神，能够为这些弱势者的心理带来更多希望；完美的毗湿奴则在北部和高种姓民众中更有基础。透过上述解读，这一地缘分布特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很多人感到疑惑的是，既然印度教源自于雅利安人，并且有强大的种族隔离特征，为什么今天的印度教，表面看起来却成为了肤色各异民族集团的共同信仰。

事实上就信仰或者说意识形态来说，源头在哪并不重要。即使最初来自于你的敌人，也不代表你不能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做一些改动，在彰显自己族群独立性的同时，为自己留下反征服的想象空间。曾经早于阿拉伯人进入文明阶段的波斯人，在被征服后最终选择了非主流的什叶派信仰，是可供参考的最典型案例。尽管很多人会为古波斯文明的衰弱感到惋惜，但最起码今天伊朗的宗教领袖可以认为，阿拉伯人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能够成为其传播意识形态方向。

虽然今天的印度教与最初的吠陀信仰、婆罗门教一脉相承，但也并不代表其在传承过程中没有遇到挑战。列国时代包括耆那教、佛教等在内的，倡导众生平等的思想流派兴起，并在印度的土地上广为传播。这些以反婆罗门祭司精神统治，及种姓的不平等制度为特点的思想，被统称为沙门思潮。孔雀王朝的创造者（旃陀罗笈多）在晚年归信耆那教、阿育王在征服南印度后变成虔诚的佛教徒，都是试图用沙门学说来解决印度内部矛盾的尝试。

然而沙门思潮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失去了市场，更多是为印度人提供了多种选择。也可以说，正是在沙门思潮的倒逼之下，由祭司阶层垄断人神沟通权的“婆罗门教”信仰，才进化为人人可以通过偶像崇拜、修炼身心（比如瑜伽）的方式，达到梵我合一境界的印度教信仰。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佛教等沙门学说在印度本土还是走向了没落。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缘因素，那就是无论这些流派如何倡导众生平等，但都无法解决印度各民族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

一方面高种姓者出于保护自己种族特征或者地位的需要，总会更倾向于让种族隔离制度现实存在。南亚很多伊斯兰化的地区，内部依然有种姓文化残留就是一例；

另一方面印度教中以族群、职业等为标签的阶级固化做法在现在看来，固然是一种落后的做法，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民族繁杂（并且还不停有新民族加入）的板块来说，却是稳定社会结构的一剂良方。最起码，由印度教—种姓固化的社会，不需要在每一次被征服后陷入内部混乱的状态。或者说那些外来民族的征服，不至于触发印度社会的内部矛盾，从而引发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当然，这其中又牵扯到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如何为那些强势入侵民族，在种姓框架内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孔雀王朝收复印度河平原之后，为遗留在此的波斯人、希腊人等民族集团解决种姓问题，成为了婆罗门教改革者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沙门思潮来说则不是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婆罗门教同样无法进化为能够通行全印度的“印度教”。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不改变四大种姓基础的情况下，以部族、职业等为标准，设定归类于三大种姓（不包括婆罗门）的“亚种姓”。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印度的民族集团，通常被归类于刹帝利阶层。这样的设计，完美的解决了入侵者的身份问题，并且不至于动摇以婆罗门阶层为代表的印度教基础。

从继承和发扬的角度来看，印度教与婆罗门教的继承关系，还可以比照儒家思想与周代礼制之间的继承关系。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最初所追求是“克己复礼”，行为修养以达到周礼的要求为准（《周礼》为儒家经典之一）。今天我们追溯华夏文明的体系源头，亦可追溯到周礼成文之时。然而周代初期的礼乐制度本质是服务于贵族阶层，在彰显等级制度存在的同时，也意味着只有贵族阶层才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传两千年，在于其将守“礼”法的要求及受教育权，推广到了全体民众中。这与印度教打破婆罗门教对于祭祀权的垄断，使之真正成为全民信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至于身份问题，“家天下”思维的华夏文明的通行做法，则是通过姓氏文化为融入华夏者找一个源自上古某“名人”的血统出身（这其中司马迁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 第七节 笈多王朝在孔雀王朝分裂后重新统一印度

阿育王死后（公元前 232 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孔雀王朝走向了分裂。达罗毗荼人覆盖的南印度以及民族混杂的旁遮普地区，相继回复到了独立状态。势力范围回缩至恒河流域的孔雀王朝，也于半个世纪后为新的王朝所取代。接下来，从中亚而来的塞种人、大月氏人（贵霜帝国）、嚙哒人（白匈奴），相继入侵印度河平原。这使得印度雅利安人的势力一直到公元 4 世纪中期，仍然如列国时代般局限于恒河流域。

重新复制孔雀王朝统一印度之路的新王朝，出现在公元 4 世纪初。这个同样崛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的王朝，叫作“笈多王朝”。公元 4 世纪末至 5 世纪初的“超日王”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北魏统一北方时期），笈多王朝基本恢复了孔雀王



朝的领土范围，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二个能够跻身“帝国”行列的王朝。与孔雀王朝一样，笈多王朝也是一个宗教政策宽容的王朝。一方面，婆罗门教向印度教的转型，在笈多帝国时期趋于完成。以梵天、毗湿奴、湿婆等三大主神崇拜为基础的“新教”信仰开始广泛流行，并成为笈多诸王的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包括印度河流域在内的南亚边缘板块，多信仰佛教等不那么突出种族属性的宗教，为了帝国内部融合的需要，佛教等非印度教宗教被允许自由发展。来自中国的东晋名僧法显，就曾经在自己的传记（《法显传》）中，记录下了笈多帝国鼎盛时期佛教兴盛的盛况。

现在看起来，整个印度似乎也进入了一个类似中国王朝更迭的轮回模式。改革后获得重生的印度教，重新成为了印度的主流信仰。虽然笈多王朝肯定有一天会走向衰亡，但在分裂一段日久之后，一定还会有新的印度教王朝崛起，重新建立基本统一南亚次大陆的新帝国。那些不断涌入印度河平原的入侵者，大多也逃不过被印度教融合的命运。然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印度教对手只是那些源自本土，与印度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沙门思潮宗教的基础上。宗教进化的终极形态：一神教，还没有对多神信仰的印度产生过威胁。一旦入侵者携带着更具攻击性和重塑性的“一神”信仰进入这片热带之地，情况又会变得怎样呢？

##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势力入主印度对其的影响

### 第一节 阿拉伯帝国和伽色尼王朝入侵印度

对印度地缘结构造成巨大威胁的“一神”信仰，很显然是一神教 3.0 版本——伊斯兰教。公元 7 世纪初，穆罕默德受前两个版本的一神教启发，创造了控制力 / 聚合力空前强大的伊斯兰教。使得原本处于松散游牧文化阶段的阿拉伯人，有机会将他们与生俱来的机动、军事能力聚合起来，并迅速扩张至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代表的定居文明区。在攻灭以伊朗高原为中心建立帝国的“萨珊波斯”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也开始触及印度河平原。

分析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前进入南亚的民族集团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雅利安人起，入侵印度河流域的民族集团，包括：波斯人、希腊人、塞人、吐火罗人（大月氏）等基本都属于“印欧语系”民族（白匈奴人不确定）。阿拉伯人所属的则是分布于阿拉伯半岛——北非地区的“闪含语系”民族。然而语言上关系远近本身，在地缘政治的意义并不大。就像韩语、日语即使被归类于阿尔泰语系（存疑），中亚国家也不会天然跟日本、韩国更有亲近感一样（虽然有民粹者会这样想）。

与之前的入侵者有所不同的是，阿拉伯人在印度采取了自南向北的征服路线。公元 8 世纪初，揭开阿拉伯帝国篇章的倭马亚王朝，在翻越俾路支斯坦的山地后，成功入侵了下印度河平原的信德地区，然后北上止步于南旁遮普地区（巴基斯坦拉合尔一带）。之所以会有这种选择，与阿拉伯人的原始地缘位置相关。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河下游与波斯湾地区的海上贸易就已经成为了常态。最迟在罗马时期，在阿拉伯半岛上借助驼队经商的阿拉伯人也看到了商机，成为了这条海上贸易线的参与者。控制印度河下游，有助于阿拉伯帝国在波斯湾——阿拉伯海的贸易扩张。尤其在波斯湾另一端的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成为阿拉伯人核心之地的情况下。

尽管阿拉伯人在印度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在今巴基斯坦南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总的来说，伊斯兰势力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在印度进行强势扩张。阿拉伯帝国内乱后，留在巴基斯坦南部的阿拉伯政权，亦如北部那些外来者建立的小国一样，没能对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深远影响。不过透过阿拉伯商人活跃的贸易渗透，阿拉伯人的影响还是在印度河平原有所遗留。比如今天巴基斯坦南部民族“信德人”不仅身体里杂有部分阿拉伯血统、文字上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在信仰上也可以说是巴基斯坦最虔诚的穆斯林。有一种说法是，在当地你甚至不能送给小朋友一个娃娃（因为这也是“偶像”）。

真正拉开南亚次大陆伊斯兰时代序幕的，是一支来西北方向的突厥力量——伽色尼王朝。在之前的蒙古征服部分，我们曾经对这个突厥王朝有所介绍。9 世纪后期，

之前受阿拉伯帝国统治的波斯人，开始在伊朗高原重新建立政权。其中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呼罗珊”地区，建立的波斯政权为“萨曼王朝”（公元874年～999年）。在向北击败突厥属性的喀喇汗王朝，夺取河中地区（后者依靠在中亚游牧民族中率先引入伊斯兰教，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同时向南战胜高原东南部以锡斯坦为中心的“萨法尔王朝”（同样波斯属性）后，萨曼王朝也准备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向阿富汗南部及印度河流域扩张。

然而印度河平原并没有就此迎来一个新的“波斯时代”。因为这一时期，阿拉伯及波斯的穆斯林君主们，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军制——古拉姆制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奴隶军人”制。相比之前那种以部族为基础的军制，古拉姆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些自幼从游牧地区购买而来，接受军事及宗教学习的奴隶军人，会比那些部族出身的军人更容易忠于君主。古拉姆制度初期，奴隶军人主要来源于中亚的突厥语游牧部落。随之，阿拉伯人的宗教、波斯人式的政治架构，以及突厥属性的军队，开始成为后来许多政权的标配。

问题是人毕竟不是机器，切断军人的与自己血亲集团的联系，只能说是降低了背叛的风险。一旦时机成熟，拥有强大武力的古拉姆军事集团，同样会觊觎最高权力。当向阿富汗南部开疆扩土的（公元962年）的突厥古拉姆军队，发现兴都库什山脉的阻隔能够帮助自己摆脱萨曼王朝的控制后，刚才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突厥奴隶军人出身的将领，随即以阿富汗南部城市“伽色尼”（伽兹尼）为首都，建立了名义上仍奉萨曼为宗主的“伽色尼王朝”。公元999年，羽翼渐丰的伽色尼王朝联合中亚的喀喇汗王朝一起，攻灭了原来的宗主——波斯人的萨曼王朝（阿姆河成为了两个突厥政权分割线）。

基于自己的原始属性，伽色尼王朝非常倚重来自突厥地区的军事力量。这些支撑王朝的突厥军事力量，不仅包括奴隶军人，也包括从中亚草原南下，依附王朝的突厥部落。比如在11世纪初，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的塞尔柱人，在这一时期被允许定居阿姆河之南（成为今土库曼斯坦的源头），帮助伽色尼王朝镇守北部边境。在此之前，从阿姆河到伊朗高原的呼罗珊地区，主要为操伊朗语的民族所覆盖。从地缘角度看，这意味着随着伽色尼王朝在兴都库什山脉南北建立统治，一条从河中地区通往印度河平原的“突厥 / 伊斯兰走廊”，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被正式打通了。

攻灭萨曼王朝之后，富庶的旁遮普地区成为了伽色尼王朝的下一个目标（公元1001年）。随后的20多年间，伽色尼王朝完成了这一目标，并一度攻入恒河平原。从伊斯兰世界扩张的角度来看，伽色尼王朝的这次征服最起码有两个贡献：一是第一次采用了“苏丹”君主头衔（名义由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授予）。此后，这个原义为“总督”，名义上维护哈里发政教领袖地位的称号，为突厥 / 伊斯兰系君主国所普遍采用；二是在印度河上游地区推进伊斯兰化。在突厥人入侵之前，这个民族混杂的地区曾经是各种宗教交融之地，佛教、印度教信仰非常普遍。加上之前阿



拉伯人在信德、南旁遮普地区打下的基础，穆斯林终于成为了印度河流域的统治者。

对于印度人来说，印度河平原被外来民族征服已经成为了常态。恒河平原的湿热气候，似乎成了一切强势入侵者不可逾越的障碍。迦色尼王朝统治旁遮普地区后，与恒河印度教世界之间所维持的平衡状态，亦容易让人感觉，一旦分裂的北印度重获统一的话，很有可能如孔雀、笈多两大帝国一样，收复印度河平原的。至于有没有可能让那些已经归信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回归印度教，就很难预料了。然而印度人所期待的新本土帝国并没有出现。他们与西北入侵者之间的平衡，在另一个来自阿富汗的新突厥政权——古尔王朝崛起后宣告结束。

## 第二节 古尔王朝击败拉杰普特联盟后入主印度

古尔王朝是由一支显然受益于突厥通道（即迦色尼王朝军事上倚重突厥人的政策），定居于兴都库什山脉西部“古尔地区”的突厥部落所创建的。12世纪中叶，在迦色尼王朝陷入衰弱之后，古尔王朝成为了前宗主的掘墓人。被迫退往旁遮普地区的后者，并没有稳住阵脚，很快便为古尔王朝彻底取代（公元1182年）。接下来的古尔王朝并没有止步，而是试图一鼓作气拿下恒河平原。迦色尼王朝在印度河上游一个多世纪的伊斯兰化进程，是突厥—伊斯兰势力继续向东挑战印度教世界的底气所在。那么，古尔王朝的这次东征会遇到巨大挑战吗？抵御穆斯林入侵的印度教政治势力又是什么地缘属性呢？

在印度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笈多王朝崩溃后（公元6世纪中叶），印度很快又陷入了分裂和混乱状态。最终在这一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家，而是在后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一个拥有共同地缘属性的阶层——拉杰普特人（Rajput，也译拉其普特人）。严格来说，拉杰普特人最初并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他们的来源是在伊斯兰入侵之前，那些入主印度的民族如：希腊人、波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等。

前面我们也说了，自波斯、希腊人入侵之后，婆罗门阶层所主导的印度教世界，一直存在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给这些强势入侵的民族集团一个合适的地位，以使他们融入印度教世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将之归入“刹帝利”阶层。这一归类法，并非基于入侵者过往的辉煌，更多是一种对现状的承认。一般情况下，那些滞留印度的入侵者，总能占据某一区域自立为国，成为南亚次大陆众多邦国的一员。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即使没有信仰印度教，武力入侵民族也很自然的会将自己定位为统治阶层，并利用自身的军事垄断权实施对国内其它族群的统治权。

在所谓“封建”体系下，统治阶层垄断军事权，入侵者将自身整体定位为统治阶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通行的做法。元朝将蒙古人定位为一等民族，清朝世食“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莫不都是这种做法的受益者。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四大种姓制

度框架下，获得新身份认同的“拉杰普特人”，性质实际为一种“亚种姓”。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和职业分工，再次对各阶层进行内部细分的做法。毫无疑问的是，亚种姓分类法的出现，使得印度社会的阶级固化情况进一步加深。从好的一方面理解，你也可以认为印度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了。

对于入侵印度并打下一片天地的民族来说，“新婆罗门教”（印度教）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会动摇统治基础。相反印度教种姓天定的理论，还能为他们维持统治地位提供有利的帮助。从技术上说，入侵印度的“异族”，本身就是各民族中的军事阶层。鉴于世俗统治权又是与军事权力紧密挂钩的，在凸显行业分工性质的“亚种姓”层面时，“拉杰普特人”很自然的将自己定位成为了印度的“战士集团”。

带有战士基因的拉杰普特人融入，为印度教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旦印度教世界遭遇新的重大入侵事件，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时，无论是出于维持自身利益，还是在整个印度教世界彰显力量的需要，拉杰普特人都有理由冲在前面。当然，融合成新阶层的“拉杰普特人”首先要争夺的是印度的控制权。经历过“后笈多王朝”被初的混战后，自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武力强大的拉杰普特人成为了恒河平原几乎所有邦国的统治者。北印度历史也就此进入了一个“拉杰普特列国时代”。

本质上说，拉杰普特人主导的中世纪“列国时代”（一般称之为“拉杰普特时代”）与1000年前的“雅利安列国时代”并没有区别。就携带外来基因的拉杰普特人，取代原有的雅利安裔刹帝利阶层，站上了北印度世俗统治结构的顶端这点来说，更多表明在笈多帝国时期真正完成了升级的印度教，已经能够做到不打破新加入民族与旧有民族内部结构的情况下实现融合（对于种族繁杂的印度来说更适合）。这使得那些希望以打破种姓壁垒完成融合的“沙门思潮”，在南亚次大陆的生存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了。类似的融合情况，在中央之国也一直在发生，只不过基本没有种族问题的华夏文明，技术上更容易抹平一切原始裂隙。

11世纪下半叶，当新生的突厥－伊斯兰政权“古尔王朝”，开始取代伽色尼王朝成为印度旁遮普平原的统治者时，恒河流域的拉杰普特人虽然已经在南印度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却还没有完成内部的统一，其内部甚至有上百个独立小邦国。古尔王朝的崛起，以及新生伊斯兰政权对恒河平原的想法，对于拉杰普特人主导的北印度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最起码原本分裂的北印度，有了一个共同抵御外敌的理由。如果能够战胜古尔王朝，并能反攻印度河平原成功的话，那么领导这场战争的拉杰普特邦国，复制当年孔雀帝国、笈多帝国的成功之路是相当可期的。

然而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每一个时代总会有它独特的特点（让这个时代变成别的一条“河流”）。如果说印度教的升级行为，让印度的融合能力变得比之前要更强的话，那么印度人在拉杰普特时代所面对的对手，在这方面能力就显得更为强大了。伊斯兰教所宣称的“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对于印度河流域的低种姓印度教徒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那些



本来已有众生平等观念的佛教国家，在军事上又无法对抗被宗教思想武装起来的伊斯兰－突厥战士。

另一个有助于伊斯兰教在印度河平原传播的因素，是印度河平原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基于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地缘背景，这个一神教 3.0 版本的很多教义，会更加适应热带沙漠气候区（比如食物方面的禁忌）。结合上述有利条件，加上阿拉伯人、迦色尼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到了公元 12 世纪末，异军突起的古尔王朝终于有了在恒河平原展开圣战的桥头堡。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北印度拉杰普特诸国组成了联盟（史称“拉杰普特联盟”），准备将穆斯林大军阻止在恒河平原之外。



塔劳里战役示意图

公元 1191——1193 年，古尔王朝与拉杰普特联盟之间的战争爆发。双方集结主力决战的地点叫做“塔劳里”（Taraori，今译塔拉奥里），这个点非常具有地缘分割上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上印度平原的旁遮普地区一共有五条“伞”状河流所组成，由西向东分别是：印度河（干流）、杰赫勒姆河、杰纳布河、拉维河，以及最东部的萨特莱杰河；与喜马拉雅山脉平行的恒河，也有诸多由北向南的支流，整体则呈“梳子”状排列。其中最西部也是最长的一条支流叫作“亚穆纳河”，塔劳里的位置就在亚穆纳河以西（属亚穆纳河流域），其直线向南 100 公里就是同在亚穆纳河畔的印度首都“德里”。

很显然，亚穆纳河不仅是恒河平原的门户所在，也是保卫印度教世界的第一道屏障（反过来萨特莱杰河则是旁遮普平原的门户）。在拉杰普特联盟中，最为强大



的拉杰普特国家，同时也是联盟的领导者，所控制的区域正是以德里为中心的恒河平原西部（德里－阿杰梅尔一带）。这一切都使得“塔劳里战役”不仅成为了双方的开场之战，更一跃成为了决定南亚次大陆命运的总决战。如果古尔王朝取得胜利，接下来穆斯林的铁骑在恒河平原将不会再遇到强大阻力；而如果获胜的是拉杰普特联盟，那么新的印度教帝国则很有可能诞生。

顺便说一下，今天的德里分为新旧两个部分，北部为狭义的“德里”（或称旧德里），南部为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印度政治中心“新德里”（始建于1911年）。应该说这种设计，既保存了旧德里的古都风貌，又让“德里”地缘位置价值继承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如果当年北京城在重获首都地位时能够这样处理，也许就能少许多遗憾了。

客观的说，身为职业军事集团的拉杰普特人，战斗力还是很强的。马上民族的基因结合印度特色，使得拉杰普特大军不仅拥有大量骑兵，还有数千战象。凭借这一点，在战争的第一阶段（1191年），拉杰普特联盟取得了胜利，甚至反突破成功，攻入旁遮普平原的门户：萨特莱杰河东部重镇“巴廷达”。然而经过数百年经营，并且打通了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突厥－伊斯兰走廊”的穆斯林们，入主印度的决心显然比当年的亚历山大要坚定得多。很快（1192年），古尔王朝便重新征召了战斗力更为强大的军队重返塔劳里。

对于印度教世界来说，不利的一点在于，他们组织起来对抗异族入侵的是一个松散“联盟”。时间拖得越长，内部消耗也会越大；而对手内部尽管也民族繁杂，但“圣战”的大旗看起来却能更好的聚合内部力量。尤其对于那些身处中亚、兴都库什山区的穆斯林来说，富庶的恒河平原是那么的有吸引力。最终古尔王朝取得了第二次塔劳里战役的胜利，拿下了德里。并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横扫恒河平原，一路将征服线延伸到了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地区。南亚次大陆也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伊斯兰统治时期。

### 第三节 蒙古入侵印度的德里苏丹国

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公元1192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穆斯林不仅在南亚拉开了长达600余年的伊斯兰统治时期，更在西亚让欧洲十字军的东征事业步入了衰弱期。正是在这一年，伟大的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圣城耶路撒冷，建立了从埃及到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在12世纪行将结束时，从东地中海到恒河的伊斯兰圣战事业，看起来都步入了高潮期。

然而无论是库尔德人（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还是突厥人建立的古尔王朝，最终都没有成就帝国伟业。半个多世纪后，奴隶军人集团属性的“马穆鲁克王朝”，颠覆了阿尤布家族的统治；而古尔王朝则在更早的时候，便陷于崩溃（公元1206年）。

导致古尔王朝崩溃的，是崛起于阿姆河三角洲的“花刺子模”。比起古尔王朝，花刺子模这个同样突厥属性的国家看起来要更有帝国相，不仅成为了中亚河中之主，还向南拿下了波斯高原，向东扩张至印度河。在古尔王朝的统治崩溃后，那些原本跟随古尔人进入南亚次大陆的突厥部落（时称“四十家族”），遂以古尔王朝的“印度总督”为新苏丹，建立了西起印度河、东至孟加拉湾，以德里为中心的“德里苏丹国”。

以花刺子模当时的声势来说，下一步本来是很有机会取代古尔王朝，成为北印度那些突厥军事贵族的新主人的。然而非常运气不好的是，这个时代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另一股更为强大的游牧力量——蒙古人。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征服成果，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刚刚显露出帝国相的花刺子模，可以算是蒙古西征中最为悲剧的牺牲品了。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花刺子模开始膨胀的帝国雄心（诛杀蒙古派来示好的商队），才直接触发了蒙古西征。然而攻灭花刺子模的蒙古人，也没有跨越印度河去完成对德里苏丹国的征服。以至于花刺子模的残余力量（在王子扎兰丁的带领下），得以退入德里苏丹国避难，并在蒙古人结束第一次西征后，一度复国成功（后又为蒙古人所攻灭）。

阻止蒙古人前进步伐的，并不是汹涌的印度河水，而是印度炎热的气候。如果说渗透中亚已经数百年的突厥人，早已熟悉了干热的气候，甚至开始向湿热的恒河流域扩张。那么从北亚寒冷之地而来的蒙古人，则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先适应相对容易克服的干热气候。蒙古人对中、西亚的征服，客观上切断了业已打通的，中亚通往南亚的突厥 / 伊斯兰通道。使得当初跟随古尔王朝进入北印度的突厥人，能够在不受其它新突厥 / 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下经营印度。

#### 第四节 拉杰普特人在穆斯林政权压力下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在“德里苏丹国”存续的 300 多年间（1206 ~ 1526），经历过数次王朝更迭，其内部的结构也是以独立性很强的军事封建为主。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北印度相当于从拉杰普特 / 印度教统治集团时代，进入到了突厥 / 伊斯兰统治集团时代。唯一的不同在于，拉杰普特人还没有来得及博弈出一个最高政治级别的统一王朝来（哪怕是名义上的）。

“新移民统治阶层”的进入，利益最受损害的自然那些已经融入印度教世界的“旧移民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了。尽管印度社会之前也接纳过众多入侵者，并用“拉杰普特”这个筐将之装进了印度教体系中。但这次入侵的突厥 - 穆斯林，显然是不会从一神信仰“退步”至多神信仰的。更何况与印度海、陆相接的西亚、北非、中亚，都为伊斯兰教所覆盖，这为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增强了后盾。比如北印度的突厥军事贵族们，可以一直从中亚引入突厥雇佣军或奴隶军人，以维持和增

强他们在印度的统治力。

在突厥穆斯林政权的压力下，拉杰普特人无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屈从于穆斯林的统治，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二是逃离恒河平原。很显然，总会有人做出第一种选择的。在德里苏丹国及后来的莫卧儿王朝期间，都有部分拉杰普特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以至于今天广义“拉杰普特人”的范畴里，也会包括一些穆斯林。当然，对于那些坚持印度教传统的拉杰普特人来说，“拉杰普特人”这个光荣的头衔是只可能属于印度教徒的。

选择逃离穆斯统治的拉杰普特人，大体上又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或向北避入喜马拉雅山、克什米尔地区，或向南与达罗毗荼人争夺生存空间。据称，后来以忠诚和武力闻名于世的尼泊尔廓尔喀人，就是这一时期避入喜马拉雅境内的拉杰普特人的后代。不过现在真正证明自己身份并享受“拉杰普特”地缘遗产的，主要是生活在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及古吉拉特邦的拉杰普特人。在现代印度建立之前，这片土地曾经是拉杰普特联盟最后的保留地。即使在强大的莫卧儿帝国，及后来的大英帝国统治时期，也没能改变这一地区拉杰普特诸邦的事实独立地位。

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地区（可称之为“拉杰普特地区”），能够成为拉杰普特人保留地的地理原因，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地缘位置。作为今天印度最西部两个行政区，分隔印度、巴基斯坦的“印度大沙漠”、南部的印度洋／阿拉伯海、东面的马尔瓦高原，合力为退出恒河平原统治的拉杰普特人，圈出了一个既独立于印度河－恒河平原，又有别于印度中南部高地区的邻海平原带。其压力最大的北境所对应的，恰巧是旁遮普（印度河流域）与德里（恒河流域）相接的敏感地区，历史上长时间为两大板块政治力量相争之地（这种多方角逐局面，有助于拉杰普特人待价而沽）。

拉杰普特地区的另一大优势在于沿海。从位置上看，恒河平原的产品要想通过海路出口，一般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德里一带经拉杰普特地区进入阿拉伯海；二是沿恒河而下，通过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地区进入孟加拉湾。受益于这样得天独厚的区位，历史上这两大板块都成为了商业发达之地。今天古吉拉特邦也是全印度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正是借助在古吉拉特邦的执政经历，莫迪才有机会登上印度总理的宝座（其本人也是古吉拉特人）。只不过孟加拉地区在海、陆两线的伊斯兰影响之下，大部改信了伊斯兰教，并因此造就了独立的“孟加拉国”；本来在恒河平原过得顺风顺水的拉杰普特人，则在空间被压缩到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地区后，怀着对伊斯兰政权的刻骨仇恨，成为了印度教的保卫者。

尽管拉杰普特人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块保留地，并一直在印度地缘政治格局中，以“拉杰普特联盟”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属于这些战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古尔王朝开启的印度伊斯兰统治时代，则一直延续到大英帝国将印度变成女王王冠上最耀眼的那颗宝石。



## 第五节 帖木尔与巴布尔先后入侵印度

随着蒙古人步入衰退周期，连接中、南亚的“突厥－伊斯兰通道”被再次开启。公元1398年，崛起于河中的“帖木尔帝国”，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河攻入德里，几乎让德里苏丹国成为过去式。不过一如当年的花刺子模和蒙古帝国一样，帖木尔的军队并没有深入恒河流域。这是因为，虽然帖木尔和他的帝国本质属性都已为“突厥”，但蒙古帝国这笔丰厚的地缘政治遗产，还是让人不忍放弃，所以帖木尔将自己定位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并致力于成为另一个成吉思汗。在这种企图心下，之前成吉思汗和他儿孙们征服过的每一个地区（甚至包括远在东方的中国），都成为了帖木尔的战略扩张方向。

在恢复蒙古帝国版图的梦想实现之前，曾经被成吉思汗放弃的恒河平原，暂时并不是帖木尔的主攻方向。客观的说，帖木尔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先后击败甚至终结了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西亚的伊尔汗国、东欧的金帐汗国，甚至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把也正处在高峰期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打垮（以至于延缓了后者征服拜占庭的时间）。然而正是因为扩张过快，帖木尔的帝国也成为了像亚历山大帝国那样的“一世帝国”。公元1405年，随着帖木尔病逝于远征明朝的路上，他所创建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虽然没能重新打造一个横跨欧亚的“新蒙古帝国”，但帖木尔帝国的短暂辉煌，还是将他和他的帝国成功的变成了一笔地缘政治遗产。以至于100年后，另一股崛起于中亚河中之地的突厥／伊斯兰新势力，在打政治牌时会以帖木尔和成吉思汗的共同子孙自居。这股新势力的领导者，就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创者——巴布尔（一般被认为是帖木尔的六世孙）。

公元1504年巴布尔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在山脉南麓的阿富汗境内取得喀布尔、坎大哈等入侵印度的跳板。尽管巴布尔随后尝试过重回中亚，但很快便在遇到障碍后调整方向，将建立新王朝的希望锁定在了印度。公元1526年，已经拿下旁遮普地区的巴布尔，与德里苏丹国在印度西部城市“帕尼帕特”一带展开决战。这个战场与当年古尔王朝决战拉杰普特联盟的塔劳里非常的近（直线距离仅50公里），都在德里的北部、亚穆纳河的西部。沿着古尔人曾经走过的路径，在取得帕尼帕特战役胜利后，巴布尔旋即入主德里，正式建立“莫卧儿王朝”。

除了运行300余年的德里苏丹国内部早已进入风雨飘摇的分裂期以外，莫卧儿王朝的胜利，还得益于一样重要的军事技术进步——黑火药武器。从奥斯曼（也可能是波斯）引入的火炮及火枪部队，是巴布尔能够在短短数年间横扫旁遮普，取胜帕尼帕特决战的重要因素。早在15世纪中期，黑火药武器就已经开始在西方战场崭露头角。如果没有火炮的助力，奥斯曼帝国将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那坚固的城墙。及至15世纪末，在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战场上，黑火药武器都成为了战

场的主宰者。此时，身处印度的突厥人却对这项军事进步完全没有概念。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新的王朝甚至帝国取代德里苏丹国封建集团统治印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 第十四章 南印度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 第一节 锡兰岛的族群和宗教结构

随着 12 世纪初突厥 / 伊斯兰政权统治印度时代的开启，印度雅利安人也好，融入印度教社会的“拉杰普特人”也罢，都已成为了印度地缘政治舞台的配角。按照最简单的黄、白、黑人种划分法来看，最早在印度河流域开启文明时代的“达罗毗荼人”算是“黑人”；印度雅利安人则属于“白人”；原始属性为黄种人的“突厥人”的大规模涌入，无疑又为印度这个人种博物馆增加了一抹颜色。当然，这些源自北亚的游牧者，早已在中亚河中地区混合了伊朗语族“白种人”的基因，变成了黄白混和人种。因此最终也没有让北印度的种族特征呈现出黄种人的特征（今天生活在印度东北部的黄种人族群，是由缅甸方向进入的）。

纯粹从种族角度来看，印度历史也可以算是一部“白色人种”挤压“黑色人种”生存空间的历史。基于全面了解这片大陆的需要，现在我们要换个方向，从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切入，看看一直身处配角地位的“南印度”，地缘结构上都有哪些特点。那些顽强生存于此的印度原住民，又对伊斯兰文明的扩张，以及 16 世纪初欧洲基督徒们的登陆，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南印度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地缘概念。作为地理概念时，通常指向的是德干高原及其周边沿海地区，恒河流域（包括南部隶属本流域的南部高原区）则为北印度。二者之间的地理分割线，是由坎贝湾（古吉拉特东南部）注入阿拉伯海的“讷尔默达河”；不过作为地缘概念时，南印度所指向的则是德干高原（包括沿岸低地）中南部“达罗毗荼语系”民族分布区，其范围要比地理概念时的南印度更窄些。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南印度”即是后者。

地缘概念的南印度比地理概念的要更窄，或者更偏南的原因很简单，自雅利安人入侵伊始，达罗毗荼人的生存空间就不断在向东、向南收缩。最早的时候，达罗毗荼人不仅覆盖了整个南亚次大陆，甚至有可能是伊朗高原之南，波斯湾北的“埃兰”文明的缔造者。尽管在众多西北入侵民族的压力下，达罗毗荼人在波斯湾、印度河流域的存在早已成为过去式，但今天在伊朗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俾路支地区，仍然还生存有 100 多万达罗毗荼人——布拉灰人，他们与残存于印度北部高原区的奥昂人、孔德人一起被称之为“北达罗毗荼人”（总数只有数百万），共同向世人证明着这片大陆曾经属于达罗毗荼人。

在大英帝国为后殖民时代的南亚次大陆规划政治版图时，宗教、语言等地缘因素是考虑的重点。如果说“印巴分治”的标准是“宗教”的话，那么不用再为宗教分裂而头痛（虽然境内还有穆斯林存在）的印度，在内部划分政区的主要依据就是



“语言”了。拜这一原则所赐，今天我们可以大体沿着印度的行政版图划出“南印度”的范围。这些南达罗毗荼人覆盖的地区，由北向南包括：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喀拉拉邦，以及泰米尔纳德邦。

上面这些地缘政治标签，相信大家最有似曾相识感的是“泰米尔纳德邦”。作为印度最南部的一个邦，泰米尔纳德邦的主体民族，就是前些年经常出现在国际新闻里的“泰米尔人”。悲剧的是，有关泰米尔人的消息，基本都与反斯里兰卡政府性质的少数派武装“泰米尔猛虎组织”有关。值得庆幸的是，延续时间长达25年的斯里兰卡内战，在2009年宣告结束。这同时也标志着泰米尔人在锡兰岛（斯里兰卡所在岛屿）东北部独立建国的梦想破灭。

有留心过斯里兰卡内战新闻的朋友，应该会注意到，出现在镜头中的猛虎组织成员，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肤黑发卷，与经常在宝莱坞电影中见到的北印度人形象有明显的差异，或者说是黑色人种属性明显；相比之下，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僧伽罗人（占总人口75%），体质特征倒更具有高加索人特点（相对），整体与北印度的种族特征更为接近。由于南亚地区所面临的种族入侵压力基本都来自北方，泰米尔人在种族、语言上保存有最多“达罗毗荼人”的原始特征是很好理解的。然而与印度半岛隔海峡相望的锡兰岛，主体民族的种族特征要更接近北印度，多少就让人有些意外了。

通常情况下，像锡兰岛这种处在大陆尽头且与大陆紧邻的岛屿，总是更容易成为大陆土著民族最近的避难所。比如在日耳曼人的挤压下，曾经覆盖中西欧的“凯尔特”民族，如今就只在大不列颠岛的边缘彰显自己的存在了。事实上，达罗毗荼人也是岛上最早的土著居民。今天在锡兰岛东南部的原始丛林中，还生存着小部分这些达罗毗荼人的后代（总数仅数千）。与数千年前他们刚跨海移入这座岛屿里一样，这些被称之为“维达人”的锡兰土著，至今还处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阶段，并过着渔猎生活。

不过作为一个岛屿来说，海洋所给予的环境又是开放的。定居印度半岛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固然可以比较早的跨越最窄处仅60余公里，中间还有数个小岛提供中继的海峡（保克海峡）进入锡兰岛，但来自印度其它地区，乃至印度以外地区的民族，同样也可以跨海来此定居。可供参考的最典型案例，是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岛上主体民族的语言、种族特征都表明，他们的先民并非来自非洲，而主要来自于印度洋另一端的印尼、马来西亚一带的“马来人”。

研究语言的变迁，是解开人类迁徙密码的重要手段。僧伽罗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他们的祖先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时起，陆续从北印度迁入这个岛屿的。具体的过程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这次“地理大发现”，显然与海上贸易有关。结合同一时期北印度进入列国相争时代的背景来看，如果有一支或者数支“印度雅利安人”沿着海商开辟的航线移居锡兰岛，并不意外。最起码，这条沿海岸航

行的航线，要比后来哥伦布、达伽马的跨洋航线要安全得多。比较难确定的是，僧伽罗人的祖先启航的地点是在东部的孟加拉，还是西部的古吉拉特（僧伽罗人自身倾向于孟加拉）。

2500 多年前的北印度已处在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印度雅利安人所具备的农业、军事乃至文化优势，是锡兰岛上那些原始达罗毗荼人所无法相比的。更何况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后者的人口数量并不会太多。与印度大陆的情况一样，尽管带着婆罗门教对于达罗毗荼人的种族歧视同时登陆，但达罗毗荼人的基因，还是不可避免的混入了僧伽罗人的血液里。相比之下处于更高文明层次的僧伽罗人，在保持语言、宗教这些文化上的北印度特征要更容易些。更何况通过海路，他们与北印度的交流一直都没有切断。



僧伽罗人

大陆对锡兰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印度半岛所产生的那些宗教，也都曾经是僧伽罗人的选择方向。最初进入锡兰岛的僧伽罗人无疑属于婆罗门教的信徒。然而在印度列国时代，包括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不利于民族和解的婆罗门教，都在遭遇讲求众生平等思维的沙门思潮宗教的挑战。僧伽罗人也是在这一时期转信了佛教（据称是公元前 3 世纪中阿育王传播的结果）。虽然后

来升级之后的印度教在公元 7 世纪前后又重获优势，但在南亚边缘地区（如孟加拉），仍然有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政治空间。锡兰岛上的僧伽罗人没有改变自己的佛教信仰，很大程度与泰米尔人有关。由于与之有竞争关系的泰米尔人选择成为印度教的保卫者，保持差异性的宗教信仰，有助于僧伽罗人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泰米尔人对僧伽罗人的威胁，早在 2200 多年前，僧伽罗人成为佛教徒后不久就显露出来了。当时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王朝在入侵锡兰岛屿后，开始尝试在岛屿的北部建立政权。此后 1000 多年间，伴随着军事、政治博弈，不断有泰米尔人从印度半岛迁入锡兰东北部地区，并逐渐成为了岛上第二大民族。不过泰米尔最大规模的移居行为，却是发生在英国殖民之后。为了牵制身为多数民族的僧伽罗人，也为了解决岛上劳动力的问题，英国人不仅更偏重于在政府相关部门使用原住的“锡兰泰米尔人”，更从印度南部引入了大量“印度泰米尔人”（二者后来的比例约各占一半）。类似这种做法，可以说在欧洲殖民史中非常常见。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往往在被殖民国家独立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

好了，通过上面的解读我们应该知道，自我封闭的锡兰岛并没有成为达罗毗荼人的避难所。同时，也很难成为介入印度半岛内部斗争的第三股力量。真正的“南印度”，只在大陆之上。要知道，尽管历史研究者为印度排出了三个统一帝国：孔雀帝国、笈多帝国、莫卧尔帝国，但实际上这三个帝国也都没有真正完成过印度半岛（南亚次大陆）的统一工作。这其中缺失的一环就是南印度，更准确的说就是印度半岛南端的“泰米尔地区”。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就将解读，为什么无数来自北方的征服者都没有能够征服泰米尔地区，这些泰米尔人又取得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成就。

## 第二节 印度南北差异在语言结构上的体现

南印度的历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是一片空白。比如提到印度电影，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位于孟买的“宝莱坞”，并认为这就是印度电影的全部。这些电影给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里面不仅主角肤白貌美，一众配角和群演也大都带有较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由此也经常会有人拿来和现实中见到的印度人相比，觉得电影的欺骗性实在太大，甚至认为那些拍印度电影的演员都属于高种姓。其实这中间更多只是个地缘背景的因素，因为宝莱坞所处的位置是在北印度，所能代表的只是北印度电影。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印度的种族特征相对会更接近欧洲人的感觉。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宝莱坞电影又可称之为“印地语电影”。通行于北印度的“印地语”，在印度的地位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然而却并不能认为，北印度各地的语言都属于目前定义的“印地语”。像孟买所属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其所讲的马拉蒂语在语言上就与“印地语”不同，但都同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所谓“印度语族”，通俗点讲就是“印度－雅利安语”。只不过基于各地的地缘特点，在南亚北部分化出了不同的语言。

在全印度，仅中央和地方规定的法定语言就多达 20 多种（包括英语）。许多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比如通行于印度西北部，在巴基斯坦被定位为国语的“乌尔都语”，与印度的国语“印地语”其实是一种语言。前者因为宗教和地缘位置原因，吸收了更多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的词汇，并且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后者则更希望保持印度特色，还在采取梵文字母拼写（梵文就是古“印度雅利安语”）。这一幕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在上演，比如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如果中国不是采用表意文字，而也使用拼音文字的话，现在内部的语言类型应该不会比印度少。

就印度内部的语言分类而言，有一个规律可循：在北印度，但凡靠近边境或者海洋的邦，比如西孟加拉邦、古吉拉特邦、旁遮普邦等，因受外部影响较大，都分化出了独立的语言。而以恒河平原为核心的北印度内陆邦，则都属于以“印地语”



为母语的地区（现有4亿多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使用者）。搞清这些语言彼此间的差异，对普通人来说意义也不大。大体上大家知道，印度可按语言类型分为北部的“印度语族”区，以及南部的“达罗毗荼语系”区就行了。

地缘上的南印度，即是指德干高原及其周边沿海平原带的达罗毗荼语覆盖区。很显然，德干高原是这些印度原住民得以不被彻底同化的天然屏障，不过这并不代表达罗毗荼人是一个高地民族。真正帮助达罗毗荼人保持种群优势的，依然是那些沿海低地及切割高原的谷地，而不是德干高原本身。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德干高原周边大片平原带出现在东、南两个方向。这与德干高原西高东低的地势有关，这样的地势使得高原东南沿海地区能够得到大部分的高原之水，以及顺水而下的泥沙。

这片印度南部最大的平原带，依地缘特点可分割为安得拉平原及泰米尔纳德平原两块。两大板块之间的分割点，也是高原与海洋最接近的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今天泰米尔纳德邦的主体民族“泰米尔人”，以及“安得拉邦”主体民族泰卢固人所使用的民族语言（泰米尔语、泰卢固语），成为了最主要的达罗毗荼语。两大语言的使用人口数不分伯仲。在达罗毗荼语族2亿出头的使用人口中，这两者合计占比高达75%左右。相比之下，印地语人口在北印度的相对优势就要明显得多（其它语种都只有千万级的使用量）。

上述语言结构特点，也反映在了印度当代最显性的文化代表——电影上。北印度印地语一家独大的情况，使得宝莱坞成为了唯一的电影中心。而基于南印度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双强并立的特点，南印度的电影中心也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安得拉邦首府海德拉巴的“托莱坞”，以及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钦奈的“考莱坞”。另外还有两个市场份额较小的，用其它达罗毗荼语的“莫莱坞”和“桑达坞”。前者位于喀拉拉邦，后者则位于第四个南印度邦“卡纳塔克邦”首府，印度著名的软件基地——班加罗尔。顺便说下，这些看起来山寨味浓浓的带“坞”别称，的确是从美国的好莱坞变化而来的。

其实中国人对南印度电影也并不陌生（只是不一定知道罢了）。比如最近有部印度大片《巴霍巴利王》，相信大家即使没看过全片，也可能在网上被其中的某个片段刷屏了。这部神片就产自泰卢固电影的基地“托莱坞”。另外，非常红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南部的考莱坞也有同版权的作品（到国内被翻译成《三傻大闹宝莱坞2》了）。其实南北印度拿同一版权独立拍摄，供应各自的受众是非常常见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印度电影，会在名称里画蛇添足般的加上“宝莱坞”一样（如《宝莱坞机器人之恋》）。

透过分析印度电影分布结构，相信大家对印度的南北差异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当然，这并不代表这些差异就一定会导致印度的分裂。在伊斯兰教入侵北印度之后，南印度俨然成为了印度教和印度文化的守卫者，并由此拉平了与北印度地区的心理差距。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数次北方入侵所导致的衣冠南渡，使得长江以南

包括岭南地区，对华夏传统文化的信仰程度，甚至可能高于北方。至于南印度在语言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则很大程度类似粤语片和粤语文化区在中国的存在。如果你不认为“粤语”的特异性存在会导致中国分裂的话，那么印度也不会。

当然，不管中国还是印度，这种南北方求同存异的融合，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两地北方不断南下的马上民族，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基于中国人喜欢记录历史的习惯，这一进程的轨迹甚至细节在中央之国的形成中会比较清晰。相对而言，印度特别是南部的情况就要模糊很多了。玄奘、法显等中世纪时前往印度寻求佛法的中国僧侣所做的记录甚至成为了印度梳理相关历史的重要依据。

以今天我们为南印度的主体民族及语言打上的“达罗毗荼”标签来说，最直接的证据就来自于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在书中，玄奘将其记录为“达罗毗荼国”，所谓“达罗毗荼国”在印度历史上被称之为“帕拉瓦”。玄奘抵达北印度的公元7世纪初，正是帕拉瓦的鼎盛时期。其不仅让南部的其它泰米尔地区臣服，同时也向北控制了安得拉邦的南部。

有研究表明，所谓“泰米尔”一词就源自于“达罗毗荼”一词的演变。不管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位置更靠南的泰米尔人保留了最多的古达罗毗荼基因（包括种族和文化上）。即使在印度第一个“统一”帝国——孔雀帝国时期，来自北方的印度雅利安人，也仅仅把控制线延伸到了安得拉邦地区（后世的几个帝国也同样如此）。达罗毗荼国的首都“建志补罗”位于今天泰米尔纳德邦东北部，帕拉河畔的甘吉布勒姆。与该邦首府钦奈相距不远，帕拉河也是帕拉瓦王朝的核心之地。以其地缘位置来说，可以算是达罗毗荼保留地抵御北方入侵的最前线地区了。至于它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谁，南印度历史上又有哪些国家值得关注，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雅利安人渗透德干半岛的路线

从雅利安人踏足印度河平原的那一刻时，达罗毗荼人的生存空间就在不断缩小。及至2000多年前的印度“列国时代”，恒河平原又成为了印度-雅利安人的核心之地。达罗毗荼人的空间，则被进一步压缩至印度半岛南部的高原地区。然而这并不代表高原就能够阻止雅利安人的渗透，最起码根据流域控制理论，恒河平原南部那些隶属恒河流域的高原地区，会很快成为印度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

先来看看恒河平原之南的高地区内部，又是如何切割的。这一高地区最具知名度的，自然就是“德干高原”了。在德干高原北部，还有东、西相连的两片高地区：西部的“马尔瓦高原”及东部的“焦达讷格布尔高原”。德干高原与这条高原带的分割线是两条河流：一条是发源于高地中东部，向西注入阿拉伯海的“讷尔默达河”；另一条源头与之相邻，向东注入孟加拉湾的“马哈纳迪河”。如果说喜马拉雅山脉是恒河左岸之水的来源地的话，那么这条圣河的右岸水，则都是出自马尔瓦-焦达



讷格布尔高原了。当然，这两片高原的海拔也就在 600-1000 米左右，为恒河所作出的贡献肯定不如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了。但它们的存在，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恒河流域的南部边界。



南印度地缘结构图

讷尔默达河－马哈纳迪河谷以南也可单独称之为“德干半岛”，以便有一个能



够涵盖德干高原主体，及其边缘平原区的标签。这两条河谷带可以视作恒河流域与德干半岛之间的南北过渡带。这种情况与汉水河谷（汉中地区）、淮河流域在中国南北划分中，所承担的角色类似。基于中印两大文明区长期以来都是遵循着从北向南扩张的规律，今天此类过渡地带的地缘属性都更加偏向北方。这一点从最能彰显地缘属性的“语言”分类上便能看出。在中国，汉中、江淮地区都属于系出北方的“官话区”；在印度，讷尔默达河、马哈纳迪河流域所涉及的古吉拉特邦、中央邦、恰蒂斯格尔邦、奥里萨邦，今天也都是“印度语族”（印度－雅利安语）的覆盖区。

在数千年的北方压力侵扰下，上述中、印南北中间地带并没有成为北部地缘文化渗透的终点。湖北、四川这两个长江中上游省份，乃至包括云贵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与中国的北方地区一样属于“官话区”，被统称为“西南官话区”。明清两代，为填补西南地区因战乱损失的人口而进行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是西南官话区形成的直接原因。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西南方向。今天地缘概念上的“南印度”（达罗毗荼语区）与地理上的南印度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缺失了德干半岛西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特点在于，除了孟买所在的西部狭长沿海低地，以及北部同样狭长的，与讷尔默达河谷相邻的达布蒂河谷（同样注入坎贝湾）以外，大部分地区属于注入孟加拉湾的河流流域。由马哈拉施特拉邦发源，经南印度注入孟加拉河流有两条：一条是东北部的戈达瓦里河；一条是克里希纳河。这两条河流也是德干半岛最大的两条河流，其中下游地区都位于今天的安得拉邦。

从上述地理特点可以看出，如果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想入侵德干半岛的话，方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先进入德干半岛西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寻找河谷低地立足；第二步是沿戈达瓦里河－克里希纳河扩张，控制今天南印度北部的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地区；第三步则是向德干高原之南的泰米尔低地区，也就是今天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所在地扩张，完成全印度的统一。

上述进程在印度列国时代就已经开启。印度雅利安人最先切入的是今天马哈拉施特拉邦东北部，戈达瓦里河上游盆地的“那格浦尔地区”（那格浦尔今天是该邦第二首府）。在当时的雅利安十六国中，渗透至戈达瓦里河上游地区的“阿湿波国”，也是唯一越过南北地理分割线的雅利安国家。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终于将雅利安人的事业推进到了第二步，征服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地区。鉴于在跨海而来的大英帝国到来之前，由北印度而起的征服工作都止步于第二步，因此孔雀王朝开创的事业，已经足以让它跻身于印度三大“统一”帝国之首了。

就征服德干半岛来说，上述线路其实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公元4世纪崛起的印度第二帝国：笈多帝国，就是在统一北印度之后，先沿孟加拉湾而下。由马哈纳迪河下游的奥里萨邦切入，先征服安得拉邦一带的低地区，再羁縻德干高原的。这一

战略得以实践的基础，在于海上贸易所带动的海军力量的发展。海陆并进的战术，使得人口密集的沿海低地可能比高地区更先被征服。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中国的抗日战场也曾经发生过。日本帝国一方面沿着传统征服路线，在陆地方向由北向南推进；另一方面凭借强大的海军，夺取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所有的重要城市。

孔雀、笈多两大帝国对德干地区北部的政治征服，包括帝国崩溃后存续于这一地区的以雅利安人为统治阶层的国家，将以宗教为核心的北印度文化传播至了整个印度半岛。在大分裂期间，一些以南印度为基地的国家，如安得拉邦北部沿海的“羯陵伽”、统治戈达瓦里河、克里希纳河流域的“安度罗”（又称萨达瓦哈那）也曾经北上争霸。达罗毗荼人稠密的人口，以及因沿海而获得的海上贸易之利，为这些雅利安殖民国家北上提供了有利支撑。

然而也正是因为土著人口众多，大部分被征服的德干地区（特别是安得拉地区）并没有在语言、文化上彻底雅利安化。当然，那些曾经被北方民族长期统治的地区，肯定留下了更多的外来基因。比如安得拉邦的主体民族——泰卢固人，在种族特征上就比泰米尔人更为高大健壮（巴霍巴利王的男主角就是泰卢固人），语言中也吸收了大量古印度雅利安语（梵文）。

毫无疑问的是，整个印度都存在混血的问题。然而在族群归属感中，种族特征固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更多则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在印度教从北至南覆盖整个印度半岛的背景下，族群之间的差异更多显示在了语言层面。印度雅利安人 2000 多年来的德干渗透史中，真正从语言角度完成雅利安进程的板块，就是开头提到的以孟买为首府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缘板块的主体民族“马拉地人”（人口约 9000 余万），所操的“马拉地语”与印地语一样都属于“印欧语族”（种族和语言上都融入了部分达罗毗荼成分）。

马拉地人及其所在的板块，也曾经在印度地缘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突厥－伊斯兰政权入侵恒河平原之后，退守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地区的拉杰普特联盟，曾经是北印度伊斯兰政权最为忌惮的势力。为此，16 世纪取代德里苏丹国统治北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对拉杰普特联盟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后者则在保留宗教信仰及独立性后，妥协成为了莫卧儿王朝军事中坚，并为莫卧儿王朝统一印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拉杰普特人失去恢复印度教印度的雄心之后，印度教世界需要另一股强大力量站出来，挑战北方的伊斯兰政权。基于印度的地缘结构，这股力量如果想在北印度的印度教徒中引发连锁反应，显然需要有印度－雅利安背景。这一机会，最终被位于拉杰普特人与南印度达罗毗荼人之间的“马拉地人”抓住。在 17 世纪后期，当莫卧儿王朝开始走向衰弱之时，马拉地人以新的印度教保护者形象横空出世，建立起了强大的“马拉地帝国”（也译马拉塔帝国），并一度几乎颠覆莫卧儿王朝。

不过这段历史，离我们目前所处的时空还有点远。提前拉出来，实在是因为印

度人并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过于久远的那些雅利安混战史，于我们了解印度地缘结构帮助并不大（尤其是还有那么多生僻的古国名）。如果想了解简单感受下马拉地帝国风采，以及他们与伊斯兰政权之间的恩怨，有一部印度大片《帝国双璧》倒是可以一看。

#### 第四节 拉杰普特人建立遮娄其王朝

马拉地人的族源，并非只有印度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也包括拉杰普特人后裔（并且居于上层）。公元7世纪在北印度崛起的拉杰普特集团，在更早的时候（6世纪中叶）便开始向德干高原方向渗透，并在戈达瓦里河－克里希纳河流域建立国家。这支在德干半岛建立政权的拉杰普特人被称之为“遮娄其人”，他们也建立的王朝也因此被称之为“遮娄其王朝”。

遮娄其王朝的政治中心位于克里希纳河上游河谷地带，卡纳塔克邦北部的“巴达米”是这个王朝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公元7世纪初，遮娄其人扩张至戈达瓦里河－克里希纳河下游，也就是安得拉邦的中西部。基于地缘分割，东进的遮娄其人很快脱离了母国的控制，独立建立了“东遮娄其王朝”。

两个遮娄其王朝在德干半岛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公元11—12世纪。不过由于地缘位置的不同，两个兄弟王朝后来的地缘轨迹也不尽相同。其间西遮娄其王朝一度被身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另一支拉杰普特人——“拉施特拉库塔人”（也译“拉喜施拉库塔人”）所颠覆。后者建立的“拉施特拉库塔王朝”在8世纪中-10世纪末成为德干高原之主，并北上与同属拉杰普特政权的：恒河上游的“瞿折罗－普腊蒂哈腊王朝”、下游的“帕拉王朝”争霸印度，共同书写了一部拉杰普特时代的印度三国史。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在这把“拉杰普特人”单独作为一个民族集团，与印度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区别开来。但每一支拉杰普特部族在融入印度教世界时，都会寻求婆罗门阶层来证明他们来源于印度雅利安时代的某个古老世系，或者是某位雅利安神话人物的后裔。这种情况，与那些入主中原后将自己的祖先与某位华夏人文始祖联系起来的北方民族相类似。因此，无论从宗教还是语言来看，拉杰普特人所作出的努力，实际也都可以被归类于印度雅利安文明的扩张。公元11世纪末，拉施特拉库塔王朝陷入衰弱之后，南方的西遮娄其人重新夺回了德干高原的控制权，为了与之前的“西遮娄其王朝”区别，后人又将其称之为“后遮娄其王朝”。

从地缘政治属性来看，拉杰普特人的南下分为两支，一支的核心区在今天的卡纳塔克邦（西遮娄其人）；另一支则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然而尽管遮娄其人很早就开始在德干高原统治，但曾经为其核心之地的卡纳塔克地区，却没有能够因此而雅利安化。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两大板块与恒河流域的地理距离。相比卡纳



塔克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显然更容易一直从北方吸收印度雅利人南下。

在后“后遮娄其王朝”复兴之后，西遮娄其人选择了将它的政治中心迁往今天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一带。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无疑是为了避免拉施特拉库塔人的再次崛起，同时在客观上放弃了在南印度的深耕，并进一步加深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雅利安化程度。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今天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地缘属性上被归类于北印度，而更靠南边的卡纳塔克邦则为南印度。

一定要比较两支拉杰普特人，谁对德干高原西北部的雅利安化贡献更大的话，应该是拉施特拉库塔人。事实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名字，便是源自“拉施特拉库塔”这个曾经以其地为核心的强大王朝（“马哈”是“大”的意思）。所谓“马哈拉施特拉”之称，甚至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经出现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记录中了。在那本甚至能当成印度史书的游记中，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被译作“摩诃剌侘国”(Maharattha)。

与西遮娄其人、拉斯特拉库塔人在德干半岛西北部，与印度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混合形成雅利安属性的“马拉地人”不同的是，深入到安得拉邦低地区的东遮娄其人，最终选择了一条本土化路线。今天通行于安得拉邦境内的，属于达罗毗荼语系的“泰卢固语”，就是在东遮娄其王朝时期正式成为这一板块的官方语言的。这一选择为东遮娄其王朝的稳定，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至于身为遮娄其主系的“西遮娄其”被拉施特拉库塔人所颠覆后，旁系身份的东遮娄其王朝，仍然可以在达罗毗荼之地上延续他们的政治统治。

东遮娄其王朝的“泰卢固化”选择，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命运将更多与南方的“泰米尔”政权发生联系。在政治上，这往往体现为王室联姻对象的选择。如果你选择做一个雅利安国家，那么你的王室便会更多选择北部国家结亲。比如在传说中，锡兰岛上的僧伽罗人在移居于此并建国时，虽然也与土著部落联姻，但却还是渡海迎娶了来自北印度的公主为后。东遮娄其王朝在开启本土化选择之后，南方泰米尔诸王国的王室，便成为了其主要联姻的对象。至于说最终是融入了西遮娄其基因的“泰卢固”，还是更纯粹达罗毗荼属性的“泰米尔”，有机会完成南印度的统一工作，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五节 东遮娄其王朝与南印度诸国的博弈

东遮娄其王朝在南部最大的对手，是崛起于今天泰米尔纳德邦东北部，帕拉河谷的“帕拉瓦王朝”，也就是玄奘笔下的“达罗毗荼国”（公元275-897年）。达罗毗荼国时代是北印度文化向泰米尔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然而在印度混乱的历史中，帕拉瓦王朝的统治阶层，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南印度土著政权还是存疑的。毕竟自孔雀王朝起，印度雅利安人的政权势力就已经触及到了泰米尔地区的东北部。

帕拉瓦王朝的强大，很可能是因为上层带入的北方基因。

真正能够确定属于达罗毗荼系的，是分布在今天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的三个国家：朱罗、潘地亚、哲罗。其中朱罗的核心区在泰米尔纳德邦中东部的“高韦里河”下游；潘地亚的崛起地在该邦东南部的“韦盖河”河谷。哲罗的控制核心，则是位于德干高原西南沿海平原带的喀拉拉邦。上述三个因地缘、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王国，早在孔雀王朝入侵德干王朝之前就已经存在。

语言归属是印度划分行政区域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喀拉拉邦的官方语言“马拉雅拉姆语”，也是古泰米尔语的一部分（公元9世纪时分化出来）。促使喀拉拉邦或者说“哲罗”与朱罗、潘地亚（泰米尔纳德邦）分化的原因，在于地理的分割。整个德干高原边缘是被两条整体呈V字型的高大山脉围就，包括西侧的“西高止山脉”和东侧的“东高止山脉”。其中更具连续性的西高止山脉，一直延伸到了印度半岛的南部顶点。这一地理特点，使得喀拉拉邦所处的沿海平原，与泰米尔纳德邦之间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割。

另外，古泰米尔地区之所以能够长期抵御住北方入侵，除了优良的农业条件以外，海洋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从方位上看，泰米尔纳德邦的河流皆从东南方向的孟加拉湾入海。孟加拉湾另一侧的东南亚是其主要贸易方向；喀拉拉邦则正好相反，面临阿拉伯海的这条狭长沿海平原带，除了是整个印度降水最多的地理单元以外，也是阿拉伯乃至非洲方向登陆印度的首选之地。这条位于西高止山脉和阿拉伯海之间的海岸（北部目前位于卡纳塔克邦境内），又被贸易者称为“马拉巴尔海岸”（马拉巴尔为山海之间的意思）。在后面解读葡萄牙人的登陆时，马拉巴尔海岸将成为我们的重点。

贸易方向的不同，显然也是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形成差异化地缘特质的重要原因。长期面向“西方”的贸易特点，对喀拉拉邦人口的宗教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今天在喀拉拉邦的宗教信仰分布中，印度教大约占6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占两成。在很多地区，这样的比例足以成为动乱的根源。然而在喀拉拉邦，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三大宗教强势共存的客观事实，反而促使该邦民众在印度独立后多次选择无神论者（共产党）执政。以至于今天的喀拉拉邦，成为了整个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最文明的地区）。

上述三国在印度半岛的最南端，经历了上千年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博弈。尽管哲罗所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贸易和独立性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从争霸南印度的角度来看，还是潘地那和朱罗所在的泰米尔纳德地区更有潜力些。公元9世纪末，随着曾经控制泰米尔、泰卢固地区的“达罗毗荼国”（帕拉瓦王朝）走向衰弱，泰米尔三古国中与之最近的朱罗也抓住了机会复国，并成功颠覆领地大大缩小的帕拉瓦王朝，南印度也由此迎来了朱罗时代。

遮娄其人对安得拉邦地区的入侵，是帕拉瓦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在攻灭帕瓦

王朝的过程中，决定实施本土化策略的东遮娄其王朝，与复兴当中的朱罗结成了盟友。后者也依靠这层关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成功的臣服了潘地亚、哲罗等竞争者。问题在于，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统一整个泰米尔地区后的朱罗王朝，如果想进一步向北部，尤其是泰卢固地区扩张的话，终究还是要面临着与东遮娄其王朝一战的境地。不过，事情最终以一种看似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公元 11 世纪后期，两个南印度王朝通过联姻，分别代表泰米尔和泰卢固地区完成了正式合并。

新建立的王朝，在历史上又被称之为“遮娄其－朱罗王朝”。当然，这次合并其实就是朱罗王朝对东遮娄其王朝的吞并。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得益于朱罗王朝对泰米尔地区的整合以外，更因为朱罗王朝在公元 11 世纪时在海外的强势扩张。这使之有机会成为南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被冠以“帝国”称号的国家。不过相比 15 世纪时，郑和下西洋以及葡萄牙开启的海外殖民事业，朱罗王朝代表南亚次大陆在东南亚进行的海上征服事件，知道的人却并不多。



## 第十五章 马来群岛地区文明与国家的产生

### 第一节 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先来回顾下东南亚的地缘特点。整个东南亚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大陆相连的“中南半岛”；另一部分则是主要包含大、小巽他群岛、菲律宾群岛的“南洋群岛”部分。后者又被西方殖民者称之为“东印度群岛”；前者则因为被认定为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大陆，而被西方称之为“印度-支那”或“中印半岛”。基于地理环境上的区别，今天生活在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上的族群，在属性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以语言来划分的话，南洋群岛（包括马来半岛南部）属于“南岛语系”民族覆盖区；中南半岛上的民族情况则要复杂些，有属于“南亚语系”的，如柬埔寨的高棉族、越南的京族；有属于壮侗语系的，如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也有属于汉藏语系的，如缅甸的缅族。

中国和印度是整个东南亚民族的来源地。从时间关系上来看，南岛语系民族迁入东南亚的时间最早。在受到后来民族挤压后，向南渡过马六甲海峡，并一步步向整个南洋群岛扩散。这其中各民族的来源地究竟是哪，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好在这些太过久远的血统问题，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同的种族背景，也不会为这些民族的融合制造障碍（如印度那样）。我们更加关心的是，进入文明时期的东南亚是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印度在这当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海洋贸易是远距离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印度半岛漫长的海岸线，以及身为西方贸易重要产品出口地的地位，使其很早就成为了世界海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开放性结构及内部的分裂性，也是印度半岛能够发展海洋贸易的重要原因（有多文化、经济形式共存的空间）。就这一点来说，东南亚的情况与印度类似。只是基于印度的文明层级更高，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地缘特点，更容易使之成为外来文化的接收地。同时，征服了恒河下游的印度雅利安文明，也通过陆地线路经缅甸向北向中南半岛渗透。这种双重优势，使得印度文化在东南亚的早期传播要比中国更为据优势。侧重于自身大陆属性的中央之国，更多只是在越南半岛北部的红河平原占据优势。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宗教信仰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体。经由贸易传播，最迟在公元前的印度孔雀帝国时代，印度教和佛教就已经成为东南亚很多地区的主要宗教了。比如东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王国，公元前1世纪建国的“扶南”，以及扶南衰弱后，同样在湄公河中下游地区崛起的“真腊”，印度教都在其国内享有国教的身份。

在印度本土所经历长达千年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与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潮”宗教之间的竞争，同样也在东南亚延时上演。只不过东南亚整体黄种人属性的特点，

本身对于具有种族隔离作用的“印度教”并没有刚性需求。所以更具平等思维的佛教，最终取得了主导地位。当然，毕竟印度教曾经在东南亚兴盛一时，二地的地理环境特点又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中南半岛的佛教国家看到一些印度教文化的遗存。比如泰国最著名的宗教标志“四面佛”，其实就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中被边缘化的“梵天”，印尼的戏剧舞蹈在分类上属于印度教舞系等。

需要说明的是，东南亚尤其是南岛部分，并非只是海洋活动的被动参与者。包括南洋群岛在内，广泛分布于台湾岛以南的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岛屿之上的“南岛语系”民族（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存在，都能够充分体现了这一族群的海洋属性。最迟在公元1世纪，为独木舟一侧或者两侧加装“弦外支架”的技术（以在恶劣气候中保持舟体平衡），就已经帮助“南岛语系”民族从东南亚地区向外扩散了。其中向太平洋地区迁徙的部分，形成了现在分布于夏威夷、新西兰等地的“波利尼西亚人”，向印度洋方向迁徙的，则主要成为了“马达加斯加人”的族源。

留在南洋群岛地区的南岛语系民族，主要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岛屿国家的部分，在语言分类上则属于“印度尼西亚语族”，通常情况下，广义的“马来人”就是指向这一族群分类（狭义则是指马来西亚人）。如没有特别说明，行文中所指“马来人”都是指广义层面。基于体量关系，岛屿本身很难产生原生文明。其位置也使得其在文明的学习层面，落后于可以从海、陆两线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南半岛。那么，南洋群岛是什么时候诞生出地区性大国，又是如何与远在孟加拉湾另一侧的朱罗王朝发生关系的？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二节 马来半岛成为马来板块的文明起点

以西方的命名方式来说，整个东南亚可以分为“印支半岛”和“东印度群岛”两个板块。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将之称为“中南”和“南洋”两个板块会更让人舒服些。当然，从尊重其本身属性的原则来看，后者更应该被称之为“马来”板块。马六甲海峡是两大板块天然的地理分割线，但实际上二大板块的地缘分割线却并非它是它，而是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克拉地峡”。

经常被热炒为下一个“巴拿马运河”的克拉地峡，也是马来半岛与中南半岛的地理分割线。由于马来半岛虽然在地理上属于中南半岛的延伸，但其狭长的走向，以及基于马六甲海峡而带来的海洋属性，使得之在地缘上成为了马来板块的组成部分。今天这一地区大部以“西马”的标签（又被称之为“马来亚”或“半岛马来亚”）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一地缘属性在政治上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在克拉地峡南部拥有部分领土的泰国，对是否要挖通“克拉运河”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马来板块的文明起点便是在“马来半岛”，与大陆地理相连并非是其争得这一荣誉的原因。从南印度跨海而来的贸易者，是南洋板块文明因子的最初注入者。问

题是，从海洋贸易的角度来说，苏门答腊岛似乎应该具有与马来半岛同等的机会。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最初沟通印度洋与南海的贸易线中，马六甲海峡并非首选。东、西方贸易者通常会选择通过马来半岛北部陆地中转，在半岛的另一端再装船重新驶往下一个港口。

借助风帆技术沿海岸进行探索，是人类开辟远洋航线的重要手段。由于马六甲海峡整体处在南、北纬 5 度之间的“赤道无风带”中，那些沿海岸航行的早期商船，选择在进入赤道无风带之前靠岸并转运货物，比去马六甲海峡龟速航行要更节约成本。受这一贸易形式的影响，马来半岛北部，也就是今天泰国与马来西亚相交地带（而不是马六甲海峡沿岸），成为了南印度商人最早选定的贸易点。一如地中海的希腊人、腓尼基人一样，这些以贸易为目的的开拓者，最终也将他们的贸易据点升级为了城邦国家。根据记载，最起码公元初年，马来半岛北部都已经有了系列由南印度人建立的城邦国家（包括在羯荼国、狼牙修等国）。

受贸易影响而在印度人影响下完成文明升级的，并非只有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以北至曼谷湾部分，与马来半岛具有同样的地理优势。中南半岛最早的地区性大国——“扶南国”便是这一优势的获得者。扶南国的领土范围从湄公河下游平原，向西一直延伸至克拉地峡北部。这使得这个由高棉人建立的王国，不仅能够拥有大量农业之地（以及因此而生成的人口优势），还能够从印度洋——太平洋的跨洋贸易中分一杯羹。

从地理角度看，印度贸易者最初在选择兴建贸易城邦城址时，克拉地峡南部（相比北部）并没有特别的优势。问题在于，与大陆相近的地峡北部地区，更容易成为大陆势力的延伸。今天这一地区归属泰国、缅甸两国，就是这一地理位置影响的体现。也就是说，印度人最初并非没有在克拉地峡北部建立贸易据点，只不过这些贸易据点后来被崛起于中南半岛的本土政权所湮没了。反过来，印度教、佛教等来自印度的宗教，也得以在中南半岛传播和扩散。

### 第三节 爪哇国和三佛齐在南洋的崛起

尽管整个克拉地峡南北地区凭借狭长地势所带来的贸易优势，成为了马来板块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文明起点（不包括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北部红河平原）。但一地区的劣势也是明显的，缺乏纵深、过度依赖贸易，使之只能延生一些城邦性质的国家，并且容易为外来殖民者所控制。如果生活在马来板块上的“马来人”，想诞生一个强大的地区性国家的话，就需要把希望放在那些大型岛屿上了。

与马来半岛距离最近的，是马来地区最大的一组岛屿：“大巽他群岛”。这组岛屿中最大的岛屿又有四个，分别是：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苏拉威西岛。今天除了加里曼丹岛北部归属原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以外，其余部分皆为



印度尼西亚所有（原荷兰殖民地）。从东、西方海上贸易的角度来看，大巽他群岛北部与马六甲海峡相邻的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无疑会更有价值。尤其是与马来半岛合围成马六甲海峡的苏门答腊岛。然而从农业和人口角度考量的地区竞争力来说，四大岛屿中最小的爪哇岛却是最强的，印尼首都雅加达便位于爪哇岛的西端。今天这个面积与福建相当，且也多山的热带岛屿，人口竟然能够达到 1.4 亿之巨。要知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的总人口也不过 2.5 亿。

对于热带地区来说，农业生产的两大基本要素：阳光和降水，基本都不会缺乏。最大的问题在于，在过度降水的冲刷下，土壤往往无法保持肥力（有毒的重金属倒会留下来）。比如南美的亚马逊平原就是典型的案例，以至于即使你把热带雨林全部砍光，也无法让这片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农田。然而同处热带的爪哇岛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帮助爪哇岛养育如此众多人口的，是数量多达上百的火山。虽然这些火山周期性的活动，难免对岛上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但相比它们定期为爪哇补充异常肥沃的火山灰来说，这点不安全感完全属于可以在承受范围内（火山爆发是有预兆的，人口损失并不会大）。

基于爪哇岛优异的农业基础，这个岛屿早在公元初便已成为“马来人”的核心居住地。东汉时期，岛屿上的土著政权甚至出现在中央之国历史记载中。只是稠密的人口也为爪哇岛的内部统一工作增加了难度，其内部整合工作一直到公元 10 世纪初才初见成效。这一时期的爪哇岛被整合为了三个国家，分别是：西部的塔鲁纳国、中部的诃陵国，以及东部的爪哇国。最终统一爪哇岛的是东部的爪哇国。公元 10 世纪末，爪哇与当时的宋朝建立了贸易联系（在中国历史中，当然还是体现为“朝贡”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身处南海之外，且不在东西方贸易线上的爪哇国来“贡”，多少有些出乎意外。以至于在中国人的口中，“爪哇”成为了极远之地的代名词，在某件事情被彻底遗忘时，经常会用“丢到爪哇国去了”来形容。

统一全岛的爪哇国之所以急于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很大程度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苏门答腊岛，也在同一时期完成了内部整合工作，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王国——三佛齐。尽管苏门答腊岛的农业潜力不如土壤肥沃的爪哇岛，但其身处马六甲海峡之侧的地理优势，却在这一时期得以显现出来，并由此而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前面我们说了，早期沟通印度洋－南洋的贸易线，是通过“海－陆－海”的联运形式在克拉地峡南北转运的。不过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在这两片海域穿梭的贸易者们终于发现可以借助自然力，将马六甲海峡身处无风带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利用起来，并最终促成了连续的海上贸易线。

这一发现就是对北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气候环境影响深远的“季风”。东南亚及南海地区，与印度和北印度洋地区一样，在夏季时为从赤道方向吹来的“西南季风”所覆盖；冬季则受源自大陆的“东北季风”所影响。掌握了这一规律，贸易者就可以在冬季时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然后在马六甲海峡一带休整、贸易，等待

来年的夏季再借西南季风之势抵达印度（反之亦然）。由于可以借助季风航行，并且全程采取海运形式，商船的吨位比起之前有了大幅的提升。这也使得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量，开始渐渐对陆地丝绸之路产生压倒性优势。

说到这里，你可能在技术上会有个疑问，就是帆船如何在赤道无风带航行。其实在强大风力影响下，海水表面是会形成洋流的，借助季风进入无风带的帆船，可以顺着同向的洋流继续前行。另外“风”也并非促使表面海水流动的唯一原因。像马六甲海峡就会受到赤道逆流的影响，呈现总体从东南向西北方向流动的补偿流。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洋流的方向，而在于你是否掌握了规律并善加利用。后面当我们的视角再回到葡萄人身上时，你甚至会发现借助逆风航行的风帆技术也已经成熟了。

当然，完全利用洋流的航行，速度肯定不会很快了。为帆船配备划桨（称之为“桨帆船”）、用尾舵的摆动提供前行的动力，以及用吨位较小的桨船拖动大型帆船，都是解决船只动力的辅助办法。虽然这些办法在速度上都无法与顺风顺水的航行相比，但考虑到两个季风之间相隔有数月之久，借助季风的跨洋航行（比之沿海岸航行）又可大大缩短航程，这段完全不用考虑风暴侵扰的热带海域之旅，倒成为难得的休闲时光。

事实上，南洋群岛丰富的物产，以及土著的马来人，本身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贸易终端。精明的商人们并不会真正休息，而是会充分利用这段等待季风时间，与马六甲周边地区进行贸易。本身不处在航线上，但人口众多的爪哇岛也是受益者。不过基于位置关系，随着马六甲海峡的货物运输量日益增大，受益最多的终归是海峡两岸地区。这也是“三佛齐”王国得以崛起的根本原因。至于爪哇国和三佛齐，最终谁成为了朱罗帝国的对手，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四节 三佛齐征服爪哇国并与朱罗对决

苏门答腊岛的面积是整个马来群岛中最大的一个，相当于 3.5 个爪哇岛。但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只有约 5000 万，只相当于爪哇岛的 1/3 强。火山灰是热带农业的关键，虽然苏门答腊岛上也有 90 多座火山，但活火山的数量只有爪哇岛的十分之一不到（印尼有 120 多座活火山，爪哇岛就 100 多座）。没有更多活火山周期性的补充土壤肥力，使得苏门答腊岛的整体农业、人口潜力都不如爪哇岛。

然而人口并不是衡量地缘潜力的唯一标准，不然中国和印度的国力肯定要超过美国几倍了。苏门答腊之名的原意为“金岛”，在古代中国的记载中曾经被称之为“金州”。这是因为其位于西南，贯穿全岛的巴厘桑山脉盛产黄金。这放之四海皆通行的硬通货，显然对提升苏门答腊岛的地缘潜力会有所帮助。不过真正让苏门答腊岛有实力跟爪哇岛对抗的资本，还是源自于它的位置。如果说爪哇国优异的土壤条件，

使得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更重的话，那么苏门答腊岛更像是一个商业国家了。

在海洋贸易线上，港口是最重要的一环，并不是所有岛屿都天然能够生成优良的海港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岸线经常遭受海浪侵蚀，造成海岸线过于平缓，使得二岛的天然海港并不太多。西爪哇的雅加达、中爪哇的三宝壟、东爪哇的泗水（苏腊巴亚），是印尼排行前三的港口城市。三佛齐王国的崛起之地，今天苏门答腊岛东部最大的港口城市“旧港”（今译“巨港”），则选择兴建在了岛上河流穆西河的下流。通江达海的位置，使之不仅可以得海运之利，并且更利于辐射岛内。

选择海湾还是河流下游建港，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有贸易需求的存在，人类总会在漫长海岸线上找到合适的点，将岛内的资源运送出来的。上述港口无一例外的都身处岛屿的北沿，便是这种地缘选择造成的。三佛齐王国实力直接源自于它与马六甲海峡相邻的位置，即使来自中国和印度方向的贸易者想前往爪哇岛贸易，通常也需要从苏门答腊岛之侧经过。凭借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三佛齐王国和旧港成为整个马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技术优势，甚至因此成为了马来文化的文明起点。

为了巩固这一经济和技术优势，崛起之后的三佛齐王国开始了在马六甲半岛的扩张，并最终完成了对海峡的控制。与此同时，这个佛教王国也开始通过战争和联姻的方式，尝试向富庶的爪哇岛中西部扩张势力。公元10世纪末，当东爪哇王国在全岛的霸权建立后，南洋两大强国或说两大岛屿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愈发的尖锐，并在公元11世纪初爆发决战。

与爪哇国相比，以海上贸易立国的三佛齐王国，在海上要更占据优势，这也使得三佛齐王国成为了这场南洋争霸战的胜利者。尽管这场战争本身很大程度消耗了三佛齐王国的国力，但出产自南洋诸岛上的黄金、香料、名贵木材等，都是东西方贸易链上的重要商品。军事霸权的取得，是为了能够做到为这一地区制定统一贸易规则。战胜爪哇王国，将使得兼具交通和产地优势的三佛齐王国，变得更加的强大。

就一条贸易链来说，任何一个环节的强大，对这条链条上的其它环节来说都未必是好事。三佛齐在南洋的称霸，很显然会增强它的议价权，并对它的两个直接贸易对象：中国和印度利益造成直接影响。对于来自这两个地区的商人来说，一个分裂并相互制衡的马来地区，才是最有机可乘的。在地中海文明圈，贸易争端往往是战争的直接起因。那么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商人，是否有机会将贸易矛盾升级为战争呢？

三佛齐王国崛起之时，中国正处在北宋时期，空前的北方压力似乎让这个中央之国无暇顾及远在“爪哇国”的争端。不过这其实与中国此时身处的时代并无关系，因为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专注于陆地的文明，历代中央王朝对于海外扩张都可以说是毫无兴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造就的自给自足心理，使中原王朝在海外贸易问题上，更多是秉持着“恩赐”的心态。即如果你原意以卑微的夷狄身份，加入中



央之国的“朝贡”体系，那么通常情况下，面子上得到了满足的中国统治者，会允许向你出口包括瓷器、丝绸、茶叶等在内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商品。而你所需要用来交换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满足皇室和上层猎奇心态的土特产。

无论是三佛齐还是爪哇国，在强大之后都曾经主动遣使加入过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而这种披着政治外衣的经贸往来，基本也能够保障中国商人的贸易权（尤其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中国的贸易者有着官派的背景）。有鉴于此，一个抱着“中国不需要世界”心态的中央之国，对南洋地区是否出现一个强大政权并不会感兴趣，更不用谈为了贸易而劳师远征了。

如果感觉某个国家的崛起会对中央之国造成某种威胁的话，反制的做法通常是断绝“朝贡”权，让你没办法买到天朝上国的商品就够了。按照现在的说法，不让某国来“进贡”的做法，相当于是一场贸易战了。千万不要小瞧了这种不流血战争的影响力，15世纪之后的日本就曾经深受其困。以至于日本之南的琉球王国凭借与中国的朝贡联系，而获取了巨大的转口贸易利益，并因此而成为东海地缘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在排除了中国对三佛齐王国的威胁后，我们再来看看印度方向。相比中国，印度对产自马来地区的黄金和香料的需求要刚性得多。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对这类商品也有狂热的感情。通过转口西方，印度的中间商还可以赚取巨额的中间利润。基于位置关系，此类海外贸易大部是由南印度来承担的。正因为如此，三佛齐王国的做大所直接影响到的，也是南印度的利益。

南印度如果想对三佛齐王国的做大有所反应，前提是出现一个统一政权。大多数时候，这一地区都处在一盘散沙阶段。除了以潘地亚为主的达罗毗荼政权，曾经对近在咫尺的锡兰岛北部进行过海外征服以外，并没有尝试过进行更远的扩张。虽然历史中有一些南印度人借助贸易在马来地区取得了成功甚至建立政权，但却与南印度政权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不属于政治殖民）。不过在公元10世纪朱罗脱颖而出后，这种情况出现了改变。

公元10世纪中叶，在吞并潘地亚之后，朱罗人得到了潘地亚人在锡兰岛北部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控制了整个斯里兰卡。与太平洋相比，印度洋上的岛屿并不多。在跟南印度相近的北印度洋区域，除了锡兰岛以外，从马拉巴尔海岸西南一路向南延伸至赤道的“马尔代夫群岛”，是最主要的海外陆地了。尽管马尔代夫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自然资源，但其横亘于印度半岛与赤道之间海域的位置，使之在航线上还是具有一定价值。今天美国在印度洋上唯一的支点，便是向英国租借的，与马尔代夫群岛北部相邻的“迪戈加西亚群岛”之上（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从锡兰岛而来的僧伽罗人有可能是马尔代夫群岛最早的居民（最起码是文明带入者），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南印度的泰米尔人等族。后来长期控制东西方海上贸易通道的阿拉伯人，也在这个印度洋中继点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今天马尔代夫的官

方语言“迪维希语”，便是在僧伽罗语的基础上，吸收了其它移民语言成分形成的（尤其是阿拉伯语）。在朱罗全面控制锡兰岛之后，这个立志在海上有所作为的南印度国家，也随之控制了马尔代夫。

与此同时，三佛齐王国也通过对爪哇国的征服成为了南洋霸主。两个都希望最大限度获取贸易利益的地区性强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战争往往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一场海上战争，不仅将决定谁能够取得东西方贸易的主导权，更能够帮助胜利者的历史影响力提升至“帝国”层面。顺便说一下，从另一个角度看，信奉印度教的朱罗与信奉佛教的三佛齐之间的战争，似乎也算得上是一场“圣战”。不过多神教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的排它性，尤其是源自印度的宗教。因此，这只是一场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的战争。

最终主动发起进攻的，是正处在势头上的朱罗王国。朱罗人组织的海上远征军，在马来半岛西北部的吉打（今天马来西亚吉打），以及旧港都取得了海战的胜利，成功的迫使三佛齐王国臣服。不过朱罗王国并没有进一步入侵爪哇岛，也没有真正在马来地区建立直接的政治统治。对于一个海上帝国来说，能做到削弱主要对手、控制海上交通要道就足够称霸了。就像后来的大英帝国，也只是控制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部分。

携征服三佛齐之势，朱罗王朝在陆地上也开始沿海岸线向孟加拉方向扩张，势力范围直抵恒河河口，同时还在缅甸南部沿海地带建立据点。从扩张路线可以看出，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与拉杰普特人争夺北印度的控制权。朱罗人所立志打造的，是一个“环孟加拉湾”贸易帝国。也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朱罗可以算得上是南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帝国”。

“朱罗帝国”的强势扩张，很大程度是依托了海洋优势。而在周期性被游牧民族横扫一遍的恒河平原腹地，这一优势并无法体现。打造一个“环孟加拉湾”帝国，尤其是夺取恒河三角洲所处的孟加拉地区，则可扬长避短，将朱罗影响力发挥到最大（这种情况多少与古代中国相似）。在这个贸易圈内，最让人感兴趣的板块当属“孟加拉”了。

## 第十六章 孟加拉与印度东北部的地缘特点

### 第一节 孟加拉形成独立板块的原因

世人对孟加拉的兴趣，应该始于“印巴分治”之后，当时以“东巴”之名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今巴基斯坦为“西巴”），足以让每一个在地图上看到这种情况的人感到好奇。毕竟在印度教的印度和佛教的缅甸之间，硬生生的挖出一片伊斯兰之地来，难免会有违和感。每一个国家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地理依据，或者说会依托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尤其这种与周边国家有显著差异的国家，往往在地理独立性上要更强。下面我们先从地理角度切入，来看看孟加拉地区在地理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孟加拉地区最显著的地理特点是“水”，这是一片水资源异常丰富的三角洲平原（孟加拉平原）。从水系角度来说，可称之为“恒河三角洲”。更准确的说法则是“恒河－布拉巴普特拉河三角洲”。所谓“布拉巴普特拉河”，就是中国西藏境内的雅鲁藏布河在印度境内的名字。在孟加拉境内，它又被叫做“贾木纳河”。这条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大河，在山脉东端顺着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拐了个90度的大变，转而向南注入了印度东北部平原。然后再在地势的作用下，向西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延伸，最终在孟加拉平原再次南流，与恒河相交注入孟加拉湾。整个走势，颇像一个变形的“？”号。

纯粹从地理层面来说，流程较短的河流会被认定为较长河流的支流。从这个角度来说，全长超过3000公里的雅鲁藏布江，显然比2500公里长（还包括合流后部分）的恒河，更有资格被标注为干流。不过为山川河流命名的是“人”，大多数时候对人类活动影响力的大小，才是干、支之争的主要参考标准。比如对华夏文明起源有着重要影响的青海境内的“湟水”，单纯从长度来说并不如在民和县附近汇入它的大通河，但地理环境较差的大通河谷，在人口及地缘影响力远不如湟水，因此整个流域会被以湟水命名，大通河也变成了湟水的一级支流。

恒河与雅鲁藏布江的干、支之争也是如此。反映在地缘层面上，就是孟加拉平原并不会因为雅鲁藏布江的流程更长，与西藏地区拥有更近的地缘关系，而是因为恒河的存在成为印度的一部分。这一点也可以从“孟加拉人”的民族属性上看出。与恒河平原一样，孟加拉人也是“印度雅利安人”在北印度扩张形成的。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宗教原因独立成国，孟加拉之于大多数人的知名度，并不会高于西海岸有着类似位置的古吉拉特。

造就孟加拉地缘独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加拉平原的地势。由于遇到海洋的阻力，河流下游的三角洲地区一般会沉积，并形成农业条件优异的扇形平原。加之



临海而带来的贸易之利，使得这种三角洲地区更容易成为独立性较强地理单元。孟加拉平原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本身正处在印度半岛南部高地区与东部高地区的相接之处。这一地形特点，不仅改变了恒河和布拉巴普特拉河的流向，也进一步强化了孟加拉平原的独立性。中国古代的江东（后来的江南）地区，其实也有类似的特点。只不过，中央之国在文化上更倾向于统一。海洋贸易之利之于长江口的优势，也只是在上海开埠之后才得以显现。使得孟加拉这种在宗教、政治上独立的情况，并没有在中央之国出现。

回到孟加拉的地理结构问题上来。在地形图上可以看到，孟加拉平原的西侧是焦达讷格布尔高原；东、北侧，则是分隔印度－中南半岛的“若开山脉”的北部延伸丘陵。这段从孟加拉湾向北延伸至中国边境的丘陵地带，整体并非为弧状，而是呈现为“人”字形。其中南北走向充当印、缅边境的部分，被称之为“那加丘陵”；东西向充当孟加拉东北部（与印度）边境的部分，则可统称为“卡西丘陵”。上述地形特点，并不止于加深了孟加拉平原的独立性，更让南亚－东南亚相接的这片土地，地缘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单纯从行政地图上，也可以感受到这点。在“挖”去了孟加拉国之后，印度东北部与中国、缅甸相接的区位，显露出一片飞地般存在的国土。这片亚飞地的核心区，是喜马拉雅山脉与卡西丘陵、那加丘陵包夹而成的“布拉巴普特拉河谷”，行政上属于印度“阿萨姆邦”所辖。

## 第二节 阿萨姆国统治印度东北部地区

著名的阿萨姆红茶，使得“阿萨姆”之名为世人所知。不过对于地缘研究者来说，更感兴趣的是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属性。所谓“阿萨姆”之称，源自于13世纪初以布拉巴普特拉河谷为核心立国的“阿萨姆国”。阿萨姆人属于黄种人的“傣泰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同源。在他们入主这片土地之前，这一地区的原住民也不是印度雅利安人，而是属于藏缅语族的部族。今天除了傣泰族源的阿萨姆人以外，还有与缅族亲缘相近的那加、米佐等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阿萨姆国在印度东北部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整个孟加拉平原以北、以东至若开山脉，今属印度的领土都属于它的领地。包括有：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和特里普拉邦。加上印度在中国声索主权的“藏南”地区所设立的“阿鲁纳恰尔邦”，这片介于中国－孟加拉－缅甸之间的印度控制区，又被称之为印度东北部的“七姐妹”邦。

与东南亚乃至东亚种族属性一致的印度东北地区，在印度是一个异类的存在。为了遏止这一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印度在建国之后开始大规模的向这一地区移民，并因此加剧了当地的地缘矛盾。应该说，印度东北地区的这一特殊地缘属性，与孟加拉人维持自己地缘独立性的努力也有直接关系。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对于以恒河

平原为核心的印度政权来说，拿下人口众多、贸易昌盛的孟加拉平原之后，也很难有动力去解决那些受山地保护的黄种人。

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真正为伊斯兰化“印度雅利安人”（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民族）覆盖的，都是农业条件较好的平原区（包括盆地）。那些充当印度和阿富汗分割线的山地两侧，则为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所控制。印度和巴基斯坦最为动荡的地区，分别为东北部、西北部多山地区的局面，也可以说是当年大英帝国希望为英属印度谋求一条安全的地理屏障所造成的。

阿萨姆国在印度东北部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初。在其陷入衰弱后，从缅甸南部向北扩张成功的“缅族”政权（为此还跟当时的清朝较量过，具体参考乾隆十全武功中的“平缅甸”），曾经试图将阿萨姆国纳为自己的领地。不幸的是，身处这个时代，亚洲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在孟加拉站稳脚跟，并准备以其为基地向西、东两张扩张的英国，很快便将阿萨姆国和缅甸悉数纳入了大英帝国的版图。

欧洲人征服世界所造成的一大后果，是诸政权的边界开始线性化。在此之前，世界上大多数政权并不会刻意为自己划出一条符合地理规律的地理边界。控制每一个地理单元的核心区、中心城市，是形成统治的基础。追求明确地理边界，并以追求统治区地理边界完整的做法，源起于 17 世纪开始崛起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法兰西（红衣主教黎塞留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主政时代）。以古代高卢的版图为历史依据，山脉、河流为自然边界的理论，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法兰西后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也被称之为“自然边疆理论”。

然而划分行政板块，向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单纯依据地理分割来划分，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山脉分水岭还是大江大河，本身未必都一定会成为族群的分割线。很多时候，一条河谷平原或者一条分水岭两端的山地，会被同一民族所覆盖。比如追求自然边界的法国人，一定要以莱茵河为边界划分法德边界时，就会遇到莱茵河左岸的阿尔萨斯地区居民为德意志人的局面。

这种地缘边界与地理边界的误差，通常也是近现代国际政治冲突中最为常见的导火索。身处这种尴尬夹缝中的民族能否获得独立，或者归于与自己属性相近的国家，更多要看自身的地缘潜力以及历史机遇。一般情况下，人口较多又有海岸线拓展外联空间的板块，机会会更大。拥有 1.6 亿人口，又与印度洋相接的孟加拉国，最终能够独立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一基础上，以伊斯兰教立国，其实只是孟加拉为彰显独立性所做的技术选择罢了。

至于封闭于内陆，人口潜力又不大的阿萨姆国，就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余地了。在大英帝国统治时期，英国人便依地理关系将之划给了印度（而不是缅甸）。当然，英国人的这种做法也并非完全没有地缘基础。毕竟以阿萨姆人所处的位置来说，与南亚核心区的关系要高于被山脉分割开的亲缘民族。这也导致了阿萨姆国在立国之

后，很快成为了一个印度教国家。

### 第三节 孟加拉在宗教信仰选择上的变迁

印度教在南亚的强势地位，同时体现在孟加拉人信仰选择上。前面我们之所以使用了“伊斯兰孟加拉”这一标签，是因为今天信仰伊斯兰教的孟加拉国，并非是“孟加拉”或者说“孟加拉平原”的全部。孟加拉平原的西、北部边界，并非是孟加拉平原与高地的自然分割线。西北方向大约有 1/3 归属于印度。在印度的行政区划中，被称之为“西孟加拉邦”。

“印巴分治”时，基于宗教而做出的政治分割决定，是西孟加拉从孟加拉分离出来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西孟加拉地区的孟加拉人，信仰的是印度教。曾经从 1772 年直到 1911 年的 140 年间，充当英属印度首都的“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邦的首府所在。英国人的这种选择，与当年朱罗帝国在孟加拉的扩张、伊斯兰教在孟加拉的立足，都有着相同的逻辑。孟加拉这片人口众多的沿海平原，既是一个高潜力的贸易终端，也是一个可以辐射北印度的陆－海枢纽。同时板块的地缘独立性，又使得它与外来势力更容易找到利益上的合作点，以共同应对来自恒河平原的地缘政治压力。

孟加拉人以宗教差异彰显地缘独立性的做法，并非只在接受伊斯兰教时才有所体现。在古尔王朝为北印度开启伊斯兰统治时代之前的“拉杰普特人时代”。统治孟加拉地区的，是拉杰普特属性的“帕拉王朝”（公元 7-12 世纪）。这一时期，印度教在整个印度次大陆开始强势复兴。通过修改教义，印度雅利安属性的“婆罗门教”，变成了可以吸收其他种族成份的新“印度教”，并彻底击败了佛教等沙门思潮宗教。

然而基于地缘政治需要，孟加拉的帕拉王朝并没有随大流的成为印度教之地，而是选择了以佛教立国。更鲜为人知的是，帕拉王朝选择的教派，既不是汉传的“大乘佛教”，也不是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而是与藏地一样的“密宗”。实际上，密宗信仰正是在孟加拉兴盛之后，再传入藏地的（公元 8 世纪时）。两个隔喜马拉雅山脉相望的边缘板块，在这段历史时期甚至曾经多有交流。密宗时代也是今天孟加拉族的形成阶段。不幸的是，在整个南亚地区，佛教势衰的趋势已经很难逆转了。最终能够坚持这一选择，避免印度教融合的，只剩下与大陆隔海峡相望的斯里兰卡了。不过紧接着“拉杰普特时代”在印度强势建立统治的伊斯兰政权，给孟加拉人提供了另一个选择。

公元 1199 年，席卷整个北印度的古尔王朝也征服了孟加拉的帕拉王朝。如果伊斯兰教能够顺势同化整个印度（哪怕只是北印度）的话，孟加拉人的选择也许又会是印度教了。问题是，那些突厥裔的穆斯林只能在干热的印度河流域做到这点。在



恒河平原、德干半岛地区，苏丹们更多只能以宗教宽容政策，在不动摇印度原有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抛开最顶层的穆斯林统治者，孟加拉地区的那些孟加拉裔地方贵族，面对西部印度教地区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时，本身并没有得到缓解。西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化，就是这一地缘压力的具体体现。

选择与最高统治阶层一样的宗教，是缓解这一压力的有效手段。孟加拉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始于德里苏丹国时代，并在莫卧尔王朝时期完成。与孤岛般存在的密宗信仰相比，伊斯兰信仰所能够带来的资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更多，也更有利于维持孟加拉地区相对印度教地区的独立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孟加拉本身具有的“陆－海”贸易枢纽地位，在整个印度洋乃至东南亚、东亚海上贸易为穆斯林所垄断的时代，穆斯林的身份将极大减轻孟加拉经济所需付出的信任成本。

现在我们知道了，孟加拉伊斯兰化的选择，是一个基于其特殊地缘政治 / 经济位置，受陆、海两条传播方向（尤其是前者）共同影响而做出的选择。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欧洲势力能够在密宗时代结束时，强势介入南亚次大陆的话，今天的“孟加拉国”将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片孤悬于此的基督之国。

#### 第四节 曼尼普尔人经营英帕尔盆地区

正准备回到大国博弈的解读模式来，忽而想起中印缅边境至今依然是一个国人关注的热点板块。跟中国人地缘政治关系较近的缅北地区，大家的熟悉度较高。相对来说，国土呈犬牙交错状的印、缅、孟三国之间有什么样复杂的地缘纠葛，就没那么熟悉了。鉴于上述三国于中国在北印度洋的布局有着莫大关联，因此再花些笔墨也是值得的。

弧状的若开山脉－那加丘陵，是南亚次大陆与中南半岛的天然分割线。其中“若开”之名取自缅甸的“若开邦”；“那加”二字则得自印度的“那加兰邦”（那加兰为“那加人”的意思）。这两段独立命名的山体，实际是一条连续性很强的山脉。如此命名，更多是基于两国分享这一地理分割线的需要。唯一有问题的是，那加丘陵并不是一条丘陵，它与若开山脉一样，海拔在 1500-2000 米左右（丘陵海拔一般在 500 米以下）。这样的高度，加上密布的原始森林，足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有鉴于此，将之合并命名为“若开－那加山脉”，或者将那加丘陵改称为“那加山脉”，会更有利于大家理解这一地区的地理结构。

当然，若开－那加山脉虽然比之很多山脉来说，看起来完整度都要高得多，但一定要将之分割为二部分，也不是没有依据。承担这一地理分割任务的，是一个身处山脉之上的封闭盆地：英帕尔盆地。相信这个地理标签会让绝大多数人感到陌生，不过提起另一个名字“曼尼普尔”，关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动向的朋友，可能就要熟悉得多了。在网络传闻中，身处印缅边境的印度“曼尼普尔邦”，是一个印度人

进入都要受限的国中之国。更吸引眼球的是，曼尼普尔人自认为是龙的传人，并且是从中国境内迁移过去的。甚至还出现有共产党组织、山寨过中国国旗和国徽等。这一切，都让人对这个“小中国”充满好奇。

在地图上很容易能够找到曼尼普尔的位置，印缅边境在中段出现了一个明显的90度转折，折线的上方就是曼尼普尔。从地形图上会更容易感受到这个神秘之国的存在。整条印缅边境并非严格按照分水岭原则来划分的。其中最南端全部归属于缅甸，甚至若开邦的大部分土地处于若开山脉西侧的沿孟加拉湾地区；中部则由于曼尼普尔的存在，使得印度在这个位置上的边界能够抵达若开-那加山脉的东麓。

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片纯粹的山地是很难成为某一政治体内的“一级行政区”的。在山麓拥有一片能够聚落大量人口的平原，是行政升级的基础。比如塔吉克斯坦虽然号称“高原之国”，但它的国力及今天的政治地位，取决于塔吉克人在山麓平原还拥有那一席之地（虽然没有完整的）。这也使得塔吉克人被分为“平原塔吉克”和“高原塔吉克”两种。中国境内的塔吉克人属于人口潜力较小的后者，也因此只能支撑这中国境内的“塔吉克”标签，在行政上体现为“县”一级（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支撑曼尼普尔存在的平原，则不在山麓而是在高原之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英帕尔盆地”。英帕尔是这个古老国度的首府所在，以这样一小片高山平原为核心，加上周边保护盆地的一圈山地，就是曼尼普尔邦的地理基础了。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样一个高山盆地区划给印度或者缅甸都是可以的。不过从水系角度来看，会更容易判断曼尼普尔的地缘倾向。曼尼普尔河是滋养英帕尔盆地和曼尼普尔人的母亲河。这条发源于英帕尔盆地北部山地的河流，在向南穿越盆地及若开山脉后，汇入了缅甸境内的钦敦江（伊洛瓦底江上游），并最终注入缅甸南部所对应的安达曼海。从这个角度说，虽然曼尼普尔被大英帝国划给了印度，但其实与缅甸的地缘关系更近。

历史上，英帕尔盆地的地理封闭性，使之在英国人全面控制印度、缅甸之前，一直都能够维持独立地位。即使是在印度东北称霸数世纪的“阿萨姆王国”，实际上也没有能够控制曼尼普尔。毕竟无论是来自印度（包括孟加拉）还是缅甸的统治者，劳师动众的去征服这样一个山地国家，性价比都是非常低的。据称“曼尼普尔国”的独立地位，前后维系了200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由于无法明确获知曼尼普尔人立国的起点时间，这一数据有些存疑，但曼尼普尔长期保持独立状态是可以肯定的。

曼尼普尔独立性还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在英国人到来之时，包括曼尼普尔在内的印度东北山地板块（不包括平原地区的阿萨姆人），土著民族大都处于信仰原始宗教状态。山地为这些蒙古人种的部族抵御了外来文化的同化。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是曼尼普尔也曾经有过文化输出之举。马球是曼尼普尔人非常喜爱的项目，同样喜爱马上运动的英国人，在控制曼尼普尔后很快也迷上了这项运动，并将之改造

为现代体育项目。

考虑到马球早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就已兴盛一时，而曼尼普尔人看似又与中国渊源颇深。一定要把中国与现代马球的起源联系起来，最起码比从“蹴鞠”那里获得足够自豪感，要更靠谱些。可惜曼尼普尔人是否真的与中国，或者说华夏文明有直接联系，实际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曼尼普尔人声称，自己的王族来自于中国的“齐”朝。然而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齐国，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南、北齐，有部分“齐人”向曼尼普尔迁徙，都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基于种族特征而引发的联想，更像是曼尼普尔人为维持地缘独立性所做的一丝努力。毕竟相比于两侧的印度人、缅甸人，中国对于曼尼普尔的现实威胁基本为零。如果这种联想仅仅是为了借力，那么也许曼尼普尔人口中的“齐”，也许是更为强大的“秦”的误读。

其实基于与印度的分离感，在印度东北地区，“中国联想”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曼尼普尔南部的米佐拉邦姆邦，也有很多土著居民认定自己来自于中国（甚参与了修筑长城）。在英国人所代表的西方势力统治南亚、东南亚大陆后，印度东北地区（尤其是山地）部分土著部族，又把对抗周边强大民族的理想寄托在了西方人身上。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有大量土著部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像那加拉邦、米佐拉邦，人口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都非常高。甚至还有部落民选择了犹太教，将自己描绘成为圣经时代犹太人失落的“十支派”（这也是每一个想皈依犹太教民族所使用的套路了）。

类似借助宗教信仰寻求西方势力支持的情况，在有分离倾向的缅甸北部山地也同样存在。经常出现在缅甸内战新闻的“克钦邦”（二战中国远征军撤往印度所走的“野人山”即胡康河谷便在此邦）；身处若开山脉的“钦邦”，便有很多不愿意融入缅甸的克钦人、钦人从原始宗教转信基督教。只不过，身处大国夹缝中的这些山地民族，很难依靠这种事大的努力为自己谋得独立地位。相比那些身处内陆山地的“少数民族”，拥有海岸线的板块更容易引发世人关注，以及获得外力支援。若开邦是缅甸边缘七邦中少数拥有这一优势的板块。今天若开山脉西麓的沿海低地区被孟加拉和缅甸所分割，除了南部归于缅甸的“若开邦”以外，北段则归属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专区”（专区为孟加拉国一级行政区，共有6个）。

单纯从行政地图上看，你可能会为孟加拉国在这个位置上拥有一个近乎飞地的突出部感到疑惑；而一旦从地形图上看，却又会让人觉得从地理分割的角度看，孟加拉国或者印度应该更有理由得到身于若开山脉分水岭之西的若开邦。至于孟加拉在吉大港地区怪异轮廓的形成，则是当年印巴分治时，印度得到了阿萨姆王国故地的结果。

事实上最起码在14世纪中叶，源自德里苏丹国的穆斯林势力向东夺取吉大港地区统治权之前，吉大港地区大部与若开邦地区都归属于同一国家：若开人建立的“阿拉干王朝”。对比即使山势险峻的北部地区，都没有能够阻止阿萨姆人跨越分水岭



的扩张，若开人在山脉走弱为丘陵的南部地区向孟加拉方向的渗透，也不应让人感到奇怪。由于阿拉干王朝又经常臣服于缅甸政权（包括今天的归属）。因此，阿拉干王朝也可以视为缅甸的地方政权（参照中国历史的描述方式），吉大港地区的这段历史则可被视为缅甸统治时期。

阿拉干王朝是在 18 世纪末彻底从地缘政治舞台上消失，并归入缅甸的。此后的 19 世纪初，英属吉大港与缅属若开地区之间的矛盾，甚至成为了“第一次英缅战争”（公元 1824 年）的导火索。在这场战争中，缅甸军队一度曾经拿下吉大港地区并攻入阿萨姆。不过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及技术优势，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若开邦成为英国人占领的第一块缅甸领土（60 年后缅甸整体也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有鉴于缅甸在历史上的确曾经强势扩张过，领土范围包括了今天试图独立的边缘邦，将今天缅甸版图的奠定“归功”于英国人，是不够客观的。只不过，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低地起家的缅人，控制自己边缘地区的时间还不够长，造成了今天几乎所有边缘邦（缅人所控制的腹地行政上都为“省”）都有独立倾向。

顺便说下，每个试图独立的缅甸邦都有着自己的民族武装。若开邦的民族武装叫作“若开民族解放军”。不过能够让若开邦登上时政版面的，并不仅仅是若开人为独立所做的努力。若开邦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才更吸引国际人权组织的眼球。在缅甸政府和信仰佛教的若开人的挤压之下，这些穆斯林移民不仅无法获得缅甸国籍，很多更被迫成为了难民。缅甸人认为，这些穆斯林是当年英国殖民者从南亚乃至中西亚地区招募穆斯林劳动力的结果；而罗兴亚人则自称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参考印度东北部的民族的“中国联想”）。其实到底源自哪里并不重要，残酷的现实是，罗兴亚人之于这片土地的渊源，并不足以让他们拥有地缘政治上的机会。

## 第十七章 德里苏丹国衰亡后的印度地缘格局

### 第一节 德里苏丹国没能完成整合南印度

帕拉王朝与东南亚也有十分紧密的贸易关系，乘着东北季风南下、西南季风回归的孟加拉商人，同样将马来之地视为重要的贸易中转地。击败帕拉王朝，并夺取孟加拉地区的出海口，为朱罗帝国的“环孟加拉湾”贸易帝国，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值得一提的是，在击败帕拉王朝之后，朱罗人曾一度把首都迁往孟加拉，想在北印度有所作为。

朱罗帝国有此野心，很大程度源自于它的宗教属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朱罗在 11 世纪上半叶的三次扩张，帮助其完成了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向“帝国”的升级。其征服主要包括：南下并吞斯里兰卡的僧伽罗国；东进击败马来群岛的三佛齐国；北上夺取帕拉王朝在孟加拉的出海口。这三个王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佛教王国，而朱罗则是印度教王国。因此这一地缘政治层面上的扩张，很大程度也代表着印度教的强势复兴，更让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第一次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印度教和全印度的保护者。

不过前面我们也说了，以朱罗帝国的地缘特点来说，想一统整个印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能够在这片大陆角逐统治权的，还是那些从西北方向渗透而来的外来民族。因此朱罗很快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这也导致突厥－伊斯兰民族入主印度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印度半岛的地缘政治局面大体还是呈现为“北拉南朱”的局面。包括德干高原西北部（西遮娄其王朝）的北部地区为拉杰普特诸国控制，南部则为朱罗统治。

与拉杰普特联盟最终成为抵抗突厥人入侵中坚力量不同的是，盛极而衰的朱罗王朝并没有机会与穆斯林政权交锋。12 世纪后期，朱罗帝国在南印度的统治开始动摇。帝国境内各板块开始涌现出新的王国，比如安得拉境内崛起的“卡卡提亚王朝”。这个王朝被泰卢固人认定为是：第一个真正由泰卢固人建立的王朝。也可以说，泰卢固民族如果想追溯自己的历史的话，会更原意以这个土著王朝为源头。至于泰米尔人，朱罗王朝无疑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朱罗人在南印度的宿敌——潘地亚人，本来也是这一荣誉的有力争夺者。同样在 12 世纪末复国成功的潘地亚，很快击败了衰弱中的朱罗人（公元 1215 年），并在半个多世纪后吞并朱罗。整个 13 世纪，潘地亚人都是泰米尔地区的强势统治者。不过它能做到的也仅仅是这一点了。

从战略上看，南印度再出现一个强大政权的最大障碍，是取代拉杰普特人成为北印度统治者的突厥／伊斯兰政权。几乎与潘地亚在泰米尔地区做大同时，古尔王朝及其继任者“德里苏丹国”，也基本完成了在北印度的整合工作（拉杰普特地区

除外）。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已经适应印度地缘环境的德里苏丹国进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不仅开启了对德干半岛的征服工作，更在西北方向击败了入侵旁遮普地区的蒙古察合台汗国。

从公元 1320 年起的 5 年间，德里苏丹国一共进行了 4 次南征行动，将控制线南端推进到了朱罗人所处的高韦里河谷。突厥人在德干半岛的征服路线，与当年的拉杰普特人“遮娄其王朝”类似。即先征服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所处的克里希纳河 - 戈达瓦里河上游，然后东进安得邦的泰卢固地区。最后向潘地亚人所控制的泰米尔地区扩张。在德里苏丹国的强大攻势下，南印度诸王国纷纷走向了覆灭的边缘。泰卢固人的卡卡提亚王朝，便是在这个时候被瓦解。称霸泰米尔地区（包括喀拉拉邦）的潘地亚人，也遭遇了重大失败。突厥人甚至一度攻入了潘地亚人的都城。

对于北方入侵者来说，征服并控制南印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现在的南印度人，俨然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为了印度教最后的守护者。为了完成对南印度的全面征服，德里的统治者甚至一度效仿遮娄其王朝，将都城迁到了克里希纳河上游：卡纳塔克邦中北部的德瓦吉里（公元 1327 年）。然而北方的一个变故，却彻底打乱了突厥人整合南印度的计划，使得这个即将诞生的帝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印度半岛的西北方向。

让德里苏丹国关注的这个方向是蒙古人的地盘。13 世纪的蒙古西征，使得印度之西出现了两个强大的蒙古汗国：伊儿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其中河中地区及阿富汗东部归属于察合台汗国；伊朗地区及大部分的阿富汗为伊儿汗国领地。蒙古人的这种分割，使得印度河平原南部的信德地区处于伊儿汗国势力范围；而对印度威胁最大的，开伯尔山口所在的贯通中亚 - 南亚的“突厥伊斯兰通道”，则处在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之下。

之前我们曾经分析过，蒙古人在中亚的征服工作（及后来的整合），客观上阻断了新突厥人 / 穆斯林势力再次进入南亚的通道，为德里苏丹国的突厥统治集团整合北印度赢得了时间。当然，这并不代表蒙古人在完成内部整合，并适应中亚的干热气候之后，就不会觊觎印度的富庶。刚才我们提到的 13、14 世纪相交之际，察合台汗国的几次连续入侵就是蒙古人做出的最大努力。那么，是不是蒙古人的再次入侵，打断了德里苏丹国对德干半岛的全面征服呢？答案却很让人出乎意料。因为打乱德里苏丹国南征计划的，并不是蒙古人的入侵，而是蒙古人的崩溃。

蒙古人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在 13 世纪上半叶开始走向了崩溃。与印度相接的两大汗国中，最先崩溃的是统治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大部分阿富汗地区的伊儿汗国。公元 1335 年，随着君主的离世，内部矛盾已无法调和的伊儿汗国，被分裂为了几部分；察合台汗国则在十几年后被分裂为了东西两部分，并旋即为帖木尔帝国“曹魏代汉”般的所取代（公元 1370 年）。一边是在中亚统治开始崩塌的蒙古汗国，一边是在印度正如日中天的突厥政权。这样的局面，很难不让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



动心，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来自于中亚 / 阿富汗地区。即使说没有接收蒙古帝国遗产的野心，最起码也希望能够拿下兴都库什山脉两侧，为自己脆弱的西北门户加上一道防火墙。

公元 1337 年德里苏丹国开始暂停在印度南部的整合工作，集结大军向动荡的阿富汗地区发起远征。不幸的是，这些在印度日久的突厥人不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还低估了他们那些突厥远亲接收蒙古人遗产的决心。远征阿富汗的德里苏丹国，不但没有能够从崩溃的伊尔汗国遗产中分一杯羹，反而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顺便八卦一下，如果当时有先知告诉德里的苏丹，在他出征的前一年，察合台汗国境内出生的一个婴儿（帖木儿）最后成为了伊尔、察合台两大蒙古汗国遗产的继承者，不知会不会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向。德里苏丹国这次大伤元气的远征，极大的改变了印度的政治走向。葡萄牙人登陆印度之时，所观察到的印度地缘政治版图，也正是在这次远征之后建立的。

## 第二节 印度在后德里苏丹国时代陷入分裂

德里苏丹国争夺蒙古帝国遗产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即将完成统一的印度再次分裂。那些受命于德里，管理德干地区和东印度沿海地区的，源出中亚 / 阿富汗地区的突厥裔、普什图裔地方长官，纷纷抓住机会摆脱德里的控制。这些独立出来的地方政权中，最主要的国家有两个：一是以孟加拉为中心的“孟加拉苏丹国”（公元 1338-1576）；二是德干高原北部的“巴赫曼尼苏丹国”（1347 ~ 1526）。这也再次证明了，决定地缘政治的根本性因素，并不在于种族、民族、宗教等人的属性，而在于“地理”。

德里苏丹国、孟加拉苏丹国、巴赫曼尼苏丹国，在恒河平原西部 / 旁遮普地区、恒河平原东部 / 孟加拉平原、德干高原北部形成的“品”字型三国格局，也是印度历史的常态。比如之前的拉杰普特时代，这三个板块对应的就是：瞿折罗 - 普腊蒂哈腊王朝、拉施特拉库塔王朝、帕拉王朝。对于不熟悉印度历史的人来说，记住这些陌生的王朝名肯定是十分痛苦的。不过这样做也没有必要，结合印度的地理结构，总结出印度的地缘政治规律才是重点。

把印度历史的常态总结为“三国演义”的前提，是南部达罗毗荼地区游离于印度地缘政治舞台中心之外。在北方穆斯林政权内部出现大分裂的同时，这个常态性自成一体板块，也抓住机会迎来了新一轮的地缘政治整合。相比德干半岛北部，无论是最早的印度雅利安人，后来的拉杰普特人，还是现在的穆斯林，都无法有效控制德干半岛南部地区。这也导致在这一地区争夺统治权的，还是达罗毗荼 - 印度教地方政权。

源出泰米尔、泰卢固地区政权，看起来都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并建立一

个统治南印度大部的新王国。不过这一次，神明眷顾的却是今天南印度四邦中的另一个成员：卡纳塔克邦。卡纳塔克邦的主体民族被称之为“卡纳达人”（坎纳拉人）。今天在南印度达罗毗荼各族中的人口约 3000 万，较泰米尔、泰卢固人要少（后两者在 5000 余万人）。这与卡纳塔克地区以高原为主的地形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泰卢固人的安得拉邦、泰米尔人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平原面积就要大得多了。

不过地缘政治博弈，从来不是说谁人口潜力更大，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南印度四邦（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安得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的地理特点为一高三低。一高指的是“卡纳塔邦”，这个邦所覆盖的实际是整个德干高原的最南部（可称之为卡纳塔克高原）。而其余三邦，则是围绕这部分高原，在西南、东、东南三个方向的低地区。注入安得拉邦、泰米尔纳德的几条主要河流：如东遮娄其王国所在的克里希纳河；达罗毗荼王国崛起的帕拉河；朱罗帝国的源头高韦里河，上游都是在卡纳塔克高原之上。

这一地理特点意味着，卡纳塔克高原很容易成为北方入侵者入侵南印度沿海平原的跳板。前面我们也解读过了，当年的遮娄其王朝，以及后来的德里苏丹国都遵循了这个南下路线。并且将控制南印度的政治中心，放在了卡纳塔克邦境内。当然，这些统治卡纳塔克地区的外来民族（包括之前的雅利安人），很难成为坎纳拉民族追溯的政治源头。真正在政治上能够成为坎纳达人源头的王朝，叫做“曷萨拉王朝”。

公元 10 末世纪，复国之后的西遮娄其（后遮娄其）王国，将它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德干高原西北部，即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孟买一带。高原西南部的卡纳达人则脱离异族统治，建立了“曷萨拉王朝”。在朱罗王朝崛起并强大之后，这个将注意力放在环孟加拉湾地区的海上帝国，实际也并没有控制曷萨拉王朝。朱罗王朝行将覆灭之时，曷萨拉王朝甚至曾经尝试出手帮助，以抑制潘地亚王国成为新的南印度霸主。只不过随着德里苏丹国的南征，诸达罗毗荼政权之间的内斗，意义已经不大了。

在德里苏丹国南征的时候，潘地亚人虽然看起来已经接收了朱罗帝国在南印度的势力范围，成为新的霸主，但内部结构远不能说得上稳定。相比之下，卡纳达人政治上的稳定性，无疑使之更具优势。最终德里苏丹国北撤之后，卡纳达人得以填补穆斯林在南印度留下的政治空间。不过后来压倒潘地亚等国，成为南印度霸主的却并非曷萨拉王国，而是源出这个王国的新王朝：维贾亚纳加尔王朝（又译：毗奢耶那伽罗王朝），一如孔雀王朝之于摩揭陀国一样。

新王朝的名称源自于它的都城“胜利城”（Vijayanagar）。今天它的名字叫“亨比”（Hampi），南距卡纳塔克邦首都班加罗尔约 350 公里。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则是在 17 世纪末才兴起的。顺便说下，当年成龙/金喜善主演的电影《神话》，曾经到过这座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古城取景。

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公元 1336-1565 年）不仅提升了卡纳塔克邦和卡纳达人（语）的地缘政治地位，也事实成为了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印度教大国。毗奢耶那伽罗王

朝与巴赫曼尼王国由此也在德干半岛形成了长期拉锯的局面。双方的政治分割线，大体稳定在西起果阿邦，东至孟加拉湾的克里希纳河一线。这其中巴赫曼尼苏丹国所控制的德干高原部分，包括有今天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 / 安得拉邦北部地区。为了与同样属性的德里苏丹国相区别，王国的建立者声称自己的祖先和权力来自于波斯王室（一位叫巴赫曼的波斯王），并且侧重于从波斯、阿拉伯地区引入人才。不过真正的统治阶层，还是那些源自中亚 / 阿富汗地区的突厥、普什图家族。

在地缘结构复杂的印度，很少有一个帝国或者王国，能够达到中央集权式的稳定。尤其分封各地的穆斯林地方长官，本质都是有强大部族背景的军事贵族。公元 15 世纪 -16 世纪初，巴赫曼尼苏丹国在经历一拨穷兵黩武式的扩张后。做大的军事贵族们谋求割据独立，并形成了五个新的苏丹国（比达尔、比贾布尔、艾哈迈德纳格尔、比拉尔、果尔贡德）。为了争夺巴赫曼尼苏丹国的遗产，五个身处“后巴赫曼尼时期”新苏丹国内部互有争斗。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无疑为南方的印度教政权扩张提供更大的纵横空间。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开始从军事和外交两方面着手，深入分裂的德干高原北部。

### 第三节 巴布尔入主印度建立莫卧尔王朝

正当四分五裂的南亚次大陆看似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地缘政治重组时，两股来自印度之外的新势力却开始从海陆两个方向迫近印度。在传统的西北方向，自称继承了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血统的“巴布尔”，在与由中亚草原而来的，源自金帐汗国的势力——乌兹别克人争夺河中失败后，开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了处在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与开伯尔山口之西的喀布尔（公元 1504 年），跟他的祖先一样站在了通过印度的大门口。

这个“突厥化蒙古人”，或者说试图继承蒙古帝国遗产的“突厥人”，此举的主要目的并不在印度，而是为了积蓄力量，从同样属性的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回更应由自己享有“法定继承权”的河中之地。但在接下来的反攻河中行动中，巴布尔很快再次败于乌兹别克人之手。后者对河中地区的主导权，则一直延续至今。当重回中亚的希望破灭后，巴布尔和他的支持者们终于现实的把目光投向了开伯尔山口的另一端，并很快在风雨飘摇的德里苏丹国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元 1524 年进军旁遮普，1526 年拿下德里，在印度北部正式建立“莫卧尔王朝”）。

16 世纪初的这场从中亚传导至印度的地缘政治连锁反应，并非第一次发生（甚至可以说是常态）。最著名的一次是 2000 多年前，居于河西走廊大月氏人被蒙古人击败后，迁入了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中亚草原；原居于此的白种游牧民族塞人，被迫南迁至河中地区。在大月氏人被匈奴人支持的乌孙人所逐，再次南下河中后，



塞人又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建国。

就从中亚方向入侵印度的势力来说，曾经出现过两次属性上的大变化。一次是自地缘公元 6 世纪，突厥帝国的势力扩张到河中之后，整个中亚开始突厥化。诸白种游牧民族（包括雅利安人、塞人等）后裔的生存空间，逐渐被挤压缩至了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一线。从语言角度划分，前者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后者则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第二次大变化就是阿拉伯帝国扩张在中亚所触发的伊斯兰化浪潮了。民族突厥化，宗教伊斯兰，加上人种上混血化（黄白），成为了中亚民族的三大显性标签。也直接导致入侵印度的西北通道，被打上了“突厥－伊斯兰通道”的标签。即使强大的蒙古人进入，也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趋势（最终被融合）。如果历史再沿着这个轨迹延续的话，莫卧尔王朝即使完成了印度的统一，也应该会在几个世纪后，被来自中亚的新突厥政权所征服。

然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改变世界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当巴布尔与乌兹别克人第一次争夺河中的控制权时，达·伽马的船队已经绕过了好望角，正向着印度发起最后的冲刺。葡萄牙人的到来，又将如何改变印度的命运呢？

## 第十八章 达·伽马航行至印度时面临的形势

### 第一节 达·伽马船队抵达印度马拉巴海岸

经过这段时间对印度地缘结构的解读，达·伽马和他的船队终于又可以向印度出发了。与印度当地政权达成贸易协议，是葡萄牙人此次远航，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海外探险行为的终极目标。由于寻找到了阿拉伯向导，达·伽马已经对当下印度的地缘政治格局有所了解。基于印度西海岸呈现出的伊斯兰教、印度教政权南北分治的局面，葡萄牙人此行似乎只要顺着季风抵达“维贾亚纳加尔王国”控制的马拉巴海岸，也就是今天的喀拉拉邦一带，就能够达成贸易协定。

公元1498年5月20日，从马林迪出发的达·伽马船队，在西南季风的帮助下，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将近2300海里的航程，抵达了马拉巴海岸最重要的贸易城邦——卡利卡特（今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在中国的记载中，卡利卡特还有一个知名度更高的标签：古里国（古里佛）。这个印度港口不仅是很多阿拉伯航海家抵达印度的首站，也是15世纪初郑和船队继续向非洲/阿拉伯海岸航行的起点。这位伟大的中国航海家，甚至在第七次航海之时病故于古里，结束了他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古代航海史。

郑和并不是第一个抵达古里的中国人。在他之前，生活在元朝时期的中国人汪大渊已经随船队完成了他的个人印度洋之旅（著有《岛夷志略》）。这位中国航海家的知名度远不如郑和大的原因，在于主导元朝海上贸易并打通航路的，是那些服务于蒙古人的色目商人。汪大渊作为随行人员的探索之旅，很难有地缘层面的意义。虽然郑和及明朝能够爆发如此强的远洋航海能力，无疑是建立元朝海上贸易兴旺的基础上。同时郑和的船队中也有许多穆斯林水手为之服务，但作为明朝政府的官方组织背景，决定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属于华夏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沿着郑和甚至汪大渊的航海之旅，解读从中国到非洲东海岸航线的地缘结构，应该更能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比如就有研究者认为，汪大渊曾经到过澳洲，发现澳洲的功劳应该记在中国人头上。然而问题在于，汪大渊即使到过澳洲，于后来的世界地缘格局也没有任何影响（更何况他只是随行人员）；郑和的突破虽然有意义，但于华夏文明来说只是一个意外。明朝的航海史，也在郑和身故之后宣告终结，甚至为了避免后人仿效（认为是劳民伤财，与国家无益），而销毁了航海资料。换句话说，并没有能够改变华夏文明的属性。相比之下，从欧洲那些开拓性航海家的探索之旅着手，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今天的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回到马拉巴海岸上来。马拉巴海岸是位于西高止山脉与印度洋之间，那条狭长沿海平原带的南段。这条为德干高原围边的山脉，在位于今印度果阿邦南部的中点

与印度洋的距离最近，天然将整条沿海平原分割成了镜像效果般的两部分。其中北段大部属于马哈拉斯特拉邦（南端为果阿邦）；南段则是我们所说的“马拉巴海岸”，今大部属喀拉拉邦（北部属卡纳塔克邦）。马拉巴海岸的主体民族，是泰米尔人的近亲“马拉巴人”（马拉雅拉姆语）。这一地区最早的政治代表，是与朱罗、潘地亚争夺古泰米尔地区霸权的“哲罗”国。

马拉巴人开始显现出独立的民族属性，是在公元9世纪中叶。一方面朱罗帝国开始崛起，并长期称霸南印度，打破了哲罗国旧有的统治结构；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穆斯林商人将贸易线覆盖至包括东非海岸在内的（建立了一系列斯瓦希里城邦）整个北印度洋。基于地理位置和结构的原因，背山面海的马拉巴海岸成为了穆斯林商人登陆印度的首选之地。这些穆斯林商人的到来，为马拉巴人和他们的语言注入了新的元素。背山靠海的狭长海岸，一般是很难产生一家独大的政权，而是容易形成一系列的贸易城邦。这些贸易城邦彼此之间的竞争以及开放性，更能够促进贸易的繁荣。就马拉巴海岸来说，卡利卡特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南部距其150公里处的“柯钦”。在明朝的记载中，在柯钦立国的城邦被译作“柯枝”。

哲罗国的统治解体之后，以古里国、柯枝国为代表的，以贸易立国的城邦开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并接受朱罗帝国的统治。海外贸易的日渐昌盛，也使得立足于马拉巴海岸的“国家”，不再纠结于参与南印度霸权的争夺。在维贾亚纳加尔王国称霸南印度后，这些城邦也转而臣属于这个新的印度教大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维贾亚纳加尔王国（毗奢耶那伽罗）在意识形态上跟北方的苏丹国们是死敌，但在具体的宗教政策上却十分的宽松。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这些外来宗教，以及佛教、耆那教等本土宗教，都能够有生存空间。事实上北方那些苏丹国一般也不会强迫治下之民改变信仰，这本质上与印度复杂的地缘结构有关，宽容的宗教政策有助于新统治秩序的快速建立。

对于以贸易立国的马拉巴海岸来说，宽容性显得更为明显也更重要。在整个阿拉伯海周边地区都为穆斯林所据的情况下，土地狭小的马拉巴海岸，在经济上比之南印度其它地区更依赖于与穆斯林商人的合作。好在对南印度产生地缘政治威胁的，是从北方而来的突厥人（包括部分普什图人），而海上贸易的对象则主要为阿拉伯人（包括部分波斯人）。因此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二者之间，最起码在政治上不是利益共同体。就像不能简单认为，同为天主教徒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利益一致一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又必须适应地缘环境。由此在马拉巴海岸也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古里、柯枝等城邦最上层及最底层的民众地缘属性为信仰印度教（也包括佛教等本土宗教）的达罗毗荼人；经济及政府机构的运作，却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掌控。这种妥协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饮食结构，无论是穆斯林所忌食的猪肉，还是印度教徒所尊奉的“神牛”，都不会出现在当地上层社



会的菜谱之中（羊就没那么幸运了）。

事实上，在朱罗帝国崩溃之前，穆斯林商人对整个北印度洋贸易并没有达到垄断的程度。最起码在南印度和孟加拉湾地区，同样以贸易立国的朱罗曾经做得风生水起。问题在于，伊斯兰教的建立，本来就带有很强烈的商业基因。贸易发展必定会引发金融方面的需求，金融信用体系的完善反过来又会促进贸易。无论是贸易还是金融，拥有一套彼此都认可的，甚至封闭的意识形态，将有助于降低信用成本。穆斯林的共同信仰，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比如温州）基于地域、宗族而形成的价值认知，都是他们成为全球化生意人的基础。

举例来说，中国东南沿海很多拥有共同地缘背景的商团内部，商人们之间大笔资金的拆借，往往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利息的计算、信用的背书，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一旦有人敢于失信，他所面临的就被整个商业体系所抛弃。伊斯兰教徒依靠的，则是能够全面指导生产生活的《古兰经》。比如说在穆斯林内部，彼此间的信贷关系受《古兰经》的约束是不能收取利息的，为此，金融投资会以参股、手续费等形式获取利润，由此而产生的金融机构被称之为“伊斯兰银行”。很显然，如果没有穆斯林的背景，是不可能融入这套金融体系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印度此时只是简单的两分法的话，那么马拉巴海岸的统治者应该会很欢迎有新势力加入，帮助他们打破穆斯林对海上贸易的垄断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印度西海岸的贸易权实际都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唯一能让葡萄牙人感到安慰的是，马拉巴海岸的政治属性不能算是穆斯林政权。那些受各阿拉伯商业集团影响的城邦，彼此间的竞争关系也很激烈。这一切，都为葡萄牙人达成贸易协定留下了斡旋空间。

不出意外的是，葡萄牙人与卡利卡特统治者的谈判工作，遭遇到了强大阻力。毕竟卡利卡特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增加或更换个贸易对象的问题，而是很可能需要改变自己的统治模式。左右卡利卡特政治的阿拉伯商业集团，并不认为葡萄牙人的到来会让他们受益。四个多月后，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达伽马，被迫带着他的船队返航。

## 第二节 达·伽马船队逆风返航时使用的风帆

为了维护自由港的声誉，马拉巴海岸的阿拉伯商业集团，并不会阻止葡萄牙人登陆后的贸易行为，也没有直接威胁这些异教徒的生命安全（就像在斯瓦希里城邦一样）。驱逐他的理由，看起来也是有法可依（包括认定达·伽马曾有海盗行为）。不过这个启航的日子，可是非常的不“吉”。要知道，8月底的时候正是北印度洋西南季风盛行的时候，再想横穿印度洋，难度可想而知。

葡萄牙人完全可以感觉得到，卡利卡特做出这一决定背后所隐藏的恶意。当然，

离开卡利卡特的葡萄牙人，也可以选择到柯钦、果阿等港口盘桓，以等待东北季风的到来。不过达·伽马被认定的“违法”行为，也会让其它港口接纳他的希望变得渺茫。更何况在卡利卡特换得大量香料、宝石等稀缺商品的葡萄牙人（同时外交上又显见不会有进展），也希望快点回国复命。逆季风而行虽然很难，但却并非完全不可行。略微关注过一些大航海时代历史（包括从影视剧中）的人都会发现，来自西洋的帆船与中国帆船在形制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区别在于“帆”。中国帆给人的感觉比较“硬”，颜色较深；西洋帆则色白、较软，能够被风吹鼓起来。纯粹从观感来看，后者看起来会比较酷一些。当然，是否先进、是否能适应更多的气候变化，肯定不是看外观，而是要看技术面的。

就帆的形制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横帆与纵帆。所谓横帆的特点，是在桅杆上下钉有横木，然后将帆上下两端固定在桅杆、横木（桁）及船体上。帆可以做成方形，也可以做成等腰梯形。其与纵帆最大的外观区别，在于对称性（想像一下风筝的样子）。受风面积大且受力均衡的横帆在顺风之时，效率很高。同时因为帆体稳定，还可通过增加桅杆的高度、横杆的层数（让一根桅杆能够从上到下固定四、五面帆），最大限度的挖掘桅杆的效用。另外，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可以通过调解帆的数量来适应不同的风力。要知道，风太大时，帆太多了反而会造成危险。

从技术的发展轨迹来看，横帆无疑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帆。从埃及到古希腊、罗马，再到维京海盗，所使用的帆船都属于横帆船。然而横帆船的劣势也同样突出，那就是只能在顺风时使用。虽然可以通过绳索拉动横杆，做小角度的调整（以适应侧顺风），但一旦遇到逆风就完全没法使用了。

在使用横帆的情况下，需要有桨手在无风或者逆风条件下将为船只提供动能。为此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古罗马战舰还是维京人的海盗船，竖起一、两面横帆的同时，两侧还如蜈蚣足般排列有船桨。这种桨、帆结合的形制被称之为“桨帆船”。地中海式桨帆船，被统称为“加莱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与地球其它地区相比，加莱船在“帆”的使用上，并没有特别之处，但在“桨”的使用上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其特殊的地缘环境有关。一方面地中海的气象相对规律，受西风 and 副热带高压影响。冬季盛行西风，夏季则基本无风浪，需要用桨来提供动力。另一方面，繁荣的贸易所引发的利益之争，也使得地中海战事频发。在海战当中，能够灵活调节方向和速度的桨，要比帆更实用。以舰首切断对方战舰的排桨，也是古典时期地中海海战的常见战术。16 世纪，当葡萄牙人试图打开大明帝国的贸易之门时，其舰队中所使用的灵活、快速的桨帆船，就让广东沿海地区的官民眼前一亮。吸收其排桨技术（配合中国帆）而造出船只，被称之为“蜈蚣船”、“快蟹船”。

然而依靠桨来提供动能的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大型的三排桨战舰，甚至要使用多达 300 名的桨手。既然桨船要耗费大量人力，横帆的使用又有诸多限制，那么有没有一种帆能够适应各种风向呢？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纵帆”。欧洲人最早接触并引入的纵帆，是阿拉伯人从印度洋带入的“三角帆”。整个帆的形式，就像是一面带旗杆的三角旗。如果说横帆都是对称的，那么纵帆的特点就是不对称了。帆体及支撑帆体的横杆可以围绕桅杆灵活调整角度，及至与船体呈一条直线（“纵帆”之名由此得来），以适应不同的风向。更为神奇的是，纵帆还可以顶风逆行。当然这个逆行并不是呈直线，而是走“之”字形曲折前进。至于原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伯努利原理”。如果你对技术原理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明白纵帆可以适应不同风向，横帆只能顺风航行就可以了。

最早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到三角帆技术的，是主导东地中海贸易的拜占庭帝国。最迟在公元9世纪，这一技术便已经在地中海取代横帆被普遍使用了。由于地中海贸易在三角帆普及的时代，被来自意大利的海上共和国所垄断，三角帆在欧洲因此被称之为“拉丁帆”。不过阿拉伯人也不用为“版权”被窃取而感到不平，因为他们同样也不一定是这项技术的最早发明者。早在公元初就已经顺着季风和洋流，完成了横渡印度洋航程的马来人，也有可能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顺便说下，中国帆本质上也是一种纵帆。区别在于中国帆是加了很多撑条的“硬帆”（又称“蓬帆”，外观类似于“罗马帘”）。纵帆的特质，使得中国帆也能够灵活调整方向，适应更多风向；但纵帆逆行的原理，更多要仰仗帆体受风后的变形。硬帆受风后变形较小，因此不能做到真正的顶风逆行。

尽管纵帆在灵活性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样也有着缺点。那就是在顺风状态下，效率没有横帆高，并且也不能多层叠加以增加受风的面积，从而导致船体不能建得更大。如果只是在地中海或者近海航行，纵帆的这一劣势并不明显。在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开始尝试外洋探险时，他们所使用的主要还是两桅和三桅纵帆船（被称之为“拉丁卡拉维尔帆船”）。

需要说明的是，有时航海家们在搞清风向规律后，为了更好的利用顺风，也会把纵帆换成横帆。比如哥伦布在利用西风和信风往返大西洋两端时，就对它船队中的卡拉维尔帆船做过这样的改造。问题在于，这样的转换本身并不方便，更难在航行过程中随机应变。随着航程的延伸，尤其当目标开始变成横穿大西洋或者绕过好望角时，伊比利亚双雄的航海家们，需要有能够兼具排水量和灵活性的新帆船，来帮助他们完成远洋抢险。在一艘航船上同时安装横帆和纵帆，并根据风向来调配使用，是不错的解决办法。这一需求所催生出来的新船型，便是葡萄牙人在15世纪中叶设计出的，著名的“卡拉克帆船”（西班牙人当然会很快复制这一技术了）。其特点是：在前桅和中桅装上多面横帆，以扩大船只的排水量；后桅则装上一具三角帆，增加灵活度。完成横穿大西洋壮举的哥伦布，其旗舰就是卡拉克帆船。

现在我们清楚了，被卡利卡特人驱逐出境的达·伽马船队，并非没有办法逆风横穿印度洋。然而纵然有“纵帆”的帮助，这一逆天而行的航行，也注定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3个多月前，从马林迪出发的葡萄牙人借助顺风穿越阿拉伯海到达卡



利卡特，仅仅花了 26 天时间，而这次原路返回，却足足花费了将近 5 倍的时间。一年之后，达·伽马的舰队回到了葡萄牙。葡萄牙通往新世界的窗口，也就此打开。

### 第三节 达·伽马船队因坏血病而减员

公元 1499 年 7-9 月，达·伽马的船队陆续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然而最终回到葡萄牙的船员，还不到出发时的一半。损失主要并不是武装冲突或者恶劣天气，而是由坏血病造成的。这个可怕的病症，能够导致水手牙龈及皮下渗血，最终痛苦而亡。今天我们知道，坏血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C 而造成的，只要能够补充新鲜蔬菜水果就能够避免。不过欧洲人在 18 世纪下半叶，才通过试验明白了这一点。

当然，没有弄清楚原因，并不代表每个出远洋的人都会得坏血病。在此之前，有一些特定群体因为独特的饮食习惯，而帮助他们避开了坏血病的威胁。比如食谱中拥有大量蔬菜的中国人，就不会为之所困。随船携带的泡菜、用雨水培植豆芽，以及饮茶的习惯，都可以帮助中国船员解决维生素 C 的补充问题。在完全没有蔬菜水果供给时，生食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肝脏，其实也是补充维生素 C 的有效方法。不过相信能够通过这种特殊嗜好，无意规避坏血病风险的船员并不会很多。

并非只有中国人通过传统饮食，歪打正着的避开了坏血病。腌渍蔬菜在很多不能四季供应蔬菜的地区，都很流行，比如中东欧地区。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拥有这一习俗的荷兰人，就凭借这一饮食习惯，而降低了坏血病产生的概率。另外，酿造类的果酒，如欧洲贵族们喜欢饮用的葡萄酒（没有蒸馏过的），也同样能够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C。而后来水手们喜欢饮用的，以甘蔗汁发酵蒸馏而来的朗姆酒，就没有这个效能了。

从维生素 C 含量及易储存程度来看，原产自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柑桔类水果，是最适宜加入水手食谱的新鲜食品。18 世纪末，英国海军也正是通过为每个水手每天供应一杯柠檬汁，而彻底摆脱了坏血病的威胁。然而在达·伽马远航印度之时，他和船员们对上述知识一无所知。在其顺风向印度航行的 20 多天时间里，维生素 C 补充的问题并不会凸显。而当需要花上数倍时间逆风穿越阿拉伯海时，情况有多么糟糕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达·伽马没有能够与印度方面达成贸易协议，并且损失了过半的船员，但经济上的获利却是十分的惊人（据称有 60 倍的利润）。这样的利润，足以让葡萄牙和整个欧洲疯狂，并且让所有的投资人愿意为他的下一次航程买单。当然，这次探险之旅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抛开暂时还无法解释的坏血病威胁不说，如何与阿拉伯人控制的印度贸易网合作，将成为葡萄牙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 第十九章 葡萄牙因贸易权与卡利卡特开战

### 第一节 葡萄牙再次组织船队前往印度

受利益的驱动，仅仅半年之后（公元 1500 年 3 月），一支由 13 艘船只及 1200 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被迅速组织起来再次远航印度。要知道，对于当时只有 150 万人口的葡萄牙来说，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之前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就是现在这支船队中的一名船长，而需要休整的达·伽马并没有再次远航。另一位葡萄牙贵族：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成为了船队的指挥官。

之所以把这位指挥官的全名列出来，是因为他所领导的这次航行，取得了一个意义不亚于打通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也就是在这次航行中发现巴西。鉴于巴西本身并不在前往印度的航线之上，这一发现无疑是非常的传奇。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达·伽马的引导之下，卡布拉尔的船队才误打误撞的发现了巴西。不过因为卡布拉尔此行的目标是印度，因此除了在登陆之处立下十字架以为所有权标志，并派出一艘船回国报喜之外，卡布拉尔的船队很快又回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之上。发现巴西的过程，以及巴西的地缘结构，也将在葡萄牙人稳定了印度的商业版图之后，再行解读。

巴西并不是这次远航中唯一的意外发现。后来在通过莫桑比克海峡时，葡萄牙人同样因为海风和洋流的作用，又“发现”了马达加斯加。然而作为船队中最传奇的人物，达·伽马却没有能够再为这次发现作出“贡献”。也许是宿命使然，当日迪亚士曾经在靠近非洲最南端时遭遇风暴，并将好望角命名为“风暴角”（后由葡萄牙国王改为好望角，希望有个好兆头）。这次当迪亚士和他的新伙伴们再次经过好望角时，又遇上了风暴，并损失了四艘船，而迪亚士本人也在风暴中不幸遇难。

风暴并没有动摇葡萄牙人继续向印度进发的决心。在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葡萄牙人并没有遇到麻烦，并且和达·伽马一样寻找到了阿拉伯向导。然而当他们抵达马拉巴海岸后，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葡萄牙人的巨大购买力，不仅抬高了香料等重要商品的收购价格，更让马拉巴海岸的阿拉伯贸易集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其中反应最大的就是卡利卡特。

作为马拉巴海岸的霸主，卡利卡特的印度人本身并非不想允许葡萄牙人在此贸易，毕竟每笔交易都会为自己带来税收。然而阿拉伯商人在卡利卡特的渗透太深了，他们深知，如果葡萄牙人成为了卡利卡特的新合作伙伴，自己将有可能被边缘化。为了阻止双方达成协议，卡利卡特的阿拉伯人甚至在达·伽马离开之后，就暗杀了其留在城内充当联络人的几名葡萄牙水手。并威胁以罢市的方式，阻止卡利卡特的统治者与葡萄牙人达成协议。

当葡萄牙人的船队再次来临，并准备在卡利卡特扫货时，阿拉伯人很快对这个竞争对手发动了袭击。不甘示弱的葡萄牙人也同样用武力做出了反应。这次短暂冲突对双方都造成了一定损失，并且让葡萄牙人暂时放弃了与卡利卡特贸易的想法。好在卡利卡特并不是马拉巴海岸唯一的贸易港口（虽然是最强的）。相比卡利卡特的敌对态度，以柯钦为代表的其它马拉巴城邦，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就要缓和得多了。毕竟葡萄牙人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新市场。因此，未能进入卡利卡特的葡萄牙船队，在柯钦等港口还是收购到了足够的货物，并于次年中回到葡萄牙。

## 第二节 葡萄牙第三次至印度时与古利卡特交战

尽管因为风暴和武装冲突损失了半数船只，葡萄牙人的这次航行依旧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只不过对于葡萄牙来说，卡布拉尔船队的这次印度之旅的意义，决不在于又一次证明了航路的可行以及印度的富庶，而在于让葡萄牙人意识到，他们虽然可以在阿拉伯诸商业集团内部寻找到贸易对象，但要想吃到最大的那块蛋糕，战争将是唯一的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印度寻找基地并驻扎一支常备海军（印度洋舰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鉴于印度距离葡萄牙本土是如此的遥远，并且对手并非弱小的土著部落。葡萄牙建立印度洋舰队的想法在当时不可谓不疯狂。不过东方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足以让葡萄牙上下去接受这个挑战。公元 1502 年 2 月，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达·伽马再次受命远洋印度。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达·伽马这次不再是以使者和商人的身份出访印度，而是带着“印度洋海军上将”的尊号，以及由 20 艘军舰（武装商船）组成的舰队前往印度。如果说前两次印度之旅，葡萄牙人的原则是尽量避免冲突，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达成贸易合作的话，那么这一次，他们则完全做好了“仗剑行商”的准备。

在东非斯瓦希里城邦，达·伽马代表葡萄牙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展示出了称霸印度洋的决心。迫于葡萄牙船队的压力，以及自己的体量（大型斯瓦希里城邦的常住居民不过万人），基尔瓦的穆斯林统治者表示愿意臣服于葡萄牙。对于东非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样做也有可能是一次机会。最起码从表面看起来，葡萄牙人能够帮助他们对接欧洲市场。而在此之前，输往地中海的海上商品只会经由波斯湾或者红海中转入欧洲。

事实上，葡萄牙人对东非的想法，远不止于将既有的斯瓦希里城邦纳入自己的贸易网那么简单。能否在印度洋获得成功，决定着葡萄牙能不能晋升为一个“帝国”。在印度洋，印度才是成败的关键。为此，在达·伽马第二次启航前往印度之后，葡萄牙人紧接着就派出了优秀的军官团前往印度，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以职业军人取代航海家成为船队乃至海外领地的主官，也成为了葡萄牙从商业扩张向武力扩



张的转折点。

然而在马拉巴海岸，已经跟印度土著政权形成共生关系的阿拉伯商业集团，尤其是霸主——卡利卡特，所能够调动的资源要远高于斯瓦希里城邦。当达·伽马以同样的态度要求卡利卡特的统治者顺从时，与印度统治者关系良好的阿拉伯商业集团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拥有强大武力的达·伽马，则开始打劫他们所遇到的阿拉伯商船，以期迫使阿拉伯人屈服。

在这个过程中，达·伽马舰队中的数艘军舰与卡利卡特海军（实际为阿拉伯武装商船），在卡利卡特附近的海域进行了两次海战。尽管卡利卡特的船只在数量上十倍于葡萄牙人，但与有备而来的葡萄牙军舰相比，战力明显不足，最终完败于葡萄牙人。这一结果，使得马拉巴海岸的印度城邦，尤其是卡利卡特最大的竞争对手——柯钦，纷纷开始与葡萄牙人合作。虽然在冲突失败之后，卡利卡特也表示愿意与葡萄牙人就贸易问题做进一步协商，但双方实际都不认为和平就此到来。尤其是葡萄牙人还要求卡利卡特驱逐所有的阿拉伯人时。相比之下，柯钦的态度就要“真诚”得多了。

### 第三节 葡萄牙在柯钦构筑城堡抵御卡利卡特

对于征服者来说，利用被征服地区的内部矛盾，能够让他们事半功倍的完成目标。比如在以后的美洲征服中，我们会常态性的看到，总会有某支土著部落愿意充当“带路党”，以借助白人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对手。柯钦对葡萄牙所拿出的最大诚意，就是在达·伽马的船队返航之后，允许其留驻印度的分舰队驻扎于自己的港口。葡萄牙随后向柯钦派驻军事人员，也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存在对柯钦提升在马拉巴海岸的竞争力，包括稳定内政都有诸多好处（显然，柯钦的阿拉伯人不会喜欢看到这种合作）。在葡萄牙人“帮助”镇压阿拉伯人所引发的叛乱之后，柯钦的统治者甚至同意葡萄牙人在自己的海岸线上构筑军事据点（公元15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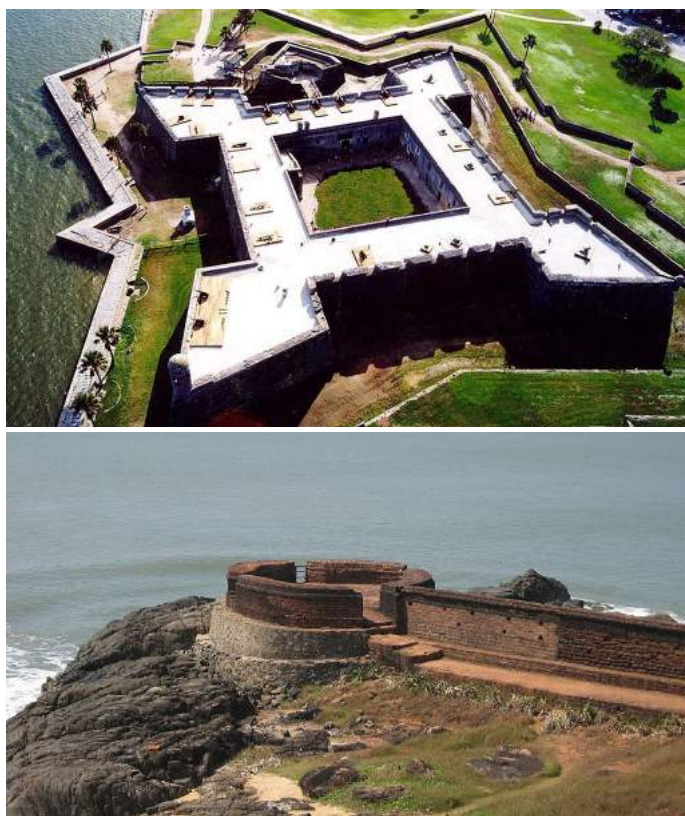
对于在印度洋拥有野心的葡萄牙来说，这点至关重要。要知道，一国的海洋影响力延伸，并不仅仅取决于海军的实力，以及海岸线的质量，更取决于你在全球各沿海板块，尤其是关键海峡/水道上是否拥有基地。今天我们谈论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时，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正是这点。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巅峰之作，美国不仅凭借美西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在西太平洋拥有属于自己的海外领地（关岛）。更可以凭借与西欧国家的地缘及同盟关系（尤其是英国），获取那些前殖民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遗产。典型案例，就是美国从英国手中租借“迪戈加西亚岛”，从而获取了在印度洋中心位置的支点。

相比之下，没有殖民和大航海时代积累的中国，在拓展蓝海影响力时，就掣肘多多了。先天不足但后天可补（填海造岛）的南海，是中国能够直接延伸海洋控制

力的最重要领域。南沙在中国海洋战略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关岛之于美国。至于印度洋，支点国家是否愿意合作，更多要看中国所能展示的贸易合作前景了。

柯钦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作，也正是看中了与之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尽管这种合作，尤其是允许对方在自己领土上的军事存在，难免会让人想起当年存在于中国的“租界”。对这一合作倍感威胁的，自然是一心希望驱逐葡萄牙人，并且不愿看到柯钦坐大的卡利卡特了。在控制卡利卡特宫廷的阿拉伯人看来，之前与葡萄牙人的几次冲突失败，更多原因在于自己准备不足。当葡萄牙人的堡垒开始兴建之时，卡利卡特的备战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运转了起来。

公元1504年，据守柯钦堡垒的葡萄牙人迎来了真正的挑战。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卡利卡特集结了它所有的力量（包括那些服从于卡利卡特的马拉巴海岸城邦）。这其中包含总数不少于6万由印度人组成的陆军；以及不少于150艘的船只，由阿拉伯人操控的海军。葡萄牙方面的军力，则包括总数不超过5艘的卡拉克、卡拉维尔两种型号的葡萄牙战舰；堡垒内的兵力也仅有150人左右。即使加上柯钦派来协助的数百印度军队。胜利的天平看起来也完全倒向卡利卡特一边。



棱堡与圆形堡垒

设计得凸凹有致。整个墙面上缀满凸出的塔楼式堡垒（棱堡），两个堡垒间的距离，则以远程交叉火力能够封死整个防御面为标准。实际上，类似的设计在中国古代也有。在很多古城墙上，大家会看到一些均匀分布的突出部——马面。这一设计所起

然而战争从来不是一个拼数量的游戏，尤其是处在技术革命时代，技术领先方往往能够凭借技术上的代差，以非常小的代价取得巨大的胜利。在陆地上，葡萄牙人构筑的坚固堡垒很大程度弥补了兵力的不足。封建贵族林立以及频繁的战乱，使得欧洲人在构筑城堡上颇有心得。十字军东征时期，是欧洲城堡技术的一个大发展期。正是依靠坚固的城堡，十字军骑士们才在穆斯林的包围当中拉锯了那么长时间。文艺复兴时期，科技水平的发展又进一步让欧洲的城堡在设计上日趋科学。由此，也在16世纪初催生出了世界军事建筑史上著名的“棱堡”。

所谓“棱堡”，简单点说就是把城堡原来平滑（平直）的轮廓，

的也是这个作用。只是相比之下，欧洲那些服务于贸易的军事堡垒，由于并不承担大规模的居民生存功能，在结构上能够做得更为复杂罢了。

火药武器的普及，是催生棱堡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16 世纪的欧洲战场上，黑火药武器开始成为战场的主宰。虽然因为移动不便的问题，火炮在野战战场上的表现，不如火绳枪这类的轻型黑火药武器，但在城墙和甲板上使用，却正好可以规避这个弱点。同时，火器的普及还迫使防御方不得将城堡建得更坚固。相比之下，还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印度人，能够倚仗的重型远程攻城武器就只有抛石机了。

葡萄牙人在大航海时代之初，在海外所构筑的城堡还算不上是标准的棱堡，但在结构及与火药武器的配合上，也已经非常成熟了。今天留存于世的最著名的葡萄牙殖民城堡，当属西非黄金海岸（加纳）的埃尔米纳奴隶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在葡萄牙人坚固的城堡，以及大量火枪、火炮的面前，卡利卡特的印度军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说仅仅是第一次进攻，进攻方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 1000 人。

当然，如果卡利卡特能够一直包围科钦的葡萄牙城堡，战略优势看起来还是在他们这边。毕竟葡萄牙人的武器再厉害，储备也有消耗完的一天。然而卡利卡特人却并没有办法真正包围葡萄牙人。基于地中海贸易和竞争的需要，欧洲人在沿海城堡的兴建上，一直很注意海、陆功能结合。三面环海的大陆岬角，是兴建贸易城堡的最佳选择。这将迫使拥有陆地资源优势的进攻者，不得不面对一个狭窄的进攻面，防御者则可将力量集中在一个防御面上。

事实上，君士坦丁堡的选址及兴建，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只不过规模超常）。公元 1453 年，为了攻破这座千年古城，奥斯曼军队所集结的陆军及战船，都超过了对手的十倍。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火炮优势，攻破君士坦丁堡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超级火炮帮助奥斯曼军队直接攻破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从战略角度来说，拜占庭的失败源自于它制海权的丧失。历史上，这座千年古城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在于其即使被对手进攻，也总能通过海路获得补给。

类似的情况，其实早在 2000 年前雅典、斯巴达争霸的伯罗奔尼战争中就曾经出现。雅典城在斯巴达人的重兵包围之下，始终不被攻破，就是源自于它能够从海外殖民地得到补给。只不过，雅典城本身并没有兼具港口功能。为了能够打通海上生命线，雅典人在海岸线与城市之间修筑了一条“甬道”，并以重兵护卫。

为了对接海上贸易通道而修筑的葡萄牙－柯钦城堡，并不会被陆军所围死。也就是说，卡利卡特如果想彻底困死葡萄牙人，就必须取得海战的胜利。问题在于，葡萄牙人在海上的优势更为明显。如果说葡萄牙人在陆地上的优势仅仅体现在防御上的话，那么船坚炮利的葡萄牙战舰，则不仅能够击沉对手的战船，更能够直接进攻对方的港口。

最终在几次海上对战失败之后，卡利卡特人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原因，在于卡利卡特人也无法承受围城战所带来的损失了。在将近半



年的围城战中，卡利卡特陆军穷尽了几乎所有的攻城方式。而在整个战役中，仅仅是直接死在战场上的印度人，就超过了5000人。更为要命的是，战场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马拉巴海岸湿热的气候，造成了卡利卡特军队中疫病横行。以至于因病死亡的人数，几乎相当于战死者的三倍。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也能看出，卡利卡特已经无力再战了。

柯钦之战的胜利，为葡萄牙的印度洋称霸及帝国事业正式拉开了序幕。只是印度人及马拉巴海岸，并非印度洋贸易的主导者。那些与卡利卡特利益相连的阿拉伯人，所能展现出的也远非伊斯兰世界在印度洋的全部实力。接下来，葡萄牙人将迎来真正的挑战。

## 第二十章 葡萄牙夺取印度洋贸易主导权

### 第一节 葡萄牙控制东非海岸和中东航线

柯钦之战的胜利，使得葡萄牙人的野心进一步膨涨。为了进一步控制印度洋贸易，葡萄牙海军接下来把目标瞄准了东非的阿拉伯人。尽管以基尔瓦为首的斯瓦希里城邦，已经表示愿意纳入葡萄牙的贸易网，但对付这些没有强大土著势力支持的贸易城邦，看起来要比在马拉巴海岸简单得多。直接控制东非海岸之后，使得葡萄牙人不仅能直接与津巴布韦高原盛产黄金的莫诺莫塔帕王国交易，更有机会向这些非洲土著传播天主教的教义（这可是教皇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基于斯瓦希里城邦的体量，葡萄牙人的征服几无悬念。其中斯瓦希里城邦中最强大的基尔瓦，以及最先反对与葡萄牙人接触的蒙巴萨，分别于公元 1505 年、1509 年沦陷。在一个个清除阿拉伯人原有的统治势力之后，葡萄牙人在当地逐步开始建立自己的统治（包括在初期扶植傀儡）。意识形态的传播（天主教），是葡萄牙人稳定统治的有利手段。然而仅仅依靠这一点是不够的，原始的血缘关系会比宗教纽带更为稳固。简单点说，葡萄牙人如果想在包括东非在内的海外殖民地延续统治的话，就必须要有数量一定的海外移民（最起码能够支撑政治、军事、经济的管理阶层）。

然而人口恰恰又是葡萄牙最大的短板。16 世纪初，葡萄牙的总人口不过 150 万左右。受限于地理条件，其本土人口数量很难有质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在海外殖民时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那就是鼓励进入殖民地的葡萄牙男性与当地女性通婚，并通过赋予这些混血后代以特权来强化葡萄牙的统治（比如澳门的“土生葡人”）。对种族融合的开放态度，与伊比利亚半岛纷杂的民族融合史不无关联。这种开放态度，导致身为葡萄牙最大前殖民地的巴西，在种族融合问题上素以开放而著称。相比之下，种族融合史比较单一的英国、荷兰、德国等国在海外殖民时，在这方面就要保守得多了。

在坐实了东非海岸之后，葡萄牙人开始尝试向内陆的津巴布韦高原进行政治、宗教渗透，甚至发动战争，以期直接控制这片黄金之地。不过在整个 16 世纪，这种渗透总的来说都不算成功。疫病、后勤，乃至阿拉伯商人的抵制，都是阻碍葡萄牙人向内陆扩张的障碍。一直到 17 世纪，葡萄牙人才算是控制了沿岸的低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莫桑比克。而葡萄牙人能够取得进展的重要支撑，就是在当地繁衍、壮大的葡萄牙人后裔。

相比于殖民商品输出地所遇到的人口困局，通过军事手段控制海上贸易线，反而要简单得多。一个配合火炮、舰队的坚固堡垒，在关键的水道所能起到的作用往

往是决定性的。纵观环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水道，红海与波斯湾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枢纽点。可以说，在葡萄牙开辟新航线之前，几乎所有从海路输入环地中海地区的东方商品，都是经由波斯湾及红海转运的。

尽管葡萄牙人的贸易是围绕着新航线进行的，但为了打击竞争对手（阿拉伯人），阿拉伯商船以及那些不处在新航线上的阿拉伯人据点，也会成为葡萄牙舰队的打击目标。为此，在加紧征服东非海岸的同时，葡萄牙人也开始对上述两条水道下手。从地理结构上看，分列于阿拉伯半岛两侧的波斯湾和红海，都属于深入陆地的内海。其中波斯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湾－印度洋相连；红海则通过曼德海峡与亚丁湾－印度洋相连。理论上位于水道一带的岛屿，以及海峡两侧的岬角，都可以成为控制水道的战略基地。葡萄牙人选中的是几个岛屿，包括：横亘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以及亚丁湾东端的索科特拉岛。



## 亚丁湾

200 艘的阿拉伯船队所围攻（公元 1507 年）。然而一如同样水准的阿拉伯船队在科钦海域的表现一样，葡萄牙人击沉了对手大部分船只，并随后在两个岛屿上兴建了堡垒。这两场战役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葡萄牙人竟然无一战死。

然而在这个时代，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已经势微，除了尚未开化的东非海岸以外，印度洋地区的阿拉伯商人及贸易城邦，大都需要在政治上依附于大陆政权。阿拉伯海上商业集团与这些大陆政权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共生的互补关系。一旦阿拉伯人的商业链断裂，利益受损的宗主们势必要为之出头。

以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来说，其天然属于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辐射范围。

以上述岛屿的重要位置来看，当然不可能为先前的贸易者所忽视了。在葡萄牙之前，阿拉伯商人已经在这些地点经营了几个世纪。其中包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城邦，甚至还曾经接待过郑和。有一种说法，“霍尔木兹”之名就是来自于一个被郑和记录为“忽里模子”的阿拉伯商业王国。

向霍尔木兹海峡扩张的葡萄牙人遇到了激烈的抵抗，6 艘卡拉克船所组成的舰队，被总数将近



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对葡萄牙人），此时这两个区域正进入了新一轮的整合期。由阿塞拜疆而兴的萨法维王朝，刚刚统一了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好消息则是，这个军事上由阿塞拜疆突厥人支撑的帝国，并没有海洋基因。在奥斯曼帝国的阻隔下，本身也难以从东西方贸易中获取额外的利益。因此在葡萄牙人显示了自己的海上实力后，新生的萨法维王朝并没有试图参与印度洋的竞争，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西线，以应对十分不愿看到伊朗统一的奥斯曼帝国。

## 第二节 威尼斯与穆斯林国家结成反葡联盟

事实上，真正因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而利益受损的，并不是环印度洋国家，而是从东西方贸易中直接获益的东地中海政权。葡萄牙人的到来，对正从小亚细亚向新月沃地扩张的奥斯曼帝国，以及控制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都造成了很大损失。有数据表明，在达·伽马远征印度后的几年当中，通过原有贸易通道输入地中海地区的香料等东方商品，就急剧缩水了70%。可以想见，要是让葡萄牙人继续做大，将对上述穆斯林帝国造成多大的损失。

有鉴于此，尽管这两个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也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还是决定联合起来，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进行一场决战。然而直接拥有印度洋出海口（红海）的马穆鲁克王朝，本身并没有多少海战经验。从表面看，这似乎与马穆鲁克的属性有关。众所周知，马穆鲁克王朝从军事到政治上，所倚重的都是以那些被称之为“马穆鲁克”的强悍奴隶骑兵集团。

不过马穆鲁克在海上的弱势，其实更多与埃及的地理环境有关。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尼罗河水，能够将下游地区滋养为沙漠绿洲，但却无力生成茂密的森林。营造船只的木材，需要从爱琴海－黑海地区进口。这一先天不足限制了埃及海洋实力的增长，以至于在整个地中海历史上，埃及都没有能够成为地中海海上霸权的争夺者。只不过，鉴于埃及控制了红海与地中海贸易的陆间转运通道，印度洋的那些阿拉伯商团、据点会愿意名义上接受马穆鲁克王朝的领导。固守于罗得岛的十字军遗存——医院骑士团，是马穆鲁克无法进口足够木材的直接原因。穆斯林王朝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线，一直都是这些强悍武装僧侣的主要袭扰目标。这种情况直到十几年后（公元1522年），奥斯曼帝国集结了20万军队以及400艘战舰攻入罗得岛，才宣告终结。

尽管如此，罗得岛的骑士们还是用自己的顽强赢得了荣誉投降的机会，被获准带着武器和财富离开了罗得岛（最终落脚马耳他岛）。不过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已经没办法从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中获益了，因为比之稍早（公元1517年），奥斯曼帝国已经横扫了叙利亚和埃及，成为了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统治者。换句话说，土耳其人在罗得岛的行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这次积极参与印度洋战事，说到底也是已经把包括埃及在

内的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视为了盘中之物了。长期与拜占庭帝国在爱琴海的博弈，是促使奥斯曼帝国由一个游牧政权，华丽转身为一个陆海兼备帝国的主要原因，尤其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吞并了拜占庭帝国。这使得与马穆鲁克结盟的土耳其人，能够从地中海调集大量地中海式浆帆船（希腊水手+土耳其佣兵）经由埃及送往红海。由于马穆鲁克政权本身缺乏海洋基因，因此曾经在古埃及时代就打通过的古苏伊士运河早已被废弃。土耳其人提供的这些战舰不得不在埃及靠岸后先行拆解，再经由陆路由驼队送往红海进行组装。

整个备战过程中最让人感到诧异的，并不是两个穆斯林帝国的结盟，而是威尼斯的加入。单纯从威尼斯的地缘属性，以及它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来说，威尼斯加入“反葡”联盟都会让人有节操掉落一地的感觉。然而对于唯利是图，从来不认为上帝比金钱更重要的威尼斯人来说，做出这一选择却是很自然的事。

事实上，尽管在奥斯曼帝国做大，甚至吞并拜占庭帝国后，威尼斯人的利益的确受到了很大冲击，毕竟威尼斯曾经长期控制拜占庭的贸易。但总的来说，威尼斯还是东地中海贸易中重要的一环。输往欧洲的香料等商品，很多还是要从威尼斯人那里转手，尤其他们还可以从马穆鲁克那里获得货源（虽然要付出高额的关税）。当然，奥斯曼帝国的做大，以及对商路的战略封锁，是推高了香料等东方商品的价格的主要原因，但这其中大部分的成本，还是由最终的买家来承担。只不过，价格的推高会导致需求量的缩减，对于威尼斯这类中间商来说利益还是会蒙受很大损失罢了。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只是让威尼斯商人们元气大伤的话，那么直接从印度进行收购，能够以低价供应欧洲市场的葡萄牙人，对于威尼斯来说就是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了。这个强势竞争者的加入，不仅逼迫威尼斯以断绝外交关系来表示对葡萄牙的抗议，更直接加入了两大穆斯林帝国主导的“反葡联盟”。当然，威尼斯毕竟还是属于基督教阵营，明目张胆的派出海军参战还是有所顾忌的。它所提供的支持，主要是派遣技工帮助拆装奥斯曼帝国的浆帆船。

现在，东地中海势力最为强大的三股力量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前往印度去挑战葡萄牙人了，那么还有没有其它力量加入这个因利结合的“反葡联盟”呢？除了来自东地中海的奥斯曼、马穆鲁克、威尼斯三国以外，反葡联盟中还有两位来自印度西海岸的成员。一个是代表南印度反葡势力的“卡利卡特”；另一个则是北印度西海岸贸易的主导者——古吉拉特。古吉拉特对于今天的印度来说，是一个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时珠三角地位的板块。如果说喇叭形的珠江口为珠三角扩张了海岸线，那么古吉拉特的海岸优势，则是靠半岛状地形——卡提阿瓦半岛来扩张的了。当然，这两个板块的优势更多还在于其地缘位置。前者是通往北印度的门户，后者则是西方登陆中国的第一站。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拉贾斯坦邦与古吉拉特邦，合称为“拉杰普特板块”。

不过这两个邦的地缘特点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意思即为“拉杰普特人之地”的拉贾斯坦邦属于拉杰普特人的核心之地。相比古吉拉特的海洋优势，拉贾斯坦邦的地势要更为高些，横亘境内的阿拉瓦利岭及其东南侧的马尔瓦高原，为拉杰普特人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撑。

为拉杰普特人的军事能力加码的另一个地理因素，是这些高地上所覆盖的热带草原类型植被。作为一个战士阶层，拉杰普特战士最得力的助手，是由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个热血马种：阿拉伯马、阿哈尔捷金马（汗血马）相交培育出来的“马瓦里马”。从血统的来源也可以看出，这是穆斯林入侵所带来的副产品。不过印度各司其职的种姓制度，以及拉杰普特人军事阶层的定位，才是他们能够在包括马种选育在内的军事技能上，超出其他印度土著的原因。

基于古吉拉特邦尤其是卡提阿瓦半岛的海洋属性，以及穆斯林在海洋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古吉拉特邦的地缘结构要比拉贾斯坦邦更为复杂，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更大。15 世纪初，穆斯林控制了古吉拉特并建立政权。不过被压缩在拉贾斯坦邦的印度教保卫者们，却还是一直没有为德里所征服。直到后来的莫卧儿王朝表示尊重拉杰普特王公们的统治权（及宗教信仰）后，北印度才算真正为穆斯林政权所覆盖。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身为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的马umbai，当时也为古吉拉特所有。

身为印度西海岸的两大海上门户，古吉拉特、卡利卡特是阿拉伯人印度洋贸易网的重要成员，与控制印度洋－地中海贸易入口的埃及之间，有着很多共同利益。葡萄牙人对阿拉伯商船的劫掠行为以及新航路的开拓，对上述政治体的利益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二者的加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印度洋虽然广阔，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在大洋腹地寻找对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岸线和港口一带，才是海上利益争夺的主战场。为了从源头切断葡萄牙人的贸易线，古吉拉特和卡利卡特分别一南一北，成为了奥斯曼－马穆鲁克海上联合舰队在印度所选定的两大基地。

### 第三节 葡萄牙在第乌海战击败穆斯林舰队

公元 1508 年 3 月，印度洋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穆斯林舰队抵达了古吉拉特，并在孟买南部的焦尔港海域与几艘葡萄牙船只展开了第一场海战（穆斯林舰队方面的船只总数超过 200）。在围攻了三天之后，这场遭遇战最终以葡萄牙人突破包围圈而告终，葡萄牙方面的损失则是一艘船只及 9 名船员被俘（不幸的是，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之子死于此战）。这场小规模海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穆斯林海上联军的实力更为强大，反而恰恰证明了葡萄牙舰船的优势所在。葡萄牙人之所以未能在这场遭遇战中全身而退，是因为已经在印度海岸占得优势的葡萄牙舰队，正分散在各个港口附近保护葡萄牙商船，以及截杀阿拉伯商船。双方需要一场真正的决战来证明谁才是印度洋的主导者。



公元 1509 年 2 月，在经历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海上交锋之后，双方都期待的海上大决战，终于在卡提阿半岛最南端的“第乌”港海域拉开了序幕。葡萄牙舰队的数量为 18 艘，其中半数为卡拉克帆船（5 大 4 小）。有记录表明，葡萄牙人制造的卡拉克帆船，曾经达到过 2000 吨之巨。尽管不确定第乌海战中葡萄牙船只的吨位，但与阿拉伯人通常使用的单桅帆船相比，桅杆数在 3-4 根的卡拉克帆船，体量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穆斯林舰队的数量远超对手，但占据舰队多数的那些阿拉伯独帆船，早已在这几年间证明了自己完全不是葡萄牙舰队的对手。奥斯曼帝国提供的 12 艘大型多桅桨帆船，是穆斯林联军希望所在。这些依靠三角帆及大量桨手提供动力的地中海战舰，巅峰期的最大吨位也能够做到 2000 吨。问题是上从战术和武器装备角度看，情况并不容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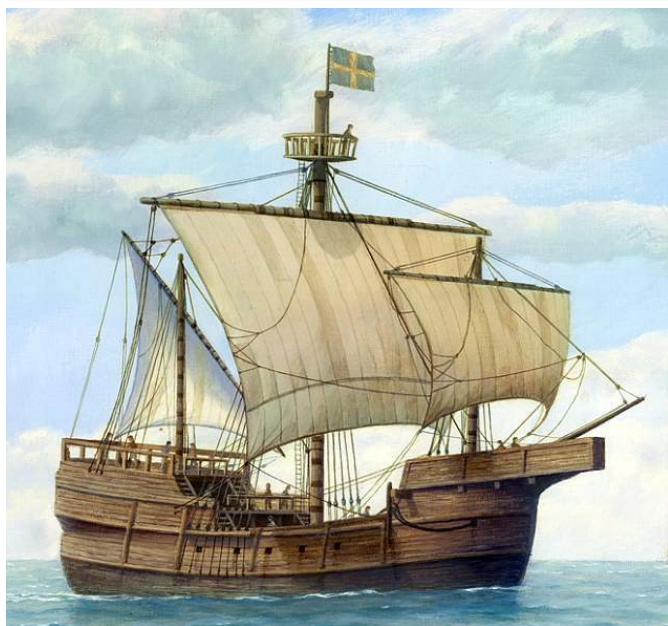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地中海当下的海战形式与古典时期并没有太大区别。以舰首特设的“撞角”高速撞击对方的船体及排桨，再用跳帮的方式在对手甲板上肉搏，仍然是最为常见的战法。至于远程武器方面，在传统的弓弩、弩炮以及希腊火之外，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土耳其人也在甲板上配备了些小型火炮。问题是排桨船追求机动性的特点，使得火炮的植入受到了很大限制。可以说，被穆斯林寄予厚望的奥斯曼战舰，无论在远程武器的射程还是威力上，都落后葡萄牙人。

15-16 世纪是欧洲在火器技术上开始领先的时代。落后者不仅包括穆斯林，也包括一直以火药发明者，及最早火器使用者自居的中央之国。有很多人会以明清交接之际时明军所使用的大量火炮，来佐证中国曾经在当时拥有领先世界的火炮技术。然而令人泄气的是，这些被称之为“红夷大炮”的火器，正是由葡萄牙人传入的。同时期的日本也是火器的受益者，只不过资源较少、战争规模更小的日本，仿制成功的是火枪罢了（鸟枪）。至于是怎么传入的，后面我们会解读到。

欧洲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以及因此而频发的战事，是促进火器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其它地区也是战事不停）。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欧洲文明中所蕴含的商业基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创新力。以欧洲地缘政治缩影的意大利来说，既有源自法兰克军事采邑制的“封建国家”，也有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共和国。在封建领主们为了维持自身优势，而限制一些武器的发展时（比如十字弓）。商业共和国却可以更纯粹的为了利益，鼓励技术进步。

事实上，这一多样性的地缘政治结构，也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得以兴起（包括出现在意大利）的基础。所谓文艺复兴，不仅是哲学、艺术领域的“复兴”，也是一场科学革命。在过往的战争史中，军事技术的进步更多是一种缓慢的经验累积。而现在以文艺复兴为契机，欧洲人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式（如几何学）来改进火炮、城堡乃至战术的设计。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航海时代初期，我们在鸦片战争中看到的那种多层甲板布设火炮的方式还未出现（这是 17 世纪初由英国人率先使用的）。

不过，仅仅是在顶层甲板周边布设一圈火炮，已经足以让葡萄牙人占据绝对优势了。在包括第乌海战在内的海战当中，大部分穆斯林船只在进入葡萄牙火炮射程之后，即被击伤或击沉。虽然基于数量和灵活度的优势，总还是会有部分船只有机会靠帮葡萄牙船，但接下来的景象却更让人绝望。



卡拉克帆船

与土耳其人的地中海式桨帆船相比，葡萄牙人的卡拉克帆船要显得更为高大，尤其是舰首和船尾。这使得整艘船的船体，看起来有些像中国古代所使用的“元宝”。如此的设计不仅是能存储更多的货物及弹药，也能够近战中增加自己的防御力。当然，这样的元宝式设计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在风暴之中容易失去重心而颠覆，葡萄牙人经常在好望角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说与此有关。

然而在海战当中，葡萄牙人高大的船体却成为了穆斯林舰队的恶梦。无论是体型较小的阿拉伯独桅船，还是体型较大的地中海桨桅帆船，都无法与之比肩。这也使得冲破葡萄牙炮火的土耳其及阿拉伯船只，在靠帮之后无法迅速跳到对方甲板上，以展开他们擅长的肉搏战。地中海战舰那善于切削对手排桨的舰首，同样很难对葡萄牙人坚固的船只体造成伤害。想象一下，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穆斯林联合舰队，在承受巨大损失后艰难靠近葡萄牙战舰，却又必须冒着火枪喷射的风险攀爬船体时，结果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即使海战真的进入到了甲板肉搏的阶段，土耳其雇佣兵以及在马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马穆鲁克们，其实也占不到丝毫便宜。用盔甲、火绳枪（乃至原始手榴弹）武装起来的葡萄牙士兵，不仅在轻武器上占优，而且更熟悉海战的特性。

最终这场决战以葡萄牙人的完胜而告终。至于双方的战损比，相信大家都能想象得出来。经由此役之后，葡萄牙人算是彻底取得了印度洋的霸权。尽管后来数十年间，不甘于被柯钦压制的卡利卡特、征服埃及并成为红海之主的奥斯曼帝国，还

数次尝试过与葡萄牙人争夺印度的贸易主导权，但也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葡萄牙人在接下来的称霸过程中，同样未能做到完全垄断印度洋贸易。在第乌海战之后，葡萄牙人很快就放弃了在索科特拉岛的经营（公元 1511 年）。这种放弃，很大程度是因为索科特拉岛的位置还不够好。从位置上来看，葡萄牙人更青睐扼守红海－亚丁湾通道的曼德海峡。在这条最窄处仅 26 千米的海峡中充当关键先生的，是一个叫作“丕林岛”的小岛（今属也门）。

在放弃索科特拉岛之后，葡萄牙人曾经试图进驻丕林岛（公元 1513），但很快也放弃了。这种放弃很大程度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如果葡萄牙人一定要卡住这条咽喉要道的话，就必须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后果。要知道丕林岛的位置不仅处在阿拉伯人本部的包围之中，也正处在通往麦加的海上朝圣之路上。一定要在这里控制商道的话，将很可能引发一场不计损失的圣战。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追逐商业利益才是他们真正的使命。顺便向那些尚处在原始宗教状态的土著们传播天主教教义，也是一件于神于己都有利的事。至于让自己处在圣战的旋涡之中，就大可不必了。只要能够经营好印度西海岸－东非海岸的据点，并通过这条新航线将东方商品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那么失去了欧洲这个大市场的穆斯林们（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实力自然会被削弱。当然，这一崇高的目标说穿了只是葡萄牙获取巨大商业利益的副产品罢了。基于这个现实的目标，葡萄牙人并没有在阿拉伯半岛沿岸与穆斯林死磕，而是进一步将他们的东方贸易向更为遥远的东方延伸。接下来，身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分割线上的马六甲，将成为葡萄牙人的下一个目标。

#### 第四节 葡萄牙在印度建立殖民据点

在葡萄牙战舰驶向马六甲之前，我们还要交待下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地缘政治布局，以及除了控制航线以外，那片马来人之地还有什么吸引着葡萄牙人的到来。首先第乌海战的失败，使得第乌的统治者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为了避免被葡萄牙人报复，古吉拉特方面不仅交出了巨额战争赔偿，甚至还表示愿意走柯钦模式，即通过允许葡萄牙人在第乌建立军事据点，进行深度合作。然而在苏丹们的势力已经覆盖至德干高原北部的背景下，葡萄牙人认为现在驻军第乌城的风险太高。能够帮助延伸东方航线及获取香料的南印度港口，则更具优先级。

当然这并不代表葡萄牙人对第乌港就没有想法了。毕竟这个位于卡提阿瓦半岛最南端的港口，可以将葡萄牙人的贸易线间接延伸至恒河平原。因此在葡萄牙人完成将贸易延伸至太平洋的大目标后，回过头来还是拿下了第乌（公元 1535 年）。为了阻止葡萄牙人这样做，已经控制了埃及和红海的奥斯曼海军曾经发动了第二次第乌海战（更准确说是一场围城战）。只是面对葡萄牙人坚固的城堡及火炮，土耳



其人的这次努力依旧以惨败而告终。公元 1780 年，葡萄牙人在第乌港东南方向又拿下了另一个港口——达曼港。作为一个半岛，卡提阿瓦半岛在南北两侧天然与大陆地区形成了两个夹角，包括北部的卡奇湾与南部的坎贝湾，后者相当于北印度与南印度的分割线，地缘位置更为重要。第乌港与达曼港，则分处坎贝湾口两端。

如果说第乌港可以作为通往恒河流域的入口的话，那么达曼港则能成为进入德干半岛北部的门户了。历史上这两个港口与印度海洋线上的其它葡萄牙殖民地一起，被称之为“葡属印度”。基于这一历史渊源，达曼、第乌所组成的“达曼－第乌中央直辖区”虽然面积狭小，在印度却也是与邦平级的一级行政区。类似达曼－第乌这种因殖民时代地缘政治遗产成为印度中央直辖区（又称联邦属地）的，还有原为法国殖民地的“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比起由两部分组成的达曼－第乌来说，“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的结构更为复杂，包括有在印度东海岸线性排列的：本地治里、卡来卡、雅南四地，以及西海岸柯钦之南的马埃（本地治里为首府）。参考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国的存在，印度行政区划中这一奇特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在葡属印度当中，最为著名的并不是达曼、第乌，也不是最先“投入”葡萄牙怀抱的柯钦，而是位于马拉巴海岸北部的果阿。基于位置原因，果阿长久以来一直是南德干地区印度教王朝“毗奢耶那伽罗”与北德干穆斯林政权“巴赫曼尼”争夺的焦点。这使得果阿的控制权经常在二者之间转换。公元 1469 年，果阿的控制权再次转向了穆斯林一方。不过葡萄牙人登陆印度之时，情况开始对穆斯林方面不利。盛极而衰的巴赫曼尼苏丹国开始分裂为 5 个独立邦国。这不仅对南方的印度教政权来说是个向北延伸控制力的好机会，更让葡萄牙人看到了控制果阿的机会。

在取得了第乌海战的胜利后，葡萄牙人旋即将兵锋指向了这个印度西海岸的枢纽点（公元 1510 年）。在经历过两次围攻战后，葡萄牙人终于得到了果阿旧城，并将之打造成为葡属印度的首都。顺便说下，作为全球殖民时代的先驱，葡萄牙人在放弃海外殖民地方面却也是最为顽固的（澳门是其最后一个放弃的殖民地）。与印度独立之时，法国便向印度方面移交了殖民地不同的是，印度方面直到 1961 年底才不得不通过战争（果阿战争）的方式，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复果阿、达曼、第乌三地。初时三块原葡萄牙殖民地一如“本地治里”一样，合成了一个中央直辖区，以至于葡属印度之名有时也直接指向果阿。不过在 1987 年，果阿被剥离出来成为印度第 25 个邦（也是面积最小的一个）。

葡萄牙在海外殖民地的顽固，部分底气在于它的本土化策略。前面曾经解读过，为了弥补人口不足，葡萄牙鼓励出海的男性与当地妇女通婚，并由此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混血葡人阶层。天主教的传播，是葡萄牙人渗透当地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这一点在果阿显得尤为明显。果阿的统治稳定后，葡萄牙人开始在果阿成立宗教裁判所（公元 1560 年），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异端”宗教都被明令禁止。

及至 19 世纪初宗教裁判所取消之时，天主教已经在果阿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随着宗教禁令的取消以及印度的“光复”，很多原本基于利益皈依天主教的印度人，又恢复了印度教信仰。今天果阿的印度教徒比例已经占据了 2/3，但 30% 的天主教徒比例，仍然使之成为印度重要的天主教中心。

尽管葡萄牙人在殖民地的统治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也有了像果阿这样的稳固基地，但在印度这样本地人口占据绝对优势，并且有自己成熟文明体系的区域，能够做到这点的毕竟只有少数几个点，其军力也不可能做到控制所有沿海港口。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手中这些据点的作用，葡萄牙在科钦之战获胜之后，就确立了它在印度洋的经营战略。这一战略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由葡萄牙王室垄断印度洋的贸易权。任何想在印度洋进行贸易的商船和商人，都必须向葡萄牙购买贸易执照并纳税，并同时选择在葡萄牙控制下的港口进行贸易；二是任何没有从葡萄牙获得贸易授权的商船，都将成为葡萄牙军舰的攻击目标。

如果葡萄牙人的计划能够成功，即使那些从印度输往（或中转）红海、波斯湾地区的货物，也必须被葡萄牙人雁过拔毛。只是葡萄牙人想做到完全垄断的话，就需要控制印度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每一个港口，而做到这点将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将目光投向了印度洋东侧的马六甲。

## 第五节 香料的主要种类和分布区域

在整个东西方贸易线中，印度（尤其是南印度）那些港口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中重要的出口地，也是东亚、东南亚商品进入印度洋以西市场的转口地。控制马六甲将有助于增加葡萄牙在全印度的影响力，这与当年朱罗帝国远征三佛齐的原因相一致。另一个让葡萄牙人急不可耐前往马六甲的原因，在于“香料”。

在所有让人着迷的东方商品中，香料是非常重要的种类。除少部分动物分泌物以外（如龙涎香、麝香），被统称为“香料”的商品，大多为用原产自亚洲热带地区的富含香气植物的皮、脂、根、叶、花果等部位制成。与奢侈品定位的丝绸和瓷器相比，香料的使用范围要更为广泛。有些香料被用来为食品增加风味，有些则被用来清新空气、助眠，甚至增加宗教的神秘感。这其中，充当调味料的品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印度是重要的香料出产地，印度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香料。以印度味道中占据基础地位的“咖喱”来说，其本质就是把各种香料磨成粉混合，用来加工食物（泰米尔语原意为“多种香料放在一起煮”）。然而印度人所使用的香料却并非全部产自印度，其中有几种重要的香料来自于马六甲海峡之东的马来群岛（东印度群岛），更准确的说，是来自马来群岛中的：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

马鲁古群岛旧称“摩鹿加群岛”，是位于大巽他群岛与新几内亚岛之间的一组

岛屿。体量要小得多的班达群岛则位于马鲁古群岛南面。从地理位置上看，前者其实是后者的附属群岛，因此我们可以将之合称这马鲁古－班达群岛。在大航海时代，这组今由印度尼西亚领有的岛屿，因盛产香料而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

除了马鲁古、班达群岛以外，世界范围内还有两个岛屿以盛产香料而著称，包括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以及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岛。其中桑给巴尔岛以出产丁香而闻名于世（占全球产量的 80%），格林纳达产出的则主要是肉豆蔻（占全球产量的 1/3）。上述岛屿被合称为“四大香料岛”。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上述岛屿才生产香料（只是比较出名），随着大航海事业的延伸，低纬度地区很多丰富的物种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食谱。除了玉米、土豆这些原产自美洲的粮食作物在全球扩散种植以外，香料也是如此。全球很多地方比如中国南方的亚热带、热带地区都有引种。

事实上四大香料岛中的桑给巴尔岛、格林纳达岛也并非香料的原产地。比如格林纳达的肉蔻，是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引种的；桑给巴尔的丁香，则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由重新进入斯瓦希里海岸的阿拉伯人（阿曼赛义德王朝）开始大规模种植的。当时在驱逐桑给巴尔岛上的葡萄牙人并建立苏丹国后，阿拉伯人开始在岛上大量砍伐原始森林，以种植丁香树、椰子树（可生产椰子油）等经济作物。

阿曼人之所以在桑给巴尔大量种植丁香树，是因为在阿拉伯人的食谱中，丁香是烹调羊肉时必不可少的香料；至于在喜食牛肉的欧洲人那里，牛肉最好的搭配则是黑胡椒。其最贵的时候，甚至比同重量的黄金价格还要高。回顾一下最早凭借味道成为人类生活必须品的“盐”曾经对人类的政治、经济造成过多大的影响，就能够明白这些让人类产生依赖感的调味料，为什么会成为众方关注的焦点了。

前面所列举的丁香、豆蔻、胡椒三种重要香料的原产地，正是马鲁古－班达群岛。也就是说，这些马来人控制下的岛屿才是最初的“香料岛”。在葡萄牙人抵达印度洋之前，欧洲人已经从穆斯林商人口中，隐约知道在东方靠近印度的海域有一处盛产香料的岛屿。而当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并取得霸权之后，香料岛的位置也就不再成为秘密了。控制航道与香料主产地的双重诱惑，使得葡萄牙人在控制果阿之后，旋即将兵锋指向了马六甲海峡。在这个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枢纽点上，一个东南亚土产的穆斯林政权——马六甲苏丹国，正等待着葡萄牙人前去征服。



## 第二十一章 元朝海军跨海远征占城和爪哇

### 第一节 爪哇岛崛起新政权挑战三佛齐

在葡萄牙人出征之前，先来看看马来群岛地区的政治结构。今天隶属这一地区的国家包括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以及2002年脱离印尼独立的东帝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包括有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三国。殖民时代的分割，是这一行政格局形成的直接原因。其中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为前英国殖民地；印尼为前荷兰殖民地；菲律宾为前美国 / 西班牙殖民地；东帝汶则为前葡萄牙殖民地。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满意殖民者的分割。即使出于民族自尊心的需要，上述东南亚国家也不大愿意将西方殖民时代作为自己的国家起点。只不过历史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选取哪一段历史继承，就要看各个国家当下的地缘政治需要了。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是“南越国”在越南历史中的地位。当越南还身处中华文明圈，并以此为优势在中南半岛扩张时，越南人更愿意将“南越国”作为他们的国家源头，以及文明的开端；而当越南人认定这一源头将对自己的独立性造成威胁时（同时中华文明又暂时落后于西方文明），这段历史的存在又不得不被定性为被殖民的“北属时期”。

以马来——伊斯兰文化为基础谈南洋地缘政治格局的话，潜在的矛盾其实就是印尼与马来西亚之争了。一般来说，地缘潜力明显占优的一方会更希望大家走到一起，反之一方则更愿意享受独立状态所带来的红利。一如今天在两岸关系中，大陆一方无论从政府还是民众层面，都视统一为当然之事；而害怕被统一后利益受损的台湾方面，无论蓝绿都希望在客观上维持高度的独立性（差别只在于要不要政治上的名义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超过2.5亿的印度尼西亚，显然比人口仅3200万的马来西亚更有建立统一国家的意愿。

在“民族自决”政治观占优的今天，印尼、马来西亚走到一起的机率非常低，甚至很难成为一个可以公开政治讨论的话题。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大历史的维度，来探究这背后的地缘政治渊源。由此而引出来的问题便是，如果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选择的话，他们会更愿意以历史上哪个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源头呢？

葡萄牙人即将出征的马六甲苏丹国，算是马来地区的第一个穆斯林政权，并对整个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传播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从这点来说，它是整个马来地区伊斯兰化的原点。然而对于有雄心壮志的印尼来说，如果需要选择的话，会更愿意以一个印度教王国——满者伯夷，作为其地缘政治诉求的依据。接下来，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马来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

整个马来地区最先迎来文明曙光的是马来半岛北部。印度人最早在这一地区建立贸易据点，以“海－陆－海”的方式打通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的贸易通道。最早兴盛的土著政权，则是公元7世纪兴起于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一带的三佛齐王国。其与爪哇政权、朱罗帝国之间的恩怨，我们在前面解读南印度时已经呈现给大家过了。

朱罗帝国的那次入侵，本质是贸易控制权之争，印度人并没有能够吞并三佛齐王国。公元13世纪初，借朱罗帝国消亡、南印度重新陷入分裂状态之时，三佛齐王国曾经远征锡兰，从南印度人手中成功夺取了该岛的控制权。只不过，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两地地理距离来说，朱罗王国控制马六甲不容易，马来人控制锡兰岛的难度同样远高于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十几年后，随着本地僧伽罗政权的复兴，三佛齐王国不得不退出锡兰。

远征锡兰是三佛齐王国的“人生巅峰”，然而盛极过后往往伴随的就是必衰。14世纪中叶，本来已经几乎统一南印度德干半岛的德里苏丹国，便是因为向中亚扩张而失败（借蒙古伊尔汗国消亡之际），而迅速丧失了对德干地区的统治权的。如果说印度长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是恒河流域与德干半岛的南北矛盾的话，那么马来地区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了。

在三佛齐立国的数百年间，最大的挑战一直来自于爪哇岛。其成为地区强国的标志，也是臣服了爪哇政权。在与苏门答腊政权的博弈当中，与之距离最远，却与“香料群岛”更近的东爪哇地区，一直充当着主力作用。当三佛齐王国将注意力放在殖民锡兰，并遇到挫折时，东爪哇地区也借机崛起了一个新政权——信诃沙里。不要头疼又出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个东爪哇王国只是一个过客，并不是重点。13世纪末，信诃沙里王国在将三佛齐的势力逐出爪哇之后，王朝的权力很快便因为一次特殊的入侵事件而发生了转移。一个继承信诃沙里的新王朝——“满者伯夷”，才是接下来的重点（圈起来，要考的）。

类似满者伯夷与信诃沙里的继承关系，在中国也经常出现。比如当曹魏即将完成中央之国的统一之时，司马氏的崛起使得曹丞相当年的布局，皆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过“三家归晋”本身完全是魏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并没有外来入侵者做催化剂。相比之下，满者伯夷崛起的导火索，更类似于印度孔雀王朝取代摩揭陀难陀王朝。前者在后者即将完成北印度统一大业之时，凭借驱逐外来入侵者的功绩及因此而掌握的军事力量，从而僭越上位建立新王朝。

“帮助”孔雀王朝上位的外来力量，是强弩之末的亚历山大帝国。基于地缘位置关系，印度已经是希腊人所能扩张到的最远端了（以至战士无心再战）。亚历山大在回程路上的英年早逝，更是加速了马其顿军团战略性撤退的脚步。与之相似的是，影响爪哇岛政权更迭的外来者，也是一支在旧大陆让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力量——蒙古人。只是这次威胁到爪哇人的并不是蒙古铁骑，而是元朝海军。

## 第二节 元朝进攻安南和占城中的失败

两次征日之战的失败，让人很难对元朝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抱有期待。如果说第一次东征是败于运气的话，那么有十几万原南宋水军加入的第二次东征，依然以失败而告终，就不能仅仅归结于运气了。究其根本，在于二点：一是之前宋朝与日本并无正式的贸易关系（日本没有加入宋朝的朝贡体系）。虽然民间仍有贸易往来，甚至使得宋朝钱币大量流入日本，但官方层面缺乏熟悉东部海况的人才；二是那些新加入的原南宋水军，并不是真正的“海军”。

与今天我们叫法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并没有“海军”一说，有的只是在内河作战的“水师”或者“水军”。即使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开始打造工业时代的海上舰队，其正式名称也还是“水师”（北洋水师）。江南地区为远征日本所准备有 3500 余艘船只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原南宋水军（朝鲜方面另准备了 900 艘船只）。这看起来一下子让蒙古帝国的水战能力有了巨大提升，但实际上，这些江南水军所因袭的战法及所适用的船只，大多只能运用到内河航道。

由于内河的气象、水况远比海洋简单，因此适用于内河航行的船只如果挪用于外海，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内河船只一般会做成吃水浅平底，以适应内陆水域较浅的河流深度；用于海上的船只，则会做成吃水更深、稳定性更好的 V/U 型底，同时将底舱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的水密隔舱。这样的话，即使一、两个舱室破损进水也不至于沉没（并且可以修补）。除了这两点之外，细究起来海船在桅杆、船体外型等诸多方面，都与内河船只有着不少细节上的差距。

急于攻日的想法（包括消耗新附降军），让蒙古人没有时间营造更多的海船。一个看起来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问题是，从航线上来说，远征日本看起来还不像是一场真正的远洋之战。因为无论是从朝鲜出发的蒙古、朝鲜舰队，还是从江南北上的原南宋水军，其实都是沿岸航行，最终穿越最窄处仅 40 公里的“对马海峡”登陆南日本。然而海洋就是海洋，即使你只是沿岸航行并采用了正确的船型，也很难保证在一场风暴之下保全自己（想想葡萄牙人在好望角的遭遇），更何况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跨海之战呢。公元前 5 世纪，准备更为充分、面对海况也相对更好的波斯军队，在两次远征希腊的过程中，也同样因恶劣气象的影响而蒙受了巨大损失。

罗马在与迦太基的长期战争中，在海洋上后发的罗马，也多次遭遇类似的状况。依靠战略上的坚持，罗马人一点点的加深自己对海洋的认识，并最终成为了一个“地中海帝国”。所谓“十年陆军，百年海军”一说，含义也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说，蒙古人即使运气好点没有遇到“神风”，在日本的前景也是非常不被看好的。这一点，可以在远征爪哇之役的预演：占城之战中得到验证。前面我们说到，南宋末代政权曾经在崖山海战之前，计划逃亡到位于今越南中部的“占城”。不过在当时，占城并不属于“越南”，而是一个独立国家。今天的越南在宋元时期被称之为“安南”。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今天的越南领土上所呈现的都是三分天下的格局。除了北部与中国地缘关系紧密的红河政权（安南）、南部为高棉人所有的湄公河三角洲以外，中间背山临海的过渡地带，就是“占城”了。

15 世纪，安南吞并占城。18 世纪初，又从高棉（今天的柬埔寨）人手中得到了湄公河三角洲，奠定了今天越南的领土格局。此后，内部改朝换代的安南人希望改国名为“南越”，不过并没有得到当时的宗主——清王朝的同意。最终同意的方案，便是今天的“越南”之名（清嘉庆帝定）。在今天越南已经将族群扩张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情况下，占族人已几乎被完全融合了。今天在越南境内，被甄别为占城民族的人口，还不到 2 万人。顺便说下，占城灭亡之后，有少量占城人流亡到了中国的海南三亚，其后裔今被统称为“回辉人”（被归类为回族）。

之所以要特别解读一下占族人，是因为与中南半岛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占族人的种族、语言属性为与马来地区同属的“南岛民族”。关于占族人的族源问题，目前还不十分确定。一种可能是，南岛民族先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抵达这片陆地，占族人则属于没有被后来民族同化的南岛民族后裔。还有一种可能，是南迁至马来群岛的南岛民族，通过海路抵达占城地区并立国。

无论哪种情况，海洋以及航路的存在对于占城的存续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上，占城人也以善于航海而著称。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在隔着安南政权的情况下与中国直接联系。不过在中国能够控制越南北方的时期，占城人更多是以防御的心态看待中国。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占城北部曾经被南越国、汉帝国纳为领土，并于公元 137 年脱离当时的汉朝统治独立建国。

而中国对越南北方，也就是红河下游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五代时期的“南汉”（公元 10 世纪）。越南或者说安南地区被中国统治的这段历史，被越南称之为“北属时期”。此后一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从中国手中夺取越南的控制权为止，则因一直奉中国为宗主而被称之为“藩属时期”。在越南北部进入藩属时期后，占城与中国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出于牵制安南及开展贸易的需要，占城积极与当时统治中国的宋王朝交好（纳贡称臣）。在双方交好之初，即对中国的地缘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热带地区由于物种丰富、新陈代谢快的原因，在农作物选育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今天中国人所食用的很多作物，都是透过丝绸之路或者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从热带地区引入的。北宋初年从占城引入的“占城稻”，也是其中一例。在热带环境下选育出来的“占城稻”，具有耐旱、适应性强，且生长期短等优点。一经引入，便由政府主导，很快在江南地区得到推广。为中国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深度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占城稻本身并不一定是占城人培育出来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稻种。不过是中国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却是肯定的。作为南海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占城

也由此在其中获益颇多，并自觉自愿的维持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有鉴于此，南宋末代政权会有南下占城避难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只是政治永远都是现实的。南宋避难占城的计划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是占城不愿惹祸上身（崖山海战前一年，占城向元使口头表示愿意称臣）。不过南宋避难占城的破产计划，仍然让蒙古人产生了疑虑。为此，在崖山海战之后，元朝政府希望直接将占城变为行省而不是藩属。这一决定自然很难让占城接受。公元1282年11月，为了控制占城，元朝以大小船只350艘（包括海船100艘），随船军人5000名，由广州启航攻伐占城。

这并不是一条正常的扩张路线。因为在元朝水军驶往占城之时，安南亦没有成为元朝的行省，而只是表示愿意延续藩属的地位。向安南借道过境，从海、路两线同时向占城发动攻击，是蒙古政权对安南提出的要求。很显然，这是一条“假途伐虢”之计，所期望的也无非一并解决安南和占城问题。只是经过长达千年的北属时期，安南人也对北方强邻的军事艺术了然于心，并没有上当。在占城人的顽强抵抗之下，渡海而来的元朝远征军陷入了苦战状态。

一年多之后，未能如愿攻下占城的元朝还是决定重走寻常路。即先集中力量发动对安南的战争（元越战争），同时召令攻击占城的军队北上夹击。然而集结数十万兵力，先后两次进行的元越战争（1284年—1285年、1287年—1288年），并没有让元朝政府如愿吞并安南。安南最终还是得以遵循前例，成为中央之国的藩属。除了在越南方向的征伐以外，蒙古在中南半岛还针对缅甸进行过试错。在攻灭南宋的战争中，蒙古人曾先行经由青藏高原的边缘，吞并了长久以外保持独立状态的云贵高原（大理国）。这也使得蒙古人有信心在这个方向上再向南尝试一下。只不过同样鉴于地形和热带湿热气候的原因，持续十年的“元缅战争”（1277年——1287年）依然没有为元朝提供一个新行省。

不过这场战争倒也不能说一点收获都没有，缅甸由此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央之国的朝贡体系。事实上，在云贵高原融入中央之国之后，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了。既然元朝在陆地方向的扩张实际止步于云南——广西一线，那么中间还隔着个安南的占城，自然也断无建立行省的可能了。在占城之战结束之后，占城便以藩属的身份重新回归到了中原政权的朝贡体系中。后来的远征爪哇之战中，元朝远征军便是由泉州出发沿岸而下，先在占城补给再继续南下的。

### 第三节 元朝海军远征爪哇以失败告终

一甲子之前，花刺子模的无礼行为直接触发了蒙古西征的决定，由此也诞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陆帝国。这次爪哇人的自负，能不能也让蒙古人顺势扩张至整个东南亚呢？这首先要看蒙古人这次的准备工作对不对路，毕竟之前已经有过几次

不成功的案例。在元朝的行政建制中，南海诸国的经营问题并非是由位置更近的广州，而是由福建负责的，这与泉州在宋朝成长为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有直接关系。公元1292年12月，已经决心做一个“中国”皇帝的忽必烈，下令由200艘海船、2万人（包括5000陆军）组成的军队，从泉州启程发起了对爪哇的远征。

应该说，已经坐稳江山并且吸取教训的元朝，准备工作比前几次要好得多。最起码用来远征的船只以及水手，都是源自长期开展远洋贸易的泉州地区。至于这些用来远赴南洋的泉州舰船到底长什么样，大家可以参看前些年在广东台山海域发掘出来的“南海一号”沉船。需要说明的是，基于蒙古人有些“异样”的地缘属性，让他们的很多行动不能简单的算在“中国人”头上，“蒙古帝国”与“中国”也不能简单的划等号。至于以蒙古帝国的边界为依据，将中国的历史疆域划到东欧、西亚，就更是自欺欺人了。不过已经采用中国式国号“大元”并统一中国全境的“元朝”，在政治属性上却是可以归入中国朝代史的。

从军事层面上看，由蒙、朝、汉三军合作的二次远征日本之战中，代表中国力量的原南宋水师，所承担的更多是战略支援（包括用来围田打持久战）的作用，军事上的“中国”属性并不突出。同时鉴于原南宋水军的内河属性，无论是看过程还是结果，也都谈不上有海洋层面的突破。相比之下，由泉州组织的爪哇远征军，无论是运输工具还是水手、军队的属性上，都是建立在南宋的海外贸易基础之上（只有少量高级官员为蒙古人），结合政权此时的属性，将爪哇的远征之举视为中国海权扩张的突破，客观上也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些海外战争的政治归属问题，其实本来也是无所谓的问题。在这里拿出来讨论，更多是给关注“中国”古代成就的朋友一个判断标准罢了。更容易引发我们关注的，是战争中的技术问题以及它的地缘背景。对于爪哇远征军来说，除了船型和航海基础比之前更占优以外（比之征日），更大的利好还在于气象。虽然说从航程上来看，远征爪哇的距离要远高于从朝鲜东渡日本，但依靠东北季风的助力，以及丰富的远洋经验，远征军在航行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从泉州出发的舰队，在经由占城补给之后乘风南下，于次年二月登陆爪哇。

另一个能够让中国远征军松一口气的情况是，之前在日本遇到的困难不会再出现。南、北纬5度一带被称之为“赤道无风带”，马来西亚、印尼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南海南端都包含在这一区间。这一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年四季风平浪静，加上热带风情，非常适合休闲度假。今天诸如马尔代夫、巴厘岛等都是位于这个区间。爪哇也是位于这个区间的边缘，因此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再也不必担心“神风”来袭的问题了。在这一看似有点疯狂的计划中，更多要考虑的是怎么回来的问题。无论胜负，远征爪哇的中国军队如果想回来，所倚仗的还是季风。南海的东北季风一般始于11月，结束于次年的3月；西南季风在南部则一般始于每年的5月底，结束于9月中。借着东北季风南下的中国商人，如果想继续穿越印度洋，前往南印度、



红海或者东非等地区的话，可以借着东北季风一次性完成航程（反过来的行程则借助西南季风）。

不过大多数人并不会如此安排，而是会借着东北季风抵达南洋诸岛，与乘西南季风来此的阿拉伯、印度商人交易，然后再借着西南季风回程。横跨印度洋进行贸易的商人，大多也是如此操作。由此，靠近马六甲海峡的这几个南洋岛屿，便由此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贸易枢纽点。在严重依赖季风的计划中，扛着“元朝”大旗的中国军队，最起码需要在南洋坚持三个月才可以言退。如果在这个季风周期预先没有安排好后续梯队的话，则必须坚持一年，等到下一次东北季风再起之时，才有可能得到后援。

东爪哇的政治中心是位于岛屿东北部的“泗水港”（今称苏腊巴亚），也是这次远征的直接目标。中国远征军的登陆地点是泗水西北部的图班（Tuban），稍事休整后于3月由水陆并进向泗水进军。此时岛上的政治形势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来说，也颇为有利。我们知道，海岛虽然从形态上来看貌似一个天然的一体，但漫长海岸线所带来的贸易开放性，实际上更容易使得岛内各点经济自成一体，并产生诸多独立政治单元。看看大不列颠多年内部遇到的问题，就容易理解这点了。

此次元朝远征的直接目标“信柯沙里”，虽然在驱逐三佛齐势力的过程中，其逐渐完成了在爪哇岛的称霸，但内部依然没有整合完毕。在元军登陆之前，信柯沙里的国王刚刚被此前统治东爪哇的前朝（谏义里国）王族后裔所暗杀，并起兵试图复国。后者在控制东爪哇时，通过与三佛齐王国的联姻，成为了爪哇诸国中的霸主。如果这次内乱有三佛齐的幕后支持，并不会感到意外。

当然，对于远征军来说，谁做岛上的“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愿意服从于元朝政府。而对于两股爪哇本土势力来说，谁先能争取到中国“客军”的支持，也就意味着打开了胜利之门。最终抢得先机的是信柯沙里方面，在国王被暗杀之后，王国的领导权被转移到了他的女婿（罗登·韦查耶）手中。在这位新领导人主动表示愿意归顺天国上邦后，元军将领相信了这位盟友的诚意。并开始与之组成联军，向谏义里军队发起进攻。来自中国的军队，无论是战术还是武器层面，都有着很大优势，所欠缺的主要是地利和人和。有了信柯沙里这个“土著”的配合，这两点便不成为问题了。针对谏义里的几次战役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然而接下来局势却并未如元军所想的那样发展。在之前战役中保存实力的信柯沙里，只是用了一招借刀杀人计。当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覆灭后，旋即将兵锋指向中国人。最终遭受袭击的5000中国远征军，在损失了3000余人后于4月底撤回港口登船。此时能够帮助他们回国的西南季风尚未刮起。不过即使此时西南季风起，船队也需要在人力和船桨帮助下，先行纵穿赤道无风带。无非是季风起时，会有带动对应方向的洋流为之助力罢了。因此这个时间，可以说还是刚刚好。功败垂成的中国远征军，在进入南海之后，高效率的赶上了刚刚刮起的西南季风，最终顺利的

回到了中国。

#### 第四节 征爪哇之役产生的后续影响

可以想见，损兵折将的远征军将领将受到一定处罚。然而接下来，身在大都的元朝皇帝却并没有像远征日本那样，再对爪哇用兵。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爪哇远征军回国后的第二年（公元1294年），元朝的创立者忽必烈便离开了人世。无论出于内部稳定局面需要，还是为了防备中亚方向那些兄弟汗国觊觎最高汗位，蒙古人都必须把心思放在大陆上；另一方面，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跨海尝试，元朝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除非中兴的信柯沙里执意要与“中国”为敌（阻断商路），否则再劳师远征也实在没有必要。

那位凭借平定叛乱、赶走元军而声望达到顶峰的国王女婿，并没有中兴信柯沙里，而是借机建立了属于自己家族的新王朝，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满者伯夷”。好在这个新王朝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知道与中国的贸易将给他带来多大的利益。很快，爪哇的新国王便遣使纳贡，向中国的新皇帝表明，自己愿意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前在攻取占城和安南的战役失败之后，自大的蒙古人已经接受了这种名义宗主的关系定位，或者说继续维持前朝所达成的平衡。这一次，在爪哇人主动表示臣服的情况下，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动刀兵了。对彼此来说，这种政治关系定位，无非为了开展贸易的需要罢了。

虽然元朝在南海的两次军事行动（占城、爪哇）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也不能说是空耗军力。毕竟这两次使用武力的行动在军事战略、战术层面，都展现了强大的远洋攻击能力。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并不是每一场战争都需要有领土甚至经济的直接收获。很多时候，单纯为显示威慑力而进行惩罚性战争，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旦有强力而来的第三方势力试图拉上它们影响中国利益的话，这些前车之鉴必定会对南海诸国的决策造成一定影响。当年汉将陈汤在孤军前往中亚康居之地攻灭郅支单于后，所做的战争总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正是此类军事行动最好的注脚。

可以肯定的是，除了驱赶元军所带来的信心及声望以外，满者伯夷还从这支远道而来的中国军队那里，得到了更加先进的武器及战术思想。要知道，虽然之前南洋已经与中国大陆有了长期而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包括火器在内的战争武器，即使在中央帝国内部都属严格控制的，输出就更加难了。这次爪哇之战，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遇。

中国人当然不会主动传授自己的战争经验了。与中国远征军的合作，以及后来的缴获是满者伯夷战力提升的关键。受袭而被迫撤退的元朝军队，不仅损失了大半陆军，也不得不放弃了大量船只和武器装备。有记录表明，爪哇远征军虽然借助季

风顺利回到了中国，但出征时的两万中国人，最终只剩下了 5000 余人。损失的人员当中，有相当部分被迫滞留爪哇。一如当年的怛罗斯之战后，被俘的唐朝军人为阿拉伯及西方世界带去了造纸术一样。爪哇远征军中被俘的技术人员，也不得不再次做了一次技术传播。

在船帆上加装一条条横向的硬质桁条，是中国帆的特点。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发明了可以帮助船只灵活转向的尾舵。这些设计都出现在了满者伯夷的船只之上。这无疑能够为满者伯夷远洋能力加分，并使之有机会成长为一个贸易帝国。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那些爪哇远征军被迫抛弃的大炮（包括仿制品），开始部署在了满者伯夷的战船上。

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农业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地缘属性上原本就有很大的不同。简单点来说，三佛齐王国的农业非常不发达，却海上能力很强；爪哇岛的情况则是反过来。尽管爪哇岛在农业及人口上都更占优势，但海岛地区具有的天然开放性，却限制了爪哇政权的扩张空间。毕竟不仅每一个岛都是一个天然的独立板块，岛屿内部也会因漫长的海岸线，而更易分割成一个个拥有独立出海口的政治体。

如果能够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只要能够攻取或者封锁被征服对象的港口，通常依赖这些港口进行贸易的内陆地区，都会选择臣服于征服者。当然，征服者本身一般并不会强行去改变岛上的政治及其地缘结构。政治上派驻个总督、经济上能够收取贡税，就算是满足统治需要了。一定要做到更深一步，很可能在一个点上的消耗，就足以拖垮一个帝国。

现在有了中国人送来的礼物，爪哇人终于得以补上自己海洋短板，并开启自己的征服事业。不过三佛齐并非满者伯夷征服的唯一目标，基于松散的统治结构，征服三佛齐本身并不意味着原本视其为宗主的那些属国，就天然会服从于新领导者。更何况在三佛齐衰弱后，原本纳入其政治体系的那些国家早已回复到了独立状态。



## 第二十二章 满者伯夷崛起后征服马来世界

### 第一节 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政治格局

先来了解下在地理及地缘政治层面上，满者伯夷舰队都有哪些需要征服的对象。用一句话来形容满者伯夷的雄心，那就是“已知的马来人覆盖区”，简称“马来地区”或者“马来世界”。在地理上包括有：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苏拉威西岛、爪哇岛四个大岛及其附属小岛组成的“大巽他群岛”；与爪哇岛隔海峡相望的巴厘岛，及其以东至帝汶岛（东帝汶所在岛屿）一带的“小巽他群岛”；苏拉威西岛与几内亚岛之间，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

以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来说，满者伯夷帝国当时所希望征服的“马来世界”，就是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东帝汶五国所覆盖的区域了。受印度文明影响深远，是这一地区当时在文明层面的最大特点。统治阶层采纳的是印度教或者佛教信仰，还是坚持原始宗教信仰，客观上是文明与原始分类的主要标准。这一标准也导致在地理、种族、语言分类上，应该也属于“马来世界”的菲律宾群岛，还不属于当时认知的文明“马来世界”范围。

没能处在东西方贸易线上，是菲律宾人还处于蒙昧阶段的直接原因。不要为这点感到惊讶，要知道离东亚文明更近的台湾岛，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直到1521年，麦哲伦帮助西班牙人发现菲律宾群岛，才算是为南海东北部的这片岛屿打开了通往世界的一个新窗口。当然，如果没有这次地理发现，菲律宾几乎肯定也会完成伊斯兰化进程，并成为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文化内核的新“马来世界”，或者说“马来-伊斯兰世界”成员。

对于今天的印尼来说，满者伯夷当年所规划的帝国蓝图，几乎就是今天“马来-伊斯兰世界”的翻版。如果这个曾经击败强大中国的东爪哇政权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作为印尼的地缘政治源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同时满者伯夷的征服，也为我们了解在伊斯兰化之前，这些岛屿的地缘政治状态提供了帮助。

先来看看满者伯夷本部，也就是爪哇岛的情况。在满者伯夷崛起于东爪哇，并向中、西部扩张势力之时，最不满意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他的近邻“西爪哇”了。三佛齐王国的衰弱，也让西爪哇政权重获独立，其代表性王国叫做“巽他王国”。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那条著名的“巽他海峡”，以及大、小巽他群岛之名便是来源于此。

爪哇岛的东、西地缘差异，在印尼现在的民族结构中也能看出。在印尼2.6亿人口中，源自爪哇中东部的“爪哇族”位列第一，占比将近一半；位列第二的，就是分布于爪哇岛西部的巽他族，人口也有4000万。这种情况的形成，与爪哇岛内

部长期东、西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关。而爪哇族的人口优势，又能从侧面印证了满者伯夷等东爪哇政权的成功。

狭长的岛屿结构，是爪哇岛东西地缘差异形成的基础原因。在同样狭长的苏门答腊岛，这种情况也有所体现。三佛齐王国的统治核心是岛屿东南部的平原地区。深入陆地的河流，为三佛齐王国开展海上贸易提供了有利帮助。基于其明显的海洋属性，三佛齐对岛的西北部，依托山地的内陆地区则控制乏力。在满者伯夷的征服目标中，存在于今北苏门答腊省地区的卡罗王国，就是苏门答腊西北地区的政治代表。与三佛齐倚重海洋贸易不同的是，卡罗王国经济中农业比例要高得多。

前面我们曾经解读过，面积较小的爪哇岛之所以能够在人口上拥有巨大优势，得益于岛上遍布的活火山。在热带雨林气候区，过度的雨水很容易造成表层土壤的矿物质流失（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这些不时喷发的火山，能够为岛上经常性的补充肥沃的火山灰。相比爪哇岛，苏门答腊岛的活火山数量要更少。支撑岛屿存在的高地，是一条沿苏门答腊岛西侧延伸的山脉——“巴里桑山脉”。苏门答腊岛上的活火山，便集中分布于这条山脉的中段。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有北苏门答腊的锡纳朋火山、西苏门答腊的默拉皮火山（在 21 世纪先后爆发过）。

借助这些活火山，依附于山脉中段的西、北苏门答腊地区（省），成为了苏门答腊岛的农业中心区。相对而言，源起于北苏门答腊省的卡罗王国，在海洋贸易上就要弱势许多。比如今天北苏门答腊省位于马六甲海峡之侧的首府“棉兰”，在 19 世纪末都还是个小村落。借助因贸易开发而移居于此的爪哇人、华人（占比五分之一）等外来民族，才逐渐使其成长为苏门答腊岛第一大城市。当然，农业国还是贸易国都是相对而言。地处这样一个海岛地区，卡罗王国也一样拥有自己的外贸渠道，甚至曾经前往当时的宋朝“朝贡”。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这个苏门答腊国家被称之为“呵罗单”。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三佛齐王国与卡罗王国之间的差异，本质是一个开放性贸易大国与传统农业国之间不同。前者在技术上容易取得优势并压倒对方（包括让对方表面臣服），但想做到吞并、融合对手，却还是很难的。最后提前预告一下，在满者伯利一统马来世界的 13 世纪中叶，在苏门答腊岛的最西端，也就是今天印尼内部最大分离势力所在的亚齐地区，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至于这个变化是什么，后面会解读到。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在 13 世纪初期时的地缘政治结构了。必须说明的是，整个马来世界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部族、小国林立。就像今天的印尼内部，除了爪哇、巽他这些大族，还有数百个小民族一样。上述国家，更多只是所在岛屿的代表者。在每个时代，这些代表的名称可能都会有所变化，相对恒定的是依据地理特征而产生的地缘结构。

## 第二节 马来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格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马六甲海峡对岸的情况。今天泰国最南端与马来西亚交错的三个半行政区：也拉府、北大年府、陶公府，以及宋卡府的东南部（统称“泰南四府”或“泰南三府”），因马来/伊斯兰人口占优，而一直有分离主义倾向。然而这一地区的马来属性，并非是在伊斯兰化后才形成的。在满者伯夷的征服版图中，与其相邻的马来西亚玻璃市州、吉打州，就已一并构成了马来世界的最北端。

从地形角度来看这一地缘结构的形成会更为清晰。在地图上我们会看到，马来半岛的南部为马来西亚、泰南四府所控制的区域，轮廓明显呈纺锤状。其最宽处的东西纵深达到 330 公里，6 倍于宽仅 50 余公里的克拉地峡。这一马来人覆盖的区域，地缘上又被称之为“马来亚”。这一名称在政治上通常也指向马来西亚的西部领土（东部则称“婆罗洲”）。一条被称之为“大汉山脉”的山体，是马来亚避免成为大陆势力所融合的地理、地缘基础。依托这片海拔达到 2000 米的山体，以及依山伴海所带来的海港优势，马来人成功抵御住了来自中南半岛的入侵压力。

具体到中世纪时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南半岛的“暹罗王国”（泰国的前身）压力。12 世纪时，沿马来亚海岸分布的代表性小国主要有：北部的古伦王国（马来西亚吉打州）、中部的彭亨王国（马来西亚彭亨州）、南部的淡马锡王国（新加坡）。因为地理纵深有限，这些马来人组建的小国本质都为贸易城邦性质。在苏门答腊、爪哇两岛争雄期间，这些城邦一直处于配角状态，那两个岛中谁更加强大，这些城邦便成为谁的属国。在世界范围内，这其实也都是贸易城邦的政治常态。

一个板块想在本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露脸，总归是要有些地缘优势的。苏门答腊、马来亚的贸易优势；爪哇岛的农业和人口优势，使得它们在马来世界中成为了核心之地。除此之外，香料的主产地：马鲁古群岛，因为这一独特优势，也提升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被规划入了满者伯夷的政治版图。在当时，存在于其主岛之上的塞兰王国，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代表（塞兰岛的岛名便来源于此）。

与香料群岛相比，体量要大得多的大巽他群岛的另两个大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反而没能获得与其体量相配的地缘政治地位。尽管因为地理位置相近原因，上述两岛也被列入了中世纪马来世界的范畴。先来看看加里曼丹岛的情况。从总面积和平原面积上看，被荷兰人、中国人称为“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岛，似乎有理由成为马来世界的核心板块。这个世界第三大岛今天在行政上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大体以岛屿中央山脉为界，分割为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部分。其中控制北部岸线的马来西亚部分，中间还间杂了个“文莱”。这种一岛分三国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少见的。

然而比起相邻的爪哇岛，婆罗洲的土壤情况却非常不理想（缺乏活火山），这使得岛屿的整体环境，呈现为物种丰富却农业基础单薄的热带雨林状态；同时与身



处马六甲之侧的马来亚、苏门答腊相比，又无航线优势。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使得加里曼丹岛的内陆地区一直到上个世纪都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能够引发外部征服欲望，并导入文明因子的，只有那些拥有海岸线的边缘地区。虽然随着西方殖民及工业化的开启，加里曼丹岛也逐渐得到了开发。只是今天岛屿上总计约 2000 万的人口，也足以显示它的生存条件远不如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

受苏门答腊和爪哇岛的影响，加里曼丹岛的沿海地区在中世纪也有进入文明序列的土著王国出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处北部岸线的“渤泥国”。这个曾经多次为中国所记录的婆罗洲国家，即是今天文莱苏丹国的前身，同时也是整个岛屿伊斯兰化的起点。在其最强大之时，不仅统治了婆罗洲的大部分地区，亦控制了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等岛屿。后来文莱苏丹国没有选择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与这段令自己骄傲的历史不无关联。



满者伯夷帝国与马来地区的伊斯兰化

身处加里曼丹岛西侧的“丹绒布拉王国”（今印尼西加曼丹省），是该岛上的另一个政治代表。这个土著王国的成就及在中国的知名度就远不如渤泥国了（中国境内甚至有“渤泥国王墓”）。不过提起由海外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相信很多关心历史的朋友都有印象。这个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末存在于南洋的华人共和国，就是创建于西加里曼丹地区。也正是由于自身人口潜力有限，当时已经伊斯兰化的马来裔统治者，才寄希望于借助华人的帮助，抵御荷兰殖民者的入侵。

再来说说苏拉威西岛的情况。在南洋诸岛中，苏拉威西岛的形态可以算得上是

最奇特的了。这个岛屿在地理上，就是一片向四个方向延伸支脉的山地（多山地而少平原）。这一奇特的地理形态，不仅几乎隔绝了其几个半岛之间的陆地联系，使之天然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板块，更阻碍了岛屿的内部的地缘融合。这一特点，从岛屿依地理位置而形成的 7 个民族，以及繁杂的宗教信仰（甚至有 1/5 的基督教徒）便可看出来。

今天苏拉威西岛的人口增长至了约 1700 万。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印尼的人口移民计划。由于爪哇岛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同样拥有大量活火山的苏拉威尼岛，便成为了印尼政府战略性外迁人口的目标地。只不过在缺乏工业力帮助的中世纪，苏拉威西岛的潜力显然很难得到开发。这也使得一直以来，在马来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中，苏拉威西岛不得不处于龙套地位（没有突出的政治代表）。

相比苏拉威西岛，面积要小得多的巴厘岛反而更容易引发满者伯夷和世人的关注。由于爪哇、巴厘两岛之间仅仅相隔了宽仅 3.2 千米的巴厘海峡，因此巴厘岛很早就受影响进入了文明序列。这一文明影响力还向东延伸到了巴厘岛东部，与之同属小巽他群岛的龙目岛、松巴哇岛。在 13 世纪，小巽他板块等待满者伯夷舰队前去征服的政治体主要有：巴厘王国以及松巴哇岛上的“栋普王国”。顺便说下，印尼群岛中的第三条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通道“龙目海峡”，即是位于巴厘岛与龙目岛之间（另两条为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

好了，现在我们清楚了，满者伯夷从政治层面为自己规划的帝国板块，都包含哪些政治对象了。也大体明白了，满者伯夷帝国可能完成的政治版图边界在哪里。

### 第三节 满者伯夷征服马来世界建立帝国

有了强大的海军，整个 14 世纪成为了满者伯夷的世纪。加里曼丹岛沿岸、苏拉威西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马鲁古群岛那些原来臣服过三佛齐的马来政权，在 14 世纪中期都逐渐成为了满者伯夷的属国。按照一般标准来看，这已经意味着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了。这当中还有个历史典故。引领满者伯夷扩张的并不是一位王族，而是一位权臣“加查·玛达”（公元 1319 年 -1364 年执政）。

由于统一马来世界的历史功绩，加查·玛达成为了印尼历史上最受尊崇的英雄人物，甚至如中国历史中的关羽一样被神化了。如果哪天印尼称霸南洋之心再起，那么外界最有可能先嗅到的气息，可能就是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大力宣传了。这位政治地位有点类似曹操、历史功绩则相当于秦始皇的权臣，在开启统一过程中曾发过一个著名的誓言（帕拉帕誓言），那就是在征服马来世界的工作完成之前，将一直按印度教的戒律“斋戒”。在各宗教之中，斋戒行为在技术规定上会有所差异，但核心之意都是克服以饮食为代表的生理性欲望，也就是“禁欲”了。比如印度教中有经典规定，每月应斋戒两次，并在白日禁食（夜晚祷告）。



不管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斋戒禁欲，每日做到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于一位身处世俗权力中心的领导者来说（对僧侣相对简单点）。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帕拉帕誓言的自我约束，可能仅仅指向的是不在食物中添加香料这一点。对于大多素食的印度教徒来说，香料为口舌所带来的刺激性感觉，能够很大程度取代食用动物性蛋白所带来的满足感。从这点来说，的确算是牺牲很大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香料对于南亚、东南亚地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大约在公元1350年前后，包括巨港（旧港）在内的马来诸港口，以及控制这些港口的政权，基本都为满者伯夷的帝国海军所征服。为了有效统治这些属地或者属国，满者伯夷一般会采取联姻的手段，特别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被征服地区的王族。在政治松散的马来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这其实都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当然，政治就是政治。这层关系虽然能一定程度为彼此间的信任加分，但一旦时局有变，最先发难的却也往往是那些“女婿”（满者伯夷的创立者，本身也是前朝的“女婿”）。

在征服巨港之后，满者伯夷也采取的联姻的手段，从愿意合作的三佛齐王族之中选取了自己的代理人。那些试图抵抗的三佛齐贵族，则被迫向北迁都至“占碑”（今天印尼占碑省）。不过二十多年后，满者伯夷还是彻底吞并了苟延残喘的三佛齐，完成了对苏门答腊的统一。事实上，最后一个顽强抵抗爪哇人的并不是三佛齐，而是与之同处爪哇岛的“巽他人”。很多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最不愿意被你超越的，往往就是离你最近的人。在通过联姻方式确认巽他王国属国地位的尝试失败后（巽他人认为联姻可以，但双方应该是平等的盟友），加查·玛达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来消除这个近邻的威胁。

不过强大的武力以及严苛的管理手段，虽然能够帮助你完成军事上的征服，但却并不能帮助一个新生帝国完成内部融合。在这方面，在东亚完成类似功绩的秦国，就有着切肤的教训。后世诸中国王朝在吸取教训后，大都采用的是“外法内儒”的治国方式。即在用国家强力机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用儒家思想对人民进行“教化”，以在意识形态层面完成统一。

对于信仰印度教的满者伯夷帝国来说，大力推广印度教就是最好的融合方式。在满者伯夷崛起之后，印度教在南洋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大量印度教神庙在满者伯夷统治区，尤其是核心的“东爪哇”地区被新建。东爪哇也因此成为了南洋最后被伊斯兰化的板块。由此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今天伊斯兰教虽然在印尼成为了统治性宗教，但一定要对比各民族的信仰程度的话，我们会发现爪哇岛西部的巽他族，比之人口占绝对优势的爪哇族更为虔诚。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后成为一个共和国，并在政治生活中竭力淡化宗教影响力（包括国旗设计上也没有如马来西亚一样有伊斯兰色彩），不得不说，也与满者伯夷的这段历史有着重要关系。

尽管在大力推行印度教，但满者伯夷和之前的南洋诸政权一样，并不会强行禁止其它宗教信仰。这种状态与诸宗教在印度的情况相一致。这种宽容性得益于多神



信仰并没有那么强的排他性。毕竟从技术上看，多神信仰很容易通过把其它神祇吸收进来的方式，完成融合。比如印度教的梵天大神，在佛教里面做“四面佛”就毫无违和感。中国人把各路神仙放在一个庙里祭拜，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相比之下，一神教信仰则有着强列的排他性，并从而导致“圣战”事件的产生（即使所信仰的神系出同源）。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今天带有强烈宗教极端色彩的恐怖主义，都是最好的例证。

#### 第四节 巴塞苏丹国伊斯兰化对马来世界的影响

每一个王朝、帝国都有它衰弱的时候，满者伯夷也不例外。以南洋的地缘规律来说，在没有新外力介入的情况下，接下来取代满者伯夷称霸南洋的政权，有可能出现在爪哇，也有可能是在苏门答腊；选择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仍然是印度教，也有可能是佛教。一如中国延续两千年的王朝更迭史一般。

然而马来世界的情况又与东亚有情况有很大不同。简单点说，作为连接两大洋的马来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意识形态上，更多会受到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中心的影响。由于华夏文明的内敛性，以及本身文化对热带地区的不适应性（想象下让马来民族理解那些节气，会有多么的困难），这一影响更多是从印度方向传递而来的。同样产生于热带季风区的印度教、佛教，在整个东南亚的传播可以说是毫无认知上的困难。

正因为如此，一旦印度的地缘结构有变，那么在东南亚尤其是严重依赖海洋贸易的马来地区，就很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那么印度有变化吗？答案是肯定的。随着新千年（公元 11 世纪）的到来，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开始大举入侵印度，并为整个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伊斯兰统治时代”。这期间在宗教文化层面，虽然印度文明的主体，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得益于信仰与社会结构完美融合的特性，成功抵御住了伊斯兰文化的入侵（虽然在政治上不得不屈服），但与中、西亚气候条件类似（热带沙漠气候），且地理相接的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却还是率先完成了伊斯兰化进程。

然而尽管印度教徒在印度腹地成功的坚持了自己的信仰，但他们也就此失去了向海外继续传播印度教的途径。随着伊斯兰政权在印度半岛的推进，以及阿拉伯人在整个印度洋上的开拓，穆斯林商人尤其是阿拉伯商人逐渐在印度洋贸易中占得优势。原本在孟加拉湾占据统治地位的印度教大国——“朱罗帝国”在 13 世纪的崩溃，更为阿拉伯商人获取印度沿海贸易控制权铺平了道路。在这个爪哇人崛起南洋的世纪，穆斯林商人们不仅在诸如马拉巴海岸的地区，成为了各印度城邦的贸易甚至政治主导者，还与北印度的伊斯兰统治者互相配合，成功的诱使孟加拉地区加入了伊斯兰世界。

在这一背景下，正当东爪哇人倾心打造自己的“马来帝国”，并试图以印度教信仰作为马来人融合的基石时，巨大的危机实际已经来临了。伴随着贸易线的扩张和穆斯林商人的到来，马来地区对于伊斯兰信仰已经有所接触。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伊斯兰信仰在马来地区传播有限，除了少量在沿海与之进行贸易的马来商人，以及马来贵族（通常二者是统一的）受影响会信仰伊斯兰教以外，并没有太大影响力。

基于伊斯兰教本身政教合一的属性，伊斯兰教成功传播的标志，往往是某一皈依伊斯兰教的地方统治者遵循教法，并开始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来统治国民时。在这一政治设定下，伊斯兰教能够很快自上而下得到推广，这类国家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之为“苏丹国”。比如孟加拉地区的伊斯兰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果按这一标准来看，13世纪中后期始建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亚齐地区的“巴塞苏丹国”，可以认定是伊斯兰教在马来地区所获得的第一个突破。

巴塞苏丹国全称为“须文答腊－巴塞苏丹国”，位于今天印尼最西端领土“亚齐特别行政区”的东北部，与亚齐首府“班达亚齐”的直线距离约250公里。从地图上看，苏门答腊岛最北端大体呈现为一条约260公里宽的棱线，班达亚齐与巴塞便位于这条棱线的两端。从政治属性上来看，所谓“巴塞苏丹国”其实只是一个规模很小贸易城邦，伊斯兰教信仰也只限于城邦之内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居民，这点与东非海岸那些居民人数最多万人的斯瓦希里城邦类似。虽然身居苏丹之位的有可能是当地皈依伊斯兰教的部族首领，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伊斯兰属性的贸易城邦，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由阿拉伯商人所控制。

不管巴塞苏丹国的实质属性是阿拉伯人的殖民地，还是可以算成第一个马来－伊斯兰政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穆斯林商人在印度洋的东端终于拥有了稳定的落脚点。透过这个跳板，阿拉伯人不仅能够向南洋腹地延伸贸易线，更可以润物细无声般的传播他们的信仰。单纯从位置上看，位于印度洋－太平洋相接点上的亚齐和巴塞苏丹国，也可以算是伊斯兰教向太平洋地区（海路）传播的起点。今天的亚齐地区成为印尼内部最有分裂倾向的板块，与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不无关系。当然，亚齐的“伊斯兰骄傲”其实并不止于此，后面等亚齐苏丹国出场时，会有更加详细的解读。

在满者伯夷帝国崛起之后，巴塞苏丹国及以此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们，也识时务的进入了后者的势力范围。对于贸易城邦来说，这种选择并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因此获取在南洋进行贸易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不过精于算计的商人同样也很清楚，投资政治并依靠政治获取垄断资源，才是获取利益的最高手段。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人吕不韦，在这点上就曾经有过很好的实践。有鉴于此，其实巴塞苏丹国只是伊斯兰世界在南洋的一个起点。阿拉伯商人们希望以巴塞苏丹国为起点，接下来能够在整个马来世界影响甚至控制更多的国家。

不过从位置来看，位于马来世界边缘的巴塞苏丹国，很难对马来地区腹地的那

些马来部族起到示范效果。尤其现在统治整个马来世界的，是正在推广印度教的满者伯夷帝国。对于多神信仰的帝国统治者来说，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宗教在民间的传播一回事，坐视它影响政治稳定又是另一回事。好在前面我们也说了，每个王朝、帝国都有它衰弱的时候。有了巴塞苏丹国这颗火种，那些埋头精耕南洋的穆斯林商人们，总归会等到机会的。至于这个机会在哪？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二十三章 中南半岛各民族进入文明时期

### 第一节 中南半岛湄公河流域的地缘结构

虽然苏门答腊岛因为三佛齐的崛起,而成为了最大的贸易中转地。但从位置来看,马来半岛也同样有机会让往来于马六甲海峡的商船,更多停靠在自己的港口。问题在于,马来半岛本身的地缘潜力有限,需要外力支撑来完成这一目标。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外力并非总是起到积极作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最有可能对马来地区构成影响的,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而应该是近在咫尺的中南半岛,这其中又以陆地相接马来半岛的泰国为甚。事实上,在爪哇人征服马来世界,并建立“满者伯夷帝国”之时,也正是泰国在中南半岛崛起为最强大国家的时期。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时刻经营马来半岛,很有可能同时受到南北两个方向的巨大压力。

今天的中南半岛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强国。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五个国家中,越南、泰国、缅甸算是呈三足鼎立的第一阵营。这三个国家的人口都在5000万——1亿这个区间(代表农业潜力),也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代表海洋潜力);柬埔寨和老挝的实力则明显不足。前者情况稍好,有1500万人口及一小段海岸线。后者则完全是个龙套角色的内陆高地小国,人口约700万。然而在14世纪之前,柬埔寨却是中南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其鼎盛时期的领土范围,不仅包括今天的柬埔寨全境,还包括老挝南部、泰国东北部,以及越南南部。由于主体民族为高棉族,这个中南半岛最早的强大文明体史称“高棉帝国”。要想搞清泰国的地缘结构,就必须先对高棉人的历史有所了解。

高棉帝国大体经历了三个时代:扶南王朝(公元1世纪-7世纪)、真腊王朝(公元7世纪-9世纪初),以及因吴哥窟而闻名于世的吴哥王朝(公元802年~1431年)。为类似史料缺乏的古代帝国划出一条具体的疆域线,是非常困难的事。事实上即使是中国这样能够详细记录历史的国家也因为标准问题,对于历史地图该如何表述也是件颇有争议的事。相比之下,在地缘层面认定一个政权的覆盖范围会更为的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棉人曾经的帝国,其核心就是一个“湄公河平原帝国”。

先来了解一下湄公河流域的板块结构。作为中南半岛的母亲河,湄公河流经了中南半岛的全部五个国家。其上游最北边的一段目前为缅甸-老挝-泰国三国的国境线。以河流为界,是划定国境线时最常见的方式之一。相比用认定山脉分水岭的方式划分国界,认定一条河流的主航道要更容易操作。然而依河划界的最大问题,就是往往容易把地缘相近的族群割裂。要知道,河流在人类迁徙、交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一流域且具备相似地理环境背景的区域,在心理认同上往往趋同。

上述问题体现在缅甸、老挝、泰国因湄公河而国境相接的这一地区,就是形成

了著名混乱之地——“金三角”。结合地形图大家会发现，在这个三国交界之地，以地缘板块来划分的话，其分别对接着缅甸的“掸邦高原”、泰国的“泰北山地”，以及老挝北部的“上寮高原”。然而问题在于，掸邦高原和泰北山地的主体都不属于湄公河流域（前者为萨尔温江流域，后者为湄南河上游）。真正属于湄公河流域的，只有靠近河流右岸的一小部分。这片身处缅东、泰北，在心理归属上却与老挝边境地区更为趋同的湄公河流域，正是金三角地区的核心所在。

与泰国、缅甸相比，老挝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湄公河国家。除了金三角之南，以及最南端与泰国、柬埔寨相邻的少量地区以外，老挝的绝大部分领土都位于湄公河左岸。在大家的印象中，老挝是一个典型的高地国家，全国80%以上的土地为山地、高原。然而与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等给人同样印象的国家一样，老挝能够有机会成为独立国家的原因，恰恰在于那不到二成的平原。同样的例子在中国境内也能找到，比如“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福建。

老挝的轮廓很像一柄中国古代的“如意”，内部可分为三部分：上寮、中寮、下寮。全境为高原山地的上寮部分，便是这柄“如意”的头部（中寮和下寮为如意柄），其面积占老挝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从地形上看，湄公河在南出上寮高原后，沿高原南麓向东延伸，在遇到分隔老挝、越南的长山山脉后，转而向南，最后经柬埔寨、越南南部流入泰国湾。湄公河拐的这个弯，便天然造就一老挝境内的另两个板块：中寮和下寮地区。今天老挝首都万象所在的中寮平原，便是位于湄公河之北与上寮高原之间；而下寮平原，则位于湄公河之东与长山山脉之间（除南端少部位于湄公河西部）。

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层面的中寮、下寮地区，还包括高比例的附属山地（超过50%）。去除掉这些山地，老挝人能够拥有连片平原之地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地形图上看总会觉得老挝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高原国家的原因。然而一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老挝之所以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点平原之地的存在却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把视线拉高，会发现这条位于湄公河左岸的狭长平原带，属于另一个更大的板块——湄公河中游平原。这片为山地包裹的碟形台地平原，一般被称之为“呵叻盆地”或者“呵叻高原”。其西部为纵贯泰国中部的“栋帕耶费山脉”；南为分割泰国、柬埔寨的“扁担山脉”；东为老、越边境的“长山山脉”；北即为“上寮高原”。

事实上，呵叻盆地的海拔仅为100-300米，以至于在一般的分色地图上，呈现的也是代表平原地貌的绿色。它之所以也被称之为高原，是因为栋帕耶费山脉之西是“湄南河平原”（又称“曼谷平原”），以南则是“湄公河下游平原”。这两个下游冲积平原的平均海拔仅为25米左右。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这样一对比，呵叻地区也就红着脸挤进高原队列了。

湄南河流域是泰国人的龙兴之地。高棉帝国的兴起之地，则是湄公河下游平原。

在 17-18 世纪，这片平原最南端的三角洲地带，大部为越南所侵夺。为了更好的对应这一政治背景，我们可以将柬埔寨部分的湄公河下游平原，称之为“金边平原”；越南部分称之为“湄公河三角洲”。前者的地缘中心，为今天的柬埔寨首都金边；后者的核心则是当年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胡志明市。不过相比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名称，它的旧名“西贡”听起来会更具浪漫色彩。

西贡本身其实不是在湄公河三角洲，而是依附于三角洲边缘一条独流入海的小河“西贡河”之上。当然，无论从地理还是地缘角度来看，这都不影响它划入湄公河三角洲板块。纯粹从地理位置上看，正处在湄公河三角洲与下游干流分割点的“金边”，更应该是整个湄公河下游，包括三角洲地区的地缘中心。一般而言，类似的节点是很容易成为全流域的地缘中心的，中国的南京、埃及的开罗都是此类位置的受益者。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越南人当年没有能够再把国土向北方延伸一些，也与金边是高棉人的都城有关。不过金边并非一直是高棉人的政治中心，公元 1431 年之前，高棉帝国的都城是在那个著名的世界遗产——吴哥窟（今为柬埔寨暹粒市所辖）。那次迁都也意味着吴哥王朝和高棉帝国时代的终结，新的高棉王朝被称之为“金边王朝”，并一直延续至今。值得一提的是，高棉历代王朝之间都有直接的血统继承关系。这使得今天的柬埔寨王室可以追溯到扶南王朝初创的公元 1 世纪。从这个角度来说，柬埔寨王室足以压倒只能追溯到公元 4 世纪日本皇室，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室（现任国王为第 97 世）。

吴哥窟位于金边平原的西北部，金边则位于南端。连接二者的是一条名叫“洞里萨河”的湄公河右岸支流。由于吴哥与金边之间的低洼地形，洞里萨河在这个区间得以扩张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它的另一个名称是“金边湖”，如果当年高棉人不迁都的话，就可能叫“吴哥湖”了。从控制整个湄公河平原的角度来看，吴哥其实比之金边要更为合适。在这个位置上，高棉人不仅可以向北控制湄公河中游的呵叻盆地，还更容易往西部的泰国境内的湄南河三角洲渗透。

位置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你强大之时，这样一个位置固然能够帮助你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一旦衰弱却又容易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最终逼迫高棉人迁都，并失去呵叻盆地的（同时也丧失了对上寮高原的影响力），正是崛起的泰国。只是高棉人应该没想到，当年为了躲避强敌而选定的新都，随着越南人对湄公河三角洲的入侵，在 200 多年后又变成了“天子守国门”的局面。

事实上，从高棉人手中拿到湄公河中游平原（呵叻盆地）的泰国，以及同样收获到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依然对柬埔寨最后保有的这块肥沃土地抱有极大的兴趣。高棉帝国衰弱后，这两个方向也多次对金边的存在构成直接威胁。最近的一次，就是越南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那次入侵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世界地缘政治舞台正发生着一次重大变化，退无可退的柬埔寨得到了来自中国的援手。投桃报李，



在关乎中国海洋战略的南海问题上，柬埔寨一直是中国最坚守的支持者。一切一切，都那么符合远交近攻的外交逻辑。现在我们基本搞清了柬埔寨的情况。接下来能够真正对马来地区构成威胁的“暹罗王国”，将正式登上地缘政治舞台。

## 第二节 孟人和高棉人的崛起与相争

中南半岛所有国家都在湄公河流域拥有领土，但从地缘层面上看，只有领土范围几乎全在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除沿海部分）、老挝才算是真正的“湄公河国家”。我们知道，“湄公河”一名只是中南半岛国家的叫法，在中国被称之为“澜沧江”。这条大河发源于中国的青海，再经由中国西南的横断山脉流入中南半岛。

由于澜沧江流域深切于高山纵谷之中，它本身所滋养的人口数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换句话说，这条亚洲第三大河流，在中国乃至西南的地缘政治史中影响力并不算大。不过横断山脉所收集的巨量降水，如果能够被控制起来的话，显然将对下游的湄公河国家造成影响。虽然在技术有限的古代，这一地缘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工业化之后情况则大有不同了（技术影响地缘关系的典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6年3月，湄公河流域因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严重的旱灾。中国主动开闸放水两周，以缓解湄公河平原的灾情。

除了水量的分配、调节以外，一条能够通航的河流，还能够在人流、物流两方面正面影响相关国家的关系。以侦破7名中国船员遇害的“湄公河惨案”为契机，中国与中南半岛相关国家大力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目的就是依托湄公河航运在地区经济、安全两方面，进一步拉近相关国家的地缘关系。刚才所说的放水之举，便是中国积极推进这一合作机制的努力之一。当然，“水可载舟即可覆舟”，澜沧江之水在能带来合作双赢前景的背后，所隐藏的战略威慑力也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两方面来说，老挝、柬埔寨两个完全的湄公河国家，如果跟中国在战略层面走的跟近，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相比之下，虽然在湄公河流域也拥有大量领土的（呵叻盆地）泰国，对湄公河的地缘依赖性就没那么大了。因为泰国的崛起及核心之地并不在湄公河，而是在与之相邻的湄南河。与中南半岛其它主要河流，如：越南的红河、缅甸的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怒江）的境外发源不同，发源于泰北山地的湄南河，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泰国河流。这一地理特点，决定了泰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选择，将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

然而泰人却并非最早入主湄南河平原的民族。在泰人还困居于北部山林之中时，参与湄南河平原争夺的，主要是高棉人和它的亲缘民族——孟人。在语言上，孟人和高棉人被归类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单从这个名称表述，大家也能感受到二者的亲缘关系了。一般认为，孟－高棉民族的祖先是在公元前从云南方向扩散入中南半岛的。与两族同源的，还有中国境内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

由于在印度东部发现一些与孟－高棉民族语言同源的部族，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孟高棉民族可能是发源于印度“泰卢固”地区的北部（海德拉巴一带），然后再向东扩散至中南半岛，以及中国的西南部，以至于孟－高棉语族所属的语系被称之为“南亚语系”。另一个似乎可以佐证此观点的证据是，与更加纯粹的达罗毗荼人“泰米尔人”相比，泰卢固人的基因里除了混入了雅利安人的高加索成分外，还有明显的蒙古基因存在。当然，实际的迁徙路径更有可能是反向的。就像印度东北部当年建立阿萨姆王国的泰人，是从东部扩张而来一样。

今天主要生活在缅甸的孟族，早已经成为了一个人口仅 100 多万的边缘少数民族（不到缅甸总人口的 2%）。不过在历史上，孟族却是与高棉人联手，创建中南半岛文明的民族。在高棉人经营湄公河下游平原时，缅甸核心区——伊诺瓦底江平原南部（下缅甸平原）也崛起了不少孟人国家。受印度文明影响，孟人甚至在公元 3 世纪就已在梵文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文字，这一时间比与印度距离更远的高棉人还要更早一些。不过孟人内部并没有能够像高棉人整合成一个强大帝国。孟人最后的衰弱与缅人的南迁有着直接关系。公元 9 世纪中，同样从中国境内沿伊诺瓦底江南迁的缅人（汉藏语系），开始崛起于伊诺瓦底江平原北部（上缅甸平原），并以今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西南部的“蒲甘”城为中心建立王朝。这个缅人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也因此被称之为“蒲甘王朝”。

公元 11 世纪中，蒲甘王朝沿江向下，征服了下缅甸的诸孟人政权，同时臣服了边缘高地（如掸邦）诸族，第一次完成了缅甸的统一。孟人先发的文明优势（比如佛教信仰、文字），遂就此成为了缅人进入文明序列的肩膀。可以说，今天在缅甸占统治地位的缅族，无论是文化还是血统上，都融入了大量的孟族基因。以至于你从外貌、服饰上，几乎无法分清两族。在泰国的历史中，来自缅甸的缅人王朝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历史上曾经多次入侵泰国。不过这一压力在缅甸完成第一次统一之时，还不会体现出来。一方面因为缅人还有花许多时间整合下缅甸的孟人，以及防备其它高地民族南下；另一方面则因为自信能够将帝国范围延伸到任何一片陆地的蒙古人，在攻灭大理国之后，不久便对安南、占城等中南半岛国家发动了全面进攻。

除占城、安南以外，之前因为有云贵高原独立政权缓冲（南诏 / 大理），而未进入中原王朝视线的缅甸，也首次遇到了来自北方帝国的入侵。尽管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影响缅甸的独立（只是建立了朝贡关系），但遭遇攻击的缅甸第一王朝却因此陷入大分裂。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上缅甸为来自掸邦的泰人政权所控制，孟人也在下缅甸纷纷复国（公元 1531 年，缅人“东吁王朝”重新统一缅甸，建立第二王朝）。

史前的那些民族迁徙史，与后来历史的关系也不大了。我们只需知道，在缅人、泰人这些后来民族南下之前，从伊诺瓦底江平原到湄南河平原，再到湄公河平原的这片沿海低地带，都是“孟高棉民族”的天下就可以了。这两个将中南半岛带入文

明序列的“土著民族”，一个以伊诺瓦底江平原为中心，一个以湄公河下游平原为核心，今属泰国的湄南河平原则是双方争夺的缓冲区。

最先在湄南河平原渗透成功的是孟人，公元3世纪，湄南河平原便出现了孟人建立的小国。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公元6世纪时统一了湄南河平原南部的“堕罗钵王国”（11世纪后被中国史书称为“罗斛国”）。不过高棉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几度完成了内部整合。因此湄南河平原的孟人国家，在很多时候不得不臣服于东侧的高棉帝国。高棉帝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公元12世纪。已经立国300余年的吴哥王朝，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成功。不仅以及向西征服孟人的“罗斛国”（成为吴哥王朝的属国）、还一度向东攻取了占婆王国（占城）的都城。吴哥窟便是在这一阶段作为帝国兴盛的标志，修建并成为高棉人都城的。不过一如孟人此前遭遇到来自北方的缅人入侵，而由盛转衰一样，高棉人很快也要接受来自北方的挑战了。

从位置上看，后来侵占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将是高棉人的主要压力源。不过刚刚在公元10世纪初才结束“北属时期”的安南，除了会不时骚扰吴哥王朝以外，主力扩张方向还是越南中部的“占城”。值得一提的是，占城也并不仅仅是一个悲惨的夹缝国家，相比其它中南半岛民族，占城人的海上优势十分明显。12世纪末，在与越南通过谈判取得暂时和平后，占城人曾沿着湄河河—洞里萨湖而上，攻入过吴哥王朝的都城。不过地缘实力占优的高棉人不仅很快将占城军队赶出吴哥，还反过来入侵占城成功。只是隔着长山脉，高棉人同样也很难消化掉占城。不久占城人便复国成功（1220年）。真正成为高棉帝国终结者的是来自西北方向的“泰人”。

### 第三节 泰人南下湄南河平原建立王朝

关于泰人是什么时候迁入中南半岛及湄南河流域的，并没有定论。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相关各国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比如泰国人更愿意相信，他们不仅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同族，更与人口更多的壮族同源（壮泰同源）。公元8世纪—13世纪中，先后在云贵高原建立的南诏、大理两政权也是泰人政权。甚至认为泰人的大规模南迁，源起于蒙古人对大理国的征服；中国方面则认为，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录的泰人先民政权，应该是曾经归附汉朝的“哀牢国”（今云南保山一带），并很早就扩张至中南半岛了。至于南诏、大理两国，则应该是由彝、白两族所建立的。

用现在的民族划分标准来解决古代的部族关系，本来就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好在这些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纯粹从民族迁徙角度来说，有两点倒是大体可以确定的，一是泰民族最初是在怒江—澜沧江流域形成，再沿江向中南半岛扩散的；二是泰人迁入中南半岛的时间要晚于高棉人。那些从中国境内南迁的泰人先民，顺澜沧江、怒江（掸邦的萨尔温江）南下，沿途扩散入老挝境内的上寮高原（及至越南西北部山地）、湄公河中游的呵叻盆地，以及缅甸境内的掸邦高原。部分则在南下



途中接入湄南河，并最终扩散至现在的泰国湾。

早期迁徙至中南半岛的泰人先民，都是以村寨的形式散布于丛林之间，并没有形成强大统一的王国，也因此少有记录留传下来。这种情况直到公元 13 世纪中，湄南河平原北端崛起的第一个泰人政权——“素可泰王国”（今位于泰国素可泰府），才出现改观。素可泰的位置正处在湄南河平原与泰北山地的相接处，此类山地与平原相接之地，也是大多数民族走向文明的起点。由于素可泰王国建国的时间与蒙古攻灭大理国的时间相近，因此很多泰人认为，素可泰王国的建立，与受此影响而大批南逃的泰人先民有关。不过实际上，素可泰王国立国的时间要略早于蒙古攻灭大理。从位置上看，“引领”泰人进入文明序列的，是与之相邻的孟人和高棉人。

在素可泰王国崛起之后，一方面与泰北山地的同族结盟（一如当年周人与诸羌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向原先受吴哥王朝控制的湄南河平原下游，以及相邻的呵叻盆地扩张。与此同时，之前顺湄公河而下的泰人（今天的老挝人），也已从上寮高原渗透至了湄公河中游平原。在这两个方向的包夹之下，高棉人的势力退出呵叻盆地几乎是必然。不过此时的湄公河中游平原还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板块，基本还处在丛林密布的未开发状态。包括湄南河下游平原在内的沿海平原，才是中南半岛文明的核心之地，也是各方争夺的焦点。

在中国的记录中，泰可素王国被称之为“暹国”。作为泰国第一王朝，素可泰王国在湄南河流域的统治持续了一个世纪。由于在军事上征服了湄南河平原南部的罗斛国，这个泰人建立的湄南河王国，遂被外界始称为“暹罗”。事实上，一直到上世纪 30 年代末，泰国都是一个以暹罗为名的国家。只不过从地缘范围角度看，“暹”、“罗”二字的地缘范围有限，而“泰”这个民族标签能扩张的地缘想象空间就要大得多了。这样的话，中国境内的傣族（甚至壮族）、老挝境内的佬族、缅甸境内的掸族，甚至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人等族，都可以存在于泛泰主义者的想象空间中了。

然而民族与政治从来都不是天然统一的。虽然“泛泰主义者”一如“泛突厥主义者”一样，可以用民族属性归类的方式来描绘政治版图，但落实到现实的地缘政治中，饭却还是要一口一口吃的。对于在 13 世纪代表泰民族崛起的“素可泰王国”来说，最先要做到的是，是融合已经被孟人和高棉人经营了数百年的湄南河下游地区。尊重并继承被征服地区原有的结构，是文明相对落后民族政治整合先进地区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在中国，那些入主中原的北方政权，最终的选择几乎都是在自己掌控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继承原来汉人王朝的政务体系。在孟－高棉民族占据优势的湄南河下游，泰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在政务上依靠孟人及高棉人，并逐渐学习、完成自己的文明进化。

不过与中国那些南下的北方民族最终不得被人口更多的汉人融合有所不同的是，泰人本身也是一个在北部高地已经拥有大量人口的农业民族，并非与孟人、高棉人生产方式相左的游牧民族。换句话说，在军事优势完成征服之后，泰人不用承

担因生产、生活方式转换，而丧失民族特性的风险。反过来，为了获得国民待遇，原来定居湄南河下游的孟－高棉民族，却会逐渐为泰人所融合。当然，上述融合过程的完成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这期间最大的风险在于湄南河下游原本的地缘独立性，以及更大的经济潜力。更为肥沃的土地，以及临海而获得了商业之利，使得湄南河下游地区很难愿意接受上游地区的统治。就这一点来说，如果湄南河平原一定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的话，那么下游地区将会更有机会。

14 世纪中叶，素可泰王国内部所隐含的南方问题终于显现了出来。湄南河下游的罗斛国故地，从素可泰王朝中独立出来。不过经过一个世纪的经营，此时独立的“罗斛”，地缘政治属性已经变成了和素可泰一样的泰人性质（尽管还是有高棉人和孟人在为政权服务）。由于都城设立在距曼谷约 60 公里的“阿瑜陀耶”（华人称之为“大城”），这个泰人属性的“罗斛国”被称之为“阿瑜陀耶王朝”或“大城王朝”（1350 年—1767 年）。

15 世纪初，大城王朝吞并素可泰王朝，完成了整个湄南河流域的统一。这个“泰国第二王朝”也是泰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在它的存续期间，缅人也在缅甸解决了北方掸人和南方孟人的问题，再次完成了统一，包括有：“缅甸第二王朝”——东吁王朝（1531—1752 年）、“缅甸第三王朝”——贡榜王朝（1752～1885）。这也使得缅甸开始成为泰国西部最大的压力源。上述两个缅人王朝在崛起之初，都曾经向泰国方向扩张，并攻破曼谷。后者更是直接终结了大城王朝。

大城王朝被缅人终结之后，泰国人很快便建立了“泰国第三王朝”——吞武里王朝（1769 年—1782 年）。只是这个王朝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秦、隋两朝的过渡王朝，很快便为不满其统治的贵族、宗教势力所颠覆。替代吞武里王朝统治泰国的“泰国第四王朝”，就是延绵至今的“曼谷王朝”了。之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吞武里”这个过渡王朝，倒并不是因为它挽救了泰国的国运，而是因为王朝建立者“达信”的父亲原籍中国潮汕，他还有一个叫做“郑信”的中文名（出生在泰国，母亲为泰人）。以至于这位“达信大帝”不仅在泰国历史上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更在华人圈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实际上，大城王朝的开创者（乌通王）也有传说是个华人。究其背景，概因为自宋朝而开始兴旺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东南亚带入了大量华人移民，并有机会凭借经济优势深入影响东南亚的政治结构。当然，王朝的开创者是否具有中国血统，其实是完全不重要的。就像今天泰国几乎每任总理虽然都能找到清晰的中国血统，却也不能寄希望于就此对中泰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还可以想想新加坡）一样。同样的，在泰国的内部权力争夺中，华人血统也不会产生负面影响（郑信的失败，也不是因为他的华人血统）。

相比那些权力之争，我们更关心的是泰国地缘结构的变化。所谓素可泰、大城、吞武里、曼谷，其实都是都城之名（吞武里在曼谷西邻）。除了素可泰以外，其余

三者皆在湄南河三角洲。从这一变迁也能看出，自 15 世纪起，湄南河三角洲地区便已经成为暹罗的中心。政治中心的南迁，不仅有利于泰人发展海洋经济，更对湄公河下游平原的高棉人构成了直接威胁。这其中有个有趣的位置关系，除了孤悬东北角与中国地缘关系更近的红河平原以外（越南北部），中南半岛南部的三大冲积平原带：伊洛瓦底江平原、湄南河平原、湄公河下游平原，位置上并非为平行状态，而是自西向东倾斜。简单点说，伊洛瓦底河下游平原（下缅甸），对应的是湄南河上游；湄南河下游对应的又是金边平原的北沿。



吴哥窟

在整个大陆地区都盛行的“北方压力”规律这此也有所体现。缅人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完成统一之后，对湄南河的泰人构成了压力；而统一湄南河流域的泰人，又对位置更偏南的高棉人构成了巨大威胁。由于湄南河三角洲与金边平原北部的吴哥一带，并没有天然山脉以为屏障。大城王朝自南向北统一湄南河流域之后，吴哥王朝的都城便被泰人攻破（公元 1431 年）。这使得高棉人不得不将都城南迁至金边，以依靠西北方向的洞里萨湖，以及沿海的豆蔻山脉来保护王朝中心的安全。由于人口大量迁，盛极一时的吴哥城逐渐在东南亚充沛的雨水作用下，重新恢复成了一片丛林之地。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被殖民柬埔寨的法国人重新“发现”。

而在越南人从红河三角洲南下之后，柬埔寨更是面临着双重北方压力。在失去了湄公河三角洲之后，豆蔻山脉的沿海平原甚至成为了柬埔寨仅存的海岸线。曾经的中南半岛霸主，也因此退步成为一个东南亚二流国家。

#### 第四节 缅人和泰人在马来半岛的分割线

伊洛瓦底江平原、湄南河平原、湄公河下游平原，这三大平原并非是中南半岛国家唯一的博弈舞台。在那条向马六甲方向延伸的突出部上，博弈同样精彩。基于位置和海洋经济的关系，无论是谁占据了湄南河三角洲，都会很自然的沿着海岸线向克拉地峡及马来半岛方向延伸控制力。在泰人南下之前，孟人、高棉人都曾经这样做过，泰可素、大城这两个泰国王朝也是如此。然而下缅甸的控制者，在这个方向也拥有同样的机会。从地理结构入手，会比较容易明白这点。



山脉跟河流都是非常好的地缘分割线。相比于河流的主航道，基于山脉分水岭的分割会更为合理。缅甸和泰国基于此而形成的边境线就是一条连续性山脉，包括：北部的“他念他翁山脉”、南部的“比劳山脉”。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延伸段，这条北起掸邦高原、南至克拉地峡的山脉，不仅是泰、缅两国的国境线，更是中南半岛印度洋、太平洋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简单点说，他念他翁-比劳山脉之西的河流，包括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等河流，皆流入隶属印度洋的“安达曼海”（缅甸海）；以湄南河为主的山脉以东河流，则注入归属于太平洋的“泰国湾”（暹罗湾）。

由于比劳山脉两侧并没有对应的高大山脉与之合围成大片的冲积平原，因此这条山脉本身便孤独的成为了中南半岛南部的一个突出部，并天然在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了两条海岸线。先来看看西侧的情况。从位置上看，缅甸境内的伊诺瓦底江平原，并没有接受他念他翁山脉之水。这个缅甸主平原东侧的水土，来自于掸邦高原的西麓。这片滋养了萨尔温江的高原，一直向南延伸到了印度洋，以至于在掸邦高原与他念他翁山脉之间的狭窄空间出海的萨尔温江，只形成了面积很小的冲积平原带。

今天他念他翁山脉以西，包括萨尔温江下游平原在内的这条沿海平原带，为两个缅甸少数民族地区：克伦邦、孟邦所有。其中孟邦覆盖了全部的海岸线，克伦邦则在孟邦与山脉之间。再往南的比劳山脉分水岭以西地区，则属于缅甸中央政府的直辖省——德林依达省。就地理属性来看，克伦邦、孟邦、德林依达省其实属于一个板块，这条背山靠海的狭长地带，有一个专属地缘标签“德林依达海岸”。历史上，孟人是最早从伊洛瓦底江下游，向德林依达海岸渗透成功的民族。13世纪末，缅甸第一王朝（蒲甘王朝）因蒙古入侵而分裂之后，孟人曾经在下缅甸及德林依达海岸复国成功，建立“白古王朝”（中国称“大古刺”）。只不过16世纪中，缅人的“东吁王朝”崛起并统一上下缅甸之后，孟人便基本退出地缘政治舞台了。地处边缘的德林依达海岸，成为了孟人最后的保留地。

缅甸独立后，丹林依达地区的北部、西北部，先后划出了孟邦、克伦邦两邦。后者在族源上，与缅族以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克钦族同源（著名的“长颈族”便是克伦族的一个支系）。缅甸境内的行政结构目前为7省7邦，其中直属中央的“省”在居民结构上以缅人为主，其余位处边缘的每个“邦”，都对应一个少数民族。相对其它六个位处伊诺瓦底江中下游的缅人“省”，德林依达省的存在宛如一块飞地一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事实上，在孟人覆盖湄南河下游时，比劳山脉东麓也同样是孟人的天然扩张区。在孟人衰弱，泰、缅两族分别在他念他翁山脉两侧崛起之后，两族的博弈也延伸到了比劳山脉这个突出部上。

总的来说，基于地理方面的原因，比劳山脉之西的德林依达海岸，大多数时候都还是处在缅甸政权的控制之下，泰人则牢牢的控制着山脉东麓的岸线。理解这点并不难。毕竟德林依达海岸与伊洛瓦底河平原海、陆相连，缅甸政权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海路来施加控制力；同样的道理，泰人以及之前称霸泰国湾的高棉帝国，在控

制比劳山脉东侧也有绝对的优势。比劳山脉的存在，完美的解决了泰、缅两国的平衡问题。不过比劳山脉并非是中南半岛这个突出部的全部。在这条狭长陆地带的的最南端，马来人依靠大汉山脉及马六甲海峡所带来的双重优势，抵御着来自大陆方向的侵袭。至于到底是由谁，缅人还是泰人来具体展现大陆威胁？还是需要从基本的地理结构着手。需要先厘清的一点是，尽管东西纵深最窄的克拉地峡，看起来似乎更应该充当中南半岛民族与马来民族的地缘分割线，但事实上地缘分割这件事，从来不是简单的几何画线问题。山脉、河流的走向才是决定性因素。

## 第五节 泰人在马来半岛南部控制的区域

整个比劳山脉－马来半岛地区的轮廓，很像一条中间自然弯曲、踏向马六甲海峡的马腿。位于克拉地峡之南的马腿关节部，才是真正的枢纽点。在地形图上，这个轮廓呈现为平行四边形的关节部位，地理边界是由两段山体及两段海岸线所标定的。其中两段山体包括有：北部与比劳山脉相接的“普吉山”、南部与大汉山脉相邻的“銮山”（均为南北走向，长约 280 公里左右）；两段海岸线则分别与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曼谷湾）、西南方向的印度洋（安达曼海）相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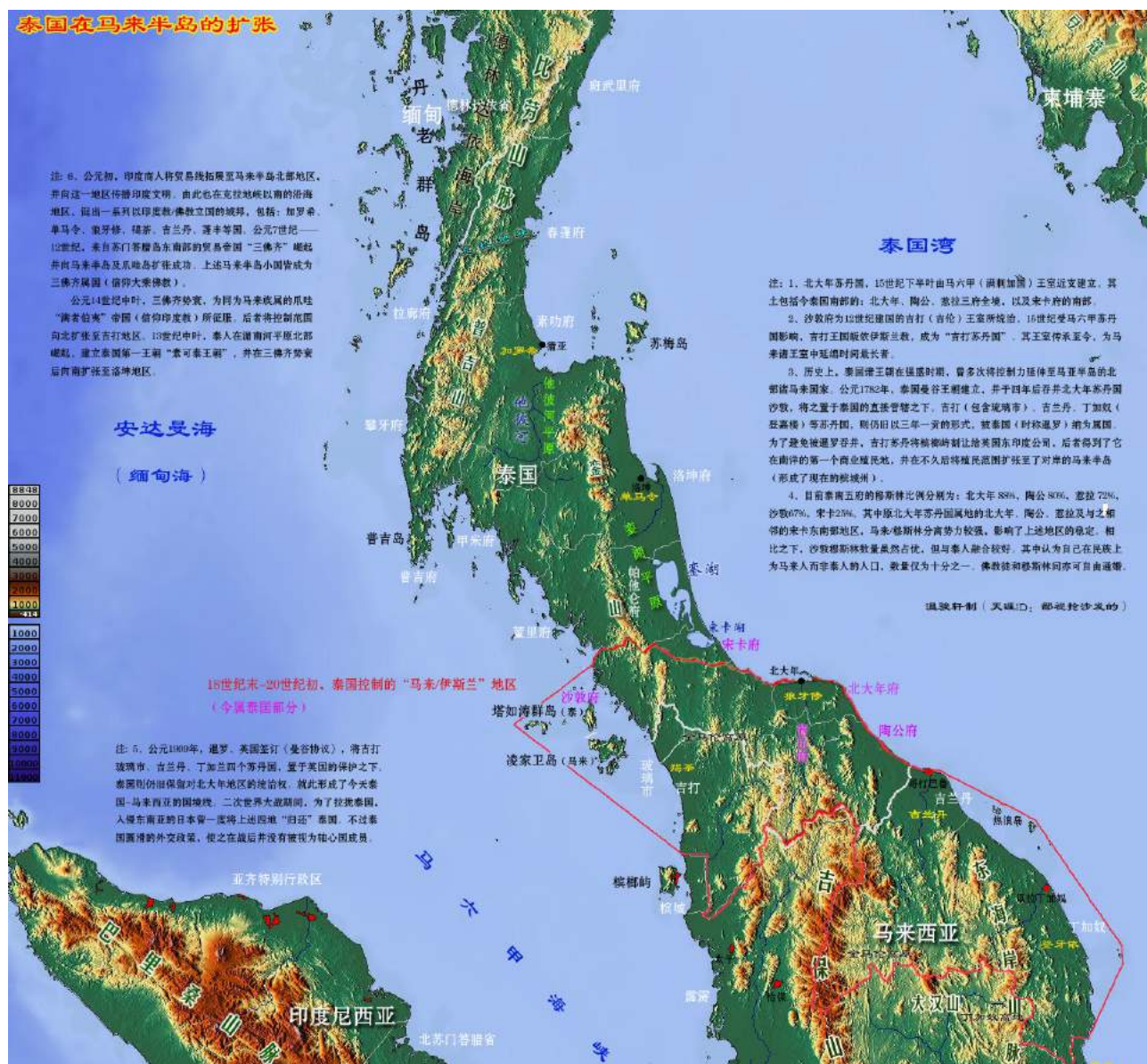
銮山与普吉山之间的这片土地，整体呈现为南高北低的冲积平原状态。按照一般经验，其间必然有一条较大河流来帮助我们为之命名。事实也的确如此，流经其间的是一条由泰王亲自命名的河流——“他彼河”。他彼河也是泰国南部地区最大的河流，经略他彼河平原的行政区，则是泰国的南部“素叻府”（华人称“万伦府”）。由于比劳山脉本身与海洋结合太紧，无论是它西侧的缅甸部分，还是东侧的泰国部分，人口密度都远不能和北部的大平原区相比。比如缅甸方向的德林依达省，面积比海南省还要大，但总人口却只有 120 万。相比之下，面积仅为德林依达省 30% 的素叻省，却因为低地面积的优势，滋养着与之同样多的人口。

在远离大陆腹地的另一端，有一片豁然开朗的平原地带，其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泰国还是缅甸，谁掌握了他彼河平原，谁就有机会继续向南扩张，同时也能更好的拱卫北部岸线的安全。既然这片平原主要是由“他彼河”滋养的，那么判断谁更有地缘优势就很简单了。河流的走向将决定一切，因为入海口在哪个国家一侧，哪个国家就能够很方便的通过水路渗透至平原腹地，进而控制整个板块。至于这条泰南第一大河的走向如何，大家可以先自行在地图上查找一下。接下来，中南半岛与南洋群岛的碰撞，将正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他彼河的源头在普吉山和銮山的南端，向北注入泰国湾。这意味在这片土地上占据优势将是泰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地理因素对泰人颇为有利：首先他彼河平原距离泰国中心地带的距离，比之缅甸的中心地带要近得多。从伊诺瓦底江三角洲的仰光，南下他彼河源头的陆地距离在 1200 公里左右，而从湄南河三角洲的曼谷



到他彼河口只有 600 公里；其次，比劳山脉西侧的地理结构要更为复杂些，远古的地质活动甚至在缅甸方向形成了一条与比劳山脉等长的岛屿带——丹老群岛。这一切，都使得缅甸在南下扩张并融合孟人时，遇到比泰人更多的挑战。控制“他彼河平原”对于素叻地区所获取的地缘优势，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大。比劳山脉在这个位置已然势衰，他彼河平原西侧与印度洋之间并没有高大山脉阻隔，其源头处距离安达曼海的直线距离仅有 10 公里。这使得控制了他彼河平原的泰人，很容易就能够向西获得印度洋出海口，并使之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地跨两洋的亚洲大陆国家。



## 泰国在马来半岛的扩张

在泰人获得的印度洋海岸线中，不仅包括普吉山与銮山之间部分，还包括普吉山西麓的岸线。在这段长约 700 公里的印度洋海岸线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当属普吉山南端，在印度洋中的那个突出部——普吉岛了。当然，这本身与其印度洋的位置



并没有关系，而是与纬度有关。在他彼河平原以东的泰国湾一侧，同样低纬度的苏梅岛也是体验热带海岛风情的目的地。只是相比之下，泰国在印度洋一侧的海岛数量要更多罢了（除普吉岛之外，还有瑶诺岛、帝王岛等很多选择）。可以说，如果比劳山脉再往南延伸一些，能够与马来半岛的大汉山脉对接，而不是在中间拉开一个空当的话，不仅会让今天的泰国损失不少绿色 GDP，更有可能大大压缩“克拉地峡”计划的想象空间（如果不完全归属一个国家的话）。事实上，以他彼河平原为依托，泰人还进一步向南压缩了马来人的空间。

如果一定要为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找一条地理分割线的话，銮山其实比克拉地峡更为合适。銮山不仅与普吉山－比劳山脉之间拉开了一个他彼河平原这个空档，与大汉山脉之间也是如此。这片位于銮山东麓的沿海平原，行政上包含有今天泰南的洛坤、帕他仑两府，以及宋卡府的北部。区域内最引人注目的地标，是身处帕他仑、宋卡交界处的大湖——銮湖，整个平原地带中南部的河流基本都是先汇入此湖，以及它的附属湖泊“宋卡湖”，然后再注入曼谷湾的。为此，我们也可以将銮山以东的这个地理单元标定为“銮湖平原”（虽然平原北部洛坤境内的河流，实际都是独流入海的）。

在马六甲海峡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主航路之前，亚洲东部与西方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多是经由克拉地峡以南至大汉山脉之间，以銮山为中心的这两条平原带之间来进行的。从印度洋方向而来的商人会尽量沿河深入内陆，然后在河流分水岭附近登陆，再将货物通过陆路转运到太平洋流域河流上的船只，以“海－陆－海”形式打通物流通道。基于銮山在其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我们可将这条贸易通道称之为“銮山通道”。最先发现这一商机的是来自南印度的商人。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印度人也在这个銮山通道建立了一系列贸易城邦，并为之带入了以印度教、佛教信仰为表现形式的印度文化。进入中世纪后，随着东南亚本土势力的崛起，印度文化虽然在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仍然具有很深的影响，但却逐渐退出了地缘政治舞台。

基于銮山通道的海洋经济属性，在海洋经济中有先发优势的东南亚民族，将最有机会从印度人手中夺取通道的控制权。在东南亚诸政权中，做到这一点的是来自苏门答腊的三佛齐。位于通道居中位置的“洛坤”地区曾经是这个海上贸易强国重要的贸易中心。今天这座城市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三佛齐时代留存下来的佛塔（约公元8世纪）。13世纪，随着三佛齐帝国的衰弱以及素可泰王国的崛起，马来人逐渐丧失了在这个枢纽地区的控制权，南下的泰人成为了洛坤以及銮山通道的控制者。至于中南半岛的另一个竞争者——缅人，则还在为融合下缅甸及德林达依海岸的孟人而努力着。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三佛齐是佛教的传播者，泰人的最终信仰也是佛教，不过二者之间的选择却仍然有很大区别。即三佛齐所传播的是大乘佛教教义，而泰人和中南半岛大部分民族所接受的，却是“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

同样选择小乘佛教的锡兰（同时遭受过三佛齐入侵），是泰国佛教的重要传入地。

这背后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意义，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另外，越南北部的佛教徒，所信仰的也是与中南半岛其它民族不同的的大乘佛教（与中国相同）。这一选择同样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总的来说，拥有海、陆两条渗透路线，并且内部更容易整合为一体的中南半岛民族，最终在控制“釜山通道”的问题上更具优势。

14 世纪中叶崛起的泰国第二王朝（大城王朝），不仅将泰人政治中心南迁到湄南河三角洲，也随之加强了对他彼河、釜湖两大平原带的控制，并试图进一步向马六甲方向扩张。不过稍早一点，来自爪哇的“满者伯夷帝国”已经崛起。这个马来-印度教国家不仅征服了大汉山脉周边的马来人城邦，更几乎统一了所有进入文明序列的“马来世界”。中南半岛与马来地区的地缘政治分割线，大体也正是在大城王朝与满者伯夷帝国时期形成的。当然，今天的泰国控制线实际还要再向南一些，而马来世界的地缘结构包括政治结构，也与满者伯夷时代有所变化。至于这些变化是怎么形成的，又受到了哪些外来因素影响，我们后面会有解读。

由于湄南河平原在渗透马来半岛的问题上，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因此中南半岛民族能否在对抗马来势力北上的问题上占据优势，取决于湄南河平原是否能够整合为一个强大国家（而不是仅为某个帝国的边缘地区）。暹-罗两地统一为泰人国家之前，湄南河下游地区属于高棉人与孟人势力相争的缓冲之地，战略上比较难做到这点。在素可泰王朝代表泰人做到这点后，“泰”民族便成为了中南半岛渗透马来半岛的代言人。整个马来半岛的南北对抗形式，也开始朝着有利于北方的方向发展。泰人取代孟-高棉民族，代表中南半岛民族强势南下之后，马来人方面的情况也一直在变化当中。在三佛齐强盛时代，这个贸易强国曾经将控制线向北推至克拉地峡一线，将整个马来半岛纳入了自己的政治版图。建立在今泰国境内他彼河平原（素叻府）、釜湖平原（洛坤-宋卡一带）的加罗希、单马令等小国，都为三佛齐的属国。

## 第二十四章 三佛齐的灭亡对南洋格局的影响

### 第一节 满者伯夷攻灭意图再坐大的三佛齐

14 世纪中叶，崛起于东爪哇的“满者伯夷”帝国，在马来世界取得了比三佛齐更大的成功，几乎统治了所有已知（或者说进入文明序列）的马来国家。不过在马来半岛方向，爪哇人取得的成就并不比三佛齐更高。今马来西亚位置最北的“吉打”地区，是满者伯夷帝国控制线的北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就是泰人已经统一了湄南河流域，并且将控制线渗透至銮湖平原一线。以今天的政治归属来说，满者伯夷的历史成就无疑应该归属印尼。就印尼境内的地缘政治博弈来说，又主要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问题。在三佛齐称霸之时，曾经多次遭遇来自爪哇的挑战。在满者伯夷巅峰期后的 14 世纪末，最先动摇帝国基石的力量，同样来自于苏门答腊的三佛齐之地。

相比中南半岛那些建立在大河冲积平原，并且可以从海、陆两线向边缘地区扩张的大陆国家来说，群岛性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稳定性。比如现在自视内部凝聚力超强的日本，在大部分历史时段，内部也都是处在分裂当中的。满者伯夷虽然和三佛齐一样，凭借海上优势称霸一时，但南洋诸岛的开放性，使之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爪哇人早在 14 世纪叶就已经征服了三佛齐及其它马来国家，但这些国家的旧王朝基本都得以保留。换句话说，就是以属国的形式存在于满者伯夷的政治框架内。

从地缘基础来看，三佛齐之所以成为最先崛起的马来政权，得益于它在海洋贸易上的先发。当然，只有垄断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在三佛齐强盛的时代，来往于马六甲航线的东西方商船，如果不经停三佛齐所设立的关卡，就会受到舰队的袭击。事实上，这也是海上争霸的常见手段，后来的满者伯夷、葡萄牙也都有类似的做法。然而苏门答腊岛也有它的短板，那就是人口潜力没有爪哇岛大。在来自爪哇的满者伯夷，借助元朝远征军留下的军事遗产补上这块短板后，情况开始变得对苏门答腊岛不利。换句话说，即使满者伯夷逃不过兴亡周期走向衰弱，下一个取而代之的马来政权，也很有可能来自于爪哇岛。

为了重振雄风，三佛齐希望得到域外力量的支持。在穆斯林已经垄断印度洋海上贸易的情况下，阿拉伯商业集团看起来是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对于已经在马六甲海峡西端取得这个支点（巴塞苏丹国）的阿拉伯商人来说，也热切希望能够在位置更佳的海峡东端做到这一点。不过伊斯兰势力在介入南洋地缘政治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提供支持。在离南洋最近的印度，德里苏丹国虽然名义上控制印度北部，但内部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至于贸易线的另一端，



控制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也正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以至于在 15 世纪初差点被来自中亚的帖木儿所灭。更何况这两股源自亚洲草原的力量，本身对海洋缺乏兴趣。对他们来说，在自己领地范围内对来往的商人收税更为简单。这也是为什么在政治上已经无足轻重的阿拉伯人，却还能够垄断印度洋贸易，甚至在东非海岸建立一系列贸易城邦的原因。

与阿拉伯人相比，在南洋贸易的另一个方向——中国，直接介入南洋地缘政治的基础要好得多。13 世纪末策动远征爪哇之战的“元朝”，就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尝试。公元 1368 年，乞丐出现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在长江下游的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并于同年将蒙古人的势力驱逐出了长城以南地区。既然马上出身的蒙古人都可以借助前朝留下的遗产介入南洋政治，那么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重建的中央帝国，自然也有可能这样做了。

明朝在建国之后也的确如当年的元朝一样，很快着手继承前朝地缘政治遗产的工作（遣使前往南洋各国）。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东部终端，中央之国的每一次政治变化，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即使出于纯粹的维护正常贸易往来的考虑，相关国家一般也会及时按照中央帝国所希望的那样，对新朝进行“朝贡”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已经衰弱为爪哇属国的三佛齐，会很愿意看到这次变化能够对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有所帮助。不过这种愿景能否实现，还要看爪哇人会不会还那么不识时务。

尽管爪哇人当年曾经因拒绝纳入元朝朝贡体系而遭遇直接攻击，甚至直接从元征爪哇之战中受益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但显然处在巅峰期的满者伯夷，并不愿意再次承受这样的风险。元朝的那次失败远征，已经证明了南海并不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如果不是满者伯夷随之马上采取了务实合作的态度（主动朝贡），来自中国的远征军很可能还会再次到来。有鉴于此，满者伯夷和三佛齐一样，都第一时间向中央之国的新统治者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虽然 30 多年后，郑和曾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深度介入了南洋政权，但在此时，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还没有精力去关注海外的利益。彻底解除蒙古高原的威胁及完成内部整合，才是这个新帝国最急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三佛齐和满者伯夷对中国的新王朝寄予了什么样的政治期望，短期内都是无法实现的。

在前往南京进行朝贡之后，三佛齐的统治者显然也意识到，暂时没有办法得到来自明王朝的直接帮助。为此他们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大量来自中国东南部的移民，于“洪武”（朱元璋的年号）年间开始被引入苏门答腊岛的东南。这些中国移民一方面帮助三佛齐进行农业开发（这也是三佛齐的短板），另一方面也深入参与了三佛齐的政治和海外贸易。虽然基于商业的原因，爪哇岛也同样有华人前往各港口定居，但因为爪哇在政治上的强势，以及更为密集的人口数量，那些定居爪哇各港的华人暂时没有机会显露出更大影响力。

受海洋贸易影响极大的马来世界，国家往往是围绕着一座港口城市而兴起的。

三佛齐的中心原来在岛屿东南、穆西河下游的“旧港”（马来语发音 Palembang，音译“巴邻旁”）。一如很多我们熟知的东南亚地名一样，这个名称也是一个中文名，名字的含义与其文字本意一致。之所以会有这个名称，是因为满者伯夷在征服三佛齐后，对旧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三佛齐的政治中心转移至了北部哈里河下游的“占碑”。不过现在，这个河港城市的名字多标注为“巨港”，概源于闽南语中“旧”、“巨”同音。相比“旧港”之名，“巨港”要更有气势罢了。

无论是巨港还是占碑，其所对应的海区位置都处在马六甲海峡与爪哇岛之间的航路上，当年三佛齐也正是凭借这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区位优势称霸南洋。为了避免三佛齐的再次坐大，满者伯夷最终还是攻灭了这个本已臣服的属国。关于具体的征服时间，有公元 1377 年、公元 1397 年两种说法（都是在洪武年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期间满者伯夷对三佛齐发动了持续战争，最终直接彻底击垮了这个曾经纵横两洋的国家。如果说爪哇人做出这项决定，有担心三佛齐从中央帝国新王朝得到帮助的成分，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 第二节 梁道明与陈祖义控制三佛齐故地

尽管三佛齐原有的马来王室彻底结束在旧港－占碑一带统治的时间不是十分确定，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随着三佛齐势力的消散，原先被引入的中国移民开始迅速填补留下来的政治空间，并与当地居民一起抵御满者伯夷的统治。不过就像不是说“马来人”就一定会在政治上统一一样，以复兴“三佛齐”为口号的华人势力内部，也同样存在着竞争。占碑、旧港两座曾经的三佛齐都城，是这两股势力各自割据的支点。

这其中控制占碑的华人领袖，是来自广东南海的“梁道明”。相比这个名字，后来取代他位置的副手“施进卿”，知名度要更高些。后者的名声，直接来源于他帮助郑和击败海盗“陈祖义”的功绩。而祖籍广州潮州的陈祖义，所代表的就是盘据于旧港的另一股华人势力。除了祖籍相近以外，双方的另一个共同点则是都希望从三佛齐的政治遗产中受益（都自称新三佛齐国王）。当历史推进到 14-15 世纪相交之际，华夏文明在海外的政治扩张，终于在不经意间靠这两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迈出了第一步。

以这个世界的地缘基本形式来说，无非是两大类型：大陆和海洋。前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严重依赖土地本身的产出（如农产品，各种自然资源）；后者的繁荣则依靠贸易所带来的利差。当然，一切都只是相对的。一个被定义为大陆属性的国家，也会希望有机会补足自己在海洋上的短板；一个严重依赖海洋贸易的政权，如果有直接控制商品产地的机会，也同样不会放过。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在印度文明影响力退却以后，代表印度洋势力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代表太平洋势力的

中国移民，将是竞争南洋地缘舞台主导权的两大势力。在穆斯林已经在苏门答腊岛北部成功取得地缘政治突破的情况下（巴塞苏丹国），以复兴“三佛齐”为名的中国人，看起来是很有机会在位置更好的南部地区扳回一局。毕竟人口是中国的一大优势，而阿拉伯人并没有大规模迁入马来地区的基础。

不过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实际情况总是更为复杂。愿意渡海南迁的中国人，本身就是这个族群中最适应海洋的人。因此在三佛齐的旧地，两股渡海谋生的华人力量，在取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控制旧港的陈祖义部，更青睐三佛齐立国的原始优势。这位后来被中国认定为“海盗”的华人社团领导者，招募了一支人数过万、战舰过百的舰队，通过控制来往于马六甲海峡、爪哇岛的航路以获利；相比之下，以占碑立足的梁道明部，走的更像是传统的以人口、农业为基础的立国之路。有记录表明，仅仅十年时间就有数万来自广东沿海的民众举家来投。

中国人几乎是世界上最不愿意主动迁徙的民族。历史上为了充实新征服的边缘地区，往往需要动用国家强制力才能够做到。能够吸引深深依恋土地的中国人，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迁徙至南洋，除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长久以来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以及本属热带气候环境所缩减的心理障碍（离开故土）外，显然还有苏门答腊那些尚未得到开发的土地的功劳。

### 第三节 阿拉伯人在南洋传播伊斯兰教的方式

如果说中国势力的渗透，核心目的和手段在于“居”的话，那么阿拉伯人则是“商”了。从他们在陆地上扩张影响力的经验来看，“伊斯兰教”的传播才是地缘渗透的利器。将因政治征服而引发的宗教传播形容为“硬传教”的话，依靠商业影响力进行传播的方式，就属于“软传教”了。南洋的伊斯兰化，就是典型的“软传教”。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用商业利益及看起来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吸引贸易合作地区的上层人士加入；二是向下传播；三是以伊斯兰教法立国。就第一阶段来说，身份认同所能减少的贸易信用成本，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解读过了。比较要关注的是后一点。所谓“文明”其实并不仅仅是通过那些高大建筑、技术成就来体现的，更多是通过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行为而表现出来的。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伊斯兰世界因一些保守的做法，生活方式看起来已经不那么“潮流”了，但在中世纪却并非如此。尤其在与甚至不提倡洗澡的中世纪做对比的天主教世界的情况下。

对于一直接受外来文明影响的马来族群来说，南洋诸岛聚居的穆斯林社区及华人社区，在生活起居细节上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吸引力。二者相比的话，伊斯兰教义那些对生活细致入微的约束性规定，尤其将卫生要求赋予宗教意义的做法，又使得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行为方式看起来要更有仪式感，进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穆斯林



每日需要礼拜五次，并于事前做身体清洁工作）。千万不要小看了“仪式感”所产生的吸引力。对于任何意识形态的传播来说，能够让受众明确感受到身份认同、提升的仪式非常重要。比如加入某一宗教组织或者党派时，以洗礼、宣誓等手段，就是比较常见的“仪式”帮助完成身份转变的方式。通过仪式，可以使受众在心理上开始融入自己的新身份，以及和过去划清界线。

在一些邪教传播、传销活动中，从心理上绑架受众的极端性“仪式”，更是花样百出。比如最近网络上热传的所谓“尼姑结婚”视频，实则是一个名为“五行币”的非法传销组织所搞的活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另类的现象，是因为这个非法组织要求骨干，无论男女都得剃光头（重点在于女性）。对于一个受蛊惑的女性来说，当她的满头青丝被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剃去时，也就意味着从心理上跨入了一个很难挣脱的陷阱。

回到伊斯兰教“软传教”的话题上来。被传播地区的上层人士接受伊斯兰教后，传教者第二步会做的，就是帮助这些上层人士向治下的民众传播教义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传播并不一定代表彻底的“伊斯兰化”，还会或多或少的保留以前的信仰痕迹。这一点，在今天的马来地区依然可以感受到。比如很多人通过早期香港电影所了解到的，流行于南洋的“降头术”，就是原始宗教的遗存。

仅仅作为一种信仰存在宗教场所中，并不符合伊斯兰的原始教义。将教法融于整个政治、法律系统，实现政教合一，才是先知穆罕默德创教的本意。依《古兰经》指导而建立的教法实施体系，又被称之为“沙里亚法”。在这一体系之下，精研教义的阿訇，同时又会兼有法官的职责。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依靠一个体系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法律管理的统一。如果说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一定程度的集权能够有利于个体的竞争力的话，那么“沙里亚法”的确能够帮助一个族群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组织松散且处在文明边缘的阿拉伯人，在得到伊斯兰教助力后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

当然，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所有有先进性都是比较当时的竞争对手而言的。时至今日，无论是“沙里亚法”还是东西方的其它文明的类似做法，在工业时代都已经不适用了。比如在工业时代，人类可以依靠对能源的运用，极大降低自身的体力付出，男性在体力上的天然优势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大降低。换句话说，女性在现代社会所能发挥的经济影响力，将远甚于古代。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女性依教法束缚在家庭和头巾之下，对自身的竞争力影响将是致命的。

另一个可供借鉴的对比，是中国与日本在关于解决女性工作问题上迥然不同的做法，以及所导致的深远影响。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老龄化问题其实并没有邻国日本那么悲观，即使未来发展到日本的经济程度和人均寿命阶段。能做到这点，与当年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型有着直接关系。尽管当时的做法整体上有些矫枉过正（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但最起码在这点上，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好了，现在我们明白了，不管伊斯兰教的教义，以及沙里亚法在今天是否有重新适应环境的需要，但对于当时的马来社会的整合来说，却是有着正向作用的。在14世纪末，阿拉伯商人在南洋很多港口城市，其实已经做到了第一步。即吸引部分马来本土的上层人士接受信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强大的满者伯夷眼皮底下进入第二阶段，直至进入第三阶段：复制出更多的“巴塞苏丹国”。三佛齐被满者伯夷攻灭所引发的动荡，在战略上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不过人口占优的中国人，已经及时填补了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政治空间。如果试图抓住机会的阿拉伯商团还希望有所作为的话，需要另寻机会。在政治上，衰弱的“三佛齐”将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资源。这个纵横南洋数百年的强大海上帝国，留下的地缘政治遗产不会那么快消失。

自称“三佛齐国王”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了三佛齐地缘政治遗产的价值所在。至于阿拉伯人的做法，则是在三佛齐王室中寻找一个愿意皈依伊斯兰教的合伙人，并依靠其在马来人中的影响力构筑政治版图。不过仅仅做到这点还是不够的，毕竟三佛齐旧地的政治空间已经被中国人填充。在中国移民源源不断的输入，以及不明了中国新王朝态度的情况下，与这些中国人展开竞争并非明智之举。阿拉伯商团和他们的合作者，需要另外寻找一片土地来完成政治目标。

这片用来复制“巴塞苏丹国”模式的土地，应当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应该在原三佛齐的势力范围内的马来地区，如此才有地缘遗产可说；二是在重要航路之上，这样才符合阿拉伯商人的利益。如果有这样一片合适的土地建港、建国，那么阿拉伯商人就可以将商船源源不断的引入这个新“伊斯兰 / 三佛齐”城邦停泊，并使之成为南洋海上贸易中心。反过来，有了贸易垄断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这个新国家也将为阿拉伯人的利益提供有力保护。那么有没有这样一块土地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马来半岛之南，与马六甲海峡相接那条海岸线，将是最合适的选择。这条海岸线今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所有，其中位于海峡入口的新加坡，位置看起来尤为重要。至于最终的选择是哪里，又面临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挑战，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四节 马来西亚的族群和地理结构

对于试图在南海和印度洋有所作为的中国来说，马来西亚以及从它当中分裂出来的新加坡，有着不可替代的地缘政治地位。同时马来西亚华人数量不仅是海外诸国中最高的（总计约有700万，总人口占比1/4），也是海外中华特征保存完整度最高的社群。像大家熟悉的杨紫琼、李心洁、梁静茹、光良 / 品冠、巫启贤、阿牛……等明星，都来自于马来西亚。如果不说的话，相信在很多人心中，这些演艺明星无论如何是很难和“外国人”划等号的。因此无论是从探究复杂地缘关系形成的维度，

还是服务于现实地缘政治目标的角度来说，马来西亚的形成都值得我们多费些笔墨。

一个国家有一些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少数民族，几乎是现代国家的常态。然而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已经不能简单用“少数民族”来定义了，更何况华人在经济上还有绝对的优势。如何弥合两大族群之间的分歧，成为了马来西亚必须面对的问题。顺便说一下，马来西亚华人并不能被简称为“马华”。因为在马来西亚，“马华”是最早建立的华人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的简称。比较合适的称呼，是“大马华人”。在这个问题上，之前解读过的伊朗似乎能够提供一点借鉴。在大家的印象中，伊朗是个“波斯人”的国家。然而实际上，波斯族在伊朗人口中的占比为2/3，只是刚到绝对优势线，另有1/4源出突厥的阿塞拜疆人，以及5%的库尔德人。这个比例，几乎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的比例相同。



马来西亚人

同时，长期的磨合还为波斯、阿塞拜疆两族在文化上找到了弥合差异的共同点，那就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什叶派的国教地位，正是在阿塞拜疆人统治时期得以定型的。可以说，今天的伊朗一定要让什叶派最高领袖坐在权力之巅，很大程度就是为了解决波斯、阿塞拜疆两大民族的矛盾问题。然而伊朗的经验并不适用于马来西亚。要知道，穆斯林群体与华人群体都素以封闭著称，今天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族群之间亦是各成体系、泾渭分明。最起码在宗教层面找到一个调和点，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两大族群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建立

从感觉上来看，伊朗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差异，看起来并没有马来西亚那么突出。历史及宗教是阿塞拜疆人与波斯人达成共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历史上，自公元999年的伽色尼王朝起，突厥人曾数度在伊朗高原建立政权。可以这样说，在1925年建立的伊朗末代王朝“巴列维王朝”之前的一千年的历史中，除了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伊尔汗国）统治时期以外，伊朗的最高统治者都有着突厥背景。

统治阶层的突厥背景，并不必然导致其与人口占优的波斯人之间的对立。更多的是在时间的磨合下，找到共同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在面临巨大外部压力时。



的历史上，有没有过合力点了。

地缘政治的基础在于地理，先来看看马来西亚的地理结构。对于一个海洋国家来说，领土内部为海洋所分割是一件再正常不过事情了。群岛结构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完成统一（比如日本）。不过马来西亚的结构倒颇有些特别，除掉沿海岸线分布的那些细碎小岛以外，马来西亚内部分为二块：马来亚和婆罗洲。其中马来西所指的就是马来半岛部分；婆罗洲指向的，则是马来西亚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领土（加里曼丹是印尼人对此岛的命名）。以方位来划分的话，可以将之分为“西马”和“东马”两部分。西马实际上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而东马又和印尼、文莱两国三分一岛。



马来西亚地图

如此结构，自然很容易让人产生感到疑惑：今天的马来西亚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结构又是否稳定。要知道上一个被如此分割，并且有强邻在侧的国家——巴基斯坦，已经在1971年失去了它的“东巴”（孟加拉国）部分。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背景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都属于原英国殖民地，它们独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

都是由英国一手操办的。

很显然，这一切都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地缘遗产有关。不过把锅全扣在英国人头上，也有失偏颇。作为一个商业本质的帝国，英国在殖民时代的作为，更多是建立上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到底是真正的殖民（移民实土）还是与当地统治者合作，更多取决于哪种方式能带来最大的直接收益。一般来说，一个地区文明层级越高、人口密度越大，羁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会为大规模移民开发留下可能性。印度和美国这两个曾为大英帝国统治的“一类地缘政治版块”，就是这两个方向的典型案例。在马来西亚内部，也存在着这种差异。从面积上来看，东马地区要更占据优势。

不过“地缘”属性的界定，从来不是只看面积的。单从马来西亚的得名来看，马来亚地区似乎应该地缘地位更高。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如果说一定要在两个地

区中划出核心区和边缘区来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区就是“马来亚”地区。马来西亚地缘政治、文化的起点，是位于新加坡和吉隆坡（马来西亚首都）之间的“马六甲”。今天马来西亚内部共分为十三个州级行政区，马六甲便是其中之一。

与新加坡一样，马六甲州也是一个典型的城邦式行政区。一座城（马六甲市）加上周边的郊区，便是其所有了。只不过，新加坡阴差阳错的跻身国家之列，而马六甲则在马来西亚谋得了一个一级行政区的待遇。不过马六甲无论作为一座城还是一个州，名气现在都不算大。马六甲这个标签为世人所知晓，更多是源自于“马六甲海峡”之名。只是能够在沿线众多竞争城市中脱颖而出，足见马六甲这座城市曾经有过一段辉煌历史。至于这段辉煌历史指的是哪一时期，下一节接着解读。

## 第五节 马六甲王国的建立及其伊斯兰化

公元15世纪初，从苏门答腊岛渡海而来的旧三佛齐王族“拜里米苏拉”，先是在位置更突出的淡马锡，也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建国。后迫于暹罗人的压力，被迫沿海岸线向西另觅新港复国，其最终选中之地便是今天的“马六甲”（二者距离约200公里）。公元1405年，在阿拉伯商团势力的支持下，源出旧三佛齐-马来王室“马六甲王国”正式建立。历史上，这个王国更多以“马六甲苏（素）丹国”留名于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马六甲王国的建立以及向政教合一的“苏丹国”转变，实际上经历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从公元1397年，拜里米苏拉前往淡巴锡建国开始，这个过程历经整整半个世纪。也就是说，当年郑和七下西洋，六次停靠马六甲时，他所见到的其实还不是一个苏丹国。

当然，从传承的角度来说，马六甲苏丹国甚至马来西亚，把自己国家的时间源点追溯到拜里米苏拉在马六甲立国的时间（公元1405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厘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为之前我们所说的伊斯兰教的“软传教”提供一个典型样本。在以商业为诱因的“软传教”过程中，上层信教-全民皈依-政教合一，这三个步骤是需要时间来推进的。事实上，拜里米苏拉本人真正决心成为一个穆斯林的时间，很可能也是在立国之后的公元1414年。在那一年，马六甲王国的创始人迎娶了来自巴塞苏丹国的公主。当然，这并不代表拜里米苏拉在此之前，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义。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开始只是将伊斯兰教视为可以与佛教、印度教相容的宗教。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同时代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郑和，就因为也同时接受过佛教思想而让后人困惑于他的信仰。

郑和在信仰上的模糊处理，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毕竟在明朝国民信仰佛教、道教等本土（化）宗教的情况下，一个将自己用排它信仰封闭起来的虔诚穆斯林，在政治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空间的。同样基于考虑到环境，一个原本应信仰佛教（也可以是印度教）的三佛齐王族，在是否做一个穆斯林问题上的犹豫也是可以理解的。毕

竟这种转变虽然可以获取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却也可能丧失其在原来马来族群中的号召力。一个中国人较为熟悉案例，就是太平天国。尽管洪秀权“改良”过的基督教组织（拜上帝会）在初期曾帮助太平天国取得成功，但最终却还是因没有办法兼容儒家文化，而丧失了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失败）。

不管马六甲王国的创立者在信仰上是否经历过纠结，在大历史层面上，马来世界的伊斯兰进程都已拉开了序幕。与志在整个马来世界的爪哇人（满者伯夷）不同的是，马六甲王国的创立者暂时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受限于人口潜力，力图在马来半岛及新加坡海峡扩张是比较现实的目标。最终马六甲苏丹国也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个方向是一定会受到暹罗阻击的。至于有没有什么战略窗口能够帮助马六甲王国做到这点，后面会有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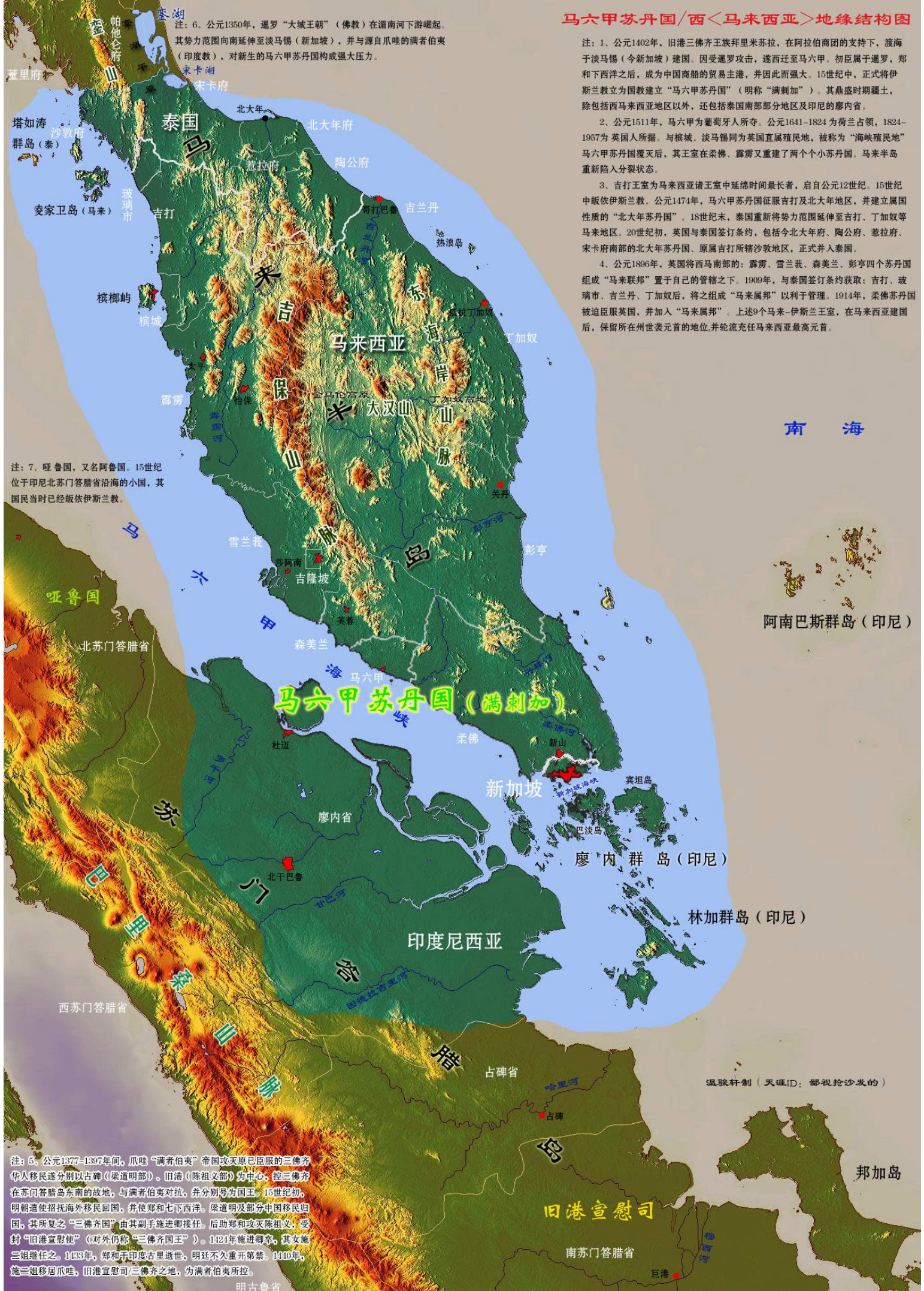
再来了解一下马来半岛基本的地缘结构。今天的马来西亚共分为十三个州，以及吉隆坡、布城、纳闽三个联邦直辖区。十三个州中，又有 9 个直接由原来的苏丹国转变而来，并由这些旧统治者担任元首。以示区别的话可以将之命名为“苏丹州”。以中国内部一级行政区来做对比的话，大体可将马来西亚这三种行政区对应为：自治区（苏丹州）、省（州）、直辖市（联邦直辖区）。当然，马来西亚的情况跟中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类比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罢了。比如在中国，自治区在地缘政治结构中，客观上处于边缘地位；而马来西亚的苏丹州，则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每个“苏丹州”的元尊号都为“苏丹”，玻璃州市和森美兰是两个例外。至于为什么会成为例外，我们后面会解读到。

## 第六节 马六甲海峡北岸的地理结构

在整个马来半岛，最引人注目的点应该就是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了。这个据守马六甲海峡入口的城邦国家，其实并不是半岛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岛屿——“新加坡岛”。其与马来半岛之间隔着一条狭窄的“柔佛海峡”（最窄处仅 1.2 公里）。与新加坡岛一起横亘于马六甲海峡入口的，还有与之隔“新加坡海峡”相望，由数百个岛屿组成的“廖内群岛”。新加坡海峡之名得自于“新加坡”，柔佛之名则得自于与新加坡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柔佛州”，二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香港与深圳。柔佛州之名得自于“柔佛苏丹国”。在马六甲解体之后的“后马六甲苏丹国”时代，柔佛苏丹国一直是整个马来亚诸伊斯兰政权的领导者。其领土不仅包括今天的柔佛州，也包括新加坡和今属印尼的廖内群岛。

新加坡与廖内群岛的地缘政治归属，归根结底源自于二者之间的那条海峡。新加坡海峡的平均宽度要十倍于柔佛海峡，使得它而不是柔佛海峡成为了马六甲海峡的入口。19 世纪初，新加坡岛和廖内群岛都还处在“柔佛苏丹国”的统治之下。在英国立足马来亚、荷兰控制苏门答腊、爪哇等马来岛屿的情况下，双方对马六甲海





## 马六甲苏丹国/西(马来西亚)地缘结构图

注：1. 公元1402年，旧港三佛齐王族拜里米苏拉，在阿拉伯商团的支持下，渡海于淡马锡（今新加坡）建国。因受暹罗攻击，遂西迁至马六甲。初臣属于暹罗，郑和下西洋之后，成为中国商船的贸易主港，并因此而强大。15世纪中，正式将伊斯兰教立为国教建立“马六甲苏丹国”（明称“满刺加”）。其鼎盛时期疆土，除包括西马来西亚地区以外，还包括泰国南部部分地区及印尼的廖内省。

2. 公元1511年，马六甲为葡萄牙人所夺。公元1641-1824为荷兰占领，1824-1957为英国人所据。与檳城、淡马锡同为英国直属殖民地，被称为“海峡殖民地”马六甲苏丹国覆灭后，其王室在柔佛、霹靂又重建了两个小小苏丹国。马来半岛重新陷入分裂状态。

3. 吉打王室为马来西亚诸王室中延续时间最长者，启自公元12世纪。15世纪中皈依伊斯兰教。公元1474年，马六甲苏丹国征服吉打及北大年地区，并建立属国性质的“北大年苏丹国”。18世纪末，泰国重新将势力范围延伸至吉打、丁加奴等马来地区。20世纪初，英国与泰国签订条约，包括今北大年府、陶公府、惹拉府、宋卡府南部的北大年苏丹国、原属吉打所辖沙敦地区，正式并入泰国。

4. 公元1896年，英国将西马南部的：霹靂、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四个苏丹国组成“马来联邦”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1909年，与泰国签订条约获取：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后，将之组成“马来属邦”以利于管理。1914年，柔佛苏丹国被迫臣服英国，并加入“马来属邦”。上述9个马来-伊斯兰王室，在马来西亚建国后，保留所在州世袭元首的地位，并轮流充任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注：6. 公元1350年，暹罗“大城王朝”（佛教）在湄南河下游崛起。其势力范围向南延伸至淡马锡（新加坡），并与源自爪哇的满者伯夷（印度教），对新生的马六甲苏丹国构成强大压力。

注：7. 哑鲁国，又名阿鲁国。15世纪位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沿海的小国，其国民当时已经皈依伊斯兰教。

注：5. 公元1377-1397年间，爪哇“满者伯夷”帝国攻灭原已臣服的三佛齐华人移民遂分别以占碑（梁道明部）、旧港（陈祖义部）为中心，控三佛齐在苏门答腊岛东南的故地，与满者伯夷对抗，并分别号为国王。15世纪初，明朝遣使招抚海外移民回国，并使郑和七下西洋。梁道明及部分中国移民回国，其所复之“三佛齐国”由其副手施进卿接任。后助郑和攻灭陈祖义，受封“旧港宣慰使”（对外仍称“三佛齐国王”）。1424年施进卿卒，其女施三姐继任之。1433年，郑和于印度古里逝世，明廷不久重开第禁。1440年，施三姐移居爪哇，旧港宣慰司/三佛齐之地，为满者伯夷所控。

温骏轩制（天涯ID：鄙视抢沙发的）



峡控制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最终“主航道中心线原则”这一看起来最为公平习惯规则，决定了二地的政治归属。航道北侧的新加坡岛（及其附属小岛）成为了英国殖民地，荷兰人则得到了廖内群岛，并与其它“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在1949年整合成为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在这场殖民盛宴中，没人会在乎土地原来主人——“柔佛苏丹国”的想法。不过这个苏丹国在马来西亚的地缘政治史中，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新加坡和廖内群岛这两片今天不为马来西亚所有的岛屿，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海峡与航道并非完全能划等号，受地势、水深的限制，可通行航道的宽度总是要小于海峡本身的。具体到新加坡海峡的问题上，其西段岛礁、浅滩众多，通航水道的最窄处仅有4.5公里。当然，偏窄的宽度对于控制者来说，是十分有利的。比如苏门答腊亚齐地区的巴塞苏丹国，要想在海峡西端影响过往商船，其难度就要远高于在新加坡海峡之侧。后面我们也会解读到，16世纪中叶崛起的亚齐苏丹国，曾经在争夺马六甲入口的问题上，做出过什么样的努力。

狭窄而又重要的水道、星罗棋布的岛屿最容易让人想到什么样“有前途”的职业呢？估计大家都想到的，是海盗。在三佛齐的海上霸权崩溃之后，淡马锡（新加坡岛）和廖内群岛也一度成为了海盗猖獗之地。相比之下，淡马锡因与大陆距离更近，更容易成为各方角逐的焦点。拜里米苏拉一开始之所以选择在此立国，也正是看中了它特殊的位置。然而无论是立足于新加坡岛，还是在廖内群岛方向控制航线，都会存在本身地缘实力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海峡两侧的这些岛屿，更有可能成为强大海上国家统治之下的一个节点。在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占之后，马六甲苏丹曾一度率领军民，退至廖内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宾坦岛”上。只是仅仅支撑了15年（公元1526年）后，就在葡萄牙人的攻击下返回马来半岛一事，便很能说明问题。

新加坡一直都对自己的独立信心不足，原因也在于此。当然，马来西亚为改变民族结构而逼迫新加坡独立的情况，在更崇尚丛林法则的古代是很少见的。大多数时候，不管岛屿的实际控制者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更强大的政权影响之下。问题在于两点：一是这类节点通常也是各方势力交汇之处，政治归属于哪一方是一件很需要权衡的事；二是控制国本身也会有衰弱周期，一旦衰弱就有可能给这类外岛留下混乱的空间。

如此枢纽般的位置，也同样为暹罗人和爪哇人所看中。在泰国大城王朝与爪哇满者伯夷的压力下，马六甲成为了拜里米苏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整个马六甲海峡由西向东呈“酒瓶”状轮廓。吉隆坡至新加坡部分为“瓶颈”，吉隆坡以西的瓶身部分，海峡宽度则骤然放宽。在瓶颈部分，马六甲所对应的这段海峡，又是除新加坡海峡之外最狭窄的部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六甲成为了拜里米苏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及吉隆坡在争夺马来亚地缘政治中心的问题上所具备的优势。事实上，今天马六甲海峡依然留有海盗的生存空间。其最危险的水域，

恰恰是在马六甲城附近海域。

仅仅依靠阿拉伯商团的帮助，新生的马六甲王国要想从泰国大城王朝与爪哇满者伯夷帝国的包夹中突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问题在于，马六甲和阿拉伯人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后盾。阿拉伯人当然可以尽量让自己的商船在马六甲停靠、交易，以做大后者的实力。只是觊觎丰厚通路利益的南北两大势力，并不会轻易让他们轻易做到这点。泰国人把拜里米苏拉从淡马锡赶走，便是明证。能够对南洋产生影响的，并非只有南亚地区，身处南海之北的中央之国，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今天在全球扩张影响力的中国，在地缘政治层面推出了两条主线，合称“一带一路”。其中一带指的是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则意指连接太平洋 / 印度洋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后一条路线中，南洋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它在几百年前并没有本质性变化。

“一带一路”的提法，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遗产继承的经典做法。用一句成语形容就是“旧瓶装新酒”。前者旧瓶源自于汉武帝时期开拓成型的丝绸之路；后者的旧瓶上最耀眼的那抹亮色，显然就是“郑和下西洋”了。在马六甲王国试图摆脱南北两大王朝影响，艰难求生之时，大明王朝的这个历史性决定，将对马六甲及南洋的地缘政治生态造成重大影响。



## 第二十五章 郑和下西洋对南洋地缘格局的影响

### 第一节 明朝时中国对东洋和西洋的划分法

公元1405年～1433年，郑和奉命七次出海远洋。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远洋之举，船队编制有2万余人，船只数量规模达到200余艘，其航迹从南海向西，一路延伸到北印度洋周边地区。即使是后来在海外殖民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在开拓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如此大规模的中国船队进入南洋，不可能不对当时的南洋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在解读郑和下西洋一事对南洋的影响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西洋”这个概念。首先要了解的是，到底哪里才是“西洋”；其次从以方位命名的方式来看，有西洋也就必定有东洋了，那么“东洋”又在哪里，郑和们又有没有去过“东洋”？

明朝是取代元朝统一了中国，其最初对海洋的认知，自然也继承于元朝。在元朝时期的认知中，苏门答腊岛西端是一个分界线，以西地区被归为“西洋”，以东的马六甲海峡、南海周边地区则被称之为“东洋”。这个切割标准今天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划分法，应该说还是很科学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以此标准来看的话，作为郑和船队重要目的地的马来地区，毫无疑问的应该属于“东洋”范畴。那么为什么这段历史被称之为“下西洋”，而不是“下东洋、西洋”呢？

实际上“郑和下西洋”的提法，并非出自于郑和往来东、西两洋之时，而是源起于16世纪末（明万历年间）的一本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正处在倭寇犯境的威胁之中，舆论上有借郑和远服海外诸国之事来达到抵御海外侵扰、重振国威的需要。“三宝太监下西洋”及后来演化而成的“郑和下西洋”故事，遂在此时以演义（甚至被神化）的形式流传于世。

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为什么明朝初年，郑和出使东、西两洋的事件，在后期演化为了“下西洋”？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中国人在通过郑和船队的多次远洋，从而系统的获得了东、西两洋的资料后，发觉元朝的划分方法并不那么准确。如果从南中国找一个离开中国海岸线的起点的话，这个起点无疑是广州。假如从广州出发（或经停），借助季风南行的中国船队一路向南的话，他们最选抵达的将是加里曼丹岛中部。对应的点大体就是现在“文莱”的位置。在郑和开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后”，文莱地区（当时名为“渤泥”）也得以凭借这一优势发展了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有严重“对称情节”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以文莱——广州这样一条近乎正南、正北的中轴线（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做到这一认知并不难）来划分东、西两洋的话，看起来会更为合理。由此在明朝后期，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三宝太监西洋记》，

还是同时期成书的《东西洋考》，都将文莱及其以西地区归入西洋范畴（菲律宾及日本领土内的国家则归入“东洋”）。

在 19 世纪中后期，在被跨海而来的欧洲人逼迫打开国门看世界之后，“西洋”一词在中国逐渐成为了欧洲乃至整个白种人统治下欧美地区专属。“洋”这个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原本远低于“土”的字，也因其在技术上所暗含的先进性，与后者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以至于今天，“洋”在中文的语境中，仍然含有高大上的意味（“土”则反之）。受这一思维影响，在日本凭借海洋实力崛起，并对中国构成威胁后，“东洋”的标签也成为了日本的专属。

当东、西两洋都有了专指对象之后，“南洋”便成为南海周边地区的代名词，更可进一步用来专指马来地区（行文中的“南洋”便是这层意思）。纯粹从其与南海相接的位置来说，“南洋”一词的使用倒也更为准确。当然，名字只是一个标签，不要因此而引发认知混乱就行了。我们更关心的，是郑和下西洋之举到底对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行为本质

15 世纪最开始的几个年头，拜里米苏拉完成了他建立新王国的选址工作（马六甲）。几乎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南京城里，大明王朝也刚刚通过一场战争完成了权力交接。这场由叔叔（朱棣）夺取侄子（建文帝）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都必定会经历一个内部融合的危险期。整个国家新的政治格局，以及民众的心理归属，都需要一个时间段来完成。在地缘研究中，这个时间跨度经常被我用：三代、半个世纪，或者一甲子来代指。如果要用一个更学术点的标签来概括的话，我们可称之为“地缘量变期”。

一个地缘量变期结束之时，迎来的就是质变。至于说是往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就要看这个量变期内所积累的到底是矛盾还是动能了。我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可以预见的将来”，而这个概念所指向的时间段，其实就是一个“地缘量变期”。一切的战略规划、预测，超出这个时间段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地缘量变期结束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质变（造就新的地缘因素），都将改变下一步战略规划 / 预测的基础。

即使一个国家或者文明有信心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前行，最大的问题却又是，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你在变化其它地区也一样在变化。就像 1922 年建立的苏联，最终之所以会在 69 年后崩溃，除了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导致经济增长出现瓶颈的问题以外，更是由于铁幕之外的美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战略优势（导致差距拉大）。而后者的变化，是苏联没有办法帮助“计划”的。同样，闭关自守千年的中央之国，在 19 世纪后期暮然发现被万里之外的欧洲远远的甩在后面，也是这种情况。

回到大明王朝权力交接的话题上来。帝王家事向来没有对错之分，有的只是成王败寇。结合上述分析，“成王”的客观标准，其实并不在于你有没有登上权力的最高峰，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坐稳这个位置，并且让王朝保持稳定。如果能够做到这点，那么最起码历史评价不会差；如果能让王朝进一步强大，那么就很有可能升华到“大帝”级别了。因此李世民、朱棣一类夺权上位的帝王，之所以能够做到青史留名，并不是因为他们登上帝位，而是帮助王朝渡过了最初的危险期。至于秦二世、隋炀帝这种二世而亡之君，自然就会被人放大他们那些“失德”之事了。

我们在这里解读这些，并不是让大家把关注的焦点重新放到权力斗争上。恰恰相反，是希望这背后的地缘规律得到重视。简单点说，在大势的作用下，很多所谓“明君”的能力得到体现，是因为他顺了大势；那些往往被认为一定能力低下的末代之君，很多时候只是生不逢时。

公元1402年，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这位强势帝王一直执政到公元1424年。待他离世之时，距离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已经过去了整整56年。按照刚才所说的“地缘量变期”理论，明朝已经平稳渡过了危险期。对于一家独大的中央帝国来说，这意味着不需要有很多创新性的规划，趋于稳定的利益集团及民众的心理归属感，也将帮助王朝惯性运行很长一段时间。所谓“无为而治”的意义正在于此。

当然，稳定的同时也在蓄积着内部矛盾。一旦这些矛盾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改朝换代重新开始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在农业文明背景的古中国，这一矛盾的焦点体现在土地日趋向既得利益集团集中。由此不仅削弱了中央政权调配资源的能力，更在底层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经由外患、天灾的触发，往往便会变得不可收拾（民心思变），而在王朝鼎盛的蓄能期，此类事件通常并不会导致严重政治后果。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将其推向鼎盛期的，无疑是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的朱棣。

朱棣一生所做之事中，大概有四件最让人印象深刻：一是从自己侄子建文帝的手中夺取皇位；二是下令编纂《永乐大典》；三是五次北伐蒙古，并最终迁都北京；四就是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了。其中有重大地缘影响力的，是后两件。迁都北京所造就的“天子守国门”格局，既有利于维持对蒙古草原的压力，亦让帝国内部不至于再出现动摇稳定的强藩（否则还会有第二个“燕王”出现）。明朝此后能够再有200年的国运，这次迁都实是首功一件。应该说，以中央之国的历史来看，明朝迁都北京之举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外部的北方压力，及内部的强藩威胁，历朝历代都是令中央政权头疼的事。无论是以史为鉴，还是朱棣自身的经历，都会促使他做出这项正确决定。

与迁都北方相比，一直对海外扩张无甚兴趣的中央之国，突然在永乐年间组织强大舰队远赴南洋甚至印度洋，却着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本身有“阴谋”的成分，是朱棣为巩固皇权，在寻找可能流落海外的建文帝。



另一个有争议的“阴谋论”，指向的是郑和本人。有观点认为，郑和借助大明王朝强大的国力，主动推进了南洋的伊化兰化进程（而不是在传播中华文明）。单纯从马六甲苏丹国及南洋此后一系列伊斯兰国家崛起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时段的吻合度来看，的确很难相信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不过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个结果是仅由某一方，甚至某个人来决定的。更多是要看“势”（战略趋势）对何方更有利。接下来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拨开这层迷雾，看清事实的真相。

单从 15 世纪初中央之国的实力，包括海洋实力来说，对南洋应该是呈碾压之势的。数百年来通过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所获取的经济、技术优势，是大明王朝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战略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遇到合适的点，就有可能触发海外扩张。郑和下西洋的本质，就是一次中国海洋实力的总爆发。然而此类爆发，并不必然以改变地缘属性、战略格局为方向，也有可能只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试错之举。从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社会所积累的这些海上优势，源出于东南沿海地区。尽管中央之国并不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是一个大陆属性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但在人口、经济和技术领先（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只有部分地区倾心于海洋，也足以对周边海区构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假定当时的明朝政府能够放手从长江口——珠江口的东南地区去经营海外的话，也必将取得积极战略成果。

现实问题在于，大明王朝无可避免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大陆属性决定了它不会主动进行海外扩张，更难以容忍此类行为对内部稳定的影响。虽然这并不代表帝国官僚一定会放弃海外贸易，但一切的前提却又必然放置在可控范围内。比如说，在东西方贸易网中，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物产丰富的商品供应方，让外商在固定的特许港口贸易，问题不大；但如果主动通过军事、移民等手段打造海外贸易帝国，甚至再造中华（如后来的欧洲殖民者一样）的话，就会让身处华北腹地的帝国中央官僚们产生尾大不掉的担忧了。

鉴于上述分析，“郑和下西洋”之举在战略上已经注定了只是一次试错，而非改变中央之国基本地缘属性的突破。当然，这并不代表其本身没有价值。要知道，可以共同追溯的记忆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地缘要素。随着中华民族即将在新的“海洋世界”迎来伟大复兴，这笔郑和在 600 年前留下的“地缘遗产”，将为中央之国的海外事业发挥积极作用。至于 600 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对当时的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地缘影响，则是接下来的解读方向。

###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时召回移民并剿灭陈祖义

之所以说“郑和七下西洋”之举于当时只是一次试错，是因为这场前后延续 28 年的（1405 年—1433 年）远洋行动，在郑和身死之后便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几年开启海外探险之旅，且起点和规模都要低得多的葡萄牙，不仅

没有因开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个脚印的构筑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国”。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概因为“海洋”对二者的意义完全不同。对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且在综合实力上独霸于东亚的中央之国来说，海洋所带来的商业之利只是用来锦上添花。甚至这个“花”添与不添，亦不取决于是否有经济价值，更要看有没有可能影响王朝内部的集权度及稳定性。所谓“凡士农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清·雍正）之语，便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总结。

反观葡萄牙，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土地狭小而贫瘠，人口不过百万（15世纪），甚至一直笼罩在强大近邻“西班牙”的阴影之下。海外扩张成为了其唯一改变国运的救命稻草。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率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今天我们是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看到葡萄牙的。普通民众将更多通过本菲卡或者波尔图这样的葡萄牙足球队，了解到葡萄牙人一直渴望从西班牙独立出去。就像巴塞罗那俱乐部和毕尔巴鄂竞技队，成为巴塞罗纳人、巴斯克人表达独立情绪的窗口一样。

以“农本思维”来看，控制一片土地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实边”，然而郑和下西洋之举并没有肩负这样的战略任务。让更多的海外国家进入朝贡体系，以彰显新王朝的强大，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至于由此而获取的经济利益，包括航路的开拓，反而只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了。上述思维并非只存在于明朝和朱棣的脑中，而是华夏文明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在华夏文明的“天下”（世界）观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一是“王者无外”。也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已知的世界，都应该臣服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二是“华夷之辩”。这一观点在将“华夏”定位为文明中心的同时，同时承认华夏文明无法覆盖“天下”，所谓“蛮夷”是客观存在且无法融合的。

以地缘视角来说，带有鲜明温带农业区特征的华夏文明，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造就了“华夷之辩”的产生。难以为华夏文明所融合的，既包括蒙古高原这种游牧之地；也包括热带地区这种，虽然可以开展大规模农业，但却因气候差异巨大、距离过远而无法有效统治的区域。在“华”——“夷”有别，但却又在理论上必须同奉一个“共主”的逻辑下，统治华夏文明覆盖之下的土地，被定位为“内服”地区（核心区），并被纳入王朝的直接管控范围；以外的区域则属“外服”地区，被允许以羁縻、朝贡的方式存在于中央之国主导的“天下”中。

应该说这一观点本身带着鄙视其它地区和文明的成分，甚至因此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后而一时无法适应。但其正视地缘差异的思辩方式，却也算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反观一神教思维主导下的“西方”世界，却是认定可以用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模式统一世界。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无论是狂热天主教徒、穆斯林所引发的圣战，还是美国极力在全球范围推广普世价值观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可以这样说，抛开“华夷之辩”中的盲目自大的成分，中国人在

当下接受“多元世界”这点上，要容易得多。若是理解了这一点，忧心现实的中国会希望崛起为一个全球制霸国家的想法，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既然在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央帝国并没有在海外扩张的动能，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去做什么战略性的计划，尤其是在海外“再造中华”这种事了。事实上，帝国中央不仅没有给予郑和船队“殖民”海外的任务，反而使之成为了一次召回外流之民的威慑之旅。那些被视为背祖忘宗，且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海外华人，被视为流民，甚至“天朝弃民”，回归故土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为此，明朝给予这些海外华人的政策是：给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为有原罪）。听闻招谕归国者，可既往不咎，还复本业。带头回流的移民领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赐。反之则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点，在明成祖（朱棣）所颁发的诏书中有明确记载：“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郑和下西洋

召回海外“流民”政策实施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技术落后的古代，“人口”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应对战争，都需要大量人口。同时，“人头税”也长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人口大量流失海外，不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即使不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安全

（比如做海盗），也会导致经济上的损失。在这一政策影响下，试图在三佛齐故地立国的梁道明、陈祖义两人，成为了正、反两种选择的典型。前者在郑和一下西洋同时，听从了使者的劝说即刻回国（公元1405年），并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嘉奖，大量迁居三佛齐的中国移民也随之回流；后者则因率众割据旧港，拒绝归国，而与他的“海盗集团”一起，被回程的郑和船队所剿灭（公元1407年）。

剿灭陈祖义的直接理由，是其聚众为盗、为害南洋，并阴谋袭击郑和船队（抢夺财物）。当然，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海盗”也并非不能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后来的大英帝国最有发言权。从16后期的伊丽莎白时代起，英国人就开始为亦商亦盗的武装民船颁发“私掠许可证”，以从战略上打击西班牙等竞争对手。这股被称之为“皇家海盗”的民间武装力量，在商业和军事两条线上都为“日不落帝国”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事实上，陈祖义所代表的“海盗”，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皇家海盗”。然而



无论从中央之国的文化属性，还是明朝的政治结构来看，却都是绝对不可能容许这种秩序破坏者的存在的（更别说“奉旨为盗”了）。为了避免海外华人的移民、商业行为，对国内之民造成不好的示范，王朝更愿意采取一刀切式的“闭关锁国”之策。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闭关锁国之策，使得本可依托母国从正常贸易中获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过海盗、走私等行为获取生存空间；这些行为反过来又更加刺激朝廷坚持海禁。很显然，这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无助于中央之国的海外扩张，更会一次次的消磨掉中国社会自发而生的海外迁徙热情。这种情况一直到 19 世纪后期，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同时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内部人地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方才有所改观。

回到“大航海时代”，中央之国的固有文明属性与海外商业、人口扩张的天然冲动之间，有的只能是互相消耗。如果说明朝最强大时上述矛盾尚没有凸显，陈祖义的授首也无非是又一次彰显了中央帝国的强大的话，那么明朝后期为祸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之乱，就堪称这一结构性矛盾所触发的一次战略级的事件了。讽刺的是，在明朝将亡之时，一直在夹缝中求生的民间海商（盗）力量，竟然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尽管这根稻草最终未能挽救明朝的国运，但却在地缘层面将台湾这个化外之地变身成为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巧合的是，这股海上势力的代言人也姓“郑”（虽然郑和的“郑”是赐姓）。

#### 第四节 色目人在元朝和明朝时的社会地位

15 世纪初无疑是中央之国对海洋态度最为开放的一个时段。饶是如此，中央帝国重“土”轻“洋”地缘属性，仍然使得郑和下西洋之举，无法造成更深远的地缘影响。最起码从技术上看，在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同时，却又恩威并施的诏谕移民归国，便很有些自缚手脚的意思。即使是对领土扩张观念不那么强的欧洲人，在布局海洋时也知道，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本土人员移驻海外港口，航线节点的控制便无从谈起。那么，有没有一个群体既能让保守的中央之国免去影响稳定之忧，又能帮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回回”。

与今天部分人提到“回回”二字，似乎略带贬义不同的是，在 15 世纪时，“回回”二字本身只是对特定信仰人群的一个泛指（一如“支那”一词原本并无贬义一样）。这个标签成为特定信仰人群的专有名词，起自元朝时期。在建立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后，大量来自中亚 / 西域的西北民族被引入中央之国核心区，以在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三方面，协助蒙古人管理数量庞大的金、宋遗民。由此也造就了大家熟悉的元朝式“种姓”制度，即将全国之民依地缘属性划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之所以说元朝式的“种姓”制度，所依据的是地缘属性，而不是“民族”属性，

是因为在这种划分方式中，属地原则非常明显，并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民族概念。其中“汉人”的概念，主要包括原来在金国统治下的北方各族，甚至朝鲜半岛之民也被划入了“汉人”这一等级；至于“南人”，则指向的是原南宋遗民了。用今天的地域观来看，这两个等级之间的差异，更像是南方人、北方人的区别。再深入解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切割方式其实跟蒙古人的征服顺序有关。简单点说，越早归服蒙古人的地区，等级越高。这也使得像大理国这样的西南之地，因早于南宋被征服，其民也被划入了略高一级的“汉人”等级。抵御蒙古帝国入侵时间最久的南宋遗民，则无可避免的成为了最被压制的对象。掌握“征服顺序”这条主线，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元朝的四等人群划分中，来自中央之国核心区西北方向的“色目人”，等级仅次于蒙古人了。

富庶的农业区，一直对游牧民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以蒙古高原的位置来说，中亚/西域的绿洲农业区（塔里木盆地、河中地区）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央之国核心区，都是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扩张方向。正常情况下，基于经济原因，入主中原会更有吸引力。尤其蒙古人的发源之地，还是在蒙古高原的东部（与华北距离更近）。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崛起于草原之前，蒙古诸部也的确受金朝所辖制。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后（公元1206年），很自然的便将征服金国作为了第一目标，并于立国后的第五个年头正式发动了针对金国的战争。在此之前，为了更好的完成目标，蒙古人先发动了针对西夏的战争，以期通过对西套平原、河西走廊的占领对金国形成两面合围的态势。只不过顽强的党项人并没有让蒙古人攻灭，使得蒙古人不得不在西夏表面接受“附蒙伐金”条件的情况下，发动了针对金国的战争。

从战略上来看，蒙古人的策略并没有错。1000多年前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反攻时，也是先从西线着手，控制河西走廊——西套一线。只是西夏的激烈抵抗延缓了金国覆灭的时间。在中亚方向，为了集中力量入主中原，成吉思汗曾试图与控制“河中”的花剌子模国进行商业合作。不过结果想必大家通过之前的内容已经知道了。这一时段也正是花剌子模强势崛起之时，花剌子模人高调拒绝了蒙古人的示好。这也使得蒙古人暂缓了对金战争，而提前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并拿下了天山南北的绿洲农业区。

应该这么说，对于当时如日中天的蒙古人来说，拿下东亚或者中亚都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先西征大获成功，后攻灭金、夏之举，却让“元朝”在属性上与之前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往的历史中，在文明层级上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开始“汉化”（比如鲜卑），即采用适合东亚农耕文化的管理方式。而生活在中亚—西域的绿洲农业区的“色目人”们，却让蒙古人有了不一样的选择。那些既熟悉农业生活，同时又带有浓厚商业基因的“色目人”，成为了蒙古人最好的经济助手。蒙古人可以把让自己头疼的农业区，“承包”给这些精明的中亚商人（比如“包税制”），自己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便可。能持久

这样做的前提是，蒙古人必须保有他们的军事优势。客观上看，有了色目人这个阶层做防火墙，蒙古人也就更容易避免被“汉化”。构筑在这种平衡理念上的社会结构，便成为了我们看到的元朝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亚－西域整体上又分为北部的草原游牧区，以及南部的绿洲农业区两大块，因此就“色目人”这个阶层来说，其实并不光是承担经济管理这一职责。从哈萨克草原、北疆地区等游牧区引入内地的部族（如钦察、乃蛮等部），承担的则是军事功能（辅助蒙古军）。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如果“色目人”不能为元朝提供经济上的解决方案的话，是很难成为一个第二等级的。另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色目人”在当时并不等同于穆斯林，也不等同于“回回”。事实上“色目”一词，在唐朝便已被用来称呼西域及以西地区的诸民族了。蒙古西征之时，有很多中亚民族，如统治西辽的契丹人，当时信仰的都不是伊斯兰教。正是由于种类繁多，“色目”这一看起来更直白的标签，才成为这一群体的代名词。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区别于其它色目人的“回回”群体，只是其中一种。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回回”群体是色目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公元11世纪中，喀喇汗王朝征服河中、南疆之后，伊斯兰教便已在中亚绿洲农业区扎下了根。由于绿洲农业区的人口数量要远大于草原游牧区，加之这些绿洲穆斯林在元朝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是重要经济管理工作（并因此在元朝的官僚体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导致在当时民众的感知中，“色目人”几乎就等同于“回回”了。及至大部分源自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也都接受了伊斯兰信仰之后，这一界限就更加模糊了。

公元14世纪中，蒙古人在中央之国的统治走向了崩溃。对于后来建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来说，在推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境内数量各超百万的蒙古人、色目人。就这个问题来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明朝政府在法律上（大明律）明文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必须与“中国人”通婚，以此来融合这些所谓的“异族”。而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却又因伊斯兰教的封闭性，导致了境内穆斯林人口的扩大。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明朝政府对于前朝留下来的这两类“高等级”社群，还是区别对待的。在法律中定下“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大原则的同时，也做了“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补充。这其中所说的“回回”、“钦察”两族，就是色目人的主体。前者主要源自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中亚／西域绿洲农业区的穆斯林，主要服务于元朝的政府机构和经济体系；后者则指向的是中亚突厥语游牧民族，主要服务于元朝的军事机构。

换句话说，明朝政府对于身为进阶统治阶层的“蒙古人”，融合态度是相对强硬的；而处在第二等级的色目人，政策则相对柔和得多。这样做，一则可以将“色



目人”从蒙古人的统治体系中分化出来。在北方威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点尤为重要；二则也是正视问题的存在。毕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色目人在中央之国的经济、军事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客观上需要这部分前朝“精英”继续为新王朝发挥作用。明成祖朱棣的上位，使得明朝的民族政策进一步放松。一直为帝国戍守北境的“燕王”，比之身处南京的官僚们更明白这些“异族”群体的利用价值。包括“蒙古人”这一群体也并非不可以被分化。在“靖难之役”及数次北伐蒙古的战争中，北军中的蒙古人、色目人都曾为最后的胜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色目人后裔，郑和能够肩负出使西洋的重任，更是明朝宽容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总的来说，明朝在宗教和民族政策上还是呈比较宽容态度的。并没有出现类似“西班牙光复运动”后，对穆斯林群体进行清洗的情况。在靖难之役后，甚至出现原先迁移至长城之外的蒙古人、色目人大量回流之态（客观上避免了这北元所用）。如果说“回回”形成于明朝大体也是没有问题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一个在技术上要求“诏衣冠如唐制”（注意不是“宋”）的新王朝来说，唐朝的因开放而获得的发展，一定程度也是明朝所希望学习的。

当然，任何事务都有其两面性，民族问题也是一柄双刃剑。明朝在学习唐朝包容性的同时，也保持了足够的谨慎，以避免出现“安史之乱”的局面。文化上的认同（比如服装），是明朝包容蒙古人、色目人的前提。换句话说，必须先认可自己“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然后再谈信仰的宽容性。在郑和身上，上述融合特征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在明朝扩张海洋影响力的过程中，带有“中国人”和“穆斯林”双重身份的群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具体都有哪些体现，又对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五节 明朝解决主体民族与穆斯林结构性矛盾的方法

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人人都知道1+1等于2，但两个1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二，也可能是零。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个能帮助个体间达成一致的“地缘凝聚点”。这个“地缘凝聚点”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发共鸣的历史……，同时，它也可以是宗教。

在成为“地缘凝聚点”这个问题上，宗教看起来比之其它点要更有优势。一个宗族的扩张，往往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努力，但一个能满足时人某种心理需求的“宗教”，却有可能迅速传播，并形成规模效应。比如每到一个古典王朝行将崩

溃时，就会涌现于“农民起义”浪潮中的各种攀附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的宗教组织；又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帮人用“信仰”消灾解难、治病养生的各类地下教会，乃至邪教组织。

从技术上看，一神教的传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于其它宗教。这其中尤以 3.0 版本的伊斯兰教为甚。不过理解了上述内容，大家其实也清楚了一点，对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派来说，无论其所保持的自身特点是该归于民族特点，还是宗教特点，本质上都是为了凝聚自身所处的社群。从这点来说，以宗教为标识和与宗族 / 血缘为标识，并没有区别。然而，同样从技术上来考虑，对于客观上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来说，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识别度又非常重要。从少数派的角度来说，保有的识别度过小，将面临被多数派融合的风险；过大甚至与大环境格格不入，那么实际在做的就是——一种“自我种（民）族隔离”，并最终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实际上，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在认同自己“中国人”大身份的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离”的程度，民族矛盾并不会凸显。只是“度”的掌握永远是个问题。从中国穆斯林的角度来说，为了不被周边民族吞噬（特别是多数民族），以宗教属性来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

问题在于，“中国认同”的基础其实是“文化认同”，这又与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彼此做出一定的妥协。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此类问题出现在何地，在多数派往往占据了政治及话语权的优势时，这个压力更多是由少数派所承担的。从基督教借大航海之势向中国传播之时起，类似问题也曾经出现过。在华夏文明中，祖先崇拜及儒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如 16 世纪后期在明朝传教的“利玛窦”采取了务实妥协的手法。即认定祖先崇拜与对孔子的尊崇，并不属于一神教教义所禁止的“偶像崇拜”范畴，技术上可以绕过这两个壁垒，向中国人传播教义。

然而这种取巧的做法，在教廷内部始终存在争议。18 世纪初，在清康熙执政期间，这一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史称“中西礼仪之争”。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坚持信徒不应该祭拜祖先和孔子的罗马教廷，被清王朝禁止在中国传教（虽然在中国的传教士仍希望做出一定妥协，以换取传教权）。这种文化碰撞，不仅在中国，在受华夏文明影响浓厚的日本、越南也普遍存在。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罗马教廷才不得不面对现实，允许上述地区的信徒按照固有习惯祭拜祖先、神社（日本）等异教偶像，问题才算解决。

明朝初年，在中国境内已经形成稳定社群的穆斯林群体，所面临的正是一个战略适应问题，毕竟大明王朝所打出来的口号是“恢复中华”。相比天主教的传教工作，穆斯林社群所面对的境况看起来要略好一点。因为对于中央之国统治者来说，天主教的传教工作，本质是在与其争夺人口和话语权。如果允许教廷坚持在意识形态上

的排他做法，那么其每增加一名信徒，就意味着将减少一名“中国人”。相比之下，“回回”在当时则属客观存在的一个“外来”社群。不那么普世的“内婚”做法，客观上不会对主体民族的数量构成威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必须以“中国”认同为基础。尽管在这一认同之下，主体民族和少数派看似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方式，但伊斯兰教教义中强烈的排他性，多少还是让“回回”这个群体在融入大环境时有些尴尬。一旦遇到乱世，这些差异性又往往会从内、外两方面同时放大，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放大成宗教、文化，甚至政治之争。不过在初临这个问题的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之举却似乎为这个群体和中央帝国找到了一条共生共赢之路。对于大明王朝来说，人口流失海外虽然是不能容忍的，但如果替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是源自有“中国”认同的穆斯林群体，情况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为了在社群竞争中保持内部团结性，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地缘凝聚点”的社群，势必会有意无意的强调其宗教特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习惯。然而身处海外，情况就正好相反了。身处一个陌生的竞争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将成为更占优势的“地缘凝聚点”。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很多人都应该注意到一个社会现象：一出国，就爱国。很多在国内对现状诸多不满的人，到了国外反而更多把视点放在了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上（并引以为豪）。这种心理，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是一种比较而产生的落差（看到了国外的不好）。更多是因为身处异国环境中，不管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你身上的中国元素都会被周边人所强调。一个强大的，“好”的母国，将会从心理上为你加分；反之，则会身受其累。另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是，关于跨种族混血儿的身份识别。中国人一般看混血儿像“外国人”，而外国人则更容易识别出混血儿身上的中国元素。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理解，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有关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些信息了。在这当中，三佛齐故地管理者的身份问题，是最容易引发关注的。在梁道明、陈祖义这一正一反两个代表相继“离开”苏门答腊之后，梁道明的副手，即穆斯林身份的“施进卿”成为了旧港的统治者。并以大明王朝所授予的“旧港宣慰使”一职（机构名则为“宣慰司”）为王朝的海外事业服务。旧港宣慰司的设立，以及“中国 / 穆斯林”身份者的启用，看起来完美解决了中央之国的内敛性与海外扩张冲动间的矛盾。

至于受启用者的伊斯兰信仰是源自本人出身（回回后裔），还是在移居南洋受穆斯林商人影响后皈依（时有发生），反而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或者移民团体的信仰发生了变化，保守的帝国官僚将不再会坚持其“回归”；而倾向于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势力，则可因势利导的利用其“中国”身份认同，进行海外布局。

不过问题在于，以郑和船队规模所展示的企图心来说，仅仅依靠数量有限的“中国 / 穆斯林”双重身份认同者，进行海外布局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平衡南洋各国的



地缘政治关系，以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才更加重要。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郑和是如何布局的。

## 第六节 郑和下西洋时对马六甲王国的扶植

大明王朝海外扩张事业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马六甲王国”。在郑和船队抵达马六甲之前，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城王朝纳贡称臣。也许有一天，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记，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在虎视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册封一个“宣慰司”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不过“旧港宣慰使”一类机构的设定，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曾经在明朝时成为了中央帝国的殖民地。在羁縻化外之地时，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维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所希望做的。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在欧洲维持“大陆平衡政策”的出发点类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参与博弈者越多，彼此间的牵制越大。反之，对于外部平衡者来说，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更别说一体化了），中国人也同样不想看到东南亚有一家独大的情况出现。就马六甲海峡这条关键水道来说，无论是归属了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大城王朝），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满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即使中国人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仅仅是为南洋带去的贸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换句话说，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就会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暹罗、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最起码在南北两面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进行捆绑，或者说置于大明王朝的保护之下。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国家），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与三佛齐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

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简单点说，会更懂游戏规则。穆斯林商团与马六甲王国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伊斯兰属性，是郑和选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不说，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插入一个以伊斯兰

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今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态势。试想一下，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将对马六甲海峡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话，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可供参照的例子，是将整个黑海－地中海通道打上“土耳其海峡”标签的土耳其。对这条重要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土耳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宗教上的伊斯兰信仰与政治上世俗化（或者说西方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土耳其人客观上有机会承担连接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使命，并从中为自己获利。当然，这种“蝙蝠”的身份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既有机会左右逢源，亦有可能里外不是人。两种属性中的某一种一旦过于强势，不仅可能会造成内部分裂，更有可能引发外部的不安。

15 世纪初的马六甲王国，所承担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纽带的角色。对于郑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国海洋势力来说，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穆斯林已经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整个“西洋”（印度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南洋周边地区，穆斯林商人的渗透工作也绝不比中国人差，甚至出现了中国移民皈依伊斯兰信仰的情况（反向则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海外启用“中国穆斯林”，还是扶植马六甲王国这样的伊斯兰信仰国家，都能够让穆斯林商业力量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战略合作者，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加以排斥。

马六甲的综合优势，使之成为了郑和船队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郑和船队不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城寨，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带往南洋进行交易的货物，会先在马六甲停、贮，然后再分别前往周边地区。一旦外交和贸易任务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团也是回到马六甲集合。这一举措，不仅使得马六甲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更为之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利好。脱离暹罗控制立国，便是这一利好的初步体现。当然，能做到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主动表示加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并频繁入贡以示好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为了维持这种有利于中国的平衡，大明王朝甚至数次在暹罗人进犯马六甲时，要求暹罗保持克制，不要做打破平衡之举。

借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大势，在 15 世纪的上半叶，马六甲不仅控制了马来半岛南部，还跨越海峡，控制了相对应的苏门达腊岛海岸线（今印尼廖内省地区）。也就是说，这个瓶颈型海峡最重要的东部“瓶颈”部分，尽为被明朝称为“满刺加”（马六甲）的王国所有。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穆斯林，及与满刺加这样伊斯兰色彩国家交好，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也是有失偏颇的。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另一个

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佛教徒）主导的锡兰岛，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斯里兰卡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们更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伊斯兰政权，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今天在斯里兰卡的土地上，仍存在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但南洋真正大量出来政教合一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在郑和身死，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比如满刺加真正变成政教合一的“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 15 世纪中期。限制满刺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

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为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着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结束，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的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最终大明王朝并没有满足满刺加对旧港的野望，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使”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穆斯林。

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对外自称“三佛齐国王”）的施进卿，已于 17 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在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明朝在内的外交支持。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简单点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会遗风，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有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那么敏感。即使在今天，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 1440 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牺牲品。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岛也在 15 世纪后期至 16 世纪掀起了伊斯兰化浪潮，并迫使满者伯夷帝国的印度教统治者，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自东爪哇地区（直至灭亡）。今天以旅游



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则成为了满者伯夷 / 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国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在中央帝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原本更愿意突出“中国”属性的天朝弃民们，客观上势必会突出他们的穆斯林属性，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伊斯兰化后彻底融入。换句话说，现在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纯粹从血统上追溯的话，是很难追溯到郑和时代的。那么，今天遍布南洋各地，并对当地经济居功至伟的“华人”群体，又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他们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平衡的？我们将下来的解读中揭晓答案。

## 第二十六章 荷兰引入华人开发南洋地区

### 第一节 中国人口剧增使下南洋成为现实

葡萄牙人的舰队是在公元 1511 年攻陷马六甲的。与此同时，大明王朝却把面朝海洋的大门重新关上。在这一阶段，海洋之于中国的印象，更多是近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之患。从战略上来看，郑和船队在远洋事业中所占得的先机，已是荡然无存。不过就这点来说，倾心于大陆的中央之国并不在意。即使后来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国家，先后试图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中央之国最终也还是通过“地利”及自身巨大的体量，将欧洲透过海洋传导过来的压力所化解。只不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技术差从量变拉升到质变程度时，差距就很难拉平了。

为了搞清中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定位，以及华人在南洋地缘结构中的现状，我们暂时需要把时间线从葡萄牙人的航迹中偏离出来，从更长的时间段来审视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得失。从技术层面看，真正让西方有能力压倒庞大的中央帝国，并且将后者变身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姑且借用一下这个标签）的力量，源自于 18 世纪 60 年代——19 世纪中期，欧洲所开启的工业革命。机器取代人力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不仅在生产力方面抵消了中央之国原有的巨大人口优势，更在军事技术上让欧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落败，及其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就是这一技术代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爆发。也正是在此后，中国被迫进入了技术、社会、文化全面求变的“近代史”阶段。

对于古老的中央之国来说，这一变革期是异常痛苦的，并且不得不对一些固有理念做出改变。就清王朝最后半个世纪的变化来说，最有地缘意义的有两方面：一是放下天朝大国的身段，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理念，开展“洋务运动”。换句话说，就是试图在不改变固有政治、文化结构的前提下进入工业时代。这与日本当时所走的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二是被迫放松了对人口的管制，允许大量人口流入国内未开发地区及海外。其中向东北移民的行为被称之为“闯关东”；去海外谋生则被称之为“下南洋”。

大量中国北方之民移入东北地区，本质还是大陆开发模式的延续。与 2000 多年前，秦征南越所导致的移民行为，并无本质区别。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地理大发现，随着东亚农业区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农业技术的提升，东北地区依然还是会得到开发。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满清政府出于为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封禁了东北地区，这个进程应该还会更早开启。然而说闯关东事件跟地理大发现完全没有关系，也是不够客观的。

中国人口长期以来的保有量都是在千万级，一直到明朝后期才有可能破亿。及

至清朝后期，更是膨胀到了惊人的四亿。这一切，都与美洲的被“发现”，以及由此传入中国的高产农作物有直接关系。土豆、红薯、玉米等源自美洲的农作物不仅高产，更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一些原来无法大规模蓄养人口的土地，也因此得到了开发。相比地理大发现在“闯关东”历史中的间接催化作用，“下南洋”则完全可以被视为其催生的划时代事件。中国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大量移入南洋之举，起点可以上溯到荷兰制霸东印度群岛期间。

## 第二节 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在南洋扩张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在葡萄牙、西班牙双雄争霸之后，紧随其后崛起的全球性殖民大国，是16世纪末从西班牙统治中独立出来的尼德兰低地区，时称“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王权、神权至上国家不同的是，新生的荷兰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共和国。以至于被一些历史学家认定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太阳底下无新事，商业阶层主导的“共和体制”并非荷兰人的创新。在地中海时代，威尼斯等商业共和国就已经借此主导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经济，进而获取政治红利。当然，商业模式有很多种，亦有优劣之分。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看似更重王权的国家，在海外殖民时，也经常会把殖民权特许给商人。荷兰人之所以更加的成功，在于他们的做法更加的纯粹，更加的商业化。

成立于公元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承担着荷兰在南洋扩张的历史使命。事实上，荷兰人以纯商业模式进行海外开发的起点，还要早于这个时间点。在公元1595年-1602年期间，荷兰商人先后成立了十几家进行东印度贸易的公司。精明的商人眼中并非只有竞争，更会看到因为减少竞争（形成垄断）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在政治家的建议下，各自为战的荷兰商人们很快以股份制为基础，建立了统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之所以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时间点，是因为英国商人在公元1600年取得了女王特许，也成立了面向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单纯从这个时间点看，英国人似乎是以商业模式主导殖民扩张的先行者。然而考虑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实际是把之前十几个小型东印度公司整合为一个大型联合体，且整合后的规模十倍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创者的称号其实应该是归属于荷兰人的。这一点，还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称：“联合东印度公司”看出。实际上，荷兰东印度公司之于西方殖民事业中的开创性，并不在于它在法律层面的成立点到底是早于还是晚于英国，而在于其模式上的创新。简单点说，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东印度公司”，在运行模式上实际都是在模仿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且由于自身内部环境的限制，这些模仿行为都没有达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高度。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它是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股



份有限公司”。权利和风险、出资和收益对等，是一个基本商业原则。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商业合作中以出资份额来确定收益分配比的“合伙制”模式都很普遍。不过这种合伙制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股份制”。

荷兰人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两方面：一是有限责任。过往的商业模式中，投资人往往要承担着无限责任。即使企业破产，也必须由个人承担无限的债务偿还责任。这一模式貌似对债权人更为公平，但也让投资行为的风险被无限放大，进而降低了投资的活跃度。“有限责任”则是指投资人仅以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直白点说，投进去的钱赔了就赔了，投资人不用再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仍有机会再进行新的商业探索。二是证券交易平台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期成立的，还有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位于荷兰首都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包括与之配套的第一家现代企业意义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其上市交易的第一支股票，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这开创了企业公开向社会募集资本，并自由交易的先河，并且让一切交易都变得快捷而有章可循。一直到今天，成立已逾四百年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仍然吸引着众多荷兰内外的企业来此发行股票。



17 世纪荷兰商业公司所占领的土地（浅绿色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占有）

荷兰模式并非完全摒弃政府的参与。有限责任和证券交易平台化的想法，本身也不是新鲜想法。只不过，付诸实施则需要政府的认可和背书。从政治角度来说，将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的“尼德兰革命”，是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共和”体制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荷兰共和国”政府，从属性上保证了政治将服务于资本和商业。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之于东印度公司的角色定位，仅仅是作为一个入股的出资方，

并获取相应的红利（比例为 18%），以维持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这使得私人资本获得了空前的安全感，并极大调动了荷兰民众参与海外扩张事业的热情。资本的主导，甚至让东印度公司在殖民过程中，几乎承担了所有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是权力）。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能够自行组建雇佣军性质的军队，并发动殖民战争，还能够发行货币、建立殖民地，乃至与有关国家订立政治条约。

总结下来，荷兰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后发小国的地位，成为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第三个建立海上殖民帝国的国家，来源于它的更加纯粹的“商业化”属性。这种明显的商业属性，甚至为荷兰赢得了一个“海上马车夫”的外号。如果之前仔细阅读过威尼斯共和国的成长史，相信大家并不应该为荷兰的崛起感到意外。也不会怀疑，商业资本对“政治”的控制能力。不过提前解读荷兰崛起的因素，与我们正在展开的“下南洋”问题又有什么关系？荷兰模式在商业上如此成功，后来为什么又被不成功的模仿者——大英帝国所超越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后面揭晓。

### 第三节 荷兰争夺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

现在我们知道了，荷兰于殖民世界的崛起，在于其创新性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有别于古希腊、意大利那种主要由大商人集团 / 家族主控的经济模式。用马克思对荷兰殖民史的评语来总结这段历史，就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

仔细观察后来形成的荷兰殖民帝国版图，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荷兰人的扩张范围，几乎全在“教皇子午线”授权葡萄牙开发的范围内。这种选择，一定程度是个政治策略。尽管荷兰人为了彻底脱离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断断续续在 1568 年—1648 年间打了 80 年仗（史称“80 年战争”），期间双方曾多次妥协、反复。但总的来说，精明的荷兰人总体掌握了一个战略原则，那就是以葡萄牙势力范围内为扩张方向（虽然为了对抗西班牙，也曾有过合作）。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荷兰人力争脱离西班牙影响期间，西班牙曾经一度透过王室继承，与葡萄牙合并（公元 1580-1640 年）。但在欧洲模块式的政治架构中，这种君合模式并不影响葡萄牙政府、海外殖民地体系的独立运作。换句话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缘政治关系上，一直都没有变化过。荷兰人识时务的将战略扩张的方向对准葡萄牙，也为其最后与西班牙和解，彻底在法律上获得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

除去避免与西班牙陷入战略消耗，进而影响自己的独立进程以外，经济原因才是荷兰人选择向东的根本原因。毕竟对于商人来说，成熟的亚洲市场所能提供的贸易空间，要远大于新大陆。葡萄牙人凭借在非洲岸线的先发优势，得到了这块最肥的资源，足以让任何人（包括西班牙）感到眼红。如果说西班牙还会因为与教廷的

共生关系，遵守着“教皇子午线”的话，那么在意识形态上打着反天主教旗号的荷兰商人们，自然是不会拿教皇的谕令当回事了。

由此，整个荷兰的殖民地开拓史，几乎可以被概括为对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侵蚀。资源丰富，且位置重要的东印度群岛，是荷兰人争夺的重中之重。公元1603年，荷兰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葡萄牙舰队，标志着荷兰人取得了东印度群岛的主导权。接下来，荷兰人先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香料群岛（马鲁古－班达群岛）的贸易权，并将荷属东印度的政治中心，设立在了爪哇岛的西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

17世纪中，葡萄牙在东方航线上的最重要两个支点：马六甲海峡上“马六甲城”（公元1640年）、好望角的“开普敦”（公元1652年），相继落入了“海上马车夫”手中。后者因为气候宜人（地中海气候），成为了荷兰人海外移民的首选之地，并形成了今天南非最大的白人群体——布尔人。只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度受荷兰主导的马来半岛、南非，最终都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荷兰与葡萄牙在17世纪的博弈，甚至一路延伸到了中央之国的领地。在16世纪最初的20多年间，荷兰人曾5次对澳门展开军事行动，但都未能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这个重要支点。与葡萄牙争夺澳门未果后（公元1624年），荷兰人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台湾。后面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郑成功最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台湾，并从地缘政治层面将台湾岛纳入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畴。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澳门及台湾的活动，后面会有专门章节加以解读。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那就是荷兰人在亚洲尤其是南洋的扩张，对华人海外移民动向有什么影响。

#### 第四节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开发南洋引入华人

后人总结西班牙后来的失败原因，很大程度会归结于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模式。比如对印加帝国的掠夺，以及黑奴的高消耗使用模式。这就好像在原始农业时代，烧荒的方式既能平整土地，又得到了种植农作物的肥力。然而待肥力耗尽之后，如果不想出一个可循环的方式养土的话，就只有换个地方继续烧荒了（这种原始农业模式被称之为“游耕”或者“迁移农业”）。

在伊比利亚双雄联手打开新世界窗口时，新世界就仿佛是一片可供无限“烧荒”的原始森林。然而这种原始资源量再大，也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试图分一杯羹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与后来资本起主导作用的荷兰、英国模式相比，西、葡两国对殖民地的权力主导模式，的确存在很大的资源浪费。一切都有如农业进化过程中，粗放农业模式最终被精耕细作模式所取代一样。

与权力主导的社会相比，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的架构是基于“契约”搭建起来的。契约订立双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更能让每一个商人感到安全。在渗透东印度群岛之后，荷兰人在解决人力问题上的做法，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饱受诟病的黑奴劳动力，并没有被大规模引入东印度群岛，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招募的“契约华工”。契约华工或者华人“下南洋”行为的高峰期是在鸦片战争后。有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以“契约华工”的形式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数量将近千万。南洋又是华工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仅新加坡一地所转运的华工，就超过 500 万。很显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外“华人”比例最高之国，与它的特殊位置和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对“契约华工”一事推动最大的，是当时的大英帝国。奴隶劳动力的使用，本质并不符合工业 / 资本时代的需求。这也使得英国在 19 世纪初，是最早提出废除奴隶贸易的国家，并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来解决废奴后的人力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中央之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政治的积弱及时代的转变，也使得晚清政府不再把人口外流视为洪水猛兽。由于需求量巨大，契约华工的签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多拐、骗等强迫现象。以至于历史上，契约华工又在部分地区称之为“猪仔”，签约、转运华工的行为则被称之为“卖猪仔”。

然而将整个“契约华工”式的人口外流现象，视为一种变相的拐卖人口，或者视为“黑奴”制度的变种并不客观。大部分流入海外的华工，还是抱着“淘金”的目的自愿前往海外的。“猪仔”一说，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旅途、工作环境的恶劣，且需要用劳动偿还出海的费用（导致丧失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英国对华工的招募行为，始于 19 世纪末对马来半岛资源的开发，不过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荷兰。

公元 161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将位于巽他海峡东侧的雅加达，定位为自己在东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彼时的雅加达规模还很小，为了自己在东南亚的长期经营，荷兰人不仅将马来语的“雅加达”更名为荷兰语的“巴达维亚”（二战时改回来了），更开启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契约华工”群体也由此出现。当地马来人的劳动效率问题，是荷兰人决心引入华工的主要原因。由于华人很早就开始在南洋各主要港口城市经商甚至定居，精明的荷兰商人很快便做出最经济合理的决定：让中国人来帮助他们建设殖民地。不过单纯将荷兰人的招募对象称为“华工”，倒也不是很准确。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荷兰人并不是直接招募中国人做工，而是把工程或者商业项目（比如种植园）包给有实力的中国人做，由后者再进行招募工作。

荷兰人的这种承包式做法，使得“卖猪仔”一说并没有提早出现在 17 世纪初。换句话说，当时前往爪哇等地谋生的中国人，基本是没有强迫现象的。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种基于各种“契约”而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比如在 18 世纪初，有 80% 以上的种植园主是华人）。这种合作关系使得前往荷兰殖民地谋生的中国人，整体也获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并有在荷兰人与马来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的趋势。然而华人最终却并没有在荷属东印度形成一个中间阶层。那么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事实上，在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扶植政策，最终都可以做到主导当地经济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勤奋和危机意识。由于四季交替，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总有一段缺乏食物来源，需要依靠储蓄来生存的日子。同时，这种资源的相对匮乏，还会使得族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反观低纬度的热带地区，则大都以物产丰富而著称（缺水干旱地区除外），几乎不用为食物来源问题感到困扰。在自然、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为勤奋及更有危机意识的温带民族，一般在竞争力上优势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对教育的重视。与世界其它温带地区不同的是，在华夏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基因中，“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一意识作用下，学习并适应新环境，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本能。一个群体在外谋生时，也往往会倾向于把领导权交给群体中最有文化和学习能力的那部分人（“精英理政”理念）。重视教育的文明基因，甚至使得东亚诸国家/地区，成为这个星球上有机会后发完成工业化的唯一区域。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地缘相近。无论在地理还是人种、农业类型上，东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是最接近的地区。换言之，最起码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一定要去海外谋生的话，东南亚地区是最容易适应的。地缘相近也使得在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在人口上能够源源不断的得到来自中国的补充，最终形成规模效应，沉淀出适应属地生活的社群。

然而一个社群能够在外取得成功，不仅与自身的素质有关，更与身处的环境有关。换句话说，华人群体虽然不需要特别的政策扶植，就有机会在东南亚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但最起码也要有容得下他们生存发展的空间。在17世纪的荷属东印度，这一空间是十分宽松的。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需要借助华人的助力，更希望把前往爪哇各港口交易的中国商船吸引到巴达维亚来进行交易。应该说，荷兰人的政策是十分成功，并且是双赢的。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进入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华商、华工，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济及城市的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华人群体开始向介于荷兰人与土著马来族群之间的中间层发展。

除了经济以外，华人社群还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支撑，才有机会成为一个中间层。荷兰殖民开发爪哇初期，华人社群的规模效应还并不明显。除了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开发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以外，还与清朝初期为封锁台湾岛（郑成功），而严格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一定关系。公元1684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王朝解除了禁海令，允许民间出海进行贸易。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试图前往荷属殖民地谋生的华人数量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人，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开始用审批的手段限制华人入境。通俗点讲就是，在清王朝解除海禁之前，荷兰人对前往自己领地的中国人，持的是开放态度；现在的话，则要用“工作签证”的方式来进行限制了。然而一如美国无法杜绝拉美

移民的涌入一样，荷兰人同样也无法做到这点。

统治阶层的态度，对中间层能否存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这点与中间层谋求的人口规模，却又存在一定矛盾。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你的人口多到让统治阶层有尾大不掉的感觉，那么危机也就到来了。在海禁解除之前，尽管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但定居巴达维亚的华人不过 3000 人。这一数量并不至于让荷兰统治者感到不安。然而在 18 世纪初，仅合法居住于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数量就已将近 2 万。如果荷兰人没有打算把华人群体培养成统治东印度的政治助手的话，对于常住人口数量不过十万出头的荷属东印度“首都”（巴达维亚）来说，这一数字已足以让人感到不安了。除了中国开放海禁的影响以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对华人社群造成了重大影响。至于这个变化是什么，下节再接着解读。

## 第五节 荷兰在香料贸易衰落后引入甘蔗种植

几乎可以充当硬通货的香料，一直是东、西方贸易中最具吸引力的商品之一。在葡萄牙人成功开拓新航路之前，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对抗的需要，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借助对东、西方商路的垄断，推高了包括香料在内的东方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随后打通新航路的葡萄牙人，在为自己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则平抑了香料的价格。

香料贸易上的丰厚利润，是将荷兰人吸引到东印度群岛的原动力。只不过，击败葡萄牙夺取香料群岛的贸易权之后，精明的荷兰人采取了更为极端或者说商业的手段来获取利润，这一手段就是“垄断”。理论上，在一条贸易链上控制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做到垄断，并因此获取超额利润。比如奥斯曼帝国通过政治扩张，阻断东西方贸易的陆路通道；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争霸活动，都可以做到主导东西方贸易中的一个节点。

葡萄牙人的做法，与奥斯曼、威尼斯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曾经解读过，在“发现”印度西南的马拉巴海岸后，葡萄牙很快就着手建立印度洋舰队，并逼迫往来阿拉伯海的商船停靠在自己控制的港口（同时袭击阿拉伯商船）。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物流环节控制香料贸易。至于精明的荷兰商人，在香料贸易上的做法看起来要更加的“釜底抽薪”。荷兰人认为与其费心费力的去切断一条条的海上贸易通道、逼迫商船前往自己控制的港口交易，不如从源头上控制产地。当然，如果某样商品的出产地本身具备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的话，荷兰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荷兰人就不会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征服中国来获取丝绸和瓷器的贸易垄断权。

不过在部分香料产地的垄断问题上，荷兰人面临的难度就要小得多。供应全世界市场的丁香、肉蔻等香料，产地都是来自南洋的“香料群岛”（马鲁古－班达群岛）。那些还处于部落状态的岛民，完全不是荷兰人的对手。为了达到控制货源的



目的，荷兰人不惜对岛上土著进行过屠杀，以迫使对方签订独家供应协议。除此之外，甚至还尝试过减少货源的办法：在选定两个可控岛屿之后，将其它岛屿上的丁香树焚毁。当然，这并不代表荷兰人不会尽力去控制通路了，毕竟不是每一种香料的产地都那么好控制，比如胡椒的产地就要广泛得多。通过海上称霸，荷兰人同样曾经控制过大部输往欧洲的胡椒。这一系列组合拳，让荷兰人从17世纪的香料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益。然而什么事情都有个物极必反的规律。荷兰人的垄断行为，最终却导致了香料贸易的没落。

本质上来说，香料并非像盐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在厨房中更像是奢侈品的定位。一旦价格太高，势必会减少客户的需求。荷兰人在货源控制上最为得力的丁香就是这种情况。减少的需求，反过来拉低了荷兰人的利润。另外，每种香料本身都并非是无可替代的，当一种香料的价格太高之后，人们会倾向于加大其它香料的使用量。比如胡椒因为种植区域广泛，价格就始终比较平稳，甚至因为荷兰人无法控制全部产地，而因竞争激烈、供应充足出现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

说起来，今天西餐配料中，胡椒使用范围远大于肉豆蔻和丁香，与此不无关联。类似情况在很多商品贸易中都出现过，最典型的就是石油了。控制世界主要石油供应的欧佩克组织把价格推高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刺激替代能源的研发/投产，反过来平抑石油的价格。最近两年石油价格持续低迷，就与美国对页岩气的成功开发有头直接关联。另一个同样出现在餐桌上的案例，是韩国人的饮食结构。很多喜欢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在韩国的饮食文化中，“拉面”（中国人眼中的方便面）的地位几乎仅次于泡菜，人均消费量居世界第一。

实际上，韩国人的传统主食跟日本、中国南方一样是大米。上世纪60年代，由于韩国开始进行工业化，大量农地被转化为工业用地，导致大米自给率不足。为了保证粮食安全，韩国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民众，在主食中加入以“拉面”为主的面食（小麦价格比大米便宜）。最后的成果，就是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的韩国，现在生产的大米不仅基本能够自给，甚至在丰产之年还有可能过剩。至于价格，自然也不至于高到影响居民生活了。

回到香料贸易的主题上来。尽管荷兰人在控制香料贸易上煞费苦心，但作为一种可以再生、可以扩大生产规模的资源，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香料贸易最终还是在17世纪后期走向了没落。这并不是说香料贸易就不存在了，而是说它在贸易中的比重开始大幅下降。对于追求利润的荷兰人来说，他们需要找到其它的替代产品，以从战略层面弥补利润上的缺口。具体做法就是引入其它经济作物。地理大发现时代同时也是个物种迅速传播的时代。基于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包括香料、咖啡、甘蔗、可可、橡胶……等在内的经济作物，被各殖民国家有意识的引种到世界其它气候相近的地区。比如荷兰人一直强力垄断的肉豆蔻，就在18世纪后期被英国人想办法“偷”出了种子，引种到了毛里求斯、马来半岛等地的英属殖民地中；东非的桑给巴尔岛，

19 世纪引入丁香之后，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丁香生产地。

而在 17 世纪后期，荷兰人引入爪哇的主要经济作物则是甘蔗。事实上，甘蔗应该是大航海时代最早被引入殖民地的经济作物了。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创者，葡萄牙人在海外的第一个地理发现，是东距摩洛哥 700 公里的马德拉群岛。对于志在印度的葡萄牙人来说，远离海岸线的马德拉群岛并没有航路上的价值。为了开发这片海外领地的价值，此前原产印度，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伊比利亚半岛的甘蔗，被引入了马德拉群岛。返销欧洲的蔗糖原料，则为葡萄牙后来的探险工作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原产印度的甘蔗，在气候相近、土地肥沃的“东印度”（爪哇）种植，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从荷属东印度销往欧洲的蔗糖，在弥补香料贸易利润缺口的同时，也对当地华人的数量和结构造成了直接影响。由于华人的固有优势，特别是在农业上的优势，当地种植产业几近为华人所垄断。种植园、糖厂更因此引入了大量华工。换句话说，客观增长的工作机会，才是以巴达维亚为代表的荷属东印度的华人数量大幅增长的真正原因。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角度来说，只要蔗糖出口顺畅，并不会太在意种植生意交给谁做，包括雇佣哪里的劳工，毕竟荷兰人才是这一产业的最大获益者。更何况一直以来，高效的华人社群出色的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分包任务。然而花无百日红，伴随着华人数量的大幅增长，一场巨大的危机也即将到来。至于是什么危机，对华人在南洋的历史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六节 蔗糖贸易衰落引发荷兰人屠杀华人

任何危机的最终爆发，除了矛盾的累积以外，都会有一个导火索。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爪哇地区时，华人社群兴盛与衰弱的导火索，都源自于一个甜蜜的商品——蔗糖。在人类的食谱中，盐可以算得上是第一必需品。人类之所以需要食用盐，是因为需要盐中的钠离子，来保持细胞内外渗透压及身体的酸碱平衡。如果要找一个仅次于盐的调味料，应该就是“糖”了。

与盐相比，糖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必不可少。不过糖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神经元。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的物质，很多行为（如恋爱）都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除此之外，一些物质也能做到这点，比如毒品。毒瘾之所以难戒，根源上就在于毒品能够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使人在生理、心理上产生依赖感。除了毒品这种强刺激物质以外，我们的食谱中还有很多常见的物质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并产生一定的依赖感，比如咖啡因、酒精，以及烟草中的尼古丁。相比这三种物质所产生的“瘾”（依赖感），很多人对“糖瘾”知道的就比较少了。其实人类之所以对甜食有着天然的喜

好，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糖能够刺激多巴胺的产生（想想小朋友为什么都喜欢吃糖），如果过量食用一样容易成瘾。

多巴胺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没有了它，我们的人生才是一片灰暗。只是凡事都有个度，一旦跨过了这个度，打破了人体的平衡，就会反受其害罢了。毒品之所以可怕，在于它的强刺激性会使得其它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手段，变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能让人一、二次成瘾的硬性毒品，使得人类几乎无法靠自身的意志力来逆转这一成瘾的进程。相比之下，糖、咖啡因等物质的摄入量就容易控制得多了。之所以要对“糖”的功能做一个技术分析，是想告诉大家，从一定层面上看，“糖”的消费市场也是可以像 19 世纪的鸦片一样，被培育、放大的。类似的还有咖啡、茶的消费市场。与后两者比较，糖的市场前景还要更为广阔。因为作为一种高热量的碳水化合物，糖还可以起到迅速为人体补充能量的作用。

在大航海时代起，就从阿拉伯人那里了解甘蔗种植技术的欧洲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糖。这是因为，纬度偏高的欧洲并不太适合甘蔗生长。湿热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才是甘蔗喜欢的环境。这也使得 16 世纪以前，蔗糖在欧洲的价格一度非常昂贵。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贸易流通，欧洲蔗糖消费市场在 16 中期-17 世纪初得以迅速扩大。蔗糖与茶、咖啡等同样来自地理大发现成果混合在一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同时，蔗糖还被加入到各种食品中，以至于今天我们一提到西餐，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各式甜点。

除了商品本身的品质以外，消费市场能否被刺激起来，产能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产能支撑，那么消费习惯就会被引向其它方向。地理大发现为不能自实现蔗糖自给的欧洲，补上了供应端的不足。作为最早在海外殖民地引种甘蔗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得到巴西后，也将甘蔗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引入了这片新大陆。返销欧洲的蔗糖，对欧洲市场的培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巴西仍然是全球种植甘蔗最多的国家。亚洲供应端的打开，也对欧洲市场造成了影响。之前曾经分析过，尽管甘蔗的原产地是在印度，但中国才是最早精炼出白糖的国家。中国产的白糖，甚至销往印度，以至于今天在印地语中“白糖”一词（cīnī）的意思便是“中国的”。将中国产白糖大规模输往印度的，就是 17 世纪在亚洲称霸的荷兰。除了从中国大陆地区进口以外，荷兰人从亚洲得到的货源，更多来自其在台湾开辟的种植园。

由于巴西白糖在运程上有着显著优势。最初荷兰人的白糖贸易，主要是针对日本、波斯市场。不过一直挑战葡萄牙的荷兰，在切割葡萄牙的亚洲贸易蛋糕同时，同样也没有放过巴西（并相应成立了“荷兰西印度公司”）。一系列针对巴西的战争，特别是对巴西海岸重要港口的占领，极大影响了巴西种植园的生产，及蔗糖的出口。尽管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扩张并不成功，但新大陆的战争却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受益者。在巴西白糖供应不足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亚洲白糖，迅



速开始填补空间。

蔗糖贸易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弥补了荷兰人因香料贸易衰落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一如香料贸易一样，荷兰人控制下蔗糖贸易也终会有衰落的一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市场的饱和。就欧洲市场而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培育，蔗糖消费在18世纪中增速开始放缓。与此同时，蔗糖供应端的竞争却愈发的激烈。在亚洲方向，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链产生了重大影响。郑成功在台湾的登陆，使得荷兰人丧失了东方最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也正是从那时起，以巴达维亚为核心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才成为了荷兰人重点开发的甘蔗种植区。基于中国人在甘蔗种植及蔗糖提炼方面的技术优势，荷兰人一直希望招募到足够多的华人，来帮助他们在爪哇重建蔗糖供应基地。

17世纪80年代，清王朝在解决台湾问题后的开放海禁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外“淘金”热，让爪哇的制糖业迎来真正的高峰。据统计，18世纪初在巴达维亚的华人中，有85%都是服务于甘蔗种植园或者制糖厂。这种对单一经济的依赖，也让当地华人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荷兰人失去了对蔗糖贸易的主导权，这些华人何去何从将成为大问题。需要提一下的是，虽然台湾问题的解决，间接帮助荷兰人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却也同时让荷兰人失去了日本市场。因为此后地理相近的中国蔗糖，重新占领了日本市场。为了弥补亚洲市场的损失，荷兰人瞄准了与爪哇地理相近的印度市场进行深度开发。今天印度人是如此的爱好甜食，说起来荷兰人也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事实上，欧洲才是爪哇白糖深耕的主要方向。受益于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当时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世界其它地区。在市场出现饱和之前，荷兰人的东西方蔗糖贸易也迎来了它的巅峰。然而不要忘记的是，从地理位置来看，只需横跨大西洋就能运抵欧洲的美洲蔗糖，才更具优势。随着巴西制糖业的复苏，欧洲市场开始面临西印度蔗糖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一直觊觎蔗糖利润的英国人，也将自己控制下的加勒比地区打造成了甘蔗种植基地，并持续扩张产能。在供给和消费两个终端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荷兰人的蔗糖贸易在18世纪30年代末，开始迅速走向衰弱，大量种植园主破产（导致华工失业）。这逼迫荷兰人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中国人的问题。荷兰人所想到的办法，是将这些华人分散移往其它荷兰殖民地（如锡兰），进行新的开发工作。

从商业角度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似乎并无不妥。然而从自身的文化属性来说，中国农民几乎与荷兰商人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对于商人来说，因为经济结构调整而进行资源（包括劳动力）的调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对于小农经济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对熟悉环境的耐受性要强烈得多。上百年的磨合，已经让巴达维亚沉淀出了成熟的华人社区，华人并不愿意因为短期的经济困难就再次背井离乡，去接受未知前途的命运安排。

公元 1740 年，在两种文明、两种理念的碰撞之下，爪哇华人社群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试图反对迁徙的华人群体与持强硬态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导致上万名巴达维亚华人，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屠杀。由于事发地有一条叫“红溪”的河水，这一屠杀事件也被称之为“红溪惨案”（今天雅加达仍有一个街区叫“红溪”）。

在这里解读“蔗糖贸易”和“红溪惨案”的大背景，并非单纯的让大家缅怀历史。更多在于让大家明白，被动卷入全球贸易链中的海外华人社群，其实很难决定自己命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入上层建筑又可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纯粹追逐利益的荷兰人，并没有让华人社群帮助其统治殖民地的想法。将华人单纯视作贸易链中一环的做法，使得荷兰人会在有尾大不掉感时，毫不犹豫的用强硬手段解除威胁（而不是寻求另一种双赢的解决手段）。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都没有看到过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呢？情况也并非如此。接下来，一个颇有些小清新味道的名字“兰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拨开笼罩在它身上迷雾，也将成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 第二十七章 婆罗洲的族群结构和政治格局

### 第一节 婆罗洲的土著民族及文明发展水平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殖民帝国的形成也是如此。今天大家印象中的西方殖民版图，大多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整合结果。不过虽然列强彼此之间磨合出了势力范围，但具体到对内部诸板块的统治形式，却也是千差万别。这一节将要解读的，就是一个属于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的奇怪华人组织——兰芳公司。

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做大，与地理大发现及后来对世界的瓜分有着莫大的关联。作为这场盛宴的缺席者，甚至是受害者，不少中国人在思考个中原因，也希望能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也曾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的证据。“兰芳共和国”就是诸多历史线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然而历史上，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共和国吗？甚至能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仅比美国建国时间晚一年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

单从名字来看，“兰芳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组织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政治名称。所谓“共和国”之说，更多是当时的西方观察者考察后认为，其已经具备了“共和”及“国”的两个要素，在外交层面有将其归类为“共和国”的行为。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区别土著马来族群所建立的苏丹国或者更原始的部落体（以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定，就是接下来所解读的了。

先来看看“兰芳”所在的加里曼丹岛的情况。加里曼丹岛是印尼人在独立后所取的马来语名称，中国人大都还是愿意称呼它之前的名称“婆罗洲”。尽管面积是南洋诸岛中最大者，但婆罗洲的开发时间及深度，远不如爪哇、苏门答腊两岛。相对较偏的位置及不够肥沃的土壤，是造就这一现状的两大原因。以至于中国人和荷兰人进入开发之时，岛上的大部分土地还是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婆罗洲在开发上的滞后，还体现在它复杂的民族结构上。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今天以南洋群岛为居住地，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的“马来人”种族集团，除了在菲律宾北部的部分皈依了天主教以外，这一种族集团几乎能够与穆斯林划等号。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南洋诸岛上实际还存在部分没有伊斯兰化，甚至还保持原始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同语族部族。尽管在数量上没办法与数亿“马来－穆斯林”相比，但在局部地区却可形成数量上的比较优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婆罗洲。

在马来西亚，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是被认可的三大民族。根据 2010 年的统计，在 2627 万拥有马来西亚国籍的口中，马来族的人口占比为 54.5%，华族为 24.5%，印度族则为 7.3%（注：另有 232 万拥有永久居住权的非公民人口）。那么



问题就来了，这三个数字相加不过为 86.3%，还有数量高达 350 余万的其他“马来西亚公民”隶属于什么民族呢？除了少量外部移民以外（如西方殖民者后代），这些没有被归类于马来西亚三大民族的民族，就是我们刚才指出的，生活在婆罗洲的那部分尚未伊斯兰教化，但在语言、种族属性上却与马来 / 伊斯兰群体相近的部族。在马来西亚的民族结构划分中，他们有一个尴尬的总称——其他民族。

对于已经成为穆斯林的马来族来说，婆罗洲非典型性的“马来人”的存在，多少有些敏感。一方面马来族认为，这些婆罗洲土著天然应该成为穆斯林；另一方面，这些据守山林的婆罗洲土著，却认为已经伊斯兰化了的马来人，实际是入侵了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其他民族”除了坚守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外，甚至会主动选择基督教等其它宗教信仰。另外，还有相当部分土著部族，认定自己的祖先是 1500 多年前从中国西南迁徙而来，华人才是他们失散多年的“远亲”。



加里曼丹岛行政地形图

标签叫做“达雅”。具体的做法是在每一个部族前面，加上一个“达雅”的前缀。比如伊班族，就可以被称之为“达雅 - 伊班族”。

以“达雅”为标签的婆罗洲土著民族，并非只存在于马来西亚，而是遍布整个婆罗洲。与马来西亚规避“达雅”一名称不同的是，在印度尼西亚，达雅已经成为了表列民族。类似对民族划分的不同认定情况，同样也存在于中国。比如对台湾原

出于分而治之的目的，马来西亚并不愿意给那些非伊斯兰信仰的婆罗洲原住民一个统一的族称。在不得已给予族称时，也是将之分别命名为伊班、比达友、乌鲁等名称。但随着婆罗洲（东马）的经济逐渐与马来亚（西马）差距越来越大，这些民族内部却有很强烈的愿望形成一个更高层面的民族共识，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权力。民族的划分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婆罗洲土著最起码可以分为 6 个民族，数百个支系。马来西亚部分的婆罗洲，土著所希望得到的更高一级的民族

住民族的认定，暂时无需承担具体管理职责的大陆方面，给出了一个“高山族”的笼统总称。而台湾方面则列出了泰雅、阿美、排湾等 14 个族名。事实上，这个划分标准也没有得到学术上的认可。换句话说，在不同的专家看来，可供细分的民族数量是有很大大商榷空间的（台湾原住民也属于南岛语系民族）。

缺乏可共同追溯政治（统一）历史，是这些台湾、婆罗洲土著难以整合到一起的重要原因。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了那么多年，每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然形成的部族，自身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甚至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结下了世仇。将之实际整合在一起，本身并不容易。在内部缺乏整合纽带的情况下，外部推进也是一种方式。比如曾经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在建国后都曾经对境内的民族结构做过一次梳理、整合工作。这其中就有基于简化管理的需求，将一些在文化上相近，但政治上没有共同历史的族群，整合为一个民族的案例。然而马来西亚方面却缺乏这样做的动力，因为尽管以伊斯兰教为凝聚点的“典型性马来人”，在整个马来西亚是多数民族，但在东马来西亚的沙巴、沙捞越两州，人口占据多数的却是有可能整合为“达雅族”的非典型性马来人。

一旦东马土著得以整合在一起，并在政治上成为与前述三大民族并立的民族，其信仰上的非伊斯兰化将会被有意凸显出来。在西马或者说整个马来西亚，马来人维持自己在三大族群中统治地位的基础，在于其认定自己才是马来西亚的土著民族，而华族及印度族属于外来民族。由此马来人也可以心安理得的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不管马来西亚的做法是否公平，但在一个地缘结构破碎、多民族共存的国度里，这种做法客观上还是维持了各民族的微妙平衡。尤其是华人占据了经济优势。问题在于，这种外来民族的认定，显然是不能扣在东马土著身上的。东马土著也由此在理论上，享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权力。如果“达雅人”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和行为准则，即使不凭借人口的比较优势，将东马分裂出马来西亚联邦，也有可能与华人、印度两族形成联盟，共同对抗伊斯兰信仰的马来族。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穆斯林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作为掌握政权的马来人，最需要防备的是非穆斯林族群有机会形成统一战线。

作为较晚接受“文明”洗礼的婆罗洲，达雅人及其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并不只存在于马来西亚境内，也存在于印尼境内。依据所在方位，印尼所控制的加里曼丹岛部分，被行政分割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加里曼丹省”，其中除了最靠近爪哇的南加里曼丹省外，达雅土著在其它四个省份均为多数民族。整个婆罗洲可以被归类于“达雅人”的土著民族，据估计总数可能高达 800 万。然而在印尼方面，对于达雅人问题的敏感度，并不如马来西亚那么高。这是因为，印尼部分的加里曼丹岛虽然有数百万达雅人，但放在印尼 2.6 亿的人口数量中，是非常不起眼的。换句话说，爪哇、巽他等穆斯林民族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印尼，并不担心达雅人有机会分离出去。相比之下，反倒是亚齐这种更原教旨，并远离政治中心的穆斯林民族，

更容易有分裂的倾向。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在南洋诸岛中，加里曼丹岛在地缘结构上的神奇之处，并不仅仅是因为马来、印尼、文莱三分天下的格局，还因为有个足以影响岛屿地缘政治格局的土著“达雅人”存在。

## 第二节 婆罗洲沿岸港口形成的苏丹国

从地缘规律上看，类似“达雅人”这种原本整体处在原始氏族状态的土著，将会随着外来民族和文明的入侵，逐渐缩小人口上的优势，直至最终被基本融合。时间已经推进到了 21 世纪，达雅人依然能够在婆罗洲的人口中过半，可以想见，在 18 世纪后期，中国大规模踏上这片土地上时，达雅人在数量上有多大的优势。

人口数量并非是衡量竞争力的唯一标准，否则我们也不会认定，达雅人在婆罗洲的人口比例，将随着外来人口和文明的入侵，逐渐消亡。历史上，达雅人在文明层级上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以至于 18、19 世纪与之接触的西方人，会将他们称之为“猎头族”。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开发台湾岛时也曾碰到。总的来说，越靠近山地的部族，所保持的原始习俗会越多。有考古证据表明，在伊斯兰教席卷南洋之前，婆罗洲的一些沿海点也如南洋其它岛屿一样，接近过印度文明的影响。

不过真正让婆罗洲为文明世界所熟知的，还是伊斯兰教的传播。整个婆罗洲最早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是 15 世纪中的“文莱苏丹国”（后面会具体解读）。此后自 16 世纪起，婆罗洲沿岸的各重要港口，尤其是能直接受贸易线辐射的北、西、南沿海，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据港而兴的小型“苏丹国”。比如西加里曼丹沿海的三发苏丹国、苏卡达纳苏丹国；南加里曼丹的马辰苏丹国等。

鉴于婆罗洲本身的潜力有限，这些小型苏丹国本身在南洋地缘政治舞台上大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其统治范围也多是处在沿海的河口地区。至于说它们的建立者是从马来半岛或是爪哇、苏门答腊而来的马来穆斯林，还是受穆斯林商人影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达雅人，倒是并不重要的。伊斯兰信仰及统治方式，足以将他们融为一体，并与原始达雅部族区别开。对比达雅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马来－穆斯林群体在婆罗洲拥有很大的优势。

换句话说，在伊斯兰教的强大渗透力下，那些沿海苏丹国必将渐渐向内陆扩张，并一点点同化土著的达雅人。比如文莱就一度统一了包括文莱、沙捞越、沙巴在内的整个婆罗洲北部。而这三个地区也因此经常在地缘政治上放置在一起，被称之为“北婆三邦”，或者“砂汶沙”地区。然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却对南洋的伊斯兰进程造成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改变，是处在伊斯兰教传播链最末端的菲律宾北部，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下，成为了天主教之地。在文明开化较晚的婆罗洲，类似的非伊斯兰外来影响也同样存在。



除了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力量以外，华人群体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并对婆罗洲的地缘结构造成了影响。在达雅人的传说中，他们在婆罗洲的起点，或者说最初聚居地位于今天印尼境内的“西加里曼丹省”境内。巧合的是，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华人社团，所选择的登陆之地，也是在西加里曼丹省。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达雅人依赖原始森林维持自身特性

从轮廓上看，婆罗洲大体呈现为一个向东倾倒 45 度的等腰三角形。在地形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自东北部顶点，向南偏西方向延伸的一条高大山脉。我们可以将之称之统称为“伊班山脉”（或者伊兰山脉）。“伊班”之名，源自于东马来西亚境内最大的达雅人部族“伊班族”。

这条主分水岭承担分割印、马两国功能的伊班山脉，其实被命名为“达雅山脉”会更好。当然，达雅也好、伊班也罢，在婆罗洲也许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意味，但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标签来标定它。山脉和原始森林往往是土著文化的最好保护者，这一特点在婆罗洲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接受这种“原始”地理环境保护的，并不仅仅有数百万达雅人，还有非常珍惜的“婆罗洲侏儒象”。

今天生活在婆罗洲的大象，总数量不足 2000 头。作为一个亚洲象的一个孤立亚种，这个数量已是非常稀少了。最新研究表明，婆罗洲侏儒象是一个本该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它们的原产地并非婆罗洲，而是与之隔海相望的爪哇岛。与在亚洲大陆的亲属略有区别的是，生活在更低纬度地区的爪哇 / 婆罗洲象，体型要更小巧一些，即使是成年雄性，身高也不超过 2.5 米。

很显然，婆罗洲侏儒象这一特征是受气候环境影响而自然形成的。就像苏门答腊虎的体型小于孟加拉虎，孟加拉虎又比华南虎更小一点一样（东北虎体型最大）。大约在 200 多年前，几头“爪哇象”被当作王室之间的礼物引入了婆罗洲，并在婆罗洲原始森林的庇护下繁衍至今。不幸的是，在这次带有政治意味的物种迁徙之后不久，爪哇本土的大象便灭绝了。尽管有人认为荷兰殖民者应该为此负责，不过考虑到爪哇岛那恐怖的人口密度，这口锅一定要让某个西方国家背的话，由葡萄牙人来背会更合适（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带来的高产作物）。

由于没有强大的陆地军事压力，婆罗洲侏儒象并没有如他们在印度和中南半岛的表亲一样被训练为战象，因此也没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露脸。之所以在这提一下这种看似无关的动物，是因为他们和达雅文化的存在，其实都依赖于婆罗洲的“原始环境”。如果有一天，婆罗洲的野生大象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达雅文化，也很有可能会随之消失了。当然，即使环境发生了彻底变化，也不代表作为

族名的“达雅”会消失。适应新环境，为原有文化注入新凝聚点，是很多族群在延续并发展壮大时会做的事。达雅人或许也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不再依赖“原始”属性，还能够内部达成共识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数百年前那些引入伊斯兰信仰的马来人，算是作出了一个成功表率。只不过，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族群独立性的话，达雅人显然是不能做出同样选择的（否则就被融合了）。



婆罗洲侏儒象



婆罗洲达雅人

达雅人的这一困境，在 16、17 世纪婆罗洲沿岸纷纷建立小型苏丹国时期就已显现（约有 20 多个）。很多数时候，先期已经接受其它多神信仰，并且建立相对完善统治体系的地区，在传播一神宗教时会更顺利些。简单点说，就是文明开化地区的社群，更容易权衡利弊做出更现实的选择。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是上世纪 60 年代起，基督教在韩国的爆发式传播。今天，韩国信仰各种教派（包括自创的）的基督教徒，数量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摆脱“落后”中华文明的影响，拥抱更有活力西方文明的想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韩国在文化因素上如果有些“复古”的做法，比如一定程度的重新接受汉字，也同样不足为怪。

对于 2、3 百年前那些占据沿海港口的马来 / 穆斯林来说，向内陆扩张的速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达雅人和客观地理环境的“原始”性，是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足够的人力。人力资源是地缘竞争中最重要因素之一。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日本，及至当时的朝鲜半岛，曾经在东北展开了一场移民大战，以期得到这片东亚大陆最后的处女地。尽管后两者，一个在政治 / 军事上占据了优势，一个地理距离上更具优势，但最终获胜的还是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

如果有更多马来 / 穆斯林人口移民婆罗洲，势必加快岛上苏丹国的开发进程。然而相比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而言，婆罗洲无论在航线还是土地资源上，吸

引力都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人口潜力，并且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人”，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 第二十八章 西加里曼丹华人社团的政治演化

### 第一节 华人前往加里曼丹淘金并结成社团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进入南洋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早的。荷兰人对爪哇的开发，掀起了一波移居南洋的新高潮。问题在于，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婆罗洲的苏丹，引入华人的目的，本质都是为了让后者创造经济价值，而华人愿意背井离乡的跨海而来，也同样是为了“淘金”。如果说荷兰人吸引大批华人前往的利器是“蔗糖”的话，那么婆罗洲苏丹们靠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足以让你眼前一亮的矿藏——黄金。

黄金的价值和吸引力自不必多言。人们常常把华人出海谋生的历史，称之为“淘金”，以至于今天若有人出国留学，也往往被冠之以“镀金”之名。殊不知最初大量华人去往海外的目的，真的是去“淘金”。在华人海外淘金的历史中，最知名的地点应该是美国太平洋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了。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的河流中发现了黄金，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前往淘金（原来本地人口只有数百），这其中就有大量契约华工（1852年，仅华工就有3万）。圣弗朗西斯科也因此有了个中国式的名称——旧金山。

一开始“旧金山”前面并没有一个“旧”字，只不过在圣弗朗西斯科发现黄金之后不久，太平洋之南的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发现了金矿，并同样被前往中国招募华工的商人渲染为“金山”。为示区别，美国的“金山”就变成了“旧金山”。这段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华人所数千年积淀出来的“勤奋”基因，使之所能够适应的环境，决不仅仅限于种植园。今天的中国能够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并有在互联网时代领先的态势，这一优良的文化基因同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和澳大利亚并非华人海外大规模淘金的开端。追溯起来的话，黄金对华人的吸引力，在18世纪初的婆罗洲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需要说明的是，早在荷兰人觊觎这片土地之前，华商就已遍布加里曼丹岛各港口，并对当地的商业呈主导之势了。事实上，在荷兰人重点经营的爪哇时，最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相比种植业和采矿业，纯贸易活动所能沉淀的人口并不多，最早在婆罗洲发现并开采黄金的，应该是文莱苏丹国境内的华人。19世纪中，西加里曼丹沿岸的苏丹们也纷纷引入华人勘测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河流，并陆续发现了多处金矿。如果以河流为标识划定范围的话，这些华人覆盖的矿区，从西加里曼丹北部的“三发河”流域，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部的“帕万河”流域。其中又以西加里曼丹中心河流“卡普阿斯河”以北地区为集中连片区。

与荷兰人将制糖业分包中国人的模式一样，西加里曼丹的苏丹们同样也不会直接参与金矿的开采，而是将某一河段承包给某一华人社团，并定期收取租金。这种模式给予华人以相当大的自由，以至于身处婆罗洲的华人群体，开始由经济、文化属性的“社团”，向有政治属性“社会”进化。当然，依托种植业做大的爪哇华人群体，也同样有着这个趋势。只不过强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制造“红溪惨案”之类的强势手段，避免了一切的发生。



西加里曼丹行政地形图

相比在荷兰人主导的巴达维亚等地，华人在西婆罗洲的政治空间要大得多。这很大程度有赖于当地马来苏丹们，并无法有效统治那些人口占优的达雅人部落，因此需要有一支第三方力量来帮助他们做大自己的力量。引入荷兰人或者其它西方商人也是一种选择。只是即使不考虑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单看葡



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军事优势，主动选择他们做合作者也是件很危险的事。尤其婆罗洲的苏丹们自身的力量大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认清这一点的苏丹们，在荷兰人试图取得贸易专属权时，甚至会与当地华商联合起来拒绝这一要求。

这里要先来解读下“社团”这个标签。正式的定义中，所谓“社团”一词指向的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爱好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不过对于这个词，在看港片长大的一批人眼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上世纪8、90年代那些快意江湖的香港电影里，“社团”往往是黑社会组织的自称。当然，不管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所组织的“白”社团，还是帮派性质的“黑”社团，其实都是符合刚才所说的定义的。之所以把前往西加里曼丹采矿的中国人用“社团”一词概括，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个“社团”组织。最初的组织原则与中国曾经存在的洪帮、青帮等帮派组织并无二致。只不过西加里曼丹特别的地缘环境，使之一度有机会登堂入室，进入政治序列。

在西加里曼丹，以采矿业为经济基础所结合成的一个个华人社团，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名称——公司。你没有看错，就是公司。事实上，中国人将商业组织命名为“公司”正是源自于婆罗洲的采矿业。顺便说一下，网络上有种说法，言“公司”一词所源自的孔子和庄子之说，其实是臆造。这两个字连用成词的初衷，就是字面本身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而成的互益组织”。这样一看，是不是和“社团”一词几乎可以划等号呢？

说起来如果不是“公司”一词，最终被套用在了西洋泊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组织上，估计现在海外的社团组织还会自称“公司”。有意思的是，在帮会组织生存空间日渐压缩的今天，很多此类“社团”又开始以现代意义的“公司”形象，游走于正常社会中。再追根溯源的话，“公司”一词涵意的转变，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甚至说就是“兰芳公司”的转型有莫大关联。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下一节我们就将以这一特别的案例，来了解中国传统社群在自然演化过程中（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将如何对接西方文明的。

## 第二节 洪门 / 天地会所选择的凝聚点和理念

说起“社团”或者说“帮会”，就必须提一下“洪门”和“天地会”了。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两个经由无数小说、影视剧演绎过的帮会名称了。其实洪门和天地会是一个组织，通俗点讲，后者是前者对外的俗称。之所以要在这个西方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提到这个组织，是因为洪门不仅几乎是中国近现代所有传统帮会的源头，亦和海外华人社群的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天地会组织中，在普通民众中知名度最高者当属“陈近南”了。金庸老先生在《鹿鼎记》中一句“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便让千千万万喜爱武侠



小说的中国人，知晓了这位天地会“总舵主”的名号。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陈近南其人，又是否真的与天地会及台湾郑氏有那么多恩怨纠葛呢？其实关联是有的，不过千万男士所仰慕的韦爵爷肯定是没有原型的。陈近南的原型真名为“陈永华”，一如书中所写那样，历史上陈永华为郑成功延揽的重要谋士。书中所没有写到的，陈永华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帮助郑成功开启了台湾的华夏化进程。在他的主导之下，郑氏台湾开始系统性的复制大陆以儒学为中心的一整套教育、选才体系（如建孔庙、修学校、开科举）。另外，以农为本，军民两便的围田制度也在他的主导下得到推广。

尽管陈永华推进台湾华夏化进程的意义更大，但相信大家更关心的，还是他及郑氏台湾和天地会之间的关系了。关于洪门/天地会的研究甚多，然而研究者以为依据的历史传说，包括帮派传承文字资料，显见有夸大、附会，及难以自圆其说的成分，以至于研究者们的结论往往互相矛盾。可以确定的是，洪门所产生的时代是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之际，“反清复明”是其在政治上所追求的目标。按照一般规律，旧王朝的记忆只能维持三代，但“反清复明”的口号却一直延伸到了清朝崩溃。甚至在清朝已经成为历史后，当初以这一口号为凝聚点的社团组织，依然能够在1911年以后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中曲折，与清朝为维护自身统治的独特设计不无关联。

与过往很多入主中原的马上政权不同的是，清朝在接受华夏文明及原有统治结构时，设计了一套力保自身民族独立和统治地位的制度（八旗），甚至要求人口占优的多数民族做出一定的妥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剃发令”。剃发令、八旗制度的实施，客观上达到了满洲统治者所要求，但也使得中国社会无法从内心深处彻底接受这个新王朝。由此也很容易把单纯的反政府行为，上升到更高层面的“恢复华夏”层面。

当然，反清或者说恢复华夏，并不一定代表要扛着“复明”的大旗。比如与清朝延绵不绝的“反清复明”运动不同的是，“反元复宋”口号在整个元朝存续期间，都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即使元末韩林儿曾一度名“大宋”，真正用来凝聚反元力量的，也是民间宗教力量。“复明”的口号之所以那么有市场，很大程度与明朝的开国历史有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并出兵北伐之时所喊出的口号（语出《谕中原檄》）。明朝开国时就这一政治口号的成功实践，使之和大明王朝一起，成为了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相比之下，被后人认为始终没有雄起过的宋朝，在这方面就无法有号召力了。从这点来说，如果说洪门一名中的“洪”字，源自于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由此可以看出，有清一代，“反清复明”口号在民间的号召力，与其说清朝那些因各种原因结社甚至揭竿而起的“农民”是在怀念一个遥远的旧王朝，不如说是希望从意识形态层面着手，用“恢复华夏”的愿景引发共鸣。既然“反清复明”之说如此有市场，那么不管是清初那些前明遗民所组成的民间反抗组织，还是后世认

为这杆大旗更有号召力的帮派组织，都会希望寻找到一个点，一个被前朝官方政治背书过的聚结点。

换句话说，以“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为凝聚点，却又兴起于草根阶层的洪门社团，需要有一个真正能代表“明朝”政权的政治势力来提升其政治出身。作为明朝所遗留下来的最后抵御者，郑氏台湾很显然就是最合适的对象。如果去看洪门“南少林”、“洪门五祖”等初创传说，就会发现他们都带有鲜明的闽粤属性。也可以这样认为，在明末清初中国各地所涌献的民间反抗组织中，能够与郑氏台湾发生联系的“洪门”，在意识形态和传承上占据了最有利的地位。以至于晚清三大帮会中的另两个：活跃于江淮下游的“青帮”、兴盛于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最终都愿意将自己的历史置于“洪门”之下。

那么，洪门与郑氏台湾之间是否真的有联系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依托台湾、经略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及其后人，与东南沿海的民间反清复明组织，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属性上的互补性，都使得二者有结合在一起的需要。不过这不并代表说，是郑成功或者陈永华创立的天地会，只是说双方在当时的确有一定层面的合作。将郑成功及陈永华等有“明朝”正统出身的政治人物引入社团的历史，有助于抬高“洪门”的出身。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日本。在日本侵华战略中，志愿打前站的民间社团组织“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与日本政府/军队就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只不过在日本已经完成国内整合的情况下，“黑龙会”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民间社团力量，政治目标比之中国的“洪门”要更为宏大，是帮助日本帝国夺取并消化中国东北地区罢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洪门所抢占的“反清复明”制高点，使之在整个华人社会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可以说，任何对现有体制、社会、法律不满，乃至仅仅是想垄断某一经济领域以谋利的人，都可以附会于这个出身高大上的组织，包括参照其既有的组织架构建立实际独立的帮派。在西方人看来，洪门内部的组织形式颇有些民主、共和的意味。这是因为，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式社群不同的是，洪门组织在成员关系上要更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洪门中人最引为自豪的信条之一。建立在这一信条之上而形成的组织架构，也就有了推选、议事等看似与西方民主类似的形式

用更具平等意识的“兄弟”形式，聚结更多个体的这一理念并非洪门所独创。在上一个异族主政中原的朝代——元朝时期便已蔚然成风。随着创作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两书的流传，以及又一个异族统治期的到来，这一能够最大限度淡化个体原有身份、年龄、阶层背景等因素的统战形式，不仅在理论上有了可供参照、引用的“典籍”（包括关羽这个“偶像”），更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

事实上，在宗教及至现代政党的发展史中，内部个体在身份上的平等，都是迅速获取群众基础的利器。比如在伊斯兰教教义中，认定穆斯林皆兄弟的理念，就使

其成为了扩张最为迅速的宗教。甚至以此理念在印度教及种姓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南亚地区，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又比如在 20 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崩塌之际，国、共两党都选择了“同志”这个更据平等意味的称呼，来塑造党内的人际关系。

### 第三节 青帮的起源及其组织架构

既然已经说了洪门，那自然也就不免再提一下后来与之并立的“青帮”了。由于“青帮”的出现，洪门也经常被称为“红帮”，以便与之对应并统称为“青红帮”。其实从洪门的组织原则及文字的本意来说，“洪门”之称会更为精准。这里所说的“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标准，一个帮派只要认可以“反清复明”（或者说“恢复华夏”）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即可跨进这个“门”里成为组织的一员。

反观青帮，在组织架构和原则上则要严格得多，也要“传统”得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青帮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以“兄弟”理念为基础，而是与父子相传类同的“师徒制”。每一个进入帮会的成员，都要找一个师傅拜入门下，并且位列相应的字辈。这点，相信对黄金荣、杜月笙等旧上海青帮人的事迹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到。

比之师徒制更为模仿血缘纽带，突破传统宗社扩张瓶颈的做法，是收“义子”行为。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个民间帮派圣典中也能找到例证，比如将关平设定为关羽的义子（实则可能是亲子）。这一做法的历史，要远早于结拜异姓兄弟的形式。类似唐朝李克用蓄养“十三太保”（12 个是养子）以为爪牙、历代宦官收养子以为外援的做法不胜枚举。不过这种做法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局限性还是太大，最起码在做大帮派之时，不如师徒制门槛低。后者只需在强化“师徒如父子”的信条，并在组织架构中注重长幼尊卑之感，便可收到如宗社组织一般的稳定度。

总的来说，以“师徒结构”凝结起来的组织，是对传统宗社组织的一种模仿和变通了，其横向扩张力度上不如“兄弟关系”统战而来的洪门。由此江湖上也有“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之说。不过凡事都是利弊共存，青帮覆盖范围虽远不如洪门，但却因金字塔型的结构，在组织上更为严密，也更有执行力。青帮之所以做出了和洪门截然不同的选择，在于青帮诞生的地缘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与洪门靠“反清复明”政治理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同的是，青帮的诞生缘起于一笔生意，一笔必须和清廷合作才能完成的生意。

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除了熟知“天地会”（洪门）这个以清朝为时代背景的帮会组织外，一定对“漕帮”之名也不会陌生。这个依托南北粮食漕运发展起来的帮会，真实的原型其实就是青帮。随着南北运河的打通，以及长江下游农业的日趋成熟，南北漕运也逐渐连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18 世纪 20 年代，从清朝政府



手中获得漕运权的青帮也由此发迹。也可以说，这之后的漕帮，所指向的就是青帮。由于漕运经济在地域上的局限性，青帮并不需要像洪门那样有海纳百川的能力。反之，却需要更高的组织性，以完成政府承包给他们的任务。这使得青帮在组织理念上，与洪门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另外，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取漕运权，青帮必须撇清与洪门的关系，这从其帮名又被称作“清帮”就可以看出。理念及组织形式的不同，使得青帮并没有成为洪门的一份子，而是最终发展成与之鼎立的江湖第二大帮派。

然后青帮却又并非与洪帮无任何关联。一般认为，青帮创立者原出自洪门，因其与政府（清）的公开合作，而被看作是洪门的叛徒。从二者的定位来说，即使没有最初的渊源，洪门将有“红顶商帮”性质的青帮视为异类也属正常。不过在19世纪后期，两者存在渊源的这一观点，同时得到了两派的背书。这是因为，随着海运的兴起（包括太平天国对江南的占领），漕运开始进入衰弱期。利益的受损无疑导致了青帮成员对清政府的不满，转而愿意在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中为自己扣上一顶“红”帽子。至于洪门中人的态度，江湖第二大帮会愿意来认自己为祖庭，自然也不是坏事。

从大历史背景来看，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以及海洋重要性的提升，漕运在19世纪后期的衰弱、消亡实属必然。然而这并不代表“青帮”会就此消失。毕竟100多年的经营，使得青帮已然拥有了严密的组织架构及足够的人力资源，其对“垄断”经济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对物流的垄断），亦非其它帮会可比。如果有另一个可以拥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平台在侧，还是很有机会抢得先机的。

那么，这个能让青帮凤凰涅槃的新经济平台又会在哪里呢？结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革，答案呼之欲出。它就是身处漕运起点的长三角地区，同时又能为古老的中央之国对接海洋的“上海”。只不过，为适应新的形势，之前垄断漕运的行为演变成了“抢码头”。直至“码头”这个概念，由江河之滨扩张到了火车站、娱乐场所，乃至一切可能被帮派所影响的经济领域。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家脑海中一提到“青帮”的概念，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上海青帮大佬的形象，而很少有人能够联想到武侠小说中的漕帮。

好了，通过了解洪门、青帮所产生的地缘背景，大家应该了解了，这两个江湖帮会其实是代表了两种组织模式。二者共同点在于，都是植根于中国民间自下而上形成的。虽然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这些民间帮会架构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即使偶有像明朝这样借助“明教”这样的民间社团组织登堂入室者，也会在建立传统官僚体系后，迅速与之划清界线。不过时代的剧变还是在南洋给予了我们一个观察民间帮会组织，在抛开上层建筑影响的情况下对接现代文明的窗口。下一节，我们就将具体解读西加里曼丹华人社群的变迁。

#### 第四节 加里曼丹华人以洪门组织方式聚结

洪门和“反清复明”思想能够延绵不绝，除了“恢复华夏理念”天然所具有的群众基础以外，与东方被西方的“发现”也有着莫大关联。东西方贸易线的打通，客观上激发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潜力，并使得海外华人移民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绝大多数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初期并没有移民的打算，所希冀的只是赚钱养家，最后落叶归根。然而在陌生的环境中，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单打独斗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成一个个群体，以共同抵御风险、争取利益成为了自然选择。这种聚结群体的做法，可以被称之为“社会性”。

“社会性”并非人类所独有的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很多动物（如蚂蚁、蚂蚁）也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性。不过人类作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比之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来说，总归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体现在“社会性”的特点上，就是人类懂得以某种后天创造的“意识形态”为聚合点，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而其它生物，包括人类最初所遵循的组织原则，仅仅是基于天然的血亲关系。

鉴于过往的一段历史中，“意识形态”一词在中国经常被窄化为政治意识。实际上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一直说，主义也好、宗教也罢，都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任何对事物的观点和认知，都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所能涵盖的人越多，它在政治上想象空间也就越大。从这点来说，创立“一神教”概念的犹太人，之所以无法竞争过2.0\3.0版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在于“犹太”社会的基石是建立在血统，甚至是基于母系传承的血统之上。

以血缘纽带聚结为群，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犹太人算是这个星球上少有的“原教旨主义者”了。唯一不同的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面积太小，且处在地缘关系复杂的地中海之侧，使其无法依靠如此“原始”的组织原则做大族群。其所创立的，在传播力上如此“先进”的意识形态——犹太教，客观上只被用来避免族群解体；而身处东方，地理位置上定性为“海中地”的华夏社群，则有机会成长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人口数量最多的一枝。

现在问题来了，前往南洋淘金的华人，是否仅用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就足以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马来人、达雅人，乃至西方列强的竞争呢？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你不能单凭一句大家都是马来人种或者基督徒的口号，就让印尼、马来西亚合并，欧洲统一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走出国门之后，基于血缘关系而凝结成的一个个基层宗社组织，是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了。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就将面临显而易见的人力短板。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中国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关系，以及“反清复明”理念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得洪门的组织形式成为了海外华人社群的普遍选择。比如在20世纪初，旧金山据称就有90%的华人

隶属于洪门致公堂。这促使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在发现这一特点后，政治性的选择了加入“洪门”组织。后者及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今天中国的政党序列中，还有“致公党”一席之地。

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在推翻清朝之后，“恢复华夏”的口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反过来，洪门“兄弟会”联盟式的组织理念，却一定程度使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边缘化。在出身洪门的政治人物看来，联邦式的“联省共和”制，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重建的基础。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经与孙中山政见不和，甚至炮轰中山舰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后者在下野之后，在香港着手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转型成为了政党式的“中国致公党”。与洪门组织在推翻清朝后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富庶且临海的上海及江浙地区成为“民国”地缘中心后，组织严密、执行力强的青帮组织，反而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露脸机会（虽然是作为工具）。以至于一直有传闻，蒋介石曾经一度加入过青帮。

上述内容，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看待 20 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解，海外华人社团为什么会倾向于以“洪门”思想和组织形式来凝结社群。18 世纪中后期的西加里曼丹地区，便是较早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洪门式组织试验田。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活跃于西加里曼丹的各个华人“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几乎都可以被归类于“洪门”组织。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特点，同样为西方研究者所关注，其英文名称即为“中国兄弟会”（Chinese masonry）。之所以在前面要标注“中国”二字，是因为比洪门思想在中国的兴起稍晚一点（18 世纪初），英国也诞生了一个“兄弟会”组织——共济会，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在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展壮大。

最近这些年，随着一些中国研究者引入将共济会与操控世界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共济会组织在中国也成为了阴谋论理论中的常客。由于中、西两个兄弟会在形式上有颇多类似之处，甚至有人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似点，只是一种基于传播力考量的自然选择罢了。就像中、西方政治史都经历过裂土分疆的“封建”模式，但并不存在谁模仿谁一样。与洪门的组织原则类似的是，共济会也试图用兄弟关系抹去被吸纳者的背景差异，以获得尽量多的受众。不同的是，二者诞生的环境不同，导致在意识形态的选取上有所差异。如果说“洪门”组织在吸收成员时的门槛是“华夏”身份及认同的话，那么共济会成员的底线则是对“神”的敬畏感。即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共济会，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有神论者。

事实上，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说的话，洪门所主张的“华夏”认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血缘传承而形成的“祖先崇拜”（清朝统治者并不愿意在血缘上附会华夏身份）。看到这里，会不会再一次感受到地缘的力量，回想起中、西方地缘模型上的“海中地”、“地中海”差异来？对于地缘结构复杂的“西方”来说，“神”



在意识形态统一方面的作用，要远大于古老的中央之国。

共济会在西方是否真的那么有能量，又是否真的操控世界，并不是这里所要探究的方向。不过可供参考的是，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制造一个类似的阴谋概念的话，洪门倒是极佳的选择。如果根据一些表面特征，及组织出现的时间顺序进一步开脑洞的话，你甚至能得出共济会是洪门在西方的分支，进而演绎出洪门控制世界的故事来。好了，头脑风暴至此结束，下一节我们将回到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问题上来。

## 第五节 兰芳公司与和顺总公司的建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于成千上万涌向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来说，并非天然就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无可能因为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或者洪门兄弟，就会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之争。由于闽粤地区族群结构的复杂性，海外华人在抱团取暖时，最初都会倾向将个人的地缘属性作为重要标准。比如说兰芳公司，核心成员就是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同时，前往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亦以客家人为主。

从商业角度来说，随着竞争的加剧，兼并、重组，直至形成垄断共赢的局面是一种趋势。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至荷兰（尼德兰）共和国的建立，本质都是基于这一商业规律。这一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主要聚集于三发河——卡普阿里河下游之间的数十个华人公司，在18世纪70年代大体重组为了两部分：一是南部的“兰芳公司”；二是北部的“和顺总公司”。前者的核心采矿区被称之为“东万律”；后者的核心采矿区则被叫作“蒙特拉度”或者“打劳鹿”。

与西加里曼丹为所谓“兰芳共和国”一统天下的网络宣传有出入的是，兰芳、和顺两大华人集团，一直共存到了1850年，直至后者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征服。“兰芳公司”之所以成为西加里曼丹华人社会的代名词，更多是因为荷兰人在征服和顺等华人公司时，兰芳公司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而较晚被消灭（因此保留下来了更多资料）。

另一个有意无意的认知误区，是撇清“兰芳”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甚至将之描述为竞争关系。这当然是由于所谓“兰芳共和国”已经被拔高为了一面共和旗帜，将它的出身与一个帮派色彩浓厚的组织挂钩，实在是自辱这一定位。然而，兰芳公司的天地会组织性质，却是又客观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愿意相信兰芳为亚洲“共和”体制开拓者的研究者，会将兰芳公司的一些竞争社团笼统称之为“天地会”，并认定其天地会式的组织形式，只是向后者借鉴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华人共和国，但说华人自18世纪中后期起，一直主导当地经济，及形成了稳定的华人社会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尽管

吸引华人前往西加里曼丹奋斗的是西加里曼丹的金矿（此外还有部分金刚石矿），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华人社团一开始都是从事采矿业。要知道，一个聚集了数以万计华工及其家属的区域，粮食的供给本身也是一笔大生意，尤其中国人的食谱跟当地土著有很大区别的情况下。



西加里曼丹华人势力分布图 (18 世纪 70 年代)

与此同时，意识到危机的其它华人公司，也开始分出人手开辟自己的农业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个的矿业公司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结构齐全的华人小社会。

对于习惯于打造自循环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发生在海外的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即使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也还遗存有很多基于某项产品生产，比如钢铁生产、石油开采，而衍生出的一个个“企业型社会”。这些大多为国企的大企业，不仅拥有

在绝大多数公司专注于采矿之时，部分华人开始注意到了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巨大商机，兰芳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类似的商机在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淘金热中也同样呈现。在绝大多数人把“金”理解为水中的砂金时，某个顺势发明耐磨帆布牛仔裤的美国人，也淘到了自己的“金”。相比牛仔裤，粮食要更为刚需、更容易因垄断而扩张势力。在采取结盟的方式与其他采矿公司联手消灭自己在农业领域的竞争者后，兰芳公司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张，并开始染指西加里曼丹的矿业。

医院、学校，甚至还有派出所等社会性机构，甚至在人员流动上呈现出很大的自循环性。只不过在政治结构稳固的中国，这些“企业型社会”并没有机会进化为政权罢了。

兰芳公司存在了约 112 年（1776 年～1888 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兰芳公司与其它华人采矿公司一起，在西加里曼丹打造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华人社会。由于没有更高一级的政治保护，西加里曼丹的“企业型社会”同时还衍生出了自己的行政、执法，乃至军事机构。有稳定的社群、有固定的领地、有政治属性的管理机构，这一切都使得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采矿公司，已经具备了成为“国家”条件。

由于东西方地缘背景的差异，无论是兰芳还是其它华人公司，本质都不是西方类型的“共和国”。比如其在法律层面所依托的，是洪门那些属于习惯法范畴的帮规。当然，所谓共和国的本质，是认定“国家”是属于全体公民，而非个人的。从这点来说，以洪门“兄弟”式关系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被称之为“共和国”，也并无不妥。只不过，当时的华人社会还没有这种认知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已经具备了“国家”各项特征，但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那就是国际认可。每一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国际法则，比如想从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得到好处的话，获得中国皇帝的认证就是必经的程序。就现在的“世界”而言，联合国则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国家身份的认证机构。西方支持建立的从塞尔维亚脱离出来的“科索沃共和国”，以及在俄国支持下，从格鲁吉亚脱离而出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尽管都有些国家予以承认（前者甚至达到 100 多个），但在联合国五常没有形成共识之前，都还是很难被认定为是正常国家的。

那么在 18-19 世纪的西加里曼丹，如果当地的华人社团有意组建国家的话，他们客观上又应该取得哪一方的认证呢？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是一种方法。有观点认为，兰芳公司似乎这样做过，不过并没有结果。以中央之国无意向海外扩张，并视移民为“天朝弃民”的一贯做法来说，无论是否做过这种努力，结果其实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更大的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欧洲人才是这个时代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具体来说，西加里曼丹华人真正要面对的，是已经将南洋群岛视为自己领地的荷兰人。

很不幸，并且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荷兰人完全没有把西加里曼丹华人社团视为平等国家的想法。早在 17 世纪初，荷兰人就曾经尝试过登陆加里曼丹岛。不过一方面因为当地土著的激烈抵抗，另一方面也由于加里曼丹岛的资源，在南洋几个主要岛屿中实属较低的。因此一直到 18 世纪末，荷兰人也只是在岛屿南部，传统上属于爪哇岛政治辐射范围的南加里曼丹沿海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

西加里曼丹马来苏丹们与华人采矿公司之间的矛盾激化，是荷兰人得以渗入的原因之一。这些将华人社团引入自己领地淘金的苏丹，无疑从华人的辛勤劳动中获



得了巨大利益。有记录表明，在华人社团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采矿的 18 世纪中期，仅三发地区的马来苏丹，每年都能够得到 500 两黄金作为地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尾大不掉的情况终于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入，及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使得华人社团开始不满足于承包商的地位，开始谋求独立地位。

以“兰芳公司”及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皆为 1776 年）成立为标志，西加里曼丹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身处这片土地的华人采矿公司、马来苏丹国、达雅人部落之间冲突不断。由于华人在经济和组织力上更具优势，且已经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局势一直朝着有利于华人的方向发展。

当苏丹们认为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是主要威胁时，他们倾向于引入华人力量来帮助自己稳定统治；而当华人势力开始做大时，雅加达的荷兰人又反过来，成为了苏丹们制约华人社团的外援。19 世纪 20 年代，荷兰人的军队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并在当地苏丹的支持下进驻三发、坤甸地。荷兰人的到来，当然不是出于维护马来苏丹们的利益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整个西加里曼丹。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做的是逼迫是华人采矿公司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保护（包括悬挂荷兰国旗）。很显然，这种做法将极大影响华人采矿公司的独立性及利益。

任何一个群体在面对这种境遇时，都会自然分化成两派。总的来说，在荷兰军队登陆并开始向华人采矿公司施压之后，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倾向于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将荷兰人赶出西加里曼丹。除了军事上的抵抗以外，寻求英国人的支持，是其在外交上的策略之一。

## 第六节 英国和荷兰划分在南洋的势力范围

与荷兰人在崛起之时，战略性的对标葡萄牙不同的是，大英帝国更多是伴随着对西班牙殖民地的侵夺而崛起的（同时与葡萄牙结盟）。这很大程度与英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足以与西班牙抗衡的人口优势有关。从 16 世纪末起，通过一系列针对西班牙的战争，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拓展殖民地。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不仅击败了西班牙，还击败了试图与之全球争霸的法国人，包括也尝试分一杯羹的荷兰人（纽约就是荷兰人开拓的殖民地），成为了整个北美地区的霸主。

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独立意识的增强，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大英帝国在西线的殖民事业遭受了重大打击。在新大陆的殖民事业出现转折之后，英国人开始将重心转东方。包括印度、东印度群岛，乃至中国的贸易线，成为了大英国帝国再次崛起的希望。虽然早在公元 1600 年，英国王室便授权组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对印度的贸易，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英国的殖民重心此前一直在美洲方向。如果说在北美的扩张，是以移民的形式进行真正的“殖民”的话，那么承包给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更多只是一桩生意罢了。

我们可以以美国独立战争为分界线，将此前主要在美洲政治扩张的大英帝国，断代为“大英第一帝国”；此后主要在东方扩张的大英帝国，称之为“大英第二帝国”。以后解读北美地缘结构之时，“大英第一帝国”将会是主角。先行交待这一背景，是因为在英国人开始染指南洋之后，这一地区海外华人的命运便开始与之紧密捆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国殖民帝国的扩张，东印度公司这种纯粹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型社会”，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在 18、19 世纪相交之际，最早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公元 1799 年）。此后荷兰人开始以“荷属东印度”为行政框架，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开拓的殖民地进行政治整合，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印尼。

由于英国人还要利用商业力量扩张他们在东方的势力，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延续的时间要长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过在“大英第二帝国”时期，它的权力开始被逐渐削弱（后面会具体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在马来地区获得的第一个据点，是马来半岛西北部的“槟榔屿”（1786 年），此后又在马六甲海峡中、东部拿下了马六甲、新加坡两个点，并组成了用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峡殖民地”（1826 年）。英国人的强势渗入，无疑会影响到荷兰人的利益。特别是作为马六甲航线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城此前一直为荷兰人所直接控制。然而尽管荷兰人最初是通过与葡萄牙的战争，才拿到马六甲的控制权的（1641 年），这次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却没有再次引发战争。在审时度势后，英、荷两国选择了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随后马六甲城也被荷兰人移交给了英国。

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这一决定很好理解，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已是世界最强。换句话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无法阻挡英国人的进入。一定要撕破脸的话，即使英国人不用全面战争的方式攻击荷兰，单是封锁马六甲海峡也将让荷兰商人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时，作为一条重要航路，马六甲海峡的争夺并非一场零和游戏。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精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实更愿意通过控制商品供应地来达到贸易垄断的目的。为此荷兰人在经营南洋群岛之时，将统治中心放在了人口、资源最丰富的爪哇岛（雅加达），如果英国人不是谋求独占马六甲海峡的话，那么荷兰人的核心利益并不会受损。

反观英国人的态度，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同样可以尝试拿下整个南洋群岛，特别是人口资源最为丰富的爪哇岛。英国人没有选择这样做，更多是从欧洲地缘政治平衡的角度来考虑的。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只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海外殖民地只是用来争夺中心控制权的筹码罢了。无论在欧洲还是海外，法国都是英国最大的对手，尤其在英荷条约签订之前，整个欧洲刚刚被“拿破仑帝国”（1803-18015）横扫过。更为让人担忧的是，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普鲁士王国的崛起，又使得长久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开始出现统一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法德之间的荷兰（比利时当时归属于荷兰），对英国来说

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就像英国一直在战略上与葡萄牙结盟，以牵制西班牙一样。即使圆滑的荷兰人在以后的政治博弈中不明确的支持英国，将之逼向法、德阵营对英国来说也没有好处。除了考虑到欧洲的地缘政治平衡以外，英国人对整个南洋也没有志在必得的想法。从贸易来说，整个东方最有诱惑力的无疑是印度和中国两个超级市场。深耕并垄断印度市场、开拓中国市场，是“大英第二帝国”在 19 世纪的战略方向。至于后来所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英国人在印度及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没有哪个殖民帝国能够先后在东、西两线取得如此成就，“日不落帝国”也就此成为了英国的标签。

要想将中国和印度两个市场连接起来，马六甲海峡自然是贸易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只要能在马六甲海峡拥有稳定的据点及势力范围，并且竞争对手尊重这点，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基于上述考虑，英国与荷兰最终于 1824 年签订了“英荷条约”，划分了双方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及相应的贸易原则。其中事关地缘政治走向的主要有：荷兰将在印度沿岸及马来半岛的据点交给英国，以帮助英国控制印度和马来半岛；英国则不介入新加坡海峡及马六甲海峡主航道以南地区的争夺。即认可廖内群岛及苏门答腊岛属于“荷属东印度”的势力范围。

英荷条约的签订，奠定了今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边界基础。在这一条约保护下，英、荷两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利益都得到了保证，同时共同阻止了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至于西方在南洋的最早开拓者——葡萄牙，即使没有英国的介入，他们也只剩下南洋群岛最东部的半个帝汶岛（东帝汶）了。事实上如果不是与英国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而英国又在南洋与荷兰两分天下的话，荷兰人在 19 世纪中一鼓作气拿下东帝汶也未可知（1859 年荷葡签订条约，正式瓜分帝汶岛）。

顺便说下，如果说葡萄牙在南洋还能够保留一块自留地，只是间接受益于其与英国稳定的地缘政治联盟的话，那么在大英帝国完全控制南亚次大陆之后，葡萄牙还能在沿海维持果阿、达曼－第乌等“葡属印度”的存在，甚至到印度独立后还试图保留，则完全得益于这层关系了。在了解上述地缘政治背景后，相信大家对印度、南洋现在的一些行政划分有了更深的理解。不过，这一切与 19 世纪南洋华人的命运又有什么关联呢？

## 第七节 荷兰征服西加里曼丹诸华人社团

前面我们说过了，在荷兰人决定军事征服西加里曼丹时，代表主战势力的“和顺总公司”（位于西加里曼丹北部）试图寻求英国人的帮助，或者说纳入英国的贸易网，以摆脱荷兰人的控制。然而问题在于，荷兰人之所以能在 19 世纪 20 年代前后军事登陆西加里曼丹，直接原因就是英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在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



布局。这一威胁使得原先一家独大的荷兰，不得不加速控制那些原本被视为鸡肋的地区。

英荷双方快速达成和解的消息，对于华人公司来说并不是好事。尽管根据最初显示的消息，英国人愿意与之进行贸易，甚至曾经派人来岛上考察（19世纪30年代），但基于不引发新矛盾的考虑，英国人还是放弃了介入西加里曼丹事务的想法。最终在19世纪50年代，荷兰人彻底征服了以和顺总公司为代表的力图维持独立的华人势力。在整个荷兰人的征服过程中，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希望用接受荷兰人统治交换自治权的华人公司，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组织模式来改造原有架构。也就是说，正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传统社团性质的华人“公司”，开始与西方意义的“公司”接轨。

将西式商业组织称之为公司的做法，在中国本土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大门之后。这一概念的传播者，应该就是已经在南洋接受西方制度改造的部分华人采矿公司。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概念更替的阶段，仍有传统社团以“公司”之名自称。比如1853—1855年在上海起事的天地会式组织——小刀会，对外声称自己为“兴义公司”，就还是传统的社团组织。

兰芳公司所做出的妥协，使其得以存续到19世纪80年代。然而一如之前在巴达维亚（红溪惨案）的情况一样，荷兰人并不打算把华人培养成帮助他们统治土著马来族群的政治助手。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更愿意让马来苏丹们辅助他们进行政治管理，而让华人施展经济才能，以此来相互牵制。鉴于华人在西加里曼丹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这种选择并不算错误。日后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统治，大体也是遵循这一分而治之的模式。

在得知自己所据有的土地将被荷兰人划归马来苏丹们管理之后，兰芳公司和其它留在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武装反抗。只是这些抵抗并没有改变政治属性的华人社团彻底消失的命运。尽管此后西加里曼丹仍然留有大量华人，并客观上主导着当地经济，但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的终结，已经再所难免了。

在华人生存空间受到荷兰人挤压之后，一场以西加里曼丹为起点的新迁徙活动也拉开了序幕。不过那些不愿意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华人，并不用离开已经熟悉了的马来地区。毕竟荷兰人并没有统治整个南洋，甚至还没有拿到全部的婆罗洲。在其它尚未被西方人入侵的马来苏丹那里，包括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华人还有希望找到新的机会。至于这场迁徙又对整个马来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二十九章 北婆罗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 第一节 华人与英国人渗透入婆罗洲北部

1824 年的英荷条约直接决定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包括荷属东印度基地性质的爪哇岛的归属。在整个条约中，新加坡海峡作为马六甲主航道入口，成为了英荷划分势力范围最重要的依据。以新加坡海峡所处的纬度来为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爪哇岛——帝汶岛一线的大巽他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曾经为各方争夺焦点的“香料群岛”（马鲁古—班达群岛）等南洋主要岛屿，最终都成为了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并为后来的印度尼西亚所继承。

不过英国人在马来半岛以外也并非一无所获，今天整个婆罗洲呈现马来西亚、文莱、印尼三足鼎力的局面，就是英国人介入的结果。其中文莱以及被统称为“东马”的砂拉越、沙巴两州（合称北婆三邦），在独立之前都属于英国殖民地。如果以新加坡海峡所处的纬度为切割线的话，会发现整个“砂文沙”地区大部都处在这条线的北部。在英荷正式签订条约之前，英国人已经开始尝试与北婆罗洲地区的苏丹们接触，试图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新加坡海峡这个坐标的确立，从法理上让荷兰人无法在婆罗洲独美，并最终导致了一岛分三国的地缘政治奇观。

文莱苏丹国在之前的行文中已经多次出现。根据中国史书记载，作为岛上最强大及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文莱最早的名称为“渤泥国”。公元 1408 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率众前往南京朝贡，后病故于中国。在传说中，这位被明王朝厚葬于南京的国王，其实是一名叫作“黄森屏”的中国人，以至于今天文莱首都还有一条路以“黄森屏”命名。当然，传说只是传说，也无法得到文莱王室的认证。即使中国人真的曾经在文莱建国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不会影响文莱的马来属性。

不过基于文莱苏丹国的位置，有机会率先与中国发生地缘联系是可以肯定的。前面我们也说过，前往西加里曼丹采金的华人，就是从文莱而不是中国招募的。相比立国日久的文莱苏丹国，西加里曼丹那些小型苏丹国的控制力显然要弱小得多（反之则自主空间大），这也使得西加里曼丹迅速成长为华人汇集之地。在荷兰人强势登陆，并开始以武力夺取华人的矿场之后（同时将这些矿场交给配合的公司开采），西加里曼丹北部的华人采矿公司被迫开始转型农业以自救，然而这显然无法与采矿的利润相提并论。为此，部分华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婆罗洲北部，即当时属于文莱苏丹国范围的砂拉越地区。从和顺总公司分裂出来的“三条沟公司”，即为北上势力的代表。

与西加里曼丹的情况类似，文莱苏丹在整个砂捞越地区也面临统治达雅土著的问题。在华人入驻之时，正逢达雅人大规模“叛乱”之际。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人

采矿公司的引入，亦有文莱引入外援之意。即使华人社团不直接介入当地政治，他们定期所缴纳的租金，也将对文莱苏丹稳定当地的统治起到正面作用。只是参考西加里曼丹的地缘政治演化路径的话，凭借采矿积累而羽翼丰满的华人社团，有可能会最终主导砂拉越的政治和经济，为后人留下一个名为“三条沟共和国”的政治传说。

然而在西方势力开始加紧瓜分世界的 19 世纪后期，这一愿景实现的机率几乎不存在。最终阻止所谓“三条沟共和国”在砂拉越地区崛起的并非荷兰人，而是将北婆罗洲地区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人。不过和荷兰靠“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扩张模式不同，英国势力在砂拉越的登陆方式要显得更为神奇。公元 1838 年，一个叫作“詹姆斯·布鲁克”的英国冒险家，率领一条炮艇抵达砂拉越首府“古晋”港（这条炮舰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财产）。



詹姆斯·布鲁克在婆罗洲的征服



詹姆斯·布鲁克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是由众多资本通力合作搭建而成的“有限公司”平台的话，那么布鲁克和他的炮舰就纯粹是一个“个体户”了。在商业社会中，有限公司和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户”都具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从这点来看，如果大家对英、荷等国授权（或默许）“东印度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帮助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形式已经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对布鲁克这种个人冒险行为也不应该感到诧异。凭借强大的武力，布鲁克和他的追随者很快帮助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并于 1841 年从文莱苏丹那里获得了总督之位。也正是在这一年，华人采矿公司与它的前任签订了矿业承包合同。次年，不满足于此的英国人总督（马来语“拉惹”）宣布摆脱文莱苏丹的宗主权，成为独立的“砂拉越王国”，为了与那些土著王国区别开，这个白人王国又被称之为“布鲁克王国”。

很显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转移至砂拉越的华人采矿公司都不会愿意让自己置于西方人的管理之下。问题在于，英国人既然能够凭借武力制服达雅人和文莱苏丹国，自然也能够对华人采矿公司造成同样的压力。因此，尽管砂拉越矿场的华人



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布鲁克的统治，并且源源不断的从西加里曼丹吸引新的矿业公司及华人加入（包括在 1857 年发动武装起义），但最终还是只能接受现实。并不需要为砂捞越华人政治萌芽的遭遇感到遗憾，毕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势力的崛起，更多是一场意外，一场在荷兰人暂时未能北上而产生的意外。其积极意义并不在于有没有机会在海外再造中华，而在于让封闭保守的华人社会，有了一次自下而上重生组合的试验机会。只是在英国势力几乎同时登陆情况下，这场注定失败的试验，最终未能在砂拉越延续罢了。

布鲁克王国的领地原本并没有现在的砂拉越州那么大。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白人统治下的砂拉越王国，不断通过租借、武力征服等方式向东扩张，包括治服原本不接受其统治的华人采矿公司。整个扩张过程中的标志事件，发生在公元 1890 年。在这一年，白人国王的私人军队控制了“林梦”地区。如果不是把地图放大，你很难注意到今天面积狭小的文莱竟然还被分为了两部分。这块位于达雅山脉与南海之间，面积不足 4000 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就是林梦地区。林梦地区也是布鲁克王国及砂捞越州，最东边的一块土地。只是没有哪个国家会对这种一分为二的情况感到满意，尤其文莱苏丹国残存的总面积还不到 6000 平方公里。因此直到今天，文莱还在试图从马来西亚手中拿回林梦。

“白人国王”这种从被殖民地土著那里直接夺取统治权（并使用当地尊号）的模式并非孤例。在华人主导西加里曼丹的过程中，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兰芳公司崛起后不久，一位在竞争中落败的华人社团首领，率众征服了卡普阿斯河下游距海岸线约 100 公里的一个酋长国（戴燕），并开始以酋长 / 国王的身份世袭在该地区的统治，直至荷兰人彻底征服西加里曼丹的华人势力后方宣告结束。

无论是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模式，还是“布鲁克王国”这种冒险家模式，能够在海外立足，很显然都是依托于其母国的强大。区别在于，后者可以以英国保护国的身份，存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中。二战结束之后，布鲁克的后继者正式将砂捞越的所有权转移给了英国。20 世纪 60 年代，砂捞越与沙巴一同加入了马来联邦。与英国人在海外的花样殖民方式相比，被中央之国统治者视为天朝弃民的南洋华人社群，无论成长的路径与这些西方人有多少相似之处，最终都无法摆脱被政治边缘化的命运。像同样海外漂泊的犹太人那样倾心于经济，几乎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 第二节 苏禄王国控制婆罗洲沙巴地区

在西加里曼丹的形势开始恶化之后，砂捞越地区并非是华人（包括后来者）海外定居的唯一目的地。位于今文莱苏丹国之东的沙巴，同样也是华人寻梦之处。这一地区原本也属于文莱苏丹国的统治范围，只是早在 17 世纪中，文莱就已经将这一地区的主权割让给了另一个苏丹国——苏禄苏丹国。做出这一选择的理由，据说

是因为苏禄苏丹帮助其平息了境内的一场叛乱。不过参考英国人布鲁克的所作所为，相信大家也应该明白，在这一外交事件中，武力才是决定性因素。

在中国历史中，苏禄王国与文莱苏丹国的前身“渤泥国”享有着同等的待遇。这不仅因为这两个王国在郑和下西洋时，先后前往明朝朝贡，更因为跨海而来的两国国王都有因病离世，将自己留在了中国的情况。区别在于，山东德州的“苏禄东王墓”一直有子嗣留在中国守墓，并借用温、安两姓融入了中国社会；而没有子嗣守墓的南京“渤泥国王墓”则逐渐湮没于荒野之中，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才被发现。

苏禄王国的崛起之地并非位于婆罗洲，而是今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境内。苏禄人接触伊斯兰教的时间并不比文莱人晚。14 世纪末，便有伊斯兰传教士开始在苏禄群岛传教。至 15 世纪中，苏禄王国也如其它马来国家一样，变身成为了政教合一的“苏丹国”。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香料群岛上的香料如果要北出南海的话，苏禄群岛将是必经之路。

除了以其国命名的“苏禄群岛”以外，群岛与婆罗洲、巴拉望岛，及棉兰老岛等菲律宾岛屿之间的这片海区，也被命名为“苏禄海”。“苏禄”之所以压倒周边那些土地比自己大得多的岛屿，成为了海区之名，是因为崛起于群岛之上的“苏禄苏丹国”在立国之初，就基于自己的地理特点确立了一个“地中海”式的扩土模式，其正式的名称为“环苏禄海伊斯兰苏丹王国”。原属于文莱苏丹统治范围，今属马来西亚的沙巴地区，是苏禄人的主要侵略目标。棉兰老岛西南部及巴拉望岛，亦相继成为了苏禄苏丹国的领地。在其影响之下，整个菲律宾南部地区成为了伊斯兰教兴盛之地，有许多未被征服的土著部落同样开始接受伊斯兰教。

如果不是麦哲伦的环球旅行，菲律宾今天很可能已经被全面伊斯兰化了。16 世纪 60 年代，在西班牙人以北部的吕宋岛为基地，正式在菲律宾群岛开启殖民模式后，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同时起步。由于吕宋岛处在伊斯兰教海上传播链的最东端，当时并没有建立强大的苏丹国，因此天主教士的传播工作进展还是很顺利的。不过在已经立国一个多世界的苏禄苏丹国势力范围内，天主教的传播工作遇到了极大阻力。以至于西班牙人并无法真正统治这一地区。

在今天地缘政治舞台上，菲律宾南部残存的穆斯林地区，被称之为“摩洛哥”地区（意为摩洛哥人的土地），而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南部菲律宾人则被称之为“摩洛哥人”。“摩洛哥”一称源自于西班牙人，在最初登陆于此的西班牙人看来，这些马来穆斯林无论从信仰还是肤色上看，都与刚刚被他们赶回北非的“摩尔人”相似。因此“摩尔人”这个带有贬义的，原本指西北非穆斯林的标签被贴到了马来穆斯林身上（后因口音问题变成了“摩洛哥”）。只不过由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止步于此，“摩洛哥人”之称才并没有扩散到整个马来地区。关于摩洛哥人及北婆罗洲的故事还没有写完，下一节我们将就这一地区的历史恩怨做进一步的地缘解读。

### 第三节 英国夺取苏禄王国的沙巴地区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 19 世纪后期，北婆罗洲地区即已呈现出三分天下的格局，这其中包括：砂捞越的白人“布鲁克王国”；中部的文莱苏丹国；以及东部为苏禄苏丹国所领有的沙巴地区。19 世纪后期，上述三个地区都被英国人列入了殖民计划中，以进一步加强自己对南海航线的话语权。相比其它两个地区，英国在控制沙巴地区面临的挑战要更大一点。尽管英国人在 1881 年强行登陆，并从苏禄苏丹手中拿到了沙巴地区，但要想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和西班牙方面有个正式的条约。毕竟从吕宋岛南下而来的西班牙人，一直视苏禄苏丹国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一如当年荷兰人意识到自己无法与大英帝国对抗一样，西班牙人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

公元 1884 年，也就是在西方列强召开为瓜分世界确立原则的“柏林会议”当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条约，明确了沙巴归属于英国的事实。当然，作为回报，英国也向西班牙保证，不再染指包括苏禄群岛、巴拉望岛在内的菲律宾群岛南部岛屿。西班牙人这样做其实是明智的，因为十几年后的“美西战争”（公元 1898 年）证明了，西班牙已经变得多么的虚弱。如果说作为后发殖民帝国，德国的试图分一杯羹的方向主要瞄准了非洲的话，那么新生的“美帝国主义”，则把目标锁定在了西班牙身上。战争的结果是导致西班牙失去了在加勒比海（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亚洲（包括菲律宾、关岛）的殖民地。美国则完成了由前殖民地，向海洋帝国身份转变的关键一步。

随着菲律宾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前英、西两国所签订的关于沙巴的法律问题，也同样为美国所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没得到尊重的就是苏禄人了。在苏禄的统治家族看来，这种西方列强无视自己主权做出的决议，并无法律效力。以至于今天，大家仍然偶尔能够在新闻中看到，苏禄苏丹后裔声称要替自己和菲律宾拿回沙巴的言词。甚至在 2013 年，还爆发了 200 余苏禄苏丹家族支持者，武装登陆沙巴并与大马警方交火的严重外交事件（共造成 60 多名武装分子死亡）。

就很多有能力和愿望做到这点的大国来说，类似苏禄人的要求，不失为一个索取领土的法律依据。然而在菲律宾，苏禄苏丹家族更像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对于菲律宾来说，在尚不能对南部穆斯林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情况下，去扶持一位“苏丹”向邻国讨回历史领土无异于天方夜谭。更大的问题在于，无论是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都还与前宗主国保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很难在指责英、美当年出卖自己利益的同时，又从这两个最重要的西方国家那里得到支持。

尽管从国家角度来说，菲律宾不大可能去证明自己才是沙巴的所有者，但基于沙巴地区与苏禄群岛的地理距离，以及马来西亚相对更发达的经济，以合法或非法身份移居沙巴的大量摩洛移民，客观上不仅使得沙巴成为马来西亚人口增长速度最



快的地区，更成为了这一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 第四节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的分离主义

从直接安全威胁的角度来说，对沙巴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的，也并不仅仅是闹剧一般存在的苏禄复国者，还有来自菲律宾南部的摩洛分离主义者。在一个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国度，伊斯兰教徒很显然不会感到舒服（反之亦然）。鉴于菲律宾的穆斯林世居于南部岛屿，与北部吕宋岛上的居民并无政治统一的历史，如果没有分离主义倾向，反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了。事实上在沙巴境内制造大多数麻烦的，正是这些摩洛分离主义者。不过这些菲南极端组织本身对沙巴并无政治想法，他们潜入沙巴为的是绑架外国游客，以获取赎金。这其中就包括2014年2月，针对一名中国上海籍女游客的绑架事件（后通过斡旋获释）。

顺便说下，绑架外国游客在很多极端武装组织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笔生意。这些收获的赎金到底有多少是用来支持他们伟大事业的，对普通民众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应该有意识的避开这种高风险地区。以谋求摩洛兰地区独立为政治目标的菲南武装势力，是国际新闻的常客。最新的报道，是菲律宾那位特立独行的总统杜特尔特，在南部棉兰老岛等地延长军事戒严令，并高压打击极端武装。如果要圈定今天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活跃区，可在地图上找到“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这个于1987年妥协建立的穆斯林自治之地，主要包含有两部分：苏禄群岛（除伊莎贝拉市），以及棉兰老岛西南部，苏禄群岛东北方向的伊利亚纳湾部分沿岸地区（行政上主要包含南拉瑙省、马京达瑙省）。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摩洛人属性的分离组织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为很多派系。其中最为知名的有三个：一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二是阿布萨耶夫组织；三是马巫德。前者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武装组织，透过将近40年的武装对抗，客观上已经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2012年，菲政府与之初步签订和平协议。后者宣布放弃武装对抗，政府方面则同意升级“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的政治权力，使之更接近一个国中之国的地位。这个在“天下有变”时随时有可能升级为正式独立国家的政权，被摩洛人称之为“邦萨摩洛共和国”（邦萨意为“国家”）。

然而结构性矛盾，使得菲律宾南部地区获取和平的愿景变得遥遥无期。即使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能代表大部分摩洛人接受半独立地位，也一定还会有极端民族、宗教主义者，愿意跟随如阿布萨耶夫组织、马巫德这样，如基地、ISIS组织那样行事的极端组织制造事端（包括向这两个组织宣示效忠）。最近引发杜特尔特采取强硬手段的，甚至中断访俄之旅的便是马巫德组织。有鉴于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菲律宾政府都将继续为南部的穆斯林地区倾注大量精力。

虽然菲律宾政府很难清除南部的分离势力，但摩洛人想彻底独立也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毕竟摩洛人的总人口占比还不到菲律宾的 5%。其所覆盖的面积，也只有菲律宾总面积的 9%。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希望原本被认定为温和穆斯林的马来地区，出现一个极端立国的示范。因此所谓“邦萨摩洛共和国”一定要谋求彻底独立的话，除了像基地、ISIS 这样的极端组织以外，几乎不可能在国家层面获得支持。

单纯从菲、马两国维持平衡的角度看，沙巴归属于马来西亚，要比归属于菲律宾更容易维持彼此的地缘平衡。否则这个本就三足鼎立的南洋第一大岛（面积），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有人可能会从意识形态角度认为马来西亚会在菲南问题上有些暧昧，但事实上这样做对马来西亚并无任何好处。对于马来西亚这样多民族的联邦国家来说，更为关心的是国内的局势稳定。更何况“邦萨摩洛共和国”在领土问题上的远期目标，不仅延伸到了沙巴，甚至还包括了砂捞越。

其实现在婆罗洲特别是东马来西亚部分的地缘政治结构，就已经够复杂了。除了砂捞越、沙巴两州以外，东马地区还有一个一级行政区——纳闽联邦直辖区存在。这个法律地位与吉隆坡、布城相同的行政区，是位于文莱东北沿海的一个岛屿。19 世纪中叶，准备将北婆罗洲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大英帝国，希望在沿海寻找一个岛屿作为基地，最终选定的即是纳闽岛（公元 1848 年，从文莱手中“租”取）。离岸较近的岛屿，一直是海洋殖民者最为青睐的殖民地。既可通过自己的海洋实力影响甚至控制大陆沿海地区，在安全上又有极大的保障。只不过，这种做法有利于建立殖民统治的做法，往往在被殖民国家独立后，让本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在中国内部获得“特别行政区”地位的香港、澳门就是这种情况。

## 第五节 华人在婆罗洲的人口比例的变迁

好了，现在我们大致清楚了东马来西亚地区以及文莱的前世今生。基于西加里曼丹的那段华人开发史，以及 19 世纪的那场外迁潮，砂捞越和沙巴两地都拥有大量的华人人口，其中大多数又都属于客家人（与西加里曼丹的情况一样）。二者当中，砂捞越的华人比例最高，约占 27%（60 余万），这一比例甚至比当地的马来穆斯林还要高；而在沙巴地区，华人人口的比例也有 11.2%（70 万），只比马来穆斯林少 2 个多点。

当然，整个东马地区人口比例最高的，还是那些被分解为数十个民族，信仰也不尽统一的土著——其它民族。将之统称为“伊班人”可能会使其中一些部族感到不快。不过如果哪天这些土著部族能够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并联合起来，那么东马地区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出去，并非没有可能。鉴于砂捞越州是马来联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州，沙巴州则是人口第三多的一个州，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势必会极大削弱马来西亚的实力。每个国家都有可能面临民族及分裂问题，在这里从地缘角度分

析马来西亚的情况，并非是为中国政治干预他国内政，或者为一些朋友的海外再造中华梦寻找新的支点。新加坡的案例告诉我们，在地缘政治利益面前，同文同种并不总是加分项的。更何况历史上，南洋华人已经为他们在政治上的想法付出过太多代价了。

很多人都知道印尼曾经有过数次排华历史。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西加里曼丹是印尼华人根基最深的地区，也是上世纪 60 年代印尼排华事件中受损最严重的区域。尽管早在 19 世纪后期，西加里曼丹的华人政治便宣告终结，甚至出现了大量人口外迁现象，但整个西加里曼丹地区仍然拥有很高比例的华人。这些留在当地的华人，并不仅仅聚居于城市进行工商业活动，有部分甚至已经如他们的祖先一样，深入郊区山林觅得一片世外之地开垦，并形成一个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落（尤其是荷兰人夺取矿产控制权后）。有记录表明，在 20 世纪上半叶，华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还能达到 1/3，与土著达雅人的人口数量相差无几。

在经历过日据时期及上世纪 60 年代的印尼排华事件之后，华人在西加里曼丹的人口占比，已经不足 10% 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比例应该也并不会提高。如果深究这段历史的话，会明白日本和印尼将华人视为眼中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华人社群在政治理想上出现的一些变化。

今天作为最早大规模定居南洋的华人社群，西加里曼丹华人的这段开发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其标志是在“西加里曼丹省”获得了原住民族的身份认证。这意味着当地华人的政治权力不会如印尼其它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华人那样遭遇限制。也许在不可预见的将来，南洋或者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还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婆罗洲二百多年来的地缘变迁足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母国作为后盾，一切强行改变命运的举动，将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



## 第三十章 葡萄牙攻取马六甲产生的影响

### 第一节 葡萄牙征服南洋马六甲苏丹国

在通过荷兰人与加里曼丹华人采矿公司之间的恩怨，了解了婆罗洲的前世今生后，“马来亚”地区（东马）将是下一个需要详解的板块。到时大家会发现，在大英帝国开始染指马来亚之后，这一地区很快成为了下南洋华人的主要目的地。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大航海时代的历史中，还是当今的地缘政治舞台上，马来亚地区都是一个各方关注的枢纽点。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回到大航海时代的原点，回看下最早代表西方打通马六甲航线的葡萄牙人是怎么做的。

在取得“第乌海战”（1509 年）胜利后，已经能够在印度立足的葡萄牙人，立即向控制海峡的“马六甲苏丹国”派遣了使者，以期尽快打开通往香料群岛的航路。有记录表明，当时的马六甲苏丹不仅拒绝了葡萄牙使者要求开放港口的“请求”，还焚烧了葡萄牙人的船只。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两年后由 17 艘船只组成的葡萄牙舰队，抵达马六甲海域。事实上，马六甲苏丹是否应该强硬的将葡萄牙人拒之门外，并不重要。斯瓦希里海岸与马拉巴海岸发生的一切，足以使马六甲苏丹打消幻想。无论马六甲苏丹怎么做，也都不能让葡萄牙人放弃迷信自己的火炮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想法。

一如之前在印度洋上的多场海战一样，葡萄牙舰队在前后两场海上决战中，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损失了几乎所有军舰之后，马六甲的穆斯林统治者放弃了家族经营已逾百年的马六甲城，退守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柔佛地区（今马来西亚柔佛州），并将都城迁至扼守新加坡海峡入口的“宾丹岛”（廖内群岛主岛之一）。这一事件造成的另一个地缘影响是，尽管今天的马来世界主要被分割为印尼、马来西亚两大板块，印尼人也一直试图在强调他们在民族与语言上与马来西亚有区别（包括将自己的语言命名为“印尼语”），但各方（包括文莱）都认为，廖内语所在的廖内群岛是包括印尼语在内的广义“马来语”的发源地。当然，如果不是今天廖内群岛被划归了印尼，印尼方面愿不愿意做这样的认定，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马六甲苏丹国异地复国之举并不能让他们满意，尤其马六甲人还一直希望能够夺回自己的祖地。虽然他们没有力量与葡萄牙人正面对抗，但却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上袭扰他们。问题在于，葡萄牙人并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控制整个马来亚地区。反观被迫移驻廖内群岛的马六甲苏丹国，在经历过十几年的对抗后，也意识到自己并无力量赶走这些异教徒。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在公元 1528 年达成了协议，互相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并不再主动发起攻击。事实上，马来亚地区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值得葡萄牙人去开拓，攻占马六甲只是开拓通往香料群岛的航路。如

果能够拥有这个当时马六甲海峡最好的港口，且不再为保障马六甲海峡航路的安全付出额外的代价，对于志在东方的葡萄牙人来说，与马六甲苏丹国议和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不过对于准备接受现实的马六甲苏丹国来说，葡萄牙人的插入确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一方面海峡两岸那些原本臣服于马六甲苏丹国的地区开始重获独立；另一方面从今马来西亚霹雳州，到柔佛州等靠近马六甲海峡东段的部分（及其附属岛屿），虽然一直是马六甲苏丹国重点经营的直属区，但由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切入，这一尚且认同马六甲王室统治的区域，也顺势分裂为了两部分：“柔佛苏丹国”和“霹雳苏丹国”（由两个末代苏丹的王子分别建立）。

简单点说，在葡萄牙人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入侵马六甲之后，原本借力伊斯兰教东进，及华夏文明史无前例的海洋开拓之举（郑和下西洋）而兴盛一时的“马六甲苏丹国”宣告解体。在这场文明竞逐的舞台上，西方人开始在南洋乃至全球取得主导地位。然而这并不代表伊斯兰势力，就会这么快的放弃南洋这个必争之地。在马六甲王室无力代表马来伊斯兰世界展开对异教徒的反击后，在原本最早接受伊斯兰文化（南洋范围内）的亚齐地区，一个新的苏丹国开始代之扛起了圣战大旗。这个新苏丹国并非是之前曾经与马六甲王室联姻的“巴塞苏丹国”，而是由一支来自“越南”的马来人所建立的。乍一看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不过看过之前的内容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这些“越南马来人”就是占城人。从民族分类的角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占族人。

## 第二节 亚齐苏丹国崛起并与葡萄牙对抗

在马六甲苏丹国引领“马来族群”进入一个新时代的15世纪，人种和语言上同属马来民族的占城人，在越南中部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公元1470年，时称“安南”的越南攻陷了占城的都城，并兼并了占城的大量领土。此后的占城虽然还保有南部一小块领土不至于灭祀，但已彻底沦为了越南的藩属国，并在17世纪末完全并入越南。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占族人开始逃亡海外，这其中就包括一支由占城王族率领迁往亚齐地区的占族人。占族人聚居的区域位于苏门答腊岛的最北端，东距巴塞苏丹国约200公里。这个后来改名叫“班达亚齐”的港口城市，今天也是印度尼西亚“亚齐特别行政区”首府所在地的。民族、信仰，以及长期以来参与海上贸易的经历，是占族人将亚齐地区定为迁徙目的地之一的动因。

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征服，及后来所引发的一系列军事冲突，迫使大批原本以海峡东段港口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开始回流至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地区。之所以用“回流”这个词，是因为在马六甲苏丹国崛起之前，亚齐地区的巴塞苏丹国，一直是穆斯林商人在南洋地区最重要的中转地。不过巴塞苏丹国并未从马六甲的衰

弱中收获利好，抓住这次机遇的，是与之相距 200 公里“亚齐占族人”。占族人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原因之一是与他们在越南中部的同族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在南海地区开展贸易的穆斯林商人来说，这显然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海上贸易；同时，占城王族的背景，是“亚齐占族人”能够脱颖而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穆斯林 100 多年前扶植“三佛齐”王室后裔在马六甲建国的理由一样，“亚齐占城人”自带的政治遗产，不仅意味着能够迅速建立成熟的国家组织，更能从看不到政治希望的占城故地持续吸引人口加入。

事实上，在此之前客居班达亚齐数十年的占族人，还不得不接受时称“南淳里国”土著王国的统治。在郑和舰队的记载中，这是一个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但人口不过千余户的小国。接受文明水平更高，且更有商业头脑的占族人定居，是这个小国发展经济的一个机遇。最起码有机会在与邻国巴塞苏丹国的竞争中增加筹码。

然而逐渐掌控当地经济，并抓住马六甲王国衰弱战略机遇的占族人，很快便有了足够的力量反客为主，将“南淳里国”变成自己的“亚齐苏丹国”，一如马六甲苏丹国在 15 世纪初的崛起一样。在成为穆斯林商人最重要的中转地之后，占族人所建立的“亚齐苏丹国”，迅速崛起为了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强国，甚至吞并了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巴塞苏丹国。今天的印尼“亚齐特别行政区”，便是在当日亚齐苏丹国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仅仅控制苏门答腊岛北端，并不是亚齐苏丹国的最终目标。毕竟从位置上看，马六甲海峡东端要比西端更有利于开展贸易。那些原本在马六甲苏丹国庇护下开展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之所以选择投奔亚齐，很大程度也是希望有一股新的力量能够带他们重夺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尤其是在看到马六甲苏丹的后裔，开始放弃这一目标之后。

亚齐人自然也知道南洋伊斯兰世界，及穆斯林商人们对自己的期待。有鉴于此，这个国家自建立之日起，就带着“圣战”的气质。也可以说，这些完成占城人向亚齐人身份转变的“越南人”清楚，通过战争和更纯粹的信仰，不仅能够让他们在南洋“马来-伊斯兰”世界立足，更有机会取代马六甲王室成为地区领袖。

为此，亚齐人的军舰一次又一次的袭扰葡萄牙商船，甚至几乎攻陷马六甲城。只是从客观环境来看，占城王族后裔要想代表伊斯兰世界重新控制马六甲海峡，所面临的挑战可要比 100 年前的三佛齐王室后裔要大得多。与当年试图扼杀马六甲苏丹国的暹罗、满者伯夷相比，葡萄牙人在军事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商人们的选择并不是马六甲苏丹国得已强大的唯一原因，郑和舰队的安全背书，才是其完成原始政治积累的真正依靠。

既然在马六甲苏丹国的崛起过程中，郑和舰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亚齐苏丹国希望击败葡萄牙人的话，那么它也必须寻找一个强大的外援，才有可能做到。问题是，在郑和身故之后，大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央之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在海



外的政治扩张（尽管还会有商业往来）。更没有可能为了亚齐人的圣战，而专门组织一支舰队。亚齐苏丹国所期待的强援，只有可能从伊斯兰世界选取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印度是另一个可供求助的方向，尤其在这片大陆上，穆斯林在政治及海洋贸易上已经取向了主导权。只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已经击溃了印度穆斯林商人所策动的一次次反击。在家门口都无法对付葡萄牙人，更别指望他们能够在马六甲有所作为。

那么，纯粹从实力上来看，谁又能够成为亚齐的强援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东地中海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毫无疑问，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足以让它担当伊斯兰世界指路明灯的职责。问题是，即使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取得了埃及和红海的控制权，其与马六甲海峡之间还隔着一个印度洋呢。那么土耳其人有没有可能远赴马六甲，支持当地的圣战事业呢？答案出乎很多人意料，在亚齐苏丹向奥斯曼帝国请求了支援后，土耳其人做出了积极回应。

16 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在它的巅峰期，在“圣战”层面，不仅吞并了原为东罗马帝国所掌控的巴尔干地区，更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庇护下夺得了匈牙利的宗主权。然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开拓，却为帝国的繁荣带来了一丝隐忧。原本为穆斯林商人所控制的印度洋贸易，尤其是能够带来暴利的香料贸易，在葡萄牙人的冲击下，受到了巨大损害。为此，在葡萄牙人刚刚抵达印度之时，奥斯曼帝国曾经联合当时还未被其吞并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与印度西海岸的穆斯林政权 / 商人一起阻击葡萄牙人。不过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第乌海战等一系列海战的胜利，还是让葡萄牙人在印度站稳了脚跟。

现在亚齐苏丹国的强势崛起，给了奥斯曼帝国再次将棋下到东方的可能性。虽然二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土耳其人还是派出了一支由 15 艘船组成的舰队前往马六甲（公元 1565-1567 年）。这支舰队的任务并不止是直接参与马六甲战局，更多是通过带去技术工人，为亚齐提供欧洲先进的火炮、火药，乃至造船技术。使之在技术层级上，不至于被葡萄牙人拉开太远。有了奥斯曼帝国的庇护与帮助，亚齐苏丹国迅速得以强大。针对马六甲的战事，一直持续到 1575 年。不过葡萄牙人还是抵御住了奥斯曼 - 亚齐联合舰队的攻击，保住了马六甲。在这一波军事行动中，最大的收获反而是攻陷了柔佛苏丹国，使一直视自己为马来诸苏丹国宗主的柔佛，被迫接受向亚齐妥协。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惊讶？一场以圣战为名的战争，最终却开始同室操戈。

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感到意外，要知道在第乌海战时，威尼斯人可以为伊斯兰联军提供了很大的技术支持（帮助拆运船只至红海）。无他，盖因为葡萄牙人所开拓的新航线，极大地影响了威尼斯人作为中间商的利益。亚齐与柔佛等国交恶也是如此，对于柔佛等马来亚国家来说，即使亚齐真的能够赶走葡萄牙人，接下来做的也一定是建立一个以马六甲城为都城的，横跨马六甲海峡的“亚齐帝国”。在这种情

况下，已经接受配角定位的柔佛、霹雳两国，以及那些本已独立的马来亚国家，反倒会失去独立地位，倒不如利用葡萄牙人的存在，在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

这事情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持。基于意识形态而作出的1+1等2的设定，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实现。由于未能得到马来亚诸国的真心支持，亚齐最终暂缓了赶走葡萄牙的目标，转而用将武力对准了原马六甲苏丹国治下的其它地区。17世纪上半叶，彭亨、吉打、霹雳等苏丹国，相继被纳入了亚齐苏丹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还会看到，葡萄牙人与柔佛、北大年等马来苏丹国组成联军，一起与亚齐作战。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马六甲海峡三足鼎力的格局已然形成。无论是强势崛起的伊斯兰新势力——亚齐，还是旧势力的代言人柔佛，抑或是强势介入的葡萄牙人，都无法独占马六甲海峡和香料贸易的利益。这一僵局，直到荷兰人开始向东印度群岛扩张，才宣告打破。

### 第三节 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城

在阶级史观中，将“荷兰共和国”推向地缘政治舞台的那场革命，被称之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同时也被定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抛开阶级分析法不说，将这一历史事件定义为资本和商人阶层的胜利，是没有问题的。

荷兰人这一更纯粹、更“现代化”的属性，不仅体现在开创以“有限公司”形式主导海外殖民事业的模式（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貌似时间稍早一点），亦体现在香料贸易的争夺上。前面我们在提前介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情况时，就曾经解读过，将殖民中心放在爪哇岛（雅加达）的荷兰人，更注重从商品的源头处控制整个贸易。为此，他们不惜在香料群岛进行屠杀以及毁树行为。如果说前一项做法是比较通行的逼迫土著居民就范的做法（使之不与其它商业集团合作）的话，那么后一种将自己控制区以外的货源断绝的做法，真可以说的上是一种“商业创新”了。

荷兰人是在17世纪初开始进入南洋，并在爪哇岛建立殖民中心的。此后势力增长迅速的荷兰人，又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城（公元1641年）。不过正如之前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荷兰人并没有特别重视马六甲的经营。更注重从源头控制货源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这个枢纽之地拥有一个港口罢了。同时葡萄牙人之前的教训，也使得荷兰人明白，想要彻底控制马六甲海峡，会遇到多么大的反弹。相比之下，蚕食爪哇岛上那些没那么多海外利益和关系的苏丹国，反而要容易些。

“葡属马六甲”变身为“荷属马六甲”，意味着葡萄牙退出南洋地缘政治舞台的中心。在荷兰人的步步紧逼下，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所能保留的唯一据点，就此只剩下最东端的半个帝汶岛了（东帝汶）。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南洋的开拓，迎来了

荷兰时代。不过没有变化的是，代表马六甲苏丹国政治遗产的“柔佛苏丹国”，以及更倾向于以圣战形式立威的“亚齐苏丹国”，仍然是马六甲海峡最为重要的两大力量。

事实上，在夺取马六甲城这件事上，荷兰人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才能。简单点说，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在柔佛军队的帮助下攻下马六甲城的。而柔佛苏丹得到的，则是在荷兰人的支持下，继续充当马来亚诸苏丹国的盟主。唯一公开对此表示不满的，是同样具有马六甲苏丹血统的“霹雳苏丹国”。只不过在两个地区竞争者，一个从伊斯兰世界的最强者“奥斯曼帝国”借力（亚齐苏丹国），一个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代言人的“荷兰”合作的情况下，霹雳苏丹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结盟对象。

如果南海之北的中央之国此时还有郑和时代的雄心的话，无疑将成为马六甲诸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悲剧的是，几乎与荷兰人夺取马六甲、重塑南洋地缘政治格局的同时，曾经创造过远洋奇迹的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灭亡（公元 1644 年）。此后统治中央之国的清王朝，对海洋的唯一兴趣，是如何让海峡对岸的郑氏台湾臣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上得天下的满洲人，不仅没有进一步把视野扩张向“蓝海”（切断郑氏的海外的贸易链），反而是保守的选择了海禁。

不管清王朝当时的做法是否更有利于结束海峡对峙的状态，中央之国没有在王朝更迭的强盛期，如元、明两代那样尝试强势介入南洋地缘政治，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战略上看，这意味着自认为已经解除北方威胁的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海的那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更多是不屑）。直到 200 年后，大英帝国的炮艇驶入珠江口之后，古老的中国才真正明白，原来威胁并不仅仅来自长城以北。

当然，不重视海洋的锅完全让清王朝来背，也是有失偏颇的。从根本上看，这还是华夏文明深处的大陆属性所造成的。这一属性在重压之下并非没有可能改变，毕竟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央之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大陆国家。之前的重陆轻海，是因为一家独大于东方的地缘环境造成的。只是船大难调头，这一调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能够看到调整好的结果了。

#### 第四节 荷兰雇佣布吉人与马来亚锡矿的开发

回到马六甲海峡的博弈问题上来。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尽管在赶走葡萄牙人这个问题上，荷兰人与柔佛苏丹选择了互利合作，却并不代表荷兰人不需要从别的角度入手，加强自己在马六甲及至整个南洋的实力。对于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荷兰人来说，他始终面临一个和葡萄牙人一样的困境，那就是人口问题。葡萄牙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倾向于让男性葡萄牙人与土著婚配，然后诞生出一个身份认定为葡萄牙人，但又与本殖民地有亲缘关系“土生葡人”阶层。

葡萄牙人在种族问题上的宽容性，与伊比利亚半岛长期以来处在欧、非大陆博



弈焦点的位置分不开。从迦太基时代至穆斯林统治时代，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经历了上千年的混血史。而就欧洲整体情况而言，这一做法并不常见，尤其对于日耳曼血统的国家来说。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始作俑者便是以荷兰后裔为主的南非“布尔人”（现称阿非利卡人）。当然，所有的认知都是有可能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普遍“民主”的今天，人口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南非白人，开始有接受混血阿非利卡人（棕色阿非利卡人）群体的趋势。问题是长期受其歧视，甚至被称为“杂种”的后者，未必愿意领这个情。

对于处在东印度群岛开拓期的荷兰商人来说，同当时那些定居南非的荷兰农民一样，还没有用“混血”来解决人口问题的想法。单纯就建立统治，或者维护利益的需要来说（就不要再有“再造荷兰”的想法了），人口短板很大程度是体现在军事力量上。也就是说，荷兰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提供足够维持殖民统治的武器和物资，但还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来提升自己的武力值。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利用印度复杂民族结构而挑选出来按英军模式训练、组织起来的印度军队（由英国军官团统领），是大英帝国维护南亚统治，乃至向外扩张的重要助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会发现，在当年“八国联军”的合影中，还有一个包裹头巾的第9方代表存在。

身为商人的荷兰人，更倾向于用“雇佣军”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一如当年纵横地中海的商业国家迦太基、威尼斯那样。被荷兰人选中的雇佣对象，是一支来自于南苏拉威西地区的马来人部族——布吉人（又译武吉斯人、布吉斯人）。在地理分割严重、部族林立的苏拉威西岛，布吉人算是比较大的族群（目前的人口约为350万人）。不过鉴于苏拉威西岛的地形和地理条件，布吉人在岛上建立一个强大政权的机会并不大。即使在南苏拉威西地区，布吉人也还面临着位置更好的“望加锡人”的竞争。后者控制了岛屿最南端的“望加锡港”，并因为处在马六甲海峡、大巽他群岛与香料群岛航线的中端（且与南北向的望加锡海峡相交）而获益匪浅。最先在苏拉威西岛上建立了“苏丹国”的，便是望加锡人。

貌似有航路之利，但身位又不是最好的布吉人，选择了另一份有前途的传统职业——海盗。在南洋诸民族中，布吉人以善于海上冒险及“经商”而著称。只不过布吉人的“海商”之路，武力成份要显著得多。立足于爪哇岛的荷兰人，在向望加锡地区扩张势力时认识到布吉人的潜力。后来双方还通力合作控制了望加锡港这个重要的贸易中枢（公元1667年）。

布吉人的海商/盗事业与荷兰人的贸易版图都不会局限于望加锡。在控制马六甲之后，作为第三方合作者，布吉人也被荷兰人引入了马来亚地区，以为自身的安全增加筹码。荷兰人为这些强悍受雇者所选定的区域，位于今马亚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是因为一种重要矿藏——锡矿。

采矿业的兴起曾经是华人流入南洋，特别是西加里曼丹地区的重要原因。在马

来亚的一些地区，如吉打州也有金矿，不过真正让马来亚从资源的角度吸引殖民者及华工目光的还是锡矿。吉隆坡是南洋地区最早发现锡矿的区域，早在荷兰人还未进入南洋的 16 世纪末，就有西方考察者在吉隆坡一带的河流中，发现了富含锡矿的泥沙。

“锡”对于很多中国老人来说，往往意味着两种制品：一是用锡制作的器皿，如酒壶、烛台等；二是祭祀先人用的“锡箔”。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还会知道青铜是一种合金，在冶炼过程中加入了少量的锡（或铅）。其实在西方包括阿拉伯世界，锡也被大量用来制造家用器皿和宗教用品，这使得锡算得上是一种普及性比较高的金属了。不过荷兰人对东方航线的开拓，还为锡找到了另一个用途。

众所周知，在中国出口西方的商品当中，能够与丝绸、瓷器齐名的就是茶叶了。不过相比前两样商品，欧洲人熟悉茶叶的历史要晚得多。而最初将茶叶大量运往欧洲，开启欧洲茶叶消费市场的，就是 16 世纪初打通东方贸易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兴起，间接的刺激了锡的需求。为了防潮，木制茶叶箱的外层会覆盖一层俗称“铅皮”的铅锡合金；箱内也会用锡箔包裹茶叶（跟香烟用锡箔包裹是一个道理）。

及至今天，马来亚及整个南洋群岛地区，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产锡区之一，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马来西亚都是世界最大的产锡国。马来亚地区的每一个州都有锡矿，其中最重要的产锡地又是西部霹雳州－雪兰莪州一带（吉隆坡位于雪兰莪州内）。两州东临的“吉保山脉”，则是锡矿资源的输出地。在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期间，马六甲城客观上成为了两个马六甲苏丹国继承者：柔佛苏丹国和霹雳苏丹国的分割点。也就是说，在马来亚地区最早靠“锡”致富的，是在政治争霸中不太得志的霹雳苏丹国。

尽管柔佛苏丹国拥有更好的航路优势，以及地缘政治遗产，并使得葡萄牙人、荷兰人，都更愿意将之视为马来亚诸苏丹国的领袖，但霹雳苏丹国境内发现的锡矿资源，无疑为后者增添了独立自主的筹码。控制资源以形成垄断，是荷兰贸易帝国兴盛的秘诀。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增强对马来亚锡矿资源的影响力，雇佣军身份的布吉人，被荷兰人有意识的安置在了马六甲城与霹雳州之间的雪兰莪地区。很显然，霹雳苏丹不会满意荷兰人的这种做法。不过面对兼具海盗和雇佣军身份的布吉人，身份“高贵”的霹雳人并没有更好的办法。1740 年，在雪兰莪地区经营近一个世纪后，羽翼渐丰的布吉人，终于完成了政治上的进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雪兰莪苏丹国”。

布吉人在马来亚取得的成功还不止于雪兰莪。17 世纪的最后一年，马六甲王室在柔佛苏丹国的统治，为其首相家族所取代（一如先秦之“田氏代齐”一般）。这种常见的宫廷权力更替，并没有让柔佛苏丹国灭亡或者走向分裂。只不过从血统上来说，霹雳苏丹国终于成为了马六甲王室唯一的合法继承者。对于今天以“马六甲

苏丹国”为国家源头，并希望在南洋伊斯兰世界的更有心理优势的马来西亚来说（比之印尼），能够有这样一支纯正马六甲王室血统的存在，还是很有意义的。

尽管“柔佛第二王朝”的统治家族曾长期与旧主家族通婚，并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 有资格继承柔佛，乃至马六甲王室的地缘政治遗产，但在霹雳州还有马六甲王室直系继承者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招致了普遍质疑，并给了觊觎柔佛地理位置的其它国家以入侵口实。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悍的布吉人雇佣军团再次被寄予厚望，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掌握了柔佛的军、政大权。19 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的认可下，布吉人终于登堂入室建立了“柔佛第三王朝”。鉴于自己的出身远不及前两个王朝，这个延续至今的新柔佛王朝，更愿意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曾经与之联姻的某个阿拉伯贵族那里。

其实一般情况下，王室之间的这些恩怨并不是地缘解读的主方向。在这里解读布吉人之于马来亚的历史，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旧苏丹国的继承者至今仍是所在州的世袭元首，并对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发挥决定性影响。如果中国想在南洋乃至更远的蓝海有所作为的话，多了解一点相关背景总是没有坏处的；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再次体会下，种族乃至宗教上的共同点，从来不是左右地缘政治关系的主因。在政治家眼中，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 第五节 米南加保人在马来亚建立森美兰国

在荷兰人统治马六甲时期，布吉人并非是唯一被引入平衡马来亚本土势力的外来民族。还有一支源于苏门答腊岛西部高地的民族——米南加保人，也同样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米南加保人是苏门答腊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人口约 800 万。这个民族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牛”文化无处不在。至今仍然在米南加保人的头饰及民居设计上，看到牛角的形象；二是母系社会遗风浓厚。今天在米南加保人家庭中，母亲仍然承担着一家之主的职责。

有一种说法认为米南加保人的祖先来自云南，大约在 2500 年前迁至苏门答腊。要是单纯从民族服饰及民居风格来看，倒是与云南一些少数民族风格颇有类似之处。其实在南洋很多民族中，都有类似的传说。另一类能够与中国联系上的传说，便是某位来自中国的公主，曾经在郑和时代前往马来地区和亲（马来语称“汉宝丽公主”）。不管此类传说有多少可信度，最起码能够证明，中国的影响一直存在于南洋吧。

米南加保人在马来亚建立的国家叫作“森美兰”，位于马六甲和雪兰莪之间。尽管基于文明发展的必然性，米南加保人在很多方面也开始向父系社会转变。包括开始接受父权思维浓厚的伊斯兰教，但相对“原始”的氏族文化，使其在国家的结构上，也有别于其它马来苏丹国。简单点说，森美兰人在马来亚建立的国家类似于“部落联盟”的结构。



在马来语中，“森美兰”是“九个州”的意思。最初移民马来亚的米南加保人，按照自己的氏族归属自然形成了九个城邦。为了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并形成合力对抗外部压力，九个米南加保城邦在18世纪上半叶（1730年），结成了联邦结构的“森美兰”。有别于其它马来亚苏丹国，森美兰的国家元首并非由某一家族所世袭，而是由州内四大部族的首领定期选举产生，并称之为“严端”（意为最高统治者）。

由于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隔海峡相望的地理关系，以及米南加保人在苏门答腊岛的人口优势。早在马六甲苏丹国崛起时，就有米南加保人被引入，以平衡原有的马来亚土著势力了。马六甲苏丹国的崩溃，以及荷兰人有意分而治之的想法，给了米南加保人最终建立国家的契机。

锡矿的发现，是“马来亚米南加保人”数量增加，并最终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布吉人在马来亚立足，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属性的话，那么米南加保人的情况，则多少与后来移民南洋的华工有些类似了。在米南加保人所世居的苏门答腊西部山地中，向来以出产金矿而著称。这意味着米南加保经济中，除了依靠“牛”的帮助来经营的农业以外，还拥有一定程度的采矿业。马来亚的所发现的锡矿，不仅成为了普通米南加保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更为“森美兰州”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 第三十一章 英国殖民马来亚对其地缘结构的影响

### 第一节 英国建立海峡殖民地与南洋华人的分化

作为一个地缘枢纽，马来亚成为四方民族汇聚之地，并不让人意外。即使是充当马来西家国家源头的“马六甲苏丹国”，其建立者同样来自于苏门答腊。共同的种族背景以及信仰，使之在融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并无技术上的障碍。然而今天的马来西亚，却依然是一个种族分立明显的国度。华人、印度人社群与马来社群之间虽然在共同的“马来西亚”国家认同下，尚能和平共处，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却没有融为一体的可能性。在马来穆斯林看来，最应当为这一“三族鼎立”的格局负责的是英国人，因为华人和印度人大量涌入马来亚，都是在英国主控马来亚之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决定将扩张重心放在亚洲的大英帝国，相继在马六甲沿线获得了三个重要支点，包括：西端的槟城、中部的马六甲城，以及东端的淡马锡（新加坡）。这三个英属港口合在一起，被称之为“海峡殖民地”。其中除了荷兰人交出来的，马来亚传统地缘政治中心“马六甲”以外，槟城和淡马锡都是最适合建立直属殖民统治的岛屿。只不过前者的政治范围，后来又从所在的“槟榔屿”岛扩大至了对岸。

为了强化自己在马来亚的控制力，英国人并没有如荷兰人那样，从其它南洋岛屿上引入马来部族，而是将吸引人口的方向，放在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超级人口地区身上。选择前者的原因，是因为印度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选择后者，则是因为英国人发现，华人的适应能力及生产效率，要远远高于南亚、东南亚的热带民族。

在荷兰人控制西加里曼丹的采矿业之后，马六甲海峡周边地区，尤其是英国人控制下的“海峡殖民地”成为了华人矿工移民的重点地区。对于南洋华人来说，开采锡矿与开采金矿，在技术上并无本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荷兰人还是英国人治下的种植园里，这些原本在中国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在转而经营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时，同样拥有巨大的优势。为此，诸如米南加保人之类的马来民族，很快便在这场产业竞争中落了下风。只不过出于分而治之，及减少管理成本的原因，英国人将政治管理权更多向土著马来政权倾斜罢了。

一如所谓的“马来人”内部存在多样性现象一样，在马来亚这个文明交汇之地，华人群体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19 世纪以前，最远可以上溯到明朝的小规模华人移民，由于不具备种群优势，大多都一定程度开启了土著化进程。这一进程显现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迎娶了当地的马来女子，使得血统上呈现了一定的混血性；二是在语言上同样呈现出混合性，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纯正的华语（主体为福建方言），而是混杂了很多马来语甚至泰语的成分。由于这些马来“土生华人”的社群中的男

性又被称之为“峇峇”（女性则被称之为“娘惹”），因此这一语言又被称之为“峇峇语”。整个土生华人社群则被统称为“峇峇娘惹”。

尽管无论在血统还是文化上都出现了一定混合性，但峇峇娘惹无疑还是华人的一份子。在这个土生华人社群形成之后，一般并不会选择再与马来族通婚，而是会从相同背景的家族，或者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中选择婚姻对象，以避免被马来人同化。这也使得整个峇峇娘惹群体，在文化上仍具有鲜明的中华特征。在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英国主导马六甲政局之后，土生华人社群在文化上又出现了新变化。这些兼具华人优秀品质，又与当地马来社群沟通无碍的“峇峇”，成为了英国经营海峡殖民地的得力助手。而接受这一定位的土生华人，除了在自己的语言技能上再增加一项“英语”之外，很多也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开始在生活方式上模仿西方。

与土生华人群体相对应的，是“新华人移民”群体。19世纪初，在英国开始渗入马六甲海峡，并率先占得槟榔屿之后，便已开始主动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招募华工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英国对华贸易额的剧增，马来华人的数量出现了质的飞跃。对于这些为了生计而“下南洋”的新华人移民来说，并不愿意视那些完成本土化进程，并成为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统治助手的“土生华人”群体为同类。“海峡华人”，是那些坚守故乡传统的华人移民，对这些出现西化倾向华人群体的称呼。

由于最先成为英国统治助手的主要是“峇峇娘惹”群体，这也造成“峇峇娘惹”与“海峡华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然而即使是19世纪后期移民马来亚的“新”华人群体，也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三代成峇”。新华人移民对自己的第二代还能够灌输故乡的记忆，但到了第三代，其本土化认同往往就要压倒自己的中国认同了。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政治分割的台湾岛。以至于绿营的台独主义者们，认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时间为之创造了“天然独”群体。

总的来说，“海峡华人”并不能等同于“峇峇娘惹”群体。如果说后者所吸收的主要是马来文化的话，那么前者所表现出的则是西化或者说英国化了。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为例，李光耀的曾祖父，广东大浦客家人“李沐文”是李氏家族移民新加坡的第一代（公元1862年）。从时间上来看，李氏家族无疑属于“新华人移民”群体而非峇峇娘惹群体。然而作为移民家族的第四代，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2岁便前往英国留学。以至于后来被英国人评价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纯正的英国人”。

有趣的是，李氏家族的祖籍也是兰芳公司成员的来源地。如果不是以兰芳为代表的华人采矿公司在西加里曼丹势衰的话，李沐文下南洋的目的地，应该很有可能是西加里曼丹了。不过兰芳公司的这段历史，对李光耀亦有很大影响。最起码在日后建立新加坡的过程中，李光耀在处理与马来人，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吸取了兰芳公司的教训，并使得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具备了独特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尽管很多中国人对于李光耀的亲西方倾向，以及其甚至更希望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联邦的



想法颇有微词，但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说，他只是选择了一条最适合在夹缝中求生的道路吧。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移民南洋的华人，都务实的接受西方化的“海峡华人”定位。事实上，无论是李光耀及其所代表的“海峡华人”，还是被很多坚守纯粹华人文化的南洋华人所轻视的“峇峇娘惹”，都只是华人在适应环境时所做出的一种选择罢了。是否选择吸收土著或者强势文化，并不会改变他们“华族”认同（不是政治上的中国认同）的本质。这是因为，一个身处异地的族群，如果不想被融合并失去自己原本优势的话，坚守自己的文化核心，与周边民族划清界限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从技术角度看，移民群体自身的文化越强大，能做到的机率就越高。就这点来说，有 5000 年文明史做依靠的华人，以及用“犹太教”来武装自己的犹太人，都算是成功者了。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峇峇娘惹”都能被归类于“海峡华人”，同样也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是“海峡华人”。在这个概念形成之初，真正能够接受英式教育，并成为英国统治“海峡殖民地”助手阶层的毕竟是少数。只不过新加坡在立国之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海峡华人”群体，的确从国家和文化角度一直在强化“海峡华人”的属性。以至于以英语教育主导的新加坡华人群体，与坚守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然而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的选择，说到底只是个务实的选择。基于维持自身种群特征的需要，即使在一定历史阶段淡化了华文教育，也无法改自己“华族”的定位。因此尽管新加坡在立国之后显现出了很强的英国化特征，甚至在地缘政治上倾向于依靠西方力量来维持地区平衡，但在中国强大之后，海峡华人文化中务实因子，也同样会促使其开始强调自己的“华人”属性。

## 第二节 君主立宪制及其他政治权力分配模式的利弊

荷兰人更加纯粹的商人属性，使之在 17 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有些“唯利是图”的属性，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今天大家会看到，一些前殖民地居民会怀念大英帝国曾经的统治，包括精英阶层以受封英国“爵士”为荣，但在荷兰人殖民最成功的南非、印尼，却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对殖民者的认同，好似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将之称为“被殖民综合症”并不为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技术角度，分析下大英帝国为什么能够更加成功。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管理工作的话，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在“分权”与“集权”问题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打造了一套适合自身特色的平衡体系。这种平衡反映在政商关系上，就是既可以通过高度授权的“东印度公司”进行扩张，同时也没有被商业阶层所绑架。

从结构上来说，经济无疑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则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以期维持社会的运行。任何为单一力量所主导的政治体系，本身都面临着瓶颈。荷兰这种纯粹由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商业共和国”，与威尼斯这类“中世纪商业共和国”，乃至“迦太基”这种“古典商业共和国”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办法被更多的人，尤其是被统治者产生国家归属感。一旦觉得不能从联邦中受益，组成“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那些省，甚至会毫不犹豫的脱离这个体系。



英国女王

与荷兰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组织模式相左的另一个极端，是常见的“军政府”模式。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和混乱时，最为强调意识统一和权力集中的军人阶层，往往会被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是说无论当时的客观效果是好是坏，带有明显军事主导色彩的政治模式，

都将对社会多样性及决策的战略性和致命影响，并最终造成体系的崩溃。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便是典型案例。

以大英帝国的情况来说，并没有出现过商业力量和军事力量主导帝国走向的情况。这一文一武两股力量，更多是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下相辅相成。在这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以至于被当时的荷兰、法国资产阶级所摒弃的传统权力核心——王权。17世纪末，英国率先爆发了带有新兴商业力量（资产阶级）崛起性质的革命——“光荣革命”。不过与后世很多类似性质革命不同的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而是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改革——君主立宪。

所谓“君主立宪”制，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统而不治”，在保留君主作为国家统一标志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英国的这一创新，不仅让它在权力分配上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为后来各君主国所仿效），更在体系里保留了旧制度中的有用部分。在大英帝国成为过去式后，邦联性质的“英联邦”成为了英国与诸前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平台。至今仍有16个国家（包括英国），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名义元首。不得不说，君主的存在为这个“共主邦联”性质的组织找到了一个聚结点。相比之下，法国为前殖民地所打造的政治圈子“法兰西共同体”就

要失败得多了。这当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法国没有办法推出一个，让前殖民地共同认同的聚结点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追溯历史的话，大家会发现，将中国推上“中央之国”定位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类似英联邦的“共主邦联”模式。只是基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在运行模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日本则是又一个采纳“君主立宪”制而完成转型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基于日本与英国类似的地理位置，以及天皇长期以来本已成为“虚位君主”的背景，英国一直是日本在崛起之时所效法的直接对象。作为欧、亚两洲最成功的殖民帝国，让“君主”和其所代表的阶层，以新形式继续发挥作用的做法，最起码使得两国在这个危险的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内部消耗。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是否选择一个“君主”作为名义元首，要看君主的存在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内部矛盾。历史上最为失败的案例，当属曾经认为只有恢复君主制，才能避免中央之国分裂的袁世凯了。对于积重难返，并且在认知当中一直视“君权”为“集权”代名词的华夏文明来说，一场推倒重建的革命看起来会更有号召力。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荷兰。荷兰在17世纪的崛起，可以说是“商业共和”力量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在19世纪初，荷兰模式走向没落后，荷兰人又重新请回了国王，以至于今天看到的荷兰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王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在佛朗哥结束军人极权统治时代后，西班牙人重新迎回了自己的国王（1975年）。至于说是否能够找到适合的人选，这在欧洲倒完全不是问题。即使是变革最为彻底的法、德、俄等国，如果有一天需要国王的话，也一定能够找到血统和法理上合规的人选。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时，都需要更多考虑自身的客观环境，并基于环境作出最合理的战略设计，在海外扩张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今天作为曾经的一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已经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美国自二战以后，不遗余力的以自身制度为模板，对外推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一个“地缘量变期”（50-60年）过后，无论是曾经被美式普世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国家，还是美国自身，都对这个“一套模板打天下”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在扩张政治控制力问题上，最让美国有挫败感的地区当属中东。自外向内的暴力重建（伊拉克）和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这两种手段都未能在中东取得预期的效果。对美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无论你以哪种形式摧毁一个旧世界，都未必能够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一个新世界。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上台就是最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以至于美国不得不默认埃及重回军政府模式，并对那些看起来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做法视而不见（如一次判处数百人死刑）。

今天，特朗普这个看似异类的美国总统上台，以及他关于“将停止推翻外国政



权的竞赛”一类的外交政策表述，都表露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依然将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很有可能在外交取向问题上出现反复，不过如果想反思得更彻底点的话，其前宗主国“英国”的帝国史，应该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 第三节 英国建立马来联邦并与泰国分割马来半岛

在海外“殖民”过程中，大英国帝国在制度上的创新可以说是最多的。与欧洲其它国家多采取直接统治模式，尽力将被殖民地与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融为一体的做法不同的是，英国人更愿意采取相对柔性的“间接”统治模式。纯粹从扩张者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做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不过如果你的目标地区是不与本土相连的海外地区的话，英国人更为柔性的方式会更具性价比罢了。

这种更具弹性的殖民模式，在马来亚地区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帝国在马六甲海峡的直接支点，英国在由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组成的“海峡殖民地”，统治力度是最强的。这一直接统治模式所造成的一个地缘后果，就是英国人能够更加自由的根据需要，塑造海峡殖民地的民族结构。今天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区域，与马来人比例相当（2015年），占比超过40%，马六甲亦有将近4成的华人比例，就是在英国人改变下的结果。

公元1895年，英国在马来亚南部组建了一个控制力度稍弱于“海峡殖民地”的，包含有四个马来亚苏丹国：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以及彭亨的“马来联邦”。在这个殖民政治体中，上述四国原有的统治者，除了涉及马来-伊斯兰文化的事务可以自行决定以外，其它的外交、内政事务均由英国负责或者“指导”。

一直认为自己是诸马来亚国家领袖的“柔佛苏丹国”，并没有成为马来联邦的一部分。从殖民控制的角度看，最有“历史”的柔佛苏丹国，也是最晚进入英国殖民体系的马来亚政治体（1914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作为最后一个被荷兰人征服的苏丹国，亚齐苏丹国的独立一直维持到了1904年。不同的是，今天在马来西亚联邦中，柔佛和它的苏丹家族仍然享有很高的自治权。而在更愿意走单一制模式的印度尼西亚，自认为在宗教、政治两方面都拥有光荣历史的亚齐，却成为了整个印度尼西亚境内最有独立倾向的区域。在印尼整体奉行世俗化政治原则的背景下，亚齐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苏丹国”。

在马来半岛，仅仅控制南部地区并不会让英国人感到安心。从将控制线推进到更符合天然疆界的角度来说，即使不能将克拉地峡以南马来半岛尽数收入囊中，最起码也要把依附于以大汉山为核心的，包括吉保山脉、东海岸山脉的山地，及其沿岸平原的马来亚地区，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方位上，英国人面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时称“暹罗”的泰国。

作为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欧美殖民的国家，泰国善于左右逢源的政治技巧，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英国并不是唯一在 19 世纪大肆在东南亚扩张的欧洲国家，与之相爱相杀的法国，也同样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南半岛布局。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将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整合成了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在英国控制缅甸的情况下，泰国则面临着被英法两国瓜分的巨大风险。

不过除了被瓜分外，泰国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充当英、法两国的缓冲国。最终经过努力，泰国取得了这个定位。当然，与此同时泰国所能控制的区域也大为缩水，这点在马来半岛的分割问题上亦有体现。在整个 19 世纪，泰国人认为他们的控制线最起码应该包括马来亚北部的：吉打、北大年、吉兰丹、丁加奴（登加楼）四个马来地区。尽管这一区域的马来人自己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至多与泰国之间维持着一种类似泰国人认定的“朝贡”关系，但英国在建立“马来联邦”时，未能将范围继续向北扩张，不得不说是因为泰国利益线存在的关系。

20 世纪初，在柏林会议为各殖民帝国催生明确边界线的大背景下，英国也终于与泰国就两国签订了分割马来亚的正式条约（1909 年曼谷条约）。其中泰国政治渗透较深，已经进行直接统治的北大年地区被划入了泰国，其余三地则在已和英国签订保护条约的情况下，正式划入了英国势力范围。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今天马来西亚最西北部，也是最小的一个州——玻璃市州。

玻璃市州长期是吉打苏丹国的一部分。19 世纪中叶，迫于泰国的压力，吉打苏丹被迫将玻璃州割让给了泰国。1909 年，英泰两国签订条约，在马来半岛划分势力范围时，玻璃州成为了英国殖民地（但却没有回归吉打）。这段历史，一方面使得面积狭小的玻璃州市得以在马来西亚，获得一个与吉打平级的行政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玻璃州王室，只能以“拉惹”自称（比苏丹略低一级，相当于“亲王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除了缺失北大年这个角以外，英国基本完成了以“马来—伊斯兰教”为地缘特点的“马来亚”板块的控制。这一地缘结构上的错位，虽然可以被视为泰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但却为今天泰南的局势的稳定埋下的伏笔，以至于北大年苏丹国故地成为了泰国分离主义思维最为严重的区域。

#### 第四节 英国治下南洋各板块组建马来西亚

1909 年，在解决好与泰国的关系后，英国旋即即将北马来亚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四地，打包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政治体——“马来属邦”。在这个内政自主权高于“马来联邦”的政治体中，英国人也不忘补上“英属马来亚”的最后一块拼图——柔佛苏丹国（1914 年被迫加入）。在英国解决好与地区另两大势力：荷兰、泰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后，这个自视最有资格成为马来亚领袖的苏丹国，最终失去了独立的筹码。

事实上，类似马来联邦、马来属邦这种灵活的政治归类法，英国人在印度已经操练得很熟了。那些在“英属印度”范围内尚能维持传统君主制的土邦，根据保留权力的不同，大体也是被分为了这两大类。其在地缘上的共同点，就是英国并不会刻意去打破被殖民地原有的民族、宗教，乃至习惯法结构。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也为英国人的统治留下了一个宽松统治的“好”名声。以至于今天还有那么多前殖民地，对英国人曾经的统治存有好感。单单从争取认同感上来看，英国人的这种做法的确比美国过往那种，一定要逼迫他国政治结构、价值观向自己看齐的做法，要更有效得多。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最强海洋国家的标志，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战后为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美国人并不愿意看到欧洲那些老大帝国仍然在海外殖民地拥有主导权，同时在大陆以外缺乏殖民地的俄国人，亦同样对此耿耿于怀。因此随着二战对世界霸权的重新定义，以及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衰弱，全球范围内迎来了民族国家独立的高峰期。

1946年，作为殖民时代向民族独立时代过渡的产物，英国治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合并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并于1957年获得了正式的独立国家地位。不过此时的英国，还对在马六甲保有一个直属殖民地存在幻想，因此并没有把位置最好的新加坡放入这个新生国家的范围。然而在大势面前，英国最终还是不得不把自己在南洋的殖民地打包为了“马来西亚”。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合并建立了今天的“马来西亚联邦”。唯一的例外，是同样在婆罗洲拥有最强宗教、政治历史的“文莱苏丹国”。如果英国人决定让“砂文沙”地区单独成立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文莱应该是很愿意充当这个新国家核心的。那样的话，这个新国家的历史源头，将毫无疑问的指向15世纪初的文莱。然而一旦与马来亚地区组成联邦，那么无论在政治还是宗教上充当源头的，就只能是更有资格的“马六甲苏丹国”了。

事实证明，文莱的选择是对的。今天在东马人认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遭遇了马来亚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文莱却得以凭借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及海底的石油过得顺风顺水。与文莱的处境类似的还有新加坡，不过与文莱主动选择不加入“马来西亚”不同的是，新加坡却是被“踢”出去的。这其中，潜在的种族矛盾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那个过渡性的“马来亚联合邦”中，华人人口占比为40%，而在吸收进新加坡，及东马的砂拉越、沙巴两州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2%。加上以印度人为主的其它族裔（目前印度裔占马来西亚总人口7.3%），成立之初的马来西亚，马来人与非马来族裔之间形成了均势。很显然，这一比例将对力推“马来人优先”原则的马来人不利。两年之后，“新马分离”议案在马来人主导的议会全票通过，新加坡被动的迎来了独立。随着新加坡的独立，以及出生率上的差异，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比例



则下降到了 1/4。

在族群争端中，每个民族都会希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从这点来说，以原著民自居的马来人，试图为自己多加一层政治保护并非不可理解。马来西亚地缘结构的复杂之处，不仅体现在种族层面，还体现在特殊的联邦政治结构上。在马来亚地区，当年被英国保留在“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中的马来亚国家，在联邦结构中亦完整保留下来。吉兰丹、森美兰、彭亨、霹雳、玻璃市、雪兰莪、森美兰、登嘉楼、柔佛等 9 个“苏丹国”不仅直接转身为马来西亚联邦的 9 个州，其旧统治家族亦仍然承袭着所在州的“元首”之位。

至于马六甲、槟城这两个原英国直属的“海峡殖民地”，以及东马的砂捞越、沙巴两州，则因在殖民时代终结了“国家”传承，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推举“州长”一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马来西亚的三个“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布城、纳闽。今天马来西亚最为知名的城市，应该就是马来半岛南端的吉隆坡，也是马来西亚的首都。不过这个首都的定位与中国人脑海中的印象多少有些区别。2001 年为疏导首都压力，将城市功能更好为商业、金融服务，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南 25 公里处新建了行政中心“布城”，并将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行政部分迁驻于这个新“联邦直辖区”。

对比中国最近为疏导北京“非首都功能”而做的雄安新区规划，大家也可看出二者虽然在动机上相似，但在具体做法上的选择却大相径庭。对于中央集权体系的中国来说，首都的“政治功能”是最为核心的功能，更能因此吸引大量的资源附着。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哪天真把管理全国事务的行政部门从北京迁出，那就真是迁都了。同样的选择放在马来西亚这种联邦体国家身上，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政治中心的定位，并不能天然带来更多的资源。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更多源自于它在商业层面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吉隆坡宁愿把行政中心迁出去，也要力保其金融、商业中心地位的原因（华盛顿的弱势也是如此）。

参照中国的行政结构，“联邦直辖区”的定位相当于中国的“直辖市”。相比于其它行政区，无论在殖民时代还是现代国家，“直辖区”的设立，往往都带有更多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如果说吉隆坡、布城直辖地区的取得，是因为它们的“首都”功能的话，那么“纳闽”的直辖则更多源自于殖民时代的定位。在渗透婆罗洲的过程中，英国人也同样需要一个类似于新加坡的离岸港口作为强力支点。这个点最终便落在了原属文莱领土的“纳闽岛”身上。1906 年，纳闽岛被从英国治下的“北婆罗洲”（沙巴）分离出来，并入了“海峡殖民地”。尽管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纳闽曾一度回归沙巴，但基于这段历史及它的地理位置，它还是在 1984 年获取了“联邦直辖区”的地位。今天定位为自由港及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纳闽，更多是作为一个类似香港的存在，在拉动东马来西亚经济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地缘作用。

好了，透过对马来西亚前世今生的解读，历史、地理、政治这三个看似独立的

学科，再一次在地缘视角下完成了一次交叉。接下来，我将重回“大航海”这根主线，随着葡萄牙人及其后来者的航迹向南海之北航行。接下来，这些欧洲人将遇到他们整个扩张过程中最大的挑战。